

書叢育教民公

# 育教民公士瑞

著斯克魯布  
譯曾繼魯

者編主  

---

五雲王  
翹 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士瑞

著斯克魯布  
譯會繼魯

者編主  
五雲王  
愨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月購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31488)

公民教育叢書 瑞士公民教育一冊

Civic Training in Switzerland:  
A Study of Democratic Life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Robert Jackson Brooker

原著者

魯繼曾

譯述者

王雲

主編者

韋長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總之，它（瑞士）所給我們的最耐尋味的教訓乃是傳統與制度聯絡一致時，怎樣能超邁往日之成績，在一個普通人身上發展優良公民之品質——精明、中庸、常識、以及對公共團體之責任觀念。就因為這在瑞士已有成效，所以它的民主主義比任何國家都更真純。』

語見 James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II 449.



## 編者原序

本叢書，乃是由幾位專家，根據類似的計劃，分擔歐、美八個國家的公民教育之分析而成，本書就是其中之一種。本叢書之共同的旨趣，從廣義上說，乃爲物觀地檢討各國的政治團結之制度，判定公民訓練，在這些近代國家中之廣大的趨勢，並且指示公民教育之更大的發展，與統治之可能性。就有兩個國家，意大利與俄羅斯，現正以驚人的手腕，嘗試於新型的政治的忠貞之締造。德、英、美，法代表現代強國，以及政治團結的各類型之發展。瑞士和奧、匈，是用以顯證欲協調中央政治的忠貞與紛歧而抵觸的民族與宗教的因素所必遭之困難。

本叢書包括下列各課題：

- 一、蘇聯（註一）——芝加哥大學俄國語文及其制度教授哈柏著（*Soviet Russia, by Samuel N. Harper, Professo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二、大不列顛——威斯康新大學政治學教授葛斯著（*Great Britain, by John M. Gau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三、奧、匈（註二）——前任蒲達貝大學教授，現任奧勃林大學政治學教授查惹著（*Austria-Hungary, by Oscar Jasz, formerly of Budapest University, now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Oberlin College.*）

四、美國——海德堡大學財政學教授普潤克滿著 (The United States, by Carl Brinkman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五、意大利 (註三)——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席奈德和哥倫比亞大學史學講師苦羅合著 (Italy, by Herbert W. Schneider,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in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Shepherd B. Clough, of Columbia University)。

六、德意志——紐約市圓哀蘭大學教授郭塞克著 (Germany by Dr. Paul Kosok, New York City)。

七、瑞士——本雪汎尼亞州史瓦斯摩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布魯克斯著 (Switzerland, by Robert C. Brook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Swarthmore College, Swarthmore, Pennsylvania)。

八、法蘭西——哥倫比亞大學史學教授海士著 (France, by Carleton J. H. Hayes,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Columbia University)。(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戰後法蘭西叢書之一種，因其與本叢書之旨趣相同故特列入)。

九、美國學校教本中之政治的態度——芝加哥大學史學副教授皮爾斯著 ( Civic Attitudes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by Bessie L. Pierc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十、原始政治組織——紐約市亨特大學政治學講師韋白著 (The Duk-Duks, by Elizabeth Weber, Instructor

of Political Science, Hunter College, New York City.)

十一、比較公民教育——支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麥里安著 (Comparative Civic Education, by Charles E. Merriam,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上列各書之共同的目標爲：(一)每個課題，最低限度，必須包括關於政治團結之社會的基礎之檢討，以及(二)對於公民教育之各種機構，必須予以充分的論列，除卻這兩個限制以外，各作家是不受任何拘束的。因此比照之下，各書在觀點上，在研究方法上和設計之進行上，就難免有很大差異。這是因爲各研究者，在態度方面、經驗方面以及環境方面，有很多差別的緣故。

我們對於各研究者，可以提出下列各問題：各種社會集團，在國家的精神上，有何貢獻？各種經濟集團之態度如何？(此處所謂經濟集團，約可分爲農、工、商三大集團。)一國中各民族集團，對於各該國政治集團之堅實性，有何關係？它們對政府具着向心的或離心的趨勢？宗教的因素在崇奉天主教、耶穌新教、猶太教的社會上有何勢力？它們對於在政治單位上之忠貞，有怎樣的關切？地域的集團，在政治的單位上，有何地位？它們單獨發展一種特殊的趨勢呢，或混合在上列其他各集團中，而發生作用呢？這些互爭雄長的忠貞心理，彼此之間，有何消長的關係？

我們不能假定任何這些集團，對於一般的政府，有何特殊的眷戀或反抗；本叢書之分析，特在指陳現存的各政治單位與權威中之社會的成分，而並無意證實任何集團的眷戀心理或利害關係之一致性。究竟有無任何抽象的忠貞心理，政治的或其他之存在，頗成問題。具體的利益，決定政治的忠貞，至於由舊制度經淘汰而演成的新

局面，以及對於將來之憧憬，都可將它加以修改。團結是各種相互牽制的勢力之合力（a resultant of conflicting forces），它是各種現存的相互抵觸的重量之均衡，它是全局之因數（factor）。這一切因數，都可改變，而其結果，可仍然不變，又或牽一髮而動全身。最關緊要的，乃為各種利益之調整（integration of interests），而非任何利益之特殊形態或性質。

在公民教育的機構中，我們所希望加以分析者為學校、政府及官吏之地位、政黨之地位以及各特殊愛國組織之職能；或從另一個觀點說，傳統在建設政治團結上之功用，政治的象徵之地位、語言、文學、報章，對於公民教育之關係，地域在政治的忠貞之建設上所佔的地位；最後我們希望，能將在國內和在國外同政治的忠貞互爭雌雄的，對於其他各種集團之忠貞，加以有效的分析。

在這些集團之間，每乏清晰的界線。我們可以將第二種分類內任何一類或其各類，應用於第一種分類中之任何一類或其每一類。例如正式學校制度，可以並且必須利用語言、文學或象徵、或鄉土之懷戀、或重要的傳統。象徵與傳統，在實際上，倘使要負其使命，就必須要彼此重疊；而鄉土的懷戀與語言，也確是有最密切聯繫的。

這般以各類為經緯所織成的圖案，雖屬錯綜複雜而難於索解，但其基礎皆為權力；而其統率的機構，無論如何簡陋，必須常加應用，倘無現存之機構可用，也必須另創新機構，以應付這般動境。其機構或簡單如古代的象徵，又或繁複如學校教育之正式的制度，但不問其形態之繁簡，團結之諸機構總是常存的。

我們在所調查的各國中，對於這些機構，將加以澈底根究與比較。其結果雖說不上是準確的測量，但可陳明



各國的類型與圖案之輪廓。然而我們希望，這些輪廓之清晰，足以指明幾種從政治的管理的過程中所發出之局勢，並暗示今後公民教育之進步的途徑。

我們可於此建議研究產生政治團結的過程時，我們絕不可忘記在同一社會中，對於其他集團之他種忠貞心理。在此處所描寫的機構中，有許多是爲若干競爭的集團所共有，所以我們若能觀察其彼此相長或相消的情形，我們對於它們就能有更清晰的認識了。教士的集團或經濟的集團，或種族的集團或文化的集團或任何集團之態度，頗足左右政府堅定政治忠貞的企圖之性質與結果；所以倘若我們忽略了這一切並存的或有關的因子中之任何一種，我們就不算窺見其全豹了。

這些機構，並不如此處所說，是時常經人類意識地應用的。這些機構之被應用，往往並非由於任何掌握政權者之意識的策劃。故此我們可以說，這些專技，乃是偶然的發見，而非意志的結晶。不論如何，它們是現存的而且是在發生作用的。

這八九種專技，不過是關於團結的勢力之廣大的類型之粗疏的目錄或分類。我們把它們提供出來，並非要把它們作爲學習或教授政治團結過程的心理之詳確的分析。因爲該項分析，必須在目標分析之後，而我們對於目標的分析尚付缺如，它們也必須在應用目標的媒介之順序的研究之後，而在所研究的各國中，這步工作，都尚未做過。

貢獻這一本瑞士公民訓練之布魯克斯教授，曾經多年留心研究瑞士之人民及其政治制度。自一八九九年

以來，他曾數次長期旅居該國。它曾將早年研究所得寫成一書名爲『瑞士之政府及其政治學術』，於一九一八年出版，並曾爲各種百科全書、辭典及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及他種雜誌撰著許多關於瑞士的文章。布魯克斯教授，曾因爲本書搜集資料的緣故，於一九二七年以數月之長時間，以日內瓦（*Geneva*）、白恩（*Bern*）、沮利克（*Zurich*）三城，爲其旅居之本部（*headquarters*），而遍遊他從前未曾到過的各處地方。該國文武官憲以及各種職業之公民，以其公或私的資格，曾給他以種種便利，使他能進入各檔案室各圖書館、各項收藏珍品庫、各博物院以及極多學校與公共場所，並得參觀政黨議會及各州大小政治集會；他們更毫不吝惜地，給他以寶貴的時間，並以他們的豐富的經驗，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而供給他以所必需之資料。布魯克斯教授，爲本書所選之副名（*Subtitle*），顯示他特別曾被瑞士人生活觀之純粹的民主主義（*Leben ansch-nung*）所感動，這種精神是貫徹在他們的一切公民訓練之中的。因此，我們希望這部研究，能使其較大的民主的國家之公民，尤其是美國人民，發生非常的興趣。

本書同查惹教授關於奧、匈之研究，適成顯著的反比，後者所分析而詮釋之種族、宗教和地域之聯合與本書所論列者迥然不同。

麥里安（*Charles F. Merriam*）

（註一）譯者按：該書原名係『蘇俄公民訓練』（*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註二）譯者按：該書原名係『哈蒲斯堡帝國之瓦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psburg Monarchy*）。

（註三）譯者按：該書原名係『法西斯黨員之訓練』（*Making Fascists*）。

## 著者原序

本書的著者，對於本書的要旨與範圍，十分坦白承認，不敢自居其功。編者麥里安教授，於其序中，指出對於這整部『公民教育之研究』的叢書，其要旨與範圍，在實際上是早被決定了的。在另一方面，在叢書之普通計劃之內各作家對於方法之選擇和結論之確立，有完全的自由——此項自由，在本書中曾被盡量利用。然而在剛纔完成初步調查之後，作者即深信關於瑞士公民教育之分析這個預定的大綱，是再好沒有的了；他於是遂始終企求與它相脗合，即或有些許例外之增減，亦以求適合該國特殊情形之故。因此，他所應盡之第一義務，就在向麥里安教授敬致謝意，因為他不僅曾供給作者以極其寶貴之綱領，並且在工作進行中，他曾給予作者以極多親切的指示和助力。

要旨與範圍雖經預定，但仍有兩種變數須加考量：（一）作者之癖性（idiosyncrasies of the writer）；（二）他的課題之特性（peculiarities of his subject）。

關於前者，作者承認他早有一個成見，以為當其甲國國民從事於描寫乙國的文物制度時，他就必須先以嚴正而詳細的政治心理分析，自行反省，在一特殊序言中，將其結果提出，而強迫讀者非先讀其序言不准即行涉獵該書。誠如德國諺語所云『凡人之觀察，是以其心理背景為轉移的』（"Du siehst was du bringst"）；所以讀

者必須明瞭著者之立場，其偏嗜和成見，以及他是否有自知之明。雖然，政治的心理分析之專技，尙屬未知之數，作者承認，尙不知從何入手，所以他特將這個意思提出，使後起者在這發展迅速的文獻之領域內，將有此種分析可以應用，於是造福天下後世。

一個人，倘使詳細描寫外國的政府，他就難免不露出他自己的心性之馬腳，終歸繪出他自己的面貌來了；這在相當的範圍內，可算是鐵一般的事實。例如孟德斯鳩（Montesquius）對於專制之憎恨，曾隱伏於他的著作之字裏行間。又如白賈士（James Bryce）在他的名著美國聯邦（American Commonwealth）一書之序言中，漏列了他是一個斯格蘭人、一個長老會的教徒和一個進步主義者（a Scotchman, a Presbyterian, and a Liberal）之事實——當其他作美國之研究時這三種特性，顯然曾使他有駕輕就熟之妙。倘使他是一個英格蘭人、一個保守主義者和一個正統的英國國教信徒（An Englishman, a Tory, and a High Churchman），他對於美國的國情，就會有不少的隔閡了；不消說，他寫成的著作，也就會迥然不同其性質了。若然，則其著作，在美國之身價亦絕不會如今日之鼎盛。

作者雖然覺察，因為他曾在許多地方盡性表露了他的癖嗜，這在明眼的讀者，是不會不明瞭他的習性的，然而他仍舊覺得，必須略作自供以盡其對讀者之職責。首先，他必得承認他是偏袒民主主義者，一個教授政治學的人，而有如此成見，或者是不可寬宥的罷。古今的獨裁者，使他覺得涕笑皆非。他既在瑞士人中，發見此種洪範，自然使他深信他們是聰明特達的民族，必然是由於作者對於民主主義的偏好，使他自從作學生的時候起，就對於瑞



士人民發生了一種非常好奇的心理，於是對他們作了深切的研究，最後乃同他們結了不解之緣，而堅固了對他們的景仰。也許他因為阿其所好，所以把他們的事情描寫得太天花亂墜了，然而他總希望，他對於他們的同情，不會抹煞他們偶然的過失。外國人對於瑞士政治之好評，每使瑞士人民自己覺得當之有愧，然而凡以民主主義的立場去瑞士參觀者，莫不異口同聲地予以贊頌。

第二、作者承認他是傾向於傑佛遜派之政治哲學的，而與哈密爾敦派的政治哲學是無緣的（he inclines to the Jeffersonian rather than to the Hamiltonian political philosophy）（註1）他雖知道這種信仰，已經不行時了。因此他對於瑞士之市民大會（town meeting）、全民大會（Junds Gemeinde）、州自治（Canton autonomy）、州權之擁護（States' rights sentiment）、人人的自由之擁護（devotion to personal liberty），以及瑞士人對各民族之不同的語言、宗教、風俗等，使其各自獨立之明朗而堅決的態度，都使作者感覺敏銳的興趣。在大量生產的立場上，這些特點，即或都難立腳，然而它們對於舉世龐大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啻是一劑清涼散。

第三、作者承認他是一個反對戰爭者（pacifist），是一個崇信教育者（a pedagogue），但他卻否認他是一個主張禁酒者或是一個本質論者（a prohibitionist or a fundamentalist）。然而因為他的反戰的主張還不够澈底，所以他對於瑞士人，以其陸軍制度，作為政治訓練之工具之一，並不覺得非常動心。但他崇拜教育的精神，確很够深沈，所以他對於完全以教育的方法來解決一切人生問題之瑞士人民，從來就未嘗不表示熱烈的欽慕，因為這個國家的政黨，甚至開設學校以培植其黨中之領袖人才，而其最大的政治家，以大政治家之最真純的意義

言，實乃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至於說到據云存在於美國的禁酒法令，作者敢直供他對該項禁令之反對，是出發於不同的哲理之立場的，係僅就憲法的表現的方式立論的。他雖在一九二八年總統選舉上，曾投了未獲選舉的方面之票，但他仍願承認，對於目下酒類汎濫的瑞士，深覺痛心，雖其人民酗酒之禍害，尙未到必須以禁令爲救藥之程度。最後應加聲明者，他雖罕赴本質論者的教堂禮拜，他間或亦參加教友派的集會（Friends' meetings），從該種集會出來之後，他每深信，倘使他要向瑞士人說明該會議中所實踐的極端民主的過程，即所謂發揮集會的精神，教友派在瑞士人中，就馬上會有可驚的發展了。在另一方面，因爲他對於儀節之或多或少的非理智的愛戀，以及對澈底的政治組織之專業的敬重，使作者坦白承認，他對天主教會以及瑞士的天主教保守黨之贊美。然而他覺得他必須宣揚教會的勢力，對各州人民生活之控制，其範圍愈大，愈使人發生反感。

論到他的課題之特性——瑞士的政治，尤其關於政治訓練。其實無甚可說，直言之，作者之怪癖與其所描寫的人民之怪癖，就大體言，可謂無獨有偶了。然而某種具物觀性質的事實，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就瑞士的政治現狀而言，他絕不像哈柏教授所描寫的俄國或希奈德教授與苦樂教授所描寫的意大利之反常的狀態。現存在於瑞士之各種制度，非由於突變，亦非由於偏激的學說之強迫的結果；而它們確是長時間和平的演進之產兒，復加以經驗的考核與實效的校正。瑞士在許多方面，確有近代式的發展，讀者從本書，可得其詳，但這一切發展經過考驗之後，乃又可被發見同它的歷史的背景，具有有機的聯繫。瑞士同世界各國，未發生戰爭，已超百年以上。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幾個危險年頭中，它曾固守長期的中立的傳統，它雖曾受過不少的磨折，但其政治制度，歸根未被波及。

當時它所遭際的令人不寒而慄的一種逆運，卽在世界戰爭初發時，它的國內，因着各地語言系統的分歧，幾演成分崩的局面，而此種難關，竟被完全打破。照樣，一九一八年之革命的總罷工，不旋踵亦歸平復，而使因暴亂所有的損失，減至最低的限度。然而，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幾年當中，因着煤礦、鋼鐵與食物之恐慌，商業之停頓，尤其外來遊客之絕跡，曾使瑞士遭受嚴重的困難，並且因着邊防之動員，使其國債之負擔，遠超於世界大戰以前之夢想。然而瑞士人民，曾於其勤奮的苦幹中，彰顯其民族本有的大無畏的精神與力量，故能在本書尚未着手之前，不特業已恢復原狀，並且有了很大的進步。例如，在一九一八年，關於國會選舉之比例代表制之設立；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國際聯盟；在一九二一年，許人民投票表決各種條約；於一九二二年，否決資金稅之徵收；以及通過關於勞工待遇及社會保險各項重要修正案——一切都是經過直接立法之民主過程所表決的。故此，可見凡本書所描寫之公民教育的方法，都非如曇花一現的新奇幻境，而都是經過長久實驗，且脗合安定的而現在發生實效的政治設施之機構。

瑞士聯邦制的稱謂初看令人迷惑，半由『議會』（“*Council*”）一詞兼指立法與行政的機關。爲着不熟悉本課題之讀者的便利起見，著者擬於此將其重要名稱，略加註釋。『聯邦大會』（*Federal Assembly*, *Bundesversammlung*, *Assemblee federale*）係兩院的聯邦立法機關之總稱，或因某種事故，兩院開聯席會議時，亦作此稱。在其人數較少的一院內，各州有平均代表的人數，其名稱曰『邦議會』（*Council of States*, *Ständerat*, *Conseil des Etats*）。依照美國類例，我們頗容易將它誤譯爲『參議院』（*Senate*），此種譯法，頗欠斟酌，因『邦

議會』並無特權，而其勢力顯在人數較多的一院之下。後者名曰『國議會』(National Council, Nationalrat, Conseil National)，其議員名額，是根據各州的戶籍比例而定的。『聯邦行政委員會』(Federal Council, Bundesrat, Conseil fédéral)在『聯邦大會』之下，而其議員，係由後者所選舉，是一個由七人所組織的行政委員會，就中有一人每年被指定為『聯邦總統』(Federal president, Bundespräsident, président de la Confédération)。任聯邦總統者，並無特殊權力，他的首要的職務，是充聯邦行政委員會之主席。再有『聯邦法院』(Federal Court, Bundesgericht, Tribunal fédéral)，係由二十六位法官所組成，這些法官，也是由聯邦大會所選舉。它的內部，分為若干庭，本書所特提出的兩庭，是在一九二五年設立的，其一，是為審判關於行政法之案件的 (Verwaltungsrechtliche Kammer)，其他是為審判官吏中所發生之案件的 (Beamtenkammer)。『聯邦法院』雖是瑞士之最高司法機關，但無權力宣稱聯邦立法與憲法相抵觸。(註二)

據白賈士勳爵之估計，他所著的『美國合衆國』之資料，六分之五，係採自美國人民之談話，僅六分之一係由書籍所參考。關於取材之如此準確數學的分割，著者對於他自己，在一個類似而較為狹小的領域內之短期的徜徉，頗覺難於清算。他深覺得力於一九二七年，從瑞士運回美國之重量超過一噸以上之書籍、公共文件、小冊子等，以及以後陸續收到難於計數的定期刊物、報紙和由瑞士通信員寄與他的剪報。為讀者檢閱便利起見，著者曾將上舉較有價值的來源，附註於各章之後。

著者雖甚得力於各種刊物，但他得之於瑞士朋友之助力，超過他能希望予以酬報之上，這些朋友，對他向他



們所發無數且時常必爲愚笨的關於他們的公民教育方法之問題，他們從來不憚煩瑣，予以詳細的解答。凡曾慷慨予著者以寶貴時間及其知識之蘊藏者，其名不勝枚舉；其實其中，也許有人對於本書所提出的某種逆耳的評語，覺得難於負責，但對於此種評語，著者願負完全的責任。在他的朋友中，應居首功者，乃爲堪稱爲各種最新的知識之寶庫的許多政黨的、自由職業的及經濟的組織之專業幹事，包括農會、工會及商會之幹事。勞績略遜於他們的，乃是各大學的教授與公立學校的教員；圖書館管理員、檔案管理員 (archivists) 及統計調製員；外交及領事官吏；立法議員、法官、行政官員以及文武官憲；政黨領袖及律師；著者、編輯、報館協會之職員、特約通信員、報館採訪員；教士及牧師；以及改良家與各黨各派的過激分子。著者每到一處，介紹他去考察鄰邑或鄰州之函件，如潮湧來，它們往往並非必須，因爲各階級之瑞士公民，顯然對政治都有濃厚的興趣，尤其歡喜同外賓討論政治。著者同客棧和旅館主人、侍役、腳夫、零售商、報販、販賣煙草者、街車及火車售票員、汽車夫、嚮導、牧人，在步行中所碰見的學生和兒童，在火車吸煙室所碰遇的和藹而慷慨的伴侶，尤其是坐在鐵道支線上之二三等客車內或乘聯邦郵傳部所經營的安適的公共汽車內，所作偶然的接談，增長了他不少的見識。總之，作爲本研究之基礎的實地調查，是一宗常川的愉快，使著者感覺，倘使世界各民族，都像瑞士人民一樣，他就甘願擺脫一切，而陶醉於每個民族之友愛之中了。

布魯克斯 (Robert C. Brooks)

一九三〇年

斯瓦士摩爾大學 (Swarthmore College)

斯瓦士摩爾、本雪汎尼亞 (Swarthmore, Pennsylvania)

(註一)譯者按：傑弗生派的政治哲學，係指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 所首倡的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 而言。  
哈米爾敦派之政治哲學，係指美國政治家 Alexander Hamilton (一七五七——一八〇四年) 所首倡之聯邦主義 (Federalism) 而言。

(註二)譯者按：關於瑞士之政治制度，讀者可參閱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所編各國憲法彙編第二輯五九一至六二三頁——瑞士聯邦憲法全文。

# 目錄

第一章	瑞士人民之凌駕一切的忠貞及其互爭雄長的忠貞	一
第二章	經濟的集團和政治的代表	三二
第三章	瑞士的政黨：沿革組織成分政策	五六
第四章	瑞士政黨之教育的和遊戲的活動	九一
第五章	瑞士人民參加選舉的情形：民衆的選舉權全民大會市民大會	一二五
第六章	政府的職務：文職和武職	一五五
第七章	瑞士的學校和教員	一九九
第八章	教會和道德的改良	二五二
第九章	瑞士家庭生活及婦女運動	二八一
第十章	特殊愛國的和其會社	三〇〇
第十一章	語言文學和報章	三四三
第十二章	瑞士的象徵——儀式紀念旗幟和紋章服制節目	三九八

第十三章	崇奉——射擊術健身術唱歌和音樂會社	四三二
第十四章	藝術音樂戲劇——露天戲劇	四五〇
第十五章	傳統和鄉土之眷戀	四七八
第十六章	瑞士國內之外僑及外來的勢力	四九三
結論和權衡		五一一



# 瑞士公民教育

## 第一章 瑞士人民之凌駕一切的忠貞及其互爭雄長的忠貞

關於瑞士人民之凌駕一切之上的忠貞，是絕不致於發生疑問的。它就是對民主主義的忠貞。舉世無第二民族更慣於以流行於德語系各州中之箴言以自況者：『國家，我們自己就是國家』（*Das Vaterland, das sind wir selbst*）。德爾斯（Thiers）於一九七二年論法人曾說：『共和國乃是使我們有最少分裂之政體』（“The republic is the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divides us least.”）這樣否定的文句是完全不適合於瑞士人民的；要使它適合他們的情況，我們須作轉語曰：『民主主義乃是能使我們有最大的團結之政體』（*Democracy is the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unites us most.*），即使將它變作這樣肯定的文句，從日內瓦（Geneva）到聖加侖（St. Gallen）和從白賽爾（Basel）到路格羅（Lugano）仍然會有批評家起來反對說，從他們的觀點，民主主義在政體以外還有更廣博的含義；它實在是關於個人的行為以及各種形態的社會生活之一種規則，而在此種規則未完全被人遵循之前，它乃是將來在道德與政治上努力企達的一個理想。

瑞士人在民主的政體上之成功遠在歐洲大陸各民族之前。在十三世紀他們已開始革去君主政體——擺

脫尚在極嫩弱狀態中而尙具封建性質的君主政體。在它四圍所崛起的強盛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使他們自己的發展受了限制；在一五一五年馬銳各蘭諾之戰 (Battle of Murten) 以後，瑞士人就斷絕擴充軍備的念頭了。上千上萬的瑞士人，誠然充過外國君王之僱傭兵；但顯然他們從戰場歸來所帶回的僅爲金錢，關於本土必須實行民主主義之信念，是始終未被動搖的。所以君主政治之在瑞士國土上，已成極枯萎而積滿塵垢之歷史的陳蹟了，如此古老而凋殘，所以它在鄉野民間故事中僅留存着些許的痕跡了。『從前有一個好皇后名叫百色；在好久以前，沒有人知道，不過大家是這樣說而已。』至於別國的君主政治，不特曾充他們世代的進潤之來源，並且他們參加歐洲各國的王朝互傾諸侯割據的戰爭以後，他們自己也學了許多乖巧，不願再蹈外國的覆轍。

同樣，瑞士的民主黨在更生期 (regeneration period) 中已解決了他們的貴族政治。在一八三〇年之間僅某某家族是 regierungsrath，意即在幾個富庶的市邑中他們有被選爲官吏之權，並且據有高貴的經濟特權。當時城市與鄉下比亦有特權，因而農村居民覺得他們被人壓制和剝削了。自一八三〇年以來一種未流血而發生了效力的革命運動在各州中挨次掃除了這種種不平等的事情，直到『更生』的州有十一個之多，其中包括幾個最大而最有勢力的州，從康斯坦士湖 (Lake Constance) 經過高平原而達日内瓦湖 (Lake of Geneva) 南至提省諾 (Ticino) Geschlechter 意即沮利克、百賽爾和日内瓦之貴族，以及白恩 (Pain) 和佛銳堡 (Freiburg) 之貴族 (patrician families) 雖保持着他們的財富，但在政治和經濟上完全與平民平等了。跟着一八四八年聯邦憲法之成立更生期之民主原則遂征服了瑞士全國。

然而在瑞士的君主政治的與貴族政治的傳統之間，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實際上二者均已絕滅，但前者因滅絕太久，故此幾乎未殘留半點痕跡了。貴族政治好比一具比較新近的死屍，至少留下了它的血裔。我們仍可聽見這個離奇的名詞 *reserungsstätt*，加諸某某家族，雖它已失去了世傳的政治的特權之含意。倘使到現在它尚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僅限於顯耀的祖宗，本鄉的及本州的社會的地位，對於梭羅色恩 (*Volturn*) 的縉紳或者也有同鄰邦舊日的貴族聯姻的意思（按梭羅色恩係古代法國欽使駐在地）。在有幾個瑞士的城市中尚有一個貴族的『佛堡聖日耳曼』（*Faubourg Saint-Germain*），例如白恩之蔣克能格斯 (*Junkern Gasse*)；在其他城市中，統治的家族之後裔維持着他們自己的俱樂部 (*casino*)，爲他們少數世家社交之所。根據一般人的看法，從前在貴族血管中所流的濃厚的藍血，現在已變成了無色無臭的清水 (*sweet water*) 了。此言雖說欠恭，但不無事實的根據，這是由於各統治的家族間之過於頻繁的互婚。他們的子孫因覺察了這個危險現在頗喜同外國人聯姻。不論 (*Teuchelner*) 之衰頹已到如何的程度，舊日提昇他們於權勢的能力之痕跡仍然存在。他們的子嗣中或許有少數殘廢的笨伯，但他的其他子嗣仍有完美的身體和極高的智力。倘使他樂意獻身與國家，據說他的姓氏之光輝甚有益於他的外交的前程。在一世紀以前獨立統治瑞士半壁河山的貴族們除卻政治的特權之微細的殘餘外已完全同化於平民了。

瑞士從十三世紀爲半民主的以來。經一八四八年到現在已成全民主的了，自聯邦經州而至於邑莫非完全民主。從歷史上看起來，這三個名詞應當掉頭來說，因爲民治是始於最小的地方單位的，漸次升高而達於州，先在

較高的亞爾卑斯 (higher Alps) 山中幾個遼遠的山谷中，經過五個世紀的時間，然後纔擴充到了富庶的都市中心。到那時此運動之高峯纔插進了中央政府之範圍。瑞士人慣說州為他們嘗試新政治計劃之實驗場所，該項計劃實驗成功以後方被聯邦所採納，這種情形頗同美國相似，不過在瑞士更為真切。這在他們的最偉大而最勇敢的政治實驗，即民主主義之本體，當然是不會兩樣的了。並且直到今日，仍然是單位愈小，民治的程度就愈高，州的民治的程度強過聯邦，邑又強過州，民治的精神平均表現於各種非政治的自願結合的會社和每種集團，除開天主教會與商業公司。最後它在各個公民的自身似乎達到了最強的程度，他們的品性經過了幾百年的經驗範疇之後，這種最高民治之結果，想亦事理之當然。

瑞士人在任何行業中都表現一種從容審量的氣度，這種氣度，是以他所屬的團體之辦事快慢的情形為基礎的。他好奇要明瞭他的鄰舍之見解而甘心折服於多數 (majorities)。他的祖宗雖好戰，但他已與暴動絕緣了；他以為政治的問題當取決於投票，然而倘使任何人欲搗亂 *Schweizerhaus* (譯者按此字可暫譯作瑞士院或瑞士老家)——他有時親熱地用此名稱以指聯邦的機構——他亦不惜以武力保障和平——一八四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即其明證。他敏速地承認真實，以最低的驚呼接受真實；我們可以相信在任何衝突中一個失敗了的團體，政治的或軍事的團體，會安靜地自認晦氣，而於次日照常工作。再次日它會組織一個政黨以作亡羊補牢之計。在一方面，瑞士的公民極端重視個人的獨立——故此理頭苦幹，經濟之自給，資料之節用，以及各種浮華的避免。我們倘使對於二百八十萬人民，或七十分比之人口，在儲蓄銀行的存款平均每人有一千佛郎之事實加以

考慮，我們就更容易了解徵收資金稅案，在一九二二年，爲何曾被極大多數人民之否決。並且在瑞士國財產之分配比較其鄰國平均的多了，下文所引關於所執田莊之大小即其明證。而且其國之總富遠超我們平日所揣想，就人口言，它雖算不得是全世界最富國，也可被列爲最富國之一。根據最新的統計，瑞士國每人平均分攤的財富爲三千一百二十六金元；紐西蘭列第二位，三千零二十九金元；美國第三，二千九百零八元，美國人看了這個統計或者會吃一驚吧。像上面的數字頗可說明比較過激的政黨在瑞士國爲何不易起事的原因。

瑞士人在他們的高度發展的財產意識之外，在另一方面，更據有一種社會義務之深沈的意識。我們固然容易過分重視口號和格言；但瑞士人不稱他們自己爲公民，而喜用 *Eidgenossen* 這個古老的名詞，而此字並非是沒有意思的。他們的老祖宗們都是『盟友』（*comrades of the oath*），然而今日的瑞士人在成年時雖不再以誓詞相約束，但這其中所包涵的盟約已經淪肌浹髓地深入了他們的肺肝。他們的『個人爲團體，團體爲個人』（*“One for all, all for one”*）之國訓（*national motto*）也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在這個年頭，在階級鬭爭的呼聲甚囂塵上的關頭，佔全國絕大多數的瑞士人定意要繼續合作，彼此容讓，不問他們的語言、宗教是怎樣的不同和世界的狀況是怎樣的不利。

最後我們覺察在瑞士人中不特對一般民衆有一種頗爲自動的適應，並且對領袖也有一種深刻的懷疑，尤其對於非常精明強幹的領袖，此二者之間，無疑是有密切聯繫的。對於廣義的國家，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他們有極博大的忠貞；在私人的關係上他們也不欠缺絲毫的忠貞。凡同他們發生過關係的人，都覺得他們非常忠實可



靠。『民主主義是忘恩負義的』這句諺語以它爲一普通的定理，是很站不住腳的，然而用於瑞士的民主主義，乃又非常合式。對國家完全忠貞，對政治家他們顯示非常微弱的贊頌；他們的政治顯然是與個人無關的（*impersonal*）；他們的英雄都是已死的英雄。雖然目前是精明的歐洲偉大人物之鼎盛時期，然而在瑞士的政治上，沒有一個領袖在民衆中所享的盛譽，不是遠遜英國之麥克唐納爾（*Macdonald*）、鮑爾文（*Baldwin*）或魯意喬治（*Lloyd George*）；法國之白里安（*Brian*）或榜卡累（*Poincaré*）；德國之興登堡（*Hindenburg*）或史崔士滿（*Stresemann*）或意大利之墨索里尼（*Mussolini*）。然而在瑞士現在有一兩位聯邦的委員其才智與魄力並不在此上列諸人之下，而且這等腳色在近幾十年中實不在少數。

在憲法上，瑞士人民對於強有力的領袖不加信任，可從集團式的行政組織反映出來，聯邦的行政是採用這種組織的，各州——有 *Landsgemeinden* 的州除外（譯者按此即是全民大會制度之各州）——都是採用這種組織的。 *Landsgemeinden* 之 *Landammann*（譯者按此即前項州之州長），往往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權威，在他的小天下之內，他是全體人民的父師。這誠然是瑞士人民所特許的例外，因為地方人民對他時常予以極嚴密的監視。對精明強幹政治領袖之恐懼，時常有人提出反對的言論，並且主張瑞士應該仿照美國設立一個負責的總統，但該項建議，除了學術界，很少有人注意。同時聯邦議會之七個行政委員，一天到晚忙的要命，而報酬卻非常菲薄，雖然如此，但他們中間從來沒有一個人會犯過貪贓的弊病。

瑞士同美國間之反比，或者不應過於重視。在民主的原則與一人權力（*one-man power*）之間美國人誠然

不覺得有任何邏輯的矛盾。不只是美國總統的地位，就連幾百城市的理事（*mayors*），都可證明他們對於一人權力易於承受。其他方面，美國對於民主的定理之擁護，在反對三次連任之傳統上，於不知不覺之間，自然表露出來了，且更明顯地表露於罷免權之擴充（*extension of recall*），現在對於十一聯邦（*commonwealth*）之州政官吏和一千以上之市政官吏都已實行此種民權了。美國人現在也慣於抗議個人在法律以外或違法的擅專——例如政棍、自治團體之行政官、違法運售酒類的流氓頭目等（*political bosses, corporation executives, bootleg barons*）。然而其效力不敵瑞士，後者向來就不爲這些民治主義的贅瘤所騷擾。

瑞士今日之所以嫉視專斷獨裁的腳色，半由上文所提墨索里尼的名字。全國到處對於墨氏個人雖無惡感，但一聽墨氏之名，莫不隱然痛心疾首，他們對於現代凡表彰左傾或右傾之專制獨裁制之學說，也有相同的觀感。但瑞士人民在這件事情上的情操是頗有歷史背景的，是從反抗聖羅馬皇帝（*Holy Roman emperors*）和鄰國的君王諸侯的鬭爭而來的。後來再於仲裁期（*period of mediation*）中（一八〇三——一五），他們在拿破崙的專制之下所受之痛苦，使該項情操又如火上加油了。最後由上文所提之再生運動，把貴族世家之權推翻了，從那時候起瑞士人民就一直極端重視法治（*The reign of laws and constitutions, Herrschaft der G. setze und der Grundsätze*）而疾視人治了。這種情感，因着如此久遠的遺傳，難怪變成天性。它自然也有過失，就如它叫瑞士人民，不能享受他們最能幹的政治領袖之充分而自由的服務。在另一方面，它也最能顯證他們對民主原則之極端的擁護。

著者深覺對於一個國民的性質所作如上的概論，並不是無隙可乘的。例如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和少數宗教的黨派，持着職能代表（functional representation）之說，對於它們隨處都表示異議。白克（Edmund Burke）在很早就已經說過：『要我對全國國民提起公訴，我就不曉得怎樣辦法。』繪像比提起公訴難多了，因為後者只要舉得出一個罪名就可成立，而前者必須將被繪的面貌之各點以適當的比例提示之。然而倘使我們要為現代的『民主人』（“democratic man”）攝一幀全影，它的每個線條都會反映瑞士的容貌了。我們並沒有意思說該項類型是盡美盡善了；實在，它的進化尚在繼續前進中，而且就完善言，范德斐爾特（Vander-velde）形容瑞士人之字——庸碌主義（mediocrity）——可說其精譬不亞於其諷刺。開色林子爵（Count von Keyserling）在他的近著“Spektrum Europas”一書中以其目空一切驕倨的態度論列瑞士的特性，其精譬不及范氏而其刻薄則遠過之，以致瑞士全國各村鎮之報館主筆，異口同聲加以駁斥。這位貴族哲學家的驕矜，雖使其言論減色不少，然而他對瑞士之基本的民主主義之認識大致不訛，並有少數居於領袖地位的報紙也有同感。蕭伯納（Bernard Shaw）在幾年前對此爭議曾作簡明的結論，因為在他的『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一劇中他曾使熱情迸瀉的雷娜（Raina）向着瑞士的兵士說：『你是鄙吝的賤物。君子的人絕不屑思慮你所計較的事情；於是布冷其里（Bluntschli）輕描淡寫地回答說：『親愛的夫人，那就是瑞士的國民性。』瑞士人對此亦有完全的自覺，他們有時也喜歡彼此引用古時尖銳的俗語說：『錢能通神』（“Point d'argent, point de Suisse”）；雖在外國的觀察者的眼中，他們愛錢的程度並不高於英、美和德國。我們在瑞士的國

民性中，不論發見什麼瑕疵——在貴族的立場當然可發見不少的瑕疵——但我們仍不能否認，瑞士人是非常民主的國民；並且，惟其如此，他們完全適合於從民衆的靈魂中所產生出來的那種政府。誠如白賈士勳爵說：

『總之，它（瑞士）所給我們的最耐尋味的教訓乃是：傳統與制度，聯絡一致時，怎樣能超過往日之成績，在一個普通人的身上發展公民之品質——精明、中庸、常識以及對公共團體之責任觀念。就因為這在瑞士已有效，所以它的民主主義比任何國家都更真純。』

瑞士人民，雖習於謙遜，但對民主主義乃又頗有當仁不讓的氣概。因為他們雖罕誇耀，但在內心，他們實覺民主主義乃是他們所首創，所以他們居然有這種氣概，也是事理所當然。他們不特早在十三世紀就創造了它，並且在十九世紀又給它加上了現代的副產，創制與復決，這都是全世界的民衆所歡迎的。或者因為他們意識了他們對民治的運動之功高望重，有時使他們稍現驕矜的得色，所以客勒（Kottler）在幾十年以前，曾將下面的字句放進他所假托的人物，色難得（Martin Salander）之口中：『假使我們稍抑自滿的心理，而不時常錯誤，高傲爲愛國心，那末，我們的境況就可以更容易忍受了。』一位近代著名的瑞士史家傅友德（Eduard Fueter），幾乎忘記了對這種事件之新近提出但已成口頭禪之警告，在下面一段文字中，暴露了他們在這個題目上之虛山真面：

『複決權與其相聯的制度，例如民衆創制權等，其初雖曾遭人熱烈的反對，但現在已經成了這樣的慣常的事情；瑞士公民，已經差不多忘記了它在當初，是怎樣的一種革命的新政和一種大膽的嘗試。他更少習於思

村在這種政府的類型上，瑞士曾作了它的最獨創的政治的發見。較古老的瑞士制度之卓絕，在大體上雖曾被  
人過於重視，但對於這些制度，乃又適得其反，尤其是聯邦制之本體。這件瑞士產品之特殊的性質，於近幾十年  
中曾充分被別國人士所欣賞，而反被我們自己的公民所忽略，我們的公法專家當然除外……凡為別國人撰  
著瑞士史者，必須將該項制度作為其著述之核心。

上面這一段話頗為俏皮，也可算略為謙遜——如以最後一句為例——它從首到尾，也可算十分真切，除了  
它對瑞士的民主主義之古老形態所加的貶詞外。倘使我們不願數典忘祖的話，後者至少是現代的複決權之名  
稱和其基本的特徵所從出。無論如何，一個未經傅友德道破而卻被他所影射着的一個要點，我們絕不應當輕輕  
放過，就是現在的瑞士人民，對直接的民主主義之各項法制，已經完全由習慣而成自然了，因此在行使它們的時  
候，幾乎毫無加以思索之必要了。

同其他國家比較時，瑞士人間或在談吐之中，對於他們自己的民主主義的類型頗為自負。對於一九一八年  
革命以還的德國，他們嘗以父兄自居；回憶他們自己的五百年的經驗，他們對於北部德意志大共和國的過失，只  
當是由於年幼無知——所謂不可避免的幼稚病症。他們必得承認法蘭西的民主主義，是飽經世故的，但它的中  
央集權，又超過他們所能忍受。瑞士的政治學者，深知他們的聯邦制，既非議會制又非總統制，他們中間大多數很  
自然地覺得，在這方面，它比英國的政府和美國的政府都更優越。對後者，他們有一種真純的興趣，並非由於美國  
的民主主義，乃是由於他們曾於一八四八年，廣泛地採用它的聯邦原則。對美國的獨頭執政，他們的機器和它的

工頭們，他們的方興未艾的中央集權制和標準化的生活，他們的政治的腐敗或禁酒的法令，瑞士人當然爲禮貌的關係，不能直言不諱地發表他們的意見。

瑞士人民，對於民主主義，大家都極力避免着輕率的和粗暴的批評，這是他們的民衆，對於民主主義的敬視之又一證據了。他們可以十足嚴酷地批判他們的官吏和政府，他們甚至可以輕微地挖苦他們，就如摩西林 (Felix Moeschlin) 最近之所爲；但民治的本身在他們的國民性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沒有人擅敢施以儼薄的或鄙俚的攻擊了。歐里博士 (Dr. Oeri) 於一九二六年在新瑞士社 (New Helvetic Society) 中，對瑞士國民性的申述，可謂一針見血了，他的大意是說：『在瑞士國沒有人討論民主主義，亦猶沒有人討論生在他自己臉上的鼻子』。在無意之間，瑞士人作成了一種區別，好像十八世紀的神學家對於君王和君主政制之間所作的分辨，前者，他們以爲是人類之一員，是難免無過失的人類；後者，他們以爲是一種代天行道的和造福人羣的制度。

在瑞士的西部，的確有由少數嚴正的思想家所結合的各種小集團，他們奮力攻擊議會制，並且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職能代表制以爲之代；但他們究係少數，並且他們的興趣，乃僅限於理智的探討和科學的研究。就中有些人是受了『法國行動』 (Action Française) 所影響；但他們的措詞比較委婉的多了。在瑞士人中有極少數的人是崇拜墨索里尼者，這些人尤其在提省諾 (Ticino) 佔極少數，雖墨氏的政策在該州最易流傳。我們也不應忽視小而衰頹的共產黨，據說關於怎樣馬上建立普羅專政，他們時刻是同莫斯科通聲氣的，但顯然他們對於第三國際的命令並未完全接受。至於社會民主黨，它是民主主義的而兼社會主義的，就其成分而言，前者重於後者。對

於民主的正統之批判，是從這些黨派中所發出來的，然而除了民主社會黨外，它們都只有寥若晨星的黨員和很微薄的勢力；但令人驚異的事情，乃是它們的論調之和緩。論及掌握國家統治權的人民（sovereign people），極力避免乖謬的言詞；像孟鑠（Mencken）的『民主主義的註釋』（Notions on Democracy<sup>2</sup>）是絕不會在瑞士出版的。著作家在該國的人民中，若對於民主的原則採取譏罵的態度，就休想能受民衆的歡迎，就連在著作界中也難於立腳了；讀者對於該項作家莫不以喪心病狂者看待。在另一方面，倘使批判的對象僅爲其機運，尤其是措詞謹慎，隨處都可使人傾耳諦聽。倘使一般讀者以爲理由充足，就會不外乎兩種結論中之任何一種或兩者均被採納：第一，必須發明一種新方法，用以保障民治的精神而同時糾正被檢舉的缺點；第二，人民自己必定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待該項弊端革除後，民主主義就可進行無阻了。後一種革新案件中，十有九件是同公立教育的過程有很大的關係的。

瑞士人對於民主主義之本質，並沒有任何迷信的虔敬；他們也不以爲它是各種政治的弊端之萬應的靈藥。在一九二一年，他們的確曾將複決權擴展於條約之批准，而這個方案，是經過嚴重的疑慮之後纔被採納了的。拿他們的態度來同美國人的態度作爲反比，就可看出他們的深遠的見解，當其罷免權（recall）被美國各州普遍採納的時候，而一個相似的制度，古時的 *Athenians* 在瑞士已早被廢置了。並且他們也沒有意思拿司法的過程放在直接的民主的制約之下。倘使有人擬作如是建議，就必定會有人引於十七世紀初葉曾發生於古諾笨登（Graulunden）地方的流血暴行以堵塞其口了。在該邑所舉行的所謂全民大會（Landsgemeinden）因被

當時宗教的仇視所煽動，實際上乃是黨員的武裝的暴民，他們強迫與他們的宗教信仰相同的法官，將他們的政治上的仇敵判以死刑，而且將犯人就地正法。跟着來的異黨的報復是同樣的兇猛，如此往還報復，直到人民有了覺悟爲止。從那個時候以來，凡沾着私刑意味的法律（lynch law），甚至法庭程序之直接的民衆的制約，均爲瑞士各地所吐棄了。

就政治的民主主義者而言，瑞士人是很有資格的了；的確，他們中間有些批評家，以爲倘使他們多做工少投票，他們的境況也許會好些了。然而，有些人主張民主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政體，而應當在各種社會的關係上被採納爲一種生活的法則，而我們對於此種生活的法則，應竭力促其完全的實現。瑞士人認得上具有這種意義的民主主義麼？倘使我們使民主主義有如此高尚的含意，當然就沒有那一國的國民在現在可說是已經發得上它了。拿這樣崇高的標準來衡量瑞士人民，他們也還很不發資格哩。誠然，他們的聯邦的憲法宣稱：『瑞士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瑞士國內無隸屬之關係，無畛域、出生、家族或身分之分別及特權。』在憲法上雖有此種條文的規定，對於公民、婦女除外，雖曾賦予民治的大權，但在財富、名譽、教育、地位等上面仍有很大的差別，於此瑞士誠無異於西歐其他各國。同接鄰各大國比較，它的財富的分配的不均，雖說不甚懸殊，但它們仍然是瑞士國內最大的黨，社會黨，攻擊的對象。他們認爲經濟的差等存在一日，則該國之民主化就有一部尚未完成了。

就連各中產階級的政黨中的黨員們，也有時對瑞士民主主義之理想表示憂慮。據我們的推測，此種憂慮，今勝於昔。在世界大戰以前，瑞士民主主義之質量，在政治界是比較很有進步的，當時就連最穩健的公民也易於把



他們的國家看爲是站在文明的極峯的，而拿它的精神的偉大之信念，來安慰他們對於國土偏小之遺憾。創制和復決既經通行於全球，兼之戰後歐洲內部有若干民治的國家之崛起，均使瑞士人對他們的領袖地位深感不安了。因此有不少『施洗禮的約翰』(John the Baptist)在他們中間宣布新理想之將至和該國的精神的領袖地位之恢復。在這些新時代之前趨者中，有人憧憬於美善社會立法和社會保險。他人又在宣揚裁軍和世界和平，指出在瑞士聯邦下說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各民族之和睦以爲世界大同之先兆。更有像日內瓦的小學教員們，建議他們的政府將陸軍盡裁，而將所節省之經費用於對鄰邦貧兒的救濟之浮誇的計劃。對青年施以公民訓練之計劃，也屬於這一類。

瑞士思想界之落落的領袖們，比較其他各國對於新社會和政治理想之追求更爲關懷，此固爲不可否認的事實。而這種關切是爲他們的多數同胞所共具；熱格日博士(Dr. Leonhard Ragaz)所著之『新瑞士人』(Die New Schweiz)所受熱烈的歡迎，尤其是在青年界，便是其鐵證。熱氏係沮利克大學之神學教授，其書曾重印四版，而曾被譯成法文和意文。該書略帶宣教的意味，而偏於過分誅求瑞士人的過失，它坦然希求發展一種綱領，來把他們的國家放於世界道德和社會之最前線。一位外國的觀光者，倘若將這亞爾卑共和國的公民(citizens of Alpine republic)當着常人一樣看待，而不把他們當作上帝的天使，就會驚奇爲甚麼熱氏如此嚴厲對待報紙、政黨制、陸軍和文官，尤其是他關於旅館業在人民中會產生奴隸的性情之主張，更令人莫測高深了。在反面，凡從事於旅館業者，都在一個頗高的營業平面上經營着，實在同專業的平面，並沒有多少分別，完全沒有卑鄙

和州沿的權力而且往往愛惜自己的名譽，他使世界上在其瑞士的管家（majordomo）更可憐的人類者就尚未見過；這個同樣的特性在於侍者、扛夫或嚮導等都不缺乏，他們即或接受小帳，但他們精於其職業而有禮貌，故亦爲人所尊敬。的確有些旅客是屬卑鄙之流，然而倘使我們能善馭卑鄙者，亦可不至受其玷污了。瑞士人對於社會的理想主義之衝動每每太過，因此使他們對於國內的情況，常取咆哮的態度。有時這種態度頗近於狂妄；例如一位屬於保守黨之知識分子，曾向作者說他贊成取消一切罪刑。法庭仍舊可以審判罪人，但監獄應被廢除，而刑罰則讓個人的良心去處分。關於這個計劃之能否見諸實行，他所發的偉論，我們可以不去管它；我們在此地想告訴讀者的，乃是他關於它的優點，所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爲它可以使瑞士國領導各國加入尊重人道的偉大道德運動。

瑞士人對於聯邦的原理之崇奉，僅亞於他們對民主主義之忠貞。自然，在一種意義上，後者可以算是一種競爭的忠貞心理，反對國族化的情操。然而我們也有幾種理由，可以看見它爲有益而非有損於統一的觀念。瑞士人時常極其重視他們的政府之分權的性質，以爲他們的政府之所以迥異於法國的政府者，就在於此。他們解釋民主主義之意義重心，在於自由而不在於統一——州的自由、邑的自由，最後的分析爲個人自身的自由。他們將它認爲地方的自決，正如他們認爲它有關於他們的政制之和平與中立。簡言之，州的、邑的和個人的權利而非與它相反的忠貞，乃是聯邦民主的機構之構成的要素。於此應特加說明者，乃是他們以爲聯邦制應解爲地方分權，這與美國人用此名詞時之意義，恰恰相反：例如他們常以聯邦的原則（*Föderalistische Prinzip*）和中央集權的原

則 Zentralistische Prinzip) 是不能並容的。在五十多年以前白費士著書論列美國時曾說它有『一個雙重的政府、一個雙重的忠順、一個雙重的愛國心』，關於它的人民又說：『有兩個忠貞，兩個愛國心，較小的愛國心，是不能容較大的愛國心的』。我們一定會感覺這位從統一的英國來的尊顯的觀察者，未免小覷了愛國的精神，在美國國內所發揮的力量，因為白氏從表面上觀察，以為它是雙重的緣故。不論如何，經過四、五十年的鐵道，大規模的工業和汽車，和從這些所產生的劃一標準化和中央集權，該項較小的情操，在美國人中雖不能說已歸烏有，確實也可以說大大地減色了。在另一方面，在瑞士國，該項較小的情操，一般人卻仍以爲非常重要，而珍視之爲有最高價值的特殊的國家之福利。明達的政治家不敢輕視它；簡使他們一不當心而稍微輕忽了它，他們費盡心血所作出的計劃，在下次之復決中，就將絕無被通過之希望了。大多數的人民，對於地方自治之熱烈的擁護及其透澈的慣熟，可拿這個事實爲例：不僅政黨，就連各自動組織的大會社，其組織幾乎無不以州爲根據，它們的中央幹部，只有權代表他們參加全國的和國際的事件，其他一切權力，都保留在各地方的團體之手中的。

在所有關於瑞士國將來的危機之演說和論文中，幾乎都首列着中央集權之威脅。例如佛勒克 (Konrad Hülke) 於歐戰將終時，向日內瓦大學的學生之演講，教他們要特別注意：

『政治的兩律衝突 (antinomy)，內部的仇視，這是我國的特徵，它在我們的歷史的發展之過程上，每次都走入了一種或他種極端，而成了自由之威脅。我們可以說：瑞士的同盟，自從它出世以來，就在聯邦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兩個兇險的大灘之間，兢兢業業的行駛着的，要想把它所寶貴的自由之舟駕出廣大的世界。一心要

躲避中央集權之險灘，已有五百餘年之久，現在到達了歷史所謂舊同盟之崩潰時期，我們的國家已兩眼昏花且神經膠執而在聯邦的兇灘之前成了犧牲品了。這種經驗——兼之在這個專門學術發展和國外貿易擴充的世紀中，甚至在和平的時代，在外國所加於我們的壓力有增無減的環境之下——在今後中央集權的優勢之下，是站立不住的，這個趨勢自開戰以來，已經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甚至現在許多人都以為在維護自由之安全的運動中，自由之本質業已煙消雲散了……中央集權的觀念，因為是不自由的觀念而為瑞士人所深忌；它是帝國主義之泉源，它所以最為可怕，就因為今日之世界已完全被它所征服了。

自從上面這一篇演說發表以來，在戰時為國防所賦予瑞士「聯邦總統」之全權（*unbeschränkte Vollmacht*）已被免除了。然而佛勒克之要旨，在大體上直至今日仍為正確。它頗清晰地影射，倘使他們可以閉關自守，在最自由的同盟中，在各州掌握着幾乎是完全的主權中，瑞士人民仍然可以享受最完全的幸福。然而因着外力的壓迫，不幸必須有高度的集權。主張中央集權者之主要的理由，乃是它可以使最高度的地方分權實現於其國內。它的最大的危險，乃在過度發展之後，它將吞沒了瑞士人世代沿習的各種自由權利。

對於一個美國人，雖然他也是一個聯邦的公民，前面所描寫的學說，似乎是難以見信的。美國人因為已將興趣轉移到確實重要的事情，例如物質的繁榮，所以他們不再像瑞士人關切他們的自由了。再有一個解釋，雖然它很可以算為前面的解釋之推廣。在美國的州的疆界的後面，再沒有任何特殊的制度，沒有人民願意保存的任何具有特徵的或出類拔萃的事件。在瑞士的州的疆界的後面，卻有許多這樣的事件，它們的保存，似乎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宗教的建設、語文和方言、地方的習慣與風俗。誠然在這些事情當中，有些事情是已經背時了，而且妨礙進步與繁榮，但若失掉了它們，許多瑞士人都要以為等於喪失了他們的國魂一樣了。所以在瑞士國內，聯邦主義者和集權主義者間之政治的辯論，不僅是枯燥無聊的憲法的公式之不入耳的語調。民衆在它裏面的興趣基於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即瑞士國將來之可能制約的演進之問題。某項條件是已知的：國土之編小，它的實業必須依賴外國的市場，同德、法、意等鄰國因同文、同種而發生的實際文化的關係等。在這種時常發生作用的強烈的磨擦能力之下，瑞士特性之主角，又焉能不稍被削平，即或它們之堅強和龐大等於亞爾卑斯山。

從這一點再往前進，就都是瑞士國內之語言的淆亂，有社會黨員談論翦去從亞爾卑斯山居民 (the Helveten) 所遺傳下來的尊嚴的髮辮，和國際化、摩登化、統一化、標準化和極端的集權化——將他們的效率工程之總產品平均分配予各工友。有農民黨中之黨員，希望他們的階級的人數相對的加多，再有天主教保守黨之黨員，希望教會的權勢能恢復一八四八年以前之盛況。另有中等有產階級，把瑞士當作天堂樂土，而頗為躊躇滿志不願稍有所更張。更有些人告訴你舊瑞士已死，新瑞士剛生；他們甚至會供給你關於該嬰兒產生之年、月、日和它產生時之瑣屑的事件，並會加上幾句關於養育它的種種方法。另有他人又深信瑞士從未有絲毫的改變，將來也永遠不會改變，對於談講新瑞士者 輒嗤之以鼻；最後甚至有某些憂鬱的人們宣稱瑞士已頹唐不堪了，或早已死亡了。

在此種永遠流行着的喧鬧叫囂之中，有少數比較近於情理的呼聲，說新的或舊的瑞士均不存在，只有一個

在慢慢地演進中之瑞士；只要歐洲不發生戰爭，瑞士國內大致是不會有有很大的變動的。對於外國的影響，他們坦白地表示惶恐，尤其是從德國所受的壓力，一旦後者恢復了元氣，挾着它的強大的言論機關和文化的勢力，依恃它的奇妙的專門學術的效率，它的廣大的民衆，和它在不久的將來要復興的繁榮，都是瑞士所難以抵禦的勢力。以外國的文化侵略而言，瑞士人希望憑借教育的力量，來作有效的抵制。對於從德國或其他國家所來的經濟侵略，瑞士之戰略並不恃大量的生產，而僅依賴它的少數精美的出品。瑞士的生產者借着實驗、專門的教育、苦幹的精神和普通的資源，在該國所特有的小規模的工廠單位上，可以繼續取得勝利。所以它得避免城市人口之膨脹；地方生活和風俗得永遠繼續着；瑞士得保存它的本來面目。

將來瑞士的政治的演進，不論怎樣迅捷，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即各州，尤其是法語的西部和天主教的中部各州，對於振苗助長的集權運動，必定要誓死抵抗的。從各州以相同的代表人數所組織成的邦議會，在此項鬪爭中，將繼續爲它們的重鎮，而將以復決權爲它們護身的籐牌。有兩種特殊的制度，因各地人民誓必傾全力以保障之，所以很少有被攻擊之可能——語言和教會。關於純粹行政或財政的事件，相互退讓是時常可能的。誠然，它們因爲久已在圓融周到的精神之下，被處理而爭論的火氣已經煙消，所以依一個近代的史家說，在瑞士已經沒有絕對的聯邦主義者或絕對的集權主義者，每個集團中均已發展了臨機應變的傾向。

關於此點，聯邦的補助金的制度是頗有意義的。依照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四年之憲法（四十二條上項），聯邦政府之費用之一部分，應由各州分擔之。但在實際上，卻適得其反，因在白恩的政府，每年以相當大的款項補

助各州的用費。例如於一九二八年，該項補助金業已達到六五、〇五四、〇〇〇佛郎，超過聯邦經常歲出六分之一以上。倘使以人口爲比例，美國若採行此制，每年支出就將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了。在世界大戰後困難的時期中，瑞士的失業人數大增，該項補助金也跟着大增了，在一九二二年曾達到一五七、三二〇、〇〇〇佛郎之最高數。

在極多情形之下，俱可申請聯邦政府發給補助金。它可救濟不可避免的經濟的困窘，不僅限於失業的救濟，就連荒歉、工業的停頓等均可請求補助。從這種性質的極多小事件舉例來說：就如因爲有些人民在德國公司保險受了馬克貶值的影響，也得了一項小補助金以爲救濟。這種政策，在許多事情上的確有利於民而爲絕不可少，但又每使一般人民居然視聯邦財政當局爲搖錢樹和聚寶瓶，隨時都想借故請其救濟。大家對於它的興趣很濃，所以聯邦統計局特專爲此刊行年報。依照著者所見到的最近的年報，是關於一九二六年之補助費的，它所列該年度之七千萬佛郎之支出中，有九百萬列於臨時額外支出項下爲救濟失業之用。其經常補助費支配如下：社會政策、二七·五百分比；農業、二一·五百分比；教育、一四·九百分比；軍事與體育、七·九百分比；公路、七·四百分比；商業、實業與運輸五·二百分比；衛生、四·〇百分比；得較少的補助費者如下：森林業、公用事業、土地測量、科學與藝術、狩獵、漁撈、護鳥、警察、知識的產業之保護等等——確實是一個慷慨而包羅廣汎的清單，倘使它的一八四八年極端節儉的發起人復生於今日之瑞士，不知要怎樣唏噓不已了。

某種補助金，雖是直接付給各種私立會社者，不僅包括營業組織，也包括農會和工會，但其極大部分是間接

由各州經手所轉付者，一九二六年此數超過三分之二以上。依照各種財政的法典，並依照關於支配財政的權力之古老的政治金言，上面所述實施的事例之必然的結果，當為中央政府的權力之擴大。美國中央政府對全國各州政府，在各任其半的原則之下所給予大量的和逐年遞增的補助金，確實產生了如此的效力。在瑞士一般的輿論，乃傾向於削弱聯邦政府權力之途徑，這或者是由於各州政府之活動的能力。最令人不解者，乃對公立學校之大批的補助金，其結果反使聯邦的監督權減至最低的水準，信奉天主教的各州支配此項補助金於與憲法抵觸的用途，信奉新教各州或再變本加厲。大眾公認聯邦議會中經營大多數之補助金之議員，在瑞士乃是有最大權力者，但顯然他也不能放手做去，因為他雖是鐵錘而同時他也是鐵砧。雖然每一個被拒絕的申請者，都是以怨報德者，但顯然一切階級，包括宗教的和佔少數的語言團體，甚至仇視佔優勢的政治的布洛克(Bloch)之會社，或多或少都受了白恩的實惠。最近有一個卡通，將民衆對於此事的觀感概括的表現於純粹瑞士的風度，將聯邦描寫為一隻肥壯的母牛，以代表各地方政府和各種私人團體之農人，從每個奶頭拚命榨取其乳汁。

除補助金外，各州更同中央政府平分免除兵役稅。並且，它們得坐享聯邦酒類專賣所得全部盈餘，因該專賣之管理，它們可毫不過問而讓中央政府負其全責。依照法律之規定，它們須將上項收入之十分之一作為禁酒之費用。州政府之巧於規避上項職責，在全瑞士已成公開的祕密。近來某地方的行政者，更異想天開；他們將寓禁於徵所收入之十分之一，用以獎勵在該區葡萄園中施以滅蟲的藥霧。他們的理由，是這樣做他們鼓勵了有裨於健康的淡酒之行銷，而於是遂妨阻了威士忌(Whisky)和白蘭地之行銷。當然，他們也頗能自圓其說；但那遇事



忍讓的聯邦政府，這一次也會板起了面孔，硬不批准這種取締酗酒之特別辦法。所以我們若斷言：關於補助金和各州從中央金庫所取得的他項款項，都未曾增進中央政府之權力，這個結論似乎頗有事實的根據。

如上述事件所昭示，有幾個較小的節目，是同地方自治的情操相連繫的，而該項節目，竟使該項情操愈加強烈，雖它們是適切地被譏諷爲“Kantonliebe”之表現，意即偏狹的地方精神之表現。例如，在地方上取得公民資格者始有承受貧困救濟之權利之規定，使一個人絕不樂於放棄公民資格，因恐今後或有無以爲生之一日。有一個案件當時曾引起各方的注意，甲州一婦人嫁與乙州一男子因而取得了乙州的公民資格，以後又同她的丈夫離了婚。當她無以爲生時，乙州拒絕予以救濟，據云她於離婚時業已失掉她在該州之公民資格。而甲州亦拒絕了她的申請，以爲離婚並未影響她由婚姻所取得的新公民資格。這個案子終竟達到了聯邦法庭，該庭於是判令甲州負擔其救濟的責任。聽說亦有因亦貧者之出生地點發生疑問時，該項案件遂輾轉於各州之間，終不能決，總歸是貧人倒楣罷了。

我們並不是說像上面那種非常的經濟關係，對於地方主義之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然而確實有這種事情，並且它們在這些事情上，也不能說毫無影響。特別是古時公民自治區（Bürger gemeinden）似乎其團結全靠森林、牧場或耕地之公共產業之凝聚的力量，雖它們在政治上的重要遠遜市自治區（Einwohner gemeinden）兼之，抵制外方人之地方的偏見，使他們難於插足於某種職業。因爲這個緣故，每一州的各公立學校之所有的教員，幾乎完全是由各該州的居民所充任，然而倘使各州多多交換教員，彼此都能獲益不少。凡生長於高原地帶之瑞士

公民，倘遷居於某較遠的州，就會被他們的新鄰居們視同化外。在文化程度很高的都會中心，並非就沒有類似的偏見。一位各國知名的專家生長於甲州，向著者吐露實情說，在乙州之首市住居十五年之後，他仍然覺得參加地方事件時總不免有格格不入之勢。例如聯名呈請的文件，領銜者必須是世代久居本地之縉紳。運動參政權的婦女之經驗顯示，倘使派甲州之女演說家赴乙州去參加運動，不特無益而且有害。有幾方面，偏狹的地方精神，比從前有增無減。一位現代的史家說，在一八四八年的憲法公布以後的幾年中間，或有人由非其所居住的選區被舉為國議會之議員，甚至有由他州被選者。現在，顯然，這種事情絕不致再見於瑞士了。

現在轉到目前在瑞士確實存在的競爭的忠貞心理，我們發見大多數從外國去的觀察者，大概總會按照它們所推定的重要排列為如下之先後等級：第一、民族的語文的；第二、經濟的；第三、宗教的。然而這種排列只反映同該三個衝突領域相聯的根本困難之通常外面的觀點，而不足以代表瑞士國內之實際的狀況。民族的和語文的困難，如他處的經驗所昭示是很難處理的，在世界戰爭頭幾年中，在瑞士國內，從它們所產生的威脅確是嚴重的，然而它們好像幾乎完全被剋制了，至少現在是這樣；換言之，在上面的順序中它們應從第一位降為第三位。經濟階級利益，在瑞士競爭的忠貞心理中，確應列為亞軍，它在今日政治的世界中，隨處皆可碰見，第一表現於一個偉大而前進的社會黨和一個農民黨——該黨雖係新近出世但亦強盛——誠然該國大部分屬於有產階級的公民，必然會將經濟利益列為首選。對這樣錯綜複雜事情，要下判斷，當然應考慮到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件，然而這一切使著者不得不主張：宗教或信仰的擁戴在今日之瑞士人中，乃是最強有力競爭的忠貞心理。

倘使有兩個瑞士，彼此爲鄰居但又疏遠，其一卽基督新教的瑞士，其他卽天主教的瑞士。所謂「兩個瑞士」，未免過甚其詞，但至少它能使我們對瑞士國內的實況有更清楚的認識。我們用這名詞時，不必特別指出在歐洲各國中獨有瑞士在十九世紀中發生過宗教的戰爭。一八四七年之桑德本事件（The Sonderbund affair of 1847）好像算不得是戰事，它徵幸不久卽行停戰，並且幾乎是兵不血刃的。在它的結果上，如同七八十年以前的文化鬭爭（Kulturkampf）之結果，產生了普遍的默許。歐洲各國之有宗教的政黨者，不僅瑞士一國；瑞士有一個天主教的政黨，亦猶德國之有基督徒人民黨，比利時有強盛的教士黨。並且教會一旦得着了廣大的民衆的信仰，常常是能使它的政治的勢力爲人震懾的。

我們對於瑞士的天主教保守黨詳加檢查之後（參考本書第三章），我們馬上覺得它是建設在深入其教民之各式各樣的社會集團之組織之上的，其組織之完備、精密和有效，是無以復加了。最近社會黨和農民黨，因爲都做照了該黨之所爲，得使它們自己的基礎有了相當的鞏固。各敵黨對於天主教保守黨的結構，也都公認其堅密是毫無隙可乘的。瑞士公民所加入的每種普遍全國的會社，莫不以信仰爲分野。因爲這種關係，「兩個瑞士」之名詞，就絕不致於是無稽之談了。

在這兩個社會集團的體系之間的鴻溝，到處都是深沈的。倘使地方自治區中，兼有這兩種要素，顯然其教士之態度是舉足輕重的。倘使神甫和牧師互相和好，政治的空氣就緊張不起來；倘使一方或雙方在信仰上是不肯讓人的，雙方都退出而各取自由行動，以致隔閡日趨嚴重，而竟至不可收拾了。在幾個頗大的城市中，天主教的集

團將他們的教堂當作碉堡而環居於其四圍，只同其自己教會中的人貿易和講社交；其他新教的區域也各自營其獨立的生活，而不同異教的人相往還。這是一種不幸的狀況；尤其是當其雙方必須合作以達共同目標時。在另一方面，這總比公開鬭爭的局面要差強人意些，幸而後者不常有，有不同信仰者，僅彼此不相聞問有如隔世。因爲有九州和許多散處其外之自治區內天主教徒佔絕大多數，所以糾紛又減少了一些。在資產階級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有較多的合作，他們居然也時常一同列席於公司董事會議。在這兩派比較貧苦的分子和農民之間往還，乃最爲稀疏。

這種世代各自分立的生活，遺留下了相當的標記。實際上我們借着各種記號走進一個瑞士自治區時，比較容易知道它是屬於何種宗教的。當然一碰着神父、僧、尼等的時候，瞧見他們的特異的服裝，就馬上會毫無疑問了，但卽或不碰見他們，也有極多記號令人注目。在這個墮落的時代，短裙、短袖、短髮——這一切被視爲美國的特徵——在瑞士低平原各城市中亦頗通行，我們一旦看見其山村婦女盡蓄長髮、穿長袖之衫而著長裙（該種裙之長度實有礙於衛生）就覺大吃一驚。這種古董的服裝或者與該國某些地方天主教堂門口三國文字的布告不無關係，其英譯文，顯然是爲使外國旅客周知者，其文雖不很通順，但其意義則甚明顯，茲特摘錄如下：『凡婦女之衣不覆頸、袖不蓋肘者，一律不准進入上帝之殿』。在這樣的村莊中，男女較多穿著美麗的本地農民的服裝，但破爛補綻的舊衣，亦非罕見。男子多滿頭蓬鬆長髮，滿嘴絡腮大鬍。許多兒童跳足而行；有些男女成人亦復如是。房屋和畜廄大多年久失修；豬牛糞、尿之臭氣瀰漫各處，此卽瑞士農村生活之基本的香味。街路上比較他處有較多的

圓石子，在圓石子間有較多的青苔；室內則有較多的蒼蠅、蛛網和蜘蛛。男女以背負重，較重者則推以手車；他們作事的速度是頗遲緩。男人和女人彼此間都較為和順；在國外來客商之交往上都較為恭敬。酗酒和其他墮落的惡習，都比較普通；我們可以碰着較多的殘廢的、頸腺腫的、駝背的和侏儒的人類，甚至間或也遇着一個患癡呆病者（cretin）。這都是很像一幅鬆懈的和守舊的畫面；他們同沮利克或日內瓦附近各村新教徒之勢利的、禁慾的和無聲無臭的生活相比較或者確實更穩健、更快樂。這兩個類型的生存，雖在相隔僅數哩之間各自生活着，但它們在歷史上和在心理上宛如隔世。當然，在上面所指的社會的瑕疵中，有的是由於生活於高山環境之結果；然而因着信仰的隔閡，它們在數量上，乃有顯著的增加。

這些都是就不好的方面而言。在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瑞士之間，雖有鴻溝隔着，然而類乎桑德本的戰事是永遠不會復現於瑞士的。我們可以作如此的主張說：天主教的瑞士雖係少數，但為真實的瑞士，該國之其餘部分，已經拋棄了祖宗的遺規而入於迷途了。聯邦的發祥地為西委斯（Schwyz）、由銳（Uri）和翁德華登（Underswalden），其人口之絕大多數是天主教徒。五人有全民大會的州（Landsgemeinden（kantons））中有三個是信奉天主教。不僅對民主主義並且對地方自治之擁護，信仰天主教的各州都繼續古老瑞士之傳統。它們的居民對於現行制度所加於他們的重要職分之履行，也並不怠忽；他們參加選舉投票——有時幾乎完全一致；他們盡納稅的義務；他們使生育率不致降低；他們盡當兵的義務。反戰主義和革命的宣傳，在他們中間都是不能擡頭的；不問它們是病態的或進步的徵兆，它們都只在新教的低平原是最常見的。倘使在一個國家內必須有保守主義以救

其過激主義之偏僻，那末，天主教黨可以說從聯邦共和國之最初期，直至現在，對此種重心之供給同其他各黨比較自應居其首功。自一八九一年以來，它在聯邦會議中就時常有代表，讀者參閱了第三章以後就可知道，國會中之多數布羅克 (majority bloc) 現在比從前更需要它的贊助。所以倘使從社會的觀點有兩個瑞士，至少我們可以說它們在政治的圈內，已經成立了試行和解的辦法 (a modus vivendi)。

瑞士共和國內第二種競爭的忠貞心理，乃為含有經濟性質者，其主要的代表，是社會黨及其附屬的各集團。如同在西歐其他各國一樣，它是宣傳階級鬭爭和革命的，雖這兩個名詞不必包含暴動的意思。誠然，檢討該黨之構成分子，關於此點下面有詳細的分析，我們有把握可以預斷它會永遠不致超出和平的憲法方法之外。社會主義者，雖極端反對天主教保守黨之宗旨，但並不反對它的方法，它也竭力成立各種附屬的會社。該黨以強有力的工會組織，為其堅固的堡壘，更從事建設教育的集團、體育和遊戲俱樂部、音樂和戲劇的會社等五花八門的組織。倘使它在這些努力上的成就，能殺同天主教徒並駕齊驅，那末，我們就可以說有三個而非兩個瑞士了。它的各附屬的組織之人數雖甚衆多，然而它似乎永遠不能殺建設一個社會集團之體系，而使其獨立的程度可與天主教相等。要使民衆採取一種獨立的態度，經濟的動機之效力，絕不能敵宗教的仇視。當然現在資本主義者和略表同情於資本主義者之各社會集團，是佔着很大的勢力的；直到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時候，兩者仍會有相當的人數；只要任何一方仍然存在，工人們必得同前者發生工資契約的關係和他種關係。產業的勞工和公家的僱員，瑞士社會黨之全部黨員，幾乎盡由該兩階級所招致，並不居於遼遠的州如天主教所支配的各州；他們大多居住於高

平原地帶之各都會的中心，所以他們不特易受政黨宣傳之影響，也易受其他各階級和全國的及國際的各種文化勢力之影響。

忠於社會黨的主義，就不能完全忠於現在瑞士政府制度，因後者保障並獎勵私產。但此項衝突並非在各方面都必須是拚命抗戰的。因瑞士的現政府，既大規模從事於公有事業（public ownership）之經營，所以它對於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雙管齊下的。將來的情形，大致要看是誰的私產被收歸公有，沒收的數量爲若干，在甚麼時候和在甚麼條件之下。例如，當其鐵道收歸國有時，該項政策之所以得以通過，全仗佔優勢的獨立民主黨、純粹商人的黨、和當時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勢力之贊助。在另一方面，當其社會主義者，於一九二二年關於資金稅之徵收提倡創制時，好像是對於私產制之正面的進攻，他們吃了大敗仗，很多他們自己的黨員，也拆了我們的臺，而居然投了反對的票。倘使該黨要得農民的贊助，它必須改變口氣，尤其是關於小田莊的產權問題。所以謹慎從事於它的公有制和賦稅的提案，乃是它的成功之基本的條件，尤其是在像瑞士的國家內，其中極大多數人民，具有一個高度發展的財產意識，並切願達到經濟的安全，大家對於社會保險計劃之濃厚的興趣，和在儲蓄銀行有存款者佔全人口很高百分比等事實，都爲其鐵證。

各州的權利，既爲瑞士人超駕一切的忠貞心理之一部分，因社會主義者之信條，包含着很集權的、標準化的和國際主義，所以它又是站在反對的地位的。守舊的公民們對於國家的特性，具有一個高度發展的意識和對於外國的勢力之一種極端的恐怖，所以他們之反對社會主義，一方面是因爲它的經濟的政策，同時也因爲它的異

國的根株。然而以地方分權的問題而論，互讓似乎並非是不可能的。將來一個在國會中佔多數的社會黨，將各大規模的產業交予聯邦，同時它可以將較小的事業單位，轉移予州和市的政府，以求中央和地方間之均衡，後者的確在公有的方向上已經有了很多進步。電力廠、市立的自來水和電燈廠以及街車之經營，都在它們的手中了。從各方面看起來，從最低的行政機構開始而向上進行着是比較容易的，因在社會主義尚未在全國中佔多數以前，它必須在各地方和各州先獲取了相當的勝利。

這樣的平衡能否維持到底，社會主義者在瑞士如像在別處之旨趣，是同資本主義的國家相背馳的，但對於國家之本質，就是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必然要成爲比較從前更強盛國家，他們卻又並不反對。在這個立場上，他們所效忠的瑞士國，乃是將來可以成功的瑞士國，而非目前的瑞士國。翻開他們的本國史朝後看，社會主義者可以說他們是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間之更生者（regenerators）之嫡裔，當其那些先進們將貴族盛行的瑞士一變而爲民主的瑞士時，在其過程上，他們也曾致力於集權的運動。策之，該時期中的過激改良家，曾從外國的學說受了很深的影響，尤其是從法國來的學說。

倘使我們要將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在瑞士國內的政制保持平衡之功歸之於天主教黨，我們就不能不將在近幾十年中防免瑞士政制腐化之勞績，歸之於社會黨了。然而它們兩方面，對於現制的關係，有一個重要異點，即天主教保守黨參加聯邦行政委員會已有三十年之久，而社會黨至今尚拒絕參加聯邦行政委員會。雖然在後者現在有一個強有力的和方興未艾的要素贊成放棄不參加國家行政的政策，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有幾州業已放



棄了該項政策。社會主義者在幾個其他歐洲的國家中，業已發見有參加立法的布洛克之可能，而這在瑞士尙待實現。嚴格的議會制既不存在於瑞士，所以這樣的聯合，他們應當比在別處易於參加。

對於瑞士人民的超駕一切之上的忠貞，即對於民主主義之忠貞，社會主義者當然應佔很高的地位，除去他們中間的少數過激分子，肆言直接行動和普羅專政者不計外。然而這種言論大多發於人數日就衰微的共產黨，而且如下章所說，是毫無足輕重的。即或不重視名稱之意義，至少也值得注意社會主義者是在社會民主黨之正式的名稱之下進行的，所以他們在場面上是兼爲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政黨。因爲他們擁護婦女參政所以他們確實比其他資格較老的政黨，爲民主主義之更忠實的信徒。在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後者至多僅爲不冷不熱的民主主義者，因爲他們僅願接受它的平等的原則，於政治的範圍內而非在經濟的範圍內。在關於這個課題之通行的概念和社會主義者所信奉的概念之間，有一個極其親密的聯繫，其重大的意義尙未經人道破。如我們在前面所云，各階級的瑞士人，久已趨向於不信任精明能幹的領袖，所以他們的歷史和政治，都是爲羣衆的運動所決定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同馬克斯既是不謀而合，所以他們比較其他民族，似乎更有接受他的整個主義之危險。

調查在瑞士國內比較冒失的競爭的各種忠貞心理——主張分權之情操，倘使它確實屬於該類型；民族的和語言的紛歧，它們在現狀之下似無考慮之必要；宗教信仰的和經濟的衝突——昭示雖在幾種事件上隔閡日深，但無確具威脅性者之存在。當其我們考慮在許多其他國家內單由語言的問題所激起的仇恨時，瑞士人所給我們的印像，乃是一個快樂大家庭。各種忠貞的心理，在一個很高的程度上相互抵消了，農民和天主教徒一致反

對社會主義，擁護分權的西部和中部，一致反對擁護集權的東部等等。最後，聯邦的政治活動使各要素得以互相接觸，無論他們是怎樣被分離於老死不相聞問的社會，或地方獨立的集團。當然是產生了許多口角——無口角則不成爲政治——但也產生了對於對手方的力量，倘若不是對於他們的意見之敬重，而且有時也結成了很古怪的聯盟。例如社會主義者和農民至少在一個問題上可以聯合一致，就如一九二六年關於糧食專賣之憲法修正案；也曾有一個時候天主教徒和社會主義者，在地方的政治上結成了聯合的戰線，雖在基本的原則上，他們是不相爲謀的。倘使歐洲能免去總暴裂，那末，在瑞士國內發生任何種強暴的或奇突的變遷，似乎在最近的將來都是絕不會有的事情——下章關於該國政黨的討論，將予這個結論以有力的證明。

## 第二章 經濟的集團和政治的代表

在現代的瑞士，關於經濟的動機逐漸深入政治的問題爲一般注意之焦點。大家莫不承認這事實，雖關於影響這過程之他種勢力例如宗教的、語言的和地方的等勢力之大小各執一說。承認這事實，關於它將在瑞士人民身上可產生之禍福，都從各種可能的見解作了透澈的考慮，從社會主義者之坦白直率的態度到反動派之失望的預言，即各種優美的國民性將爲兇殘的唯物主義所吞沒之預言。

爲研究這個動境起見，必須有關於下列兩項之事實和統計：（1）關於該國之各職業集團，和（2）關於它們在政黨中和在立法團體中，尤其是國議會中之代表。關於後者之著述甚爲豐富，惟多屬於論戰的性質。關於前者不幸缺乏最新的材料，因爲瑞士之最近的產業戶口調查報告乃爲一九〇五年所發表。羅馬國際農地社（The Inter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 in Rome）曾請求世界各國政府在相同時期間，在各該國舉行大規模農地調查，以明全世界農地概況，瑞士聯邦行政委員會接受了該項請求後，近來曾命令其統計局切實調查農業、製造、商業、運輸和其他各種產業，截至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之狀況止。

不幸一九二九年之普通實業調查報告書，要待一二年後始能脫稿。因爲它是以每個產業場所爲一單位的，所以它對於全國的經濟情形，可有頗爲詳盡的記述。在該項報告書尚未發表之前，著者只得以最接近的每十年準

期舉行的戶口調查，即一九二〇年之戶口調查報告爲根據。當然，後者並非以產業機關的經理所填寫的表格爲根據的，乃是以每個公民關於他的受僱情形，對調查者所發問題之答語爲根據的——按在瑞士擔任戶口調查者大多是鄉村學校的教員，然而在這種根據上所搜集的數字，對於經濟學家，不論是怎樣，不能令人滿意，在政治的立場，它們在幾個方面，比較詳盡無遺的產業的戶口調查更有價值，現有的統計之重要缺點，乃在它們幾爲十年前之陳舊數字。暫時不提較小的分類，一九二〇年瑞士的產業集團和各集團僱用工人的數目，如第一表之所顯示：

第一表 一九二〇年瑞士之職業集團和每集團所僱用工人之人數及其百分比

職業集團	團僱用	人數	數百	分	比
農業及其他抽取工業		四九二、三〇六		二六·五八	
製造業		八二七、六二四		四四·六九	
商業		二一七、一五二		一一·七三	
運輸業		九一、二九七		四·九三	
公共行政和自由職業		九八、八九五		五·三四	
存款項按期收取息金者和支取養老金者		七三、二〇六		三·九五	
其他		五一、五七三		二·七八	
共計		一、八五二、〇五三		一〇〇·〇〇	

因爲瑞士幾乎完全缺乏鑽石資源，所以『在農業及其他抽取工業』項內，一九二〇年之四九二、三六〇人之九六·二百分比，是專屬於農業的。其尾數之三分之二，是屬於森林業、狩獵和漁撈者。從事於『採鑛和其他開採地殼之工業』者（mining and other exploitation of the dead earth's crust），引用一個頗爲別緻的統計名稱，不滿六千之數，這個數字，清晰顯示該國對於此煤鐵之基本的材料，必須仰賴外國之供給。估該職業集團之最大多數之四七三、五八九人，雖名爲『農人』，但此字在瑞士，並無佃戶之隸屬的地位之含義（no connotation of tenant subjection）。瑞士最大多數農人，是獨立的業主，從事於耕種和製乳酪，近來的趨勢是在於後者。一般農人均無多大產業，但都能盡量善用物力以增益其產量（small holdings and intensive cultivation are the rule）。許多州立學校，都能予學生以優良的農科各部門的教育。

雖然，農業之在瑞士，今已漸就衰微了，這種事實，和農人有頗高的平均智力之事實，頗足以說明政治上之所有組織完善而效力偉大之農運之原因。當一八四八年第一聯邦憲法成立時，人口中三分之二是以務農爲生的。五十年以後，其比率已降爲三分之一了。在一九二〇年和在一九〇〇年，務農者之絕對的人數，幾完全相同；但在各種職業中從事於多利潤的工作者之總人數而言，則其相對的人數，在二十年中，已自三〇·三百分比減至二五·六百分比了。在世界大戰期間，瑞士農人曾享受過一度架空的繁榮（fictitious prosperity），因此在土地和設備上，有了些冒失的投資。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農產價格之陸續跌落，曾大增其處境之困苦。惟恐此種困苦之重現，全國乳酪業協會（The national dairymen's association），曾以其先見之明，於利潤豐盛之年徵集了

數百萬佛郎之巨款，以便於牛乳售價低於成本之淡年中稍資挹注。目前該項基金虧蝕甚大，使製乳酪之業，有不久行將發生嚴重的恐慌之危機。

一八四八年之瑞士，雖有極大多數之農民，但同時製造業，也有了相當的根基。起初投於工業的大部分資金，是從爲外國的君王充當僱傭兵所得糧餉，這可說是一件希奇的事實。他們同外國君王所訂的合同，通常不僅勒索付現的高昂薪餉，並以消納大宗瑞士物產爲其附帶的條件。它雖缺乏煤鐵，但富於水力，而人口雖相當的稠密，但生活程度並不算高。瑞士之有鐵路，比較在別國之後，大率因爲在多山之地建造困難的原故；但約在一八五〇年與一八六〇年之間，一個頗堪足用的鐵路網，已經完成之後，產業的發展，於是遂有了一個新的推動。在十九世紀末葉，在從業者之人數上，工業已追過了農業，在一九〇〇年，估總人數四六·一百分比；在一九一〇年，爲四六·三百分比。其後有一個細微的相對的低落，但其人數在表面上雖似稍減，而在實際上乃爲漸增之勢，因於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二〇年之間，從事於製造者之絕對的人數，曾不斷地約略增加。我們可以更確實地說，在最近十年中，就工業之整個發展而言，它已落在商業和運輸業之後了，大致是因爲在各項工業上，曾發生過很大變遷之故。例如冶金業、機器和工具製造以及化學工業，現在比其他種工業都頗發達，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進步甚速，然而織造業、服裝業和建築工業，就比較衰落得特多了。

瑞士的農業和工業，在政治的利益上，雖常是相反的，然亦有許多相似之點。兩者均經營比較小的單位，僱用精熟的工人，而生產大部分，必須運銷於國外市場的精美商品。特別是後面一個條件，將一種迫切的保住飯碗的

動機之所有的力量，放在祈求和平和保守中立的非常強烈志願之後面；它甚至孕育一種超國家的保守主義。因為倘使世界各強大而富庶的國家，失卻了普通經濟的安定，購買瑞士的奢侈品的外國主顧之人數就要減少了；而且倘使一旦戰事發生了，他們的金錢，就必須用於生活必需品的上面，並於水陸被封鎖時，必須將款項捐輸于政府以製軍火。

瑞士的專門學校，對於農業和工業都培植了大批的高等人才，這些人才，因為在祖國無用武之地，所以必須到外國去謀發展，而其本國的農業和工業，因此而有的缺額，又必須招致意大利和德國南部等地之粗工以爲抵補。瑞士的工業，大部分爲農人家之副業，農人備辦材料回家，而由其全家男女老幼合作製成貨品，此種副業，雖較前稍衰，但仍較他國盛行。這種性質之家庭工業，在別國會發生過許多弊端；因其無需高等的技能，所以工作者雖終日累得汗流浹背，而所得之工資，仍不足以糊口，而童工又常爲其結果。在瑞士也有時聽見類似的怨言——織草辮和製雪茄煙的工業情形最壞——但它們比別國總算還少，一半必然是由於必須有高等技巧的工作，例如製造鐘錶，而另一半必然是由於同時有從莊稼和製乳酪之收入。保障工人使其不致被人剝削之功德，也應歸之於民主的環境和勞工的組織。事實上，瑞士人每每讚揚家庭工業，以其能使閭家團聚，而保存了在別國已被工廠的製造所毀滅的某項美麗的農家藝術。

我們不應當過分重視了瑞士的工業之特有的渺小的單位。它也有某種利益——鼓勵企業和創造，並且使利極多種有特色的物品之製造。從它們可以發生的弊病，大多已被生產者協會和各式各樣組織所補救。例如瑞

士的奶餅，道地的真正的瑞士奶餅之註冊商標，爲『瑞士國奶餅』（“Switzerland cheese”），是三千多奶餅廠（Käsefabriken）之出品，就有許多範圍很小；但它是在一個非常有勢力的和手腕靈活的協會蔭庇之下所集合的、檢驗的和運出國外銷售的，它在美國各大報所常登載的廣告，幾爲天才之手筆，而且它對於高額入口稅之剋制和對於和蘭、德國、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n）和本國廠商所製的劣質的冒牌貨之抵制，都發生了非常的效力。

商業和運輸業，於一九二〇年，共僱用了瑞士國內從事於生利的職工總人數六分之一，兩者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在人員方面，都有迅速的增加。至於商業同工業，亦有相同的情形，範圍不大，職工之技能都頗高，由許多小本商賈聯合而成偉大的組織，該集團所表現的主要特性，爲其中有一個頗大的百分比（三四·三）在旅館內、在公寓中和在餐館內，從事於兜攬外國客商之生意（*Fremdenindustrie, Industrie der Fremder*）。因着鐵道國有的緣故，所以只有運輸業纔確實可稱爲瑞士國的大規模的工業。在前次戶口調查中，有九一、二九九工人從事於運輸業，就有七六、二二九人被僱於公共運輸事業，除聯邦鐵道外，當然包括許多都市的街車系統。上文所云關於瑞士的工業，仰賴外國顧主，和它因此對於國外和平和安定之關切的情形，倘使加之於商業和運輸，就更加真切了。瑞士之旅館營業，幾完全爲世界戰爭所摧殘。鐵道當局，細心觀察旅行遊覽者人數之升降，用詳細的統計圖表以作精密的研究。開設商店者也祈禱晴和乾燥的夏日的天氣，此爲在瑞士不可多得的天氣；但他們的禱祝從來沒有像在一九二八年被上蒼完全接受了，因當年遊覽氣候之長，竟成旱災，使農人幾盡成



餓斃了。

在『公共行政和自由職業』項下所包括的集團，或若干集團之總合，不僅是人數衆多（在前次戶口調查報告中，它居然比轉運業超過數千人之多），而且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二〇年之間，它的增加率比較任何其他集團都要快些。公共行政人員之增加，當然反映瑞士的各公共機關之擴充的狀況；自由職業人數之增加，可以說是因爲教育的生產過剩（educational overproduction），這是大學制度的批評者所常指出的（譯者按本句原文有前後倒置之誤，已在譯文中代爲修正特此聲明）。因爲這個集團，在該國的政治生活上，是很關重要的，茲特將其成分詳示於第二表：

第二表 一九二〇年在瑞士國內從事於公共行政和自由職業者之人數

職	業人		數每種職業對總人數之百分比
	公共行政	政	
教	育	三〇、四八一	三〇・八
法	律	六、七一一	六・八
醫	藥	一七、四四二	一七・六
宗	教	五、一三六	五・三
美	術	六、五四五	六・七
其	他自由職業業	六、五六一	六・七
公	共行政	二六、〇一九	二六・一

在公民訓練的立場上，第二表所顯示的最重要的事實是：爲國家服務者之人數，超過瑞士的男女專業者半數以上。加上所有從事於公共行政者（二六・一百分比）；佔最大多數之教員（三〇・八百分比），他們當然是屬於公立學校的；公立教會（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之極多傳教士；以及從事於公共衛生之職務者；我們的得數幾等於專業者的總數之五分之二。當然這並不是說，上舉各集團，在公民的知識上，優於一個律師或獨立行醫的醫生；然而一個人的薪水，是從公帑所支取之事實，勢必使其在政治上之興趣有重大的擴展。

所可惜者，本表未能將從事於事業的幹事之職務者的人數，從『其他自由職業』項下分別劃清，因為他們在商業上，在工運上和在政治上，都有極大的勢力。在第一表內所提示的更雜的各項中，令人注意者爲在瑞士國內未從事於生利的職業者之頗多的人數（七三、二〇六人），他們是存放款項按期支取息金者（三三三三三三）和支取養老金者。充任傭工者，婦人有二〇、五二三人，男子有五、三八九人；居住於公共機關之內而依靠其贍養者，有二〇、五二三人，內中有婦人一九、〇八七人。

上文已提及經濟的因素，在瑞士的政黨生活中之勢力逐步擴充之情形，乃是人所共見的事實。它不特彰顯於所提出的政策之中，也彰顯於立法團體之人員中，尤其是在國議會中。後者是由全體公民投票所選舉者，它在履行它的職務中，頗能融合彌拉波（Mirabeau）的理想之國會——一面私衷反映國中一切階級和每個意見之明鏡。

這種褒語，對於成立後七十年中的國議會，雖屬適當，但自一九一九年普選以來，它的正確性業已大增了，因一九一九乃是瑞士首次施行比例代表制之年。對於後者，不管我們可以提出什麼政治的反對理由，但它確實曾使瑞士立法團體的人員發生變化。自一九一九年以來，每一州已成了一個選區（electoral district）。因為有幾個州的幅員頗廣，零落的政黨和集團，曾被鼓勵提出它們的候選人，它們雖不一定會成功。例如白恩選舉三十四人，而沮利克選舉二十七人，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個集團在這兩州內，倘能投稍微超過三十四分之一或二十七分之一，則選票，它就能選出一位在國議會代表各該州的議員。當然這裏所舉的是極端的例子，然有三州各舉十人至二十人，十州各舉五人至十人。在另一極端，有四州僅各舉一人，這四州即由銳（Uri）、阿布瓦特（Obwald）、尼德瓦特（Nidwald）和內阿彭色爾（Inner appenzell），然這四州的社會和經濟的狀況，都是非常單純的。恰似美國的參議院（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瑞士各州各舉兩人於邦議會。後者，因此不能代表全國現存的各社會和經濟集團，有如國議會之所為，並且它的總人數也少於國議會。

只要有了比例代表制，瑞士國內組織非常不集中的極多政黨，就必定會選出具有各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知識的和宗教的傾向之代表。在各政黨的背后，有極其繁多的會社和俱樂部，它們都各出新水任用專業幹事，並善於運用它們的政治權力，這些組織有的是屬於政黨的，也有獨立行動的。

關於上面所舉各條，政治的情況雖利於在國議會中，將全國現存各階級按其人數的比率完全反映出來，但有少數較小的事例中，在他國所容納的代表而在瑞士反被摒除。第一，積極的或消極的婦女參政僅存在於少數

地方分區中，其結果使聯邦的和各州的議會中都沒有女議員。第二、依照瑞士憲法第七十五條之規定，凡僱侶或凡執行宗教事務者均不得被選為國議會之議員。該憲法之七十七條又規定，凡任聯邦政官吏者均不得被選為國議會之議員。在另一方面，武官卻具有此項被選舉權，而在事實上，他們的人數在國議會和邦議會中都佔了一個很高的百分比。

焦萬羅利博士(Dr. Fritz Giovannoli)近來曾將國議會之高度的代表的性質，加以詳盡的分析，他對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八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瑞士普選之研究，可為美國所急需的統計調查之楷模。他按照職業將於一九二八年所選舉的一百九十八位國會議員，列於如第三表所舉之各類，他的數字在該表中略有變更，以便同美國的情形相比較。

第三表 瑞士於一九二八年所選舉的國會議員

職	業人	數	百分比
(一) 律師和法律業務		四八	二四·二
(二) 行政官吏和政治人員		四四	二二·二
(三) 農人和田莊經理		二六	一三·一
(四) 幹事		二四	一二·一
(五) 產業製造者、商人、獨立營業之業主		一八	九·二
(六) 編輯、出版者		一二	六·二

(七) 教授、教員	九	四·五
(八) 其他自由職業者	九	四·五
(九) 僱員和工人	五	二·五
(十) 存放款項按期支取息金者	三	一·五
總計	一九八	一〇〇·〇

在未着手解釋這些數字之前，我們應先聲明焦氏是以現在的職業爲他分類之根據的，於是不問國會議員的議員們從前的活動。雖然，一個議員從前的職業同他被選舉時所從事的職業，對於他政治的效用可以有相等的關係，這在瑞士同在美國都是很真切的。研究瑞士的國會名錄 (*Jahrbuch der eidgenössischen Räte*)，我們可發見許多國會議員的議員常被選舉時，是充當州或市的官吏的，但他們在未參加各該區的政治活動以前，曾從事於各種不同的職業。同樣，許多被焦氏登記爲編輯或專業的幹事者，從前也曾有過勞工和工會職員或工商業支領薪水的職工之經驗，爲其現任職務之基礎。在美國，大家都熟知，從鄉區來的許多國會議員之履歷類型，約略如下：由莊上的小廝 (*farm boy*)、學校教員、律師、區代辯人 (*district attorney*) 或擔任地方或州其他公務者，被選爲國會議員。對於美國和瑞士的國會議員，作一番普通研究之後，我們會發見經濟生活之流動性 (*fluidity of economical life*)，在美國遠超於瑞士，這固然合於我們所逆料；不論如何，在美國，從前的生活，在職業上有較頻繁的變遷和同時兼任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職務，是比較地常見。研究議員的職業之後，我們可以確實知道某種職業

(例如在瑞士爲法律、幹事職務和新聞事業)，比較他項職業對政治有較大的聯繫。然而倘使我們對於議員們早先的職業和他們社會的來源加以調查之後，我們對於此點，就可有更充分的了解了。瑞士聯邦統計局根據一九三一年普選之結果，現正從事於有這個性質之研究，不久即將公布其研究報告。

現在讓我們來詳細檢查第三表之數字，我們可立即發見律師居該表之首位，他們在國議會中佔四十八席，或說佔其議員人數二四·二百分比。很令人奇怪的，是焦氏未將九位法官包括於該四十八席之中；但據他核算全體議員中，足有七十人或三十五百分比，曾在他們的生活上研習過法律或充當過律師，其中三分之一，過後曾改業它行，所改職業大多爲行政職務或爲商務。

法律專業對國會之服務有極大的淵源，這在瑞士同他處並無區別，其理由甚爲明顯，故無復述之必要。瑞士人對律師之親暱的稱呼，*「Eizpredi」*，比較英文和導源於拉丁的用於文學及公文之德語 *Advokat* 更能顯示該項理由。然而許多律師出任國議會之議員，不完全因爲他們的職業，這是很顯明的事實。他們在商務企業中所握獨斷獨行和經理的位置，或者甚至有更重大的意義，更可注意者，爲瑞士各政黨對於推選律師爲議員的主張，也頗不一致。兩個在一般的見解上，都是保守的天主教黨和獨立民主黨所推舉在國議會中代表它們的議員，所有律師的人數就頗懸殊：在前者有四三·五百分比是律師，在後者僅有二四·一百分比是律師。在另一方面，農民黨雖亦有保守的色彩，但它的三十一名議員中，僅有兩名爲律師。社會黨常被諷刺爲收藏「不體面的倒楣的律師之廢紙箋」(*「wastelasket for discredited and brieffless barristers」*)，而在國議會中代表它的五十

位議員，僅有五位律師和兩位法官。

主張議會中有四分之一的律師不算太多者，頗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實少於此數，對於立法過程上之效率，就會成問題了。然而在瑞士，有少數政治的吹求者，時常有竭力反對他們所謂法律界把持國議會之危機。這種批評，實屬無的放矢，第一，因為新興職業之漸多，律師在國會中之百分比已有顯著的減退；第二，律師在瑞士國會中所佔的百分比，低於他們在別國國會中所佔的百分比。該專業在瑞士之崇高的標準，各律師間並無排擠與陰謀之事實，以及民衆對於此業之敬視，已將吹求者之口堵塞，故使他們難於施展其伎倆了。

國議會中第二大專業集團，佔全體議員人數二二·二百分比，包括州的官吏（一三·六百分比）、市的官吏（五·五百分比）和州市政府的僱員（三·一百分比）。州的官吏中，包括各廳長以及其他行政機關的人員；市的官吏，包括市長和各局局長。在美國的國會中，有一個頗大百分比之律師和一個較小百分比之其他職業者。在未升為國會議員之前，曾經充任地方官吏。瑞士於此有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地方現任官吏同時兼任國會議員。美國與瑞士間，這個區別，必然是因為後者之幅員編小的緣故。

然而就在瑞士的立場，各州的官吏，在國議會中佔着如此其大的一個比例，也是近於反常的狀況。在傳統上和憲法的規定上，邦議會之宗旨是在聯邦政府中充作各州之代表的機關。在事實上，它於這個職務可算頗具勞績，它的議員們在各州政府兼職的情形，更盛於國議會。一八四八年瑞士的建國元老們（founding fathers of 1788）所始料不及者為如此多的州官，會被選為國會議員。

雖然其後的發展並不難於領會，瑞士人慣常稱各州爲實驗室，凡政治的實驗先於其中予以嘗試，有了成效然後推廣於全國。同樣，各州亦爲對政治領袖的發展之育種場（experimental station）。凡在州政或市政的職務上著有成績者，頗有被選爲國會議員之希望。並且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頗樂於有深通各該地方情形者，在白恩保障其權益。在這種情形之下，收穫最大利益者，究竟是各州或是聯邦，這在瑞士尚爲一個爭辯的題目。有一種極通行的見解，以爲後者遭受各種補助金之無情的榨取，幾至傾箱倒篋，而它所得的酬報，僅爲極少的權力之讓子。

焦氏的意見，以爲將地方和聯邦的職務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中，顯證米其爾斯教授所倡之民主的政黨制之所特有的寡頭政治之社會學的法則（an illustra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law of oligarchy characteristic of democratic party systems which was enunciated by Professor Robert Michels.）爲防免專權起見，許多州憲制定僅有若干行政機關的人員，可同時兼任國會議員；他州例如提省諾絕對禁止其官吏（*regierungs-Beamte*）兼任國會的職務。然而憲法的條文和政治的實施，在瑞士都較比在美國更爲寬容此種兼職。在美國有許多州的憲法禁止此種兼職，有時用在兩種治權之下的『有利的職位』或『重要的或多利的職位』之措詞，亦有時特別指明國會議員（using such expressions as “*judicative offices*” or “*offices of trust or profit*” under two jurisdictions, in some cases mentioning specifically membership in congress.）即或沒有這種限制，一個美國的政客，也不容易同時兼在州和聯邦任職。他的敵對，必然要輕視這種行爲，以爲不合專業的



倫理，甚於對於一個不甚重視公益的團體之個人，也會不屑這種卑污可恥的圖利的行爲。必定會有人援引美國的州權和分權之神聖的定理 (sacred dogmas of states' rights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以爲反對如此的實施之理由；兼之，社會的輿論，也會把它當作是小人的行徑。

構成國議會中之第三最大集團者爲農人，佔其議席一三·一百分比。農民黨於一九一九年之選舉運動中，第一次參加聯邦的政治活動，它是在國會中竭力擁護農人之利益的。國議會中，屬於該黨之二十六席，有十五席是爲農人所得。然而農業的選民，是被其他兩個保守的政黨殷勤籠羅的。在國議會之五十八位獨立民主黨的議員中，有六人是農人；在四十六位天主教保守黨議員中，有四位是農人。在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因爲是以擁護都市工業爲政策而反對農人之利益的，所以在它的五十位國會議員中，沒有一個農人。

國議會中一個最有興趣的集團，是由專業幹事們所組成。雖然他們新近纔參加國家的立法，但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已有二十四人之多，佔全體議員人數一二·一百分比。他們的職業的本身雖然是很新的，然而他們所掌握的權力（或者我們可以說從他們身上所施展出來的權力）是很可觀的。在瑞士每種社會的組織——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知識的、或其他——一旦款項有着落，就必任用一位支取薪水的專業幹事。組織擴大時，在他之下又添雇若干助理員，有時甚至有幾十位人員在他的指揮之下，分別辦理各項事宜。這些專業幹事，因曾受過高等教育和專門訓練，支取很高的薪水，而其位置又非常穩固，所以對於其業務都非常幹練精明。關於他的機關及其一切的關係，他們都能原原本本如數家珍。他們對於政策之規劃及其提供與局外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

公開會議）或與局內人（他們的會社之會員）他們都有左右逢源之妙。他們被任用於執行某項命令時，他們的長久的經驗以及熟悉各種情形之優越的機會，使他們能有一般人所不能有的某種利益——甚至有時我們對他們的印象是：發號施令而執行之者，並非機關，而實在就都是這些幹事們自己。

倘使瑞士人對於權力這樣集中於專業幹事之手，而俯首帖耳不加反抗，就失去了他們的本色了。然而我們時常可以從各方面聽見怨言，說政治是被經濟的利益所征服了，並指出專業幹事的伎倆以證其說之非妄。爲專業幹事制申辯的人，於是遂反駁說：爲各階級的公民所成立之各種新組織，必須在政治上謀發展，即使它們因爲要取得它們應有的發展，而遂將某種較舊的代表排擠出去了，也無傷於公道，並且專業幹事之加入議會的團體，足證憲法對於變遷的社會的勢力之適應性。拿偷偷摸摸的或貪贓的勢力來比量，我們寧可讓比較強有力的會社之受薪給的代表，名正言順地出席議會，在那裏他們的活動，是人所共見的，並且我們可以隨時對他們加以批評。

在瑞士同在他處一樣，常有人攻擊議會，說它們不能代表民意而且效率很低。據說現在已經是時候了，我們應當立即將它們廢去，而代之以某種職能的代表制了，尤其是比較重要的經濟集團之職能的代表制。對於這種性質的批評，在瑞士國爲現制辯護者，能鼓作一個很有效的回答。他們僅指出在國議會中之專業幹事們，用以證明在他們國中所通行的民主式的代表制，對於將代表一切重要的經濟的和他種社會集團之利益者加入議會，並不感覺任何困難。

事實上，除在國議會內代表選民集團之少數幹事外，尚有許多其他幹事，也有很靈活的政治手腕。影響任何組織的法案，一經提出於聯邦的議會，就馬上有該組織所任用的專業幹事出現於白晝了。據說後者非常精通各該提案之情形，並且非常善於說詞，一般議員當之，罕有不被其說服者。然而他的職務，通常僅為聽取代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敵對的會社之幹事們之辯論，而加以評判。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一個有趣的和足資證明上述的主張之事實表現出來了，就是不像他處所通行的在議會的應接室私下大展其運動手段的說客（*talker*）（瑞士的幹事們是僅以公開的辯論向議員們進攻的，並沒有聽見說過他們有賄賂的嫌疑。

在國議會中佔二十四席的專業幹事，可分為三類：（1）工會幹事十人；（2）商業和雇主協會的幹事十人；以及（3）政黨幹事三人。所以為第一、二兩類所代表的資本和勞動的勢力，暫時有旗鼓相當的陣勢。工會的十位幹事在國議會中，都是屬於社會民主黨之陣線的，這也是事理之當然。商業和雇主協會之十一位幹事，分屬於下舉三個政黨之陣線：獨立民主黨五人；農民黨五人；天主教保守黨一人。至於上面所說第三類——政黨組織的幹事——二人屬於社會民主黨和一人屬於農民黨。

在國議會佔議席的十八位商人，除了一個例外，是平均分配於製造、銷售以及各種銀行和投資之企業的。目前只有一位旅館業的代表，是國議會的議員。大致從事該業者之利益，是同地方政府頗有關係的；據說他們在風景遊覽的中心所掌握着的勢力，雖不能超駕一切之上，至少也可算是很強大的。在一個風景區內，從前曾經發生過一場很熱鬧的鬭爭，在一方面，有旅館業主為他們的客人之方便起見，要在湖濱和沿公園的人行道旁安放長

椅，在另一方面，有納稅人拚命反對這種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奢侈。旅館的隊伍得勝了，自從那時起安然享受該項長椅之舒適者，大多都是從前曾反對購置它們的人。

編輯、新聞記者和出版者，在瑞士之偉大的勢力，已被他們在國議會中的十二位代表所證實了，至於其詳細情形，將在他處論列。其半數屬於社會民主黨。焦氏說：『尤其是瑞士的編輯和出版者之自身，就是一種人民的代表，因為他們所發刊的最大多數的報章，是坦白地發表人民政治的言論之喉舌。』所以新聞業者對於行政的，尤其是立法的職位是有很大緣法的。

教員和教授在國議會中之七人的額數，是遠不足以代表他們的龐大的勢力的。自從一八六〇年間民主的運動經那位鄉區白賽爾的非凡的教師熱勒 (that remarkable schoolmaster of Rural Basel, Christoph Roth) 發起以來，他們都曾致力於實際的政治。然而在中間，有許多人覺得不能久曠他們的教育的職守而赴白恩去參加立法的議會。我們雖沒有統計的數字以為根據，然而在各州和地方的立法的機關中，比較在中央的立法機關中，有一個較大的教員的額數，乃是人所共知之事實。

在其他自由職業之九位議員中，特別是行醫者 (medical practitioners) 佔了優勢，他們有六人目前是在國議會中，其中有二人是獸醫。兩位工程師和一位建築師合成九人之集團。

雇員和工人，差不多不能從他們的日常的勞動中抽出工夫來接受聯邦立法之選舉。雖然現在在國議會中，仍有五位是屬於該類之代表的，他們都是隸屬於社會民主黨的陣線的。然而一般的說來，該黨之全體五十名代

表，都可算是在國會中擁護都市工人之正當利益的。在經濟的量表之另一端，有三位屬於天主教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是歸入存放款項按期變取息金者 (rentiers) 之一類中的。

以瑞士的國議會來同美國的衆議院 (Americ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相比較，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出兩下的律師代表人數之懸殊，在前者僅爲二四·二百分比，而在後者竟有六一·五百分比。在另一方面，屬於州和地方官吏之一類者，在瑞士五倍於美國。美國雖有普遍的農業的困難，但農人在國會中僅佔三·二百分比，以之比瑞士的農人在國議會中所佔的一三·一百分比，相差很大。幹事的事業在美國，其重要遠不及歐洲，所以我們在衆議院中僅發見一位 (〇·二百分比)，『地方、州、郡和國際勞工組織之職員和代表』 (‘‘officer and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state, distric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s’’)，差堪歸入該項下，也不足深怪，以之與國議會之二十四人 (一二·一百分比) 比較，真可謂小巫見大巫了。在華盛頓的下議院中佔大多數者爲商人 (一六·八百分比)。在白恩的對照的團體中他們居第五位，其百分比爲九·二。編輯和出版者在瑞士比較在美國更佔優勢：前者爲六·二百分比，而後者爲三·七百分比。這兩個國家的教師可以說是魯衛之政：前者爲四·五百分比，後者爲四·〇百分比。關於其他自由職業相差甚微：在衆議院中佔議員人數百分之三·五，而在國議會中佔百分之四·五。工人和雇員之在美國國會，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分的，雖其中也有兩位議員 (〇·五百分比) 是可以算作工人的——一位在被選時是火車的司機人 (locomotive engineer)，另一位是業造紙者 (paper maker by trade)。因着上舉的原因，在瑞士的國議會中之工人的數目，是很小的，但

也有五人（二·五百分比）是歸入此類的。美國國會議員中沒有人肯承認他是『從產業收受定額的進款者』（“a recipient of fixed income from property”）；大概是因為在政治上，這是不便於說出口的。不論如何美國國會中沒有一個自承是“rentier”的人，而在瑞士的國議會中有三人（一·五百分比）自承是屬於這個經濟集團的。最後，在美國眾議院中之八位（一·九百分比）女議員，是瑞士的國會所無以比擬的。將女議員歸入職業的類別，似乎是不可能的；顯然在一兩件事例中，其決定的因子，是因為同一位亡故的國會議員之生前有夫婦的關係，後經該選域之全體選民，補選該婦以遞補其亡夫之遺缺。有兩位女議員，具有身為前代全國聞名政治領袖的女兒之殊榮，但為公道起見，我們應當說這兩位女議員中之一位，在政治的能力上，曾充分顯證她自己是很有國會議員資格的。

根據上文所提供的事實，來辯論關於各社會集團之相對的重要，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不過法律的專業，在美國比在瑞士有一個更顯著的地位，似乎是很明顯的。即或說在美國國會中，許多律師之被選舉，並非為着他們的專業，乃是因為某項商業或他種關係的，而他們的人數之百分比，超過瑞士國議會兩倍以上之事實，必定是因為對於他們的立法的資格，民衆有普遍的信仰。用另一種方式說，瑞士各集團的選民，例如農人、工人、一部分的商人，似乎已將他們對律師的信仰，轉移到他們自己的階級的分，或他們的組織所培植的專業的幹事了。兼之，瑞士的農人和工人，所已經發展的高度的階級意識，是在美國找不着的，他們並且建設了組織堅固的政黨，使他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權力增高了。關於此點，我們也不應當忘記了多黨制（multiparty system）的影響，比例代

表制，以及創制和複決，這一切都有利於某少數集團之政治的堅實與活動。

美國的商人比瑞士的商人更有勢力，似乎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瑞士，一般民衆對於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有相當的敬重，但總不能比擬他們從美國民衆所受的崇拜；並且在權利上，他們也不能佔其它階級例如農人和工人之便宜。我姑且把在美國國會和在瑞士國議會的律師放在一邊不說，商人在前者之百分比（四三·六）比其在後者之百分比（一二·〇）超過三倍又半了。美國的商人對於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顯然也漸倚重他們自己的階級中之活動分子了，而且這個趨勢，也漸獲得了民衆的擁護。他們在國會中的集團，不特是在逐漸擴充，並且以國會議員人數而論，實際上除律師外就要算他們最多了。他們的人數（七十二人），已經超過律師的人數（二百六十四人）之四分之一了。沒有其它職業團體，能達到衆議院全體人數百分之五，但商人已經佔了它的總人數之一六·八百分比。所以我們可以總括一句說：美國商業利益之較大權力和尊嚴，已在國會中有效地被反映出來了。當然我們也承認瑞士的產業之利益，是爲屬於其它職業的議員代表了，較爲顯著者，爲律師和專業的幹事；但在美國亦有同樣的情形，或比瑞士更盛，因爲在衆議院中有極多的律師。

同樣，地方和州的官吏、專業的幹事、新聞記者以及農人和工人，在瑞士之較大的勢力，有如他們在議會中的百分比所顯示，是被觀察和一般的報告所證實的。這些團體中間的前三個團體，其尊嚴，確實大概由於其專門訓練和教育；其後兩個團體之尊嚴，大概由於選民之衆多、組織和黨的領袖。上面已經說過，教員和教授在美國國會中（四·〇）和在瑞士國議會中（四·五）之百分比，差不多是相等的。然而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他們在瑞士

比在美國有更大的勢力。雖然缺少統計的根據，大致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州議會和市議會所有的教員之百分比，恐遠不及瑞士之比照的團體。至於其他自由職業，在國議會中之一個略微較大的比例，恐不足以爲社會的權力和尊嚴之論據。有一件稀奇的事實，就是行醫者在美國和瑞士，都是該類中最大的單獨的團體。

上面關於律師的百分比不超過二四·二，有如在瑞士的國議會中，爲保持立法的品質所必需之主張，似乎是很中聽的。然而在美國，幾乎沒有人以爲保持律師在衆議院中之最高的百分比（六一·五），也是爲要達到該項目的所必需。在反面，這個最高的百分比，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專業之過分的膨脹，有使一切其它職業遭受犧牲之局勢；並且，它對於其他職業中的分子之政治的能量，也發生了問題。即使美國的法規，因這個緣故，遂有了完美的形式和詞藻，事實上很少是如此的，它們是否缺少重要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僅爲其他集團之較多的代表所能貢獻？在國會的四百三十五名的總人數中，僅有十六位農人、十六位教員、十二位編輯和兩位雇員，其人數是否足以把握而提示數百千萬從事於這些職業的公民之各種不同的利益和意見？

因爲兩國間的情形有顯著的區別，所以我們不應當過於重視上面所述，關於瑞士的國議會和美國的參議院之人員的比較。雖然，它們確實昭示某項廣闊的反比，而這種反比頗有啓示的功用。在瑞士一般的經濟集團和各該集團在國議會中之代表人數之間所作之比較，當然比較妥當。所不幸者，是關於前項的詳細統計尙付缺如。然而將第一、二表內的數字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農人雖在該國之某幾部有堅固的組織，而他們在國議會中之百分比（一三·一），僅爲他們的階級對全國從事於生利的職業之總人數之百分比（二六·五）之一半。將



他們的黨推廣於新區域之後，他們的額數或可增加；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當然要遭受天主教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之聯合拚命的牽制。至於實業階級，在這名稱下面包括製造、銷售和獨立經營的業主，它對於從事於生利職業者的總人數之百分比爲五六·四二，而它在國議會中之代表，僅佔其全體議員人數之一一·七百分比。然而這後面的數字，顯然是絕不能在瑞士的政治生活中，代表該項經濟的因子之真實勢力。並且，它是由兩種南轅北轍的要素所合成的——雇主和雇工——後者在國議會外，雖佔極大多數，而在國議會內，它僅佔屬於該集團的五分之一的議席。如上文業已說過，雇主們是爲許多在聯邦議會中的律師和較少的專業的幹事所照顧的，而工人和雇員享有他們自己的幹事以及全部社會民主黨的陣線之護持。但這兩表所顯示的最令人注目的差別，乃是關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作者之聯合的集團。在瑞士從事於公共行政和自由職業者，僅佔從事於生利職業之總人數五·三四百分比；然而律師、行政官吏、幹事、編輯、教師和其他自由職業者，乃佔國會議員總數六九·二百分比。倘使具有擁護他人的權利之特性的律師在後面的額數中佔了過分的優勢，我們很難解釋它是瑞士選民對於該國全體知識階級所投的信任票了（a vote of confidence by the Swiss electorate in the educated class of the country as a whole）。然而當我們考慮律師僅稍微超過該額三分之一之事實時，該項解釋，就顯然不爲無據了。確實，它是同瑞士人民對於教育之信仰，完全相吻合的，該項信仰，乃是瑞士人民之最出色的特性。

在結論上，我們可以說，瑞士的國議會包含一個專業和職業之均衡的參差（Swiss National Council con-

ains a balanced diversity of professions and occupations) 就中沒有一個職業，超過四分之一的議員總數，而其中有幾個職業人數頗爲可觀，所以它們在一切問題上，都有舉足輕重之勢。國家的命運，並非付之於律師之手的；在反面，所有農人、商人、公共行政者、編輯和教員之人數，足夠充分提示各該業的意見並維護其權益。如同上文所說，這種情形根本由於瑞士有很多集團，各集團都有很好的組織，有很精明幹練的職員，深通政治狀況，而在公共事務上，頗能獨立保持其自己之權利。根據焦萬羅利博士最近研究，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之國議會的選舉所提出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意義。在下章對於瑞士的政黨機構之探討，對於本章的結論將予以更有力的證明。

## 第三章 瑞士的政黨·沿革組織成分政策

### 沿革

在瑞士聯邦制下之政黨的歷史，劃分作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第一、從一八四八至一九一九年，除一八七〇年間一個短促的時期在這整部時期內，獨立民主黨對白恩政府握有充分的治權；第二、從一九一九年至現在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因着比例代表制的原故，任何單獨政黨，在國議會中都不能達到多數。跟着新教徒和擁護集權者在桑德本知期內戰（一八四七年）中之勝利，和在次年在他們翼庇之下順利設立的聯邦憲法，他們在當然的地位，掌給了新政府之機構。在一八四八年憲法之下所產生的第一屆國議會中，獨立民主黨員或當時所謂過激黨，竟佔有一百一十一席，而天主教保守黨員，僅佔得了七、八席。

從這七、八位議員所組成的核心，雖甚渺小，竟發展了瑞士政治上之第一個反對黨。天主教徒僅佔全國戶口百分之四十之事實，使他們永遠沒有取得多數黨的地位之希望，然而天主教保守黨，在國議會中的人數，卻逐年增加，以至在世界大戰未爆發之前，他們業已在一百八十九總席數中取得了三十四席了。它的黨員們，對於他們黨中領袖之極端的擁護與愛戴，乃是其他敵黨之政客所望塵莫及的。然而我們不應臆斷在瑞士的政治上只

有天主教徒是唯一的保守黨，在西部若干州中，曾產生了第二保守運動，其中新教徒佔絕大多數，其名稱爲自由民主黨或自由保守黨（Liberal Democratic or Liberal Conservative party）。於一九〇五年，它在國議會中已獲得了十八席。故此，在瑞士政治之第一期中，在左有一個佔大多數而具有聯合戰線的獨立民主黨；在右有一個由天主教保守黨和自由保守黨所合成的陣勢分歧之反對黨。因着他們較爲顯著的反動的傳統，前者常被入指爲『右派』，而他們決不像在德國政治上被人稱爲『中派』（center）。因此，在瑞士被稱爲中派（"das Zentrum"）者，乃是新教的自由保守黨。

在一九一九年以前，有三個較小的政黨被成立了，它們都代表左派的傾向。社會政治黨，在一八六〇年間就已經發動了，雖其全國大規模的組織，是在一九〇五年纔算成立了。它的力量，大體是集中在東部各州之勞工階級之中的；而且頗名思義，它是集中主力於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它在這上面的成績頗爲可觀。到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社會政治黨在國議會中佔了從七至十二議席，但在比例代表制下，該黨已逐漸式微，到現在只保住了三個議席。一八三六年所成立的古特里協會（Guth Association）乃爲該國成立最早的政黨組織。大部分是由工人和較低的中等階級（lower middle-class）的分子所組成，它以『由教育達自由』（"Durch Bildung zur Freiheit"）爲座右銘，它的興趣，起初是集中於借教育以提高自己之身分的，但逐漸變成很左傾了。於一九〇一年借着所謂梭羅色恩婚禮（Solothurn wedding，Solothurner Hochzeit）之契約，在政治上同社會民主黨聯合一致了，但在這個契約下，雙方都不是完全滿意的，所以於一九一六年，該項契約乃被解除了。

經過此次離婚之後，古特里協會之頹勢，如江河之日下，而最後乃於一九二五年結束了它的生命。第三、終竟最爲成功的左傾運動，乃是社會民主黨。它的生存，名義上是由於一八七〇年社會黨黨員大會（a general socialist congress）所產生，但直到一八八八年，它纔在全國的政治上有了第一個地位。它在議會中的第一個議席，是在兩年以後方贏得的，從此逐漸發展，雖因在選舉之多數制（majority system of election）之下，它遭受了特殊重大的障礙。在世界大戰爆發時，它在國議會已有十七個議席了，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前，它又另外贏得兩席了。

在更生期中（一八三〇至四八年）所奮鬥的主要政治目的——一八四八年之聯邦憲法，爲這些目的之更進一步的發展，已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基礎——在獨立民主黨之全盛的長期中，終被順利地達成和固結了。針對殘存於十九世紀中的各種古代的特權，在全國建立了政治的、法律的和大部分社會的平等，後者，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因未包括經濟的平等，所以有極大的缺憾。同時它給了人民以比較世界任何國家所有的、更爲廣大的民主政治之權力，建立了一個非常有效的公立學校制，奠定了一個有效的民團基礎，在社會立法上，也有了一個可欽佩的肇端。同時人口繁庶了、商務和實業猛進了、財富增加了，而國家享受了極大的昇平之樂。何怪獨立民主黨，對於他們的建樹，洋洋自得呢？他們對於天主教固執的反對，毫不放在意中（在他們的眼中，該項反對，已於一八七四年被解決了），他們確實覺得瑞士是他們所手創的一個小烏托邦（a little utopia of their own making）；瑞士人是被高舉的人民，脫離了流行於歐洲其他國族之弊端和罪惡和它們的大都市中所充溢的貧窮的民衆；瑞士人民是天之驕子，享受着上蒼所寶子的自由、平等、和平、繁榮和幸福的農村環境，所以他們應當永遠同聲讚

美上蒼而感謝獨立民主黨之恩澤。

這種復興的樂園之政治的憧憬 (this political vision of Paradise Regained) 是從何時起漸歸模糊的，雖不易確定，但它所以漸歸模糊之理由，倒不難追溯。關於後者，該國的富力之增進，於十九世紀之最後二十五年中，有突飛猛進之勢，但它的分配，並未依照瑞士人民在政治生活上所極端重視的平等原則。一個從事於國際的和國內的產業之資產階級——因為前項事業的關係，發展了一個超國家的展望，同一個單純的牧羊的民族之特性迥異了 (quite unlike that characteristic of ein Volk von Hirten)。在政治上達到了一種新興的顯赫，甚至連聯邦會議委員的榮顯，都不能同它相提並論了。同時瑞士的較為貧窮的公民，對政治的民主主義也失掉了信仰，並不以為它是社會的一切問題之總解決。他們雖享受了許多古老的結實的利益，以及社會的立法所賦予他們較新的利益，他們仍舊開始將他們在政治的民主主義上的信仰，轉移到社會的民主主義上面去了。

在前世紀之八、九十年間的許多不同的事蹟和日期，被指為瑞士政治轉變之分水線。關於稅則各要案——一八八四、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和一九〇二年——最後兩案是被復決所反抗，但是被大多數民衆的投票所通過——是非常有意義的。其結果使自由貿易的瑞士一變而成了關稅壁壘高築的瑞士 (free-trade Switzerland became high-protective Switzerland)。受其實惠者，大多為工業階級，而農業階級也分得餘潤。或者比較更有意義乃掃盪全國的公有運動 (tremendous swup of the public-ownership movement)，其結果使自來水、煤氣和街車等工程被各邑所收買 (communes purchased water works, gas works, and street railways)；各州

發展了電力廠；而聯邦政府於一八九八年起，也將全國的各鐵道收買了。後面的一步，確實是瑞士歷史上一個破天荒的經濟的實驗，是被大多數天主教保守黨和自由保守黨所反對的，一半是因爲產業的理由，一半也因爲他們恐懼中央政府的權力，此必然會有極大的擴展。獨立民主黨，忘記了他們向來所主張的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theories）也極力贊成鐵道之收買；而社會黨，除了某項保留外，當然也採取了相同的態度，因爲他們在國有化的運動中，發見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從此他們可以將一向爲資本主義所統治的區域化爲其所征服的領土（“to win out of capitalism as conquered territory, a domain which up to the present has remained subject to its sway”）。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在這兩者之中，社會黨對以後的發展，尤爲躊躇滿志，因爲他們會從聯邦鐵道雇員中，招收了一大批生力軍。爲着同樣的理由，獨立民主黨對於收歸國有的運動，頗覺懊悔，或他們最低的願望，爲在收買之後，政府應當將各線租讓予私人經營的公司。然而不論如何，或甚至假定各路繼續爲私人所有而爲私人所經營，鐵路工人似乎大致也會整批地加入社會黨，正如整批的州的和市的企業中之雇員所已採之行動。

從旁觀的立場——在瑞士人看來毫不足奇——獨立民主黨統治該國如此之久而未腐化，實在可算是一件驚人的事實。被一個單獨的政黨統治七十年之久，而能弊絕風清毫無半點劣跡，誠然是一個世界的紀錄。敵黨加它以種種罪名，但顯然從未以貪贖之罪加於它的。然而在該期之最後幾年中，各種表記，昭示獨立民主黨已經不是外強中乾了。它顯證要抓住如此多的民衆，而不致心力交瘁，實在是日見其困難了。該黨在政治上久已裂爲右

翼、左翼與中峯了；而當其經濟的問題白熱化的時候，它不得不時常企圖用種種退讓和妥協，以平服其雜色的隊伍。一方面爲農民，另一方面爲城市工人，包括私人工業之工人和公家各種事業上所雇的工人 (Beamten)，——其人數日日劇增——所呈現之問題，乃是最糟的問題。對後者所施之任何優待，將使前者忿忿不平，因爲要加重他們已經够重的負擔；然而倘使不予以優待吧，那末，投効於社會黨的麾下之勞工，將更加潮湧了。向農人所施的任何優待，又要使工人忿忿不平了，因爲這樣會提高了生活程度，然不予以優待吧，農業又將拿政治的報復來威嚇。愈往後來，這種敵對就愈見途窮。見了世界大戰期中之經濟的竭絕，愈使他們火上加油了，加速了過激的思潮之蔓延，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之威脅的決裂，乃爲其表證。

將各方面的情形加以考慮之後，似乎對於國議會之選舉，倘使即或沒有採取比例代表制，獨立民主黨也大致會馬上就分裂的，而其統治的地位終不能保。兩次他們曾用其勢力剋制了這種改良選舉法的運動（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四日；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但潮水業已發動，不僅擁護該項改良之本質，如它已被許多州邑採納所顯示，而且也是想用它爲工具，來推翻在聯邦政治上久握霸權之政黨。當其這個法案以對憲法之創制增補案的形式第三次向民衆提出時，獨立民主黨，曾再毅然作最後的掙扎。所有的少數黨，以幸災樂禍的心理，贊助了該案之成立——其中有一個較小的政黨，後來的遭際使它深悔此舉太爲孟浪。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民衆贊成比例代表制之決議（也就是要推翻獨立民主黨的意思），鑄成了鐵一般的事實——贊成者有二九九、五五〇選民和十九個半州；反對者有一四九、〇三五選民和兩個半州。



自修正案被通過以來，關於國議會曾舉行過四次普選，其結果如第四表所載，該表附載一九一七年之選舉統計，以便比較：

第四表 各黨在國議會中所佔議席之分配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八年五次普選之結果

黨	別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八年
獨立民主黨		一〇三	五八	五八	五九	五八
天主教保守黨		四〇	四一	四四	四二	四六
農民黨		—	三一	三五	三一	三一
社會民主黨		一九	四一	四三	四九	五〇
其他各黨		二七	一八	一八	一七	一三
合計		一八九	一八九	一九八	一九八	一九八

如第四表所示，在比例代表制下，大吃其虧者，乃獨立民主黨，它在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中，驟然失掉了四十五席。在國議會中，它仍然保持着最大的單獨集團之一事實，乃是它唯一的慰安。各較小的少數黨——自由保守黨、社會政治黨、古特里協會等——都因此遭受了相當的損失，在變法後第一次的選舉中，它們的總席數從二十七降至十八了。其後它的勢力繼續降落，到現在他們內中有一個已經死去了，其他也都有奄奄待斃之勢，合計它們的議席，已經不到一九一七年的一半了。所以關於比例代表制，會產了無限制的分解 (Zersplitterung) 和小政黨之興起，將如雨後春筍之預言，都被事實所否定了。唯一蒙利之新黨乃農民黨，它抓住了新選舉制所給它的機會，

於一九一九年加入了全國的普選，而獲得了可驚的成功，其後並能保持原有的成功。其次為社會黨，關於第一屆比例代表制，選舉它有最多的理由自相慶幸；而且其後它曾有了長足的進展，目前在瑞士的政黨中，竟升為第二位了。天主教保守黨，除保了原有的地盤外，略有進展；它的地位，雖已從第二下降為第三了，然而因為政府的布洛克必須要抓住它的票，所以它的權力有很大的發揮。

就一般情形而言，在一九一九年所劃分的政治的疆界，經過其後三次普選，都未有多大變動。在新分配之下，瑞士有四個多數黨：第一，獨立民主黨；第二，社會民主黨；第三，天主教保守黨；和第四，農民黨。它們在國議會中所支配之總席數，佔全席數九三·四百分比。最後，我們可從上表所得的結論是：比例代表制之與瑞士，已經結了不可解之緣了。獨立民主黨員，因曾於一九一九年受了此制巨大的打擊，他們當然是不會喜歡它的了，但是他們現在既成了少數，他們即或想把它推翻，也莫可奈何；而且民衆們，於一九一八年，關於此問題曾表示了最大的決心，以至今沒有人敢輕意動彈它了。兼之，受此新制之實惠的各黨，握有國議會之大多數議席，所以它們絕對不肯讓人家把它推翻的，雖然，倘使它們中間一個——譬如說社會黨——要在政治的力量上佔其餘各黨之先着，其結果或將使它改變方針。因為該黨雖暫時可以獲得比例代表制之很大的幫助，但其最後的勝利，也可被該制大大地延遲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從前握統治權的獨立民主黨之領袖們，對於命運也不輕意反抗了；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也確實承認該項改革包含着重大的正義，但同時他們也感傷權力之渙散，和在一個單獨的偉大的政黨之下，政府的絕跡，歎惜在他們執掌霸權之下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的夢影。然而現在瑞士各黨各派的人士，都深信

比例代表制，在運用上是很公允而平等的，所以必須予以維護，這種信仰，比政黨之利害的計較，更為深切顯著。在舊制之下選舉，幾乎時常是使多數的黨如虎附翼而使少數的黨被它犧牲了；在新制之下，各黨可按其人數之多寡，平分政治的祿位。比例代表制，強使民主主義不致掛羊頭賣狗肉，因此使後者比先前更值得瑞士人民之信仰與愛護。

使一黨永久佔據要津之多數的政治（majority politics），在瑞士的政治舞臺上，已經無限期地消聲匿跡了。承其乏者，為各種敵對的布洛克，其成分跟着問題的性質而轉移，其凝聚的要素，通常是由於在國議會中有剋制頑強的社會黨的集團之必要所產生的。為要達成該項目的，天主教保守黨和農民黨議員，必須同獨立民主黨的議員取一致的行動；必不得已時，只要天主教保守黨和獨立民主黨所成之布洛克也就夠了——這個事實，誘致先前獨享霸權的黨同它的老對頭——天主教保守黨——媾和的傾向日漸增強了。一九二〇年夏，他們在這個方向內，已經走了第一步，當時聯邦會議宣布它已准許教皇恢復派駐白恩之使節。天主教徒視此為他們久被剝奪的權利之應得的平反；新教徒深恐此舉將為教會方面的政治活動的膨脹之先兆，其結果恐將不免重燃宗教的仇恨之烈焰。因此在瑞士，竟有不少的先知，預言憲法上驅除景教徒的條文（第五十一條）之刪除，為在這個方向內之第二步。

天主教保守黨和農民，均比較獨立民主黨更為右傾之事實，使它們為抵制社會主義者所締結的約略持久的三角聯盟，又受了一種保證。然而在特殊的問題上，這種聯合戰線，又現裂痕了。譬如說，自從農民很有效地協助

歷平一九一八年之總罷工以來，通常在農民和社會主義者之間，是有着極深的仇恨的，但該兩黨在一八二六年之糧食專賣之建議案上，又曾合作過，雖是他們的合作誠如德爾教授 (Professor Dürr) 之評語：惟其有這一次例外，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深仇宿怨是不能有例外的 (the one exception which proves the rule of their fundamental antagonism)。農業俱樂部 (Landwirtschaftlicher Klub) 之存在於白恩，乃是各黨間之橫面的聯絡之又一例證，該俱樂部之會員為聯邦兩院之一百多名議員，不特包括農民黨之代表，也包括特與農區表同情的其他各黨之代表。該俱樂部並無預選會 (census) 之意味，因為對於某案之贊成與否，它並不予其會員以拘束；但遇必要時，它可隨時召集會議，討論關於農業之問題；而我們敢說這些會議之結果，使農民的政策獲得立法之更深刻的贊助了。任何時如欲提高中央政府之權力，即可略做下開單方如法炮製（此為政黨的結合之另一顯例）：第一、將所要求者減至最低限度，僅包括絕對不可少者，剔除任何奢望；第二、將該提案中所包括的行政權和財政，收入盡量讓予各州執管；第三、竭力利用天主教與新教集團間之現有的仇怨，使瑞士西部擁護地方分權之新教徒同其政治的朋友、宗教的仇敵，天主教保守黨，沒有攜手之可能。譬如說，同一憲法增補案，在一八七二年失敗了，而在一八七四年又被通過了，其關鍵就在於此種戰略之曾被應用否。倘使不遵上法炮製，特別關於宗教的仇怨之部分，可使天主教徒和羅曼斯語系的新教徒 (Romance Protestants) 結成聯合戰線，其結果政府必歸失敗，例如一八八二年關於公立學校，須受聯邦政府之監督的提案，經複決否決之事件。

各黨派的議員們相互幫忙投票之陋習 (log-rolling)，各國的立法機關在所難免，而瑞士人於此幾為門外

漢，大多因為複決的原因。各黨聚於白恩的可尊敬的紳士們，爲求達成某項共同目的起見，誠然可互換幫忙投票之諾言，但他們不能將選區之票預許予人；因此，在這方面的努力，不特在於運用手腕以求提案得以通過議會，並且也在於一個更大的難關之打破，即得人民之贊助——瑞士人稱此過程爲複決政治之審慎（*Referendums-politische Rücksichten*）。除上面所舉之例外，在國議會中，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其一般的陣容，是反社會黨黨的。然而要說從此將有兩黨對峙的制度應運而生，又不免太冒失了。在比例代表制之下，農民和天主教徒，爲他們各自利益着想，都覺頗有希望；並且於必要時，他們可拉攏獨立民主黨，以推翻過激的法案，就如他們在一九二二年關於徵收資金融稅的創制之所爲。

聯邦立法的過程，比較從前紆緩了，互讓爲其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且經濟的利益，業已開始，比較從前更清楚地佔據了政治舞臺之中心，這都是獨立民主黨的式微之另一結果——這些當然都是一九一九年以來所盛行的布洛克制之副產物。在比例代表制下發展成了勢力的兩個新黨，都被人指責是代表階級的利益，而不是以全體人民的福利爲大前提的。除政黨外，雇主和職工之嚴密的組織，各聘有精明的幹事，以便任何同他們有關的聯邦事件，在白恩提出議會付討論時，可以爲着他們的權利奮鬥。老年的瑞士人，對於這種事情，深致不滿，他們憧憬着從前的聯邦政黨歷史，而浩歎政治的鬪爭已遠離正軌了——因爲從前所爭者，多爲純粹政治的問題，例如中央權力和各州權力之爭，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獨立和新舊宗派的教條之爭。年老的政治家所嫉視的政治動機和政黨之分歧化（*Verwirrtheit*），在瑞士如在他國一樣業已發動了。然因在目前互讓已成慣

例而覺失望，亦殊文不對題；一八四八和一八七四年之憲法，誠然爲互讓的藝術之最好的顯證。策之，經濟史學家已經證明在一八四八年以後四十年中所謂純粹政治問題的後面，是隱藏着物質的利益之生動的營求的。而且我們有理由可以說：將這些勢力加以組織而展列於臺面之上，有如其現狀，強過讓它們在暗中作祕密的活動，有如其故態，彼時各式各樣的人，都隸屬於同一政黨之下，都隨聲附和地喊着冠冕堂皇的口號，而在他們當中的較爲自私而強有力者，乃在暗中運用手腕，利用立法和行政，以爲其狹小的階級的利益之敲門磚。

就連那些最重視經濟動機在瑞士的政治上之勃興的人們，也必得承認它種動機並未失掉了它們原有的地位。故此他們根據前項理由解釋許多不同的分子，所以脫離獨立民主黨之理由的時候，而同時他們就不得不承認留下的大多數黨員，是爲着政治的理由了——倘使，誠然我們竟能分辨政治的和經濟的理由。並且顯然一個資格較老的黨，即天主教保守黨，在比例代表制實施之後，並沒有什麼變動，而其主要的聯繫，既非政治又非經濟，歸根究底乃是宗教。或者因爲瑞士人對於這種事情已司空見慣，毫不以爲有甚麼稀奇，在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似乎並不覺得他們對於自治和民主主義之擁護，即他們的最強烈的忠貞心理，同經濟利益之衝突，是怎樣的重大。倘使各州的憲法及其疆界被廢除了；倘使他們的三種語言當中的一種語言，或者說世界語，作爲了該國唯一的語言，倘使地方的風俗和傳統盡被掃除了；倘使——將不可思議的事情，堆在不可能的事情的上面——他們將民主主義捐棄了而設立了一個強幹的墨索里尼式獨裁者；那末，當然，他們會有更高的效力和繁榮，至少在於一時。當然他們也會失掉了他們的特性。這其間既然包括着這種非常深沈的國民性，所以爲一般人所引爲遺憾

的政黨的分歧顯然畢竟並非是他們的政治之基本的事項。

### 瑞士的政黨之組織

關於瑞士的政黨之生存，在上文雖假定爲普遍於全國的，但該假定是應該大打折扣的。該國的憲法的機構上之分權的傾向，大部分反映於其政黨的機構上之分權的傾向了。誠然，從一八四八年到現在之大部分的時間，嚴格地說，從來沒有過任何普遍全國的政黨組織。同這種組織最相近似者，乃是聯邦議會中由各被選出的議員所構成之派別；誠然，這些派別仍然是分類和統計之最好的根據。

在我們所討論的這個時期之始（一八四八年），在瑞士僅有州的政黨之組織，他們都各隨其與會爲其黨題名，不問其名稱和其集團之成分或宗旨是否相稱。每個州的組織，各自揭示其原則和政策，各自提出候選人，籌劃其所需的少數經費，舉行競選運動，並且在一般情形之下，是各自分道揚鑣的，除非在緊急的時期，它是絕不過問存在於他處之黨的。

就在這種鬆懈的狀態之下，獨立民主黨治理了瑞士幾近半個世紀，直到一八九四年，該黨的領袖們，纔在該項名稱之下成立了一個全國的組織。然而直至今日該黨在國議會中之部分，仍被人稱爲『過激的民主黨』（the Radikal-Demokratische Fraktion），此即其原來的名稱。這個從前曾爲一世之雄的政黨之最好的對頭，天主教保守黨，曾三次（一八七四年、一八八〇年、一八八六年）企圖達成全國的組織，而三次都未成功，其失敗

之根本原因，在於主張各州獨立者之情操過於強烈。直至一九一二年，他們方纔在『瑞士保守人民黨』(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名稱之下成立了一個永久的組織。讀者應注意這新選的名稱中並不包括『天主教』這個字，然而該黨在聯邦議會，於一九一二年以後，仍舊被人稱爲『天主教保守黨』(Katholische-Konservative Fraktion)。在日常通用的語文中，在後面公式中之頭上兩字，差不多是專用以指該黨而言的。在一八七〇年、一八八〇年和一八八八年，曾累次企圖要成立一個全國的社會主義者的組織，但直至一九〇一年，它同古特里協會在梭羅色恩聯合後，它纔有了相當的成功。農民黨甚至在今天雖曾經參加四次國議會的選舉（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八年），每次都曾有過相當的成績，但仍沒有一種全國的組織。用專門術語說，它是在白恩、沮利克、阿兒各(Aargau)、色各(Thurgau)、斯卡夫好生(Schaffhausen)、白賽爾市區(Basel-Stadt)、物德(Vaud)和提省諾之各州的黨之一堆集體(a confederation)。它在聯邦的議會中有相當的勢力，其名稱爲『農民工人與市民黨』(Bauern-, Gewerbe-, und Burger-Fraktion)。並且屬於該項運動的各州的黨在農會(Bauernverband)中有堅固的根基，在其中他們的一般的活動是有很好的聯絡的。我們的篇幅不容許我們討論瑞士小政黨的組織；總括一句話，它們的分權的傾向，比之於上述四大黨，只有過而無不及。

甚至在瑞士各較大的政黨，都已成了全國的組織之後，各州的黨派，仍繼續存在，而其重要亦僅略爲減退。它們在瑞士政治過程上之重要，超過美國各州的政黨及其中央委員會之在美國政治上之重要。關於這個情形，可以事實爲證，即除與社會黨的運動有關者不計外，各州的政黨，至今仍保存着其原來的名稱。這些名稱當中，有許



多既刺耳難聽又無大理由，其結果使全部宛如一團亂麻，即瑞士政治的宿將，也覺難於索解。統計學家僅能借表列的陳述，以清理其頭緒。例如焦萬羅利在其對於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八年國議會選舉報告之可欽佩的提示上，必須以數頁的篇幅來理此錯綜的題材，最後表列各州中，附屬於過激民主黨和天主教保守黨之各集團，前者有二十五，後者有二十二單位。

這些在政治名詞上之微細的區別，就全部而言，使人不勝煩厭，然而在它們中間，也有幾點珍聞足以引人入勝。例如在呂賽爾州 (Canton of Luzern) 有一個自由黨，而在白賽爾市區也有一個名稱完全相同的黨，但前者是屬於獨立民主黨的，而後者乃屬於瑞士之自由保守黨。在日內瓦州有一個獨立黨，在沮利克州有一個基督徒社會黨，在梭羅色恩州有一個人民黨。而三者都屬於瑞士保守人民黨（即天主教保守黨）。但最為希奇的一件事，乃出之於沮利克州，其中有兩個不同的政黨在地方上彼此常相仇視，然而二者都是効忠於全國的瑞士獨立民主黨的，這兩黨就是自由解放黨和民主黨 (Freisinnige Partii and the Demokratische Partii)。為有條不紊和省去頭痛起見，我們只能希望瑞士各黨，都能效法社會黨的榜樣，創造一種統一的名稱，將他們的立法的部分，全國的組織和州的組織，都包括在同一題標之下。

免得對於名稱上這些瑣細的區別過事鋪張了，我們應該側重的事實，為瑞士各大黨之全國的組織與活動不再被語言和州界所限制了。譬如說，天主教保守黨之大本營，是在中部德語系諸州中，但其它法語系的佛銳堡和發賴夫 (French-speaking Freiburg and Valais) 也有很多信徒。直至最近，凡農民黨的組織存在的州中之

人民都是說德語而信仰新教的，但在一九二五年國議會選舉上，說意大利語的提省諾和說法語的物德都加入該黨了。獨立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其黨員在全國之分布都很周到。

瑞士各政黨在其機構和管理上，是頗為一致的。各黨都有代表大會或黨議會 (delegate assembly or party congress) 每年至少召集開會一次，是為各黨之最高權力。黨議會選舉中央指導部 (zentralvorstand)，如以獨立民主黨為例，它是由三十餘人所組成的，而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一種諮議機關。另一個人數較少的執行委員會 (geschäftsleitende ausschuss) 執掌日常事務，在獨立民主黨中，包含中央指導部之主席一人，幹事一人，會計一人以及至少其他四位委員。此外可有其他委員會，就中具有特殊興趣者，為關於各項經濟問題之某種常設委員會 (certain permanent committees on various economic issues)，包含區委員會委員 (Vertrauensmänner)，後者代表全國各項重要職業，例如農業、商業、機製工業和手工業、文官、薪水階級和勞動階級。最後，有為瑞士每種規模宏大的組織，不論是政治的或其他的，所不可缺少的機關，即常設的專業的幹事及其辦公場所和書記若干人。以獨立民主黨為例，黨幹事乃是執行委員會、中央指導部以及代表大會中之當然的會員或委員。

全國的黨議會，因在這機構上是一個基本的機關，所以頗值得我們略為詳加敘述。依照自由民主黨的組織大綱 (Statuten der Freisinnig-demokratischen Partei)，它包含各州的政黨所舉之代表，各州對於國議會，每舉一議員，就有權遣派代表七人出席黨議會。凡無黨員被選為國議會之議員的州黨可遣派七人以下之代表出席，而且凡直接隸屬於全國組織的某項地方團體，亦有權各派一代表。此外，下列諸人對於出席代表大會，具有

當然的資格：中央指導部的委員、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該黨在聯邦議會中的部分之指揮委員會的委員（member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party fraction in the chambers），以及由該黨的報業協會所產生的代表。其他各黨，例如天主教保守黨和社會黨，都在它們的代表大會中，容許新聞記者以正式黨員的資格出席會議。

瑞士的黨議會，雖是一個代表大會，但同美國的政治集會，是迥然有別的，因為它並不推舉聯邦政府之候選人。在瑞士就全體人民而言，沒有選舉的職務，是他們直接行使的，所以這個重要的職能，就落在地方組織之手中了，這個事實，把後者的相對的重要大加增廣了。在另一方面，全國黨議會之尊嚴，也爲此事實所增進了：即他們不必同個人的野心相角逐，因此可以全部時間從容討論在國會中或在人民中間，尙待解決的關於政策的重要問題、或創制和複決的立法事件。其結果使在黨議會中，由聯邦官吏、立法議員、大學教授、專家和全國各處的政治領袖所參加的辯論，具着一種非常重大的意義，足以影響立法和行政上將來的發展，因此在報章上，有着詳細的披露。將這從各方面所發出的辯論，用速記術記錄下來而發刊爲黨務報告，是黨務工作人員以及一般留心政治者之所歡迎。

在瑞士，凡普及全國的政黨之組織，既係由早先各州的政黨所蛻化，何怪兩者在結構上頗相類似。在各州的政黨中，常有一個掌握至高權力之會議，一個指導部（a Vorstand）、一個幹事部（a secretariat）、一個執行委員會以及其他依照各州的情形所必須有的委員會等，就中一個宣傳委員會，幾乎各黨都有。在較大的各州中，這一

套政黨的機關，在其各種行政的部門中，是完全被抄襲了。例如在白恩，一個屬於社會黨的選民，不特應當投票選舉出席其本黨之全國代表大會，和州的代表大會之代表，並且必須選舉出席邑黨部年會（*Verkenning*）之代表，後者之議決案，是被一個行政指導部（*Amtsvorstand*）就地實施的。在縣黨部的組織之下，在每一市鄉自治區（*commune*），或一較大的城市之每一選區（*ward*）有一個區黨部（*militædsælften*）。區黨部為各該區之全體黨員所組成，每年開正式會議一次，處理比較重要的事宜，每月開會一次以為討論、演講和審查該黨之教育的工作之用。一個指導部，至少由五人（主席、副主席、幹事、會計及一兩位委員）所組成，是由區黨部年會所選舉。

瑞士的各黨都重視區委員會委員（*Vertrauensmänner*）之訓練、品格及其甄拔，因為他是組成區黨部各種委員會之要素。後者當然可比照美國的區委員會（*precinct committees*），即美國政治機構之單位細胞。我們可以大膽說：瑞士區黨部的工作人員，在實際的政治藝術上同美國區黨部工作人員相比較，是很落後的，因為即或在城市的選區中，他們也全然不懂得納賄、威嚇、假冒、賄選、投票、偽報票數等舞弊的玄虛。在另一方面，瑞士的區分部工作人員，必須熟悉黨的主義、政策、方略；並且，他必須善於向他鄰里中的公民，宣傳這些使他們折服而樂於在選舉之日投票贊成其政黨。近來瑞士社會黨的組織之主席，居然為這些黨務工作人員們，寫了一篇約二萬餘字的謹嚴的學術論文，詳細探討他們的活動所應根據的心理原則，這也可算是一樁驚人的舉動哩！

### 瑞士政黨之成分

一八四八年的憲法成立後四、五十年中，瑞士的各主要政黨，是由一切社會階級和各職業集團所組成。其選舉運動之樞紐，大率都是關於政治的問題，有一小部分是關於宗教的問題，經濟的仇視雖非完全沒有，但從未佔其前茅。最近三十年中，其興趣之中心乃有了顯著的轉移，以致瑞士人民將經濟的因素，在決定政黨的動機上之逐漸膨脹的勢力，爲其注意之焦點了。同時在各大組織之成分上，發生了新的分配，其分野雖非完全一致，但關於各社會階級和各職業集團，在各現存的政黨間之分配，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予以指明。

其中有兩個政黨，即社會黨和農民黨，常被人指責過於重視階級利益而輕藐了全民或全國集體的利益，這是和較老的政黨之信仰頗爲不同的。至於前者雖未獲所有工人之贊助，但是以公然擁護工人的利益爲其職志的。兼之，勞動階級可分爲許多派別，這是馬克斯主義者諱莫如深的事實。瑞士的社會黨大率是由在城市中從事於工商業的羣衆，和地方及中央政府機關及其所經營的事業之低級工作人員與勞工，自然包括聯邦鐵道所雇用的工人羣衆之所組成的。在該黨的後面，同它有着極密切的關聯的，乃爲極多強有力的工會以及政府機關服務人員之聯合會。

在一種意義上，上文所說的各職業集團中所有的分子，都可算是屬於勞動階級，但顯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屬於勞心者（white-collar workers），他們同現存的政治機構是頗爲休戚相關的，他們雖可玩弄共產革命的觀念，但在實際上，這種觀念乃是他們所最恐怖的。受定額薪水的社會黨黨員常爲其黨中之過激的同志所詬病，以爲他們具有小布爾喬的展望。然而連在極其經濟的瑞士國裏面，工黨和黨部也難爲無米之炊。政治的雇員們

和公共事業的雇員們所受薪給之低微雖足以使他們挺而走險而加入共產革命的隊伍，但他們的職位頗爲穩固，而得以按期繳納黨費和工會的會費；然而服役於私人經營事業之工人，乃頗有五日京兆之想，在經濟恐慌時期，自無繳納該項費用之能力。據說這種考慮，將政府雇員在社會黨的會議中所施展的保守的勢力，大加伸張了——當然這是經濟的宿命論（economic determinism）之另一實例了。

然而，這並不是說在瑞士被私家雇用的勞工都是激烈的革命黨。在反面，一大部分是技巧的工人——即該國所謂質量的工人（“quality workers”）——顯明瞭他們的工資標準同大陸的歐洲的量表相比較是算得高昂，並且也很能體諒雇用他們的產業，在國際的競爭上所必須剋制的困難。依照聯邦統計局最近所發表的報告，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二八年之間，在瑞士有技能的工人之實在的工資，增加了二十五到二十七百分比，無技能的工人之工資，增加了二十五百分比。該項數字並未消滅爭論：正統的經濟學家，以爲它們否定了馬克斯增加困苦之學說；而過激派乃以爲它們顯證了社會主義者和工會的方略之成效。

我們暫將主要的政黨撇在一邊，略說關於共產黨的事，他們於一九二〇年，從社會黨分出獨立，但從那時起就一直日就衰微了。民衆對於他們的擁護，大率限於東部四個工業的州中無技能的工人，尤其是被雇於較重的金工之工人。倘使在瑞士有任何普羅的要素，它暫時至少就是共產黨，但正統的經濟學家，根本就否認這種要素之存在。雖從他們的營壘中所發出的激烈的宣言，公然主張直接的行動，並斥責社會黨太沒出息和太反動，但我們懷疑在最近全國的選舉中所揭示者，究竟是否足以代表一種過激的革命的酵母。不論如何，據說莫斯科曾於

一九二九年，要求該黨將原有的首領撤職而完全從新改選，因後者曾太遷就了社會黨而忽略了謀反的方略（*Parteilistische Taktik*）。或者，由於無意的幽默，在上文的公告發出之後不幾天，瑞士各報遂登載了白賽爾的一位最有名的共產黨政客，被選為州立銀行的董事之新聞！

瑞士的農民黨也被人指責是代表一個單獨的階級利益的，在事實上它雖差不多完全是由於從事於農業者所組成，但為廣招徠起見，它乃自命為『農民、工匠和公民之黨』（*Peasants, Artisans, and Citizens' Party*）。然而近來它業已開始吸引一羣獨立的工匠，就是以東瑞士的農民為主顧的工匠。不論如何，並非所有的農民都是屬於農民黨的，因為天主教保守黨，對於他們自己的教友中之從事於農業者之利益，曾作了極其有效的照護，所以始終保持住了他們的信仰；兼之，瑞士西部的獨立民主黨，也曾保持住其大部分的農民分子，該處的工業化尚遜於瑞士之東部。

正如工人中間各自分為派別，農人中間也有同樣的派別。瑞士的農人慣常被分為大農、中農和小農（*Großbauern, Mittelbauern, and Kleinbauern*）。大農佔全體百分之三，每戶所據之耕地在三十公頃之上（約七十五英畝），按照農村的標準頗為富有，常居本地的商業和實業企業之董事的地位。中農佔全體百分之三十七，每戶所有耕地從五到三十公頃，其餘百分之六十的農民即為小農。大農當然較僅握有五公頃以下之耕地之小農為保守。在較小的農民階級的下面，甚至有一小部分的農人，偶或有贊助社會黨的政策之傾向。後者是由有很少的耕地之農民所組成，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常兼充鄰近的工廠工人，或在鄉村的鐵路車站上，充當不關重要的職

務以便於無車到站時從事於其稼穡。

在辯證術上，當然，不難顯明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同整個社會的利益相符合的。倘使所指的階級人數之衆多並同全國人民生活關係之密切，尤其是在戰爭的時期，是同瑞士的農民相等的，該項辯論就可以說是很有理由了。羅爾教授(Prof. Ernst Laur)，瑞士農會的幹事，在他最近所發表的，題爲『根據一個較高的生活概念之瑞士農民政策』(“Swiss Peasants’ Policies in the Light of a Higher Conception of Life.”)小冊子中所持的理論，就正是這樣的。其中頗富於一種單純的信仰，即『田野乃上帝所創造，而城市乃人手所建設』；雖然它所根據以爲出發點的假設乃是『爲全國人民的福利計，首要的條件，爲農業和農民階級之維護和興盛』。這個小冊子對於以瑞士農民的政治活動係僅以其自身物質的繁榮爲職志之誹謗迎頭痛擊。任何高尚的政黨，必須不僅追求經濟的利益，並且要以增進全體人民的精神和道德的福利爲目的。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死後的生命方爲不朽；而農民因爲接近在大自然中所啓示的上天的工作之緣故，所以比較城市產業的工人，對於這個真理有了更深的覺悟。同土地發生了極深的聯誼，同植物和動物朝夕共處，農民對於他終歲勤動胼手胝足的勞苦操作，並不以爲是重負或苦痛；他無暇想到罷工、排貨、怠工、工會籤條（即黏貼貨物上表示係入工會之工人或工廠出品之籤條），最低限度的工資以及其他類乎這樣的現代五花八門的玩意兒(he has no time for strikes, boycotts, sabotage, union labels, minimum wages, and other such modern contraptions)。爲着這些緣故農民之政治目的是根本宗教的；他們絕對不能接受唯物史觀或社會黨反宗教的態度。既然今世的生命僅爲



修行以求來世得進入天堂，所以人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業不在經濟，而在借着學校和教育、借着職業和一切其他生活關係上之克己服禮、借着法律和正義、借着家庭社會和國家之清白的情形，以求道德和精神的品格之發展。物質的條件也是不可輕忽的；雖對於非常的人物，貧與賤毫無損於其人格之偉大，然而就林林總總的普通人而言，貧窮不特不能誇掖其向道之誠，而反足以使其挺而走險以致陷身囹圄之中（“poverty fills more penitentiaries than monasteries.”）所以經濟的繁榮之重要，僅亞於靈性的繁榮。故此宗教的人生觀，乃是農民運動之歸宿，該種人生觀之偉大，足以包容各種宗教信仰；它保障「個人宗教自由的權利，維持各宗派間相互容讓的義務，相互敬重與親愛的心理，但絕端仇視一切將肉身及其物質的生存放於靈魂之前者」。

我們於此無須詳述羅爾博士關於軍事和國際關係之言論，並且關於他對農民黨之經濟的目標之標舉，亦無贅言之必要。我們僅須聲明，姑無論他對於精神的因子是如何推重，倘使任何人懷疑這位農會幹事（*Verbandsrat of the Bauernverband*）不配談生產、物價、稅率、工資、租金、專利、商約和社會保險等問題，他終會慚愧太小觀羅氏了。顯然該小冊子之旨趣，在攻擊農民的眼中疔（*Wohlfahrt*），社會主義，它使人將後者看作瑞士國中唯一為階級利益鬭爭的卑鄙運動。無神的、唯物的、知視的、並且暴戾的。我們又可看出著者的用意是在一個寬大、地容忍的基礎上，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將一切信奉基督教的農民聯合起來，不問是佔他的組織之最大多數的新教徒，或尚未就範的天主教徒。在他的論辯中對於自然的法則（倘使你高興說上帝的意旨），在田野和在工廠有一樣的作用之事實雖被抹煞了，但關於其措詞之圓滑實無疑問。

如上文所說，獨立民主黨，原來是由每個社會階級和職業集團的分子所組成。於一九一九年之前後，雖有農民的羣衆脫離了它而向右傾，工人的羣衆脫離了它而向左傾，但它仍舊代表着一個廣大的利益。大羣的農夫和工匠，繼續予以贊助，尤其是西部的瑞士以及對天主教之敵視超駕經濟動機之各州。作爲其黨員之堅實的和最強的核心者，乃爲信奉自由主義的工商各業之一般的代表。獨立民主黨之左翼，乃是一個雜色的隊伍，吸引他們加入該黨者，爲該黨在社會保險和國家社會主義上之成績，以及該黨對政治服務人員和一般消費的民衆之生活條件的改善之努力。所以雖於一九一九年失掉了統治的地位，許多選民根據該黨已往的歷史，和它現在的效率仍然投的是獨立民主黨的票。——這種同樣的動機，裨益了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兩者同瑞士的獨立民主黨頗爲相似。

天主教保守黨，始終是每個社會階級和經濟狀況之政黨。他們在某幾個內地的州中操縱絕大多數選民，在各該州中，其他各黨僅有從瑞士的新教各區而來的極少數的『所謂外僑』（“Foreigners”）之贊助。天主教的勢力中心區域，雖無很高的都市化或工業化，然而在天主教保守黨中仍有若干派別。德爾教授將他們分爲三大集團：（1）右派的教士；（2）中間的保守派，其中包括許多農民和小商賈；以及（3）組成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s）的左派勞工階級。雖有農民黨之崛起，天主教保守黨仍然抓牢了他們的農業的黨徒。在另一方面他們有時也惶慮他們的勞工的黨，暫時或永久從基督徒社會聯盟轉入過激的工會，而於是加入了社會黨。

現在關於兩個較老而已衰敗的自由民主黨和社會政治黨之成分，應略為提及。直至一九〇五年前者在國會議會中，尚佔十八席；而現在僅餘六席了。自由民主黨，有時亦稱自由保守黨，因着它的黨員們之富有、智力和社會的地位，使它所佔的勢力，時常超過它的人數所應有的勢力。然而近年以來，該黨黨員頗多轉入獨立民主黨之右翼和農民黨者。現在餘下的黨員，大多是新教徒中從事製造業而有古老血統關係者，在紐卡德爾（Nenchal）、物德和日內瓦各州之政治上仍有龐大的勢力。在布爾喬營壘之極左翼——古特里派嘗隸屬其麾下——有曾在東瑞士享大權的社會政治黨。現在它於一九二八年在國議會中，僅有三個議席是古乃熱斯（Gunnar）、苦羅笨敦（Franken）和紐卡德爾所選出者。

### 瑞士政黨之政策

在一種意義上，獨立民主黨之全盛乃為其不幸。從各方面說，該黨可算將其原則著入瑞士憲法了，將它的政策列入法律了，而對於它們的實施，有了充分的保障。根本上，獨立民主黨之大綱，是以自由為依歸的——思想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言論自由和教育自由。該黨敲去從貴族的已往所遺傳下來的腳鐐手鐐，很早就創造就了一種自由的氛圍。這是在大陸的歐洲踏破鐵鞋無尋處的，即或在他國亦有同樣的盛況，也只有英、美兩國差堪比擬罷了。在消極方面，該黨始終是反教士的和反守舊的（anti-clerical and anti-reactionary）；但這些傾向，現在已非它所獨有，因為社會黨也依稀有這些傾向。在積極方面，它不特主張在基本的事件上保持現狀，並且也頗

重視進步。然而，誠如德爾教授所說，進步已變成了一個隨機應變的概念，它可有一個基督教的、一個自由的、一個社會主義的和許多他種解釋。故此獨立民主黨，現在所給人的印象，是它已退守其防線了；誠然他們再拿不出來一種清晰的鬪爭的綱領，像這樣有力的綱領，已僅爲其歷史之盛事了。

同樣，天主教保守黨，也覺壯志消沈，而缺乏進取的精神了。桑德本被陷之後，他們就只求保持他們的教會，他們的學校，他們的醫院和其他慈善機關——總之，竭力保持他們特有的文化。蔭庇於他們所操縱的六個州之疆界以內，在一八四八年，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他們現在也居然約略達成了這些目標。邦議會中之平等代表原則，抄襲於美國之參議院，使他們，借重西瑞士擁護地方分權者，戰勝了許多敵對的立法的攻擊。他們幾乎可以致謝他們的敵手，獨立民主黨，因爲後者，曾致力於聯邦的創制和復決之通過，既然這些直接民治的工具，時常不曾給了他們另一道盾牌，用以抵禦反教士派的攻擊。最後，如上文所說，比例代表制，曾將該黨放於一個比前更強的相對的地位了。

在瑞士兩個資格很老的政黨之間，由於一八七四年桑德本之役，以一八七〇年左右的文化鬪爭（Kulturkampf）所積累下來的仇怨，大都被一種親善的政策所掃除了，沈蒲（Joseph Zemp）於一八九一年被舉爲聯邦行政委員會委員，爲天主教保守黨參加該會之第一人，卽爲上述政策之具體的表現。現在聯邦執行委員會之七位委員中，有兩人是隸屬於天主教保守黨的，卽馬塔（Giuseppe Motta）和墨西（Jean-Marie Musy），前者的任期自一九一一年起，後者自一九一九年。兩人均曾任聯邦總統，馬塔曾於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二〇年兩任該職，

墨西哥於一九二五年任該職。歷來並無一人因其最高行政元首是一位天主教徒，而有該國即將滅亡（“go to the dogs”）之怨聲。現代瑞士的政治家同馬塔，比沒有人曾在國內外享受過更高的盛譽，在他所受的他種榮譽之中，他曾任國際聯盟第五屆大會主席。

獨立民主黨和天主教保守黨間的現代的態度和關係，雖已趨和緩，但在農民黨和社會黨之間，流行着一種戰鬪的精神，是絕無疑義的。根本上，在後兩者間之仇恨，乃為城市與鄉村間古老的衝突之在現代形態之下的復元，這種鬪爭，在瑞士史上已屬司空見慣，使人每會聯想起法文一句深於世故的諺語，『越變，越是千篇一律了』（*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瑞士農運領袖比較其他政治領袖，對於社會黨，更易發出輕蔑的言論，指責後者，僅以超過激的思想為幌子（*merely playing with ultra-radical ideas*），其實在的目的，乃在為都市工人求較高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更多的例假和更多的社會保險罷了。然而倘使社會黨要企圖革命，農民已立志加入聯邦的軍隊，再以武力解決他們，重新施予一九一八年所曾施予他們的教訓。這將引起更激的社會主義者回答說，農民因那次救了布爾喬有功，所以他們馬上就成立了一個黨，好為他們的服務索取酬報。

德爾教授將這兩黨間更基本的仇恨總括如下：

『社會主義的工人，擁護集體的情操，農人擁護經濟的個人主義；在社會主義方面，懷着對於資本和私產之仇視，在農民方面，懷着強盛的個人獲取的慾望以及對私產之珍視；甲方重視經濟統制，乙方重視經濟自由……，在社會主義者中間，關於經濟事件傾向獨裁的態度，在農民中間，信仰經濟過程之自然有機的概念』。

上文一切都可歸納爲正反的對比：社會革命對社會保守；國際主義對國家主義。對於尙待解決的問題農民趨向於關稅壁壘政策，而社會黨乃趨向於自由貿易，特別是爲一般民衆所消費的一切貨品；關於工作時間之長度以及一般工作的條件之規章，社會黨贊成由國家制定，甚至由國際制定，而農民以爲政府最好不干預這種事件，使經濟的活動適合時代的需要；社會黨擁護大規模的社會保險制，而無須受惠者出錢，農民雖亦贊成實行此制，但附有條件，即受惠者必須出錢；社會黨要求社會立法，特別是關於勞工階級的利益，農民爲求一切階級的利益。

從上文看起來，該兩黨間宗旨之紛歧，既是這樣舉不勝舉，他們似乎沒有任何親善之可能了。然而，正如農工黨（*Finnish Labour Party*）之在美國，成了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在瑞士，也有一批專尚理論的政治家，想發明一種計劃，使農工可以聯和爲一黨，至少也要在國會中，成爲一個布洛克，使其在相當的時間內，可以統治全國。其中有一種計劃，是出於社會黨的手筆，在其大綱上規劃煤、礦、糧食和其他必需的基本貨品，由政府機關收買後，轉售與人民，於是可以統治國內市場物價，使全國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致於吃虧；同時將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的貨品能售得統一的市價，於是可排除中間人和其非法的利益。經過這種過程，可以使都市的消費者，以較廉的價格，購得所需要的物品，而使農業的生產者，能得到比現在更高的價格。然而顯然該項計劃，並未計及農民之牢不可破的個人主義；他的吝嗇的私產的本能，使他對於土地國有的意思，視若蛇蝎。或者爲着這些原因，必須要有二三十年用於教育工作的一個長時期，纔能將該兩黨聯合爲一體的計劃實現出來。

正如農民領袖所作諷刺評語，誠然，瑞士社會黨宣傳員所公然宣布爲其黨綱的階級鬭爭和革命，倘使他們

用這兩個名詞時，有影射暴動的意思，究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話罷了。大多數有名的社會黨員，在對友好密談之間，都願意承認這句話是不錯的，但在大庭廣衆之間，他們又會改變語氣了。倘若還有人懷疑這句話之真實性，他就只須考查下一九一八年瑞士全國總罷工之結果，在過激者的立場，這是不幸的事件，從那時候起，勞工的條件有了很大的進步。一九二二年，徵收資本稅創制案之失敗，更可證明社會黨雖用和平的手段，對於任何大規模的改革，也只得敬謝不敏了。在這個提案之下，僅有百分之六的公民，有繳納該項賦稅之資格——實在是可向任何選民提出的一種強有力的誘惑——然而民衆反對它的票數，爲七三六、九五二與一〇九、七〇二之比，後項數字，比同年在國議會的選舉上，社會黨的票數降落了六萬。

倘使全世界有任何憲法對於強暴的革命毫無姑息的餘地，必然它就是瑞士的憲法，因爲它具有民主的基礎，比例的代表制，以及創制與複決所供給的和平的修改之便利。誠然，在瑞士古代歷史上，武力曾經發生過很好的效力，並且也不僅一次，但那是在民治的制度尙未產生之前。正如一位現代作家所說叛變的時代（*Ära der Putsche*），是以一八四八年爲其結穴的。兼之，社會黨的成分，特別是在它的黨員中，有着極多的小官吏和公共事業的雇員，如上文所說，足以顯證暴動是不成問題的。

瑞士社會黨負責的領袖，很少圖謀以和平以外的方法來促進他們的主張，這也是人所盡知的事實。在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曾在州和市鄉自治區的行政的職務上，受過長期的訓練，於是了解了官吏職權之限制。前數年在瑞士有一幅流傳遐邇的諷刺卡通畫，將各著名的赤色領袖之姓名，按照各人狂熱的程度，依次排列於從冰點至

沸點之各劃度上，其中除了一個人以外，大家都在沸點之下。那末，在他們中間一般較為穩健的分子，既然確實沒有殺人流血的狂念，並且明知總罷工是會失敗的，爲甚麼又願意充其首腦呢？有一個可能的答案，就是他們之所以如此者，爲要妨阻狂妄的分子，使其不能取得領導權。他們爲甚麼不步不列顛工黨之後塵，將階級鬭爭和革命的口號撤銷，以免使極多怯懦的布爾喬不寒而慄呢？於此也有一個可能的答案，即它們之所以得被保存住，正爲後面這個原因，把它們作爲嚇人的假面具，使資本主義者顧而卻步，於是遂易於從他們勒取讓步；並且，或者也爲要使他們的黨徒們，工人（die Arbeitnehmer），深信他們滿想一旦有了機會，將他們的敵對，顧主（die Arbeitgeber），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然而瑞士中等階級的公民，雖有極端的警惕，但這幕喜劇，也使人略感煩膩了；誠然，『嚇退布爾喬』（「Epater le bourgeois」）是一句可能的格言，但久而久之，紙糊的老虎是會被人拆穿的，到那時就會產生嚇『不倒的布爾喬』（「un bourgeois inépuable」）了。保守的瑞士企業家，現正開始覺察社會黨領袖們掌握了更大的權力和責任時，他們的態度就略爲和緩了；因此他們很有理由相信現在大肆咆哮的共產黨倘使也發展了相當的勢力，在他們方面也會發生同樣的改變了。尤其重要的一點，乃爲瑞士的僱主們業已開始研究利益均沾（profit-sharing）和產業的民主主義了（industrial democracy）。倘使經濟的條件，容許這種觀念有充分的發展，觀察它對一個在政治界透頂浸潤於民治原則的瑞士國民之影響，乃是一樁最有興味的事了。

甚至現在，關於勞工的問題，瑞士一切社會階級的領袖們所採取的純粹人道的看法，常使人大大爲激賞。例如關於失業問題，常聽人說，該國簡直不能容許它存在。在大戰閉幕的一個時期中，有極多瑞士工人找不着工做，但



因着一切有關係的方面之殫精竭慮的結果，在最近幾年中，失業的問題，已確實如煙消雲散了。我們的篇幅不容許我們討論他們所用以消滅失業的方法或指明什麼集團——譬如說，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或者具有更直接的影響的，在一方面有雇用工人的階級，在另一方面有被雇用的工人和他們的工會與政黨組織——對於這個成績應居首功。瑞士學術界的人物及其領袖人物，完全接受一種信仰，即失業是不能容忍的，一旦發生了失業的問題，國家和社會，必須用全力於最短期間將它掃除，這乃是最令人心折的一點，拿這一點來同美國社會對其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漠不關心的情形相對照，就不啻有天淵之別了。這種性質的人道的情操和合作的努力，必然會使瑞士一般下層的公民，深信他們「個人為團體，團體為個人」的國訓，並非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比例代表制，雖曾使國議會中之陣容，發生了透澈的改換，但直到如今，它對於聯邦執行委員會之成分，尚無影響。依照憲法的成例，那個由七人所組成的執行機關，應得反映各大黨出席議會的代表人數，倘使其中有人屬於式微之黨而無去職之意，其他各黨不得有落井下石的舉措，硬要將他排擠出去，聯邦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一九年，是由五位獨立民主黨的黨員和兩位天主教保守黨的黨員所組成。直到現在，仍舊是如此的，雖然就社會黨現在在國會中的勢力而論，他們即或要求分兩席於該民國之最高執行部，也不為過。在一九二五年，他們並未提出該項要求之原故，有人說是因為在他們的領袖中，有人反對同「不名譽的資本主義者」共掌聯邦行政。想到社會黨黨員出席七八州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s of state of some seven or eight cantons）之事實，其黨中的領袖，在一九二五年所採取的態度，似乎頗不邏輯，除非他們以為接受了該項責任以後，他們就必須

放棄蠻悍的批評的態度，而關於此點，他們頗不願爲。就一般論，兩個資格較老的黨，對於現狀也頗不滿意，生怕社會黨加入聯邦執行委員會之後，波折將更多了，因在現在情形之下，要想通過一個行政的提案，已經很够麻煩了。雖然在獨立民主黨中，某部分有勢力的黨員，十分樂意將他們超過定額的五席減少，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倘使他們仍舊保持該五席，一旦出了亂子，他們就必須代人受過，因爲照國議會的現成的成分而言，他們的黨對於亂子之發生，是無法阻止的。

關於瑞士政治之前途，有各種不祥的預言。有人預言，社會黨將發展爲在議會中佔多數的黨和一種龐大的威脅，結果將驅迫一切中等階級分子，逃避於天主教保守黨，卽代表宗教和政治的權威和正統之黨——其後在該兩大黨之間，大概將發生最後絕大的鬪爭(armageddon)，按照想入非非者之信口狂言 according to pipe-dreamer's predilection) 必有一黨將獲最後的勝利。另有一批預言者，危懼農業將如土崩瓦解，農民將羣徙入都市，食物之價增高而工資反低降——從不同的分裂中，將發生另一種大爆炸。想到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八十九年中，瑞士曾享受比較平穩和十分和平的發展，在這幾十年中，它雖曾有過極大規模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改革，使我們頗覺這些假先知未免過分杞憂了 (these cassandras borrow a great deal of unnecessary trouble)。自然，爲這小亞爾卑共和國 (Little Alpine republic) 傳揚一種安定的進化之將來者，必定相信全歐洲可享長治久安之局。再來一次宗教革命或法國革命，倘使任何類乎這種震驚全世界的大禍將要臨到——或者是共產主義，倘使它有漫延的希望的話——瑞士就難免不爲池魚。但是我們應該記取瑞士雖爲一小國——或者一半確實

因爲它是一個蕞爾小國，它曾避免了兩次普遍的血浴（two general bloodbaths）；三十年之戰和世界大戰。有各種理由，可以使我們相信瑞士人，倘使不受外力的干涉，對於所遭遇的一切問題，都能尋出和平的解決。現在尚存於其國中的最熱烈的政治的敵對，在於農民和社會黨之間，但兩者都沒有相互仇殺的意思，而他們的仇對的利益之和解，雖不容易，但至少也不是不可思議的。除了這一個容易發生爭執的區域之外，在瑞士各政黨領袖們中間，處處俱有極寬大的相互的諒解和善意。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對於不論是什麼性質的政治上已成的事實，全體民衆都很樂意予以順應。例如由桑德本內戰所產生的直接的結果，戰敗各州之居民，曾以最高的速率和最少的埋怨，予以承受。誠然，幸虧聯邦的居弗（Dufour）大將之人道的方略，在該役中，並未流很多的血。另有一件事實，即得勝的新政治家們，是以一種透底親善的精神，推進各種改組之過程的。然而一八四七年軍事領袖之人道主義，和一八四八年政治領袖之寬大精神，均是真正的瑞士特性，其自身是值得尊敬的，並且是戰事之和平的後果之直接的淵源。同樣的情形，爲一八七〇年左右之文化鬪爭的結果，以及各種重要的複決案，當時不論是經過怎樣奮力掙扎，而對於失敗的分子，不論是怎樣難堪，時常都是以忠公謀國的精神所接受的。

有一種致政治分裂的通病，在瑞士幾乎是無隙可乘，因個人的野心及其連帶的極深的仇怨，在該國的政治是人所不齒的。這個好現象，大部分由屬於無論那一黨的選民，都討厭虛張聲勢的候選人。特別是自一九一九年所風行的布洛克制以及從它所產生的互讓精神，對於喜歡斬釘截鐵的決定和確定的責任者，雖爲呪逐（anathema），然而其利，足以強迫各黨領袖精密合作，並且從此可以發生一種更深的相互諒解。在探行議會制或總統

制的政府之其他各國中政治的爭執，通常易採取一種決鬪的精神，照例結果於兩三位全國的大領袖彼此間之角逐。瑞士從未發生過這種事件。一位候選人，被選擔任某項職務以後，只要他樂意繼續服務，有一個傳統，要將他保留住。總統、省長、市長和其他獨頭的行政者，實際上是没有的；到處都有行政委員會，它的每位委會，不問在他自己的黨中是怎樣傑出的人物，一律必須以他自己的見解來順應他的四位或六位同事。在黨中任何突如其來的變遷，是很希有的事；就全國而論，於兩代以上的時間中，曾經發生的唯一的該種事件，乃是一九一九年之選舉，當時因着比例代表制之施行，促進了一種調整的過程，否則會遷延至一、二十年之久。甚至一個黨在地方上被人推翻的時候，也沒有人高呼『驅逐流氓』之口號。總之，關於瑞士的政治，有一種穩重，或至少有一種雍容不迫的品質，這種精神，雖使他們失掉了某種遊戲的原素，但它確然使他們排除了任何過分的個人間之仇怨。

對於瑞士政黨生活之溫良 (amenity)，貪污之絕跡，比較分職制之絕跡，為其尤為重要的原因。關於統治階級獨攬權威和利益所會發生的嫌怨，亞里士多德，早已提出警告。在瑞士官職對於擔任的人員，僅賦予適可而止的權力，所給與的薪俸，就更加有限了，而額外的收入，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間或我們可以聽見某公務人員犯了挪用少數公款之罪，然而受賄的事情，幾乎從來就沒聽見過。我們說瑞士的政治家是誠實，也許會令人驚訝 (mirabile dictu)；而且他們都彼此明瞭。大家是誠實的。在大庭廣眾之間或在極秘密的私人交談之間，在指明敵手之過失的時候，貪污是從來就沒有被人稱述的。對於從一個沒有弊絕風清之國家而來的觀察者，瑞士公務人員之透頂的誠實，顯然是他們從彼此之間和從一般民衆中，所受的不虛偽敬重之最大的因素。這種敬重，並未根絕競

爭和敵對，特別是當其一位政黨領袖，有獨攬大權的危險的時候。然而大致可以說，從後面的事件中所產生的仇視，大半反映民衆對於專權的人物之普遍的反對，在上文，我們已經說過，這是瑞士人的特性中之最爲特出者。

最後，在同瑞士政治領袖們談話中，我們覺察他們對於敵黨之抱負，有非常的容忍。他們一律接受客勤的兩句常被引用的詩所包含的原則（the principle implied by Gottfried Keller's oft-quoted lines）：

Acht Jeden Genger, wer er sei——

Stranddiebe bilden Keine Partei.

意即一個政黨之成立，其自身就是誠意之證據。一位完全維護現制者，對於社會黨鏟除貧窮之要求之純正，也會絕不猶豫地表示佩服。一位新教的官吏，可瀝陳天主教的黨員們對待他的種種刁難，但在結語上，他也會佩服他們在宗教上的誠意和他們的學校教員們所有的優良道德影響。關於他可以將屬於他本黨的一位無用的公務員毫無顧忌地革去其職務，而不像一位布爾喬的官員要如此做的時候，定會被人反控（accusation）之事實，一位社會黨的官員，可以大放其詞，但對於某項工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理所遭遇的困難，他又會顯示可驚的內觀。自然，這種相忍爲國的精神，不是時常有的；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它確實僅有很小的發展；在世界大戰首尾不安定的時期中，它曾受過嚴重壓迫。雖然，除卻嚴重的關頭，它是瑞士政黨生活的一種顯耀的和令人歡欣鼓舞的特徵。最後——在本研究的立場上，可說最重要的一點——瑞士政治之誠實與溫良，對於該國人民之公民的品性，具有一種深沈的教育影響，乃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 第四章 瑞士政黨之教育的和遊戲的活動

下章關於學校制度的討論，將昭示吾人，瑞士人民對於生活之接近，比較他國人民，顯然有更大教育的意味。事實上，該項特性在學校裏面，比在其他公民訓練的機構中，較不積極，在後者，可以發見火一般的熱誠，並非慘無血色的思想 (*lurid enthusiasm rather than the pale east of thought*)，例如在軍隊中和在特殊愛國會社中。他處的經驗，會顯示政黨之結合，也頗依賴情感的考慮和遊戲的本能。當然，瑞士的政黨，並不缺乏這些凝結的要素，但此外他們曾發展了有最大普遍性的教育的組織。實在，從他們的立場，教育所有的廣汎的意義，無異柏拉圖的時代，包括體育和音樂，並以古希臘的和現代的意義解釋後面一個名詞。瑞士的社會黨，在這方面雖有了最大的進步，因此在本章將受特殊的考慮，但並非他黨對於他們後代的教育，就是漠不關心的。在成績的數量上，除卻社會黨就要算天主教保守黨了，該黨運用足智多謀的手腕，而以宗教的熱忱爲其臂助，參進了教育和體育界，在最近幾十年中，當有顯著的建白。自由的政黨，關於建立在他們自己的管理之下的文化和遊戲的組織，雖尚在猶疑不決之中，但他們顯然從中立會社的活動 (*activities of "neutral" associations*)，例如隨處皆是打靶會和運動聯合會，得了很多益處。並且，他們間或也互相聯絡合辦教育事業，例如瑞士公民科協會 (*Association of Swiss Citizenship Courses*)。

想到瑞士社會黨領袖們肩頭上所負的關於組織和鼓吹例行工作之重擔，我們頗覺難於了解他們怎樣能抽出似乎是無限量的時間，來從事於青年運動和將來的黨員之教育。前者之肇端，早在一八九〇年左右，但那時在呂賽爾、白恩和白賽爾為青年工人所設之俱樂部，大多不久即行停歇。直到本世紀之初，該運動纔顯示了多量活力。於一九〇〇年，普夫陸傑牧師（Pastor Pfister）在沮利克一個『以教育和友誼為宗旨的青年職工同志社』（“Association of Like-minded Young Workers with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and Friendship”），該社之名稱，雖甚冗長，但贏得了同志並傳播於其他城市了。於一九一〇年，它已經有了十四個分會和四百二十名社員，而在世界大戰之前一年，社員人數已增至七百六十三人了。

青年社會主義者人數大增之後，遂加入了國際青年團（Jugendorganisation），並曾派遣代表出席它的第一屆會議，於一九〇六年在司徒嘉德（Stuttgart）召集者，和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所召集的第二屆會議。然而在他們同政黨和瑞士工會的關係上，他們決然是議論反出的（obstreperous）。因着在一九一三年所被接受的一組綱領，這三個組織成立了一種協定，依照該協定青年團，必須接受黨的預定計劃和黨與工會的決議案，他們所受的利益，為其他兩者之款項的津貼和道德的贊助。並且，黨和工會的會議，討論有關於青年團的問題時，該團得派代表列席各該會議，陳述意見以資參考。

在世界大戰期間，青年團的團員人數突增至二千二百名。在以它的利益為大前提之教育事業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由於未被預先料到經濟的困難，工會聯合會，無力付給所應許的津貼。戰事行將結束時，大家都看出

青年社會主義者左傾的非常厲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亂事中，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參加了街上的暴動；而在次年總罷工的時期中，據說他們的標語是：『繳兵丁的械』。社會黨和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最後分裂時，幾乎一切青年運動的分子都盡其所有的投入了後者的懷抱，在共產黨青年團（Kommunistische Jugendorganisation）的名義下重新受了洗禮。所以自從那時起，社會黨必須肩起重建一種組織之責任，以便培植其下一代的黨員和領袖。

近來瑞士社會黨的青年組織，每年在山明水秀的小鎮或鄉區，召集其會員舉行一種短期的集會（Jugendtagung）。一九二七年所選之集會地點為冷日堡（Lenzbourg），敦勸青年參加會議的一封信，是借着青運之機關報『自由青年』（“Freie Jugend”）和工會各報廣播於全體勞動階級青年的，其文如左：

青年男工人，

青年女工人，

同志們：

你們已經幸運地修完學校課程了；在你們面前陳列着全部壽命以及無數問題和疑慮。在學校中你們會被訓練來作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你們能夠讀書和寫作和幹許多其他有益的事情。

今天你或者是一個學徒，或在工廠內或在公事房裏，又或者你是一個青年的農人，一個女裁縫或女店員；自從你踏進社會以後，你的世界觀現在是完全兩樣了。聽着，我們也是青年男子和女子同你們是沒有分別的。



——時代也已經把他們的鐵爪抓牢了我們；同你們一樣，我們也感覺缺乏；在我們面前也豎起了無數的問題——生活的問題——而我們明白金錢、職業、良好的教育等等，並不足以包括青年男子或女子在生活上一切的需要。爲着這些緣故，因爲我們願意明白這一切的事情，而同時從時代的不可言傳的缺乏感覺苦痛，我們已經走攏來，以便彼此交談，尋求互助的道路。

是的，青年朋友，我們知道有引向前進的道路；要除去貧窮、憂患、罪惡和我們現在最感痛苦的惡劣住宅環境，仍然是有可能性的。有一種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之堅實的團結，一種互助的運動。那就是社會主義，那就是勞工運動，工會運動——簡言之，社會主義的運動——我們就是這運動的一分子。

我們的朋友和青年同志，大家從瑞士所有的山谷於九月三、四兩天齊集冷石堡開一個青年的會議（Diet of Youth），我們歡迎你參加我們的會議。我們願意同你討論一切事情，同你一道我們要唱我們的歌，跳我們的古老的民間的跳舞。我們願意你也能明瞭我們的運動；青春是一個黃金的時代，但必須用於一種偉大的工作。社會主義是一個優美的鵠的，但它必須經過奮鬥纔能實現，而我們的青年的會議，將爲促進這新世界的——一種努力。

我們召集你來冷石堡同我們會面。來吧，即或你不認識我們，並且尚不明白什麼是社會主義。爲此你特別應當來，否則你就不能覺察在許多青年男女的心坎中深藏着一種信仰，對於光明的將來的一種希望之事實。像這樣能使青年感動的請牋可稱傑作了。冷石堡青年短期集會之程序是很短的——遊戲和以音樂的朗

誦、唱歌和跳舞，而當然不可少的爲以『我們爲何擁護社會主義』爲題目的演講，跟着並有自由發問和公開討論。到會會員之食宿等最爲儉樸，許多代表是以牀架爲牀的，而在露天烹調他們自己的食物。甚至從一位敵黨的觀察者的筆下，冷石堡之集會，也攝取了如左之好評：

『我看見過這些天真活潑的青年們，以紅旗爲導，整隊遊行於那小鎮之街道中；我看見過他們遊戲，而我所得的印象，使我深信吸引他們於一處者，並非是那一面旗，也不是種種遊戲，實在只因着要和他們的同伴們探討關於政治和生活的問題之天然衝動』。

同時社會黨在竭力整頓青年的組織，它同工會聯合會合作要發展一個擴大的教育方案。後者之宗旨，雖時常在盡量吸引青年男女，但它對於成人，甚至有了更大的成效，故此青年團之暫時的嚮訊，對於它的發展，並無妨害。甚至在大戰期間，它仍進行無阻，一九一五至一六年演講員的名單中，包含七十三個姓名，其中有八人是聯邦議會的議員。根據各演講員之職業而言，十四人是教員，五人是工會的幹事，一人是傳道士，其餘不詳。十位演講員是婦人，大多數都是政黨或勞工團體之名流。

社會黨之教育事業，原來是由在白恩設有總會所之委員會所指揮。於一九二二年它通過了一個憲法，命名爲：瑞士工人教育總會 (Schweizerische Arbeiterbildungszentrale)。其簡稱爲 S. A. B. N.。目前該執行團體是由十二位會員所組成，黨和工會各一半，大多都是專業的幹事。襄助總會以進行其事業者，爲散處全國的八十餘地方分委員會，由於各較小的地方團體所遭遇的困難，其總數已略低減。由白恩總會發出精心撰著的小冊

子，指示各地方團體的會員們如何發起並舉行演講會、補習班和工人學校。他種小刊物也曾隨時刊行，例如格林（Grinn）之『教育和階級鬭爭』，該書業已再版。另有一種八頁以上的月報，使總會和各地分會，可以互通聲氣。從白恩所發出的指導，頗足表彰總會委員們之教育的明智，並揭露其盡力獲得結實的教育結果之決心。地方團體被鼓勵去尋覓適當的集會場所，最好借用區議會或學校為其地址。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得租用客棧，並且必須遵守不供應酒類之默契，因為『酒精和工人的教育是絕對衝突的』。甚至吸菸也在禁忌之列，因為其他聽眾和演講者之舒適的緣故——在瑞士社會黨中，這種嚴格的紀律，連美國大學研究院的學生對之，也有愧色。

比關於物質環境的暗示更為重要的，乃是關於教育的事項之指導。地方分委員會被警告在一個地方開始活動的時候，他們雖然可以利用單獨的演講和教育的影片、戲劇的表演和音樂節目，但在冬季和早春他們必須竭力設置有系統的長期演講。等到第一組演講完畢時，設若可能，馬上應當開設另一組演講；當其事業發展到相當程度時，就應襲用更為尊嚴的工人部或工人學校之名稱。

總會發表的名單所載的演講員們，在他們的演講中，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不消說是不會過分忽略的。在另一方面，他們被警告在教育的工作上應避免『粗疏的煽動者的詞令』（rough-hewn agitator's speech）。將其所開設的演講和科目之名稱檢查一遍，使我們覺得其題材之性質都頗為嚴重，即或不是枯燥無味，使凡不明瞭瑞士人對教育之熱情者，要以為他們太唱高調了。下列大綱，是從該總會最近年報所摘錄：（a）經濟和法律；

(b) 美術和文學；(c) 衛生和遊戲；(d) 教育；(e) 哲學和宗教；(f) 歷史和地理；(g) 自然科學和工藝學。

例如歸入第一類之下的各講題爲：(1) 現代資本主義；(2) 馬克斯的經濟論；(3) 社會民主黨的方略；(4) 社會民主黨的原則；(5) 社會民主的思想史；(6) 合作運動；(7) 生產和消費的工人；(8) 生產合作；(9) 合作社對於牛奶之供給；(10) 婦女在合作社中之地位；(11) 合作社和工會；(12) 工會運動史；(13) 瑞士工會運動；(14) 現代工會之學理及實施；(15) 工會之活動和策略。近年來瑞士工人教育總會鼓勵各工會獨立開辦講演科目。政府機關，商務和轉運、刺繡、印刷和造紙、和紡織等事業所雇用的勞工之組織，都已經動手獨立開辦該項教育事業。就一般言，在工會蔭庇之下所開設的科目，大多近於工藝的性質以求改進工作技藝之質量；但染有馬克斯主義的經濟政治學理，當然是不會被摒棄的。

根據一九二七——二八年的報告，在總會蔭庇之下，有五十二種科目，選修的學生爲二千二百四十三名；百四十五次單獨的演講，聽講者有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七人。同時娛樂方面，並未被忽略，因在該年度中，在地方教育委員會的蔭庇之下，曾開三十三次音樂會、四十次戲劇表演、三十一一次電影、三十次名勝遊覽和四次到外國城市作長途旅行——參加人數共計八萬四千七百八十八人。馬上應加聲明者，即該項總人數中之三分之一，是參加戲院的娛樂者之人數，這樣聲明，方不致使讀者誤以爲瑞士的普通工人，是太爲嚴肅了。因爲戲院的娛樂和長途旅行，爲教育和宣傳計，是很有效的，所以後面將對它們作詳細的討論。

參加者之總數，每易使人以爲了不起；實在，它們每每是特爲這個原故所調製的。然而把它們拿來同工會和社會黨的人數相比較，參加講演和各種科目的人數，就會見得可憐地渺小，這乃是瑞士工人教育總會，以痛心疾首的情緒所直言不諱的事實。該運動排除萬難，居然達到了這樣的成功，實在是可欽佩的。從起頭就必須應付財政的困難，有時此項困難，因着戰爭的結果和實業的恐慌，就更加尖銳化了。當然對於所開的學程，是不能徵收學費的，而有時只能收取少許保證金，但後者對於未缺課的學生，照例是要退還的。黨和工會是給予津貼的，但當然都爲數不多。瑞士的領袖們，希望做照奧地利所通行的辦法，由他們的組織之黨員或會員通過一種教育稅。總會一九二七年之總收入，尙不到二萬佛郎。各地方的委員會，有時也可從自治區和州的預算內取得少數津貼，但大部份的款項，是由黨和工會所負擔的。

一九二二年，總會曾企圖從聯邦方面獲得一萬五千佛郎的津貼，用以維持它的教育活動，但其申請，兩院均未予以通過。由局外人看來，申請政府撥款來資助一個反對黨的事業，必須要切實聲明該款絕不致用於反政府的用途，方有希望。就算它是用於教育的，但其科目和演講之馬克斯的傾向，是不可諱言的。然而在瑞士，照例一切有價值的主張——卽凡自以爲有價值的主張，亦卽一切主張——一律可申請聯邦津貼；該項申請，既然罕被拒絕，而此次竟被批駁了工人教育總會爲其教育事業之申請，令人不勝詫異。自然，社會黨對於聯邦議會否決他們的津貼時所謂經濟的理由，提出了抗議，揚言倘使農會申請更大的款項也會通過的。在工人總會之報告中，關於某某州政府資助人民大學運動（*Volkehochschule movement*），以大批款項使它能夠延聘很多著名大學教授

以維持其布爾喬的擴充教育頗爲不平。

地方教育委員會之幹事們，在報告中，所舉第二個大困難，是由於社會黨在他種活動上把它的黨員們，尤其是青年黨員們，組織的太好了。教育的活動同工人遊戲俱樂部的衝突之事實，在其報告中，常被提及。有一位地方教育幹事，顯然一籌莫展，列舉他的小自治區內所有各種俱樂部如下：工人自行車俱樂部、工人健身操俱樂部、工人音樂會、一個由男女工人所合組的樂歌隊、足球俱樂部和唱岳得歌者俱樂部（Voller Jubel）——幾乎完全由同一階級的分子所組成，工會、建築業工會和紡織業工會。前四者和唱岳得歌者，每年慨然公開表演一、兩次，以及各該組織之例會，已經佔滿了全部業餘的時間，再要找一個日子來開一次演講會，不要說開設系統的講座，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的確是一個可悲的動境！對於這種情形，美國一般組織繁冗的大學之教授們，有充分的了解和極深的同情。有時也延請其他團體來協助教育的進行。例如有幾個城中工人唱歌會，被請於演講前後唱民歌（Lied）以助興。但據說有一次在關於『酒精和勞動階級』的演說之後，在演講者對於酒精之毒害，盡情叱責之後，歌者所選之節目乃爲“Schwäbischen Friedemann”一首酒徒的狂歌使杜康自己都要張口大笑了。

在總會的報告中，對於它所供給的教育的餽饌難於消化之事實，略加承認。但累次聲述工人在長時間操勞之後，身體和心理的狀況，都使他們無法專心致志以從事於繁重的知識的活動。甚至在星期六下午，他們雖不須工作，但其疲乏的程度，仍不適於有效的攻讀。星期日上午，據說是很好演講的時間，但又有他種組織的要求和對於休息與遊戲的自然欲望，使許多人不能出席聽講；因此常須將教育的集會，排於從星期一至星期五各晚間。

考慮總會及其地方助手們所遭際的困難，難怪在他們的報告中，每有悲觀的論調。上文所引的那位小鎮的幹事，根據經驗的結果，所下的結論和瑞士中等階級的改良家所作的結論，不謀而合，即今日之青年是頹廢的；更糟的，他又深信『我們這一代只知道追求麪色、遊樂和酒精』（“for our generation bread, sports, and alcohol suffice”）。然而頗可驚異者，在聽見重視民衆運動的社會黨的權威居然說：『教育不是一個民衆的問題』<sup>1</sup>（“Education is not a mass question! The mass is not hungry for education”）。倘使他們知道這些句子對於任何種民衆，不論是資本主義的或普羅的民衆，都一樣的真切，他們也許少覺安慰。S. A. B. Z. 力勸各地方爲討論起見，將大班化爲小組的坐談會之事實，最能顯證上面所引觀點之誠懇性。不論如何，從事於該項運動演講員和教員，並不因種種困難而遂心灰意冷，是值得稱贊的；他們的勞苦絕不是徒然的，他們必然會累次贏得了相當的成功。

關於參加人數的統計，從總會的報告所得的印象，會令人懷疑對於它的旨趣，是在訓練少數領袖，而非一般民衆之再三的聲明，是爲要遮掩一件不願旁人知道的痛心的事實（these may be something of a defense pattern in the oft-repeated statement of its purpose to train not the masses but a select few）。然而，總會的確曾責成地方的委員會，注意維致有爲的男女青年，以便培成黨的領袖和黨務工作人員（Vertrauensmänner）。儘先將他們位置於地方教育委員會中，而使他們有爲黨服務的機會。訓練能幹的黨務工作人員之宗旨，雖貫徹於 S. A. B. Z. 一切活動之中，而在一九二二年夏所發起的每年開設的假期講座中，該項宗旨特別被重

視了。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它們就名正言順地稱爲工人暑期學校了。

一個適於遊戲和講學的風景佳麗的地點，是從瑞士許多風景區所選出以爲工人暑期學校之地點。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接連兩個夏季，都選定了距因脫拉根（Interlaken）僅十二分鐘的途程的在吞涅湖邊的森羅倫（Sundlaenen on Lake Thun）；一九二六年所選定的地點，爲靠近路格羅（Lugano）之特賽銳（Tosserete）明媚的村落。兩年後選定了高出海面一千七百公尺的色利普棲息所（Selibühli shelter hut, located at an elevation of 1,700 meters），但該地氣候之險惡，使人不堪回首。S. A. B. Z. 曾設法租到了一所儉樸的旅館，以爲其教員和學生之住所，每人每天食宿之費，僅七佛郎，兩星期共計不到一百佛郎。將悅目的繪畫的通告，頗像美國各學校所發出的通告，寄予各地黨部和工會，請各單位選送代表入校肄業，必要時得予少許津貼。學生無須繳納學費，除了膳宿各費，由學生自理外，唯一可觀的費用，爲鐵路車票費。爲資助一九二二年夏在沮利克所開設的第一屆假期講座起見，聯邦內政部，曾撥公帑一千佛郎，白恩和沮利克兩市，各捐二百佛郎，後者並曾借予工藝專門學校的講堂爲其演講和分組討論之用（opening the halls of the Polytechnikum for lectures and seminar meetings）。一九二八年 S. A. B. Z. 於呂賽爾專爲黨務人員和工會職員另設了一種暑期講習會（Funktionärkurs），到會聽講的學員有三十二人，這是一種新的教育建設。

在第二屆森羅倫暑期學校中所開設的講座如下：（1）『資本主義的經濟之基本形態』，其六講，講師爲格林（Robert Grimm）；（2）『高等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同行公議、託辣斯、企業聯合會、資本之縱橫的集



中，同行公議和託辣斯對於瑞士經濟和瑞士工運之影響』（High Capitalistic Economic Forms——Cartels, Trust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Effect of Cartels and Trusts upon Swiss Economy and the Swiss Labor Movement），共計三講，講師爲芮林德（Ernst Reinhard）（3）『政治的勞工運動之工作』（The Work of the Political Labor Movement），共計三講，講師爲赫格勒爾（August Hügler）（4）『工會運動之工作』，共計六講，講師爲德爾（Karl Dürr）、格林、芮林德和赫格勒爾爲當時國會議員，格氏爲著名瑞士社會黨機關報“Berner Tagwacht”之總主筆；其他兩人（即芮林德、格林）爲該黨中央黨部之主席和幹事。第四位講師德爾，是爲人所公認的關於瑞士工會運動之權威作家。

社會黨的暑校學生，清晨六點鐘起身作健身操，由學生自由參加；六點半鐘早膳；七點鐘演講開始至九點鐘完畢；以後學生可自由遊戲，除午膳時間外（except for the miltagesen）直到下午五點鐘；五點至七點分組會議；七點晚膳。每個學生在學期中，必須爲小組會議至少預備一個口頭報告或論文一篇，以爲開會時討論的根據。晚膳後學生又可自由遊戲，但他們照例應用晚間閱讀，利用臨時布置的參考閱覽室；又或於晚間召集同志開非正式的討論會。主其事者，竭力使講師同學生之間發生密切的關係，在這一點上，瑞士人摹倣了不列顛勞工大（British Labour Colleges）之傳統，據說其中『倘使有三十位學生和一位教員，就有了三十一位教員和三十一位學生了（“if there are thirty students and one teacher there are thirty-one teachers and thirty-one students”）』兼之，工人暑期學校之宗旨在使其學員返家後，能設繼續作獨立的研究。最關緊要者，它所用的

方法同美國大學的榮譽課程非常相似。

社會黨的暑期學校，是頗值得詳加描寫的，因為就政黨的制度而論，它是一種新奇的設施，就各種情形而言，它也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從暑期學校歸來的學生，在黨和工會方面努力的成績，業已充分滿足了 S. A. B. Z. 之希望。或者瑞士人對於任何以教育的形態所表出的事件，易於受其感動；雖然如此，但其他黨的領袖們，在私人談話中對於社會黨在森羅命和特賽銳之收穫，也不得不表示欽佩的意思。其所施的教育之高等的質量，是為其講師們之學問和經驗所保證的。但即或除去該項事業之純粹教育的方面不說，它使青年黨員，得親聆黨中碩望之訓誨，尤其是得在研究室中，同他們親密接談，這般青年們所受的感動，確實不小了。

S. A. B. Z. 同鄰國的類似的組織常互通消息，尤其是德國、奧地利和比利時，並常邀請外國的領袖們到瑞士各城作巡迴的講演。一九二二年夏在布魯塞爾 (Brussels) 召集的國際工人教育會議中，白恩中央組織所遣派的代表，對於一個交換學生的決議案力予贊助，後來為實行該項決議案起見，曾資助十一名瑞士失業的工人，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城之勞工學校肄業 (to attend the academy of Labor at Frankfurt a. M.)。該會又曾通過一個議案，贊成主辦長期旅行，使黨員和工會會員們得以熟悉他國的情況，尤其是關於他們的教育運動。一年以後，S. A. B. Z. 開始試辦國外旅行，遣派四十代表巡行德國各城考查。這次實驗，居然獲得了完全的成功。因此為次年暑期所組織的兩個旅行團，參加者竟有九百八十八人之多。這些觀光者，曾蒙各方面慇懃招待，不僅是德國黨同志和工會會員，就連其官吏包括駐白恩的德國大使館，對於護照及種種籌備事宜，也給了他們很多

便利。十一天旅行川資，包括各種徵費，鐵路車票、旅館費用和酒資 (trinkgelder) —— 在這衰頹的時代中，甚至社會黨也似乎不吝付酒資 —— 僅一四九·一五佛郎。柏林、漢堡和法蘭克福爲其駐足之地，旅行者除參觀各地一般名勝外，特別注意各城的勞工本部、工廠、學校、合作社和人民戲院。這個計劃，後來的成功是很可觀的；在它裏面 S. A. B. Z. 終竟發見了一種同講座迥然而能吸引一般工人的教育。同時其他各國也已主辦了類似的旅行，而歐洲各處對於擠滿鐵路客車的旅行工人，在外國各城中慇懃接識同志之氣象，馬上數見不鮮了。

在我們所已經提到 S. A. B. Z. 的事業中，沒有比它的戲劇表演更孚衆望的。一切階級的瑞士人，都有演戲的天趣，所以社會黨領袖們，發見在極多城鎮中發展工人舞臺 (Arbeiterbühnen) 頗易爲力。教育總會擬編訂一個優良戲劇之詳細目錄，就現有豐富業餘人才而言，只須少數經費，就很容易演出的，在該目錄尚未完竣以前，它暫選定下列瑞士各劇本，以便各地採用：Revolution des Herzens by Felix Moeschlin, Sturmzeit by Paul Lang, and Thomas Münzer by Alfred Traber。它又推薦了許多較知的劇本和獨幕劇，內中有幾個是用方言寫的，爲規模不大的俱樂部 and 工會之用。外國作家也未被忽略，S. A. B. Z. 推薦了 (Tork's Nachspiel and Hauptmann's Weher。

工人舞臺在最近幾年中間的發展，給了瑞士社會黨戲劇作家很大的鼓勵。他們的許多作品，是有時間性的，例如關於一九二八年總罷工之企圖；其中也有因爲是用方言寫的，所以僅有狹隘的應用，惟其如此，故在地方上發揮了更大的效力。所以 Alfred Traber's Die Schoegel Tämpel mit Bolizywachtmister 必定會

享受沮利克社會黨觀衆之熱烈歡迎的，因爲它拿當地警廳爲對象之爽利的幽默，將後者素來款負勞工，而巴結富戶，用娼妓爲眼線，羨慕墨索里尼的專制獨裁以及種種擅作威福的事情（賄賂除外）之丑劇，形容得痛快淋漓了。

從這樣粗疏直率但有效的諷刺，到崔其勒的『高升』（*U. Treichler's Der Aufstieg*）其間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後者是一個三部曲的劇本，以悲慘漸次加強的格調，形容普羅民衆之命運；第一、模糊地意識着它的意志，但又缺乏能力，朝着它的領袖所指示的正途前進；第二、很想活動，但被統治的中等階級所制服了，一半因爲對於應當採取的手段，大家不能同意；第三、最後勝利了，用暴力推翻了社會的現制。統觀全劇，簡短單純，情緒豐盛而情節緊湊，雖帶着暴動的傾向，仍不失爲一部技巧已臻上乘的劇本。

在戲劇的立場，大多數社會黨戲劇作家之作風，都犯了一個顯著的毛病，就是從工人粗率的外表描繪出一個天然貴冑的品格，在另一方面，以狡猾的吮人膏血的蜘蛛形容資本主義者。爲要在工人舞臺上達成宣傳者之目標，它們的單方面的黨派色彩濃厚的性質，必然使它們發生了更大的影響。向布爾喬亞同情的觀衆，向它們呼倒彩。例如德國社會黨戲劇家托勒（*Ernst Toller*）所寫的劇本“*Maschinen*”和“*Hinkemann*”，在中等階級所光顧的白恩的戲院出演時，全場大嘩，而市政當局因容許亂黨借舞臺以宣傳其主義，受了嚴厲的批評。在S. A. B. Z.領導之下，工人的地方團體，常於晚間以吟誦和音樂節目爲娛樂。爲前者和其他節目之用，有許多大致從德國和奧地利的來源所選出的材料。音樂之宣傳的作用，雖遠不及戲劇，但社會黨當局並未將瑞士人

對於音樂之愛好放置不顧。在較大的城市內，有着很像樣的工人合奏團和軍樂隊。雖它們大多是應付普羅的節會的，有時它們也被邀參加在公園或廣場奏演的市政府的音樂會，或者同從近邊軍營而來的發爆裂聲的軍樂隊，分擔晚間全部音樂會的節目。

跟着無線電播音，在瑞士的發展，S. A. B. Z. 曾竭力利用它以從事教育的工作。根據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四日所通過的法規，每個收音的場所，每年須向政府繳納十佛郎的稅，其中五分之一為聯邦電話管理局之經常收入，其餘部分，由私人所設播音臺均分。其結果，使後者竭力設法在全國各處增加收音的聽眾，其中當然包括許多工人的家族。S. A. B. Z. 更從旁協助播音者之努力，代為在其黨員們中間傳布關於播音的消息，並徵求五金業協會之贊助，使工人的家族得以最低的價格，購買收音機及其標準的零件。其計劃之第二步，為聯合其具有收音機之黨員們，要求各播音臺在其節目中，加入社會黨名人演說一項。這樣使資本主義的財神之工具，變成宣傳馬克斯主義的工具了。

自然，社會黨和其他各黨之教育的業務及其遊戲組織，在都市比較在鄉區都更為發達。在前者，經費、助手和參加者的人數，都比較多。上舉兩項業務，在社會黨方面都是以『民社』(Volkshaus) 為其活動之根據地的，該社遍設於許多城市中——白恩、白賽爾、沮利克和呂賽爾就是其中尤為著名的城市——社所都是現代的，堅固而清潔的，並管理完善的大建築。其中設有寬敞的廳堂，足敷演映電影，或舉行遊藝會，或召集黨員大會之用，另有許多較小的會議廳和講堂，再有較小的房間和辦公室，以為黨和工會委員會及其幹事之用，上層有舒適的宿

舍和浴室，並且在下層有一寬大的餐廳以廉價供給優美食品。在有些城市中，例如白恩，後者兼售酒類，大多爲啤酒和淡酒；在其他城市中，因謹守該黨仇視酒精的普通原則，絕不兼售酒類。例如在沮利克民社之餐廳是由當地婦女協會（Zürcher Frauenvereingung）承辦的，售賣簡單的熱食品，其價格之廉，使人難以相信，雖絕不兼售酒類，但較爲貧寒的顧客，甚形踴躍的，確，它也禁民間流行的 Tass 和他種紙牌遊戲，於星期日做禮拜的時間內，暫停營業，而於牆上遍掛警告顧客『衣帽各自當心，遺失與店無涉』的標牌，使稍微講究的或稍微得過的主雇都要覺得侮辱了，其標牌所寫的原文如下：

Der Zürcher Frauenverein f. alkoholfreie Wirtschaften lehnt anständig jede Haltung für Diebstahl oder Beschädigung von Eigentum der Gäste, welche in seinen Localen verkehren, ab.

意即沮利克婦女戒酒客店同盟會，正式聲明，對於其各店雇客的財產被竊或損壞，不負絲毫責任。

從禁酒的國家而來的一位觀察者，倘使要擔負裁判這種分歧的政策之責任，就未免有失禮貌了；但著者僅願說，雖這兩個民社，都時常是座上客常滿的，但在外表上，在生動的氣象上，和在其雇客之社交的精神上，白恩的民社都遠超沮利克的民社。

遍瑞士許多小鎮和鄉區中所建立的公所（Gemeindehäuser）規模當較小，但一切階級的公民，都可自由享用，這些公所，或者是因爲各大城市中的民社有了相當的成功，所激發起來的現在有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運

動，要在各處增建這種公所。從事於這種事業的主要的組織，乃是一個財團（*Foundation*），名曰公室公所財團（*Stiftung für Gemeindestuben und Gemeindefhäuser*），自從發起以來十年之中（一九一九——二九年），在瑞士各地受其資助所建立之公所和公室已有九十處之多。公所已經成了地方人民之真正的社會中心，供給圖書、演講、戲劇、音樂、運動和慈善種種組織之便利。

雖未被包括於「教育」之項下，因教育係專指為青年的福利所有的努力而言，瑞士各黨都頗致力於向成人宣傳的活動，其中包括某種新奇而富於教育價值的活動。至於普通運動選舉的材料——小冊子、傳單之類，這種刊物為數甚夥——為國議會的選舉或為創制和複決投票所採用者，都無甚精彩，唯一的例外，為運動選舉之招貼。

在另一方面，瑞士一切較大的政黨，關於它們的活動，都刊行一種年報（*Tätigkeitsbericht*），其中可包括財務概況（*Rechenschaftsbericht*）和其年會中的討論與議事錄之速記的報告（*Protokoll*），至少也有一篇詳盡的總述，雖有時它們是單獨發表的。平常關於一年中業務的報告，為一本有一百餘頁之厚的小冊子。其中載有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和黨幹事部的報告；和一切常設委員會的報告，例如關於宣傳、州黨部以及各該黨在國會的議員；又有各種附屬機關的報告，例如青年和遊戲聯合會等。其次簡略記載該年會關於當前政治問題所作決議案，尤其是關於訴諸選民的創制或複決的問題。

黨議會的速記報告，單獨刊行時所佔篇幅就更多了，約一百五十至二百密行的頁。它們不特記載關於當前

問題之決議案，不論是議會中的問題，或是創制和複決的提案，並且也記載着最後投票以前的滔滔雄辯。財務報告較爲簡短，但它們更是難能可貴，全無法律的強制，它們詳載黨的捐款和用費之頗大的項目。社會黨收集黨費時，係以每枚值一佛郎的印花票售與其黨員，黨中大部分的收入係取給於此，爲特別事故，雖亦募集少數自由捐，例如爲創制和複決的運動。在用費方面顯示了最大的經濟；在這方面關於糜費和舞弊之檢舉，從未聽見說過。社會民主黨中央黨部於一九二五年，共用去一四〇、三一六·八二佛郎（約合美金二八、〇〇〇·〇〇元）。其候選人在當年總選中，共得三、六五九、六五二票，所以每票之平均值，尙不滿一分錢。他黨之黨員對其州黨部，須納少數捐款，對於獨立民主黨，每人每年至少應捐五佛郎。州黨部從這筆進款中，爲它所選每位國會議員，至少納三百五十佛郎，予白恩中央黨部的金庫。天主教保守黨的比照的法規，制定地方黨部爲每一千黨員每年平均應繳一百佛郎，予其中央黨部。各黨時常向其黨員募集特別捐（Kamp-fonds），用以擁護或抵制複決案。按照獨立民主黨的幹事，該黨在其黨員中，包括許多瑞士最富的人，其黨從個人所收到的最大捐款爲一千佛郎，並且該捐款之指定的用途，並非選舉，而是爲某創制案之運動。有錢的候選人，不敢用錢爲他們自己運動，倘使他們稍犯這種嫌疑，就必定會失敗的。肅正選舉的法規是沒有的，並且也不需要；一切這樣的事件，公共的輿論，會自動地予以制裁的。

由此可知瑞士的選民同他處選民比較有一不同之點，就是他們是不能被機謀所籠絡的。候選人不得作露骨的競選；政治的野心，自然是愛國者永生永世的抱負，但仍須有謹慎的含蓄。各項公職，至少在表面上是因事求



人的；候選者之朋友和他的黨同志盡力爲他斡旋，普通慣例，雖也容許將他關於公共問題之政見以光明磊落落通的格式公開於當地報章。據說在瑞士所被運用的許多間接的政治運動的方式——公民講座、戲劇俱樂部、唱歌會、工人樂隊等等——之真實的理由，一概是因爲直接的運動是徒勞無功的。關於這一點之證據——這般可驚的陳述，是必得有佐證的——我們可以重敘一位公民之慘敗的經過。此人是曾僑居美國若干年而發了財回來的。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熟悉該國運動選舉的方法，在他的心目中，這些方法，同他暮氣沈沈的祖國所習用的紆緩的方法，比較起來，似乎高明的多了。回到他的故鄉斯卡夫好生（Schaffhausen）之後，他決意採用美國的制度來運動選舉，宣佈了他自己是候選人之後，就租賃了演講廳，於是大演其說，或者甚至曾向忠厚而驚疑的選民們分送了雪茄菸。在表面上看起來，他的選舉運動是一番很大的成功。至少他每次演講的時候，他的演講廳，各處擠滿了似乎有很深的興趣之聽衆。這位政治維新家，自以爲他已經得着了當地人民的愛戴，但他忘記了一件事，就是瑞士人民對於公共集會是每會必到的，而他們在私下把他作爲笑柄的情形，是他未曾察覺的。選舉日到了，所有各處的票櫃之票數都總結了，而他也就全軍覆沒了，因爲幾乎沒有一個人投了選舉他的票。一個有希望的政治生活就此斷送了，這件事或者是可悲的，因爲這位候選人，據說是很能幹的，他的弱點就是他過於信任了美國的方法。於是使瑞士政治有朝氣、有效率的可能性，也隨之付諸東流了，因爲，不管是真是假，這個故事是正襟危坐地向着一般野心的青年所述說的，使他們不致懷疑他們的政治老前輩們所採取的謹慎的、不要兢兢業業的方法略對於引誘選民不是最有效的。

回到瑞士的黨務報告及其附載的財務概況和會議實錄，所須加以說明者，即它們所包含的材料，就全體而言，都是枯燥乏味的。雖然，上自該國的實際的政治家，下至各區（precincts）委員會之委員們（Vertrauensmännern）比較美國的同樣人員，似乎更能消納這種枯澀的讀物。自然，一般普通黨員們，對於他們的黨的確實的公文，是很少願意寓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們總覺得對於必定會在報章上發表的連篇累牘的報告，是難於避免完全不讀的。特別是關於黨部每年召集的大會中，對於政策的重要問題之辯論，每每包括剝制和複決案。後者的運命時常是被這種團體所通過的決議案所左右的，黨員們根據這些決議案，纔知道他們應當採取的態度，是贊成或反對或被准許自由投票（Stimmfreigabe）。

美國赴瑞士考查政治的人，時常疑詫爲何在那典型的直接立法的國家中，宣傳的小冊子未被採用。借着正式報告、報章以及關於每種提案所預備的運動傳單等，以宣布黨議會之決議，對於適應黨員們之需要不無小補。有兩次獨立民主黨之中央幹事部，發刊了詳審的文件，略似在美國西部各州所習見的宣傳小冊子（independant pamphlets）。然而該兩種文件之大部分的篇幅，是用以對普通政治問題來作學術的商確的，而不是對當前的問題來作正反的提示的。天主教保守黨的幹事部所發刊的三年調查（a three-year survey）報告，也是這一類的文獻。在上文所述各項文件之外，有黨部各附屬機關接連發表的極多報告。就如勞工的刊物，特別是政治的僕役和鐵路工會之刊物，包含許多關於社會黨的政策之文字。

這種附屬的刊物，對於農民黨比較對於他黨有更大的利益。同農民黨有極親密聯繫的瑞士農會（Swiss

Peasants' Union)之幹事部，受聯邦補助費之資助，關於農業的題材發刊了一組報告，不特合於實際的需要，並有科學的價值。於一九二二年，它發刊了一個總報告，包括二十五年中之總成績。該會在全國各處，已經有了近萬的自告奮勇的助手，向他報告各該地農作物的價格。設在布熱荷 (Brugg) 之幹事部，彙齊這些報告並加以整理，然後將其結果用三國文字發表於其機關報，即 *Schweizerische Bauernzeitung*，然後附入該國各部所發刊的農報 (agricultural journals) 以廣流傳。該 *Bauernzeitung* 於一季中發刊十四期，每期平均銷數超過十七萬分。瑞士的三個最大的播音臺，每星期兩次廣播行情的報告。自然，農民對於這些服務，以及對於該會所成就的各項事業，例如預測國內外之莊稼的收成，試驗各種農業機器，估計土地價格和代管遺產，供給農舍之建築圖案，以及為稍有積蓄而願獨立經營農業之農夫代覓相當的田地而為他通融款項等，不勝感激。它用這些服務所培植起來的強有力的推心置腹的民衆為後盾，何怪它的年會在瑞士報章所估的篇幅，同較大的政黨的大會相等呢？瑞士農會在其年會中，關於當前立法的和複決的案件所通過的決議案，有農民黨在國會中強盛的勢力和該黨在各鄉區之極多民衆為後盾。

瑞士兩個大黨，各發刊一種優秀月刊。社會黨的月刊名曰 "*Rote Revue*"，獨立民主黨的月刊名曰 "*Politische Rundschau*"。每種月刊不僅登載討論時事的文章，也登載關於考據和一般政治論題的著作，執筆者為國會議員、黨中領袖、行政官吏、新聞記者、教員、專業的幹事以及其他有專門研究的權威。倘使說這兩個刊物，雖有黨派的色彩，確為學術的重鎮，可以媲美『美國政治學評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也算不

得過譽吧。維護美國政黨之同樣刊物，是絕不會有的。據說 *Rote Revue* 和 *Politische Rundschau* 在各該黨之知識階級中，握着強大的勢力，而經過後者，在一般政治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 社會黨之遊戲組織

瑞士社會黨除培植教育的活動外，更努力於遊戲組織。然而在這兩種運動中，有一個迥然不同之點。該黨之教育事業，圖謀發展領袖而正式棄絕民衆的方略（*formally abjures mass tactics*），而其運動的計劃，乃坦白挫折造成少數明星的制度，而竭力使遊戲民衆化。就後項宗旨而論，雖說瑞士人民有天然愛好運動的癖性，但其所達成的勝利，確實是可驚的。

在世界大戰以前，遊戲組織在黨部蔭庇之下的發展，雖不敏速，但是一直向上的。從一九一八年起，該向上的運動，更迅速了；雖然中間它曾因經濟的困難受了暫時的阻礙，但現在它似乎又將猛進了。在一九二八年頭上，三種重要的組織共有三萬六千以上的會員，其中當然有許多，因為曾經加入幾個組織而被重數者。依據黨部的統計，三萬六千餘人中，約有一萬三千人認真從事於健身操和他種戶外遊戲，其餘的人，不是在運動會會場四週擠着看鬧熱的『老青年』（“old boys”），便是尚在準備期中的小兒童。近來天主教保守黨也開始培植遊戲組織了，所以在今日中等階級（*Bürgerliche*）體育會之政治中立的老陣線，將從左右受挾攻了。

社會黨所以重視其黨員的體育之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解說。據說工人特別需要運動——消極地抵制不良

住宅之影響和由某種工業及工廠中一般的工作所來的單面的肌肉的發展；積極地增進他們的健康，而增加他們的經濟生產力。倘使要追問爲何勞工和職工們不加入瑞士所已有的許多遊戲的組織，而要另起爐竈，馬上就可得着答案。第一，據說是因爲它們所徵收的會費過高，一般工人沒有能力繳納，即或勉強繳出會費，但其規定的運動服裝和會中所流行的豪華的習氣，都是窮人不敢高攀的。自然，這些老資格的中立的體育會，否認這些批評，而相反地硬說它們是經濟和民主主義的典型（paragons of economy and democracy）。上面所提出關於社會黨的遊戲運動之各種理由或託詞（rationalizations）不論有何重要，但有一種考慮，即露天遊戲之自身，乃爲發展社會關係之有效的學校，對於他們必然是一種最重要的勢力。在體育環境中所發展的友誼，在瑞士比較在他處更有持久的傾向。該國資格老的健身的和打靶的俱樂部，以其衆多的會員和雄厚的勢力，證實上面所說的考慮，絕非無稽之談，而且必定供給了政治的領袖們以最強烈的動機，爲黨的利益起見，來步其後塵。

兼之，瑞士社會黨曾時常堅持，意識地或否，較老的健身和打靶俱樂部在政治上是極端守舊的。遊戲爲遊戲之故是一句美好的口號，但他們覺得是淡而無味的。他們也不願承認遊戲和政治是彼此無關的；相反地他們業已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極其透澈的關聯。瑞士之傳統的健身和打靶俱樂部，在事實上，雖說和保守黨並無正式的關係，但接受聯邦政府軍政部之補助金（subventions from the military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圖謀準備青年參加兵役，而且重視愛國的和公民的精神之培育。這一切，在社會規制之下，是呢逐社會黨的實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寫着：『凡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絕不敢遣他的子女去參加這樣的講座，他自己

也絕對不能設繼續隸屬於一種組織，倘若該組織是在意識地和毫無隱蔽地進行着同社會主義冰炭不相容的教育的事業。

社會黨之遊戲運動，雖僅在最近十年中，纔有了迅速的發展，但它們可以說是具有相當歷史的。早在一八七四年古特里派（*Trilliverein*），當時是由於一般工匠們爲着借教育以自求多福的宗旨所發起的一種會社，就在其總會之下附設有健身會。這些健身會，有了相當的成功，但它們以不分階級的思想，參加一般州和聯邦健身會之比賽有三十五年之久。然而於一九〇九年古特里派健身會中某幾分會宣告脫離聯邦體育協進會了，他們的怨言，第一是關於在沮利克在阿其巴喬罷工中（during the *Aschbacher strike*），老派俱樂部所持的態度太不公允；第二是關於聯邦政府不允予以補助金。再過五年，所有古特里派的黨員，都脫離聯邦體育協進會了。其後隨着它們的母體（*their parent organization*）之衰頹而有社會黨之崛起，於是在它們當中，大多數加入了社會黨，這是很自然的，這個轉黨的過程，於一九一六年業已開始，直至一九二九年愛羅代表會議（*Arrau delegate convention*）纔經過了正式批准的手續。

瑞士工人健身暨遊戲協會（*Schw. Arbeitertum-und Sportverband*）簡稱 *S.A.T.V.*，依照其目前的組織乃是瑞士勞工三個體育會中之最大者，有二百五十個分會和二萬三千多名會員。它隸屬於國際社會黨遊戲暨體國協會（*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ssociation for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其本部在呂賽爾，所以常被稱爲呂賽爾遊戲國際（*Luzern Sport International*）——簡稱 *L. S. I. S. A. T. U. S.* 之自身，有一完備的地

方和中央的組織，它最特別的地方，是會員有權利將所提出的重要政策交付複決；它發行各種刊物，並每三年舉行一次全國會員運動大會，最近曾於一九二六年在白恩舉行這樣的盛會，參加者為一百十二男子分會和三十六女子分會。S. A. T. U. S. 所操練的健身術，在形式上是同瑞士聯邦體育協會相仿的，但在方法上，有着重要的區別，關於這一點，下面將有詳細的討論。

第二種社會黨體育組織乃是瑞士工人自行車聯合會『休戚相關』(Arbeiterfahrradverband der Schweiz, "Solidarität")，通常簡稱 A. R. B. d. S. S. 成立於一九〇五年，為德國同樣聯合會之一支會，十一年之後，它成了一個獨立的全國的會社，當時它有四千五百會員。在一九二八年頭上，它有了一萬一千四百名會員，二百七十一個支會。該自行車聯合會，完全禁止賽跑，而以集團騎車和旅行獎勵其會員。它予會員之極大的助力，在於以低廉的價額為會員身體的傷害和財產的損失保險，並代付關稅和保證金，以便外國的旅行。

瑞士工人在這方面的第三種組織，就是旅行俱樂部，自然之友(Touristenverein "Die Naturfreunde")。它已經有了二十年的歷史，在一九二八年之始，有五千會員，分布於八十一個地方集團。它的宗旨，為促進關於自然美的知識和愛戀，並圖謀其保護，且以鼓勵男女青年步行(Jugendwandlungen)的方法來促進其發展。因着公立學校之響應，必然也因着彼邦風景之明媚，舉世無匹，所以自然之友，在勞工階級之青年分子中提倡步行，已經有了非常的成功。此外，他們嘗自誇擊破了從前在瑞士亞爾卑俱樂部(Swiss Alpine Club)管理之下的爬山之貴族的獨佔(aristocratic monopoly of mountain climbing)。為提倡這種遊戲起見，自然之友曾於該國較

高的山區中建造了三十幾所躲避風雨的茅屋，每屋至少可爲二十八棲息之所。附帶地在該項茅屋中禁止售賣含有酒精的飲品。這個俱樂部將其名爲「Berg Free」的月刊按期贈送其會員。

在這三種有穩固基礎的組織之外，久已有一種醞釀要設立一個第四種組織，名曰瑞士工人打靶聯合會（Schweizerischer Arbeiterschützenbund）。倘使成功，它對於聯邦打靶聯合會之對抗亦猶 S A T U S 對於聯邦體育聯合會之對抗了。一件值得觀察的事情，就是打靶練習，在社會黨的蔭庇之下，怎樣能避免個人分數的記錄，既然這種記錄是上述三種遊戲大組織所不容許的，而且它怎樣能避免軍事的影響，既然瑞士軍政當局關於打靶所制定的規程，當然對於勞工和其他階級是同等待遇的。

瑞士勞工，在他們自己的階級組織內所從事的遊戲之種類是比較老的中立的協會沒有分別的，其間唯一的不同點，就在他們盡量提倡團體遊戲，而不重個人武藝之表彰。然而，與後面一點很兩樣的，他們堅持所用的方法，必須要能將這兩個類型的會社，清楚地劃分出來。關於勞工集團所採用的方法，可以參考斯泰滿（Stefanmann）博士所草擬並經呂賽爾遊戲國際一九二七年赫爾森佛（Helisingfors）會議一致通過的一組決議案。茲摘錄斯泰滿決議案如下：

『在社會黨的遊戲內，男女兩性享受相同的權利並負擔相同的義務……爲每一個年齡集團和爲男女兩性應分別設立特殊的組織，每種組織主持它自己的行政，並舉辦它自己的遊戲……對於社會主義者，遊戲之自身，不是一種目的；它應以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文化爲職志……它的第一個宗旨，是促進人類的健康及



其經濟的能量……在原則上，練身應在戶外舉行，非迫不得已，不應作戶內的操練……普通以脫除衣服的操練爲妥……酒精爲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敵，在工人的遊戲中應加抵制……社會主義的遊戲之第二個宗旨，乃在使一般民衆浸潤於社會化的思想之中，即負載文化和創造文化者，乃全體社會而非個人；在L. S. I. 中團體的思想應具蓬勃的生氣……在各種遊戲中對於整部間、集團間和隊與隊之間的競爭，即一般團體間的比賽應予以特別的培植和更大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的遊戲中，競爭的奮鬥，並不是用任何和一切方法以打倒敵手之渴望的機會；一個從事遊戲的工人，時時刻刻尊重他的敵手，把他看作遊戲中的袍澤和同志。一切比賽都應當在志同道合的精神中進行着；而且應當將比賽當作優秀的快樂的玩耍，而不應將它看爲求勝利而有的嚴重的粗暴的鬪爭……保存在全國聯合會和L. S. I. 之專門委員會本部中的個人成績記錄，應附以團體成績之統計……凡以非常的表演爲個人自身的勞績，所以應以獎品、花圈、憑照、頭銜、報章宣傳等爲其表彰之思想，應當根本鏷除』。

瑞士工人遊戲各種組織，完全服膺上面的決議案。譬如S. A. T. U. S. 就禁絕一切獎品，只准在盛大節日中對於優勝的團體頒給花圈。就連這一點中等階級的方法之殘痕，也希望不久將予廢除。又譬如瑞士自行車聯合會禁止它的會員們參加由德、奧的工人同志所主辦的競賽，因爲他們的組織仍繼續着中等階級的方法。考慮瑞士各傳統的體育聯合會實施團體操練之範圍，S. A. T. U. S. 和A. R. B. d. S. 反對個人比賽的堅決主張，就更覺難能可貴了。究竟這種態度能維持多久，只有時間可以證明。在美國遊戲的立場，眼見它的車載斗量的『明星』運

動員和報章對於他們的成績所表現的垂涎三尺的醜態 (with its superiority of "stun" athletes and the interminable drool of the press regarding their achievements) 令人不得不對於斯泰滿博士所建議的革新計劃深表同情。

瑞士社會黨遊戲組織，在一點上，是實行封鎖主義的。請求入會者一律必須具有工會證或隸屬於一個擁護階級鬪爭的政黨——青年不計，但到了成年的時候，就必須取得兩種資格中的一種方准入會。然而關於這些限制意見，也頗不一致。在一方面，有反對這些限制者，其理由為：各種遊戲組織之宗旨，既然在為社會主義增加信徒，那末，在招收新會員上，就不應當採取封鎖主義了。瑞士工人遊戲運動，近來雖有了敏速的進步，但據說尚有七八萬的工人存留於傳統的中等階級的社會中，該部的宗旨，應當是趕緊使這許多工人投入社會主義的組織中。在另一方面，有贊成該項限制者，他們以為比增加會員人數尤其重要的，是在會員中保持一種頑強的馬克斯精神，使他們能始終一致為主義効忠和奮鬥。

以最大的工人遊戲組織，S A T U S 而論，其中盛行着一種見解，以為同政黨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是相宜的。社會黨和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分裂以後六年之間，它滿想維持中立，容納雙方的黨員，而其結果使它對於內部的熱烈的爭吵，感覺左右為難。然而在 S A T U S 於一九二〇年所舉行的愛羅代表大會中，通過了一個議案，贊成同社會民主黨和工會聯合會，訂立一種親密的聯盟（意即驅逐共產黨）。愛羅決議案被提交其會員複決，而在吸引共產黨的區域，很大注意的一番運動之後，幸以三千七百五十三票對二千五百八十四票，維持了原案，所

投票之總數，少於有投票資格的人數三十百分比。自然，瑞士保守派的報紙，嘗以驚恐的眼光看這決議，以爲它等於揭去了工人的假面具而使社會黨的醜像現了原形。以常理衡之，它們不特不應當驚恐，反而應當歡欣，因爲它們的較爲溫和的敵對勝利了。並且對於在不久以前，聯邦議會在軍事預算的項下，重新批准每年撥給 S A T U S 二萬二千佛郎的補助費之事實，也有不少熱嘲冷笑的言論。

關於一個反軍事和社會主義的集團，接受了由於「布爾喬」政府之軍政部的推薦而來的津貼，其中是有點幽默的，然而在瑞士，因爲對於這種事件已屬司空見慣，所以大家並不覺其幽默了。關於工人遊戲運動之政治的效力，在局外人看來，是頗覺可疑的。當其極多有赤色嫌疑的民衆消磨大部分的時間於角力、划船和美藝的健身操 (kinstunnen) 或流連風景的自行車旅行，我們懷疑瑞士已經臨到了適於徹底改革的時期，至於革命又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方能成熟了。卽或時代需求強暴的政變，而勞工階級、遊戲者，或者會更願意踢一盤足球。爲何布爾喬的分子對於工人遊戲組織之發展，必須不予以熱嘲冷笑，使呈現惶恐不安呢？或者它是值得他們的鼓掌和慷慨捐助的，相信社會主義於是可以感化了更多的民衆，但其速度也同時降低了。

換一句話說，側面的表演太多了，可以牽制紅旗下大本營之壓軸戲了。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遊戲運動之成功，使教育總會之社會黨領袖們頗覺爲難。在另一方面，黨部組織者，必定深信它幫助他們，將他們的投票的羣衆團結起來了，並且也將其人數擴充了，坦馬尼派區俱樂部 (Tammany district club houses) 對於紐約市強霸機關之助力，必然也有很相似的情形。在瑞士社會黨，希望成爲一個多數黨的艱辛奮鬥中，他們不能放棄任何有效

的感化人入黨的方法，這也是人情之常。因為提倡遊戲，增進了工人的健康和精力，否則他們難免不仍舊是為機器服賤役的奴才，這樣如何使人不讚美他們所培育的組織？就連在一個對體育有很完備組織的國家，像瑞士中，大家仍然公認社會黨遊戲聯合會，曾大大地增加受遊戲利益之總人數了。因為舊派遊戲運動有了破壞中立之嫌疑，就授予了黨部組織者以侵入遊戲領域之口實，或者可算是一件憾事。但在中立業已破壞的現在，從方法的比較上——例如在斯泰滿建議中所暗示的比較——大致兩種體育都可受益。

天主教保守黨之努力，在他們自己的旗幟之下，創辦一種俱樂部 and 體育會的系統，於其中『可以灌輸宗教的要義和道德的教育，否則我們在政治上的努力都是徒然』，對於遊戲，在團結黨員上的成功，是一個最好的證據。於一九二〇年，該項運動已經有相當的進展，所以當時在白賽爾所舉行的天主教運動大會，聚集了二十個團體會員和六百五十餘名運動員。在該黨一九二七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指派了一個特殊的小委員會，過後擴充為四十八人，負責完成瑞士天主教保守黨青年之系統的組織。在達成該項目標之努力上，教會內外的領袖們，曾予以英勇的贊助。他們創立了一個生氣勃勃的機關報名曰 *Die Schildwache*，常為各方所重視。根據估計在瑞士有十萬天主教青年，加入政治組織者，不過一萬五千青年。其餘的青年，據說有加入獨立民主黨之體育會者，甚至有加入社會黨之體育會者，瑞士黨的領袖們，對於這種情形，自然感覺煩悶不安。換一句話說，瑞士天主教青年組織之動機，完全是屬於政治的，這與上文所述工人組織是沒有分別的。

天主教為遊戲和其他宗旨，將其青年分別加以組織，其成功是頗可預期的。在最近二十五年中，它曾經創造

了它自己的工會制 (die christlichsozialen Gewerkschaften)，各種俱樂部——男子俱樂部、婦女俱樂部、母親俱樂部、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疾病和殘疾會、慈善機關和一個保守派的銀行制。在一九二九年聽聞他們正在進行一種包括全國的總計劃，鼓勵其教友們盡力互相交易。天主教黨在其所統治的地域所掌握的權力，大部分由於它所手創的俱樂部網和各種組織。

瑞士一般保守黨的領袖，對於因宗教或政治的原因而脫離舊派中立的遊戲組織，頗為感傷。憑借政府的津貼、報章的傳揚和社會的勢力，他們對於後者能予以有效的推動，他種助力，他們似乎不大需要。在中等階級方面，常有說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保守黨，在專門利用遊戲為其黨派的利益。以教育政策在青年身上的影響而論，瑞士各溫和的政黨在通行的公民學科的體系中 (Staatsbürgerkurse) 已經創立第一道防線，雖然它們不肯承認該項學科，是染着黨派色彩的。這一派的政治領袖，也的確深知，必須將他們的注意，向下移到一般少年公民的身上，激起他們對於政治的興趣，在可能範圍內，將他們組織起來，於是可以預先儲才，以便將來可用以充實其政治的力量，和遞補其領袖的缺額。在這方面的第一次正式的運動，是於一九〇二年開始的，當時在愛羅成立了青年自由社 (Junghreisinnige)。其後，在其他十二州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各社的代表每年會齊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一次或數次，開會時，有中央黨部領袖討論關於時局的重要問題，和全體會員參加關於該項問題的辯論。老年黨員和青年黨員之間，意見並非時常一致的，確，在日內瓦和羅善 (Lausanne) 兩城中，青年們獨立建設了他們自己的黨，而與原有的州黨部對抗。所以瑞士的保守黨和社會黨的領袖都吃過青年組織叛黨的苦頭。青年自由社

專以社會和政治的改良爲務，有幾次也曾擬具關於原則和政策之詳細計劃書，以爲其長者之參考。他們的機關報，(Der Staatsbürger)，同時也是瑞士公民科聯合會的機關報，是一個編輯非常優良的八百報紙，每月出版兩次。保守派的領袖對於青年組織之繼續不斷的興趣，可以下面的事實證明：在一九二九年夏季，在戴爾斯蒲拉特 (Delsbühl) 召集的獨立民主黨之地方和中央幹事會議中，所提出的主要的報告中，有兩種是關於在全國各處，在這方面的努力情形。

瑞士政黨的活動，除了主要的政治性質者外，是如此其紛繁的，使人驚疑其領袖們怎樣能設顧得週到。後者對於這一切，似乎沒有一點遺漏，惟有消費合作社是例外，在比利時，後者是歸社會黨直接管理的。在瑞士消費合作社是有很大發展的，較低的中等階級和普羅的分子，都是它的主顧。然而在瑞士各城，消費合作社理事部之選舉運動，常爲其社會黨或共產黨的分子和布爾喬分子間的角逐所點綴。除了零售的商業，事實上它不過是一種部分的營業，因爲瑞士社會黨及其民社差不多是其選民及其家屬之第二家庭。

自然，要使瑞士政黨中頭緒紛繁的活動，不致荒廢，實非易事。普通應付這問題的方法，在分工和任用專業的幹事。我們也須記得在一種事情上，瑞士政治領袖之負擔，是輕於美國政治領袖的。他們的最繁重的運動，重新選舉國會議員之運動，比美國的總統競選是輕而易舉的，雖他們的空餘的時間，仍被聯邦的創議和復決的投票佔去了一部分。

教育、戲劇、遊戲和青年運動，既爲瑞士政治之原動力，它們將必日趨紛繁複雜，是絕無問題的。左翼的和右翼

的各黨，都在鉤心鬪角地發展這些附屬的組織，各自由黨雖曾表示不屑爲此，但此種競爭之猛烈或者會使他們也不得不參加了。倘使所有的政黨，都盡力發展補習班、講座、暑期學校、戲劇俱樂部、唱歌社、音樂隊、體育會、田徑隊、自行車俱樂部、旅行俱樂部等等無窮盡的附屬組織，我們可否希望將來會有一位政治的天才出世，他將在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上別開生面，不用乏味的投票程序而代之，譬如說，實際足球比賽，同時我們很高興看出瑞士人民自己在這動境中，也發現了某種幽默。例如和藹的摩西林（Felix Moeschlin）在他最近爲『聯邦行政委員、州行政委員和州議員、市議員、鎮議員及其他願意充任這些公職者』所寫的一本書『名曰 *Politikgenossenschaft*』者，描繪關於在將來國議會開會時可以發生的事件如下：

『對於某項決議案，投票贊成者，是天主教的和社會民主黨遊戲黨的黨員，以及獨立民主黨的電影黨黨員；而投票反對者，是其餘各黨黨員，包括獨立民主黨汽車黨，其黨員是最後趕到投票的。山居農民黨，仍照例拒絕投票。社會民主黨的無線電黨的態度，仍然難於理解。以其素來正確的政治本能而論，似乎不應有此態度

……』

## 第五章 瑞士人民參加選舉的情形：民衆的選舉權全民大會市民大會

### 民衆選舉權

白賈士勳爵講述一件事，關於他曾在一個偏僻的亞爾卑山谷中，遇着一位瑞士的農民，問他該地一切居民對於全民大會（Landsgemeinde）是否都有出席和投票的權利，他所得到的答案是：『那是他們的義務』（*Es ist ihre Pflicht*）。倘使根據參加選舉的人數統計，以作評判，瑞士全體選民，都有同樣的精神。雖然如此，熱心的公民們，仍然表示不滿，而對於選舉不力（*Stimmfaulheit*）之怨聲，仍時有所聞。

然而在一九一九年國議會之普選中，全國選民百分之八〇·四，曾一致參加投票。根據三州的記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參加：斯卡夫好生（九一百分比）、聖加侖（九一百分比）和愛羅（九〇·七百分比）。然而一九一九年時，選舉參加人數所以如此衆多，是因為當時有一種非常的情勢。比例代表制第一次被施行，和一切政黨都深覺在它們的立法的力量上，行將發生斷然的轉變。選民也略爲嶄新的選舉制度所吸引了。很重要的立法問題之決定在此一舉，而公共心理，仍惴惴於世界大戰之影響，及其在瑞士內部所產生的困難。

在下一次的國議會普選中，即一九二二年之普選，全國參加人數統計，就降到七六·四百分比了，差不多保



持了一九二五年之統計（七六·八），而在一九二八年的普選中，略被提高到七八·八百分比。顯然因着比例代表制，業已成爲事實，而其可能性，已盡被探出而毫無餘蘊，一九一九年之熱心，也隨着冷談了。瑞士人民喜歡選選凡願連任的議員之習慣，以及他們對於無希望的候選資格和運動之厭惡都再露呈了。

然而在美國的立場，七五和八〇百分比的參加，似乎是非常之滿意的。瑞士的選民登記表，不時常與事實相符合，在有些地方不大留意將已故的、遷移的和因其他原因喪失資格的選民之姓名勾銷，這個事實，使人對於他們的參加選舉人數的統計更加滿意了。孫提（*S. J. S. T. J.*）博士關於涅利克的情形最近所作的研究，在結論上說這種錯誤，有三四個百分比之多，所以參加的人數，最多不能超過九六或九七百分比。

將這種錯誤除去以後，在瑞士有資格的選民中，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之普選中，未曾露面者，約有一五到二一百分比，但在他們中間也有人並非故意放棄選舉者。雖有對選舉不力發出怨言者，但大多數瑞士人對於這一件，事頗爲達觀，其實他們也很有理可以達觀，因爲在其他各國中放棄選舉者都遠超過他們。可以同支加哥城放棄選舉的情形之科學的研究相比擬的研究，至今尚沒有人作過。甚至除去爲着迫不得已的原因，不能分身赴票廬投票者、病人、殘廢不能行動者外，顯然仍有很多人，是無故不到的。但後者在瑞士，不都被看爲放棄選舉權者。有識之士，很少將這政治的惡名，加諸根本不信仰議會制，而故意不投票以示抗議的少數公民。這個罪名，也未加於凡以所有的黨，都值不得他的選舉權者之身上，雖在瑞士繁多的黨派中，除了最喜歡吹求者外，總不難找着一個氣味相投的黨。在這些好爲反抗公民中有很多。在一九二五年，有一萬零三百八十一人，

在一八二九年有八千三百零八人——在表面上也總算敷衍過一下；那就是說他們投過票，但所投的是空白的票。但把這一切除出之後，仍然有少數疏忽或懶惰的公民，他們就不高興執行他們的選舉權，而他們對於十足的瑞士人所加於他們的難堪的責備，也只得默受。

地方的情形，也影響赴票廬的人數。在某幾州中在國議會中，僅有一個或少數代表名額，而某黨的勢力頗大，其結果是毫無疑義。又或，倘使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每個政黨都有很多民衆，在它們當中，可以成立一種諒解，使選舉的結果可被預定。在這種情形之下，恰如美國從前全體取一致行動的南部，或共和黨的本雪汎尼亞，有很多選民不赴票廬。故此，在一九二二年，在由銳僅有三〇·七百分比的選民，曾履行過他們的義務；一九二八年，在尼德瓦特登(Nidwalden)僅有二二·九百分比。

無反對的選舉(stille wahl)的例子也並非沒有，雖它們在瑞士不及在英國之通行。但在一九二八年之普選中，有兩件這樣的事情——一件在外阿彭色爾(Outer Appenzel)，另一件在古乃熱斯。在國議會中，前者有三個名額，後者有兩個名額；而在各該州之候選人之數，均等於其應有的額數，選民們覺得無赴票廬之必要。

在另一方面，特殊的情形可以大增參加選舉者之人數。譬如，倘使國議會的選舉是與州議會的選舉或州複決案的表決會同舉行的，赴票廬者之人數就會大增了，因為許多瑞士人，對地方的政治比對聯邦的政治，更感興趣。在十四州中，國議員的選舉同州議員的時常碰在一起，這樣的巧合，常能增加參加的人數。

瑞士選舉所特有的參加者之很高的為百分數，無疑地反映其公民羣衆在政治上之熱烈而持久的興趣。這

並非一朝一夕之結果，乃是許多世代之發展。創制和複決的投票，市民大會和全民大會，似乎都不足使瑞士選民發生厭倦；它們反使他對於每三年發生的一件大事，即新國議會之選舉，感着日新的興趣。政黨的數目和它們所提示的問題之包羅的廣汎，從極左到極右，色色俱全，其結果仍然同上。我們已經在上文說過，在各政黨的後面，有不可計數的聯合會、俱樂部以及形形色色的會社，它們對於選舉運動之興趣，並不亞於政黨之自身，並且它們也策勵它們的會員們，去作鞠躬盡瘁的企圖。

這並不是說各政黨在它們自己努力運動選舉上是落後的。清一色的投票（*enrichit tickets*）之多——佔全部八二至八七百分比——足以顯證它們所用的方法之效力。黨務工作人員，懇求選民準時到場，而且極力使人應許必定出席參加。雖這種手腕大大地增加了所投的票數，但它們卻被人彈劾為擅用威脅手段，施行蠱惑伎倆，及摧殘個人自決的權利。

有六州——沮利克、斯卡夫好生、聖格勒（*St. Gall*）、愛羅、色各和物德——有強制投票法（*Stimmzwang*）之制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投票者，處以一兩佛郎之罰金。在沮利克這種強制，可以說有名無實，其法律僅規定選民須將他們所收到的通知書，於選舉日送還選舉官或於兩日以後送還，否則差人索取而處以半佛郎到一佛郎的罰金。物德直至一九二五年纔採用了強制投票法，而它的法律只罰對於複決案不投票的選民。但據說它已經增加了出席正常選舉（即關於候選人之選舉）者之人數。

大家公認強制投票法，曾使更多的選民赴選舉場投票。顯然一兩個佛郎的罰金是不被儉約的瑞士人民所

輕視的，而在一般奢侈的美國人看來，當然等於九牛一毛。有強制投票法的五州，除了溫利克外，治洽是在一九二八年選舉上顯示為參加人數百分比最高之五州，就中有一州即斯卡夫好生，為瑞士立了一個九二·五的最高新記錄。在另一方面，實行選舉怠工（electoral sabotage）者，即投空白票者，人數之多，也首推這些有強制法的各州。自然，依照上文所論列，投空白票或者是表示某種確定的政見或某種確定的忿懣之一種方法，可見並非完全無理取鬧的。但據焦萬羅利博士說，在瑞士也有很多人投空白票，因為他們忿慨，倘不投票，就要受罰的威脅。總之不問這種行為有何理由，在有強制投票法的各州中，空白票的數量，在一九二八年，最低為色各之一·六百分比，最高為聖格勒之三·八百分比，而全國的平均數洽為一個百分比。想到上列百分比之微細，以及施行強制政策的各州有最多參加者之事實，顯然所失的票數遠不及所得的票數。至於國家於此蒙了多少利益，我們只好讓哲學家去決定了。

間或有人埋怨政府，未能從嚴執行強制投票法。例如，在一九二九年頭上，在色各所舉行的一個重要的州選中，據說在某自治區內，無故不到者在兩百人以上，然而沒有一個人受過罰。在有幾區內選舉官非常寬縱不投票者，甚至不必聲明不到的理由。顯然這樣的寬縱，越出瑞士行政之常軌，是覺得太過了，因為在州議會下次開會時，政府方面，曾受了嚴峻的彈劾和將來不應再讓這類事件發生的警告。

以瑞士參加選舉者之統計來比較在美國使人對政治感覺不安的同樣統計，我們就必須記得前者之選區比後者要小的多。倘使以選民對全國總人口之百分比為民主主義之一種指數，那末，瑞士雖號稱為該種政府之

忠實信徒，其等級將遠在美、英、德和許多其他自治國家之下，甚至連蘇俄也不如。根據一九二五年住居該國人口之估計，登記的選民之百分比，僅爲二五·三百分比。以美國全國而論，顯示每次選舉中有資格的選民之人數統計，是很殘缺的，爲着這個原因，要同瑞士作廣泛的比較是談不到。然而，一九二八年在紐約州登記的總人數爲四、八八五、三六三人，佔該年度估計的人口四二·三百分比。在美國幾個主要的州中，參加總統選舉者居然佔其全人口四〇百分比以上。在一九二〇年的總統選舉上，譬如說，印第安納州之票數，等於其人口之四三·四百分比。

自然選民，對全瑞士的人口較小的百分比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婦女尙未獲得選舉權之事實。既然必須拿住居人口的估計爲根據，而戶口局又未提出公民人口之估計，居留該國的許多外國僑民，也是使比例降低的一個次要的因數。所以瑞士今日最大多數選民，是純粹瑞士男子，他不特能證明他們的祖先是瑞士人，如像從前在美國南部的選舉法所規定，並且也能證明他們在一八六七年以前的祖先之公民的資格。參加選舉對於他們有比義務更深的意義；它是一種祖宗的傳統。難怪他們能結合而成參加人數之很高的百分比。並且倘使婦女獲得了選舉權，如同美國一樣，就必定會有一番暴跌了，這種考慮的用意，並非要爲美國人撐場面，也不是要抹煞瑞士男子英勇地負起投票的責任所應有的稱讚。

自然，投票的責任對於他們不僅包括每三年選舉國議會一次，也包括聯邦的創制和複決的投票，更無須說州和地方選舉，州和地方創制和複決投票，出席市民會議，在五州中並須出席全民會議。堆在一起說，這些義務似

乎是非常繁重；然而他們所應付的投票，比起許多美國人所應付的較爲輕而易舉，並且在瑞士所提出的創制案和複決案的件數，也不比美國西部幾州之多。譬如在一九一八至二七的十年中間，瑞士人民只表決了二十九件聯邦提案，就有十一件普通的和十二件創制的憲法增補案，其餘六件，是關於普通法律，是以複決請願的方式 (by referendum petition) 提出於選區者。因着間或有兩三個提案同時訴諸人民之事實，所以該二十九案，是在二十一個選舉日應付了的，這對於公民之十年的時間，決然不是過分的需索。

一般人慣常以參加者對全國登記選民總數之百分比爲根據，來批評瑞士的創制和複決之程序。雖自一八七九年以來，對於每次的創制和複決，皆有統計的數字可資考證，但依照上文所舉理由，它們必須要作少許折扣。一個似乎比較公道的辦法，是仿美國通行的慣例，因爲缺少登記的數字，創制和複決的參加，是以選舉總統的票數或重要的全州選舉爲根據而核算的。對於瑞士最好對照的根據，是國議會選舉所投票數，除開聯邦的創制和複決的日期以外，要全國各選區同時舉行投票，後者乃是唯一的機會。拿最近四次普選的百分比（一九一九年，八〇·四百分比；一九二二年，七六·四百分比；一九二五年，七六·八百分比；和一九二八年，七八·八百分比），求其平均數，其結果爲七八·一百分比，這可說是最近十年中，瑞士選民在最重要的選舉上之正常的舉動。

假設用這個平均百分數爲根據，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十年間，對於二十九件創制和複決案，瑞士選民到場投票平均人數，佔在同一期間，參加國議會選舉人數七二·二百分比。以提案之類別言其比率爲：未經聯名申請的普通憲法增補案，六八·二百分比；須經五萬正式選民聯名申請的創制憲法增補案，七二·三百分比；

經三萬正式選民聯名申請提出複決的普通法律案件，七九·五百分比。最後這一個百分數，雖同瑞士已往的經驗完全同調，但它所以高於其上兩個百分數的原因，一半是可用在該十年中，提出複決的幾件普通法律極其重要之事實加以說明。

所以就全體而言，參加瑞士的創制和複決投票人數，根據該國最好的標準，即從國議會的普選中所得標準，是超出意想之上的。自然，到場投票的登記選民之很低的百分數，有時也極容易拿提案的循例性（perfunctory）或比較不重要之事實來加以說明（例如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之憲法增補案，參加者僅二九·七百分比，該案是關於前一年所通過的比例代表制之必須有的過渡辦法；以及另外兩起增補案，一起關於航空——三四·九百分比，另一起關於汽車和摩托自行車的交通——三五·六百分比，兩者都是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我們也有理由可以相信，參加人數之降低，有時因為在許多選民方面，深信該提案是必定會通過的或是必定會失敗的。關於這一點，有一件有趣的事實，即對於一九一八年比例代表制創制案之參加人數百分比（四七·九百分比），當其幾乎沒有人不盼望它成功的時候，和當其它確實成功的時候，其百分數，比較從前兩個百分數低多了（一九〇〇年，五五·三百分比；一九一〇年，六一·四百分比），在第二次中，至少，其結果是更可疑的。

然而倘使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參加人數，可以等於和甚至超過國議會的選舉，使瑞士能加入國際聯盟的憲法增補案，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六日使登記選民之七六·五百分比參加了表決。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提出

複決的關於修改工廠法的一件普通立法議案，獲得了七六百分比的參加。然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最高記錄，乃是從關於徵收資本稅的創制案的投票所來的，該案是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以八五·三百分比的選民的表決所推翻的。在這一一次，參加人數，居然比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八年歷屆國議會選舉之平均數，超過了九·二百分比。在前幾十年中，也有若干次打破記錄的選舉人數，例如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七七·二百分比的選民，參加了否決擴充聯邦管理小學權力之法律；又於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有七七·六的選民參加關於將全國鐵道收歸國有的法律之通過。

最近五十年中，瑞士創制和複決投票之比較，如第五表，顯示參加人數之一致的高水準。

第五表 瑞士創制和複決的票數以及平均參加人數，以每十年為一期，一八七八——一九二七年

時 期	各 種 提 案 之 件 數		參 加 人 數 之 平 均 百 分 數					
	普通憲法增補案	創制憲法增補案	普通憲法增補案	創制憲法增補案				
一八七八——一八八七年	五	* 〇	八	一三	五三·六	……	六〇·一	五七·六
一八八八——一八九七年	八	三	九	二〇	四八·六	五八·六	五九·〇	五四·八
一八九八——一九〇七年	五	三	六	一四	四六·三	五三·九	六四·九	五五·九
一九〇八——一九一七年	六	二	一	九	四二·一	五四·二	六三·〇	四七·一
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	一一	一二	六	二九	五三·三	五六·五	六二·一	五六·四

\* 用創制以求憲法之部分的增補，始於一八九三年。



第五表所顯示的唯一重要差異，是在一九〇八至一七之十年中，當時，在世界大戰的四年中，曾有意盡力避免創制和複決之運用，並且即或運用，也僅以次要的提案爲限，以免惹起選民激烈的情緒。其後十年，爲着相同的原因，提案的件數及其重要性，都有顯著的增加。我們可以看出，先經兩院通過，無須民衆聯名申請，而提交全國選民表決之普通憲法增補案，參加入數時常是最低的。因該項提案，既經議會贊成，可以說，它們是大多數選民所擁護的；有時也因爲它們在形式上，雖是關於憲法的，但無很大實際重要——故此它們只能吸引比較少的選民。

然而關於這種提案，或關於經兩院通過，由複決的申請提交人民表決的普通法律案件，不能說在人民方面時常是不感興趣的。瑞士有一個明晰的政治類型，即「複決公民」（Referendumswähler），別號「緘默者」（*Votenzüger*），極其歡喜顯耀它有操縱立法的力量。該類選民人數之估計，竟有二十萬之多，幾乎使人難以相信。但不論如何，其人數之衆多，常足以致許多有希望的政府提案，陷於絕境，而使名政治家對於國家前途感覺失望。很奇怪，乃是在得勝以後，緘默者和爲確定的原因與他們表同情者，都沒有絲毫意思要內閣辭職或國會改選——如焦萬羅利博士之評語，這一個事實，顯示瑞士政府同普通議會類型的政府，是迥然不同的。這些久久的妨礙議事者（*chronic obstructionist*），因對於一切複決案，無一概反對，所以常遭人痛罵，但他們不過將深人民衆的極端謹慎的態度，升到極高尖端罷了。我們在瑞士，到處可以看見各種車輛，都備有精良的制動機（*brake*）。自然，在山道上它們是絕對必需的，但在一望無垠的高平原地帶，也常常看見它們。它們所代表的極端的謹慎，是瑞士人民政治活動的特性，正如它是他們的公路交通之特色。考慮這個特性，很奇特的，就是他們未曾將美國的

神怪策略——權力之分立、牽制和均衡——探入他們的憲法中。然而即或沒有這種憲法規定，他們也覺得憑借複決，用它爲中央和地方各種政治車輛之制動機，他們時常能設法保障他們自己。

創制增補案，比較已經聯邦議會通過的普通增補案，更能吸引參加投票者，大約因爲它們通常是關於各方面爭持難決的問題。誠然，前者必須由五萬選民聯名申請，始能提出，但此項人數，不到目前選民百分之五；但一個較小而活動的少數，就能設法用這個策略，譬如以八五·三百分比參加人數打破最高記錄的徵收資本稅的提案，就是以這種方式，訴諸瑞士人民者。

然而以均數而論，由複決申請書而訴諸選民的普通立法案件，比較創制增補案更能吸引興趣。爲要反對它們，『緘默者』乃全體出動。實在，這等議案，比一般憲法增補案時常並非尤爲扼要。一八九八年之鐵道國有法和一九〇七年之軍事法，就的確是這樣的。上文業已提說，最近關於勞工問題之重要法規，曾吸引極多選民。

除了包括世界戰爭的十年（一九〇八至一七年）唯一例外，關於訴諸瑞士全體人民之所有各類議案，平均參加人數，都佔近來在國議會的選舉上所記錄的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在最近十年中（一九一八至一七年），其均數高過自一八八七年以來任何時期，這似乎是一種滿意的證據——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經它處理的極多問題的時候——現代的選民，在運行直接立法的工具上，並未發生厭倦。同各階級的思想領袖之接談，證實了上面的結論：在他們中間，常作的評語，就是，因着創制和複決，在瑞士他們不必組織政黨和運動代表之選舉，也能進行政治活動（politisk bevilien）。

聯邦創制和複決，對於瑞士人民，有一種極其有效的統一和教育影響，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兩種制度，現在都有相當的歷史，而且有了很頻繁的運用，所以它們成了人民生活習慣。既然是全國選民同時參加的事情，所以它們所具有某引人入勝的力量，連國議會的普選都望塵莫及。後者雖是在一天之內完結的，但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它現在是一樁州的事件，州既爲其選區，故每一州構成了一個所謂單獨的區分。在這種情形之下，它有某種州的權利而沒有全國的性質。不論如何，新國議會未成立以前的選舉運動，比起美國總統選舉之熱烈和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是不可同年而語的。如欲將在兩人中間，擇一在華盛頓負起極關重要職務之非常集中的選舉中之緊張的情緒，注入關於一百九十八人赴白恩立法之渙散的選舉之中，當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瑞士創制和複決投票，恰正有這種緊張的性質。這是一件以『是』或『否』表決單一問題的事情，每爲非常重要的問題，能容意想不到的見解，而以熱烈的運動，爲先驅的。每一選民，從城市中富甲全國的銀行家到荒山裏赤貧的牧人，平等地參加；衆人的眼目，一旦集注於國家，像這樣，創制和複決，將人民融匯爲一單純的團體來表現好像盧梭所憧憬的普通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of which Rousseau dreamed*），他有這種憧憬，一方面因爲他是一位哲學家，另一方面因爲他是瑞士人。因爲聯邦創制和複決運動是普及全國的事情，所以它們一律協助地方的紛歧和敵對之尅制——對於包羅衆多人種、語言、地理和宗教差別的國家，這是極其重要的結果。它們充分培育國家的思想、愛國的精神，使擁護州權者不寒而慄了。照這樣，岡熱荷德銳維（*Conzague de Reynold*）論列一八七四年以來直接民主主義之影響時，稱說『沒有暴烈的震蕩，憑借合法的手段，聯邦的州是被拆毀了，

揭去一片瓦再一片瓦，挪開一塊石頭又一塊石頭。然而這個批評，顯然是單方面的，因為權力集中在今日已席捲全世，就連純粹議會制的國家也都難免；兼之，瑞士西部和天主教各州，常聯為一體，憑借複決推翻凡能增加聯邦政府的權力之方案。

而且，創制和複決，使個人覺悟他不僅是國家的百姓，他也是一個公民，所以在政治方面，他必須同他人合作。這樣，它們暫時將一個人從私人和地方生活之狹隘的關注中牽出來，而發展他的較高的人格，教育他的思想盡力為全體人民謀福利。自然，創制和複決之運用，也附帶若干流弊，主要的是有些問題所包含的特有的困難，次要的是時間和金錢之耗費，雖在儉約的瑞士人，最後一點是無關輕重的。然而經過各方面的考慮之後，直接立法之在瑞士，其利益是遠超其流弊的。

在上面所提說的『緘默者』的態度中，顯有少許滑稽；但在它的後面，埋伏着一個有意義的事實，就是瑞士選民確實覺得他在瑞士是主人。有時他或者是自私而短視的，倘使如此，他知道他必須負擔賠償。在其他的時候，他或者是遠視而公平的，但仍然懷疑他的行為之結果。像這樣創制和複決，在民衆中，培育了一個責任意識，甚至某項哲學的態度。日內瓦大學校長，雷帕德（Rappard）博士，用他得自民間的答語，顯證瑞士人民多疑的態度，這是一九二〇年，瑞士剛從複決決定加入國聯以後的話——以直接民衆投票來作這偉大的決定的舉世唯一國家。適在一個意見不一致的州中，在客棧裏，他問一羣農人對於所採取的行動有何感想。他們將這事情忖度着，嚴肅地吸着菸，且不作聲。最後一位花白鬍髯老者，將菸管從他嘴上移去，回答說：『博士先生，這種事情是要用一百

年來決定』。不問憑着民衆的表決所應付的問題是渺小，而暫時的或像國聯的事件，結果重大而久遠，爲應付它顯然有相同的樂意，而且，一旦表決了，就讓該項決定，有一番公允的嘗試，直到能以法律予以改更。考慮瑞士人要治理自己之不可克服的決心——是禍是福概置之度外——創制和複決，似乎是特爲他們定製的，正如他們似乎是完全適宜運行直接立法之這些工具的。必然，在培育對民主主義的愛護，卽瑞士人一切忠貞之首，沒有其他因子，比創制和複決更有效了。

#### 全民大會政治的方面 (Landsgemeinden, Political Aspects)

在瑞士民治的制度中，全民大會所吸引之注意，差堪與創制和複決相比擬。但在實際的重要上，它們是遠遜於後者的。聯邦創議和複決，是由全國選民投票表決的；此外更有許多州和地方問題，是用這種直接立法的程序所處理的。由銳現在既已改爲代表制的政府之後，五個純粹民治的州的人口，已降爲全國人口百分之四以下了。並且，超出純粹地方重要的問題，是很少提出於全民大會的。然而在它們的古風和儀式的輝煌上，這些爲他們自己立法的人民，每年的大會，全瑞士人民對之，無不感覺濃厚的興趣。全國各報，無不詳載其會議情形；由他州而來的愛國巡禮者，常參加該會。全民大會，雖在地域上和在構成的分子上，都是條頓民族的原始 (Teutonic in origin)，但一件令人奇怪的事實，乃是沒有旁的地方，比西南羅曼斯語的各部 (The Romance sections of the west and south) 對於它們有更高的景仰。這個情操，根本由於對純粹民主主義之理論的輸誠，而此項熱忱，並不因法、

意語的各州，只有代表的制度而稍減。在羅曼斯語的各州和全民大會各州之間，也有一種精神的血統，既然兩者都是瑞士所謂堅強的聯邦論者（strong “federalist” in the Swiss sense），意即反對將權力集中於白恩政府之手。

全民大會原有的儀式和情操價值，是極其煥赫的，所以我們將於下面第十二章內，將它們詳加論列。然而在政治的立場，民衆立法會議是難免有各種缺點的。這些缺點，在於由銳一九二八年所舉行的全民大會中，都到了潰爛不可救藥的地步了，其結果使人民自己，不得不對一種導源於一三三三年的傳統制度，表決割愛了。這件政治的自殺事例，在瑞士全國中，惹起了極大的興趣。雖其他五個尚存的全民會議州，未步由銳之後塵，但在其多數中流行着相同的情形，因此在威廉退爾州（canton of Wilhelm Tell）所提出的正反兩面的辯論，具有非常的意義。

由銳像多數內地的州一樣，在宗教信仰上，幾乎是清一色天主教信徒，而在政治上是保守的。然而獨立民主黨，於一九二五年全民大會中，居然奪取了該州在邦議會中兩席之一。天主教保守黨，對於這一次意想不到的敗北，不勝驚愕之至，所以曾用盡心血，想於次年挽回民衆的心志。經過一九二六年的失敗之後，他仍不氣餒，復於翌年再接再厲他謀挽頹勢。據說它的教士和教友中，從事政治運動者，在這種企圖中，都是無孔不入的，傾其全力來馴服其選民，雖用恫嚇或強迫手段，亦所不惜，倘使男子不易就範，乃從其虔敬的妻子或其他異性的親眷入手，務求達到最後目的。並且，該黨所費於運動投票之款項，也顯然超出尋常，用此款租賃了各種車輛，迎接其選民參加

全民大會。自然，後項行爲，在其他國家中，是不大以爲是道德敗落之證據的，它在本雪汎尼亞和甚至在斯瓦史摩爾選舉中，是難於激惹注意的。這種運動的行爲，在瑞士雖非絕無僅有，但是比較很少的，並且是被人看爲越軌行動的，特別是像一九二七年，它在阿爾特多弗（Altendorf）所流行的過甚的情形。然而我們奇怪，獨立民主黨爲何不一方面以道德的正義，向天主教保守黨獨佔所有的車輛，請其黨員免費乘坐之事實提出抗議，而在另一方面，從呂賽爾輸入幾輛公用汽車爲他們自己之用。

比請選民坐汽車不知還要壞到若干倍的政治的陋習，據說是由和善而實際的政客，對許多窮苦選民爲貼補各人的川資，所贈予從兩個到四個佛郎的小款。在一九二七年的全民大會中，天主教黨務工作人員，被人檢舉以十個至二十個佛郎津貼其遠道的選民。這種捐贈，俗稱“*Rückvergütungen*”——譯者按卽賠款之意——在瑞士是時有所聞的，但許多純潔的政治家，都以它們爲可鄙，堅決認定它們是賄賂，而非榮譽的賠款。對於上文所提出的種種陋習，不論有甚麼道德的裁判，但使一九二七年的全民大會，有破天荒的近四千到會人民的記錄，就全靠它們的運用和臨近判決最後勝負的日期之知識。然而在這番鏖戰收兵之後——意卽在三十四位雄辯家盡情發揮了他們的兩位候選人之美德以後——大家發見天主教保守黨，恢復它在邦議會中失掉的議席所憑借的多數，僅比對方多過三四百票而已，所以它的成功是很微倖的了。

頗爲顯明的，是一九二七年全民大會中的政黨的鬭爭，對於後來的革命，乃是其際遇而非其原因。它所揭示者，爲久已在醞釀中的地方的仇視，以及純粹民主主義碰着這種仇視的時候之一籌莫展的情形。不論如何，對於

全民會議的評擊馬上猖獗了；要求全體人民自己於下屆全民大會，將它廢除之請願書，立即有了一千七百八十三人之連署。

爲反對這古老的制度，所提出的諸種理由中，最有效的理由，乃是以舉手表決爲根據者。據說許多公民，在司鐸、政客、雇主和其他有勢力的人跟前，在全民大會中所表現者，乃恐懼而非深信。另有一種較不動聽的理由，但也爲爭執之焦點，即距離阿爾特多弗城較遠的居民，要參加每年在離該城三哩的波特林丹（Bozinger）草原的大會，覺得太難或太費錢。爾色潤上谷的居民，特別對於這一點深致不滿；並且，他們是遲至一四一〇年始被併入該州的，而對於地方事件，有他們自己的全民大會可以解決，據說他們對於下谷的公民，雖無仇意也覺生疏。在交通便利的現代鐵道、公共汽車和改進過的公路，使人難以相信距離乃是不能參加全民大會之正當的理由，特別是想到前幾世紀中所謂公路，不啻羊腸鳥道，而出席大會者，反甚踴躍。顯然爲保持民衆主權而用過力或吃過苦者，乃更能欣賞民衆主權者。至於說全民大會，是被有辯才者所操縱的，所以沒有一定的方針，這也是一種卑卑不足道的理由。就一般情形而論，它們是頗難感動的；並且，代表制的議會，時常是捉摸不定的，而且容易被比辯才更壞的勢力所動搖。

在另一方面，有一種很有力的爭論，以爲某種人數增加很快的階級，實際上在全民大會之下，是沒有選舉權的，因爲他們不能全大離開工作去參加它。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之間，在由銳進行的政治討論之後面，顯然醞釀着很廣泛的經濟變遷。在十九世紀之始，該州是一個獨立的小天下，幾乎是外面的世界所影響不到的，它



的人民，在種族上、宗教信仰上和經濟的狀況上，是非常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從事於農業和牧畜的。於是有了格提哈爾德山道（Gottard Pass）之改進（一八二〇——三〇年），著名的亞克森山道（Axonsberg）之修築（一八六〇——七〇年），經過奧柏拉浦（Oberalp）、芬爾克（Furka）和柯羅生（Klausen）的公路之建築（一八九三——九八年），而最關重要的，乃是格提哈爾德鐵道（一八七二——八二年），經過這一切商業流入了該州。跟着商業而來的爲工業，後者是被利用山中瀑流的龐大水力發電廠所促進的。目前從事於農業者，不過其人口之三分之一了。商業和工業，僱用了三九百分比，交通一五百分比，後者包括許多屬於社會黨政府鐵道僱員。特別是爲後者的利益起見，纔有不平之鳴，以爲全民大會的制度，實際上使他們不能在州的政治上，運用他們的勢力。

爲補救上面所謂一切缺陷起見，有人提議祕密投票，在每自治區內設一投票場所，以強制的複決，使民衆能制約代表他們的立法機關。我們想起山銳的獨立民主黨，在一九二七年之敗北，就不難了解他們爲甚麼要傾全力來反對全民會議了。然而令人不解的，乃是天主教保守黨爲什麼不維持它。他們的黨議會，爲什麼讓其黨員們對於全民大會存廢的問題，自作主張（Timminthalbe）呢？但是同該黨有極切關係的州農民協會的代表大會（delegate assembly of the cantonal Peasants' Union）宣言贊成廢除。社會主義者一貫的政策，把全民大會看爲霉爛的中古的遺骸，完全不適於印刷機、鐵道、電報和工廠之時代。擁護該制者，以其六百餘年歷史的遺產，其儀式之美麗，在國外之令譽，以及自由人民每年會集一次，以謀直接自治之高貴的景象，爲其辯護。但在一九二八

年五月六日星期日之全民大會中，一切希望盡成泡影了，因為該州的公民，都意識到此番或為最後一次的大會，所以到的人數特別多，在例行的事務處理全畢之後，在天主教保守黨上年獲選為邦議會議員的兩人被連選之後，和在關於當前的大問題之簡短的辯論之後，它遂被付諸舉手表決；其結果，為由銳之大多數公民，在會場之右的保守黨，和在其左之過激黨，都默許了他們自己的禪位。但在前者中，有一個堅固的布洛克，司卡正托山間農民（*mountain peasants of Schiichental*），他們堅決擁護着古老的傳統。

從此以後，由銳的選民，就可在祕密中投他們的票了，不再被司鐸、政客、雇主和鄰居們的監視所攪擾了。關於因着一九二八年的改革，行將產生的政黨形勢之消長，現在尚說不定。天主教保守黨，倘使預料他們將因此失勢，他們必定會盡力反對它的；必然，獨立民主黨所以贊成它，也因為他們希望在祕密中比較公開，能得更多的票數。兩黨中必然有一黨會失望的，倘使他們的勢力毫無增減，他們就都要失望了。

反對全民大會者，雖曾注重住在遠地的公民難於赴會之理由，但在各自自治區設立投票處，以後投票者的人數，能否增加，尚待事實證明。在全民大會中，關於確實到會人數，已往除非在非常情形之下，未曾計數過。但是，到會平均人數之估計，必定是不大會錯的，於一九〇四年所發表者如下：阿布瓦特恩（*Obwalden*），二五至三八百分比；由銳，三六百分比；古乃熱斯，四八百分比；外阿彭色爾（*Appenzell-Exterior*），六三至七九百分比；內阿彭色爾（*Appenzell-Interior*），七七百分比；尼德瓦特恩（*Nidwalden*），七九百分比。大概可說較小的州有較高的百分數，而根據這個事實，可以證明因路遠而妨礙到會之主張。並且全民大會平均到會人數，在大多數州參加國議會選

舉之平均人數之下，這也是真確的事實。然而關於後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在純粹民治的各州中，在聯邦選舉的統計上，沒有一州是列在前茅的。它們的人民，對於地方政治之熱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且，在它們的大多數中，都有一個全國的政黨擁絕大的勢力，因此許多選民對於聯邦選舉，不大感覺興趣。例如尼德瓦特恩和內阿彭色爾的人民，參加全民大會者，超過參加白恩代表之選舉者；在阿布瓦特恩、由銳和外阿彭色爾，對於兩者之人數，約略相等；僅在古乃熱斯，對聯邦選舉有顯著的優勢。所以倘使由銳繼續和從前一樣，為選舉州議員所投的票數，也許不會超過往日在波持林開會為自己立法的人數。即或比從前人數較少，仍然會有人代為申辯說，因為秘密投票，所以更為真摯，為民意之更誠實的表現。在理論上，或者，參加投票的人數，應當增多，因在新制之下，沒有選民須奔波遠路以赴投票場所，填寫選舉票而投入票匣，也不須費很多時間。但其過程與全民大會，比絕沒有那樣興奮，或那樣如畫的景象，或那樣同全鄉鄰人團集之親切。

以上所論列，僅限於各全民大會之平均到會人數。然而非常的際遇，吸引非常衆多的參加者，這是全民大會同各項選舉之共通的情形。在瑞士歷史上，有許多非常的際遇，在當時所行的全民大會，都曾在實際上吸引了一州全體男子，和大部分婦女小孩參加旁聽。在正常情形之下，有三千人赴阿爾特多弗參加大會，已算了不起了；但最後兩次大會，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極端興奮之中，參加者人數之衆多，可謂破從來之記錄，據估計約四千之多。在最後一次，因須決定出席邦議會的一名議員之選舉，曾計數到會人之確數為三千七百九十六人。該州一九二八年選民登記總數，既為五千九百三十一人，所以前項人數，表示選民中有六四百分比參加了該次大

會，或遠超同年赴票櫃選舉該州之一國會議員之人數，爲此僅有選民二千七百五十一人參加，或僅四六·四百分比出席了。

一九二八年在靠近司坦史 (Stans) 之威爾 (Will) 召集的尼德瓦特恩 全民大會，也曾有過非常衆多的參加者。這一次的吸引力，乃是由旅館主人和其他膽敢觸犯教會禁忌的罪人 (Moral Heretics) 所提出的准許人民於全年三個禮拜日中跳舞之法律草案。自然，這個提案是被教士、虔敬的信徒和一般老年人，所極力反對的。辯論是由一位有喜色喜意的旅館主人 (Boniface) 唱開場白的，他指着教士所發的一段彬彬有禮而毫不示弱的演詞，引起了喧嘩的彩聲。一位相貌顯示農民血統的青年教士，籲請他們維護本土之田園的和平，而保持主日 (Lord's day) 之神聖，以便保障人民之道德。一位謹慎而殷勤的農民問：『倘使該項法律草案被通過，禮拜日有誰擠牛奶？』但那天出色的演說，是一位鄉村牧師所發表的，他的慈善事業尤其是在戰事中對軍士們之救濟，是爲衆人所景仰的。『你們在這裏所看見的』，他說，『乃是在唯物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古老的鬭爭。爲着幾個金錢，鄉間的和平和家庭生活的聯繫，要被破壞了。你們自己去看城市居民禮拜日的行爲。在你們中間；你們歡喜有那種事情嗎？尼德瓦特恩 的人民，你們不應該因貪圖蠅頭微利，而負着出賣你們的禮拜日之罪名』。

跟着有他人發表的演說，有的是由誠樸的農民所發表的，他們在這種場合，以驚人的力量和明敏，侃侃而言，毫無顧忌。就演講而言，反對禮拜日跳舞者佔了優勢；但在表決時，雖富於經驗的計數者 (teller)，也不能決定究竟那一方面勝利了。第二次伸手表決，好像提案失敗了；但因兩方面人數相差太微了，所以州長 (Landman)

出面干涉，而發出號令：『凡贊成提案者，脫出會場而站在通莫陵（Monlin）之道上；凡反對提案者，站在通司坦史之道上』。過了半小時各招待員（huissiers）纔將兩個行列的人數，點數清楚了。最後在森巴其戰場（Champ of Sempach）上所用之軍號響了；公民們一聽號聲，遂返回圍場來了，而結果被宣布了——贊成者一千一百三十六人和反對者一千一百零九人。算學常常是使人頭痛的；但當時之總票數二千二百四十五，爲該州三千七百二十八有資格的選民之六〇·二百分比，同年參加國議會選舉之祕密投票者，僅八百五十二人或全體選民之二二·九百分比。

在局外人的立場，對於時常是瑞士民衆大會最如畫的景象之由銳全民大會而記述其消滅，令人不勝悽愴之感，同時也不能不希望——或者是種感情用事的希望——五個存留着的純民治的州要把它們古老的制度抓牢纔好。局內人自然對此有一種約略不同的見解。在他們沒有像旁觀者，對於民主觀念之一種古老的、彩色的、栩栩如生的表演，這是看了一回之後終身不能忘懷的事件。他們並不以爲他們自己是一幕驚人的戲劇中之演員，而只把他們自己，看爲單簡的公民從事於例行公事之處理，選舉行政官吏和法官，表決他們所必須納的賦稅，或他們所必須服從的法律，而履行這一切事情，都是依照某種傳統方式的。倘使該種方式，在他們看來是累贅的，或易被不正當的勢力所敗壞，他們就必須——雖有在反面的情緒、傳統或如畫的景象之種種顧念——行使『人民之權利，去把它加以改革或廢止，而建立一種新的政府……以某種方式組織其權力，務使它最有裨於他們的安和幸福』。

## 市民大會 (Town Meetings)

全民大會一半因着它們的主權性質，它們的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儀式，從國內外的人士，受了稍微過分的注意。在另一方面，全瑞士較小的各自治區，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的市民大會，頗被一般人所忽略，這或者是因為它們的附屬的性質和它們所處理的事務之平凡的性質。但是市民大會之古老和直接民治的精神，是不亞於全民大會的；並且，在參加人數和政治活動之綜合的數量上，它們是遠駕於後者之上的。

瑞士各大城市，由於人口繼續增高，就不得不採行代表的政府制度，而時常運用創制和複決以爲其調劑。在較小的自治區內——包括三千零三個單位佔全國極大多數——市民大會的制度仍然通行。因爲在憲法上方自治的法規，是由州所施行的，所以在全國各處，對於兩種制度間之權限，是劃分清楚的；例如在物德各自治區，人口在八百以上者，可設市政會議 (municipal councils)，而在提省諾則須超過三千人，方能有此種設置。以時間而論，後一制度是比較新近產生的。例如直到一八九五年，提省諾的議會纔通過該項制度，而到現在僅有六個市鎮：路格羅、貝林若拉 (Bellinzona)、羅卡諾 (Locarno)、其亞所 (Chiasso)、門最學 (Mendrisio) 和比亞士 (Biasso) 曾接受了市議會的制度，其餘二百五十五自治區，其人口佔全州七五百分比，仍存留在地方純粹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的。

市民大會，照例每年開常會一次，遇有特別事故，得召集臨時會議。在白恩及其鄰近各州，通常開會的日期是

遲至十二月的大抵是因為它們所處理的事件，多數具有財政的性質之原故。因為當那嚴冬的季節時時風雪交加，必須利用公所之大所 (largest hall in the Gemeindefauns) 或借村中客棧以開會。然提省諾的制度規定每年開市民大會三次，第一、二兩次是在一月和五月之間召集的專門討論自治區的各項開支，第三次在十二月為通過下年度的預算。市長 (Gemeindepräsident, Maire or Syndic, Sindaco) 為一切常會和臨時會之主席，市書記和其他官吏，也必須出席報告和回答市民所發的問題。

在有市民大會的一切自治區中，後者的權力頗為廣泛，除上文所指關於財政事件之外，並包括地方警察和消防、學校、公路、路燈以及救濟事業。它們的職掌在性質上既如此蕪雜，包括報告正式帳目和公共文件，所以這些民衆大會之程序，就難免不使人懶懶欲睡了。然而對於一件或多件重要事情，公民們也常有派別的爭持，其間就有不少自由、活潑和普遍的討論了。也許也有村中失意的政客 (village sordheids)，到會故意將其滿腹牢騷向區中各父老盡情發洩，他們是以本地方言的音調再加各種平凡的和粗俗的鄉下人的土話，淋漓痛快暢所欲言。例如漢司烏里 (Hans Uhl) 纔被選為市行政都 (Gemeindent) 代表之後，就馬上發見其職務，包括靜聽與他有嫌隙的富農之痛罵，在一大篇不入耳的冷嘲熱笑之後，並大喊：『你給我滾出去；回去種你的白菜罷，不要把你的大吹大擂的提議和決議，來糟蹋了我們的時間。我們不論如何，都比你這種窮措大高明的多』。雖然這段插話是虛構的，但這種傳奇，必定是以事實為基礎的。

在上文所列舉行政的職務之外，瑞士市民大會，也是立法的機關，因此必須通過關於全市之章程條例。照例

它們必須選舉下年度的市政官吏，雖在幾州中，因不滿於公開選舉的制度，曾以明文規定該項官吏必須用祕密票選。不論通行的是何種選舉方法，其通常的結果，乃是在職者只要無心去職，就總會被連舉而連任的。然而間或也有一番關於全國的黨派之熱烈的競選。例如一九二八年在華爾本（Worben）——白恩州，本地的社會黨宣稱他們不滿於他們在行政部（Gemeinderat）中所有之兩席，要求增加他們的代表人數。這項要求，在保守的公民們眼中似乎太過了，所以他們全體出動參加市民大會，而不顧一切地完全照着他們自己的意思，選舉了一個新行政部。

在如像上面所說非常事變之中，出席市民大會者，可以包括所有健壯的男性公民。在平常性質之常會中，到會者僅僅能湊過半數甚至還要少點，僅有較為熱心的選民纔肯出席參加。關於這一點，沒有現成的統計；但根據在州報上所發表的一般報告，有資格的選民中三分之二的參加就算不錯了。公民教科書和有心人之苦口的勸勉，時常不肯放鬆市民大會決議案之重要性——事實上，他們對這一點是完全不錯的——歸根勸勉公民們一定要準時出席市民大會。

我們必須記得，除了市自治區或居民自治區（Einwohnergemeinden），後者乃是它們通常的稱呼，因為它們是各種自治區中之最重要者，所以上文的討論，是完全以它們為對象的，但在瑞士，他部尚有別種自治區：公民自治區（Bürgergemeinden）專門注意公地、森林和草原學務自治區，其職務在選舉教員、學董和視學；以及教會自治區，其職務在選舉牧師、教會董事（Kirchenvorsteherschaft）、教會司庫（Kirchenfondspfleger）、教區代表和



賑濟委員會委員。公民自治區、學務自治區和教會自治區，同市自治區一樣關於重要事務之處理，必須會員出席其會議，所以凡隸屬於這一切自治區的公民，而不被這一首笨拙的日爾曼拉丁語打油詩（German Latin dog-geral rhyme）所感動，就必須消費很多時間和思想於地方的事務：

Wer dient der Gemeinde

Et similibus horum,

Der hat Undank

In fine laborum.

意謂，凡爲本市和類似的公務効力者，在他的一番辛苦之後，是沒有人會謝謝他的。

居住在德語的各州之瑞士作家，頗歡喜誇獎他們自己的自治區，比較該國羅曼斯部分（Romance sections）之自治區，有更高的地方的獨立。

前者曾保持了日爾曼的傲慢，而看它們自己如同小國一樣，因此對集體的州成了對立的形勢；後者從州制取得它們一切權利，而僅以它們自己爲州之政治的區域。

觀察瑞士地方自治的狀況之後，使人覺得這種說法未免過甚其詞；至少可以說羅曼斯部分之自治區十分認真看重它們自己，它們的職務，尤其是它們的權利——以提省諾爲例，其自治區，每年要準期舉行市民大會有三次之多。在另一方面，誠然，地方的獨立，是被東瑞士的市民大會，推進到極端了。在傳統上，苦羅笨敦，即以複決之

發祥地自豪的地方，對於其罕普敦十村（Village Hamlets）之獨立應得第一獎，但它又常被入譏爲剛愎自用。在該州之二百二十二自治區中之市民大會，有最廣大的自治權力；此外更有若干區（Kraze），每區是以一個單獨的山谷爲其領域的，谷中人民，開全民大會，以處理其共同利益。聯邦的政治家，對於這許多地方團體，必須照顧周到，而調停其間之衝突，他們處境之難，蓋可想見。『這誠然是一所訓練獨立和民主主義之優良的學府』，他們內中有一位曾向著者這樣講，『但是，被一個以獨立意志稱著於世的人民所經營，這個制度的本身，就發生了弊病。在這自治的濃霧中，對於整個國家的利益，怎樣能殼不漠忽。』

平常市民大會所激起的，雖是純粹地方的興趣（且說，關於它們的新聞，不同全民大會，在一般報紙上從未發載過），在廣汎的政治意義上，它們的重要和意義，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就以純粹業務的眼光來看，它們每年所用的款項之總數是頗可觀的。而且，該國的踏實的進步之一大部分，不得不歸功於它們前進的政策，和在執行地方公務上之嚴格的節儉。

然而，政治學家所最感興趣者，乃是市民大會之教育的影響。它們赫林地證實了孟德斯鳩常被入引用的格言，『公民之地方的集會構成了自由國家之力量。市政制度之有裨於自由，亦猶之乎小學之有補於科學；它們將它送到人民的門前；它們教人們以應用和享樂它的方法』。在美國，如一般人所熟知，紐英格蘭的市民大會（Common England town meeting）業已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種影響，已漫延於北美各聯邦（commonwealths）了。美國人快意地接受如像白賈士勳爵所作那樣的評語，他指它爲『自治之在現代任何國家中，最完美的學府』。雖

然，紐英格蘭之市民大會在地理的意義上，是有顯明的限制的。倘使中部和南部大西洋殖民地也有過同樣基本的制度，我們只能懸揣在美國政治制上和在美國人的生活上將會發生何種影響。將最上級加於完全之上或爲語言潔淨家所不取；然而瑞士人與美國人，較從市民大會所獲得自治訓練是的確多多了。他們受過更長久的教育，因爲該項制度，是他們本地的風光，而且在他們的歷史有了深遠的根柢。並且，它的勢力，不同在美國，未被地理所限制，因爲市民大會不僅存在於聯邦之德語的核心，並也存在於較近獲得的法語和意語各州。在沒有國家軍隊和公立學校很早以前，市民大會對於瑞士的良善人民，就已經賦予了他們大家所能參與的共同經驗，而除了都市的居民外，他們仍然在分享着這種經驗。它或者比全民大會對於自治和政治領袖之培植，是一種更好的訓練，不只因爲它包括全國更多人口之參與，也因爲它所處理的事務，他自己的鄉村的事務，對於普通人，是更切近而更易了解的。我們可以採用瑞士人自己的表白說：市民大會乃是他們的地方自治制度之偉大的初等學校，而全民大會，乃是其中等學校（*Mittelschulen*）。並且，記住了，如希士（*Hiss*）教授所指示，自治區之整個結構，自古以來，就是民治的之一事實，就更容易了解在更生期中（一八三〇——四八年）瑞士政治之前進的運動，以及其後種種民衆的制度之勝利，包括制制和複決，它們是由聯邦政府以一八四八年之憲法所制定的。

對於官吏之選舉——聯邦的、州的和地方的，在該國之某幾部分，後者包括教員和牧師；對於制制和複決的方案之決定——也包括聯邦的、州的和地方的；在較小的地方，對於市民大會；在許多區內，對於全民大會和對於五個存留的獨立的全民大會，瑞士人民所必須參加的表決，可謂多了。他們的確避免了美國人民所負擔的一個

重擔——直接初選 (direct primary)——因為對於他們提出候選人名單一節，是由地方政黨大會所主持的。在另一方面，活動的黨員，每年必須選舉代表出席聯邦的、州的、有時甚至於區的黨務會議。關於政治就高於人民的這許多不同的方式，在其整個體系上，對於成人之公民訓練，必然構成了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因為它們是最常用的原故——或者應當改爲『爲成年的男子』。因為他們時常必須關於公共的事情發表他們的意見，所以任何社會階級的聰明的瑞士公民，就不得不對政治發生相當的興趣了。赴該國考察政治的外人同其人民談論政治時，馬上就會覺察他們所表現的很高的興趣，這是前者在瑞士所獲的熟稔的印象。

頻繁的選舉和複決的參加之另一顯著的結果，是瑞士人頗少看政府爲主人之傾向；他們將它看爲一種經理人，自然是一種有專門訓練和普通可信託的經理人，而在該項資格上，應予相當尊重的，但不過是一種經理人，必須遵照聯邦和州的憲法之規定，以執行其業務者，並且對於憲法未經規定的事務，他必須時常向人民請示辦法。然而經理人們，不論有怎樣專門訓練和普通誠信，總不會完全沒有過失，過失一經發見，可由複決加以糾正，這種糾正，有時是十分嚴厲的。自然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經理人或者是對的，而選民卻弄錯了；雖然，後者之意旨終歸佔優勢，而前者只得認輸。關於這樣的處理之最希奇的一點，乃是既經推翻一種立法的方案之後，選民們又並無絲毫的意思要處分立法者；顯然，他們覺得這不過是一樁糾正僕役之小過失的事件而已，並不是一件懲戒或打倒一個兇險的主人之事件。在這個態度的後面，乃是自由的人類之政治觀，酷似古時希臘人的政治觀，後者是瑞士人之政治範本。他們的遠觀程度之高超，使他們頗能不以爲政府是極神聖不可侵犯的、無所不知的、或無所不

能的。他們怎樣能設爲神靈的眼光來看一種制度，其主要因子，乃是他們大家所不能避免的有限的壽命（*common mortality*）。

瑞士政府，除選舉外，另有其他方法，對人民之公民訓練作直接和間接的貢獻——利用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利用軍隊的制度；利用社會保險；利用勞工和產業法規；利用極多爲地方、州和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營業，自一八九八年以來，結晶於偉大的聯邦鐵道制，其設備和方法遍全國沒有不是一致的。在它一切活動上，其性質或以經濟爲主或以政治爲主，一概是弊絕風清而效率高超。例外是稀有的，我們雖可聽見私販苦艾酒（*absinth*），唯一被禁的酒類之稀疏的案件，以及稍微較多的漏稅走私的案件。或者瑞士政府教授瑞士人民的最有價值的一課，乃是關於法出必行之教訓。政治上沒有營私舞弊的事，乃是一個極大道德的勢力，雖然我們頗喜將它看爲全體人民的誠實之結果，絕對不是先由居高位而擁大權的顯官所發展的一種卓絕的倫理綱常，然後被低微下賤的小民所摹倣的。

## 第六章 政府的職務：文職和武職 (Government Service, Civil and Military)

### 瑞士的文職 (The Swiss Civil Service)

瑞士同其他現代的國家一樣，曾目睹其行政職務之巨大的擴充。一八四八年之建國元老們，是極儉約的；而且，他們惟恐新的聯邦政府之肇端即有太多的官吏，將招致各州之嫉妬。不意，後者之俸給是很微薄的，幾乎近似刻薄。當時在各州中有相似的情形。其後二十五年中，曾有過很大的擴充，一八七四年修正憲法之結果，使聯邦範圍以內之擴充，大增其速度了。同時各州和各地方行政，也有要求添設新職和改進原有職務之呼籲，而此種呼籲又從未被拒絕過。

早在前世紀六十幾年的時候，在瑞士公民之較低的中等階級中，就業已發展了一種贊成公有制度 (public ownership) 的熱烈傾向。在當時，而實在其後二十年中，社會主義的學說還太嫩弱，所以對於這個傾向之側重，是無能為力的。在另一方面，後者之力量，半由於一般小本營生的商人深恐被大規模的企業所淘汰而有的團結。另有一個更有力的要素，其政治的性質較多於其經濟的性質。本書第一、二章已令讀者注意瑞士各色人等的一種共通的特性，即對於一人權力 (one-man power) 之劇烈的反對。同此種特性有密切聯繫者乃為深恐大

企業將執政治之霸權，而顛覆了民治的性質之心理。爲提防任何這類事件之發生，地方和州被慫恿收買和經營獨佔的企業，例如自來水、煤氣和電氣工廠以及電車。一半也因爲要對於龐大資本主義的事業，預先堵塞其門徑，所以有大量民衆的贊助，早已在推進各種合作事業——消費合作社、建築和借款社（*Building and Loan Societies*）、農民合作社等等。但是，自然，朝向文職的增益之最重要的一步，乃是本世紀之第一個十年中全國各主要鐵道之被收歸國有。大約在同時，有一個強盛的社會黨組織之出世，使公有制的運動，獲得了一個新的動量；然而在社會主義的宣傳，尙未加入的時候，它已經贏得了許多顯赫的成功，這個事實是不能抹煞的。

上面略舉的各種發展之結果，瑞士公務員人數之增加，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因此在決定各種黨爭上，他們居然是舉足輕重的了。在一八七五和一九二五年之間，全國人口雖僅增加了四三·一百分比，而公務員階級卻增加了八一·一百分比了。在一八七五年白恩中央行政大小各機關所任用公務員之總數，爲八百零七人；在一九二五年其總數爲七千三百五十八人。在一八四八年，聯邦政府所管轄的最大公務機關——郵政和電報——所僱用的人員不到二千五百人；在一九一四年，它們的人員之增加，已超過兩萬之總人數，此項數字到現在，尙無大變動。國有制的運動開始的時候（一九〇〇年），鐵道僱員之平均數，約三萬人，在一九二〇年達到了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七人之最高數。自從該年以後，其僱員之總數，減少了七千之譜，雖其貨車和客車之業務年有增加，倘使我們注意到從各種汽車而來的日趨猛烈的競爭，後者的發展尤其難能可貴。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各種公共運輸機關（包括州的、地方的和全國的）所雇用人員之總數，從四萬五千零九十一人，增加到七萬六千

二百二十九人；在普通公共行政上，從一萬三千五百零二人，增加到二萬六千零九十九人。這兩個集團的人數，合攏起來，就等於瑞士全國從事於生利職業的總人數百分之五有奇。所不幸者，戶口調查的數字，未分清屬於公家經營和私人經營煤氣廠、電力廠和自來水廠，但是按照普通常識，它們大致都是屬於州和地方所經營的。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二〇年之間，這些廠所僱用的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從一九〇〇年之六千零八十六人，增到一九二〇年之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七人。所有一切行政官吏和公務人員——聯邦、州和地方——之總數，根據一位現代作家，德爾之估計，爲十五萬三千人，或其全人口二十六分之一。在比較上，瑞士的公務人員之總數，比美國要超過三分之一，這個差數大致由於前者之鐵道已收歸國有，以及在公有的政策之一的進步。

瑞士公務人員雖說衆多，但依照其總人數同全國人口之比例而論，在政治上，他們實在不應該有像現在他們所有的這樣大的勢力。這種畸形的發展，一半可說是由於它的分子之平均的智力都很高；一半也因為他們時常從事於公務，所以他們比較一般普通公民，更熟悉政治的底蘊。然而，最要緊的原因，乃是他們仿照工會的形式所成立的極多組織，這些組織，照目前的估計，包含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公務員。中央政府的雇員所成立的一切工會最後集中於一個有力的聯邦公務員聯合會（*Volkerbund*）。這些組織，有一個勇敢的報紙，而且任用了極多專業的幹事。常聽人說，後者對於當事人的利益，是過分的熱心；但這樣的評語，是不大有價值的，因為全國幾乎沒有一個職業團體、雇工的團體或雇主的團體，不是在鉤心鬪角地擴充其勢力的。

依照聯邦憲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公務人員所成立的組織在其規程和細則上，皆不得包括罷工權利之規



定。有一次有很大的壓力加於他們，要強迫他們停止工作，就是在一九一八年總罷工的時期，極大多數工務人員，一致擁護政府，完全不爲所動。政府時常樂於承認公務員聯合會，而且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批准它們的請願，例如『高物價津貼』(the payment of 'high-price-increments')，意即物價增高時，薪水亦相當的提高。

然而，瑞士公務人員所操縱的政治的勢力之最顯著的例證，乃是這個階級在議會中所有代表之高比例。在國議會之本身，如第二章所說，他們的地位，只在律師之下，佔二二·二百分比的議席，而他們對全國人口之比例，尚不到百分之四。倘使不是因爲憲法的規定，不許聯邦官吏充任國議會之議員，上面的百分比，就必然會更大了。有些州的憲法或法律，也禁止公務員當選爲它們的議員，或市議會的議員，又或限制他們可以當選的人數。在各州之間，關於現任官吏，同時兼任本地議員之比例雖大相懸殊，然在沒有法律的限制之地方，該項比例時常是很可觀的，有時甚至超過他們在國議會中之比例。例如在白賽爾市區之大議會(Stadtl. Council of Baselsiedl.)中，一百三十位議員中，有四十四位或三三·七百分比是公務員，就中有八人是聯邦的雇員，其餘是州的雇員。但是居住在白賽爾的公務員之人數，尚不到該州的選民之一二·八百分比。

自然，公務員之兼充議員者，同其他職業團體之議員比較，不必是一定更多純粹代表他們自己的階級者。實在，公務員在瑞士的立法機關中所以能大露其頭角者，一半因爲被雇於私人營業的社會黨工人，覺得有礙他們的前程，或難於抽空來負擔地方或全國的議員之義務。顯然，公務員較少受這樣的限制；而且因爲他們大多數居住在都市中，所以在工人階級的團體中，常喜歡舉他們爲候選人。

對於瑞士文官職務之批評，雖不一而足，然而卻很少有極嚴重的性質。普通它被人指責爲太專權；某些杞憂的愛國者，惟恐長此以往，瑞士的民治國家（Volkstaat）行將變成官僚專橫的國家（Beamtenstaat）了。間或有趨於極端者，倡議取銷公務員之選舉權，但這個意見，在透澈浸潤於民治主義的人民中，實際上是不會有人贊成的。在另一方面，倡議限制選舉之受動的權利（意即被選舉之權利，特別是關於公務員被選爲議員之權利）者，在某些方面是有人贊成的。因爲他們被人看爲已經超過了他們應有的代表，所以一九二二年經創制所提出的准許取銷聯邦官吏兼任國會議員的限制之聯邦憲法增補案，雖被民衆投票否決了，不贊成該修正案的人民票數，爲二五七、四六九對一六〇、一八一，各州不贊成的票數，爲一七對五。

當世界大戰爆發之際，瑞士人民被迫同意了有名的全權決議案（*Einmütige Plenipotentiary resolution*），因此幾乎將專制獨裁的權力（*dictatorial powers*）賦予了他們行政的首領。然而，他們時常是將該決議案看作應付臨時事變的策略而已，同他們的民主主義的精神是抵觸的，而且僅在國家陷於極大危機之中，纔有存在之理由。一旦戰事終止，他們趕快就將所賦予聯邦行政委員會的非常的權力，逐一撤銷了。其後他又已顯露了對行政權力之一切照例的防範，例如一九二二年之創制，然而我們在下面將要提到他們這種態度，在五年以後，並未阻止關於改進公務人員待遇之重要的立法之通過。

批評瑞士行政官吏者，慣於區別選舉的官吏和任用的官吏，據說前者比較沒有官僚的習氣，而後者較易違逆他們所服役的人民，有時甚至以高不可攀的驕矜鄙視他們。至少聯邦政府之中央行政官吏，在同人民接觸上，

更常被指責具有這樣的官僚習氣。瑞士全國人民，不論是羅曼斯語的或日爾曼語的民族，對於這一般小官僚，都不無恨之刺骨，在提到他們的，都不約而同地帶着輕蔑的口氣。

據說官僚階級，不僅在行政上對待人民有專橫的嫌疑，並且，如上文所說，在立法上也壟斷了過分的權力，因此，將政治上行政和立法兩個大領域間之界線，衝破一半了。聯邦的和州的憲法，都以立法為最高權力，然而如像討論上項事件時，瑞士人一樣地慣於逞其詞鋒熱烈擁護三權鼎立——立法、行政和司法——同在美國崇奉孟德斯鳩著名定理者殊無二致。為補充上面的批評起見，有人埋怨說，一般小官僚們，憑借有組織的選舉的力量，能迫使他們自己大批地當選為議員，因此他們的上司為要獲得他們的好感，就不敢開罪於他們，於他們可以肆無忌憚，而官規也就無法維持了。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大多數關於瑞士官吏的武斷行為之論辯，都似乎頗為溫和。或者最普通的，乃是說他們關於某項服務徵費太高和關於違犯行政法規之小過失處罰太大；但是這樣的徵費和罰金，同其他國所通行的額數，相形之下，實在是算不了什麼的，所以外國的觀察者，喜歡拿這一個批評來作瑞士人的吝嗇之明證。

至於說到他們在執行行政法規上間或有的強硬和嚴厲態度，我們必須知道，就連在瑞士也有施展無恥、狡猾或委卸責任的手腕來對付官廳之公民。因為聯邦郵傳部，保留了黃色為它自己的公事車之用，於是惹起了私家運貨汽車之主人們咆哮的抗議；對於這種事件，我們也頗不願意隨聲附和地高喊『打倒壓迫民衆的官僚』之口號。

在帳簿的另一面，必須登入許多關於瑞士官廳很可稱讚的事件。第一，它雖未大規模地應用競爭考試制度，而居然幾乎能避免像美國的分職制固結的一切弊端。一般地說來，這種微倖的結果，是由於在大小各官職上所通行的長久的任期。誠然，聯邦行政官職之任命，一律是以三年爲一期的，但是蟬聯，差不多已成爲牢不可破的慣例了。關於增加工資、升遷和告老之法律，大致都以品性優良爲斷。然而，公務人員們，不喜歡三年任期的規定，而在營謀將它改爲與實際的慣例較爲近似的任期，意即六年或十年的任期或無限的任期。倘使瑞士的吏治，的確有吃虧的地方，它從太長的任期，比較從太短的任期所吃的虧更大。因爲沒有適當的養老金，所以公務人員，甚至在精力就衰之後，也只得勉強繼續服勞，自然不敢輕意脫其羈絆；而慈悲的上司，也只好聽其自然，不願悍然將其辭退，雖使吏治不振，或使年青的僱員們必須老等而苦無升進的機會，也顧不得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時而加諸其行政的老人政治之嘲弄（*taunt of senility*），其殘忍的成分，似乎多於幽默的成分。瑞士的吏治，甚至比它能脫卸職祿分職制還要可稱讚的，乃是它的透澈的誠實，這是各方面所公認的事實。個人盜用公款的案子，是極端稀少的；至於受賄的案子，幾乎是絕對沒有的。一旦發生了任何這類的事件，舉國就要嘩然，不特必定會受相當的刑罰，並且也要遭受社會普遍的摺斥。除透頂誠實以外，埋頭苦幹（*hard unerring industry*），誠然是不甚敏速，而具有例行故事的性質，但頗算守時，而不分晴雨寒暑，每天照例必到，毫不曠廢職務，這些就是其吏治之風範。總之，我們必須同意一位關於這個題材的新近作家之評語，他並不完全捧瑞士的吏治，但他卻承認『就全體而言，我們的官僚的羣，是完全值得頌揚的。它是誠實的，在它對民衆的待遇上，是正確的，並且樂意盡它

的職務。它似乎比較大多數國家的官僚，都要強的多。」

如上文所說，對於瑞士的官僚，並沒有攻擊他們有重大的誤用職權的地方，對於瑞士所以遲延設置像歐洲其他國家所已有的行政法庭的制度，這是最好的說明。這一點，如像許多種政治的改良一樣，各州先予以長久的實驗，然後聯邦纔開始採用。巴塞爾市區，於一九〇五年設置了一個行政法庭，自恩於一九〇九年，也步其後塵了，其後有許多其它各州，也效法了它們的榜樣。直到一九一四年，國會纔通過了一個憲法增補案（一百十四條副），規定聯邦行政懲戒法庭之設置。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提交人民複決，它被人民所投的二〇四、三九二票對一二三、三三一票，和各州所投的一八票對四票所批准了。實施這修正案之準備，拖延很久，使人望眼欲穿。一部分的遲延，雖可說是由於世界大戰，但顯然聯邦行政委員會，因為很不願意撒手它在這一方面的權力，而且某高級行政大員，也深恐這個新法庭，將削弱了他們自己的權力，所以無形中就將它的設置擱置起來了。到最後延無可再延了的時候，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立了一個法律，規定兩位行政法官之任命，於翌年春天，他們就必須開始執行其職務。業已聽見有人批評這新法庭之權力太為狹隘了，而且已經有了一個擴大其權力的運動。關於官廳的佈告和章程，是否違反憲法和法律的問題，因着州行政法庭和新設的聯邦行政法庭之判例的累積，在瑞士，將來關於官廳擅用職權之批評或者不會無的放矢，於是也可以逐漸稀少了吧。

然而較之上文所說超過若干倍重要的一點，乃是瑞士公務人員，歸依社會民主黨之顯著的趨勢，因此在他們和政府之間，發生了很大的緊張。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因全國各處生活程度降低，使一般薪水階級普蒙其利。在

那種情形之下，自然公務人員對於他們的境遇表示心安意得了。

郵差以他的瑞士十字架的帽章爲榮；住宅上飄揚着燦爛紅地白十字架的旗幟之郵政局長，來往山地的驛車騎手，中央行政官吏、郵傳部——郵政、電報和電話——所任用的人員，都覺得他們自己在一般人民中間是代表聯邦政府的，所以在他們對民衆的關係上，有着相當的尊嚴。

這些田舍的狀況，久已是過去的了。自一九〇五年起，生活程度逐漸增高了，間或的加薪和『高物價津貼』，都不足以使公務員不感受左支右絀之苦。他漸次走向工會類型的有力的組織和政黨的活動，努力改進他自己的經濟狀況。一位新近的史家，傅友德（Eduard Fueter）評曰：

『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之十年中，低級公務人員，包括許多中、小學的教員，幾乎全體投入了社會民主黨——至少在該黨有極多的信徒之各州和各自治區內，一個人能設希望憑借它的助力，可以逼當局批准其要求或通過複決案』。

因着他們在一切政治事件上之特有的怯懦，瑞士人似乎太重視了上面所提的發展之危險性。加入社會黨的公務員，在該黨中，是著名最保守的分子；倘使他們中間的，確有人相信革命可以改善他們的境遇，其人數也必不會多的，這個事實之驟然的發見，便在一九一八年企圖煽動總罷工之過激的領袖們，感覺着痛心的驚奇。

然而暴動的危險雖小，但因爲極大多數公務人員，覺得他們所受的薪水太菲薄，他們工作的狀況，每況愈下，而且覓不着適當的救濟的方案，由此所產生的完全令人不滿的行政的情形，乃是一切政黨的領袖們，在多年以

前的承認的事實。從前被深信嚴正的經濟，為政治工作之準繩者所支配的輿論，最後接受了在這方面必須有透澈的改良之見解——必須充分顧到增高的生活程度之改良，以公允調劑經濟，必須覓取政府和它的僕役間之和解的改良。

其結果，乃是一樁破天荒的公務員法案（Beamtengesetz），於一九二五年三月提出於國會者，經過詳細的辯論和無數的修正之後，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以二十五票，對少數放棄投票，以免表示敵對態度者，通過了邦議會，並以一百一十對十票，通過了國議會。對該法案之反對，大部分來自邦議會，結果減低了所提議的薪水之增加，反對者，大多屬於擁護州權者以及農民黨和天主教保守黨的黨員。然而該公務員法案，經過最後修改的形式，乃是大家所贊成的。關於此點之最好的證據，在於想提出反對它的複決案者之失敗，雖要這樣做的威嚇，乃是以為應當批准更大的薪水之增加的某些過激的領袖們。

要將施行於三萬五千聯邦雇員之廣泛的法律條文，作一總括，頗不易為——至於關於它的執行之無數的佈告，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尚未完全公布者，更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說起。大概說來，該公務員法案，將政府雇員分為二十六級，而為每級定了一個適當的生活薪額。已結婚的男子，除按級支薪外，得領適度的津貼，為每一子女並得領一百二十佛郎之津貼。該法案之最精彩的一點，在於根據公務員住家的各地方之相對的生活程度所定的薪給表。按照該表，各地方生活程度，共分六級，居住在生活程度最低各鎮之公務員得自其標準薪額減去一百至一百二十佛郎，而居住在生活程度較高的城市中之公務員，得在其標準薪額以外，加領一百二十至四百八十佛

耶。並且，該法案也有關於公務員生病或遭意外不測，以及亡故後撫卹其家屬之規定。禁止罷工權，在該法案上，有了新的根據；在另一方面，關於人員之不公平的待遇和過勞，也定了相當的保障。最後，爲促進官吏較熱誠合作精神起見，擬設置一種特別委員會（Paritätische Kommission）。

再過幾年之後，纔能決定這個新法律，對於瑞士聯邦雇員們種種問題，能否予以滿意的解決，特別是它能否減少他們的政治活動。社會黨自然會圖謀乘機利用它的成立，以便對其成就以首功自居。然而在國議會和邦議會所投之票，顯證一切政黨，都曾協力同心共赴最後鵠的。許多公共雇主，據說都很體恤雇員們之困苦，覺得未能將他們的薪金，再多加一點，以符合他們應有之增加，殊爲美中不足，但是關於各方面都蒙了巨額的利益之一點，大概有普遍的同意。在政府和納稅的民衆方面，已負起了巨大而永久的財政負擔，但他們似乎是以異常急公好義的精神，負起這重擔的，希望政府和其雇員間之將來的關係，因此得以改善。就全體論，我們不能不稱讚公務員法案所昭示的廣博的範圍和政治家的眼光。瑞士人待遇各種政府雇員之刻薄，時常招致之非難，這個新法律，曾竭力予以洗刷。

最近十餘年來，在瑞士，關於吏治之探討，曾產生了許多他種暗示。某些改良家，堅持民衆必須被鼓勵來更多批評行政的過失，假定以致函主管長官或報紙爲其發表批評之方式。然而，以報紙上所登載的這樣的函件之數量而論，忿忿不平的瑞士公民，時常具有嚴正的決心，鞠躬盡瘁，以實現上面的建議（The aggrieved Swiss citizen is at all times sternly resolved to do his full duty in the promises）。聲勢較爲和緩的，乃是企圖使公



民們，更善體諒各種行政機關之許多不同的建議，例如組織講座和討論會，請官吏出席主講，並在可能範圍內，佐以幻燈放映和活動影片，和赴各行政機關之參觀。許多這種良好事業，已是在公民講座 (Citizenship course) 之下進行的，關於此點，將在第十章內再加論列。爲欲在官吏中激發更多懇摯熱忱的精神，並減低例行公事的態度起見，有人主張必須懸賞徵求公務員之發明或改進計劃。有人以爲招募產業界和專業界的分子，加入行政機關，以充其生力軍，也可以達成同樣目的。政治的干涉，雖說比較他國很少流毒，是能被減弱的，倘使行政的權力和他種公共權力之間，能有更嚴正的劃分，如像聯邦鐵道制，在這方面已經有的一部分的成就。同後面一點有關係的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乃是佛銳堡州，業已將其電汽營業，委託一個專門的行政會議 (Specialized council of administration)，專司其事，該會既無政治的臭味，又不受立法的管轄。

所以將一切事情加以考慮之後，瑞士對於其全體公務員的關係之餘剩的問題，似乎並不是難於解決的。無疑因人民早先急欲避免大規模的私人企業之權勢，在其公務員之有堅固組織的團體方面，遂不惜冒險聽任其採取工會和社會主義的活動。實在，他們對於後一事變之完全的控制，直到現在仍然毫無把握。然而在這全部過程中，最足以表現瑞士人之特性者，蓋莫過於其公務員所昭示的政治的涵養，他們覺得自己在高昂的生活程度之鐵蹄下，耐心地和平地團結起來，以從事於改善待遇之運動，直至獲得了廣大的救濟法律的成立。該國每一個職業集團，爲維護其自己的利益計，都有同樣有效的組織和準備，這一個事實，足以保證瑞士的公務員，即或要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加害於其他階級和整個政府，他們也無能爲力並且在階級利益的喧囂之後，存

在着一種民主的公道之意識和一種避免各方面的專制之悠久的決心，這是他們光明的將來之吉祥的朕兆。

### 瑞士的武職

常有作家，在軍事的立場，描寫瑞士的陸軍制度。它是一種民團的制度，大致由聯邦統轄，但仍有一部分歸各州所節制，它聯合普遍強迫兵役和很短期的嚴格訓練，這一切是由極少數的專業軍官，和最低額的公家經費所成就。爲訓練一個步兵，包括新兵學校和操練的科目，僅需要一百五十三日之確實兵役，爲一個騎兵的訓練，一百八十四日就夠了。一般人都公認該制是有效的，特別關於它所發展的極多狙擊兵（sharpshooters），以及它對於訓練兵隊，利用本國山地各種天然險要之成績。在另一方面，瑞士既爲弱小的國家，所以對於近代戰爭大規模的進行所必需的重價的攻守機械，是無力備置的。對於瑞士陸軍制度，在軍事專門學術上和爲公民訓練之機構上的效力，如欲估計其高低，另有一個因子，是關重要的。它就是民衆意志的直接表現。一九〇七年之軍事法（*Militärstrafgesetz*），改造整個制度，並且增厚了它的實力，當該項法律草案提出複決時，經三二九、九五三對二六七、六〇五票被通過了。然而，我們不應該過分重視在瑞士人民方面的這種表示之意義。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以為軍事的準備，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情，在一個墮落的世界之現狀之下，無疑是少不了的，但其在時間和金錢上的耗費，是使人難安緘默的，除了安全絕對必需的最低限度之軍備，他們決心不多耗費時間與金錢。此外，倘使戰事臨到了，他們要機智地和頑強地戰到最後一個人和最後一枝鎗。

故此，軍隊在任何意義上，都非瑞士人民之所愛悅。在反面，如像其他政府的制度一樣，人民對於它的好惡是無常的。一九〇七年的複決前十二年人民曾堅決表示反對增厚它的實力之憲法增補案。自從一九〇七年以來，關於普魯斯化（Prussianization）是怨聲載道的，對於其高級將官，亦有人加以拾德帝國同業者的牙慧之批評。在另一方面，於世界戰爭爆發之際，瑞士人民，在街頭巷口，觀看他們的軍隊，開拔出去守衛邊疆，心中十分高興，並充滿着感激的情緒，深幸其改造在暴風雨掃蕩全歐以前就已完竣了。提省諾的民團，在日爾曼語的瑞士蒙了熱烈的歡迎；而日爾曼語瑞士軍，在提省諾，接受了真正南邊的款待。動員雖是耗費的事情，但它對於全國各部更大的團結上，有不少貢獻。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在他們的邊境以外的流血慘象，業已使許多瑞士人民，對於一切戰爭和軍事的準備，都發生了最大的反感。應用軍隊彈壓該年十月之總工所發生的效力，在保守的人民中間，恢復了對他們的愛戴，但同時也加深了過激分子對他們的仇視。部分地由於後面的仇視之結果，在一九二一年提出了一個創制的法案，雖僅有制止軍事裁判之規定，但普通都把它看為反對整個陸軍制度之有計劃的運動之先聲。若然，人民對於該提案之三九三、一五一對一九八、六九六票之否決，和各州對於它的一九對三票之否決，應使該項計劃無疾而終了。然而在民衆意見的這一切變遷之中，毫無過分推崇軍隊之痕跡。瑞士人民對於武力應統制於文治之原則，亦誠推崇之程度，並不亞於英、美人士。

甚至，倘使我們向後回溯到舊同盟之極其混亂的時代，當時盟友們（Fidelenosen），到處被人看為歐洲最優秀的兵士，但有一件令人希奇的事實，乃是他們並未顯示有欲英雄化（Heroiz）他們的軍事領袖之傾向；

對於實用的目的——本鄉的防衛、爭城略地、戰利品和錢糧——比較對於如浮雲的虛榮，他們有更高的興趣。從綠林的暴客和十五世紀的雇傭兵到現今和平的農民、製造鐘表的工匠、商人、教員和開設旅館的商人，其間不啻有天淵之別；但是前者之一部分的特性，是仍舊存留於後者的。該國未同鄰國開啓釁端，已經一百多年了，一八七四年之桑德生短促內戰，也並未激起任何持久的軍事的熱忱。古代勇士的精神和尚武的傾向，雖是隱伏着的，但是絕不有誤地存在於今日之瑞士人民之中的，對於這一點，一切觀察者，都無異議。西培爾（Paul Schöpel）的兩個簡短的句子，把這件事情概括無餘蘊了：『瑞士人民，並非窮兵黷武的民族，但它是一個武的民族。』費德銳（Helmuth Federer）在他的 Unser Herrgott und der Schweizer，也以透澈人道的精神，評述這件事情。他以略帶誇張的語氣，論及古盟友之無數流血戰功曰：『但有另一件事實，乃是這些戰爭對於瑞士魂（Swiss soul），害多而利少，而甚至到今天，我們第一流的史家，仍不能辨悉，累次的戰爭，正義究竟是在我們方面或是在我們敵人的方面。』

倘使任何人懷疑武的本能，在今日的瑞士人中繼續的存在，該國之反戰論者之見證，會使他有相反的想法。因為瑞士人民，反對宣傳和平者之情緒非常高，所以許多同情於他們的人，寧可效金人三緘其口了。邵斯苦（Althe Descombres），在她對於討論兒童心理內容一組研究所作奇妙的貢獻中，曾提示從十一歲至十七歲的八百瑞士男女青年，關於戰事和兵役之思想和志向。作者之同情，雖明明在於反戰論者方面，但她關於戎裝、軍隊和整隊遊行、旗幟、愛國的情緒、歷史的紀念等等，在兒童心理上的印象之記述，將使極端崇拜武備者，拍案叫

絕了。

瑞士人確實用於軍事訓練之時間，雖短於任何其他國家的陸軍制度之規定，但在一種意義上，可以說從童年到半老，有許多瑞士人，倘使不是現實的兵士，也是可能的兵士（*soldiers in reserve, if not in case*）。在進新兵學校之前，他們必須經過各種預備的訓練；其後，倘使是步兵，他們從二十到三十二歲，屬於精兵團（*Elite*）或第一線軍團，有七個術科，每個術科以十三日演習完；從三十三到四十歲，他們被列入國防軍（*Landwehr*）或第二預備隊，有一個術科，也是以十三日演習完畢的；最後從四十一到四十八歲，他們屬於團防軍（*Landsturm*），為本鄉的保衛，得被徵召。現役軍官，至五十三歲方能退武，但在事實上，只要身體康健，時常盡量延長其服務年限。

論到兵役之各種預備訓練，可以說在新兵考試未被廢止之時，公立學校關於讀、算、寫（*linee, E's*）三門基本工具學科和公民科之教學，對於初入武的青年們，是直接有益的。這並不是說自一九一四年該項考試停止舉行之後，該項教學就完全不重要了。在反面，瑞士軍隊的效率之大部分，是由於它的一般士兵們之頗高的平均教育成績。然而特別是在健康的操練內，一般公立學校，最直接地預備青年參加兵役。一八七四年的憲法增補案成立之後，立即通過了聯邦行政委員威爾提（*Willet*）所草擬的體育法，規定全國學校之體育的要旨，在發展一切男學生之體格適合陸軍的標準。該項法律之執行，如同一切其他教育法規一樣，是歸各州所主持，但須受聯邦政府之監督。一八七四年之法律，起初進步遲緩，大致因為體育教員之人數不够分配，但到一九〇〇年，十歲至十五歲之間的男生，有八分之七是在他們教導之下了，近年以來，該國全部男青年，實際上都在受健身訓練，其首要的旨

趣，在發展將來的軍事能量，然而它在健康和精力方面之副產品對於軍事以外的生活，必然甚至有更大的貢獻。在修完小學各級強迫教育之後，瑞士青年，可自由參加各種預備兵役之操練。其中最有興趣者，乃是見習兵之組織，附設於該國各中學，共有學生六千名，分爲四十七大隊。後者由政府發給小型來復鎗，故對於射擊和操演有很充分的練習。反戰論者，以爲見習兵的隊伍，使黷武的觀念深植於青年腦中，自然是在反對之列。而陸軍專家並不以它們的成績爲滿意，以爲它們太幼稚和鬆懈，故不適於新兵學校的繁重職務之準備。但是，瑞士兵隊中許多軍官，是因爲曾參加見習兵的組織，纔對軍事生活發生了初步的興趣。中學既然是大學的預備場所，故此是國家下一代的知識領袖之培育的機關，在它們中間，有如此其多的學校，附設特殊軍事教育，對於全國關於陸軍制度的輿論之形成，大致是會有很大影響的。

完全在中、小學各級以外的，另有其它種種機會，使全國從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年們，能預先準備他們自己，以便參加軍事訓練。這些機會，就是各種專修科的開設，例如射擊科、健身科和武器運用科，在一九二八年各該科所收學生人數爲九、七五八、二五、九六五和六、九三三。爲贊助這些活動起見，聯邦政府曾以每年不到五十萬佛郎之總數，略予津貼。

二十歲的瑞士青年，必須赴新兵學校報到受訓。倘使體格合格，他就必須受一種短期的嚴格訓練。自然大致是以純粹軍事的訓練爲目標的，而其方法不外乎體操、戰術和武器的使用。在少數應徵者，或者曾受過的預習科目中，對於他們身體的成熟狀況，是有相當考慮的；在新兵學校中，在另一方面，被指定的職務，是認爲成人的工作

的，必須在嚴格的管理之下，逐一履行。它的旨趣，雖在不使任何人有超過精疲力竭的危險的負荷，但是所指定的工作，是以其全部力量之應付為準的，力量增加，擔負立即隨之增加。用力之後，務使其有相當休息以為調節，並在其職務上，時常予以變更，免使其覺得單調無聊，對於這一切，都有縝密的規劃。觀察新兵之工作，會使任何人深信該項學校要求學生盡心竭力達成他們能有的盡美盡善的標準，並且在這一點有完全的收穫。

讀者應當注意的事實，乃為在別國為軍營之常務，在瑞士乃其學校之作業。他們所用的新兵學校（Rekrutenschule）這一個名詞，頗足表示他們對於一切當前的問題，軍事的和非軍事的問題，一律是以純粹教育的方  
法來謀解決的。必然有多量純正的教育心理學，包含在他們對初入武的青年之教育中的。按照其軍政部關於軍事教育之宗旨所頒之教範：

『負管理之責的官長們，必須以教官和教習之身分，採取合理的態度，纔能期底於成。以強暴和輕侮對待新兵，採取一種傲岸的態度，使他們在工作上失掉自信和快樂，這對於士官和下士官（commissioned 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都是失態的行為……：在一切操演上和在他的職務之全盤的履行上，在訓練之下的人，必須獲得一種深信，以為他的長官所要他執行的命令和規程，倘使他盡心竭力而為之，都是他所能作的。這種深信之發展，乃是一切兵士的能量之基礎……：在軍務上，必須簡短而嚴厲地部下以確鑿的號令，有時是命其備嘗艱辛的。在另一方面，舊派軍人之暴戾恣睢，趾高氣揚和漫罵聲調之傳統，從起頭就使士兵驚惶失措，先令其立坐不安，再使其滿懷怨懟，以這樣的手段求目標之達到，不啻緣木求魚了。官長對待懦者，務須耐心，在

他們身上的要求，應採漸進主義，切莫行之過驟。凡會使新兵有詭計之印象者，務須竭力避去。一位知道如何同他部下發生適當關係之長官，必定不難在他們閒散或下差的時候，以友伴的口吻和他們接談，以他們的憂樂爲自己的憂樂。在這樣的行動中，他不難保持他的身分所應有的尊嚴；他務須避免一切討好的做作（*home-made* avoid all appearance of seeking popularity），但當其部下，覺得他的興趣是發於自然，出諸本心，和誠摯無僞的時候，他應確知他們對他的信任和愛戴。

表達這樣一種最仁慈、極其盡情奪理和友愛的精神之文字，有如上面這一段在一般正式公佈的軍事教範中，洵可謂鳳毛麟角了。較爲愚鈍的教操的軍曹，雖未時常敬謹奉行這段文字之精神，但它也並非完全，僅是紙上空談。舊日士兵之回憶和描繪瑞士軍隊生活之文學所給人之印象爲：新兵們雖受盡操演和日曬夜露之艱辛，但他們所受的待遇是溫和的，他有閒空時間以爲交友和娛樂之用，寬大容忍的精神之通行，足以包容笨伯之遐想和冥頑不靈者之執拗。

新兵學校之課程，除了操練之艱辛的實用的工作和體操外，尚有很多理論的學科。爲這個原故，演講常被採用，間或插入向學生所發之問題。至於教授的方法，該教範所指示者爲：『講演之論調，須新鮮而活潑，以求符合武人之身分；絕對不可讓它們因陋就簡，竟變爲單調的問答體裁』。凡曾有機緣參觀瑞士的軍隊訓練者，都異口同聲地稱說該項指示曾被不爽累黍地遵辦了，而其結果，曾在應徵者方面，逗引出最活躍的興趣和參加。

著者於一九二七年之夏，在鄰近沮利克之新兵學校中，何幸得目睹這種講學，當時之講題爲：『瑞士軍隊之



宗旨』。一位陸軍中尉，使他的中隊做過一番活潑的演習之後，帶其部下至操場左近崇高林木之蔭庇下休息。『軍隊的宗旨』，他以平易談話的論調解說着，『是純粹防禦的好久以前，瑞士人已放棄了擴充土地的思想』。爲使其部下深明此點起見，他曾引一九一九年聯邦拒納奧地利亞之復拉爾堡省 (Austrian Province of Vorarlberg) 爲例，應用幾個問題啓發關於該項事件之事實。應答如流者，爲一身高、面白、金髮、碧眼、鼻架眼鏡的青年，他是師範學校的學生，乘學校假期應徵入武者；但是，估該中隊多數的從斯卡夫好生而來的尖頭青年農人中，也有幾人熱心作答，可見本州學校教育之成績，頗爲優秀。

該中尉繼續其演講時評述，不贊成瑞士有國防軍者所持之理由。『據說，倘使與我們接鄰的列強發生戰事，其中有一個國家，設若侵入了我國的疆土，據說其餘各國，就會出兵相救』。『但是』，講者評論道：

『一個強大的友邦，當時也許需要它所有的軍隊以自衛。自然，他國會擔保瑞士的中立；但是誠如毛奇將軍 (von Moltke) 曾作之評論，一旦發生戰事，「外國擔保的國家所給與的助力，只限於它們自己切近的利益之保障」。即或有援軍調來，它或者到的太遲。同時，敵軍可以長驅直入，佔領瑞士全國，而且，他們在我國一旦有了堅固的根據地之後，纔想把他們驅逐出去，生命和財產，就必定要遭受可怕的犧牲了。爲防免這個危險起見，有一個瑞士的陸軍存在，就可強迫任何侵略者必須有所顧忌，倘使他們要預備進攻，就必定要預先權衡其損益之輕重了，因爲我們有了堅固的抵抗，他們也許會得不償失呢。即或侵略來到了，瑞士的軍隊，也可以阻止其前進的速率，使外國的友軍，可以趕得及來應援。瑞士的陸軍雖小，但其訓練和設備都很好。爲家和國之防禦而

戰，它應該能擊克制比它更強的敵人。它佔有某項便宜——熟悉戰地的形勢；居民之樂意的援助和所供給的情報，而他們對於敵人，是不會給與幫助和真實的情報的。

『但是』，演講者繼續說：『究竟爲什麼我們要守禦國家爲什麼不放下兵器，歡迎侵略者進來？我們可以預料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是紛至沓來的。許多人有一個相同的答案，其大意是說，瑞士人喜歡他們自己的政體和它所賦予的自由和民主主義，這類答案，所引起的評語是：對於其鄰國目前似乎熱烈擁護的專制獨裁，他們必定是憎惡的』。教官再說：

『其他民族所願有的任何政體，我們不願過問，我們瑞士人也不願意人家來干涉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民主主義，對於我們是最相宜的。任何侵略者，會不會讓我們保存着我們的民主式的軍事制度，和它所施與不分貧富貴賤全體一致的短期訓練，或他們會不會，如同我們從前被法國蹂躪的時期一般，選拔瑞士的公民，去爲他們的無止息的國際征伐作礮灰呢？任何侵略者，會不會不干涉我們各州所安然享受的寬大的地方自治，和他們會不會容許我們各市區所有的市民大會存在呢？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起見，他們豈不會堅決主張權力之集中，和一種違反瑞士人本性的風俗之劃一呢？任何侵略者，會不會讓我們保存着我們的三種語言？他們豈不會將他們自己的國語，強迫全瑞士的人民接受嗎？然而我卻願意保存着我們的三種國語之平等的地位，更不必說爲我們大家所最歡喜而且爲一切階級的瑞士人所說的無數的本鄉方言。在我們中間，沒有社會貴賤的歧視，如同德國在習於講文藝和公文上所用之日爾曼語者和只能講本地方言者之間的歧視……誠然，爲要

在我們當中保持社會的安寧秩序的緣故，我們養有警察，然而他們是我們的自家人，講我們本土的話語，並受我們的文官之節制，而這些文官，是我們選舉出來的，我們也可以投票撤銷他們的職務。倘使我們的街道和鄉村被受外國指揮的荷着上刺刀的槍桿之兵士所逡巡，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也必定會使我們心痛的。」。

要想傳達上文的語氣，是十分不可能的；但可以確說這位軍官的講論，完全沒有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氣味和無意識的說話，雖其題目，頗易引入這類的說話。自然，其語氣對於軍事，雖有坦白和熱烈的擁護，但其側重點，始終在於國防武備而不在侵略，和在於瑞士的制度之純粹的民主主義、寬容和自由。在其單純、清晰和材料之有條不紊，以及對於重要點間或加以重述上，這位演說家之風度，不屬於兵營而屬於學校教室，在其中，這些新兵在童年必定聽過類似的雄辯。然而當時因着軍旅的空氣，因着環立的鎗枝，在其自己的陰影所成的圓圈外，由鎗筒的深藍色在日光下所反射的光輝，因着在頭上的機關鎗聲，在鄰近岡巒間縈迴的響應，使這般類乎教室的講學，加上了新鮮而更有力的動聽。

這裏，應該插入關於這些教練之敘述，其人數約二百，外加五十位副官之襄助，監督新兵學校之術科和學科之教學。須先說明者，我們都是現役軍官，這個意思，自然是說他們不僅曾經過每個小兵所必須受的訓練，並且曾經過升入士官的階級所必須有的高深的和嚴格的修養。如欲被委為教練，更須精通兩種國語，並須有由學校發給准許進入大學肄業之憑照（Reifezeugnis）。事實上，他們有許多是大學畢業生。沮利克的聯邦工藝大學，在軍政部監督之下，附設了一所軍事學校，專門訓練這種教練官，在課程分配於三個學期之中，一個夏季和兩個冬季。

要估計瑞士的軍事訓練，對於其公民以後的生活之影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無疑它是深遠的，一部分因為它的普遍性。在瑞士常聽人說新兵學校如同公立學校，實際上，每個男性公民對於兩者都必須加入。自然，公立學校的肄業期間要長的多了；但在另一方面，新兵學校，使全國青年在最易受感動的年齡和最易接受朋友的環境之下，團聚起來。任何兩個瑞士人，不管是從其國之大南地北而來的，只要曾畢業於新兵學校，終身就有了一種共同的興趣，可以促膝而其話當年了，而且他們確實時常眉飛色舞地談起這類經歷。

軍事訓練在瑞士公民身上之結果，雖不易鑑定，但很容易說明其政府所希望之結果。在一個可注意的官廳文告中，以近於抒情詩的體裁，詳盡闡明新兵學校之教育宗旨（*Antikriegsziele*），茲總括其全篇的旨趣如下：

『對於兵丁的職業，對於他們的聲譽之高超的成就，充滿了快樂，對於他們的長官之信任，滿腔溫暖的情緒和友愛的心情，體魄增強，性靈堅定，但願我們的新兵邁歸家庭，為其家屬之歡欣，為其父母師長之光榮。若然他們所受的軍事訓練，就不特可達成尚武之鵠的，它對於庶民的生活，更可有一種深沈的後效，在於後者，促進優良的品行、秩序、淳樸職分之竭盡，和為他人的幸福，以犧牲自我之婆心。』

以二十歲的年齡，在新兵學校中所受的不論如何深沈的心印，在以後的年歲中，都可被抹煞的。然而，有各精練學程能使記憶栩栩常新，和軍事的能量蓬勃活躍，直至中年不衰。第一後備隊的騎兵所享受的特權，使他們可以保留他們的坐騎，隨時聽候政府之徵召，因此人都樂於投入該隊。凡曾修滿各階段之軍事訓練者，包括各精練學科，都可保留其兵器和軍裝，隨時須將這些公物，提出受官憲的檢驗。在許多國家中，無疑，舊的軍用來復鎗，是被

珍藏爲紀念品的；但在瑞士，它並不是掛在牆壁上聽其生鏽的——操所有權者，常把它擦得雪亮而無絲毫毀損，並且常把它攜到鄰近各處參加一切射擊比賽。

至於在瑞士盛行的許多來復鎗俱樂部的情形，將在第十三章加以詳細介紹。受政府的津貼特爲保持射擊的本領，它們在二十萬以上的會員中，也能保持住軍隊的精神和營幕生活之記憶。來復鎗俱樂部，對於普及於極大多數之退武軍人，雖說最爲有效，但也另有其他特殊會社，能保持軍事的傳統，其中最著者爲瑞士士官會、下士聯合會、礮兵俱樂部、工兵俱樂部、撒馬利亞人（Samaritan）和衛生——紅十字會——俱樂部。同上述各種組織之性質，完全不同者爲各界名流——特別是編輯、教師、外交家、議員和一般政府高級官員們——對於軍隊所表示的深到而永恆的興趣。在國議會中，有二二百分比，而在邦議會中，有三二百分比的議員，是現役的軍官，其品級從少尉一直到參將都有。

瑞士的軍制，在受民衆的擁護上，在聰明而不繁重上，雖無出其右者，但仍難免有反對者。後者分爲兩大類：第一、凡以政治的理由爲反對之根據者；第二、各種理想主義者之集團。第一類中大多數是社會主義者或隸屬於共產黨者，他們以爲，一旦強鄰壓境，以弱小的陸軍與之抗，不啻螳臂當車，而事實上，它的主要的作用，不過在作國內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之護身符，銷滅罷工或可能的革命運動而已。這一派的分子，大率都是建設在勞工的團結之上的國際的博愛之信徒。倘使全歐洲的布爾喬統治階級，不被推翻，而代之以勞工或社會主義的政府，他們就絕對不願意擔保和平的。在現狀之下，他們雖是反對武力的，但他們並非和平主義者，對於他們所重視的革命理

想之達成和保持他們是不惜採用暴力的，實在在沮利克、斯卡夫好生和白賽爾市區之共產黨，業已從事於一種半軍事的工人保衛團（Arbeiter-Schutzwehr）之組織，據說其宗旨在保護工人的集會、示威和他們的機關報，免被警察或贊成法西斯的集團之非法的攻擊。除了上述各種政治的反對軍制者外，尚有少數政客，在其選區中，借端攻擊陸軍制度，以爲取得選舉票之手段。

根據理想以反對軍隊者，包括某些宗教的派別和托爾斯泰對黨不抵抗主義之信徒。另有少數科學的反戰論者，主張跟着人類之進化，最後會達到一種完全的境界，到那時戰爭就會絕跡了。一種較爲普遍的見解以爲軍縮（Disarmament）之發展，現在已達到相當的程度，使瑞士人有理由放棄他們現行的軍事制度，在這種運動上，爲全世界之表率。這就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日内瓦小學教員聯合會，通過轟動全國的決議案所根據的理由。在學校教員之外（而他們當中，也有贊成軍事者，並如我們在上文所說，他們在軍官的團體中，也有充分的代表），許多新教的教士是持反戰論者。根據天主教保守黨的態度，我們可以知道天主教的教士，對於反武力的運動，是不表同情的，因爲前者，贊成一種如像目前的小而有效的陸軍制度，使軍費不致超過最近幾年的均數。除了社會黨和共產黨外，瑞士其他較大的政黨，對於現有軍隊，大率是贊成的。

社會黨對於瑞士的軍事制度之反對，近來曾略被他國的黨同志之行動所困惑，尤其是法、比之社會黨，因爲後者對於國防的建議顯明情願略予贊同。一九二八年，在布魯塞爾召集的社會黨國際會議所通過贊成廢除常備軍隊，而以一種類似瑞士的民團制度代之之決議案，使他們更加受窘了。雖有這個決議案，但瑞士社會黨，仍繼

續維持其強硬態度，每年必定是要照舊投票反對軍事預算的。他們既然僅僅佔兩院之少數，這個政策，就可作為一種抗議，而不能發生實際的效力。在贊成軍事者看來，這種強硬的態度，僅為取得選舉票之一種手段罷了。從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它乃是朝着完全廢除武力之最終的理想進行的初步，所以是有價值的舉動，瑞士在其民團之組織中，已經有了一種比較理想的制度，意即從具有常備軍各國之立場看來。雖然，議員們，雖於目前訓練的方法之批評，每每是極端嚴厲的，在一九一八年總罷工中，聯邦軍隊之作用，仍使他們痛定思痛，難安緘默，一有極細屑的事故，或甚至在任何新兵學校中發生了意外，他們對於軍政部，就當即要提出質問，務必使其難堪。

反戰論者的申辯，雖略被對於一個中立國，同時也是國聯會員的國家之權利和義務的各種不同的解釋，弄得迷離惝恍，在瑞士和他國是沒有多大出入的。在另一方面，在該國關於『戰爭之道德的替代』（*moral equivalent for war*）或說武備之道德的替代之各種建議，至少昭示一種決然新穎的意義，即以平民勞動服務代替軍事訓練之建議。這件事情，是在一九二二年以呈於聯邦行政委員會的一個申請書，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該申請書之意旨，在籲懇：

【（一）設置一種平民服役制度，使凡因着良心的動機，不願參加兵役者得以此種服役代替兵役；（二）這種服役應以公民的體育和德育，互助的精神和人民對國家不可少的愛護之發展為目的；同時須以增進公眾的福利為前提，努力實現各種平民設計，例如以排水法或灌溉法開墾荒地、亞爾卑斯高岡區域之改善、造林的工作、天災人禍之救濟】。

申請書遞到以後，接着並沒有立法的制定。實在，該申請書是不中用的，因為普及強迫軍役，既為憲法之規定，所以要變更這項規定之合法手續，在於創制而不應該出於申請的辦法，所以未採取創制的手續，自然是因為不能得着五萬人民之連署——從任何觀點，這件事情，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不過，這華爾德佛結請願（Waldvogel motion），這是以後在國議會中以其主動者之姓名，加於此項請願之稱呼，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曾惹起各方面的討論。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夏季，在提省諾州的美所柯（Mascoco）和波士柯（Busco）兩個地方，在小規模中實現該項建議之努力，使各面對它的興趣更加強化了。在前一處地方有一小團集，大多是學生，自告奮勇去從事於修理，在一五二六年被毀的壯麗的古堡。

波士柯一九二六年學生假期旅居團（Student vacation colony），從事於亞爾卑斯山中該村（超海平四千九百四十一英尺）之墾荒的工作，該村居民，因最近幾次的雪崩，在財產方面，曾遭受極大損失。每個志願者，必須至少居留兩星期，倘使可能，四星期，對工作之酬報，為食宿及鐵路車費。在該假期中，從七月二十日起，每日參加工作者之平均人數為三十五人。按照該山谷中所通行的極低額的工資，該旅居團所作的服務之價值，稍微超過其報酬，後此大都來自慈善的捐輸。道德的價值，則較難計算；但在學生方面，這種道德的價值，為從一種極不尋常的事業，有益於同胞或者並富於社會的暗示的事業，所獲的經驗。對於村民自己，被亞爾卑斯高山中的生命的嚴酷所壓迫，而慣常所見的城裏的客人，僅為着爬山束裝的旅行者，所以這整個事情，必定是一件可驚的和開心的好連道。不論如何，這個實驗比較羅斯金（Ruskin）率領牛津大學的學生為鄰近的恆克舍村（neighbouring



Village of Hincksey) 修補道路的創舉，規模總要大些，而計劃也周密的多了。在另一方面，美所柯和波士柯的志願者，在工作上所費的時間，卻短於瑞士新兵學校之極短的兵役期。類似的實驗，正在該國他處進行着，最近的報章，記載一個學生旅居團，於一九二九年夏天，在彭那切斯(Bonatchess)、在下發賴失(Lower Valais)的一個遼遠的高山小村，從事於冰塊之清除。

以平民服役代替軍事訓練之建議，不特要遭受憲法的掣肘，並且也要招架軍官之極端的反對。顯然這個計劃，在和平期中，是可以有滿意的實現的，因為像在瑞士那樣的國家中，墾荒和衛生的工作所能有的暴露和吃力，是可以同新兵學校的工作相等的。在前線冒着生命的危險者，和全國一般輿論，大致決不會容忍根據戰時在國內所作的平民服役對於豁免兵役之申請。

平民服役不被看為新兵學校之替代，而被當作其補充對於瑞士思想界之領袖，有很大的魔力，這一件希奇的事實，無疑是與該國對教育的熱心有關的。因為他們對於公民訓練之任何建議，隨時皆所歡迎的緣故，所以申辯說，軍事訓練所預防的戰事不一定會有，而且雖有公立學校制度之一切的成績，仍覺對於平民生活的職分之準備，是很欠缺的，因此大家必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有人熱烈主張，不僅應為青年男子設備平民訓練，倘使把它看為新兵學校之替代，這就是當然的了，並且一切青年女子，也必須受平民訓練，以求能幹的母親、管家、看護以及一般女工之人數，可以增加。在這一點上，設若不在賦予參政權之樂意上，柏拉圖的男女平權論，在現代的瑞士，可謂德不孤了。

日内瓦小學教師聯合會，在其一九二七年的震驚全國的決議案中，除了平民服役外，曾作其他不同的使用。現在所費於軍備上的款項之建議。後一種建議，邀約瑞士的一般教員一同要求：

(一) 取締軍事預算，而以其所需之款項，作為老年保險和撲滅肺癆與癌之用；

(二) 由瑞士政府，在瑞士國內，創辦貧兒學校，收容歐洲各大都會極貧寒的兒童，予以體育和德育之訓練。

無疑地，上面第二種建議，『不論如何都可算得是最崇高的表示』，再引用該決議案之字句，不管它能否『使該國為文化之盟主』(Place the country at the head of civilization)。然而，凡熟悉瑞士在世界大戰中所舉辦之宏大救濟事業者，似乎並不以該項建議是不倫不類的。日内瓦的教員們，以為照這樣創造一個國際互助的強有力的組織，可使該國在道德上成為無瑕的美玉。差不多無須說擁護軍備者頗不以為然。他們以為再怎樣救濟貧寒兒童，意大利的或其他，都不能阻止墨索里尼不採取自衛的行動，一旦瑞士裁去陸軍之後，使其敵人可自由通過亞爾卑斯之山道。在他們當中，趨於更極端者說，倘使意、法國一旦發生了戰事，墨氏必定要攫取提省諾州而將意大利的邊界，向前推進至大格提哈爾德(Gotthard Massif)山之高峯，否則他將感覺不安了。

瑞士聯邦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瑞士人民，不得因其宗教的見解，解除其應履行的公民義務。在實際上，良心的反戰者，是頗被優容的。根據費勒上校(Colonel Feyler)之著作，『在瑞士，倘使一個新兵是反戰論者，就沒有入會強迫他使用一技來復鎗，即或只為打靶之用』。招募新兵的委員們，是極其謹慎將事的。正如他們分派車夫

於馬車運輸隊、汽車夫於汽車隊、廚子於行軍的廚房、會計師於行政服務，也照樣安插希有的不願使用兇器之青年於紅十字隊中。自然，這是和平的時期之慣例。在世界大戰中，有少數逃避兵役者（*refractories*），因拒絕參加任何種兵役之故，曾被處以數月之監禁和遞奪公權很少的幾年。因為他們每年被傳重新判罪，這種情形，甚至使軍官們都覺得很窘。有時由軍醫大開方便之門，說被告有精神病，不適於兵役准予開釋，這種滑稽辦法，誠不少幽默的意味；亦有時由委勒將軍（*General Wille*）行使其特赦權力，恩准豁免。在世界大戰中和其後，瑞士政府因會照上面的辦法，對待良心的反戰者，曾受了嚴厲的批評；然而其政策，似乎是非常寬大的，特別是同當時在德、奧和俄國的逃兵，整批被鎗斃的事實相形之下。自然，倘使瑞士自己有一天也會成了交戰的國家，公眾的情緒，無疑也要變為嚴厲了，其結果，會使良心的反戰者所受的待遇，要比他們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之間所受的待遇，嚴厲的多了。

前面曾指出在瑞士的政治和生活上之一種顯著的謹小慎微的精神。有時這種精神之顯著，使一位大國的觀察者，覺得它似乎是太過了，差不多近於怯懦了。倘使有較少這種精神的地方，大致就在於他們的陸軍制度。實在，後者乃是他們的中流砥柱（*a tower of strength*）。但瑞士人對於它絕對沒有矜誇和高視闊步的態度。當其他們宣布它的純粹防守的宗旨的時候，絕無理由，可以不完全相信他們的，不論對於世界列強的政治家所發的類似的言論，是怎樣的看法。我們可以完全同意塞西爾爵士（*Lord Robert Cecil*）的稱述：『歐洲之理想的軍事組織，為普遍採用類乎瑞士民團制度之組織，後者對於確實的國防雖為有益，但從未為而且永遠不會是其任何

鄰邦之威脅」。

對於他們的弱小之自覺，同鄰國強大威力相形之下，可以略爲說明瑞士的謹慎，但不能予以充分的說明。對於他們極端擁護的中立原則，也有一種強烈的道德的義務之意識。這兩個要素，曾長遠範鑄瑞士的國民生活，所以瑞士人民之靈魂，已經被它們重新改造了。誠如佛勒克（Konrad Falk）對於這件事情所作的極精微的描寫。

一個人或被教養於這個思想：『你屬於一個強權，它有一天必須爲爭奪世界的霸權而戰』，又或他必須時常向自己說：『倘使最後必須出於一戰，我們除卻保住我們已有者外，絕不能有其他奢望』；兩者是有天淵之別的。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生觀，在它們籠罩之下生存者之諸般問題，都會具有迥不相同的情勢；一個民族的政治，在它的倫理的態度上，影響之深遠，是一般人慣於小看的，而前者也是輪流被後者所影響的。在這種相互的作用和相反的作用之中，一個民族的品格就被形成了；瑞士人被他們非常中立的政策，由於它的被迫獨立的情勢，逐漸範鑄成了一個同其一切鄰邦迥然不同的民族，這是與它在語言或文化上，同其中一國或他國相似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的。

### 新兵考試（Rekrutenprüfungen）

民主主義在瑞士，不僅限於票賦而已。我們在上面業已指出，瑞士人自己喜歡提說他們普及強迫教育的學校，和他們普及強迫兵役的陸軍。直到最近，學校制度和陸軍制度，由於新兵考試一向是有密切聯繫的，該項考

試，比較任何其他國家，有着更高度的發展。雖在世界戰爭爆發時被放棄了，但這種考試，有恢復之必要，已經是一個公開的問題，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曾被各方面熱烈地詳加討論。在一九二七年，聯邦行政委員會，曾建設在一種略略改變的基礎上，恢復該項考試。考慮從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由這些試驗所獲得經驗之重要性，以及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九年關於它所有正反辯論之興趣，這個題目，頗值得精密的推敲。

如同極多其他瑞士的制度一樣，新兵考試，是先在州的範圍內詳加考訂之後，纔被聯邦政府採納的。梭羅色恩，因不滿於其學校的狀況，遂於一八五四年首先試行該制。從那時起，直到一八七四年修正的聯邦憲法被通過之時為止，不下二十州在一種形勢或他種形勢之下試行了這個制度。在一八七四年，它們被聯邦政府在劃一的基礎之上，遍設於全國了，在新制之下的第一次考試，就是在其次年舉行的。

除在州行政所達成的良好結果之外，贊成將新兵考試制度以統一的形式推廣於全國者，另有其他不同的動機。當時是一個對民衆教育極感興趣的時期，該項興趣，曾受了聯邦復決和創制之新近施行之重大刺激。有識之士，覺得倘使選民關於他們的新義務，沒有受過相當教育，該國之將來，就不穩固了。新兵考試，不論在什麼地方，經各州試行之後，它們對於學校之反響，提高它們的標準，並減低不識字者之人數，都是極其令人滿意的。軍事的考慮，也頗與該制有利。瑞士人曾以極深的興趣，留心觀察一八七〇至七一年之法普之戰（the Franco-Prussian War）之驚人的戲劇。從他們接納並供養波爾巴基（Bonaparte）的敗軍八萬五千人之慈悲的工作，他們覺察了法軍在教育 and 組織上之弱點。在另一方面，他頗以爲德國之軍事勝利，大致由於它的軍隊在這兩點上之優長。

因爲深信從民衆教育的立場——對於瑞士人時常是一樁首要的事件——新兵考試之必要，並且同樣深信它們在軍事立場之必要，聯邦政府，由當時著名教師之協助，將該新制透澈地加以規定。此處應加說明者，爲該項考試，是屬於純粹教育的性質，起初完全是關於普通學校科目，到它們被廢止的時候，也大致是這樣的。直到一九〇四年，練身操的考試纔被加入了，自然，醫藥檢查一直是被應用，以便剔除體格不適於兵役者。從該制的存在之最後五年，每年所試驗青年之人數，有二萬五千之事實，蓋可想見施行該制，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聯邦新兵考試所包括的科目凡四：讀書、作文、算術和公民。對於第一項科目，主試官可依照應試者之國語從約一百字的許多短文中，隨意選用，被評定有最高成績之應試者，不特能誦讀流利而音調適宜，並能以其自己之口語，準確地重述原文之內容、秩序和意思。

作文，第二種科目，所採取之方式，頗似美國各大學考試新生英文程度所用之標準。在這項考試中，大致要兵致函其親友，關於其自身或職業的事情，或要他們從一組包括一切比較通常的生活經驗的題目中，選一個題目，作一篇短論。評定試卷成績所用分數如下：第一等，在內容和形式上完全正確或幾乎沒有錯誤；第二等，在邏輯的意義上是滿意，但包含幾個較小的或少數較大的語言的錯誤；第三等，在寫法和措詞上不妥當，但前後有聯絡而思想清楚；第四等，很壞，在實際應用上幾乎沒有價值；第五等，完全沒有價值。

在算學的考試中，新兵被發給兩種試題，每種各四題，包括加、減、乘、除、四則。一種須用筆答，他種須用口答——後一種試驗，即一般學校通常所謂心算。這些考試的題材，務求能適合應試者之職業；例如，要一位農民解答關於

土地丈量、農作物的重量、數量或價值等問題；要一位書記解答關於買賣、租金和利息的問題；餘可類推。自然，心算題簡單的多了，但其性質，與筆答题並無不同之處。

至於新兵考試所包括的第四種科目，「Vaterlandskunde」（『公民』或者是其最近似的譯名），它在實質上包括三個領域，即地理、歷史和國家的憲法。在第一領域中，很常用所謂「Stammes Karte」，意即空白地圖，顯示地的形勢、疆界和鐵道，但沒有地方的名字，應試者須於其上指出山脈、道路、江河、湖和城市，並須指出，倘使他要「在國中作長途旅行他所要循的路線」。顯然，一位沒有受過高深教育，但慣於隨處留心觀察一切的青年，比較一位馬虎的大學生，在這個測驗上，可以有更好的成績。在歷史和國家憲法的考試上，在口頭測驗中所用之問題，也注意到應考者之職業和所受教育之深淺，曾享受過非常教育利益者，比較為境況所迫提早離校謀生者，要得第一等成績，就必須能答更多的問題。

我們可舉下面的事件，作為在公民科試驗上一個完全令人不滿的成績之例子——這種事件，雖不常有，但是使愛國的瑞士人，對於他們的學校制度而且甚至對於他們國家的將來，感覺心灰意冷哩。新兵甲，其家庭頗堪溫飽，住居在離學校僅十分鐘的距離之小的山村中，帶着學校的成績報告單，前來參加考試，這是所有應考者都必須照辦的，顯明他對教師蠻橫無禮，而且曾規避凡非為法律規定絕對必須履行的每種教育責任，並且逃避了一種為法律所規定必須履行的教育義務，結果受了法庭的懲治。「你來赴考時，沿途經過了一些什麼市鎮？」新兵甲回答這個問題時，僅從四個市鎮中記起一個來。問題：「從你的村子動身，經過山中的道路，可以達到什麼地

方呢？』答案：『從來沒有。』問題：『你的州和其首府叫什麼？』新兵甲——知道前者而不知後者。問題：『你能在空白國家地圖上指出你的州嗎？』答案：『我對於地圖完全不懂。』問題：『在瑞士所說的語言僅爲德語麼？』答案：『我也相信外國，但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問題：『茹提里的三個同盟國叫什麼名字？(What were the name of the three confederates of the Rithli?)』緘默。問題：『爲何茹提里是有名的？』答案：『因爲對法人之戰。』問題：『舉出瑞士歷史上的一位名人。』答案：『格斯勒 (Gessler)。』問題：『你知道任何其他嗎？』答案：『否。』問題：『對於格斯勒你知道些甚麼？』答案：『他在森帕其 (Sempach) 打仗。』問題：『你的地方的市長是誰選舉的？』答案：『我從來不高興管那種閒事。』問題：『爲什麼你是那樣不肯到學堂裏去呢？』答案：『我不歡喜讀書，在家裏他們時常說它是不會與你一點好處的。』對於新兵甲主持公道——應該承認在缺乏準備上，他從頭到尾是頗爲一致的；茲將他的分數記錄如下：

5
5
4
5

意即在讀書、作文和公民上，完全不及格，而在算術上得了一個勉強及格的分數。

在同一考試上，有兩位應考者，獲得了最高的分數，一位是白賽爾的大學生，另一位是從上發賴失 (Uppier Valais) 山區來的青年農人。前者詳細描寫了從他的本城到路格羅之旅行，列舉沿途重要城市、江河、高山，甚至說出它們超出海面的約數。在歷史的考試上，在回答一些普通問題之後，他得蒙允許選擇古代或現代吏。揀選了前者，在清晰而正確的大綱中，他論列湖村居民 (Lake-dwellers)、亞爾卑斯山地居民 (Helvetians)、羅馬人、阿勒滿



人 (Allenarians)、勃良第人 (Burgundians)、各斯人 (Goths) 和法蘭克人 (Franks)。關於憲法，他顯示精通瑞士之國際關係，包括其公使館和領事館的組織、中立、護庇權 (the right of asylum)，關於通商、寄居留和定居權 (the right of settlement and residence) 各種重要條約。上發賴失的青年農人，雖從未受過高深教育，但會同他的哥哥在國內作過頗為廣泛的旅行，數年前，曾進專修科肄業，預備作爬山者之嚮導。被問關於高峻的亞爾卑斯山中的境界之現象 (Questioned on the phenomena of the higher Alpine world)，他顯示了一種透澈的親身經歷的知識，在空白地圖上，指出其廣大區域中之一切山道。在歷史上，他保存了在學校中學過的關於同盟國的發展之大部分，並且證明對於他的本州之編年史，頗為精熟。他對於聯邦憲法，沒有很多正確的知識，但他確實知道，發賴失在國議會中，有五位代表，在邦議會中，有兩位代表，並且知道他們是怎樣選舉出來的；關於他本州之實業和財政以及關於狩獵、漁撈、森林等一切法律，他也具有透澈的知識。

應該回憶反對我們的內政制度者歡喜的策略，是稱說它所用的考試，其內容包括一些細屑的、不合理、重要和不相干事件之問題。在瑞士反對新兵考試者所用的為相似的策略，例如據說有像下面列舉的問題：『若委爾 (Kawil) 河從東或西流經委勒德斯出貝 (Wildenbuch)？』(譯者案：原著註腳稱若委爾是一條小河，委勒德斯出貝為 Bernese Oberland 境內之山名，事實上，若委爾之河流，既不朝東又不朝西，乃是朝北的。) 『華德滿 (Thas Waldmann) 是被絞死的、被刎以斷頭機的或被鎗斃？』(譯者按：原著註腳稱華德滿從一四八三至八九年任沮利克之市長，為人強幹而專制。於一四八九年，被其仇敵推翻而斬首的。) 事實上，這種攻擊是不確實的，

凡較小的或不重要的問題，照例是避去的。舉辦這些測驗之專家，其旨趣並非要發見應試者所不知道的是什麼，乃在確定他們所知道的是什麼。

新兵考試之總成績，係僅以四種測驗（即讀書、作文、算術和公民）上之等第相加即得，最高的成績爲四。報告結果時，係採向來的辦法，將應試者分爲三等，四至六點爲甲等；七至十一爲乙等；十二及超過十二爲丙等。必然，這個定分和分等制，使瑞士陸軍將官們，能更聰明地管理新兵。考試成績列爲較高等第之兵卒，在下士出缺時，自然爲官長所願儘先拔擢，以後也照樣易升爲士官。成績表有一個三等之兵卒要想加入大家所欣羨之馬隊，就難被邀進了。總成績列爲丙等之新兵，常與其成績相等者被編於同一步隊，或其他不大需要知識之特別隊伍。在普通例行事務上，特別關於軍紀的事件上，軍官們照例是以其部下，在考試上被發見身心的弱點爲考慮的；因此在某些歐洲國家中，向來常見的虐待兵卒的事件，在瑞士是罕有的。甚至在一個新兵業已卒業之後，在他兵役記錄表上之優秀的成績，常使他較易謀取職位。公共學校公民教本，有時提醒學生說：『現在欲在公私營業謀事者，例如欲充鐵道雇員等，倘使他的軍役記錄顯示一個優良教育成績而品行端正，他就具有再好沒有的推薦了』。

所可惜者，乃是將兵卒分爲甲、乙、丙三等的制度，在聯邦統計報告上未被一律採用。爲着這個緣故，要想顯示考試結果之一的趨勢，就不易着手了。關於被分於甲、乙、丙三等之百分比，以可能有的統計而言，它們顯示一般兵卒的智惠質量之連續，而可觀的改進，自然，如每位教員所熟知，這種數字之準確度，特別是在必須作比較時，大部分是以測驗之難度、定分之鬆緊以及統一的標準爲關鍵的。然而在一八七五年以後十年中，瑞士普通教育有

了長足的進步，是無疑問的，雖這種結果，僅有一部分是由於新兵考試之影響。在該時期的頭上，後者顯示在達到受軍訓年齡的男子中，全國有三·六百分比，是目不識丁的。在幾州中其結果更壞，例如佛銳堡有一三·六百分比；發賴失，一四·四；西委斯，一八·七；以及阿彭色爾（Appenzell i. R.）三一·五百分比，目不識丁者。然而在一九〇九年，該國在軍事年齡的男子中，實際上已掃除文盲了，這是深堪慶幸的。參謀部的哀各列上校（Colonel Karl Egli, of the General Staff），僅考慮應考者中之最優和最劣者，關於瑞士陸軍新兵之教育的進步，曾作了相似的結論。茲將其統計列入第六表：

第六表 每百名被考新兵之結果

年	份最	優（在兩種科目以上有最高成績）	最	劣（在兩種科目以上爲四等或不及格）
一八八一年	一七	一九	一四	二七
一八九〇年	二八	三八	五	八
一九〇〇年	三九	四〇	四	五
一九一〇年	四〇	四〇	四	五
一九一二年	四〇	四〇	四	五
一九一三年	四〇	四〇	四	五

這種考試之結果，除被軍事當局引用外，在官廳的報告和報章上，也常採用它們的統計。其結果竟使它們成

了各州和同一州中之各市、各鎮的學校制度和對效率之指數了，據說，甚至有利用它們以比較同一學校各教員之教學能力者。擁護新兵考試者以爲如此振奮的競爭精神，完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別是因爲它激刺了公民的研究，並且不特造就了更好的士兵，同時也培植了更好的公民。

在另一方面，反對者嚴峻地批評了這個制度之競爭的效果。凡熟悉教育過程者，都知道教員們對於一切記分制之極端的懷疑。在瑞士常被入攻擊者，其實並非在於不公平，乃在於各地方的標準各異。某些學校爲令其應試者速成起見，所採用的兵操教練之熟練法，被重視心靈，而反對揠苗助長者，視爲罪不容誅了。在有些地方，爲即將應考的青年所舉辦的二十小時溫習科（twenty-hour review courses），簡直是一種最違背理性的知識之填充（crams of the most graceless sort）。在教育標準著名低的內地各州中，學生在新兵考試名列前茅時，教員可得謝金，而且至少在一個例子內，考優等的學生，自己也得了賞金。這種辦法，似乎居然使這些州獲得了它們不應該得的教育地位了，但大家都覺得這是不公道的和非專業的（unprofessional）。

世界大戰爆發時，新兵考試就被廢止了。當那在瑞士發生的急迫動員的期間，軍官們太忙，教員們也太忙（因爲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受陸軍部委任的），無暇舉辦該項試驗。當時的急需，是趕緊調遣軍隊捍衛邊境，不在對他們詳加測驗。反對考試之呼聲，在當時還有一種理由，即其所需之經費，雖據報告該項經費，如同一切其他關於瑞士行政事項一樣，是低得幾乎難於令人相信的。

然而世界大戰終止時，擁護新兵考試制者，立即動手爲其恢復鬭爭了。他們引據一切已往經驗，列舉上面與

它有利的各種理由爲它辯護。此外他們再痛斥現代青年醉心足球和他種遊戲，以及迷戀紙牌和出入酒店之非。是反之，他們堅持新兵考試會令男孩子在學校有確定的事件，以爲準備。凡被生計所迫，早離學校去作工者，會明白他們在服兵役之前，必須參加考試，其結果，會使他們努力溫習他們以前在學校中所學過的讀法、算術和公民以防遺忘。凡曾進工業和商業學校肄業者——且說，包括該國大多數青年——太容易傾向於專注狹隘職業科目，而完全不計其他一切。新兵考試，也能提醒他們，特別是關於公民科，必須在戰時和平時服務國家。一個民治國，如像瑞士，賦予其選民以最大和最重要的權力，不僅包括官吏之選舉，也包括用創制和複決對於立法作最後的決定，至少必須要求其公民具有要通過新兵考試所絕不可少的關於憲法和公共事件之最低限度的知識。兼之，瑞士有更大的抱負：它不僅是一個民治國，乃是現存民治國中之最完全者；它對全世界負有重大政治和文化的使命，要完成這個使命，其公民就必須具有公民的知識和對政治問題作獨立判斷之能力。

在世界大戰以後的爭論期中，反對新兵考試者，也提出了極多的理由。據說對於教育測驗之準備，使已離開學校而尚未在事業上立定腳跟的青年在業餘的時間，擔負過重。被迫而入工業學校肄業者，覺得其工作非常繁重。一九一五年對於中等學校（*Mittelschulen*）之改進的結果，不論如何，對於公民科之教學，有了更大的重視。我們可以公平地假定，青年們對於該課，比較一九一四年以前在新兵考試所加於他們的那種壓迫之下，有了更好的準備。在事實上，根據幾位權威，大多數瑞士男孩子，是不把軍事考試放在心上的，不管考試分數之高低，他們終歸是要服兵役的。故所以若堅持從該項經驗中，他們公民的知能得了任何永久的利益，實在是無稽之談了。

新兵考試制之更激烈的反對者，悲歎它在軍隊和學校間所成立的太密切的聯絡，以爲後者略被前者之宗旨惡化了，結果使瑞士兒童，無形中受了黠武的毒害。其他比較溫和的見解，也指責該制在其結果上是國家主義的，太集中管理於白恩了。至於最後這一點，我們膽敢說關於瑞士任何政治問題，不論是何性質，它總會被人提出，決不有誤的。在一九二四年一個專家委員會，由聯邦軍政部所指定的議員和教員所組成，確實曾建議將該項考試之舉行交給各州辦理。倘使這個提議竟被通過了，其試題必定會被腐化成一幕趣劇了；然而它使主張州權的分子大開其心了，因爲他們又可以大揩聯邦政之油水了。終竟，如我們將要提到，各州要求在考試行政上有三分二的代表權。

反對新兵考試者，再批評它們太爲『教育的』了（too much “pedagogical”），意即太過分注重了多年以前在學校中所學的科目之機械的記憶，而漠視了，甚至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從實際經驗中大致可以學得的事情。總之，它們所考的是知識，而不是應用知識之能力；它們僅企圖發見關於讀、算、寫和公民保存住了些什麼，而未成爲智力之真實的測驗。考慮心理的和所謂智力測驗，在美國之盛極一時的情形，有趣的乃是在瑞士之全部討論上，找不着它們的蹤影。

最受人攻擊者，乃在應用以新兵考試爲根據的統計，來顯示各州相對的教育程度。擁護州權者之情緒，於此大致又大露其鋒鏘了。然而有某種權威的主張，以爲考慮每年須加考驗的新兵之極多人數，以及統一的行政之極端的困難，所以根據全國各處所得的成績之比較，是非常容易引起誤會的。在邏輯上，這項辯論，能穀相等有效

地被用以擁護那些反對高度集中和結果公開之理論，不論這種公開，是否有傷各州之自尊心。事實上，它是被用以反對恢復考試制度的。結果分權的勢力，佔了很大的優勢，而且統計的比較也被禁止了。

這項關於新兵考試制度應否恢復之爭議，所產生的一種最希奇的議論，其所根據的事實，乃是考試落第者，不論如何均未被陸軍和選區所拒絕。他們問爲什麼不改造考試，而使軍務和選舉權均以考試及格爲準呢？這個問題是不矛盾的，因爲兩者既然均是需要某項能力和不應落到無用者手中之榮譽之爲公的義務。然而我們疑惑他們是以完全坦白的態度，提出這一點的，其背景或者是以反對新兵考試之恢復爲目的。必然難於揣想任何政黨或實事求是的政客，就連在瑞士，會贊成以教育的試驗，決定選舉權之建議。不論如何，它必須對聯邦憲法第四十三條，加以修正纔行得通。

上面的概說，或者足以顯示在瑞士關於新兵考試制之恢復各方面的意見是極紛歧的。甚至在該國的教員中，反對也是頗力的。在一九二〇年，在瑞士教員協會代表大會中，多數反對此制。在另一方面，對於這個制度擁護最力者中，有許多也是透澈熟悉它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作用之教員。在軍官們中間，也通行着頗爲懸殊的見解。然而普通，他們頗樂於相信考試對於軍事的目的之實利。然而將此制絲毫不變動地恢復起來，他們也是同樣反對的，因爲這樣的一種制度之費用，雖對於他們的目的完全沒有價值，仍然會加重軍事預算之負擔的。

在九年反復辯論之後，這件事情，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七日，因着聯邦行政委員會向議會提出的一個報告，達到了一個新階段。聯邦行政委員會，根據一九二四年軍政部的專家委員會之研究，建議倘使可能於一九二九年

實行恢復一種經過修改的考試制。在這新制之下，教育的試驗，僅限於公民和作文。倘使應考人在後者不及格，可再試驗其讀法。算術被廢除了，理由是被迫提早離校之新兵，對於該科在補習學校（*continuations school*）已經有了充分的訓練。對於反對根據新兵考試之結果，以比較各州教育標準者之理由，聯邦行政委員會贊成採納。故建議以後禁止公布該項比較之統計。在另一方面，關於職業集團之結果，可被提出，而且關於它們的研究，也可被公布。然而在教育考試上所得的分數，不像從前，不能記入新兵之服務記錄簿。另一方面，健身操的考試，照舊舉行，而其成績須登記在上項記錄簿內。最後，每州須選出兩位專家，會同聯邦政府所委另一專家，辦理各該區域內之考試事宜。

聯邦行政委員會之建議，代表一種妥協，如同多數妥協一樣，雙方都不討好。聯邦議會（*Federal Assembly*）將如何處置該項建議案，尚不得而知；並且，尤為重要者，人民將如何處置它們，因為在這許多由該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之後，最後它必被提交複決表決（譯者按：原著註腳稱當此書付印時，報章報告聯邦行政委員會之建議案，在國議會中被一〇四對四三票否決了。僅獨立民主黨贊成該提案，其他各黨在預備會議中（*in caucus*）決定反對它。關於此事之評論可參考 *Der Staatsbürger*, 13. Jhrg., Nr. 6 (March 16, 1929), S. 46. 自然，邦議會可使這事情延擱下去，而強迫國議會再加考慮）。倘使最後聯邦行政委員會之見解被採納了，新兵考試之新制度，顯然要比較從前弱的多了。留予各州的三分之二的管理，再將如何削弱它的權力，尚是不可知之數。

關於新兵考試之整部節外生枝的事件，只有在瑞士纔會發生的。這是該國人民在教育上深奧的信仰之芬



芳。他們關於青年公民之知識的資格所感覺的興趣——不獨是興趣，而且是切望——是無雙的（*seri. conaria*）。在其他各國，甚至在美國，對於第一次執行選舉權之青年，不知耗費了多少熱情的嘜語，而對於他們未成年以前所應有的公民教育，就很少有人過問了。在瑞士，自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年，對於這一層或者是過分關切的。在另一方面，顯然甚至在該國，新兵考試之舊制度，對於將屆十九歲的青年之主要的興趣——性慾、遊戲，在事業上立定腳跟——其嚴厲尚不足以作滿意的尅制。因為，最後的結果，瑞士或他國的新選民，在政治的知識和興趣上，同更成熟年齡集團之選民，比較在均數上顯然是劣等的。不論如何，聯邦行政委員會所提議的較鬆的計劃，要比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年所通行的舊制，一樣有效，是難於使人相信的。按照普通的報告——然而關於這種事情的報告時常是太悲觀的——瑞士青年，對於公共問題之興趣，是遠不及前代的。以在最近的爭論上所發展的反對而言，瑞士的中年和老年，也不如從前那樣堅持要以十分嚴厲的制度來考試青年了。然而這個建議計劃，雖遠不及舊制之嚴厲，但實行起來，仍舊要算是在任何國家中對於青年教育調查之最廣汎的設施了。瑞士人民，即使日漸鬆弛，仍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虔誠地服膺他們的國父裴斯泰洛齊的金箴：『一個獨立的民族，倘使沒有政治教育，就是一個玩火的小孩，使其家宅隨時有被焚之危險』（“ohne politische Erziehung ist das souveräne Volk ein Kind, das mit dem Feuer spielt und jeden Augenblick das Haus in Gefahr setzt”）。

## 第七章 瑞士的學校和教員

### 學校

瑞士人，慣常聽見外國觀察者，讚美他們的國家，爲民主主義和教育之模範的地方。然而在他們方面，是頗覺受之有愧的。關於瑞士民主主義之古老和完全是不會發生問題的；關於人民對於它之普通的接受，實在也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在本地關於這個題目之合唱，絕不是歡慶和純全的讚美；反之，其中攙有疑问的腔調，對於將來的惶慮之簡短的插樂 (minor interludes of apprehension for the future)。

關於瑞士的教育制度，也有相似的情形。外國的觀察者說，它是絕對不會錯的，它既然是由舉世同名的盧梭和裴斯泰洛齊接受了靈感的，而且是由下列諸人盡心培植的：撒爾者 (Sulzer)、哀士凌 (Iselin)、蒲德拉 (Potter)、查凡尼斯 (Charvannes)、斯塔弗芬 (Stapfer)、卜蘭它 (Planta)、德色里斯 (De Salis)、基熱爾德 (Père Girard)、德費侖堡 (De Feltenberg)、委爾利 (Wehrli)、納委勒 (Naville)、歌塞 (Gauthey)、金爪斯 (Cindroz)、德井卜斯 (De Guimps) 和極多聞名於教育學界，和爲瑞士全國所敬仰的，或至少是爲因着他們的工作使其學校著稱而有新貢獻的各州所敬重的極多理論家、改良家、教師和學校行政者兼之，以現有的教育制度而論，其民主

的普遍性和結實的美德，是被大家公認的，並且是爲人民自己盡量利用的。雖然，國內對於學校之批評，是隨時有的，並且是堅持到底的。

國內外人士，關於這兩項如此重要事件，其觀點之迥異，無疑大致由於這一個事實：外客是以他們本國所通行的民主主義和教育，照例是不甚發展的情形來衡量瑞士的；而瑞士人自己，全然地和在有意無意之間，用一種完全民主和教育制度之理想來衡量它們的成績的。在他們的態度中，最爲特別的，乃是他們時常將這兩件事情聯在一起的情形。關於訓練公民，使能履行政府所加於他們的衆多而繁重的義務，須有完備的教育之必要，在每個民主治國家中，有着極多演說和著作，其大部分必須純粹視爲莫測高深的奧祕（in a purely Herkwickian sense）。然而在瑞士人中間，對於一切這般的言論，絕對具有完全的，或者甚至是過分的認真。他們無條件地引用和接受葛拉德士吞（Hindstone）一句名言，即：『國家必須教育它的統治者』（the state must educate its rulers）。關於在他們中間所發生的任何政治弊端之討論，很少不立即反復強辯。它是由於國家教育之不良的，而改善教育，乃是治本的辦法。照例附有一種計劃，詳細說明所需要的教育的改善。

拿自斯塔弗芬（Alfred Stapfer），瑞士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 1789-1803）的學藝部長（minister of arts and sciences）和全國公共學校與師範學校制度之預言者，從他的時期以來，瑞士歷史之任何時期，都容易顯證上面之考慮。不幸因當時之不安的狀況和財政的拮据，斯氏的妥善計劃，未能見諸實行。反動跟着來了，直到一八三〇年間之更生期，各州各地，方纔開始認真設立公共學校。其後跟着一八七四年聯邦憲法之修正，在

這件事情上的特別的興趣纔又擡頭了，當時大家都承認創制和複決被擴充之後，爲民主主義在該國之將來的勝利計，使人民教育不得有廣泛的改進了。依照修正的憲法之第二十七條，各州須負責設置滿意的初等教育，它在公共學校中必須是強迫的和不徵收費用的，而且是由政府專管的。在該條規定之下，六歲或七歲至十四歲或十五歲之兒童，必須入學肄業。

達到一個較近的時期，世界大戰前期的瑞士人，關於外國人對他們在民主主義和教育上之成績所加予他們豐富的頌詞，或者確曾斤斤自喜，但時常有更大的戒心。倘若他們的政治被人家讚美是弊絕風清的時候，他們所引以爲恥的，在本國內最壞的弊端，不能超過這一個事實，即議會中某種委員會在議會開會期間，或者是可以完成他們的工作的，但未如期完成，而於閉會期間，動用公帑在山間名勝的地域繼續工作。當其被人稱揚無浪費公款時，他們就難於尋獲自責的口實了；但對於瑞士人，如同對於斯格蘭人一般，節儉乃是當然的事情，而頗難算是美德。自然他們的官吏有時也有錯誤，對各種計劃之推行超過了民衆之要求，但顯然不及私人營業上相似的錯誤之多。在他們方面，純然的盜用公款確是有的，但它們是極端地稀少，並且是受重刑的。對於一個聯邦制度之財政的負擔，外加二十五州的政府機關，任何人仍然是可以發出怨言的，並且眼見公務員，且說，包括公共學校之教員，人數之日增，也可使人不寒而慄了。

另有一個批評自己的例子，在任何一次選舉和複決上，投票人數低落時，更方正的瑞士公民慣於嚴峻地斥責他們的同胞，對於公共事務缺乏興趣，或者再加上對青年後生醉心遊戲和娛樂之悲歎。道德家對於逃稅的惡

習非常痛心，這種惡習，在瑞士某部，可說是數見不鮮的事件，但它所遭受之鄙棄，也加乎他國之上。例如當其外阿彭色爾的人民在全民大會中，因為他們的州長，對於賦稅法之執行，非常認真，他們曾破例不重選他擔任該職，全國人民對於這意外事件，曾表示公忿。

每年對於新兵考試的結果之公布，供給瑞士人民以特殊理由，可以對本國的前途表示寒心，而以其將臨的敗亡歸咎於學校。事實上，於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年施於全國十九歲青年的這種考試，顯示人民教育程度，在該期間內，是有顯著進步的。但是，具有更大的愛國心之瑞士人民，埋怨在一種學科上之成績——即他們極其重視的公民科——是及其他各科的實際，在一個將極多重要事件，交與選民決定的國家中，這種成績非大加改進不行。凡對於本國歷史和憲法顯示一竅不通者，咸被人看作具有極大危險性之怪物。也許還有人記得在美國加入世界大戰之後，各處馬上流行着一種恐怖的報告，即關於根據所謂智力測驗，在我國應徵士兵中，所發見的一個很大百分比之智力，從未超過十二歲普通兒童者（morons）。當時關於他們將來在全國各選區中之影響，曾惹起了一種不安；然而現在那些在當時被稱為 moron，而自戰地得慶生還者，在我們中間，照常參加一切活動，我們可以假定在他們的活動中，也包括赴票廬投票之正常的行為，我們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兩樣，只有在心理研究室中，他們是被看作獸子的。在瑞士人中卻不然了，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每年，是被快要參加選舉的某個百分比的青年之教育的缺陷，特別是公民科的缺陷，所刺激的。還有一點分別，就是所施行的考試，並非心理測驗，乃是以學校正常科目為根據的。因此，我們對於在定義上，不僅是未受過教育，而且是列於不可教育者之中的

notions 之恐怖，瑞士人是得幸免的。因為每年由新兵考試，顯示與他們的缺陷，並非關於被稱爲不能改變的大腦灰色質 (supposedly unchangeable gray matter of the brain)，而在於單純學校科目——讀法、作文、算術和公民——所以他們確實相信，借着教育的改良，這整個問題是可以被解決的。

如上面所描寫的，爲更聰明的瑞士人所同具的心理態度——被外人稱讚時之疑慮，關於他們的民主主義的將來之杞憂，以及戮力改進公民教育，可以保持民主主義之深信之混合結晶體——被世界大戰對該國的反響，大大地強化了。對於在條頓的和羅曼斯的語言，各地域之間，裂開的深淵，對於各地域熱烈偏袒在語言、風俗和地理的毗連，與他們最有關係的交戰國之利益，愛國公民們覺得氣沮。『天乎』，這樣的公民驚問道，『國家統一之意識，古昔同盟之精神，個人爲全體，全體爲個人之精神，數百年來擁護中立之精神：這一切都到那兒去了呢？』在世界大戰行將告終的時候，該國發見受着階級的仇恨的爆發之威嚇，類乎這樣的威嚇，是在兩代之中未曾有過的，其結果爲一九一八年之有革命性的總罷工。當時青年各種組織，對強暴行動所顯示的熱心，被人覺得是一種特別危險的徵兆。這其中必定是有毛病的，但瑞士思想界的許多領袖們，毫不猶豫地根據他們一向的主張決定，必須立即教育人民，以免這樣嚴重的政治過失，有再發生之可能。

在總罷工未爆發之前三年多，他們這種決心，已經被有名的委特斯泰動議案 (Wetstein motion) 引動了。在邦議會代表沮利克之傑出的委特斯泰所提出的動議，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被全體只差一票的一致贊成通過了。其提案之詞句爲：『請邦議會調查聯邦，可用以促進公民教育和訓練瑞士青年之方法，並提出關於該

項問題之報告和法案。委特斯泰動議案雖屬簡單，但它在全國各處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一位作家巧妙地描寫它爲引起山崩的一個滾石，而在一個短時間內，『公民教育』(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就成了一種切實的政治口號，該項名詞之好壞的意義，都兼包並蓄了。

委特斯泰動議案被通過之後，立即被聯邦行政委員會採納了，並被發交內政部作詳細的研究。後者召集了公共學校、普通補習學校、中學校和大學之代表以資贊助。包括上列各級學校教員之專業團體，定公民教育爲其開會討論之對象；以及汗牛充棟的小冊子，教育定期刊物和日報之論說，在愛國團體如新瑞士社(Neu Schweizerischer)和公民教育協會中之演說等。至少有一個政黨會議，曾將這個題目，作爲他們的討論之主要的對象。

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和三十一日，各州教育廳長之臨時會議，關於這個問題，通過了一個詳細而重大的決議案。按照這個決議案：

『青年的公民教育，須激發愛國的和社會的情緒，並須滲透整部教育。其宗旨在造就共和的瑞士公民，教導他，不僅關於他應享的權利，也須關於他對祖國應盡之義務，使他通曉我國政治組織和我國憲法的精神，使他深信爲國家之統一，和爲履行社會與文化的義務起見，有同他人合作之必要。一方面應予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以適當的重視，另一方面必須反對個人和團體的私心，倘使該項私心，危害全體的或大多數的福利。』

各州教育廳長之決議案，接着目標之頗爲理想的陳述之後，曾企圖爲公民教育之進一步的發展，擬定六個綱領。或者他們所提出最受人歡迎的建議，乃是聯邦政府須津貼地方，特爲這種新式教育所設置的師範科目。該

項文件，曾始終盡力避免得罪擁護州權者之詞句，其中有一條規定：『公民教育之組織、舉辦和監督，歸各州執掌（聯邦憲法，第二七條，二十七副）』；另一條：『無須變更律令賦予聯邦政府以更大的教育權力』。下面的文句更可顯證其謹慎，特別是不願觸犯教會：『傳授公民教育之義務，雖第一是賦予教師的，但它也是家庭，一切宗教信仰的教士、文武官吏和報紙之義務』。最後該決議案對左派的批評，也採取一種妥協的態度，主張：

『在公民教育方面之任何戮力，倘使同時不設法移去由社會的困苦所生之障礙，就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了。同產生社會的困苦之物質的和道德的原因奮鬥，予民衆公民教育以重大的贊助』。

有如各州教育廳長之決議案所暗示，委特斯泰動議案，業已開始碰着阻力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報上所公布授權聯邦政府津貼，關於公民科之師範訓練之聯邦的決議案，曾被部長擱置不辦。一九一八年之革命的總罷工運動，以及跟着它來的其他緊迫實際問題，使公衆無暇再顧到學校的改良。加之，因為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國家的統一，似乎業已大致恢復，所以對於公民教育之興趣，就隨着冷淡了。實在，有些批評委特斯泰動議案的人說，究竟，它不過是一種戰爭精神病（war psychosis）之表現，現在業已恢復常態，這種病症也可占無藥了。然而這種評語，並非完全準確，因為倘使它的確是一種精神病，它乃是瑞士人在平時和戰時都有的毛病。『公民教育』之口號，很可以說被獨立民主黨（Freisinnige-demokratische）佔領去了，它的黨員們，如下文將要顯示，特別戮力在瑞士東部各城設置志願的公民講座（voluntary civics courses）。誠然，隨便什麼時候要想戮力實施委特斯泰之動議，就必定有其他各黨派的領袖出來阻擾聯邦行政委員會，使其不得不放棄該項企圖。



反對聯邦在公民教育上之行動的重要政治集團，乃是天主教保守黨。它的黨員，在教育上熱烈擁護州自治（cantonal autonomy），因為它可以使他們管理自己的學校，而可以防免外界的勢力，侵入他們宗教和文化的勢力範圍。佛銳堡的貝克博士（Dr. Beck of Friburg），在該黨一九一六年在呂賽爾所召集的會議中，宣稱特斯泰動議案是反對宗教的，並且說它把學校之根本宗教概念犧牲了，倘被實行，它會惹起文化戰爭（Kulturkampf）。他的宣言有基爾主教（Bishop of Chur）為後盾。天主教反對瑞士任何統一的公民教育制度，其力量之雄厚，是無疑義的；因反對委氏之提案遂遷怒於委氏個人，使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聯邦行政委員會之競選上，竟落選了。

社會黨也加入了天主教保守黨反對委氏提案之陣線。該黨的領袖，堅持公民教育之整個宣傳，是由於社會民主黨曾將勞工青年羣衆，加以有效的組織之後，在資本主義者方面所發生的恐怖。資本主義者之真實的動機，乃在借聯邦政府之助力來作強迫公民教育之運動，外表雖似超然，實際將在幕後以保守思想之習慣，深植於一切社會階級之兒童中，包括勞動階級之兒童。

天主教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在原則上，都並不反對公民教育，其實，後者竟有少數領袖，以為它同社會主義是頗相融合的；兼之，他們同意可以在學校中教授公民，只要他們自己的利益，有了相當的保障。但是，教士們竭力反對聯邦的行動，因為沒有它，他們便可在他們所統治的各州之學校內，自由支配該項科目，而社會民主黨反對它是因為他既無力操縱公民教育，以為他們自己的黨謀取利益，當然他們不願它為任何其他黨之利益，有所貢

獻了。

除了剛纔提出的兩大政黨之敵對外，委氏之提案，另被瑞士西部和古諾笨登州之擁護州權者所攻擊。於此須記憶中央政府於一八八二年，在擬設置聯邦教育部長之提案上，大受挫折的情形。依照反對者之宣稱，該提案之背景，在於要把它作為在公共學校領域中銷滅州自治的運動之前驅。政客們從未忘懷一八八二年之挫折；有這樣可畏的政治的聯合反對委氏之提案，再加上民衆對於這個問題之逐漸的冷淡，何怪它們居然使聯邦政府束手無策，幾有九年之久。該提案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實際上被聯邦行政委員會，經原提案人之同意所作的決議葬埋了，然而該決議附有但書（Proviso），希望總統繼續關切這件事情，並設法促進能實現它的目的之一切適當的方案。

以在近的將來之確鑿的行動而言，這條被聯邦行政委員會所接受的但書，究竟能否超出一種空洞的願望之界線，是很成問題的。要想衝破反對任何中央集權教育政策之堅固的政治營壘，只有像前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恐怖，纔能發生效力。然而我們不應急切斷言，所費於委氏提案之八、九年的討論，是完全落空的。沮利克大學，業已將公民教育加入其課程了，其他瑞士高等學府，對於同類的學程，也已經有了更大的注意。所開設之學程，雖甚精良，但與美國程度相等的大學比較，其數量就未免太少了。兼之，志願公民講座，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成效；關於這一層，且待下文詳述。它們雖是在委氏提案前三年創設的，但從該案之討論中，它們得了不少的推動。而且，自從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九年，以無數小册子和在教育雜誌與報章上的專門論文之形式所發表，關於公民教育之文獻，對

於教員和他們的教學方法，必然有了重大的影響。

一般人民大學（Volkshochschulen），就中以一九二〇年創設於沮利克者最爲傑出，對於公民教育運動雖無直接關係，在他種學科以外，設有法律和經濟的擴充講演（extension lectures in law and economics）。就一般情形而言，成人教育在瑞士之進步，似乎不及北歐某些國家之迅速。但是瑞士也具有暑期學校、夏令營（Summer camps），兼有遊戲和教育之假期集團（vacation groups combining recreation and instruction）、婦女俱樂部、文藝會社（literary societies）、讀書會（reading circles）、演講會社（lecture societies）以及其他舉不勝舉的成人教育組織。各政黨所舉辦的種種教育事業，已於第四章敘述過，茲不贅言。一個慈善會社網（wohltätigkeitsgesellschaften）和一個公共幸福會社網（Gemeinnützigen gesellschaften）遍佈於全國，就了很多善舉，因而對於它們的會員之公民訓練，有了相當貢獻。圖書館的設備頗爲完善，而其分佈，在大體上，亦頗適宜。在幾個較大的城市中，有設備精美的民社（People's Houses），它們除價廉物美的餐館外——且說，並非時常是不售酒類的——並供給各種組織以開會地點，包括社會黨區黨部和工會等。

公民教育運動，大率是以全國中學爲對象。因爲主持該項運動者，以爲從六歲到十四歲的小學兒童，對於公民科之直接提供，尙屬過早；但是，我們在下面將要說到，在這樣的兒童之較高的年級中，業已開辦有最普通的意義之基礎作業。

在瑞士的意義上，究竟什麼是『中學』頗難界說，因爲在各州之間，缺乏統一的標準。依照一位著名的權威

谷若斯滿博士 (Dr. Marcel Grossmann) 這個名詞包括一切預備學生參加大學入學和祖利克聯邦工藝大學 (Federal Polytechnikum in Zurich) 入學所必經的程度考試 (Maturitätsprüfung) 之學校，不論其專科是古文學和語言 (Gymnasien) 或科學 (Realschulen)。在這一級中，有些學校招入修完小學四年級功課的兒童，繼續予以八足年的教育。然而中學較為普通地，僅招收修完小學五年或六年課程的學生，在它們當中也有規定，須再加一兩年之中等或郡立學校 (Sekundar oder Bezirksschulen) 之資格。所以在瑞士被列為中學的四十所學校所培植的青年學生，大多至十一、二歲和十八或二十歲之間。在天主教的中學中，照例要滿二十歲纔能卒業。(譯者按：原著註腳稱中學這個名詞，尚有一個較廣的意義，下列各種學校有時亦稱為中學：(1) 初級中學，每四年的郡立學校，其畢業生之程度，僅超過小學一兩年，大多設在鄉區；(2) 某些高等女子學校 *höhere Mädchenschulen*；(3) 各種高等工業、商業、專門和師範學校；以及 (4) 某種工藝、紡織、農業、園藝、牛乳業以及家事學等之正式學校。)

除上文以外，就難於概論瑞士中學了。在較富庶的州中，它們是宏偉的機關，校舍富麗堂皇，可與宮殿媲美，圖書館和實驗室之設備精美充實，而且教員之量質並茂。在較為寒苦的各州中，它們規模渺小，設備簡陋，教員之量質均差，而且，凡為天主教會佔優勢的地方，就都在其支配之下，就全體而言，它們所成就的工作之普通的效力和堅實，是毫無疑問的。它們完全受州政府之管轄，聯邦政府對於它們僅有之統治，是以兩種法規為根據的，其一是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所立之法律，規定具有程度證書 (Maturitätszeugnis) 者，始有資格參加聯邦所舉行

的關於醫生、牙醫、獸醫和藥劑師之考試；其二是一種法令頒布於一九〇八年，制定聯邦工藝大學入學資格。大家公認中學對於這兩種法規之應付綽有餘裕；實在，它們最受人抨擊的原因，在於它們在相互競爭中，曾使它們的課程，擁擠到極點。一位方正的瑞士批評家，對於這件事情，有如下的看法：

『將某些文科中學（Gymnasia）之成績，加以考慮之後，可得的結論，爲除了彼此競賽竭力多開功課外，它們沒有更高的目的；某些教員，以極端的熱心，從事於他們的工作之情形，有時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文科中學，乃是最後和最高的學府，而在以上，再沒有甚麼大學，但它的職能，乃在預備學生升入大學，而它不應該設法使大學成爲多餘的贅瘤。』

使其課程非常擁擠的另一要素，乃是一代一代的新從大學畢業出來的青年教員之加入，每一位這樣的教員，都決心要使舊的科目，爲他們自己積蓄的新學問，騰出地位上。因此，使瑞士的中學已經成了，並且仍然是時代的鬭爭之戰場，同前代美國大學在古文學和現代科學間所有之決鬭相類似。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學因着在舉的和許多其他理由，在委氏提案之前數年，就已經在受人攻擊了，其結果，在它們的教職員方面，發展了一種顯著的防禦反應（pronounced defense reaction）了。按照上面纔引過的權威，每個中學好像是『一個放大的螞蟻巢窟，在其中有許多精巧的工蟻，帶着它們的後代，沿着玲瓏而錯綜的途徑，從一個知識的餵養室進到另一個知識餵養室。在這種情形之下，從外面來的每一衝動自然會看爲擾亂；在大的驚擾中，每個工蟻，必竭力救護其寶貝，不論它們是古代的或現代的或僅屬於地方的性質。每種學科之代表，迅速

地團結起來，抵抗企圖改良學校者和一般事物之批評家，時常逼近他們老巢之攻打。』

主張公民教育者，除必須招架政治的、宗教的和地方的敵人之外，更須應付中學之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這是無可閃避的不幸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有兩條路：他們或者能鼓建議一個嶄新的科之創立，由加聘的新教員負責擔任，而且最好規定爲一切學生所必修，又或他們能將公民科之內容，分配予現存的各科，歷史和地理佔去了大部分，現代語言，也盡力作可能的大貢獻。第一項辦法，對於他們所抱負的全國的目的之重要性，似乎更爲適稱；但可惜它會惹起全體教員之被動的，倘非自動的，仇視。現存的各科中，沒有一科曾顯示有絲毫願意減縮它自己的各學程之傾向；而且，倘使一個嶄新的學科，加進了課程，它將使中學生久已不勝負荷之重擔，達到壓斷其背脊骨之虞歟（*the last straw to break the back of the middle-school students*）——瑞士中學生同美洲同年的任何青年，比較是一頭更能忍耐負重之駱駝。對於聯邦程度證明書之規定，或說對於一般中學競賽超出該項規定之戮力，不僅瑞士的教員們，就連瑞士的父母們，也已經在醞釀着反叛的運動了。

〔譯者按：原書之註腳稱：但是，該項規定之自身就頗爲繁雜了，尤其是關於語言之規定。不論如何聯邦程度證明書之取得必須通過下列各項考試：（1）本國語之文法、體裁和邏輯的組織，並包括對於其文學之知識；（2）第二種國語之閱讀和講說的知識，包括其現代文學之知識；（3）拉丁文；（4）希臘文，但可用第三種國語或英文替代；（5）歷史和地理；（6）數學——代數和幾何；（7）物理學；（8）化學；（9）博物——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礦物學和地質學；（10）自由畫和寫生。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所頒布，一九二七年所

實施之法令，曾將前項規定，略予變通，使學生有較多選擇之自由。在該法令之下，根據課程而分辯的三種中學類型被承認了，即文科中學（Literary Gymnasium）、普通科中學（Scientific Gymnasium）及高級理科中學（Upper Scientific School）——Literarygymnasium, Realgymnasium, Oberrealschule——具有六年課程之任何類型學校之教員，得主持程度考試，並發給及格證明書。此外聯邦政府，爲未能進中學而有同等學力之青年，另予以聯邦考試（Fremden-Matur）。關於外國學生比較容易進入瑞士大學之不公允的情形，久已嘖有煩言；必然聯邦考試可資補救。爲專科之研習，各大學得接受其他種資格之證明，例如由商業學校所發的程度證明書。

倘轉向第二項辦法，如像擁護公民教育者最後之所爲，將該科分配於現有各科，它可避免第一項辦法內之障礙，但又必須對付它自身所特有之他項阻力了。並非各科所有的教員之地位被它擡高了，除了歷史和地理教員，以及現代語的教員，也略可分潤外，所以凡未沾着該制的利益之教員，就未免有向隅之感了。他們同大多數專家一樣，是把他們自己的專門學科，看爲唯一的目的，整個宇宙之其餘部分，對於它們，僅爲一種背景而已。既然對於他們自己的目的，表示完全的滿意，所以他們即或對於公民教育之愛國的擁護者，所公布的光明燦爛的目的，也總覺不能抖擻顯發熱忱的精神來。兼之，倘他們對於他們的新職務，盡心將事，就必須設法縮減課程之其他部分，若然，又必須招致他們的有勞績，而有決心的同事之仇怨，倘使無法縮減，又會招致學生的父母和社會人士之埋怨了。

尤其關於歷史在第二項辦法中所獨享的第一把交椅，業已惹起了怨言。主張以瑞士憲法爲中學之獨立學科者中，有一位冒失者，頗帶醋味地批評說，擁護公民教育者之真實的目的，乃是對於將來，而不是對於過去之意識。他再補充說，『我們沒有爲全體瑞士人民，所引以爲光榮的歷史』，並且指出前幾世紀中之無數流血的衝突，而參加該項野蠻的內訌之兩造，在現在的聯邦中，均是站立在平等地位之各州。

這一點，經他這末一說，是很令人痛心的，而且在其它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例如在天主教各州中，教會內外的人士，對於在新教各州學校內所容忍的，關於中世紀和宗教革命之『背謬的教學』，時常不勝惶恐之至；當然在薩文黎 (Zwingli) 和喀爾文 (Calvin) 的信徒中，在其反面，也有同樣的情緒。社會主義者，擬重寫該國全部歷史爲一部階級鬭爭史。實在，他們當中曾有人這樣做過；而他們決意要盡量將馬克斯主義，注入學校中之公民科。反戰論者，反對歷史教學太注重戰爭英雄了；而軍事家，卻以爲反戰論太佔勢力了。

另有人，非難歷史教員——想到在瑞士的立場，他們的學科之極端聚訟紛紜的性質，我不能完全責備他們——以爲他們太泥於古代歷史，對於現代政治之喧囂，僅取隔岸觀火之態度；或至少覺得截至舊同盟期 (Confederation) (一七九八年) 或仲裁法令 (Act of Mediation) (一八一五年) 最爲方便，使學生對於範鑄該國現代憲法之一八四八和一八七四年之史事，毫無所知。歷史教科書，被人批評有黨派之見，或僅直書事實而不加以評論和解釋，所以不論如何，都不適於訓練青年公民去擔當將來的職分。某些瑞士的博雅學者 (certain Swiss pundits)，好像故意要重演落井下石的故事，自以爲把握住了經濟學可以絕無有誤地解決一切歷史的



問題之真理，而且以該種事件本身而論（for that matter），也包括現代政治上所有的問題，顛預地評論大多數歷史教員，關於分配之學理以及國際貿易的原理，毫不注意，更不必說一竅不通。總括起來，而以它們表面的形勢而言，上面的考慮，顯然證明，倘使歷史教員要教公民，終歸是吃力，而在任何方面不會討好的。然而他們在普通專業訓練和成功上，同他們中學同事相比較，是不相上下的。

轉到語言科在公民教育上的作用時，令人高興說，它不像歷史，似乎很少牽涉爭論的問題。無疑地，該科的教員，對於全國的諒解和統一，曾經作過，並且仍在作巨大的貢獻。自然，在一個有三種國語和無數方言的國家，像瑞士裏面，他們是特別佔便宜的。關於這門學科，在瑞士和我們自己的術語間的差別，是頗令人注意的。提到德語、法語和意語，我們稱呼它們爲『現代外國語』，『外國』一詞，在語氣裏，難免不帶着來自外國的或難懂的和甚至是卑下的暗示。對於瑞士人，按照聯邦考試之規定，在這些語言當中，有一種是他的老祖宗相傳下來的語言（matter sprache），正如英語對於我們的關係；但其他兩種，並非是外國的，而它們乃是第二和第三種國語（Zweite und dritte Landessprachen）。有着相距不遠的衆多的同胞，說一種或他種語言，在他們中間，常有旅客們講說這些語言，並且因爲青年們，具有赴外地遊歷之天然的欲望，而這種欲望，不必耗費多少金錢和時間，就能達到滿足，所以要使瑞士的中學生，深信現代語的學習之文化的和社會的價值，是頗不費事的一件事情。以同年齡的美國青年而言，這一切因子，都是沒有的或是很沒有勢力的——所以他對於中學的法語和德語的功課，興味索然，或熱烈反對。最後但非最少，凡從未進過中學的一切社會階級的瑞士人，包括工人和僕役，關於會說現代語言之直接

經濟價值是有很深的信仰的。(原書註腳謂：在英嘉丁、苦羅笨敦州(Engadine, Canton Graubünden)作者曾碰着鄉村商店的店員，和鄉村飯店的女招待，爲實際的應用，能講相當流利通行於瑞士東南地方附近之羅曼斯方言(Romansch)意語、德語、法語和英語。第一種，是他們的本土語。意語是同他們的本土語很相近的，德語屬於頗爲懸殊的語系，是他們在公共學校學會的；法語能使他們在國中羅曼斯語區域中謀得職位；英語可以在僑居該國之英、美人的家庭中，謀得僕役的位置。)

總之，瑞士中學之語言科成績之高，不僅令美國中學，就連美國大學和研究院，都要覺得慚愧了。甚至長於瑞士中學生四歲到七歲的美國學生，只要一想起兩種外國語閱讀知識之規定，就會嚇得魂不附體了。十八歲的瑞士青年，即須應程度考試，除他自己的國語外，包括第二種國語之閱讀和講說的知識，拉丁文之閱讀知識，以及希臘文之閱讀知識，唯一可自由選擇者，爲用第三國語或英文代希臘文。

好像這一切還算不夠，有些熱心公民教育者，主張制定這三種國語爲程度考試之絕不可少的，並規定它們在學校課程上，應佔相同的時數。他們的意見，以爲每個希望進大學和加入自由職業生活之瑞士人，必須精熟德語、法語和意語。然而我們懷疑如此重累中，學生會不會使他忤度在一個有多至三種國語的國家中之十足的愛國心之重擔。必然，倘使這個建設被採納了，過度的希臘文或拉丁文，就必須被裁了。

根據關於該科之專業文獻以觀之，瑞士現代語教學之內觀和技能，連同上文所述各要素，頗足說明它們所獲得的非常的結果和擁護公民教育者對於它們之重視。文學史上各主要時期，在語言科內，佔着頗爲重要的地

位，其內容包括它們對於當代社會和政治狀況之關係，所以成了各歷史學程之有價值的補充了。

我們可以臆斷德語、法語和意語之研習，在每個這些語言地域中，是會有兩個相反的作用的（two-edged sword），使瑞士學生，對於國家有離心的和向心的兩種迥然不同的傾向。然而在這三種地域中之離心的趨勢，都部分地各為一個第二或甚至一個第三國語之制定所抵銷了。兼之，對於代表在他們國內所說的和在他們的學校中所教的語言之各國，瑞士語言教員們，關於它們的文化和政治的組織分別的非常清楚。對於有關係的外國文化，他們表示最大的同情；對於宣傳到他們國內的任何過分偏狹國家主義之精神，他們是毫無同情的。例如德語和祖國在德國可以是二而一而二的，但在瑞士，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情。所林吉爾（Max Zöllinger）道：

『任何瑞士的德語教員不致於贊同洗那士（Franz Schnass）的見解以為在希勒（Schiller）的詩中「德國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富於宗教思想和誠摯的，同英國的假仁假義（Maria Stuart）法國的諷刺（Juno von Orleans）和俄國的暴戾（Demetrius）是絕不相同的」或接受「浮士德型的人物，對於戀愛之繼續的顛覆，如歌德之強有力的揭示」』。

亨尼克爾（Fritz Hunziker）評述這同一困難道，瑞士德文教員：

『必須建築通到我們北面鄰國之橋梁，而且他必須嚮導學生，沿着某條路徑，穿過同這鄰國界限分明的知識領域。但他必須非常謹慎，絕不可越雷池一步；免得因為他自己對於這些領域有了密切的接觸，遂接受了』

德國的一般知識的同情，並且將它們傳給了學生……倘使學生發展了這樣的同情，他的抵抗，永遠不屬於我們的政治文化之全部能力，就被削弱了。特別是在這一點，瑞士德文教員，務必看得十分清楚；他務必爲他自己劃出一條界線——或者非經一番劇烈鬭爭不可，但他務必劃出它——並且要十分當心免得稍有隕越。對於一個瑞士人，那是一件艱辛的工作，尤其是一個日爾曼瑞士人；對於一個外國人，這是十分不可能的，所以在瑞士不應聘德國人爲德文教員。

因爲瑞士人接受德國、法國和意大利文學之一切寶藏，爲他們自己的寶藏，所以擔任這些科目的瑞士教員們，自然充分側重他們本國的學者，對於每種文學的發展之貢獻。譬如格賽勒（Jeremias Gotthelf）、客勒（Gottfried Keller）和邁爾（Karl Ferdinand Meyer），在萊茵河彼岸，雖絕非寂然無聞的，但他們在該河之亞爾卑方面，就聲名鼎盛的多了。這些教員們，尤其注重極多較近的瑞士作家之作品，不管他們所用以爲表達的媒介是德文、法文或意文。學校中對於必讀的書目，既無呆版的規定，所以教員們可自由選擇他自己心愛的作品以爲教材。從各語言學程所讀書籍中，收穫了許多在公民教育立場有益的知識——古史（sagas）、民間的傳說、歷史的圖畫、當代的生活和道德之描寫，以及不少直接政治訓誡，例如克勒之 *Frau Regel Amruin und ihr Jüngster*。瑞士語言教學，同其各大鄰國所通用的方法，還有一個特別不同之點，就在於它注重方言之研習以及方言的作品。在羅曼斯語區域中，因其語言之古老，地方形態行將絕跡了，所以這種性質的工作並不多，但在德語區域中，因爲它們是日常交通之媒介，所以語言教員很注意它們。我們在他們中間時常聽見說：『在我們的國語中之

雙語平行的情形 (die *Zweisprachigkeit innerhalb der Muttersprache*)，而事實是說德語各州之兒童進公共學校時，所能懂和能講的，僅爲本地方言而已，雖這個事實，在瑞士國外很少有人提及。所以在一個很真確的意義上，他們的本國語乃是這種方言，而不是在德國所講的德語。在小學頭幾年中，方言乃是教室中所用的語言。其後學生必須學習以普通德語來代它，而在其過程中，他所碰着的困難，大多與學任何外國語沒有分別的。然而起初剝奪他的自由之事情，在後來的生活上，乃成了一種利益和一種快樂。他更能理解標準德語，因爲他曾在它和他的本地方言之間，作過無數可能的比較。倘使他的語言的研究，進展到世紀標準德語 (Middle High German) (譯者註：一一〇〇至一五〇〇年間所通行之德語)，在它和他的瑞士德語 (Schwyzdütsch) 間，許多極相似之點，就會吸住了他的注意。據說白恩山區 (Bernese Oberland) (譯者註：包括白恩州 Thun 湖之南，翁德華登州和由銳州之一部分) 之居民講尼白侖井語 (Langnau) 並且能殼不吃力地閱讀中世紀德文書籍。瑞士一般普通公民，雖不研究高深的文字學，但從方言之應用，也能得多量親切的滿意。他從方言的笑話、唱歌、故事和會話所獲得快樂，遠過他所認爲精確的、冠冕的和略帶高傲的德語。本地話對於他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意味，一種國民的特性，是使他同德國人有區別的；而他也有一點俏皮，故意使所用的方言，要德國人聽不懂，他纔覺得歡喜。同時，本地方言乃是他較小的祖國、州的生命之呼吸。所以瑞士的學校，對於方言之栽培，使瑞士人民覺得功德無量，並且對於形成他們特異的國民性，是確屬重要的。

熱心公民訓練者和一般改良家，歷年以來，雖常選定中學爲與他們的敵人交戰之場所，但它在瑞士教育計

劃上，絕不是唯一重要的制度。以學生人數而言，它遠不及小學，一九二七——二八年之統計，顯示後者有四七三、八六五學生之龐大的總數，男女學生人數，頗為相等；而在職業高中或預備學生進大學之高中（the super-ior secondary schools whether leading to the university or not）內，學生之總數，僅為一六、九四四，其中男青年幾佔五分之四（原書註腳稱：在初級中學內，有學生四八、五七九名，其中男學生略多於女學生。根據 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r Schweiz, 1928。）一九二八年在大學中正式註冊學生之總數為六、五九九，其中有九七四名為女生。外加旁聽生一、二七八名，大學學生總人數為七、八七七名。這些數字所顯示者，為瑞士對於教育，雖說有極大的信仰，但其富力，尚不足使其一切社會階級之男女青年，踴躍進入中學和大學，如同美國的情形；實在，自一九一三年以來，大學註冊人數已有減無增了。

改良家對於中學，所以表現如此敏銳興趣之一理由，乃在於進中學肄業的學生，是在對專業的職務和許多專業之領袖才所必需的高等教育，正在開始作重要的準備。並非因為他們全然是一個青年知識貴族（a youth-ful aristocracy brains）；反之，如像激烈分子，時常在怨憤中所指陳，只有父母之資產能設再供給六、七年求學費用之男女青年，纔有上進之希望。

對於為生活所迫，修完公共學校課程以後，不得不脫離正式學校教育之青年們，普通補習學校（general continuation schools）成就了一樁偉大的事功，在一九二八年，除五州外各州都成立了這種學校，入校肄業的

學生，共計三三、二五二人。在普通補習學校之外，瑞士可特別慶幸的，是它具有許多高等補習學校（*advanced continuant schools*），訓練學生去營謀各科專門求生的職業（*various specialized bread-and-butter pursuits*）。在一九二四年後一種學校共計一、一九一校，其中有六百校，是專教家事學的，對工業之補習，有三五四校，商業一三七校，以及農業一百校。它們從聯邦政府所受的津貼，共計二、三六〇、五六七佛郎，或略少於聯邦政府對小學之補助費。在一九二八年，在該項補習學校肄業的學生，共計一〇六、五一八人，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被家事學所吸引的婦女。家事學的教學之發展，大部分的功勞，應該歸諸一種為婦女謀普通幸福之組織（*the Schweizerische Frauenhilfsvereinigung*）。有許多專門性質的優良學校，特別訓練學生從事於各種商業、轉運、普通工藝、五金工業、美術工業、時計製造、紡織、雕刻、陶瓷以及農業。

瑞士補習學校之特別的宗旨，在造就能自立和對國家經濟生活有所貢獻之公民。借用該國人民常說的一個精闢的短句，我們可以說它們的目的，在造就『精良的工人』（*“quality workmen”*）。專門工藝學校，再進一步努力，為有能力求深造的學生謀出路，招收中學年齡的學生，予以三年至四年半的教育，使他們畢業後，能勝任經理的職務。

誠然，這一切實用藝術學校，達成高度功績了。實在，聞或有人對於它們太大的成功，表示不滿，因為它們不特造就了更多的精良工匠，並且也造就了更多的精良工頭、管理人和執行人（*more quality foremen,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純致本國各種事業，均有人才過剩的情形，使懷才不遇者，不得不向國外謀發展而使不

國失掉了優良的專門人才。

傑佛遜教授 (Professor Mark Jefferson) 一位美國著名學者，最近發表了一種關於創造才之地理分布之研究 (見 *Geographical Review*, XIX (Oct., 1929), 649) 曾特別注意顯示世界各重要國家，在一九二五年，頒給外國人民專利特許證的數目之統計。根據這種統計，瑞士人達到了一個特殊顯耀的地位；一切專賣特許局，都報告以人口爲比例，他們應居首位。『瑞士』，引傑佛遜教授的話，『在與百萬人民中有九百三十件專賣特許證，頒給了她的發明者，而其他重要國家，僅有二百至三百。』(原書註腳稱：按照各國僑居外國的人民，每百萬人領得專賣特許證之數目序次其等第如下：瑞士，九百三十；瑞典，二百九十九；奧地利亞，二百九十八；德國，二百七十一；法國，一百九十五；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一百八十八；美國，一百六十。以人口爲比例，瑞士所頒給她自己的公民之專賣特許狀，也多於任何其他國家，以每百萬人口計，一九二五年之統計如下：瑞士，五百四十二；美國，三百八十二；比利時 (一九二七年)，二百八十三；法國，二百六十四；奧地利亞，二百三十九；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一百九十一；德國，一百八十六。) 上面的陳述所根據的詳細數字，關於取得專賣特許狀的各種發明之相對的重要，基本的或其他，並未注意到，事業上，大致是絕不可能的。在它們中間，有許多絕無問題，是沒有多大創作才的瑣細的機巧，但因有相當的商業價值，所以值得向外國請求專賣權。一個在國內僅有很小市場的國家，如像瑞士，其公民對於作這樣請求之傾向，或者也比較大國家的公民，更爲熱烈。然而經過一切應有的折扣之後，上面所引用的數字，顯示瑞士人民，仍然在其他人民之上，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有極高的創造才。傑佛遜教授，以爲



這種國民特性，一部分是由於十六、七世紀在其比鄰的大國中所有的宗教的逼凌，使成千成萬的聰俊人才，其中有不少精良的工匠，遷居瑞士以避患難。譬如十六、七世紀的法國耶穌新教徒（Huguenots）創立了日內瓦的鐘錶業以及白恩和沮利克之絲綢工業。在當時因為瑞士人口中加入了優秀的人才，其工業就必然獲得了極大的繁盛。另一方面，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同現在相隔甚久，所以欲以當時發生的事件，來說明現代的經濟現象，就必須極其謹慎。就全局而言，今日的瑞士人民所據有的高度的發明才幹，似乎大多由於該國之優良的教育制度，尤其是上面所提出的極多工藝職業學校，所施予青年的極富於實用性之教育。

提倡公民教育者，對於補習學校之興趣，僅稍亞於中學，希望前者除極其實用的科目外，更能多注意關於十九或二十歲的青年，參加新兵考試之準備以及一兩年以後執行選舉權利之準備。對於新的補習學校之創立，他們是額手稱慶的，並且贊成關於某些階級的子女，必須受一、兩年或三年之強迫補習學校的教育之法制，如現存於若干州者。他們也嚴峻地批評，借口貧瘠而未開辦這種學校之各州，因此讓它們大部分青年，從十一、二歲一直到他們成年可以參加選舉的時候，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當然在工業時代之前期，兒童是被教養於學徒制之下的；但現在有人埋怨說：就全國而言，有很多青年，在完成義務教育以後九年或十年富於可塑性的生活中，大多無人教導，只得憑自己的幸運去努力前程，倘使當時他們獲得了良好的教育，他們就可以成爲比現在更好的工匠和公民了。

原本註腳稱：魯金布（R. Luginbuhl）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日，在白賽爾開會的瑞士教師會議（Lehreritag）

中的一篇演講，當時吸引了普遍的注意，以後曾以“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之標題印成一本小冊子，爲補救這般情形起見，曾建議創辦青年聯盟（Youth League），由一個自治區或城區內一切在十五歲與二十歲之間的青年所組成，由地方官廳委託該項聯盟負責辦理各種地方公益，例如視察各種道路、江河和水道、樹木之愛護、動物之保護、公共衛生之管理、健身操和手工、來後鎗之實習等之提倡。

倘使，如上面所說，中學有代表全國將來的領袖才之權利，那末，那些偉大公共學校，可更清晰地宣稱它們有代表它的民主主義之權利了。實在，沒有國家能作更確實的宣稱；事實上，瑞士人自己，雖對於他們的一切制度，平常總是謙以自牧的，就常以可寬恕的驕傲，作這般的宣稱。他們慣常說的乃是全體人民的兒童，無階級、職業或貧富之分，大家都須經過公共學校，正如全國青年必須經過軍事訓練的階段。誠然，公共學校和兵役之共同的經驗，對於瑞士人，終身拳拳服膺的全體人民，一致團結的情緒和友愛，作了有力的貢獻。

爲殷富階級的子女所特設的私立學校，在瑞士差不多是沒有的。在全國某些地方，有少數優良的收寄宿生的學校，但其中肄業的學生，除了極少例外，都來自外國僑民的家庭，其中有許多是英、美人士的子女。

原書註腳稱：然而有一個可以證明普通規則之存在的例外，可說就是日内瓦之很有趣的卜銳華學校（Ecole Privée in Geneva），該校曾於一九一四年，舉行過建校百週紀念，而現在是在卜銳華家族第四代管理之下，該家族爲其創辦人並即以其姓氏名學校。其舊畢業生中，有許多在該州之專業和政治生活上居於榮顯的地位，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黨之黨員，所以一位讚美它的人，稱它爲小瑞士的伊東或哈若（“a little Swiss Eton”）。

or Harrow<sup>2)</sup>，實在是名實相符的。在一九二七年該校有八十八名男學生，大多都是從七歲到十一歲的男孩，其中僅有一名是外籍的學生。該校之特色，是它久已實施自治和公民訓練，學生們按照日内瓦通行的選舉方式，選舉他們自己的官吏、文官和武官，而從事於一種很有趣的“Jeu de la Republique”，模擬在他們週圍的工業、商業以及政治生活。現任該校校長的卜銳華氏 (Ph. Privat) 曾簡略描寫這種遊戲，見 *L'educateur*, 61 st Year, No. 18 (October 3, 1925), p. 276. 和 *Centenaire de l'École Privat* (Geneva Imp. Atar 1914) 沮柏補勒博士 (Dr. Zubshöhler) 在格拉利舍各 (Glarisegg bei Steckborn) 所辦一所私立學校，應用全民會議 (Landsgemeinde) 爲其規劃之一部分。爲使這個記錄完全沒有遺漏起見，我們可以再加上在物德州和少數天主教的主教的州中，有些私立學校，在小規模內，是同公共學校競爭的。

主張正式公民教育者，對於小學雖不甚注意，但它們在許多方面，樹立了對於國家的興趣和愛慕之基礎。〔原書註腳稱：瑞士教育家，絕不都反對在小學教授公民。T. Wiget 根據在這方面的豐富經驗之一種研究，Das A. B. C. Staatsbürgerlichen Erziehung (Frauenfeld-Huber, 1916)，用一組顯著的例證，顯示在小學教公民之最有效的方法。在它種方法以外，他推薦兒童所觀察的或報章所描寫的政治事件之利用。H. Luppert 在 *Der Anteil unserer Volksschule an der Staatsbürgerlichen Erziehung* (St. Gallen: Feby, 1917) 中也極力主張在公共學校教授公民，但不必成爲一門特殊的學程。〕甚至在幼稚園內，從四歲到六歲的兒童，聽講神仙故事，其中有若干是得之於地方傳說的，和觀察常見的植物、動物和昆蟲以及鄰近各項活動，他用圖畫、塑像

和建造將這些事物表現出來。例如沮利克很小兒童，喜爲之事，乃是將他們在博物院內看見展覽的史前期湖上居民的房屋之小型，用泥土塑出來。在小學頭上三年中，這種活動，仍舊繼續上去，其範圍並被擴充了；國語科使兒童能享用優良教科書，其內容之大部分，是從最好的瑞士作家，細心選出的；而學校的步行和出外旅行之實踐，使兒童熟悉週圍各地方，並使他有敏銳的觀察能力。甚至在似乎同政治的範圍很少關係的學科中，也可將在公民教育上有價值的事情，靈敏地加入。例如在唱歌課內，可盡量採用民間的歌詞（*Folk-songs*）；在衛生課內，可側重煙酒對於公共健康之危害；和在算學課內，在算題中可盡量採用聯邦、州和地方行政上之數字。近年來較爲前進的公立學校，曾將兒童用於學校園和工場之時間，大大地增加了，一部分因爲它可以使兒童擺脫書本和教室之專制，一部分因爲它們深信手之訓練即腦之訓練，最後，因爲它們以造就全國工業生活所絕不少的精良工匠，爲獨立自足的生活，樹立了基礎。

在公共學校之中間階段（*Realstufe*），在優良城市學校中，包括九至十二歲的兒童，對於鄉土誌、歷史和博物作有系統的教學。在較低的年級中，這三科被混合爲一體而名曰『鄉土學』（*Heimatkunde*）。該科之教學，不僅恃書本，雖有許多極其精美可用的書籍，也憑借學校的步行和出外旅行之觀察。鄉土學盡量利用觀察法（*Anschauungsmethode*），而所根據的原理爲：『由近及遠』（*Vom Nahen Zum Fernen*）；實在，我們可以說它從家鄉的村莊或市鎮開始，逐漸擴充而爲郡（*Bezirk*）學和州學，最後就成了祖國之學了（*Vaterlandskunde*）。誠然，應用這條原則之一結果——很希奇的，就是這種結果，很少在教育文獻中提出過——就是極端強化了地

方的愛慕，對於狹隘而非對於廣大的鄉土之眷戀，這種觀念，是瑞士人之特性，並且在他們的政治上，具有龐大的潛力。

上文提說過，學校步行和出外旅行（Schulhaus-Jüge, Naturwanderungen, Excursionen），因為它們在瑞士學校生活中，是這樣一種最普通和最快樂的方面，所以它們值得特加描寫。它們在小學最低的年級中開始，他們的旅行，是以一日為限的，時常有他們的母親為伴——這對於負責的教員，可以說是能減輕其負擔的，但同時也平白增加了她的煩惱。對於較大的兒童，這種旅行，可擴充為兩、三天或更為長久。參觀工廠、博物院、歷史的名勝以及爬高山，自然，男學生最心愛的是長期野外生活，帶着燒飯的器具和帳幕，或居住在茅舍內。學校旅行兼有遊戲、練習和教育之目的，但時常留心，不使學生身體過於疲勞。凡因身體虛弱而被豁免修習體育的學生，非有醫生正式證明文件和家長許可的信函，不准參加旅行團體；身體康健的學生，也須呈驗家長許可的信函，方准加入旅行。每校有一個旅行委員會，由教員和地方教育董事所組成詳細規劃旅行事宜——據說其計劃之周到，甚至計及一日步行中所包括上山下山之數量——其宗旨，在使旅行對於優良的操練，能予以相當的勞頓，但不致使其竭絕。該委員會，也注意務使長途旅行之費用，在一個低限度之內，對於乘坐火車，得享平價的優待。倘使學生家境清寒，出不起低廉的旅費，學校可全部或部分代其貼出。

瑞士學校旅行，雖是透澈快愉的，但也不是純然寫意的閒逛（Bummelien）。反之，教員和學生對於沿途要看見的事物，必須預為透澈的準備。教員在途中，對於所經過的地方之地理、地質學、植物和歷史，須作非正式的談

話教員教兒童如何看地圖，等他們稍長，教他們如何測量和繪製爲自己使用之地圖。在旅行上，除了健康和學識之收穫外，教員同學生間之情誼，比較限於教室之接觸，更見親密了。

在兒童期如此養成的遊歷習慣，能使其終身受用不盡。它被繼續應用於童子軍、青年庇護同盟 (League for Youth Shelters) 以及各種青年組織——應用自行車、摩托腳踏車，或用一輛汽車以及鐵道，達到向全國遼遠地方作長途旅行之出發點。從這樣的起頭，許多成年人，發展了爬山的技巧，將他們極其短促的暑假，用於這種吃力的遊戲。其結果，以全國人口爲比例，瑞士就比任何其他國家，有更多的人民，精熟全國的地理，因爲熟識各處地方和它不可比擬的天然美景如此之深，對於它就油然而發生了深沈的愛好，而這種愛好，就成了他們的顯著的特性。海士教授 (Professor Carleton Hayes)，在他的國家主義論文集 (Essays on Nationalism) 中，提示愛國心之字義爲『對自己生長的地方之愛慕』 (the love of one's terra patria or natal land)；評論說，在一切大國或帝國中，最大多數的人民，對於他們的國家，知道的很微，因爲算是最廣義的愛國的，所以人都以爲他們是對全國有愛慕之忱的。(原書註腳稱：海士教授評論說，字義上的愛國心，是『頗自然的』，然而這種說法，是不無疑問的，想到許多『生長的地方』之平庸。『帝國的愛國心』，他繼續說：『必須更多是人工揉造的，更須以社會遺產的知識和意識的努力爲靠山』。自然，在培育狹隘的愛國心上，瑞士人享有其國內無上的美景所能予他們的種種便利，但是他們仍然最殷勤地培育它。並且他們應用很多『意識的努力』和『社會遺傳的知識』，來培育一種普及他們全國領土的愛國心。因爲他們的國土褊小，所以他們的工作易於生效，但他們所達到的高

度的成功，大多由於他們處理這件事情所用的智慧和力量。我們不必耗費時間來追問，在最後的分析上，究竟是知識或無知，是愛慕之較好的根據，但我們所能決然說的是：因着學校的旅行和它們所培植的習慣，極多瑞士人民對於他們心愛的小國之重要的高山深谷熟識的情形，如數家珍。

原書註腳稱：瑞士人對於自然之探勝，在一九〇六年，被 *Naturforschenden Gesellschaft der Schweiz* 之 *Naturschutzkommission* 以及在一九〇九年被一個更通俗的會社名曰 *Schweizerischer Bund für Naturschutz* 給予了力量和方針。因着這兩個組織之努力，纔有一個國家公園之創設，略似我們自己的廣大西部保留地之規劃，面積約二十方公里，位於古諾笨登州英格丁內之 *Val Chouza*。該兩組織，並曾合作，取得關於野生禽獸之保護的法律，因瑞士對於該項法律，有急切設置之必要。該自然保護同盟 (*League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 雖與公共學校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在其總幹事白賽爾之布儒里斯博士 (*General Secretary Dr. S. Brunnies of Basel*) 領導之下，曾印製了極多精美插圖的小冊子或傳單，並分送予全國學校兒童，有些傳單，是用方言寫的；專用以激起他們對於全國動植物的保護之興趣。學校教員，在自然科內，曾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應用這種印刷的材料。布儒里斯博士，也是國家公園指南之著者 (*Graubünden: Verkehrs-Verein*)，和該同盟的機關報，*Schweizerische Blätter für Naturschutz* 之主筆，每兩月出版一次 (*Basel: Verlag Benno Schwabe*)。

上文已提說，在學校中關於鄉土學的研究所用的課本，它們的數目，是無窮盡的，因為，由於『由近及遠』的原則之嚴正的應用，它們不特曾以較大的城市，並也以小市鎮為中心和出發點。斯崔克勒 (*Robert Strickler*) 1

一篇關於鄉土學教育的得獎論文之著者，在他的序言上評論說，數年前當其他從事於爲一個名叫 Hombrechtikon 的地方編輯鄉土學教本的時候，他的注意就開始被這一個普通領域所吸引了。在參考書中所發見的 Hombrechtikon 乃是差不多完全不被人知曉的一個鄉村，居民約二千四百，位於沮利克州沮利克湖上游之附近地方。同樣，瑞士的許多其他鄉村教員，也會被迫對於這個題材之豐富的文獻，來作相當的貢獻，或者留下了他們自己個人的鴻爪，和他們對於教育之偏頗的議論，但也使各該地方之生活和風俗，得借以流傳並有了意義。從這種簡短樸實但有效的論文（鄉村學校董事部所能擔任印刷的，僅此而已），關於鄉土學之教科書，高升到了適用於城市學校高年級用的十分巨大的卷帙，插有優美的圖畫並附有多幅地圖。著者所抽之版稅，必定不多；但在作品內，有一股新鮮的朝氣，一種特殊的個性，和濃厚地方色彩，可嘉許地反映着鄉間錯綜的生活，迥異美國一般規模宏大的書局所發行的，許多千篇一律而毫無精彩教本，但這些教本，或者是二十幾大州的學校同時採用的。提供於公共學校之高級的、補習學科之內的、和中學的祖國學（Vaterlandskunde），有時被指爲鄉土學之擴充體。然而，它照例較少注意地理或歷史，而極其重視公民學。近來，經濟的狀況，在這個題目之下，開始接受較大的側重。在瑞士，關於祖國學之最古的教本，是在十八世紀之末出世的，最早的課本是沮利克的威士（David Wyss of Zuni-h）所著之 Politisches Handbuch für die erwachsene Jugend，是在一七九〇年出版的。州政府和城市的教育董事會，曾時常鼓勵在這個領域內之文藝作品；例如，物德州之州議會，於一八二六年，關於適用於小學用的公民之最好的編纂，懸了八百、四百和二百佛郎三個獎金——以時間而論，和以所代表的地方之渺



小而論，這三個獎金是很可觀的。從那個時候以來，在這個領域內所刊行的教本，確有數十本之多，而其數額之增加，是與時俱進的。

瑞士公民學教科書雖其內涵頗為廣汎，但其目的，照例是僅專注於狹隘領域的，特為某一確定年級並且大都根據一州或少數州中所通行的狀況而編輯的。雖或頗為適合著者心目中狹隘目的，但我們必須承認，大多數教本所給我們的印象，是內容太擁擠、太粗糙和省略，使學校兒童不易消化。綱要的陳述和統計表之分量頗多，甚至有以問答體裁寫的教科書，使人不得不聯想到從教會問答（catechism）而來的痛苦經驗。有少數教本後面並附有普通民法之解釋，或者是提供了頗有實際重要的事件，但同時使業已擁擠不堪的學科，更加擁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難怪學生們有時批評他用的公民課，『在全部學校課程上，是最難而最少興趣的，是他們最不歡迎的功課。』有人為枯燥的教本辯護說，教員應能加入充分的例證和評論，使學生對於該科發生興趣。然而考慮祖國學和歷史及國語教本之出類拔萃的優良，對於如此重要的學科如公民，似乎不應該將教員的本領看得太高了——因為教員的本領，時常是一個不定的因子。

瓜斯（Numa Droz），一八八〇和一八九〇年間，一位最著名瑞士政治家，感覺在這方面的課本之令人不滿的性質，決意要使枯骨生春，結果就產生了他名聞遐邇的公民學教科書（Cours d'instruction civique），一本以真正魔力和真意所寫的教科書（a manual written with true charm and spirit），在講法語和德語的瑞士各州中，都被採用了。這一本造時代的傑作出現以後，接着有其他極多文詞，雖不及前者之茂美，但仍堪一讀。

而有相當學力的公民課本出現了。

以他們在教育上所有一切技能而言，瑞士教科書的作者，對於高年級用的教本之編輯，是稍有遜色的。公民在公共學校中，既然是高年級的課，所以對於上面所說的不滿意的情形，我們有了一部分的解釋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對於適應開始學公民的學生之需要所表現的希有的能力。我們可以提出柏唐里（Brenno Bertoni）所著之『小公民教科書』（Lezioncine di civica）為例，全書僅一百五十頁，印工精良，但無插圖，文體甚為樸質。以提省諾州一個村童，為其書之主人翁，柏唐里敘述他在家庭中、在學校中和在附近工作上之生活狀況，敘述他僑居意大利充當勞工之情形，以及他以後回國，在地方議會和州議會作議員時之急公好義的精神。他以巧妙的筆觸，輕描淡寫地，將地方的歷史、地理、人民日常生活狀態、他們同官所接觸的情形、公民好壞的品行、高尚道德理想及其酬報等，都插入其故事了，以赴白恩觀光為故事之結穴，使作者有機會描寫聯邦政府之實況。當然，這是一篇杜撰的故事，且是一篇消魂的故事，單純而無華，非常接近兒童的生活，倘在該書每章之末，沒有附着一關於政治的詳情之半頁的說明，就會使學生忘記他所讀的，乃是一本可恨的教科書了。但這本小書，絕不僅是一篇虛構的故事而已：字裏行間，雖滿溢着愛慕提省諾的意思，然而它同威廉·退爾（William Tell）一樣是充滿着愛慕瑞士之精神的，這對於懷疑該極南之州有同化於意大利之傾向者，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證件；對於愛好文學者，它可以作為『亞爾卑斯山及聖所』（“Alps and Sanctuaries”）之陪襯的作品（a companion piece），用柏唐里的目光，在內部的觀察來補充蒲脫勒（Samuel Butler，英國作家，生於一八三五年，死於一九〇二

年)從外面的觀察,因蒲氏雖爲瑞士之最同情的觀察者,然充其量,也只能作表面的評論,合而觀之,讀者可窺其全貌;最後,它在教育文學中,是一塊無瑕的美玉,或者因其範圍太狹,不能算爲天才的作品;但在本書著者所曾寓目的,使身體感覺不少厭倦的幾百本教科書中,它是使我不忍釋卷的唯一的著作。

關於瑞士教科書的編輯上,較合習慣型式之最優秀的作品,可舉愛勒新格 (Henri Elzingre) 之“Cours d'instruction civique, deuxieme partie”(公民教科書,卷二)爲例。它是印刷術之美麗的產品,格式精良,八十二大頁提示八十多種圖案和插畫,後者特別爲少年所心愛。課文清晰而簡單,綱目井然不紊,每章之末,附有總結。愛氏之書,專論聯邦政府,但其較早的著作,以相同的體裁,專論日內瓦州之政制,而對於其他羅曼斯各州,也各有相同的規劃。於此值得注意的一點,即在公民教科書中,不論州制之敘述,在先或在後,它總是被作者重視的,有時在初級的課本中,比聯邦政府佔更多的篇幅。還有一件令人注意的事實,乃是愛國心之概念,從未採取過窮兵黷武之方式;捍衛國家領土和關於其軍事制度之詳細情形,雖被提示,但瑞士之和平使命,以及其公民,在平時如其在戰時爲國服役之義務,時常是特別被重視的。討論國際關係時,照例特別注意紅十字會及其他有瑞士之正式參加和盡力提倡的國際合作的組織和事業。至少有一種新近出版的教科書,在州和聯邦政府的慣常討論之外,載有國際聯盟的組織和事業,無形中使學生覺得他是瑞士的公民,同時也是世界的公民。

在極多論列這般綜合的而特爲瑞士所有的科目,如鄉土學和祖國學的教本之外,也有很多地理和歷史教科書,差不多都是很優良的學校用書。後者,顯然都是毫無例外地以『由近及遠』之原則爲根據的,而專爲適用

於該國之某區或某州所編輯的，兩者之中，歷史決然是更難處理的，因為已往種種政治和宗教的爭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時常有人批評該領域內的教本，雖文字和插畫，都甚優美，但太死守枯寂的事實，而不肯稍加解釋了。顯然，解釋史實之責任，大都放在教員的肩上了，然而教員，又必須審慎從事，方不致闖下禍端。在另一方面，著者時常只有某一州的歷史為主要對象的，所以他可以比著全瑞士的歷史較為自由了。

茲再概論瑞士學校中所用的讀本，讀者或不以為重覆吧。我們可以發見在它們裏面，反映着各種語言和瑞士生活所特有的風俗。因為它們照例是為某一年級或為某一州的學校所編的，所以它們有最濃厚的可能的地方的風味。其內容，當然都出自瑞士人所喜愛的第一流作家之手筆，選擇亦頗精當，而具有地方性的文學，也絕未被忽視。這些學校讀本，時常是精工印製，而插有優美的圖畫，以其篇幅之半至四分之三，專載傳說和歷史的故事、自然研究和地理、附近地方之動植物、家畜之養護、職業、工業、建築以及各該州之風俗。因着它們的內容之優美和完備，所以不特可作為本國語言和文學之先導，並且也有不少公民的價值，可稱讚地補充了在鄉土學標題下所教授的材料。

上文的列舉，雖然好像是無窮無盡的，但瑞士的學校教育，並不是僅限於書籍的，並且其旨趣，似乎是要在可能範圍內，擺脫其羈絆的。更進步的公共學校之工場、校園和廚房，步行之普遍的實行，對於觀察法之普遍的側重，在補習學校和專門職業學校中所施的嚴格實際訓練，除了這一切以外，我們也被他們在體育上的重視所感動了。實在，後者是被看為公民教育之一要素的，為兵役之準備，同時也為將來經濟的獨立和健康的父母之基礎。許

多優良學校，在必修的健身操之外，並開設游泳和有組織的遊戲等學程。爲孤兒、爲瞎子、聾子、啞子和爲各種身心缺陷的兒童，設有各種辦理完善的特殊學校。

瑞士是普遍實行男女同學的，除非在中學，男女照例是分校的。雖然婦人沒有參政權，但女學生和男學生一樣，必須修公民。上文業已提說過，在公共學校中，男女學生的數目，是相等的，但在其上各級學校中，男子佔絕大多數，這是同美國的現狀，迥然不同的，而只可以拿瑞士人民之較不充裕的經濟資源來解釋。在公共學校中，不僅學費是免收的，就連書籍和其他學校用品，都由學校免費供給，大多由政府所負擔。許多較爲進步的州，對於家境清寒的兒童，由學校免費供給中膳，甚至也供給他們以適當的衣服。在另一方面，並非所有的中學，是免收學費的，不論如何書籍和學校用品，必須由學生自行備置。獎學金和公費（*stipends*）是有若干名額的，但許多父母，仍須令其子女提前輟學就業以維生計。在瑞士人中，如同在斯格蘭人中一樣，爲節省起見，須時常挑選男孩子中之最有成名之希望者，儘家庭經濟能力，予以最好的教育。如客勒（*Cottfried Keller*）直率地放在黑底結夫人（*Hrau Hediger*）口中的話：

這一家或那一家的父母，會有一個願出人頭地之聰敏的兒子，倘使他家的財產，足以供給他的讀書費用。或者一個人願意成爲一位衆望所歸的醫生，另一個人，願意成爲一位被人尊敬的律師或甚至一位法官，再另有一個人，願意作工程師或美術家；而他們當中每一個人，一旦達成了其心願，就易於訂一門好的親事，而結果成立了一個被人尊敬的，子女滿堂而幸福的家庭。

這位賢德而喜歡多嘴的太太，也沒有忽略一種事實，即在這樣的例案中，那個幸運的兒子或須供養他上了年紀的父母，或須隨時提拔他的弟兄們，使他們也可以享福。

心目中有了這個背景，就容易了解尚未脫盡稚氣的瑞士學生之刻苦求學的精神。從他們的世世代代必須同高山的環境奮鬥以延生命之老祖宗所遺傳下來的吝嗇和執拗的性質，使他們苦學的精神，更加堅定了，並且因為知道任何人要想在學術界佔一席之地，就必須精益求精和剋制經濟的困難，也就會使他心雄萬夫了。中學的課程，雖大多是由文化的學科所合成，但它是因着心目中的專業的目的，而以專業的熱忱所追求的。在瑞士一般中學中之青年學生，不論預備升學與否，在語言和文學上的成就，都非常可觀；且其在其他領域內之成就，也差不多有同樣的優美，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業已說過。把他們同美國同年齡的學生比較之下，令人注意的一點，乃是他們絕沒有像在後者中那樣不勝枚舉的『活動』(countless activities)，而該項『活動』，誠如愛德洛特校長(President Aydelle)之評論，同學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實在令人懷疑這兩方面是否都趨極端了。瑞士的學生，以其所有的透澈和結實，但被太多的科目所壓制，同美國較為寫意而僅及皮毛的準備之學生比擬，在樂觀心理和應變才能(optimism and resourcefulness)上，他們是不及美國學生的。

時常可聽見的一種評論，可以作為這個見解之後盾——誠然大多出自改良者和煽動者之評語，但有時也是出自大學教授的——即大學學生，太僅知道理頭讀書，而對於時務毫不發生興趣了。有時他們甚至被人責備以清高自鳴，從他們自己科學的和專業的成見之高岡，以冷眼觀察現代政治之鄙俗的鬭爭。並有人將更生期

(一八三〇——四八年)中學生組織所表現的熱烈，而甚至是武力的活動，來反比現代學生之柔弱的態度。社會主義者，當然要拿青年對於金錢的強奪和墮落的社會之天然的厭惡，來說明這個現象；反戰主義者，要以爲它是世界大戰之當然的結果；法西斯主義者，以爲這是由於缺少像墨索里尼的領袖人物。

在另一方面，據說瑞士西部的學生就很不相同了，因法國革命的思想，在該區域內尙未泯滅，所以他們對於政治的興趣和活動，是講德語的各州之學生所夢想不到的。兼之，某種大學肄業生兄弟會 (*certum univ. g. g. duate frat. ites*) 和具有光榮歷史之會社，竭力維持古老之傳統使其不致腐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芬吉亞 (*Zofingia*)，依照其憲法之規定，它是以在其會員中發展愛國心，爲其首要的目的。它雖然不參加黨派的政治，但由於四分之三的會員之表決，對於全國重大的問題，它也可以公然表示態度。在該會每年七月在古雅小鎮所芬井 (*Zofingen*) 所舉行之年會中，間有由瑞士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所發表的重要演說，該項演詞刊印成小冊後，流傳甚廣。近來各主要政黨，也已開始徵求學生黨員，並予以組織。社會主義者，早已誇耀只有他們知道如何接近青年，並感發其熱忱，但天主教保守黨和獨立民主黨，也已經各以其自己的方法，向着同一目標進行了。在後者的蔭庇之下，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舉行了一個學術節 (*an Academic Day*)，在白恩國議會之會場中開會，出席參加盛會者，爲全國各大學學生代表二百人，其結果，乃是一種永久的組織之成立。

瑞士學校，在傳統的背景上，雖說豐富，它們的範圍和方法，雖說優良，但它們的顯耀之主要的原因，乃在於其教學專業之人員。後者常被批評，因為它未能完成訓練一個完全的公民之不可能的工作，這一事實，對於人民放在教育他們的子女之男女教員肩之上重大的責任，就是最有力的反證。放在教員身上的責任之正面的證明，乃是他們所受的普遍的尊敬和順服。他們在國中，倘使不是唯一第一等的公民，也是第一等公民中的一部分。

在瑞士，從來不會聽見有人指着教員說：『的確，人是十分好，不過因為他們的高深的理論教育，或因為他們不從事於實際的事業，而僅從事於教育，所以似乎近於空想了。』他們也不會被一般人可憐，如像文雅的乞丐。這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其他階級的工人之收入，並未膨脹到很高的程度，所以譬如新興的零售商和裝設水管的工匠，都不能藐視小學教員所得的薪水。就全般而言，揆諸瑞士的標準教員所得物質的報酬，並不算壞，雖現在有加薪之必要，或由聯邦照一九〇三年之補助費加倍撥給，或由地方自行籌措。

甚至頑固的農民階級，在其他歐洲各國中，這個階級，絕不會看重知識的成就的，也不得不被一個很普通的事實所動容，即教員在鄉村中，乃是唯一買得起汽車的居民。實在，有時農民，因為學校教員，比手掌滿長角質老疤的種地者享受了更寬裕的物質生活，頗為牢騷不平。然而他也有報復的方法，即令教員執掌地方上的文書工作，充選舉監督、辦理呈報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之文件，以及地方上其他凡需要較高的教育程度和公程式的知識之公共的事務。

在許多事例中，民衆對於教員的感情，是超出尊敬和順服之上的。鄉村的教師或貧寒城區中之一卑微的教



師，在教學上，普通都有非常的技能，並且是專心致志爲學生謀幸福的，因此在地方上，成了傑出的人物，而被人民敬愛了。一位才力高強而眼光深遠的教師，在教育的方法之改進上，有了顯著的貢獻，或升任了一所規模宏大的學校之校長的職位，在他的州內和在聯邦內，就會被人看爲一位領袖羣倫的公民了，當他去世的時候，比較一位顯揚於全國的政治家，要受相同的讚美和更深的哀悼。

瑞士的教員，不特以他們在學校中的服務，也以他們的高深專業的資格和他們的透澈專業組織，贏得他們的同胞們之顯著的尊重。他們在優良師範和州立學校中，以及在本國和鄰國大學中，受過嚴格的訓練。他們在地方和全國的會社中，有嚴密的組織，總會之下有分會，分會之下有區分會，其議事錄，不僅在教育雜誌內，就連在日報上，也受了很大的注意。或者值得一提的，乃其會議所採取的政治名稱，這些組織中之一種代表會議，名曰“*Landtag*”（議會），全體教員的會議，常被稱爲“*Landesgenossen*”（全體大會）。在教育事件上，發生爭論時，例如當其委特斯泰提議案被邦議會採納時，重要教員組織之主張，成了全國矚目的重大事情了。又例如瑞士教師會（*Swiss Society of Teachers*），對於該項著名提案所採取的對策（*theses*），成了全國各處討論之對象。

瑞士教育會，除代表整個專業外，有時爲保障其會員個人權利，甚至不惜採用工會的策略，特別是教學之自由，在任何時候，被任何人威脅時。在這種事件上，如同在所有一切公職一樣，一般民衆徹底深信應予寬容，只要當事人之行爲端方，絕對不予以撤職之處分；而這些要素，被一種經驗，大加強化了，即倘使一位教員被地方教育董事會無故停職，或他的地方自治區，因着不正當的理由拒絕連選他連任原校教員，地方或州教育會，就會設法務

使有正式檢定狀的教員，沒有一人肯去補充其缺額。

(瑞士有三十四所公立師範學校，和十所私立師範學校。大致小學教員，必須受四、五年的師範訓練，中學教員，除了師範教育以外，並須在大學肄業幾個學期。)

(在沮利克和其他某幾州中，公共學校教員，是由人民投票選舉的，這個制度有爲人所意想不到的結果。當然，有被選資格者，僅限於受過正式檢定之申請人，這一層同上文所述防止擅用權威的方法，使齷齪政客無從施其伎倆。)

在瑞士，教學仍然大多是男子的職業。甚至小學低年級的教席，也大致還未因着無謂的擲節，被女性佔去了。一九二八年的統計，顯示在全國三千三百小學中，有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六位教員，其中男子佔六〇百分比（此外尚有三千三百六十八位副教員，而女性僅一百二十六位）。在其上，各級學校中，男性更佔絕大多數。他們在普通中等學校 (écoles secondaires) 中，和在高級中等學校 (écoles secondaires supérieures) 中，共佔其教席八五百分比。兼之，瑞士學校中之女教員，同她們的男同事一樣，大多都是以教學的專業，爲其終身事業者。在女性教員當中，頗少未入社會交際的女孩之類型 (flapper type)，即在未結婚以前兩三年，偶然以『花瓶』的作用從事於教學的工作者。瑞士人民，似乎也沒有反對已結婚的女教員之偏見。在一般鄉村小學中，常有夫婦兩個人主持全校教學者，丈夫擔任高級，妻子擔任低級的教學，兩夫婦即以學校的樓面爲住宅。在白恩州之鄉區中，在二千八百教員中，就有六百是結婚的夫婦。農民以其節儉的特性，頗爲贊成這種辦法，因爲不特可以使教員安心供職，

不致異思遷，因此可增加教學的效率，並且因為聘兩夫婦比較聘兩位未結婚者經費可略節省。所以常有夫婦教員，少小結婚以後，在同一鄉村的學校中共同以四、五十年的光陰，供獻于他們的專業，對於全村人民成了第二父母。

瑞士教員所享受奇妙的勢力，必定不僅由於他們的高等的專業訓練和組織，也必定是由於他們英勇的獨立和公民的活動。他們是以他們的專業為榮的，以為屬於該項專業，乃是不勝榮幸之至的，明曉它在民衆中所享受的尊重，有時甚至採取一種惟我獨尊的氣概（*ontifical manner*）；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深明對於公衆應盡的義務，而樂意在學校內外為社會服務。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常有派鄉村教員擔任該村之文書事務者；這種職務之確定的利益，在於使他對於校外的成人可有的親密的接觸，幾乎同他在校內，因着教學職務的關係，與其兒童之接觸，一樣親密了。兼之，教員在履行其社會的義務之中，對於地方風俗和行政，不久即達到的熟悉的程度，超過最老的居民之上，於是在其鄰里鄉黨中，就成了排難解紛者了。在瑞士有許多這樣的鄉村魯仲連，而且大致是因為他們，所以將教員當作不着邊際的空想家的看法，就絕無僅有了。在八月一號的國慶紀念和其他紀念日中，教員們常被邀請發表激動愛國情緒的演說，足見民衆對於他們的歷史知識和聲望之景仰。在他們所履行的繁多政治義務之外，許多教員，也是後備軍的軍官，在這個軍事的職務上，他們又同實際生活和成人的集團，成立了聯繫。最後，也是最關重要的一點，凡在政治問題上發生興趣的瑞士教員，並不慣於佯作超然的態度，或採取兩面討好騎牆的策略；反之，在學校範圍之外，他們大致會像其他公民一樣，公然宣示他們的黨派的信仰。總之，瑞士的

教員們，是隸屬於在他們四週實際生活的，而未被人認爲是不陰不陽的第三性之分子（members of the third sex）。

瑞士教員中，有極大部分，是實際從事於政黨政治者。升任聯邦要職者，並不算多，如第二章，關於各種專業，在國議會中的代表人數百分比所顯示。在州和地方立法的機關中，比較常有教員之參與，因該項議員之任務，比較不大會妨礙其專業的執掌。在另一方面，外國的觀察者，對於瑞士各政黨，在組織的工作和政策之釐定上，時常利用學術專家之事實，頗爲感動。或者最顯著的例子，乃是關於羅爾博士（Dr. Ernest Lau）的事件，羅氏爲農民黨之領袖，而且必定可算是全國最有勢力者之一，他挾着溫利克（Winkler）大學教授之資望，和關於農業及森林之深邃的學識來履行其政治的義務，在政黨代表會議中，凡遇有關於政策必須作重要的決定時，普通慣例，必預先約請一兩位大學有名專家，準備到會誦讀詳細的報告，接着由會衆自由討論，而擬定決議，且說，後者在形式和旨趣上，同美國政黨的宣言頗爲近似。

當然，由教育專業的分子所擔負的這一切政黨的服務，是不會不被人注意的，而且也免不了被人批評。尤其是在小鄉村中，有一種反對在教員方面之『陰險政治活動』之敵意；在農村選民中所流行的標語，大致不外『學校必須脫離政治的影響』、『教員不應玩政治』（Politisieren）或『教員之本位在學校而不在議會』。然而在城市中，在教員方面之政治活動，因爲太平常，所以幾乎不爲人注意，除非有些集團，覺得他們的利益，因此被忽視或損害了。然而，甚至後者，充其量也止限於訴諸瑞士古老洩忿的在私人接談間或在家庭廣衆（Stammisch）

中痛罵外 (man kann immer schimpfen)，此外別無其他舉動。

自然，由於公共學校的教員對政治之實際參加所造成的形勢，倘使後者，僅為保守黨或地方上的多數黨之黨員，就不大會惹起有勢力的方面之批評了。在事實上，卻不然，在他們當中，有很多是社會主義者。依照一位熟悉這方面的情形之權威，並非該黨之黨員，在白恩中學教員中，屬於該黨者，約百分之八。在較低的年級中，該項百分比，甚至還要增高，一部分或者因為所受的薪水較低，但大部分，因為這一集團的教員，同從勞工家庭而來的兒童接近，深知後者中有許多人，必須應付的艱辛的生活狀態。在白恩一所男子中學的一位著名的教員，是瑞士社會民主黨之主席，因此在他的指導之下，有一個規模頗大的秘書處；是一位國議會的議員；是關於政黨問題的小冊子和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之豐富的作家；在政黨集會中，時常發表演說者；並且同時他居然有工夫擔任德文和地理的教學——只有天曉他怎樣抽得出空工夫來！

天主教教士們、國家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對於公共學校教員中之社會主義者，當然要發生恐慌。上面所舉第一個集團用以對抗這種情形之策略，最近在白恩的教員中，激起了很大的公忿。當教皇的欽差，剛被遣到聯邦政府之後，就有人打聽出來，住居首都的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之兒童，被他們的教士慫恿、偵察和報告公共學校的教員在教室中之言論。至於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子，對於社會主義的教員和他們的政治的活動，當然在言談之間，有不少悲歎，在報章的言論上，也少露不安的意思。但這些分子，對於內地各州公共學校所任用的許多屬於天主教教士階級之男女教員 (Lehrbrüder und Lehrschwester)，幾乎同樣表示不滿。根據很可靠的專家

之意見，後面這種習慣，即或在聯邦憲法的字義上，並無不合之處，而至少是與其精神相背馳的，但因天主教保守黨，在國會中的勢力，頗為雄厚，而獨立民主黨，常需其贊助，始能組成一個有效的多數，所以聯邦對於這件事情的干涉，大概是絕不會實現的。以社會主義的教員而言，因為民衆對於他們的黨之擁護，是相當熱烈的，並且因為他們在各地教育董事會內，有很多代表，所以對於他們的干涉，也是絕不會有的。實在，如天主教各州的情形所昭示，相反的危險，有時也許是會發生的，即在社會黨佔優勢的城市中，具該項政治信仰的候選教員，可比其他候選教員，更易被選了。現在因為專業的資格提的很高，而謀教員位置的人數，被它們限制的又很嚴，所以關於政黨位置私人的檢舉，是很少見的，而在消息靈通者方面，對於這些事件，是痛加駁斥的。然而，在這一點，如同在他種公務員一般，我們間或可使他們吐露實情，即倘使兩位候選人之資格，是相等或幾乎相等時，有聘任權力者，是社會黨黨員，社會黨的候選人，就會中選了，主其事為中產階級的分，則中產階級的候選人，可獲勝利了。關於任用親戚、朋友、同鄉、同學等私黨之檢舉，比較政黨的偏袒，更為常見。

然而，在最後的分析上，對待從事於政治活動的教員之寬大的優容，基於黨派贊助的勢力之成分，遠不如某於在瑞士人民中之明達的領袖人物之深信，即這樣的活動，乃是該教員們應有的權利，而且其自身是有價值的。關於該項深信空前最真確而中肯的闡明，讀者必須閱讀自己是民主黨黨員的委特斯泰博士，關於「政黨教員」的一篇文章，於一九一一年初次發表，以後曾累被重版。根據這位在邦議會中代表沮利克之尊貴的議員之意見，在他的同胞們中，有些人，太歡喜用短淺的眼光，看他們自己為納稅人了，因此就以為他們自己是公務人員，包括

教員之雇主。好像私人生活上，某些其他雇主一樣，要想控制或壓制他們的工人之政治的活動，這樣的納稅公民，顯然未能完全了解現代憲法保障選民行動自由之原則。他們似乎也應該記得教員及其他政治的公僕，同他們自己一樣都是納稅人。從反駁轉到正面的理由，委特斯泰博士，相信公共學校中之有效的公民教學，絕不僅是從教科書的綱要上所拾取的牙慧，或死的知識，在教室中機械地背誦者（因委氏可算是瑞士公民科之泰斗，所以其主張頗有價值）。只有同政治有實際接觸的教員，纔能使該科有蓬勃的生氣，應用他自己親身的經驗，來顯證其過程。公民教學之首要的宗旨，不僅在使學生能通過考試，尤要者，在訓練學生能作政治的思想、政治的判斷和政治的行動。凡企圖能有效地授予這樣訓練的教員，必須自身具有這種訓練；而且倘使他們不親身參加政治，他們也無從獲得該項訓練。因此，委特斯泰博士主張：

在政治的領域內之切實的合作，不僅是教員的權利，也是他倫理的義務。公共生活，一定能因此獲益。處此危機四伏的現代，政治有分解為利益鬭爭的危局時，經濟的仇視，有傾陷整個政治組織之理想的利益，和政府自身之道德觀念之威脅的當兒，我們迫切需要，具有更廣博概念和更理想的傾向之人才出而應世。

倘使上面的思想是正確的，它對於因信仰而從事於社會黨的工作之教員，和對於加入其他政黨之教員都完全可通。除開有任何色彩的狂徒，並假定黨派之爭，未侵入學校的地盤，委特斯泰博士所得的結論為：

在我們中間，不能有排除勇猛的社會民主黨的教員於公共學校的門牆之外的論調。該項行動，不特是非必要，且是不宜有的。觀察這件事情的真像。社會民主黨的教員們，在他們自己的黨內，絕不是喧囂的搗亂分子，

甚至關於他們中間之最激烈的分子，我們也不能說他們偏頗的政治見解，妨害了公共學校的工作……特別  
是關於社會民主黨的教員們，當其他他們參加議會之實際政治時，是有益無損的；這樣做他們會適當地了解實  
際可以達到的目標，認識朝着確定目標進行的工作之優美的效果，因此可以擺脫烏托邦的幻想。

然而瑞士的教員們，不僅在政黨的關係上發揮其政治的活動。在公民講習科（*Trachtbinderkurse*）的事業  
上和他種公益組織上，如新瑞士社（*New Helvetic Society*），他們也佔着顯耀的地位；他們的姓名，常簽署於  
創制和複決之提案，尤其是關於道德的改進之提案，例如取締賭場。在瑞士沒有其他階級或專業，對於酒精的毒  
害之抵制，曾有過更大的努力，對於大家公認的輿論，即教育的工作而非政府的強制，乃是消滅這些毒害之治本  
的辦法之擁護，也沒有比他們更肯出力者。在各種教育會中，設有專部從事於這個問題之探討，這些專部，絕沒有  
像在禁酒以前，在美國學校中所教授的生理學，所特有的任何張揚，曾編印了適合兒童心理和以勸導戒除強烈  
酒類，而非完全禁酒為目的之讀物、圖表和揭貼。

在上面所舉一切為政治和社會的改良之戮力上，教員們抵觸了強有力的資產利益，後者絕不猶豫地提出  
針鋒相對的辯論。然而在瑞士，沒有一種風氣，使滿腹牢騷的經濟集團，稱反對他們的任何教員，為有危險性的過  
激分子，或甚至是一個布爾札維（*Bolshewik*）派的黨員，或非把他的飯碗打破不可。倘使有類乎後者的行動之  
嘗試，遭受其反響之災殃者，不是教員，乃是企圖眾人認為完全沒有道理的舉動之方面。日內瓦最近發生的一件  
事情，大可顯證教學專業的分子在瑞士所享受的高度的獨立和自由。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該城有由二十



九位小學教員的團體，聯合宣言，贊成軍事預算之取締和瑞士之解除武裝。這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弄得瑞士全國到處烏煙障氣。自然它是透頂觸犯國家主義和軍事分子的，特別因為瑞士軍事訓練的期間，在全世界是最短的，而其經常費又是絕頂地低。反映這些分子的意見之報紙，應用三種國語，以各種體裁的社論和諷刺，痛擊日內瓦背謬的小學教員。在另一方面，社會黨的機關報，趕緊殺出，代他們招架，這種打抱不平，對於他們或者頗難於自解，因為該黨在某些其他歐洲國家中之黨綱所要求者，恰為如像瑞士業已有的一種民團的陸軍制度。

日內瓦小學教員聯合會（他們不用聯合會這個名詞，雖無須將重大的意義加於這個名詞之上），或者被報章和政治對這意外事件之反響略為驚恐了，決定關於這個問題，在它的會員中，舉辦一個名信片複決投票（a postal card referendum）。一九二八年正月七日所公佈的投票結果，顯示六十位小學教員贊成廢除武備，九十六位反對廢除，四十五位未投票。雖這番投票所成立的事實，為投票者之大多數，是反對極端和平論者，而軍事家，仍然大為不快，因為它也顯證原來的二十九人，在他們的同業中，並非是孤軍無援的。而各方面，對於該聯合會缺乏勇氣，不敢表示意見，遂放棄投票的四十五人，顯然靡不痛心疾首。

結果這個波瀾在州議會中，引起了一場質問，跟着並有一幕由各重要議員參加的正式雄辯。這實在是一幕頗值得注意的公開辯論的表演，其略為寂寞的尾聲，乃邦議會的議長之宣言，略稱該會對於自稱贊成取締軍事預算的教員之草率的表示，頗不以為然，但它以為，對於他們無需加以其他制裁，並且它也不願接受該州議會的一位議員之建議，對於此種行為，制定一種刑罰，以儆效尤。這場波瀾，就此告終了；但在美國的立場，我們仍不勝目

目瞪口呆，而繼續驚異沒有愛國狂的（super-patriotic）個人，在全瑞士也沒有任何一個純全男性或女性的組織，要求將日內瓦原來的二十九位，或最終的六十位倡反戰論的小學教員，立即停職查辦，或驅逐出境。

（註）州議會之辯論，詳載於一九二八年正月三十日之日內瓦日報——*Journal de Genève*——而被全瑞士的報章，滔滔不絕地加以評論的。按照其後的新聞報道，於羅曼斯瑞士教育會第二十二屆會議，曾將日內瓦小學員教所提出的決議案，列入議程，詳加討論，該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集於 *Torrentriv* 地方，該提案，當時被四百三十一票中四百零四票否決了。但是，該社全體一致通過了一個提議，贊成在國際聯盟蔭庇之下，普遍的和同時的廢除軍備。

總之，瑞士學校制度，對於公民訓練之供獻，其中最有有效的事項，乃是教員們自己之高尚的品性。除了瑣屑的事件外，關於該專業，只能尋獲少數過失，而且加以考驗之後，可以顯示這些都是它的質量之缺陷。茲舉一端爲例：瑞士的教員們，或者太重視了團結的統一和教育現狀之滿意的性質，譬如，中學教職員拒絕改良的情形。他們有時也太重視了尊嚴，以致完全缺乏幽默的意識；但是，在這一點，他們反映着他們自己的民族之嚴肅性。在另一點，他們也顯證了他們國民性的一個特性，即對於公然顯露頭角的個人領袖才能之過分民主的敵對。在全部瑞士教育上，如像在瑞士政治上和全般生活上，獨頭權力（one-man power）是犯忌諱的。故此在習慣上，全體教授爲決定教育政策之重要問題的主體，從他們自己的同事中，選舉有名無實的和任期短促的校長，象徵攝政和主持典禮。美國人將正式權力和責任，集中於城市教育局長或大學校長之習慣，是違逆他們本能的情感的；而且即或有出類拔萃的個人，以其自己的精神，灌注於全校，但他們也是以間接的影響，而不是以直接的命令爲憑借的。在較小的事情上，也保持着同樣的原則。譬如一位從事於新奇教育實驗的教員，倘使公布他的研究結果，而宣傳他

的特殊方法，必將爲同道所不齒了。『寧可埋頭苦幹』，乃行爲之圭臬，在教育上和在瑞士生活之其他方面，都無例外。但是，有許多教員，在繼續從事於有趣的教育實驗，倘使在他國是會受大量宣傳的。

瑞士教員，在他們自己當中，都是平等的同事，而在教室中，他們都是主人。但這並不說他們在學生的管理上，是粗暴的或專制的；反之，通常在他們方面，有了解和同情，在學生方面，有尊敬甚至親愛。但是，關於學生自治，是否會有更好的結果，間或有以難安緘默的論調發出疑問，該項疑問特別發於熱心提倡公民教育者。美國對於學校共和政治之實驗，在瑞士引起了不斷的興趣，許多地方，曾有摹倣它們之企圖，較著者爲白賽爾、沮利克、彼得熱爾（Peterzell）和石川登（Schwanden）。並且在聖加侖一個高等學校中，自一九〇九年以來，即成立了一種學生之全民大會。

提倡自治思想者，以爲學校肇端之時，正是歐洲各國，包括瑞士，被專制獨裁的政制籠罩的時代，政治統治者之專制，十分自然地將它自己轉移到教員身上了，而其實質，仍無變化地保存於我們現在的時代。然而，凡在專制崩潰，民治擡頭的地方，尤其在瑞士，後者已臻極高的程度，教員之專制，不論怎樣仁慈，總是一種開倒車的舉動（an anachronism）。用這種方法所管理的學校，不適於培植能作獨立政治行動的公民，亦猶四週完全旱地的學校，不適於培植游泳的人才。教育的保守派（pedagogical standpatters），在爲現狀辯護上，提出現代的生活，在個人方面，需要高度的服從——例如在軍隊中和在工業中，並且根據現代青年之某種異樣而論，現在絕不是將大量的自決，付諸他們的時候。妥協的見解——一種容易提出但不容易實施的見解——是學校在下代公民中

應發展兩重的能力（即自決與服從的能力）。第一，他必須能夠將其自私的欲望，爲着公共的目的，心悅誠服地納於羣衆的行動之下；第二，他必須發展相當的個性，遇有必要時，能作他自己的決定，尤其是如像一個在非公民主國家中的獨立選民所應作之決定。

在瑞士，雖有一個似乎過分的傾向，幾乎要將全部訓練公民的責任，放在學校的肩上，然時常有人指出其他要素，必須顧到——家庭、教會、報章、經濟狀況、政黨和公共生活。關於這一切，本書都有詳細的討論。此處僅須略說家庭的勢力，已不如前代之盛了，在現代經濟狀況的勢力之下，其分崩，已有如江河日下之勢了。在基督教的國家中，瑞士的離婚率，僅亞於美國；但是它尚不及我們的一半之多。至少在新教的瑞士中，今日教會的勢力，也再不如昔日之盛了。政黨日漸傾向於經濟勢力的趨勢之反映，而且正竭力從事於與他們自己有利的那種公民教育，關於這一層，待下面詳論。至於經濟狀況之自身，它們在公民資格上的更直接和強大的影響，是毫無疑義的。瑞士理想主義者，永遠在悲歎現代唯物主義之侵入。歸罪於學校的許多公民教育上之缺陷，在事實上，顯然是應由唯物主義負責的。對抗如此強大的勢力，教員和教科書，都不大中用；除卻一個能建樹更廣大的社會正義之改革，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應付這個危機了。

主張增加公民訓練者，似乎太重視僅關於政治權利和義務的知識之獲得了。無疑，這般知識是可寶貴的，尤其是其在一個像瑞士那樣高級民主主義中。衆人或者以爲教員們，定然會贊同這個意見；但是，他們對於它，曾提出嚴重的抗議。他們指出，在選區中，凡最不能履行公民義務的人，每每正是具有最多公民知識的人。

譬如，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在該國德語和羅曼斯語區域間之仇視，和在新舊教間之仇視，都足以證明在公民精神上，最不够資格的人，恰恰是受過教育的人。誰是已經被人發見最不够公民資格的人，和誰是甚至在今日被發見最不够公民資格的人？知識分子、受過教育者，甚至——國會議員，在愛國的節日中，作悅耳的演說和高唱國歌者。以前從他們和現在仍舊從他們發出了這些仇視，流毒於民間。

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以前之評語，即支配人類行爲的不是理論乃是習慣，對於這一點，是常被人引用的。沒有人比委結特 (Th. Wieset) 用這一條原則發生過更大的效力，他的公民教育之甲、乙、丙，在瑞士已經馳名遐邇了。依照這位前輩的教育之說明，甲是關於公民事件之教學；乙是立定一個強烈的公民意志；而是養成履行公民義務的習慣。關於乙和丙，顯然瑞士教員的榜樣，比任何教室中的教學所可能達成的利益更大。關於甲，委結特相信直接的教學，不必是給予學生以關於政治的事實之詳盡的知識。愛國的精神，是由三條根吸收養料的：各種學科的知識，包括一個不多不少的公民科 (a moderate portion of civics)；一個公開而合作的傾向 (an open and co-operative inclination)；以及一個浸潤於公理和正義中之意志 (a will schooled in right and justice)。

教學雖僅爲公民教育之一部分，然而瑞士教員在這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公共學校和補習學校中之成就，就一般論，其品格是很精良的。中學和大學，在這方面的教學之質量是優美的，但其數量，尚嫌不够。根據在政治的事實上之平均的知識而論，似乎瑞士人民之教育，並不亞於任何其他民主國家之公民。在普遍的興趣和參加的習慣上，他們的等第極其高，實在必須考慮創制和複決，全民大會和市民大會等，放在他們肩上的繁重的責任。在

結束本章之前，我們不能不重提在初小各年級中，教授鄉土學所表現的希有的才智和熱忱。連同學校旅行之實施，它不只奠定了公民知識之基礎：它培育對祖國那種爲瑞士人民所更特有的深遠的親愛，這是其他各國的公民所望塵莫及的。親愛和知識聯合爲一——或者我們應該說一個廣大的親愛和不太多的知識——乃是家庭生活之頗良的方劑，瑞士人民，大量加於那個更大的家庭（即國家）之生活者，就是這種聯合。

## 第八章 教會和道德的改良

宗教改革以後三百餘年間，各種宗教的忠貞，加入了紛繁的離心的勢力，瑞士統一之情操，在反抗它們的過程中，筆路襤褸，斬荆披棘，不知耗去若干心血，而所得究屬無幾。許多瑞士人，酷似斯格蘭人，對於神學的論戰，具有深奧的興致，尤其在該國新教區域中，對於各維新宗派之先知們，更非常樂意聽信其浮言。甚至今日在全國各大都市，後者中，有許多仍保持着興旺的勸人改宗的差會（successful proselyting missions），使本地的教士，頗覺狼狽。向來這些宗派，大多是從英國移入的，近來也有極多是從美國輸入的，使瑞士人以爲我們在機械的和宗教的發明上，是一樣豐富的。在該國人民較爲清醒的分子中，有極大多數，可說是如像客勒（Gotfried Keller）之“Stichen Anfrechten”

在他們當中，很少有一個人，在禮拜堂露面的。他們不大提說關於靈性的事情。但……一旦祖國有了危險，他們開始逐漸相信上帝，起初各人只在心裏相信，以後漸次公開，直到內中有一個人，將他內心的信仰，向另一個人宣布了，於是他們立即在他們自己當中，宣傳一種奇妙的神學，其第一和唯一基本的主義，乃『天助自助者』（“Help yourself and God will help you”）

新教的瑞士區域，矜誇的事實，爲它發展了它自己的宗教改革，並且該項運動之發祥地，有三個城市，而它有

其二，即日內瓦和沮利克。當然，客爾文本爲法人，但被其祖國驅逐以後，他在瑞士覓得避難所並在麗曼湖畔（shores of Lake Lemnan），得有發展和實行他的制度之機會。在另一方面，薩文黎（Zürich）乃純粹瑞士產，自從兩次客百勒爾戰爭（Kappeler wars）（一五二九年、一五三一年）以來，尤其是因爲他的主義，使舊聯盟發生過無數次分裂。有一次，爲當時全國政治統一之唯一聯繫的議會（Diet），分裂爲兩個團體了，一個天主教團體，和一個新教團體。在地方政治上，宗教的問題，也常引起劇烈的紛爭，阿彭色爾（Appenzell）直到現在，仍被分爲內外兩個半州，原由於不能和解的宗教的敵對。實在，在十九世紀中，首因宗教的問題而發生戰爭者，在歐洲各國中，瑞士可獨享其盛名，倘使它也算得是盛名。

在一八四七年桑德本（Sonderbund）軍事衝突中，無疑也包括關於其他問題之爭執——被一黨或他黨佔優勢時，氣量褊狹的迫害所保全的古老歷史的恨怨，更被一八四〇年間，對呂賽爾之天主教的要塞（catholic stronghold of Luzern）之州際劫掠的出征（Freischarenzüge），大加煽動了。此外，尚有在該國新興工業化區域和內地位於崇山峻嶺中的各州之間，也發生了某種敵對，因爲前者憧憬着自由的政治展望，而後者堅守着傳統的農業制度和濃厚保守色彩的人生觀。不論歷史的解釋，對於這些附屬的要素，予以如何的權衡，而所包括的宗教的爭端，總是清晰的，並且其結果，總是新教的勢力之決然的勝利。一八四八年之聯邦憲法，成立以後，宗教的紛爭，就不再含有任何暴烈的威脅了——考慮它們在三百多年中所產生的混亂，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了。從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一九年，比例的代表制，成爲事實的時候，統治瑞士之政治的勢力，即在桑德本



鬪爭中，得勝的政治勢力。所以在天主教的立場，一八四七年之內戰，如他們的一位領袖最近所說，乃是一樁天字第一號的傻事（eine Dummheit erster Klasse）。然而，憑借着縝密的黨的組織與和平的政治的運動，自從那個時候以來，他們就會保障了自己的權利，以稀有的強頑和勝利，在憲法准許的範圍以內，抵制統治的黨之權力。在另一方面，新教在今日瑞士公共生活上所享之勢力，遠不及一八四八年以前之盛況。

然而，關於天主教的策略之考慮，不應使人忽略了新教的防禦反應之某種明晰的特性。當然，在雙方因着已往的衝突之記憶，都尚存着約略沈痛的情感，特別是關於宗教改革初期之浴血的內戰。因為那段『古老、久遠、沈痛的時期』，在瑞士公共學校中之歷史教學，就時時發生特殊的困難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業已論到。近來的鬪爭，似乎在宗教間所激惹的仇視，遠不如從前之盛了，或者，因為鬪爭的方式，近於人情了。幸而，一八四七年德本之戰，只斷送了極少的生命；兼之，經歷該次戰事的人，都已過世了。在瑞士新教的腦中，念茲在茲者，乃是一種遠超一切歷史考慮之地理的要素。恰巧毗連瑞士的一切鄰邦的領土——意大利、德國南部、法國和奧地利亞

——在人口中，天主教都佔極大多數。瑞士的新教徒，居於其中，好像成了一個完全被羅馬教的海洋所包圍的小島了，雖然這個事實，單獨地看來，並無多大的意義。不論如何，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八八年，他們的人數，比天主教的人數，要超過四五百分比。跟着移入的人口之增加，大多是一八八〇年開始，從近鄰而來的低級勞工，天主教的人口，火速地增加了。事實上，新教的優勢，於一九一〇年，已降到三分之一弱了（確數為三二·三百分比）。在世界戰爭期中，因為許多外國僑民，離開瑞士，各返本國從軍的原故，所以從前的比率，又幾乎被恢復了，一九二〇年

的戶口調查，顯示新教徒超過天主教徒的人數四〇・七百分比。但是，以毗連外國的環境而論，情形當然並無變動；而且一遇移民再有大批進境的模樣，新教徒自然又要發生恐慌了。在政治上，他們的感情有顯著的重要；大概因為深怕天主教將佔優勢的緣故，使他們反對奧地利的渥拉勒堡省（Austrian province of Vorarlberg）之併入，在自然形勢上，該省應該併入瑞士之領土，在一九一九年，只要瑞士表示願意要它，顯然就毫無問題了。又如關於這般較小的事情，如最近在白恩所恢復的教皇欽使館（papal nunciature）所顯示的急躁的態度（*touchiness*）。

一個美國人，考量新教的分子，在瑞士的人口上所佔略微優勝的地位之後，對於它反天主教的情感之比較的溫和，頗覺莫明其妙。在美國，新教徒雖超過天主教徒五倍，然而從二連三的無知主義（*Know Nothingism*）和美國愛國社主義（*A. P. A.-ism*），一直到最近的新三克黨（*Ku Klux Klan*）之變本加厲的瞎鬧，種種不斷的運動，更不必提為一九二八年全國選舉運動所產生的可怕的危言聳聽者（*horrendous shockers*），使我們無地自容。對於如此深思熟慮，見聞該博，和賢明的輿論，有如瑞士者，類似美國型式的狂亂的反宗教組織和宣傳，簡直是無立足之地的。比較最近在兩國所流行的類似的謠言所產生的結果，頗足顯證此種差別。在一方面，在一九二八年總統選舉期中，關於教皇將駐節華盛頓的目的之無稽的浮言，居然影響了許多選民是毫無問題的。在另一方面，在瑞士時常有類似的流言，大意是說，倘使教皇在意大利感覺政治的困難，也許要移駐愛因賽得能（*Ein-siedeln*），這種謠言，顯然不乏近似事實之意味。顯然，他覓不着更好的地方，那座具有寺院的可愛的小城，幾百年

以來，爲虛敬的朝聖者之麥加（the Mecca of pious pilgrims for centuries），在外觀上，比教皇是更富於羅馬教之風味的。但向普通瑞士新教徒講，這個迷人的神仙故事，勾不起他的敵愾之勃發，他反會以可憐講故事者，太爲幼稚的神情，一笑置之，而轉換話題。曾接待過許多外國被逐的君王，和許多弑君者（regicides），我們推測一個逃難的教皇，不大會攪溷了瑞士清幽的景象。

關於天主教的分子之政治的活動之討論，顯然應歸納於政黨制度之下，所以在第三章內，我們業已將它詳論過，在這裏，我們僅須指出那些經過改革的教會，雖仍成立於多數州中，但其勢力已比前衰減，茲列舉其原因如下。這些原因中，當首推瑞士政府之逐漸擺脫教會羈絆之態度。

從前經過改革的新教會，也有參加政治活動之資格，當其它仍然是一個有懺悔室的制度之教會（confessional church）的時候，當其它以政府的權力爲後盾，實施教士法規（clerical regulations）的時候，當其它對於建立在懺悔的基礎之上之政府，能貢獻計議的時候。但從那時以來，情況已根本變易了。政府已經脫離了宗教的束縛。教會自身，也發展了寬大的態度，並且它自己也採用了一種自由的憲法。

第二、因爲經過改革的新教會，是設立於許多州中的原故，在它的牧師和高級教士方面，關於政治的議論及活動，不得不小心翼翼了。在羅馬天主教的教會設立的地方，它僅須對付一個政黨，一個多少在它自己的勢力之下的政黨，而且它在地方上，比民主黨在我們自己的『堅固的南方』（solid south），有更悠久的統治。雖然如此，神父們時常被俗人（laïcs）提醒，他們不應該過分干涉政治。在另一方面，在新教的地域中，有許多政黨、教會全

體人士，是分散在各黨之中的，牧師們，據說並未完全忘懷，對於已得勢的和行將得勢的組織和領袖，有避免觸犯之必要。太側重了後一點，是會因太分畛域，而不公平的，因為它包含關於動機之推算，而其勢力乃是不可度量的；在另一方面，新教牧師的興趣，據說不僅對於目前的爭端，比向來較少關切，並且也逐步轉向倫理的、玄學的和甚至神祕的題材了。雖然如此，牧師對於宗教之宣揚，是有充分的自由的，只在靈性上，是被福音所限制的。關於主義之一切可以發生的問題，新教會之較高的權威，慣於以最寬大的態度和極端慎重的精神處理之。所以新教各公會的牧師們，可以對政治問題發生興趣，尤其是包含道德的考慮之問題，但很少牧師肯如此。因着聯邦憲法之一種古怪的解釋，天主教的神父，沒有被選為國議會的議員之權利，而新教的牧師們，卻有被選之資格。倘使在任職的期間，他們辭去教會的職務。後者雖享有這種政治的特權，但在聯邦立法之兩院中，曾充過牧師者之百分比，是極其低的。在另一方面，在地方上，他們時常被選為教育董事和慈善機關的董事。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牧師的職位之自身，可說有政治的性質。在新教的瑞士各處地方，其教會的牧師是由教會的選區之選民投票選舉的，其中有一個單獨的例外，即物德州（anton Vaud），該州的牧師，是由行政會議指派的。

新教各公會的牧師們，雖不慣於作政治的活動，但有時，對於待決的創制和複決的提案，也會發生一種新鮮的和多少有效的興趣。譬如有許多牧師，曾促進禁絕苦艾酒的修正案（anti-absinth amendment）之通過，並且也曾贊助過其後之節飲的法案；但我們必須說他們在反對酒精上之熱忱，遠不及美國新教的牧師。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責難他們，怕開罪於其會衆中多數反對禁酒的分子；在瑞士，關於酒類的問題之處理，絕對不能採取斷

然的強制，而且大多數牧師，在意見上和在實施上，對於禁酒的迷狂，都不感覺興趣。然而對於其他道德的爭執問題，例如取締遊戲場中之賭博，都頗能得他們的贊助。並且包含社會的正義之問題，尤其是婦女和兒童的勞工、保險和養老金的制度等問題，常有牧師們以個人的資格和大無畏的精神，主持公道。照樣，許多牧師，以特別的熱忱，從事於廢除軍備和世界和平之促進。譬如，爲瑞士加入國際聯盟之熱烈爭辯的複決運動，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牧師們，是始終參與其事的，前者差不多都贊成加入，而後者大多都反對加入。最近有很多新教會的牧師們，曾採取一種主張，贊成單獨廢除軍備，類似日內瓦小學教員聯合會之主張。牧師們，都不採取極端的和平主義，但他們的情操，是很不以戰爭爲然的。例如一九二八年三月，瑞士各新教會聯合會，曾上書聯邦行政委員會，籲懇務必竭力贊助世界和平，強制仲裁和廢除軍備。顯然，這個請願，對於牧師們在政治生活上，採取更大的活動之運動，特爲其肇端，因爲以後在同一年內，該聯合會議決在創制和複決的表決上，保障它的原則，雖繼續保持它的超黨派的態度。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它組織了一個新教通信社，它希望借此影響全國的報章，並切實支配輿論。

瑞士的保守派，對於某些牧師，徹底改良道德和政治之熱忱，當然要感覺不大放心。使他們更加納悶之事實，卽很多新教的牧師，乃社會黨之忠誠的黨員。因此，我們常可聽見一種在美國絕非創聞的說教，關於宣傳純粹的和無玷染的宗教之義務，和在禮拜堂講經時，完全不談政治之絕對的必要。但是，關於牧師方面之過激主義，有一個寬大的而令人興奮的容忍；並且，如學校教員的事件一樣，予以撤職的處分之提議，倘使確有人提過，也是稀少的。在保守派的圈子中，和在實際的政客們中，有人雖痛恨一切左傾的趨勢，但是又都同意，必須讓牧師們自由宣

講死後的天堂，和他們所愛好的今世，任何社會的烏托邦，然而有一個條件，即任何待決的提案，大約會被該項言論影響時，牧師們就必須慎守緘默。雖在保持現狀者的立場，這樣的謹慎，是稱心如意的，但不能說如此劃出的界線，從未被跨越過。在另一方面，間或聽聞有牧師辭去教會的地位，以便更自由和更有效地從事於他們所最關切的社會的義舉。

然而遍察一切，政府和新教會之間的關係，比從前較為疏遠而間接，而且顯然，後者之政治的勢力，仍在衰頹之中了。但是，我們不應該臆斷它在瑞士的公共生活中，是毫無足重輕的。它仍然是靈性的統治者，因按照法律的規定，凡未簽具不願入教之聲明者，均為當地國教之當然的教友，雖其中有許多人，從不赴教堂禮拜而對於管轄他們的牧師之職權，全然不聞不問。據說，就連實際上在教堂中租有座席者（actual pew-holders）中，也不乏大量的自由主義（latitudinarianism）。但是，在教堂的說教中，和在主日學校對青年之教學中為灌輸的高尚道德和獻身（self-devotion）的理想，對於瑞士良好公民之造就，和優秀領袖才能之培育，決然不會沒有效力。如上所說，牧師們自己，很少從事於政治的活動，但在牧師家庭中所撫育的兒童，長大成人時，常有成為出類拔萃的政治家者，乃為人所共知之事實。在慈善事業中，各改革的教會，也有難能可貴的成就。然而，政府誠然佔去了這個領域之大部分，而且為維持它所設立各種慈善機關所加於人民身上之繁重賦稅之負擔，也減少了教會向其信徒所能勸募之捐款。然而教會的救濟事業，曾顯證了它的特殊的價值，尤其是關於實驗的事業之創辦，以及凡一切不需廣大的資源，和只有政府纔能運用的行政專技，而需要分別待遇和親切的照顧之慈善事業。於本世紀之

初葉，在日內瓦和白賽爾之都市中，曾廢除了國立教會之制度，而且在有一個時期中，人都以為他州會採取同一步驟。然而，直至今日，它們仍站立得很穩，現在對於這個運動之興趣，似乎也所餘無幾了。依照某一部分的觀察者之意見，普遍的廢止，國立終竟是會轉禍為福的，可促成靈性的復興和革新的教會勢力之廣大的擴充。然而，如同在英國一樣，瑞士有許多擁護教會和政府合而為一者，贊成國教之理由，並非在其自身之價值，乃因為他們，以為它更能有效地抵制統一的和在政治上猛進的羅馬教派。

大概這最後提出的辯論，是很有根據的。新教的國立之彰著的效果，乃是對於在他處常見的新教團體，分解為極多小宗派之傾向，大加遏阻了。在瑞士，找不着有三萬五千居民之『中等城市』（“Middle towns”），能殼誇耀，倘使誇耀，在此處是合宜的動字，容納二十八個宗派的四十二座禮拜堂。如我們在上章已經說過，宗派雖是有的，但每每是很小的，所以只租得起小房間，而統治的新教團體之教堂，為數較少，但其建築則宏麗壯觀，並且，更關重要的，乃是主持各該教堂之牧師們，比較美國相等大小的城市之平均一般新教會之牧師們，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優的俸給。而且瑞士的革新的教會，更能吸引鄰近各種階級的居民，去做禮拜。如像時常在美國，可以看見的，在宗教生活上所表現的社會的隔離，以某某宗派，代表資產階級和其他宗派等分別代表中等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傾向，在瑞士是沒有的。因此瑞士農村宣教師，有向整個地方團體說教之特權，同時，他也有必須適應一切所有的需要之困難；而都市的牧師，必須顧到他的教區中大部分的人民之意見——所以，關於政治的問題，在講壇上之言論，也有謹慎之必要。

在瑞士的小黨中，僅有一個福音人民黨（the Evangelical People's party），是確實站立在新教基礎之上的，這是同在政治上有堅固組織之天主教迥異的。目前該黨在國議會中，有一議席，在沮利克和白賽爾市區兩州中，有幾千選民的羣衆。福音人民黨，雖根本是一個宗教的運動，但也有一種特別的經濟性質，因為它極端反對瑞士政治上之欣欣向榮的唯物主義。按照它的一位重要領袖：

『我們是站立在私產的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間之對峙之圈外的。我們根本反對統治的私產經濟制度，因為它是一個很悽慘的人類的制度。我們也根本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因為，倘使它是具有同一品格的人們建設的，它也是一個很悽慘的制度。我們擁護神的制度，或至少有這企圖。經濟的資產，仍為個人的私產或為集體的財產，不是主要的或迫切的考慮，而我們必須看它們如上帝的財產，並如此處理它們。』

上舉信仰之表白，用為兩種極端的經濟制度之破壞的批評則有餘，但我們或者可以懷疑，關於待決的經濟和政治的爭端，尤其是經新教各派解釋之後，神的指導或為他們現在所必須奉為天經地義的聖經的指導，是否時常能給予確切的解決。同時，誠如德爾教授之批評，福音人民黨，似乎命定必須永遠徬徨於歧途之間，因為聖經的文字，時而有這種啓示，時而又另有他種啓示，使他們迷於個人主義和集產主義之間，終久莫所適從。

任何重大的猶太人的問題，是不存在於瑞士的，實在，該民族在該國人數之稀少，根本就不能成爲問題。依照一九二〇年之戶口調查，他們的人數，總共僅有二萬零九百七十九人，或等於全國人口千分之五，稍微多一點。在他們當中，有五分之四以上，是居住在瑞士七個大都市之中的。無疑，因為從前法律的限制，但此種限制，現在久已



廢除了，在內部各州中，猶太人的人數，是極端稀少的；例如，尼特瓦登（Nidwalden）和內阿彭色爾，在一九二〇年，各僅有屬於該教的一個公民。

舊日法律之限制，並非是普遍的或極端繁重的。一八四八年之聯邦憲法，雖建立了寬大的言論、出版和結社之自由，但它並未保證猶太人或各宗派（即不屬於被承認的教會之基督徒），舉行他們的宗教禮拜之自由，關於此點，兩者均須依賴各州之善惡。兼之，該年度之憲法，曾賦予凡屬於基督教教會之公民，在瑞士國內，各處定居之權利，但不得享受各該地方之公民權利，然而，於此又將猶太人的公民，留予各州的立法自由處置，有些州，拒絕了他們有定居之權利，更有他州不容許他們，為不動產的所有人。大致這兩種法律的歧視，並非由於瑞士人，對於猶太人的公民，懷有任何特殊的反感，乃由於恐怕一個更寬大的政策，會鼓勵該民族自鄰邦的領土，尤其是亞爾薩斯（Alsace），大批地移入。

大多因為後一種考慮，聯邦政府，拒絕與和蘭及美國訂立友好的商約，因兩國均堅持它們的猶太的及它們其他的國民，在瑞士有平等的權利。然而在一八六四年，法國皇帝路易士·拿破侖（Emperor Louis Napoleon），曾提出相同的條件，該項條件，所以曾為瑞士所接受，因為附帶着某種於他們最有利的讓與（concessions），使他們可在法國出售鐘錶、緞帶和婦女所用冠帽、首飾等類貨物。既然將這樣的權利，賦予了法國猶太人，當然再不能拒絕瑞士猶太人，享受同樣的權利；於是提出了一種憲法增補案，即有名的『猶太人的條款』（Judenartikel），先由國會通過，然後於一八六六年正月十四日提請人民復決，又被一七〇、〇三二對一四九、〇四一

票以及十二州半對九州半通過了。同時，聯邦曾對固執的各州，施用壓力，勉強它們讓猶太人在地方上享受公民的權利，阿爾各（Aargau），乃為在一八七七年，最後讓步之州。

其後在瑞士，就很少有反猶太人的感情（anti-Semitic feeling）之表現了。最可注意者，乃在一八九三年，對聯邦憲法所通過的一種創制的增補案，禁止『宰殺牲畜時不先施以麻醉的手術，然後使其流血』（第二十五條副）。這個提案，原由保護動物會（S. P. C. A.）所提倡，後被仇視猶太人者，乘機利用，中間雖經國會勸導人民，將它否決，最後仍由一九一、五二七對一二七、七〇一票，以及十一州半對十州半通過了。然而，參加投票的人數甚低（四七·六百分比），使這種獨立意志之表現，有了倖得的利益之形態（the appearance of a fluke），反猶太人的分子，全體出動，而他們的敵對，守在家中，沒有出來，滿以為像這樣一種愚蠢的憲法創制案，是絕不會通過的，覺得頗堪高枕無憂。然而，結果仍然是提案者，弄巧成拙，因為聯邦立法機關，堅決不肯對於違犯該條增補案者，制定任何懲罰。

誠然，含有民族性質的社會的歧視，是稍微有一點，反猶太派的小規模的表現，也時有所聞的，但它們，都足以在瑞士的政治上，發生巨大的影響。在世界大戰期中，關於某部分猶太商人，被人指責為不公正和破壞中立的行為，曾激起了不少惡感。兩種宣傳的報紙發刊了，在性質上，是反對猶太人的，也是反對互助團的（anti-Masonic）日內瓦之手頭枷（pignon of Geneva），和沮利克之瑞士旗（Schweizerbanner of Zurich），後者專為一種名為『瑞士家鄉保衛軍』（Schweizerischer Heimatwehr）的會社，發表演論的機關。兩者在捕風捉影

(wild credulity) 恐怖的預言 (dire prophesy) 和完全缺乏邏輯上，都酷似福特氏之低爾波獨立報 (Mr. Henry Ford's Dearborn Independent) 幸而該報，現在業已停刊。在一九二八年的頭上，瑞士旗的主筆所轉載的一個廣告，使社會受了一度虛驚，該項廣告之爲贗造，一目了然，故後來證明確係捏造，但該主筆，硬說是白賽爾之一猶太人的慈善會社所登載。這個寶貴的文件中間，有一段建議該民族之清寒分子，應以瑞士法院、行政官廳和陸軍等官職爲其救濟。因登載這種完全不能取信於人的偽造的浮言。該報主筆，遭受了嚴厲的抨擊——其報紙，被人指爲『屠殺猶太民族報』 (The Pogrom Journal)，這種稱號，太把它的身價擡高了——並被控以毀壞名譽之罪，在地方初級法院，被判處以七十佛郎之罰金，並須將法院判詞刊載於報端。上訴之後，高級法院（州法院）判決維持原判罰金，而將登裁判詞一節免除；再提起上訴，聯邦法院，將罰金一節，亦准予免除，但加申斥曰：凡附合明目張膽宣傳攻擊某部分人民之運動者，必被人反攻。這個不幸事件，頗可清晰，顯證一種事實，即在瑞士知識愈高之集團，反對猶太人的情感也愈微弱。——然此種情感，在任何集團中，都沒有深惡痛絕的形態。羅馬天主教在歐洲其他各國中，在這種民族的敵對上，每趨於極端，但他們在瑞士的教友們，是比較寬厚的。實在有人說在某某都市中，例如沮利克，因他們兩個集團，都居於少數的地位，所以在選舉競爭上，天主教徒，有時贊助猶太的候選人，而猶太人也有時贊助天主教的候選人。

## 瑞士撲滅酒毒之運動

在瑞士教會所關切的諸種道德改良之中，剷除酒毒一項，有特殊的重要。該項運動，並不僅限於宗教團體——反之，如上文所指陳，某部分的牧師，頗不願表示同該運動有關，而且許多教會的分子，也反對在這一方面的改良之立法。此外尚有極多學校教員、醫生、編輯和政客，在後者中，包括不少社會黨的領袖，是在竭力設法撲滅酒精之毒害的。但是，某種戒酒的組織，俱有顯著的宗教性質，例如饒卡特牧師（Pastor Roth）於一八七七年所創立的瑞士藍十字同盟（Swiss Blue Cross League），目下有三萬以上的會員；以及哀格爾主教（Bishop Engel），等於一八九五年所創立的瑞士天主教戒酒者同盟（Swiss League of Catholic Abstainers），現有會員約萬人。於此值得連帶一說者，即瑞士人，尙未發展任何近似我們自己的反酒店同盟（Anti-Saloon League）。他們反對糜費金錢於政治運動之堅決，會使他們以為該種性質的組織，非徒無益而有損了。

（註）前節之數字，係採自 J. Olemart's Taschenbuch für Alkoholiker (Trunksünder: Aholikergewer-Verein, 1921) 面一七九。此外尙有美以美會的戒酒同盟，有會員兩千人。在教會團體以外，Olemart 更列舉其他團體如下：秘密禁酒會（Secret Temperance Order），有會員四千三百人；瑞士婦女戒酒者同盟，有盟友一千六百人；瑞士反對酒精同盟，有盟友一千六百五十人；社會主義戒酒者同盟，有盟友一千一百人；瑞士戒酒教員同盟，有盟友一千一百人；瑞士鐵道戒酒者同盟，有盟友九百九人。上舉各團體，大多隸屬於瑞士撲滅酒毒總會（Swiss Central Organization to Combat Alcoholism），會所設於 Avenue Dauphine 5, Lausanne。

瑞士戒酒運動的領袖們，一律倚重教育和道德的制裁而不重視禁令。確實有一個時期，人民被激動，遂贊成了含有禁令性質之創制案——即有名的一九〇八年七月五日苦艾酒增補案，它被通過於二四一、〇七八對一三八、六六九票，人民的表決，以及二〇對二票州的表決。想到一切其他酒精的飲品，並未被這條憲法牽涉，它

的執行，似乎無大困難；但是，我們仍可聽見，間或有私售苦艾酒之客棧和酒店。

但在這方面之基本憲法增補案（第三十二條副），乃是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者，當時瑞士人民以二三〇、二五〇對一五七、四六三票民衆的表決，和一五對七票之州的表決，授權聯邦政府，管理蒸發的酒精之製造和售賣。兩年以後，根據這個修正案之一法律，制定聯邦政府，有專賣酒精之特權，也居然打破了複決之難關，經二六七、一二二對一三八、四九六票，人民的表決通過了。它從素來憎惡各種專賣之人民手中，所受的稍稍出乎意料之外的贊助，大致是因為一種協議，即聯邦政府同意以專利之整部贏餘，以人口爲比例，完全分與各州。

關於酒精專賣行政，在瑞士曾否減低蒸發酒類之消費一問題，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知識界之意見，似乎是它在這個方向內有了稍許的效益。然而，不幸一八八五年之憲法增補案，明白規定凡從葡萄酒、水果、草果和根莖所蒸發的酒類，不屬於聯邦的管轄。當時有比較少數的農民，如此利用過他們賸餘的水果和草果，但無人相信他們所釀的酒類，在市場上，能同政府專賣的酒類競爭。然而，其後瑞士的果園和農場所釀製之酒類，在市場上，居然有過賸的情形了。它逐漸變爲白蘭地（Brandy）和利久酒（Oranides and Liqueurs），誠然芳香優美，但也強烈，並且其零售價格之低廉，使人難於相信。結果使酒毒的問題，更變本加厲了。聯邦專賣之贏利，也連帶地減低了；在一九一〇年尚餘約千萬佛郎之淨利，在一九二三年，實際竟虧了五百萬佛郎，一九二四年，也虧蝕了四百萬佛郎。

近來傾銷於瑞士各地之廉價酒精，在社會上爲害之烈，難以盡述。一九二四年之統計，顯示在該年內耗於各

種酒類，包括淡味葡萄酒及啤酒和白蘭地。共計六萬萬佛郎，或比費於麪包和牛乳之總數，僅少九百萬佛郎。在幾個農村的州中，各種酒類（schnapps）比牛奶還廉，據說家庭中常於晨間攪於閤家老幼之咖啡杯中，以為調味之用。有時這種傳說，採取另一方式，謂以咖啡調和酒味。我們所獲的印象，是酒精之過度的消費，若非先世之豪飲發展了堅強抵抗能力，其為害之烈，當更不堪言了。瑞士人雖時常沈湎於酒，然而在公衆場所之中所見酩酊大醉者，反少於施行禁酒令時代之美國。顯然，瑞士人之酒量，很為宏大。誠然，他們展覽着相對地最大多數和形形色色的酒精鼻子，緋紅而肥大，自由表露，為舉世之奇觀。

負責的瑞士政治家，深知現狀所涵孕的嚴重危機。聯邦行政委員馬塔（Federal Councilor Giuseppe Motta），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趁在微委所舉行的葡萄酒節之正式宴會（official banquet of the wine growers' Festival at Vevey），乘機宣布曰：『酒毒之災害，毀滅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子孫之健康。補救這種情形之義務，乃我所知道的最關重要的和最迫切的一種義務』。他的一位同僚苗西（Jean-Marie Musy），在這方面，以大無畏的精神，首倡立法改良運動者，於一年以後，在新瑞士社，以簡潔的詞句，斬釘截鐵地演講說：

『瑞士是唯一自由釀製水果、白蘭地的國家。

瑞士又是唯一可在國內自由售賣該項白蘭地，而無須納稅的國家。

瑞士也是具有最廉價的白蘭地之國家。

他種酒類，雖都曾增價，有些酒類，甚至比原價增高了許多倍，而今日白蘭地的價格，反比戰前低落了。

所以瑞士也是消費白蘭地最多的國家。」

聯邦行政委員苗西，接着這段乾脆的公訴之後指出，依照最近的統計報告，在瑞士，每年消耗的，含有四〇百分比以上之酒精的白蘭地，約在二千六百萬和三千萬公升（litres）之間，或說，每人平均消費六個半到七個半公升。他也未曾諱言，這種排山倒海的洪流，對於公共衛生、公共道德和經濟的效率之影響。聯邦財政部的統計，顯示白蘭地的價格低落則死亡率、某種疾病和送入瘋人院之人數，都隨着它相當地增高了。以酒毒為主，因而致死者之人數，於一九一九年為七十八人，而於一九二一年，乃升至四百零五人了，而且後一種數字，在以後各年中都未低落。因酒毒致死者中，以三十五至五十五歲為最多，而在這中年成熟的年齡中，正是全家所仰望而為生活之靠山者。在農村因酒毒而喪生之人數，高過都市；故此從農村遷居都市之生力軍，其血液業已在其出生的地方中了酒精之毒害。白蘭地和肺癆，是並駕齊驅的；政府每年撥數十百萬的經費，來撲滅肺癆，而放任其主要的成因猖獗無阻。於一九二六年，在瑞士監獄的男犯人中，發見有百分之三，曾因酗酒而致疾者，就有三分之一，是因酗酒大醉而犯法坐監者。貧困的救濟，每年耗費瑞士八千萬佛郎，就中有四分之一，或者甚至三分之一，是用以供養醉漢和他們的貧困的家屬者。

如此重大而顯明的禍害，自然會招各禁酒會和社會輿論的領袖們，羣起而攻之。顯然，該項問題之最便當的解決，在於擴充聯邦政府專賣酒精之權力，使其包括一切蒸發的酒類，以及無數農人的小烤酒器所製造的各種水果、白蘭地。甚至在大戰期中，基於這個理論之提案，在國議會中，被提出了。於一九一九年，該案經聯邦行政

委員會採納之後，擬就憲法增補草案，而爲國會正式通過了。然而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提請復決時，被三六〇、三九七對二六二、六八八票人民的表決，和一二對一〇票州的表決否決了。

無疑，這個否決，對於戒酒改良者有如青天霹靂，經過這番挫折之後，暫時頗形心灰意冷。但不久，他們又再接再厲，勇氣倍增，戮力奮鬥了。甚至在該憲法復決案，尙未提出之前，關於准許州和地方，有自由處分權力之創制的提案，業已發動徵求各地方人民聯名申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聯邦行政委員會宣布，已獲一四五、七六一人之連署，差不多三倍於法定的簽署。然而，民衆關於該創制案之表決，延緩舉行了，第一，因爲酒精專賣修正案之復決，尙未舉行，第二，因爲該復決案，雖於一九二三年，被否決了，尙欲待聯邦覓取適於它自己的解決辦法。遷延至今，已有七年之久，該創制案，尙未提交國民表決，誠然打破了創制申請之最長期的延遲記錄了。

同時，如上文所暗示，聯邦行政委員會，也在覓取解決該問題之新途徑，尤其是財政部長苗西，正在聚精會神以全力從事於解決之探討。經過審思熟慮之後，製就了另一種憲法增補案。經過一九二三年的挫折之後，不敢再貿然嘗試徹底的方案，所以在這新增補案中，僅規定，凡爲商業之故，由水果、植物根部等類，提取的酒精之製造業，必須售與領有釀製酒類執照之商行，而後者又必須以其出品，按照規定的行市，售與政府。這個策略，可避免專賣的反感，而同時政府獲得市場之管理權，並且借着零售價之提高，一方面，可增加國庫的收入，他方面，也可減少消費的數量。希望緩和農區的反對起見，特准許農人繼續提製他們自己的家庭，所消費的酒精，但其所用的原料，以他們自己的田莊所出產的水果爲限。並且，也授權政府，收買私人的烤酒器，而禁止新器之設置，這樣，可減少全國



各地過多的蒸溜酒類的器皿。

上舉修正案，經國會通過之後，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提請複決。該新提案內容，雖頗溫和，但比其前身吃了更大敗仗，民衆反對它的表決，是四六三、七五一對二二五、四〇六票，以及各州反對它的表決，是二十一州又半對半州，僅在白賽爾市區顯示贊成它者佔多數。

將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複決的結果，加以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知道反對改良者，不出我們所料，大多出於鄉區各州，尤其是出於私家蒸酒器皿最多的地方。近年農民經濟概況，頗形拮据，所以他覺得，礙難放棄用過賤的水果烤酒所得蠅頭微利。如像一個固執的人，慣於牢守祖宗的舊習，經戶外手胼足胝勞苦操作之後，慣於閒或浮一大白以解勞頓，對於戒酒改良者之天花亂墜的遊說，他是聽不入耳的，實在就連他的本黨之領袖們所發的警告，也不能打動他的心意，雖該領袖們之警告，係鑒於目前的情形，所包含普遍社會的危害，而發出的赤誠的勸勉。所以不顧一切辯論和說教，大多數農民，仍舊堅持他們的權利，絕不讓步，如其俗語說，不管一切（“was, wo, und wie”）酒，仍然要烤的。

具有嚴密組織和絕不缺乏民衆同性的客棧主人，也傾其全力，以反對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之增補案。同農民一樣，他們也頗覺有促襟見肘之窘像，主要的原因，是全國領有執照之客棧太多，超過了社會的需求；所以他們熱烈反對該兩法案，免得酒價增加之後，使他們的生意更形冷落。

然而，反對酒類立法者，並不限於農村的選民和開客棧者。某部分社會黨的領袖們，對於改良的法案，雖採取

了堅決的主張，但在較大的瑞士都市之工業區域中，仍有極大多數反對增補案之民衆。其動機無疑地是反對任何物價之增高，包括白蘭地。

幾種自私自利的色彩，較不濃厚的動機，對於上述兩種增補案之慘敗，也有其相當的影響——譬如，擁護州權者之情操，和對於專賣或聯邦管轄之反對。聯邦政府自身，因以高昂的價格出售變性酒精和可飲的酒類，也不免有剝削人民的嫌疑，約略有失政府的體統，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關於這一點的反對，不能以將來的贏利，專供老年保險和其他有價值的社會的公益之用，來作辯護，就可完全消釋了。兼之，許多戒酒會的會員，反對一九二九年之增補案，因為它太不徹底，或因為他們相信，久被擱置的地方自由處理創制案，為更好的肇端。最後，我們應當記得瑞士一切階級的公民，擁護個人自由之程度，是超過其他較大的民治國家的。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之『勝利』以後，在全國各地，有許多客棧舉行了慶祝會，高唱國歌慶祝自由之保持。

這件事情，就此告了一個段落。瑞士全體民衆，對於他們自己，在國會中的代表，提請他們通過的反對酒精的法案，會接一連二地予以否認，後一次比前一次更為堅決。他們的牧師和教師，他們的醫生和報館編輯——事實上，舉凡他們一切以智慧和責任心，處理公共問題之領袖——向他們提供的不能計數的規勸他們，曾兩次充耳不聞了。關於其他爭執的問題，選民間或會顯示相同的倔強，或者將來仍會如此。但這並不是說，當其選民採取獨立行動時，他們就是根本錯誤的。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之行動，明白顯示，他們絕對不願預聞任何缺乏公共情操之禁止的法案，於是可以避免專制和腐敗，因為它們時常是從如此早熟的法規所產生的。它更顯明，

正因為他們具有能作獨立判斷之能力——如布賴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之措詞，倘有必要「作他們自己的錯誤」之能力——對於自治政府之享受，瑞士人民，比較其他較柔順的人民，有更好的資格。在瑞士，一個普通人民，對於他和他的同類，是該國的統治者之堅決的深信，常會令人不勝驚詫。對於間或推翻精心結構的和被各方面極力推薦的政府法案間，或予以推翻，使他們的自信力，可大增堅強了。

關於反對酒精的立法，在目前情形之中，沒有比提倡改良者之態度，更能表現瑞士的民主情感。他們雖遭受了慘敗，但在他們當中，沒有人有消極的思想。選民們，從前也曾有過回心轉意的時候，例如關於比例代表制，鐵道國有和陸軍改良；而關於酒類問題一俟時間成熟，也可有改轍易途的希望。關於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之複決的投票，有一個最低限度之無謂的憂慮，因為戒酒的改良者，擁護民主主義之精神，究竟超過他們對於戒酒的法規之擁護。自我的批評（self-criticism）為其所採之方針。在複決以後之反省上，他們所得的結論是：以往反對酒類的運動，是太被以上臨下（“von oben herab”）的態度所支配了。太多領袖，太多知識階級，主持其計劃，故此在投票的場所，就缺少民衆的票了。所以今後應取的步驟，是顯而易見的——更多在民衆方面下工作，更多民衆教育以免重蹈覆轍。在這條路線上，或者需要好多年的奮鬥；但只有朝着這條路線向前進，纔能達成一個滿意的即民主的歸宿。

瑞士人，在處理酒類問題上所顯示的透澈的清醒，使外國的觀察者，異常心折。誠然，情形之糟，足以令凡具有社會良心者，憂心如焚。但甚至那些對於飲酒的毒害，感覺非常苦悶者，也深知只有理性和勸誘，是終竟能達到目

的不二法門。許多瑞士婦女，對於酒業的利益，雖敢直言反抗，但他們也僅一律專心致力於和平的宣傳和救濟的事業。在他們中間，沒有產生過像芮響（Marie Nation）的女英雄；在這樣一個感覺魯鈍的民族中，斧頭女英雄（Hatchet heroines）是匪夷所思的，倘使實有其人，也將治以徒刑，而不致受報章的宣傳，和民衆的喝彩。甚至力主戒酒之改良者，也時常發出持平之論曰：關於酒精的問題，各人有權作他自己的主張，他在正面或反面之深信，是他自己良心的事情，所以只要是他發於良心的主張，不論如何，他人也必須予以尊重和容忍，如同他們對於他的宗教信仰一樣。甚至對於有私利可圖的反對派，也有一個顯著的主持公道之傾向。將製造酒類者，和販賣酒類者之財產，充公是從未想到的；反之，大家現在公認，除非戒酒的法案，能和協農民和開客棧者之利益，對於問題之解決，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實在，也是不配有成功之希望的。

雖曾遭受了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九年之暫時的政治挫折，關於撲滅酒毒之危害，仍曾舉辦過，並現尙進行着極多良好的工作。僅主張戒除強烈的酒類者，竭力設法使飲酒者棄賤價，而烈性的白蘭地，而就本國之淡味的葡萄酒和啤酒。在所有瑞士重要都市中，都設有保護醉漢之中央辦事處（Trinkerfürsorgestellen），在那裏，患病者，得免費受醫藥和法律的幫助，被導至療養院，和被鼓勵加入戒酒會，在那裏，也可設法保護和供養他的家小。管家婦被懲患在食品中，多用鮮果或醃漬的水果；未經發酵的果子汁或從它們所製的可溶解的粉，在各處有普遍的宣傳。不賣酒的飯店，其數在各處大增，由婦女組織所維持，而其主顧，也大多屬於婦女。瑞士學校教師，尤其是屬於戒酒教員同盟者（League of Abstinent Teachers），因拳拳服膺裴斯泰洛齊之著作（裴氏於十八世紀

中，曾嚴正批評他的同胞們之飲酒的習慣，所以隨時努力，務使他們的學生深知酒毒之危害。極多學生和青年俱樂部，被設立了，就中有些是獨立的，和另有一些，是附屬於成人組織的，於一九二九年，其會員總數約近七萬。此外並有各種戒酒者之俱樂部，譬如戒酒的騎自行車者之俱樂部、戒酒的體操者之俱樂部、戒酒的旅行者之俱樂部；甚至有一個成立於一九二三年的戒酒的農民俱樂部，後者是專致力水果之非酒精的消費（nonalcoholic consumption of fruits）。宣傳戒酒的改良之福音者，有十六種雜誌，德文者八種、法文者七種、意文者一種，大多數是月刊。在最近反對酒精宣傳之妙計中，有一種是聯邦郵政局之貢獻。它所採取的策略，是在所有郵件之郵票上，加蓋一個圖章，此圖章之一邊，刻着一個骷髏和兩條交叉的白骨，另一邊刻着：『酒類傾家滅種』（“Schmapps ruins the family and the race”）。總之，各種可能的勸誘的方式，都被採用了，務使公民們避免酒精的誤用。茲有一個好消息，值得報告，即老練的觀察者，相信這一切努力，都產生了效果；雖有廉價白蘭地之誘惑，烈性酒類之消費，業已開始逐漸低減，低減之數量雖微，但其趨勢頗為確實。對於如此顯赫的成績，雖令人不勝欽佩，但是酒毒之在瑞士，依然是一個真實的災殃，抵消了教會、學校、軍隊和其它社會的動力所成就的大部分良好工作；其敗壞該國公民品格之程度，超過任何其他單獨的弊端。對於這個問題之解決，將為瑞士民主主義的美德和智慧之真實的考驗。

考慮上文關於瑞士的酒毒之嚴厲的責難，下面的報告，更覺是喜出望外的消息了，當本書在付印之中，戒酒的勢力，贏得了一個很大的勝利。在他們一九二九年的失敗之後，接着就打了這一個勝仗，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改良者，這次居然重擬了一個憲法增補案，並獲得了兩院的通過，於一九三〇年四月六日，提請復決。其結果，是斷然無疑的，因為他們的提案，曾被四九一、一〇九對三二〇、〇四九票之人民的表決，和一七對九票之州之表決，採納了。從前只有一次，即一九二二年之徵收資金稅創制案，參加投票的人數，超過了全國有選舉權者八〇百分比，而此次的記錄，表示竟達到了八〇百分比之參加人數。

這個加於瑞士憲法的新條文（第三十二條副），是經過無數次由一切利益集團派代表參加的會議，切磋琢磨的產品。因為在後者中的每個集團，都堅持要有相當保障，所以增補案之全文，是非常冗長的，所包含的事情中，有許多是沒有憲法的重要性的。但是，農民、開客棧者和其他最後對於它所感覺的信任，乃是它在投票場所獲到勝利之最大原因。簡要地說，該增補案規定水果、白蘭地之製造和銷售，應受聯邦法令之管理，蒸餾該項酒類之私人，必須出售其產品與聯邦政府，而後者必須承受購買其產品；對於水果和他種特殊白蘭地，必須深以賦稅；對於鮮果的消費和無酒精的水果飲料之消費，必須加以鼓勵，而對於水果白蘭地之消費，必須予以妨阻；最後，從這個新制所得的贏利之一半，須以人口為比例分派予各州，後者須以其所得十分之一，劃歸撲滅酒毒之用途，其他一半贏餘，由聯邦政府留作養老金和孤寡保險金之用。

這個關於酒精之新增補案，為獲得一切利益集團之全力擁護起見，在其措詞上，所顯示的圓滑技巧，令人忍

俊不禁。它使農民快樂，因為准許他們繼續利用他們自己的出產，蒸餾他們的家用所需要的一切白蘭地，而完全不須納稅。然而，倘使他們願意放棄烤酒的權利，聯邦政府，隨時樂意，以公允的價格，收買其烤酒的器皿。農民雖失掉了向一般人民售賣其賸餘的家釀之權利，但他們在政府方面，獲得了購買他們賸餘的產品之保證，政府同志比現行批發市價每公升，多給他們六分。兼之，由於政府收買水果，自行蒸餾飲料，由於食用鮮果之低廉運費，和由於為鼓勵他們的產品，在無酒精的狀態之下的消費起見，聯邦政府所讓予他們的其他特別權利，他們希望能享巨大的利益。開客棧者，樂於贊成該增補案，因為農民被禁將他們的水果、白蘭地，直接售與消費者，並且因為一般零售商和小販們，被禁販賣該項酒類。在財政的立場，聯邦政府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它對於農民的酒類和水果所出的高價，很容易拿較高的稅收和將售與領有執照的酒商之水果、白蘭地的價格提高，就很可彌補了。關於從這個新制度可預期的每年的淨利，最低的估計，約共二千三百萬佛郎。因為它有將上面的利潤之半數，分派予各州之慷慨的規定，所以在州權分子方面之任何反對該增補案的傾向，都被免除了。既然最大多數的瑞士公民，尤其是境況不寬裕者，對於養老金和孤寡保險，有敏銳的興趣，所以，關於其餘一半，專為這些有價值的社會公益之用的規定，能很有效地吸收許多贊成的票。擁護戒酒改良者（*Abstinenten*），雖仍覺頗難滿意，因為該增補案，不及他們所希望的徹底，但是他們不得不承認，它在能為民衆採納可能範圍內，已盡量遷就了他們的意旨。並且，政府的統治，現在已經成立了，他們可以希望水果、白蘭地之零售價格，將比從前加倍或甚至兩倍，而禱祝消費者，將棄該項烈性酒類，而飲淡味葡萄酒和啤酒。這樣，似乎皆大歡喜了。除卻頑固的醉漢，因為倘使他們堅持要飲櫻桃白

蘭地 (Krischhvasen)，他們就必須付較高的價錢；然而就連他們想到將來他們的惡習，會對於老年、孤兒和寡婦之救濟有所貢獻，也可聊以自慰了。實在，這個增補案，在結構上，是如此巧妙，所以它沒有碰着有組織的反對。一切政黨，都慫恿它們的信徒投票贊成，它只除共產黨不計；無疑後者的敵對，使該提案增加了許多保守派的贊助。

這項新增補案，除了顯示在反對酒毒運動之悠久而辛苦的奮鬥上之戰略的前進外，尚有值得注意之價值，因為它也很清楚地顯證瑞士直接立法之方法。反對創制和複決者慣常倚重的辯論為：這些民主的方略，不能容納假定在議會場中，所進行的，彬彬有禮的辯論，以及附帶的合法的增補案。這個反對的言論，在他處不論可有怎樣的勢力，誠然關於瑞士人的習慣，尤其是像在酒精增補案的事例中所昭示，對於應付輿論的各點之適應，具有廣大的機會。在他們的國中，憲法的增補案和立法法令，不是貿然草擬，僅為取悅某部分狂妄的派別，於是提交人民，而粗暴地命令他們說：『高興接受它，不高興就完了』(with a gruff "Take it or leave it.")。當其各利益的集團，用太狹小的詞句提出它們的要求時，從瑞士選民發出的反對之聲，倘使是大多數的反應，其意義就是說，『此路不通』。倘使反對的多數，並不怎樣大，第二步就是召集一些反對集團之代表，同他們詳細磋商，作必需的讓步和適應，於是再行試驗人民之意旨。有時必須作兩三番的嘗試，然後纔能獲得能協調各方面的利益，而具有能被人民通過的希望之提案，如酒精增補案，就是一個好例子。具有這種性質之立法的過程，比較純粹代議的立法之普通習慣，更能顯證顧全各方面的言論之政制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



## 特許的賭博 (License of Gambling)

反對特許的賭博之奮鬥，雖比反對酒毒較少吸引公衆之注意，但是反對酒毒者，大致同時也反對賭博。顯然，這個問題，已由一八四七年之憲法解決了，規定（第三十五條）於三年內取消現存的特許。這項規定，經一九二〇年之增補案之補充，更爲確定而詳盡了，另附加一條規定於五年期間，禁止一切賭博場合。同時，人民拒絕了聯邦議會所提出反對的提案，人民這種舉動，無疑是被旅館業主協會 (hotel owners' association) 鼓吹的，後者願爲『被一種公共的利益所感動的』幸運之遊戲 (games of chance 'affected with a public interest')，意即大約是在遊覽區內，已經設立的，那些賭博場，網開一面，而不致被禁。

憲法和法律，雖有嚴禁賭博之明文，但在五六個瑞士的州中，賭博是百無禁忌的，官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佯作不見，而聯邦政府，也謹慎地不加干涉，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關於這一層未聞警察有納賄的事，在美國人的立場，頗足希奇；顯然，官廳方面之寬容，是由於地方與情袒護旅館業的緣故。在一九二八年後者，曾再企圖使賭博有合法的地位，這一次居然成功了。一個爲『維持俱樂部 and 發展遊歷事業』，說得冠冕堂皇的創製案，被提出了，准許各州政府，得在公益上所默許之條件下，允許於俱樂部中，作如截至一九二五年春季所通行的幸運遊戲。該增補案復被一個附條說得很中肯聽，因其規定以賭博總收入四分之一，繳與聯邦，由聯邦指定爲天災被害人及社會一般救濟事業之用。在一番緊張的贊成和反對運動之後，這個創制案，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日，經二九

六、三九五對二七四、五二八票之人民的表決和一四半對七半票之州的表決通過了。

自然，以改良社會爲職志的各團體，被這次投票的結果突襲了、震驚了。然而如平常一樣，雖屈服於當時的民衆意志，他們會重振旗鼓，以作教育運動，而一俟有相當機會，將再向其敵人挑釁以決雌雄。在現狀之下，有幾點有玷瑞士人之令譽：第一、聯邦政府，從全國賭博場所之總收入抽取四分之一的頭錢（*poubaine*）按此字原係酒資之意；第二、特許旅館業，開設賭場之際，並非在其營業衰落之時，乃在其營業鼎盛而且方興未艾之時；第三、而且是最壞的一點，該旅館業之彰明較著的旨趣，是在使他們中間的外國的旅客墮落。這並不是說在瑞士俱樂部中，公開的輪盤賭，是欺詐騙錢的；反之，它們是同一般賭攤一樣，是老少無欺的，當然開賭場的老闆，有更多贏錢的機會，使其穩得大宗的和不斷的利潤。

外國人在瑞士報章上，披閱他們贊成賭博場之辯論，頗覺齒冷，因爲它們假定期賭博場，是專爲外國的旅客而設的。在俱樂部本身之裏面，也可發見壁上的招貼宣告，『大概它們是爲外國人保留的』；『奉警廳命，禁止公民入內』；『學齡兒童，雖有大人領帶，也不准入場，而十六歲至二十歲的未成年的青年，有成人作伴得准入場』；『學生和現役兵士或下士，不准入內』。不論這樣的辯論和規則，是如何妥善，瑞士政府，絕不能特許賭博，而同時使其自己之公民品格，不致有受惡習傳染之危險，尤其是意志未堅定的青年和順水流舟的成人，在所難免，他們隨時可光顧本地的賭場，而旅行者，僅爲逢場作戲之過客而已。

輪盤賭，對於極大多數之誠實、刻苦、謹慎和儉約的公民，沒有蠱惑的魔力，除非偶然一去，以冷眼看愚昧的人

羣之熱鬧。然而正因瑞士的民衆，具有上列各種品質，使官廳答許的賭博，在他們中間，更覺不倫不類了。就連該國之旅館業主們，平素是非常誠實而尊嚴，他們此次決定，在俱樂部中開設賭博，也覺頗有反常的意味。結果，他們或將發見此種違反常情的舉動，是得不償失的；誠然，在他們的廣告文字上，他們覺得不便指出在他們的金壁輝煌的館社中，有使外國旅客種種輸錢的便利設備。同時，他們使自己成了極端拘謹的作家之辛辣批評的對象，後者，業已極其高興，在旅館業中，看出『對瑞士人民的靈魂之一種嚴重的威脅，更不必提如賭博場所那般不名譽的污點』。

## 第九章 瑞士家庭生活及婦女運動

### 家庭生活

在瑞士結婚的生活，提示一種自相矛盾之論。在一方面，該國在歐洲爲離婚率最高的國家；在另一方面，關於瑞士家庭制度之本質的穩健性及其深遠的教育影響，是毫無疑義的。

至少，美國人是不配批評瑞士的離婚記錄的。按照一九二四年之統計，在美國每六·九婚姻中，就有一樁離婚。在瑞士，這個相對的比率是一一·三之一，至於法國的二一與一之比、德國的二四與一之比、挪威的三〇與一之比、大不列顛的九六與一之比，都是採自一九二五年之新國際年鑑（New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1925, p. 411）的。

在瑞士離婚的案件，不僅是家常便飯，也是繼長增高的。在一九二七年，離婚案件，共計二千五百起，比較一九一三年之一千六百十六起和一九一七年之一千零十一起，即可知其進展之猛了。在各州之間，離婚率相差之大，超過美國各州。在農業區中和在天主教之各區中，離婚是稀少的；例如尼德瓦登和內阿彭色爾，曾穩渡一九二七年，而沒有一起離婚的事件，而且同樣的情形，是絕不稀少的。在同一年度內，全國離婚和結婚的比率，是一與一

一·四之比。但在較大的都市中心內，它是兩倍之高的，例如日內瓦，一與四·六之比；白賽爾市，一與五·六之比；而沮利克之人口稠密的州中，同白賽爾一樣，是新教徒佔多數，其比率是一與七·五之比。

自然，上面所引的統計，是會使瑞士的神學家們感覺悲痛難安的。但在其他社團中，對於這件事情，是十分鎮靜的；有知識的瑞士公民們，並不省悟他們的離婚率，冠於歐洲各國之事實。報章也很少撰文評論離婚問題；尤其難得的，是它們很少繪影繪聲的描寫離婚案件在法庭上審理的情形，用以激動一般人的視聽，而激增其銷路。關於報章顯然缺乏企業的膽識和人類興趣故事（“human interest” stories）之原因，其解釋是簡單的。因為最大多數瑞士離婚案件，是發生於寒微社會階級之中，雖說在富裕階級中，它也漸次普通了。訴訟手續是簡單的，而且也用不着多花錢。倘使一對夫婦，向主持和議的保安官（justice of the peace, acting as a Vermittler）提起訴訟，那是無需委託律師為代表的。兼之，申請離婚所持的理由，也大多是平凡無奇的，而且完全沒有新聞的價值。但在好渲染社會醜聞之小報的立場，又當作別論。在一個像瑞士那樣的國家中，極端的節儉，是順利的婚姻生活之必要條件，多數離婚之主要原因，是丈夫無力贍養家庭，或妻子不善處理家務。寬容大度的法官，時常承認這兩種條件，尤其是夾雜着嗜好醉酒為夫婦間不能情投意合（“Zerrüttung des ehelichen Verhältnisses”）之暗礁時。一九二七年之瑞士離婚案中，四分之三，是因這個原因，被批准的；在該年度，僅有八分之一的離婚案，是因爲姦情的。

如同在一般歐洲國家一樣，瑞士的生育率，在一八七〇年之間，達到最高峯，自從那時以後，生育率就在逐漸

退滅之中了，直到現在，它是同法國不相上下的。

世界戰爭之後，曾有過一度細微的起色，在一九二〇年，每千人口之生育率，達到了二〇・九，在一九二一年，它是二〇・八，但其後不斷減退的傾向，又擡頭了。並且這種退滅的趨勢，也不僅見於都市居民，反之，在許多鄉區中，它也是大露頭角的。關於上面的統計所昭示的趨勢之解釋，在瑞士和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所以無需贅言。然而必需指明的事實，即在該國之某部避孕劑（contraceptives）之廣告，是十分公開的。

瑞士生育率低落之一顯著的結果，乃是這個事實，即在各都市中，也在幾個鄉區中，新校舍之建築，在地方預算上，自入本世紀以來，已不再像從前那樣一個大項目了。在另一方面，在第七表所包括的時期內，瑞士的死亡率之低落，比生產率更甚。在事實上，生育率超過死亡最多的時候，不在一八七一至一八八〇之十年中，而在一八九一至一九〇〇和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之二十年中。倘使一個不高的死亡率，是評判一國的福利之最好的單獨標準，那末，瑞士顯然不久將列入少數最優秀的國家之林了，在它們當中，每一千人口，每年的死亡率是在十人以下的。

第七表 瑞士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及生育率超過死亡率之數（一八七一——一九二七年）

時	期	生	育	率	死	亡	率	生	育	超	死	亡	數
一八七一	一八八〇年	三〇・七			二三・四					七・三			
一八八一	一八九〇年	二八・一			二一・八					六・三			
一八九一	一九〇〇年	二八・一			一九・〇					九・一			

一九〇一	一九一〇年	二六·九	一六·八	一〇·一
一九一一	一九二〇年	二〇·九	一四·六	* 六·三
一九二一	年	二〇·八	一二·七	八·一
一九二二	年	一九·六	一二·九	六·七
一九二三	年	一九·四	一一·八	七·六
一九二四	年	一八·八	一二·五	六·三
一九二五	年	一八·四	一二·二	六·二
一九二六	年	一八·二	一一·七	六·五
一九二七	年	一七·四	一二·三	五·一

\* 在這十年當中的數字，當然是被世界戰爭影響的，尤其是被一九一八年流行感冒的時疫所影響的，在該年中死亡率驟然升到一九·三。在本表所包括的時期中，只有在該年中顯示了死亡超過生育（每一千人中〇·六人）。

顯示離婚率猛進和生育率低減之單純的統計，雖確屬重要，但可給人一種十分錯誤的印象。從另一方面加以觀察，正常的瑞士家庭所提供的圖面是深遠的，在外表，雖非甜蜜，但其內容，為愛情和強烈合作的戮力和極端的穩定。在鄉區中，家庭生活是穩固生根於田地的。經過該國作最膚淺觀察之旅客，也必定會被一般男女老少，在田地裏共同操作的辛勤所感動。同農民生活之更密切的接觸所昭示的事實，即不僅莊稼和家畜的照顧，即家庭一切更廣泛的興趣，例如子女的教育，它的分子，同教會和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之關係，都是在圍爐的討論中所

決定的。同這一點有關係的，是這個有意義的事實：即在瑞士擁護婦女參政者，說明他們的運動在農區中所以不能有更巨大的進步之原因，大部分由於農婦對於女主內男主外之原則，非常滿意，故此毫無參政的興趣。

瑞士人民，雖是以赤誠獻諸民主主義的，但是對於他們的祖宗和門閥，是極端引以為榮的。這個事實，一半或者是與向來在該國流行的貴族的傾向有關的，以及在鄰邦帝王朝廷供兵役，對於這樣的傾向，所給子的鼓勵。例如，西門子（Symonds）提示一個世居苦羅笨敦（*Tranbünden*）而現操平凡的旅館業之家庭，其記錄，顯示從一四〇〇到一八〇〇年，曾有過三十八人在法蘭西、奧地利亞、威尼斯、荷蘭、米蘭、西班牙、英格蘭和拿破侖的軍隊中當過兵，下自小卒，上至主帥，各種武職，都曾任過。在它的榮譽官銜錄中，有一個帝國的伯爵，有兩個德國的男爵和一個法國貴族的榮銜，是在亨利四世之朝中。最近逝世的白斯浦銳喬之提阿斐（*Theophil von Sprecher, 1850-1927*），屬於同一州中一個類似的家族，曾任瑞士陸軍參謀長，而在私生活中，是農夫和鐵道經理，它從十四世紀回溯他的家世，在他的祖先中，不僅有武人和外交家，並且也有法官、議員、行政官、牧師、大學教授、史學家和小說家。像上面這樣的例子，並不是稀有的，但昔日貴族的世家，今日每為樸素的農民、小商人或開設旅館者，完全沒有官階或政治特權——實在，是徹底信奉共和者，而敵視任何那種東西；但是，他們對於他們的祖宗之功業，是充分注意的，並且對於他們的姓氏，在全國所引起的尊顯，是私心以為榮的。任何有知識的瑞士人，雖沒有像白克或德布熱特（*Burke or Dehret*）之指南，關於他的本州和鄰近五、六州之歷史的家族，他也能講說其掌故如數家珍。

然而，不僅是在專制王朝下可受貴族封號之家族對其祖宗之掌故，有不勝留戀之感。因着居民之安定的性



質，十分平庸身世之農民，深覺他們僅爲久居此同一山谷之縣縣的世代之後裔而已，而且，他們的婦女，類能詳言本地各種互婚和從表兄弟姊妹等關係。教會的紀錄和鄉村墳地內之墓碑，將這些掌故，從前代傳子後代。世居城市之家族，也頗能回憶他們的祖宗，同中世紀的同業聯合社，和同舊同盟之無數國內國外的戰爭之關係。

瑞士人民，對於家族的聯繫之深遠的親情，一部分可說是由他們的家宅和家具之獨特的性質。不僅山鄉農舍 (Chätle)，爲該國特有的風格，而且因其材料和建築，各州互異，所以它也反映着這些較爲狹小的祖國之生活。因爲它在各處，是隨着氣候之特性和本地生活之需要而改變的，所以，它不特具有絕佳的風趣，並且也頗舒適而合用。所以對於瑞士人，家宅不僅是木或石一種庸俗的結構，它乃是代表他和他的家屬之個性，以及本鄉的風格之實體。在許多住宅之正面，尤其是英格丁州之住宅，滿綴古時雕刻之紋章，表彰業主所御公服之徽章，其上之鍍金和顏色，已因年代久遠而剝蝕。在許多州內，房屋之外牆，常以壁圖爲飾，其圖雖粗劣，但富於本鄉之象徵，附有建築者服膺之格言 (Wahlsprüche)，播揚業主之仁德。以區域之大小爲比例，誠然沒有其他國家能顯示更多具有特徵之住宅，這些房屋，雖無園丁之照料，並且時常也確係卑微的建築，但其個性，仍巍然獨存。故此瑞士旅居異邦之人士，懷念祖國之熱情，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之思鄉病 (Heimweh)。

在許多州中，有各種古雅的風俗點綴家庭生活之大事——生育和洗禮、訂婚和結婚、去世和喪葬。說明這些風俗之民間的故事和各地特有的迷信，是隨處通行的。父母並不告訴兒童，嬰兒是由仙鶴送來的，雖這種古老的神話，近來曾由德國輸入。按照物德所通行的傳說，此乃神鵲之職司。在多山的區域中，嬰兒乃從深邃的狹谷中拾

得、或自墮巖中所掘出(Kindli-oder Tittsteine)或從冰川的隙縫中所取出、或由牧人從最高的亞爾卑斯山的草原所攜下。

瑞士人對於家庭的影響之重視，大部分可說是由於裴斯泰洛齊的著作之力量。那位大教育改良家，差不多可以說成立了一個崇拜母親之宗教，在他的名著『李昂納爾德和黎楚德』(Leonard and Gertrude)以及『黎楚德教育她的子女之方法』(How Gertrude Taught Her Children)中，詳細闡明這種宗教。對於他優良的母親，好像是優良的教師之頭等的類型和模範。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時常在以兒童在起居室(Wohnstube)內所受之教育來反比，以後他在教室(Schulstube)內所受的教育，它把後者認為由母親所授予的基本知識之延續。在裴斯泰洛齊之後，有泰德滿(Tiedemann)、德浦銳葉(de Preyer)、裴銳士(Bernard Perez)以及許多其他教育的作家，曾進一步地側重幼年在家庭中所受教育之重要。他們的門徒，瑞士學校教師，又曾極透澈地以之諄諄教育他們的學生，結果在全國有思想的分子之頭腦中，對於這種教誨，都有了極深的印象。在他們的談話中，累次提到『兒童之性靈』(Kindersöle)，這一話題，似乎是永遠常新的而時常可以引起敏銳的討論。

在瑞士城鄉各處，很少見着衣服襤褸、污穢的或被棄的兒童。誠然，在夏令，鄉下兒童常跣足而行，如前代美國兒童一樣，但其泥土中，必定沒有鉤頭虫，因為他們都是最結實的兒童。有時也可聽見人埋怨說，在義務教育期滿和工作年齡未屆之間的兒童，在毫無定向地漂流着，傾向於粗暴和不受約束，特別是同城市的環境發生接觸的時候。為適應這種情形起見，優良的補習學校和各種職業學校，曾作了不少貢獻。兼之，在瑞士大都會中，民衆生活

之儀表，是很循規蹈矩的，所以甚至其街路中之影響，似乎比較他國大都會中對兒童之適當的發展，是頗少有害的。至於不受約束一層，外國的觀察者，對於瑞士兒童之印象，以爲他們是非常有家教的。必然他們沒有過分的自由，並且不是嬌生嬌養的；例如中學學生，不常從他們的被恐嚇的或歎賞的父母，接授汽車爲恩物。反之，一切家庭的子女，除最富者不計外，在家務上，都分擔着應盡的義務，當然，尤其是在鄉下，但在城市也不在少數。在公共的場所中，從沒有兒童的莽撞和紛擾；誠然，有時瑞士的青年，似乎在教育的準備上，差不多有太重的負擔，使他們因爲幼年的過勞，難於勝任成人生活之嚴重的競爭。有一個事實，最足顯證，成人並未放縱兒童，即在全國許多地方之警察的單行法規，禁止十八歲以下的青年看電影。例如，在沮利克州，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六日所通過，復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所修正，關於影戲院之設立和管理之規程規定：『對於普通的演映，只准超過十八歲者入內觀看。滿十八歲以下的青年兒童，只准觀看特殊的演映，其節目，只能包括經特別指定兒童可看之影片』。據作者觀察所及，對於該項法規之普遍的執行，曾盡人力之能事。凡有此種法規的地方，一切影戲院，都在門口顯著的地位，揭示准許入內觀看之法定年齡。

在瑞士，非教育性質的文學中，家庭生活之重要，是常被重視的。客勒（Gottfried Keller）之 Eran Regula Amrain und ihr Jüngster，雖純屬傳奇的性質，但與裴斯泰洛齊之理想，頗爲脗合，內容提示一位賢母範鑄她的兒子的品性之戮力，一直從嬰兒期，而兒童期，而青年期，以達成年，專心致志，務使其成爲良好的公民。在客勒之 Wahrig 中，乃是一位老祖父，負擔着三個孤兒之教養，他以無限的機智和決心，終竟使他們深信瑞士良好的公

民，必須準時參加投票，並在政治上發揮積極的興趣，差不多所有瑞士的小說，顯證這種家庭興趣和政治興趣間之密切的聯繫，尤其是無數以農民和鄉村生活爲題材之小說。讓我們引一個最近的顯證：安得烈（H. J. Andres）N. Von der Scholle aufwärts，Hans Uhlis Verdegang als Bauer und Staatsbürger（漢斯·烏里，由農田出身，自農夫至公民之發展），是家庭生活、農業和政治之一首極其率真的田園歌，襯以擁護獨立民主黨而反對農民黨之懇切的勸勉。小說中之主人翁，漢斯·烏里，在一種意義上，雖確出自田間，初被選爲鎮議員，繼被選爲州議員，但他始終是『與泥土結了不解之緣的農夫』（“dirt farmer”），和他的工人們在田間一同操作，而在家庭和他的賢妻，馬爾色（Martha），共同商量關於田莊、家屬和政治的事情。

#### 婦女參政權（Woman Suffrage）

關於瑞士的選舉之考慮，倘使不提及被剝奪參政權的多數人民，總覺偏而不全了——婦女在一種很真確的意義上，對於更好的一半（“better half”）之稱呼，可當之無愧了，因爲共計約四百萬之人口中，她們的人數，超過男子約十四萬。僅在三個高山的州中——由銳、阿布瓦登和發賴失——她們的人數，少於男子；而在另一極端，在兩個幾乎完全是城市的州中，白賽爾市區和日內瓦，在每一千人口中，五百四十五是她們。

倘使勤勉是應享參政權之資格，那末，瑞士婦女，就應該已經獲得了完全的參政之權利了。她們於世代中，業已是家政的模範了，今日在她們當中，那些留在家中者，仍然保持着這個令譽。然而如在他國一樣，機器之來臨，已

使大羣婦女同家務完全或部分地分離了。按照一九二〇年之人口調查，在瑞士從事於生利的僱傭之一百八十五萬二千零五十三人中，有五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五人，或三三·九百分比是婦女，這個比例，在近幾十年中，曾着實地增加了。在這些人數中，有二十六萬八千零三十一人，或四五·三百分比，是從事於製造的；九萬八千六百七十五人，或一六·七百分比，是從事於商務的；以及七千一百四十一人，或一·二百分比，是從事於運輸的。從事於專門事業和公共行政者之人數，爲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人，其中共有學校教員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五人，在該總目中爲最大的單獨的項目，其次爲醫生和護士，共計八千六百六十六人。歸入農業之婦女爲九萬七千六百八十二人，約佔業農者之總數五分之一；但農人之妻及其男女兒童，在田地之操作上，爲他們很大的助力，乃是人所共知之事實。有某某等州，例如提省諾和斯卡夫好生，男子常終歲或僅於某季出外謀生，於是婦女輩實操更大部分之耕種事業。

瑞士之有閒階級的婦女們，也不大追求行樂和裝飾的活動。依照優良的成規，以主持家政，包括繁冗的購置、洗滌、用力洗擦、補綴、養護兒童包括丈夫——那些大孩子——在殷實的階級中，仍然是被重視的。像一切忙碌的人一樣，這些賢淑的母親們，仍常能抽出時間，從事於無數慈善會社、宗教會社、市政改良會社、婦女俱樂部、父母和教師協會等等之活動。

在最近兩代中，瑞士之有較大的志向之青年婦女們，在教育上，曾力求上進，日內瓦大學於一八七二年，即開始招收女生，次年沮利克和白恩之大學，亦開女禁，其他三大學，於一八九〇年以前，也都跟着做行了。獲得這個優

勢之後，她們乃開始進攻各學術的專業。在社會服務上，自告奮勇的工作者，業已奠定了一個很廣大的基礎。所以現在有三個特殊的學校（*Soziale Frauenschulen*），為該項事業訓練青年婦女——一所在呂賽爾、一所在日內瓦，都是在一九一八年創立的，另一所在沮利克，創辦於一九二〇年，在呂賽爾的那一所學校，是由天主教主持。在各大學尚未招收女生很久以前，時常深信她們的教育之可能性的裴斯泰洛齊，業已在學校中，為她們中許多人開闢了一個事業。有了高深學術之後，更能幹者，曾發展了充任重要行政職位之能力，和甚至大學教授的講席之才力。瑞士婦女，早已獲得加入醫藥的業務之權利，在該業中，她們大多成績優良。婦女對於神學之進攻，較難得手；但是，婦女宣教士，在改革教會之講壇上，已獲得了相當的地位，在日內瓦，有一個婦神學院，附設於大學之神學院中。法律因其習慣的保守主義，對於婦女也曾採取堅決拒絕的政策，一位資格很好而曾任大學講師（*Dozent*）之婦人，於一八八七年，請求准許執行律師職務，尚被該業享以閉門羹。但自從那年以後，在幾州中，婦女已取得律師的資格；於一九二三年，當其佛銳堡州仍拒絕婦女執行律師職務時，經婦女在聯邦法院提出上訴之後，該院於其判決書中，以下列判詞強迫該州政府當局，改變其固執態度：『在瑞士雖尚未將政治的權利賦與婦女，然而風俗和法律，都已確立了男女兩性在經濟的生活上之平等的地位。』該國最高法庭的這種意見，如一種影射的預言，給了女子參政權運動者，很大的勇氣。以經濟的平等之指稱而論，它的最明晰的解釋，當然不在收入之平等，而應該在於同男子競爭之權利。但是，在瑞士，後一種權利，曾被非常慷慨地賦予了婦女，並且在她們當中，會有許多人運用了該項權利，達到很大的成功，因此，她們對於參政權的運動，反比較淡漠了。

同時，瑞士婦女有了比男子更嚴密的組織。在舊日，慈善的和普通幸福會社之外，類乎美國典型的婦女俱樂部，頗爲盛行；在一九〇〇年，後者成立了一個聯邦同盟（Bund Schweizerischer Frauenvereine）。沒有一冊分類一覽，是不能盡舉瑞士婦女在普通職業和自由職業上的工作人員之各種組織，在自由職業的組織中，瑞士女教員聯合會（Schweizerischer Lehrerinnenverein）爲其中之一最大而最強有力者。她們也以消費者的資格，成立了瑞士婦女消費合作同盟（Schweizerischer Konsumgenossenschaftliche Frauenbund）。瑞士女藝術家和科學家，各有其俱樂部，並有類似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之組織，名曰：Schweizerischer Verband der Akademikerinnen。如下面第十三章所云，發揚體育和音樂之全國的組織，都附有許多婦女部，各部之間，時常舉行嚴肅的競賽。於一九一八年，瑞士婦女界對於爬山感覺興趣者，成立了瑞士婦女亞爾卑斯山俱樂部（Schweizerischer Frauen-Alpen-Klub）。將上述各種會社列成詳細表冊，可成洋洋大觀之卷帙了。然而所不幸者，瑞士婦女所成立的大多數的組織，是以新舊兩教的信仰對峙的；但是，她們對於共同的目標，仍能採取一致的行動。

對於婦女參政權運動，首舉義旗之榮譽（一八九八年），似乎當歸之於沮利克的 Union für Frauenbestrebungen。立即在其他七八個大都市中，有了特殊參政權組織，於一九〇〇年，它們聯合而成瑞士婦女參政協會（Schweizerischer Verband für Frauenstimmrecht），作爲各地分會之全國的和國際的代表。現在（一九二九年），該協會有三十八分會和地方集團，依照通常瑞士的典型，在各州的事件上，後者享有完全地方自治之權利。

關於影響婦女之立法事件，尤其是工廠法、疾病、意外和老弱保險、母親之保險、婦女販賣、酒類販賣，一九二一年之民法以及尚在修訂中之刑法，上述團體之代表，曾運用過旋乾轉坤之手腕。僅以世界大戰期間而言，它們對於瑞士邊防軍及其家屬之照護，以及對於他國被拘留的和遣送回國的兵士之優待，種種公益慈善的成績，使它們的地位，更加鞏固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這種活動，乃轉向工業領域繼續進行了。

婦女參政協會於一九一九年之夏開始，所以比社會黨早三年，每年舉辦一種假期講習會，以發揮該運動之廣義的興趣為宗旨。常選山水明媚的地方，以為開會的地點；每日上午的時間，專為用德、法兩種語言講學之用，講題分為法學、國際聯盟、其他各國之婦運、婦女之職業的傾向、母女之關係、婦女之園藝等等；下午和晚間，定為步行、划船和社交之用。在一九二七年之夏，參加婦女參政協會，在搖爾勒湖畔之麻格林景 (Magglingen on the Lake of Biel) 所設之假期學校之學員，約五十名。

大戰以後之時期，也屬於在十一個大都市成立婦女總會 (Frauenzentrale) 之時期，該會為各種婦女俱樂部，和種種活動之總匯。在最近幾年中，有五個這種總會，曾舉辦過多次全體會員大會 (Kantonale Frauentage)，城鄉婦女，均多出席參加，以討論雙方共同的問題，而使她們中間，有更好的諒解為宗旨，結果甚為圓滿。倘使這般各州婦女會議，能成為永久的制度，它們對於社會和政治，定有最高的貢獻，第一，可使城鄉居民間之宿嫌消釋；第二，或者可誘掖農婦，使其對於婦女參政運動，採取擁護的態度。

在瑞士，關於優良僕役之僱用和保留，雖不感覺特殊的困難，但該國之婦女界，並不以僅僅談論該項事件為



滿足。他們有幾個組織，曾在十個城市合作開辦了家事學校，訓練身家清白之青年婦女，其畢業生，能勝任任何平常家庭之服務。這些學校，曾竭力設法提高她們的雇傭地位，使其與技巧的職業，受同等的敬重。出乎意料之外地，雇用她們的家庭，並不將她們看為卑賤的僕婢，而是將她們當作自家人看待的，同其全家共桌進膳，並為她們向賓客正式介紹。

但瑞士婦女運動 (Frauenbewegung)，近來最顯著的成績，乃是 S A F F A，這個簡稱代表 Schweizerische Ausstellung für Frauen Arbeit，意即瑞士女工展覽會，於一九二八年之八、九兩月，在白恩舉行，在一種共同事業之下，將該國各種婦女組織，不分宗教信仰、階級、職業或政治的隸屬，一致聯合會起來了。它的由一位婦女建築師設計之十所偉大的建築，陳設了代表婦女工作各方面之展覽品——在家庭內、在學校中、在社會服務上、在農業上、在商店或辦公處以及在各種自由職業上之各種作品——一切展覽品之旨趣，不僅在表揚已有之成績，並且也為指點新活動之發展的途徑。該展覽會，是由婦女設計和管理的，它的三大餐館進行之狀況，足以證明烹調的藝術，在瑞士尚未失傳，它的音樂，係由婦女所作之譜，而其輝煌古裝表演，也是婦女之設計，成了該會最快樂而最燦爛的節目。S A F F A在各種立場，都是一個無條件的勝利，吸引了無數本國和外國的來賓，使大家對於瑞士婦女工作之特有的多才多藝的性質和堅牢結實的性質，都有了很深的印象。連帶地，它賺得了一筆很可觀的淨利，後者，被分派予各參加團體，以為舉辦各種社會事業之用費。

顯然，參政權僅為瑞士婦女界許多深感興趣的運動之一。獲取參政權之努力，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多大進展。

日內瓦之自由教會 (Free Church of Geneva) 早在一八九一年，就業已將選舉權，賦予其婦女的會員，物德於一八九六年，紐卡德爾於一九一〇年，都步其後塵了。該三州之國立教會，於一九〇八和一九一六年之間，也將選舉權賦予了它們的婦女受聖餐者；白恩、白賽爾市區、苦羅采敦、色各和阿兒各，對於這件事情，讓各地方自由斟酌，予各地教區以最後決定的權力。在白恩，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當其這種改良實施於該州的時候，約有八十教區，曾給婦女以選舉的權利；但在色各改良法規實施六年之後，在阿兒各實施兩年之後，竟無一地方教會團體，曾以選舉權賦予婦女者。一個賦予婦女以教會的選舉權 (Kirchliche Zimmrecht) 之法案，在一九二三年被沮利克

的議會所通過，但被一個極大多數的複決投票所推翻了。考慮瑞士婦女對於各種宗教事業之熱忱的贊助，在信仰上，她們很易於佔男子之先着，可見男子們，似乎太缺基督的仁愛了。關於男性對比較不重要的教會選舉權所取的態度，時常提出的解釋是：一旦批准這個要求，新要求就會馬上跟着來了，得隴望蜀，直到男子優先權的堡壘，盡被攻陷了。

於一九〇三年，由白賽爾市區發起，現在已有八州准許婦女被選為教育董事。『然而所不幸者』，引魯其·銳內克 (Annie Leuch-Reineck) 語，『由各政黨之慷慨所贖給婦女之席數，是渺乎其小的。所以她們甚至對這些州內之學校制度，尚說不上施展直接的影響』。在五個州中，婦女也可被選充任調解工業糾紛的小法庭 (Gewerbe Schlichtsgerichte) 之法官。有十州，准許她們充任各種具有慈善和衛生性質之公共委員會之委員；和在四個城市中——拉·雀·德·芳職 (La Chaux de Fonds)、呂賽爾、熱格 (Nug) 和沮利克——她們可充影片

檢查員。

上列各項，都是渺小的政治的勝利，並且都是限於地方政府之領域。直到現在獲得州的選舉權之各種企圖，都歸失敗了。但是擬賦予她們這種權利之法案，是累被提出的；而且在紐卡德爾、白賽爾、沮利克和日內瓦，它們都被州議會所通過，但旋被復決投票毀滅了——這是瑞士人民的保守性，反比他們所選代表之前進的思想之顯著的事例。然而按照犬儒派的見解，後者並無擁護女子參政之誠意，明知他們所代表的民衆，對於這般紳士派的考慮，是水洩不通的，姑且將它們通過，聊以敷衍婦女之請求。在紐卡德爾州，議會於一九一九年所通過的賦與婦女以完全參政權（suffrage féminin intégral）之法案，在復決上，被一二、〇一七對五、四三六票民衆的表決，推翻了；在白賽爾市區內，於一九二〇年，一二、四五五對六、七一一票，推翻了；同年在沮利克被八八、六九五對二一、六三一票壓倒了；在日內瓦於一九二一年被一四、一六九對六、六三四票，毀滅了；再於一九二七年，在白賽爾市區被一四、九一七對六、一五二票，打倒了。

所以絕無問題地，瑞士大多數選民，仍然信奉『女子主內』（“Die Frau gehört ins Haus”）之原則，爲其金科玉律。但是，一般民衆，雖立於堅決反對的地位，但屬於各種政治陣線的頭腦清楚而居於領袖地位之人物，漸次承認以榮膺『全歐最老民治國家』之徽號，反鄙各予全國一半以上的成人公民以參政權利所顯出的荒謬。擁護婦女參政權者，在政黨中，只有社會黨和公產黨；誠然，據說他們的擁護，非徒無益，反而又害之了，因爲在資格較老的政黨中，有極多選民，對於該項運動，因此遂發行了反感。在另一方面，據說有許多共產黨，表面上對於他

們的政黨在公共集會中所發表的正式黨綱，雖一致鼓掌贊成，但在內心中，卻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一旦實際表決女子參政權之法案時，他們同任何布爾喬一樣，堅決要在家庭內和在政治上保持男子之優越的地位。在鄉區內，反對女子參政權之情操，尤為堅決，因此使人相信，其勝利將先來自城市的各州，例如，白賽爾市區和日內瓦。居於天主教保守黨後臺老闖之地位的羅馬教會之各級教士組織，也是仇視婦女參政的。關於此點，下面所引瑞士天主教婦女聯盟，於一九二九年春所發表的惹起很多注意之宣言，或者有相當的價值：

政治的參與權，甚至對於天主教的婦女，雖不在禁止之列，本同盟不要求它，也不擁護它；然而倘使它將侵入了瑞士，我們的組織，當然要引為憾事。但是本同盟，願勸勉天主教的婦女，們務須効忠和熱誠奉行她們的職分。

雖有這種含糊其詞的陳述，或者就因為有這種陳述，新教之保守黨的分子，深怕在婦女參政之下，天主教的婦女們，將被部勒投完全清一色的票。並且他們也懼怕社會黨將導引他們的妻子和姊妹，加入他們的投票；而在另一方面，中等階級家庭之婦女，是不會投很多的票的。擁護軍事制度者，惟恐在他們的女同胞中，有太多主反戰論者，而反對禁酒者，亦惟恐她們當中有太多主張禁酒的分子，雖這兩種危懼都很少根據。瑞士的男子，對於自大戰以來，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業已批准了女子參政權，只有法國和意大利，尚未准許女子參政之事實，不大動心。不論如何，他們對於國家，在男性，即在他們自己的統治之下所有的成就，是頗覺心安意足的。

至於運動女子參政者之自身，在其言論中，也顯然缺乏熱忱的氣勢。除了她們的選舉權被男子剝奪以外，她們也不能列舉其他重大的委曲，請世界人士主持公道。譬如她們不能對於瑞士的民法發出怨言，如像法國婦女，

對於拿破侖的法典或如英國婦女，在已結婚的婦女之產業法規未改進其普通法之前，可發出的怨言。如上文所說，她們是被准許自由參加實業和自由職業的，而且是以滿腔熱忱，從事於這些，而達到相當勝利的，因此她們很少以意志或和餘力，來作參政的運動。她們也完全和男子表示同意，即或她們有此意向，以瑞士而論，任何暴烈的政治行動，業已非其時了。而她們並無此意向；在她們中間，沒有狂暴的女權運動者，會以硫酸灌入郵筒或大鬧國會，和因這種宣傳的方法，被捕入獄時，以拒絕進食的手段，作為消極的抵抗。反之，她們的言論和宣傳的刊物，充滿着關於她們的和平的和完全遵循憲法的途徑之保證，並且也累插入，她們完全沒有兩性間的仇視之陳述。她們似乎也尚未懂得，色情的蠱惑之價值，或者她們的道德太高尚，不肯效法美國婦女，在專為擁護她們的正義所舉行的運動選舉之大會中，利用大羣姿首秀麗而服裝入時的女子招待員。她們富於天才的領袖，過爾德女士 (Irle, found)，曾經指出在家庭中，在田地裏和在工廠內，雖有幾百萬婦女工人，但在瑞士歷史上，卻沒有偉大女戰士或政治家，沒有準·奧夫·阿克 (Joan of Arc)，沒有綺麗沙白王后 (Queen Elizabeth)。誠然，有一個十三世紀的西委斯之節蔡德·司徒發青 (Gertrud Stauffacher of Schwyz) 之人物，據說她曾以女性之柔婉，施展政治的手段，但僅以間接的方法，勸勉她的丈夫同他由銳的和翁德華登的朋友攜手，解除奧地利亞所加於他們的束縛。司徒登青夫人，實有其人與否，難以確定，不論如何，二十世紀的瑞士女子，在心性上，從她接受了很大的遺傳，凡相信一位婦女是一個人，而且在她的自身是一個目的者，很願意想她們有了太多的這種遺傳。

最近，瑞士參政運動者，曾顯示異常的活動。或者因為 S A F F A 之赫赫的成績，而增加了勇氣，她們持着呈

聯邦會議之申請書，請各方面簽名，在三個月的時期中，她們居然得着了二四八、二九七個可觀的簽名之總數，就中有七七、九九〇是男子的簽名。在簽名者中，有全國各處每一政黨和社會階級的公民——尤其是在非常擁護該運動之日內瓦、物德和紐卡德，獲得了衆多的簽名者。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她們以適當的儀式，將該申請書，呈給了國議會和邦議會之主席。以前瑞士的參政派，除社會黨之例外，一律不預聞政黨的組織與活動，但現在，她們開始顯示願意參加實際政治之傾向了。另一種使人興奮的時代的兆頭，雖不算重要，乃是最近成立的反婦女參政同盟（Schweizerische Ligagen des Frauenstimmrecht）。在後一件事未發生以前，關於在該國有無『反對黨』之存在的詢問，須將『反對黨』之一名詞，加以翻譯，方能使被問者了解發問者之用意，而所得的答覆，是公然無忌憚的露齒而笑的表容（with a broad grin），和這樣強有力的一種反對是，不需要組織之答詞。近來，雖有令人膽壯的朕兆，然而在瑞士關於婦女參政權之鬭爭，仍然是遍地荆棘，不知何日纔能有成功的希望。

## 第十章 特殊愛國的和其會社

以上各章，應能令讀者佩服瑞士人民之組織的能力，他們爲着社會上任何宗旨，都慣於馬上有效地組織起來。在這些無數會社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平衡（因爲在它們中間沒有一個會社能壟斷一切的），形成了該國政治之純全民主的性質。遍布於該共和國之各地者，有成千成萬的會社（Vereine）網，就中多數聯合而成全州的聯合會，最後而成全國的聯合會。每種組織，在其所追求的特殊的目的之外，差不多都宣稱更有一種愛國的目的。關於下面將要討論的射擊和體操之崇奉（cults of marksmanship and gymnastics），以及唱歌和音樂會社，也頗有相同的情形。

所以，倘使我們要着手撰著一篇論列瑞士一切帶有愛國色彩的會社之論文，該文必需一冊百科全書的篇幅。自然，這些組織，大多數對於政治只有渺小的關係，而且同他處的組織，也沒有多大區別。爲這些理由，我們在下面的概論中，將它們省去了。在另一方面，有兩種瑞士的組織，即新瑞士社和瑞士公民科協會（New Helvetic Society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wiss Citizenship Courses），是特以政治爲目的的，並且方法新穎，而對於該國人民生活特別重要；故此本章大部分的篇幅，是用以專論它們的。全世界都有童子軍，而且都很相同；但是，它們的組織，在瑞士具有某項爲瑞士人特有的和非常有趣的性質。自然，互助團員們，不是以愛國爲首要目的的，實

在，依照他們的敵人所說，他們的目的，恰爲愛國之反面。但是，他們以真正瑞士的熱情，向這種非難提出抗議，而且既然是全國唯一祕密的會社，必然免不了同政治有多少關聯，所以至少值得略加敘述。

### 新瑞士社

一般愛國的會社，都易趨於百分之百的情緒的衝動，而非百分之百冷靜的思考。新瑞士社之特點，就在於它已知道怎樣調和一種透澈國家的觀點，一種透澈知識的着手方法。自從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該社改組以來，直到現在，它曾繼續不斷地予瑞士政治思想，以很大的影響。雖不像瑞士公民科協會，對於民衆公民教育運動，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它曾處理過極多具有重要教育結果之政治問題。在許多點上，新瑞士社是一個政治學院或政治研究院。它企圖以全國思想界最高的權威，來解決政治上爭持不下的問題。從他們的專門研究中，可發見許多有價值的傑出的論文和專著（papers and monographs）。這些常被提出於該社之全國大會和分組會議中加以討論，這樣的討論之反響，常被發見於報章、民衆的集合、政黨議會和立法團體。新瑞士社之思想，未被直接變化爲向民衆之宣傳，但它經過上列各種媒介之間接的傳播之後，可以發生不少效力。在該社的後面，有一個長而榮譽的傳統，在性質上，原來略有貴族的色彩，雖在現狀之下，該組織絕無貴族之平常的政治的意義。但在柏拉圖的意義上，即受過高深教育的知識階級，戮力圖謀國家之最高利益者之意，它就實在是貴族的了；但它的活動，既有如此的價值，故很可爲一切有高等文化的民治國家類似的運動之模範。



這個經過改組的新社，實在是創立於一七六一年的瑞士社（Helvetic Society）之原來的組織一脈相傳的第三代。當時的瑞士愛國的思潮，減退到最低的水準了，因着新舊兩派教會間，說德語和說法語的區域間，以及各州之間相互猜忌，自私自利，和循環報復的爭鬪，使國家四分五裂，幾乎不能自立了。頗為希奇者，即在該國之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比當時產生過更多名震全歐的學者、作家和科學家：史學家如富士里（Füssli）和穆勒（Miller）；名牧師如約翰·加士帕·拉肥特（Johann Kaspar Lavater）；數學家如白諾依黎（Bernoulli）；著作家如格士勒（Jessner）和爾士·波賽色爾（Urs Balthasar）；批評家兼翻譯家如巴德梅（Bodmer）；教育改良家如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原來的瑞士社，乃是由這個類型的人物和許多德語的瑞士之家，和少數羅曼士語的區域的世家，聯合發起者。在最優哉游哉的十八世紀風度中，他們每歲照例在新士那奇巴（Schinnach-Bad）集會一次，在這怡情悅性的小溫泉場上，以宣讀高談闊論的演講稿消磨時間，其講演之題材，大多關於愛國心和各種社會改良的計劃，他們滿擬用這些計劃，來為他們的全體同胞謀幸福，但也消費差不多相等的時間，來培植友誼和歌詠太平盛世的理想政治。在其他設計中，他們討論過巴德梅和波賽色爾所提出的創設訓練政治家的學校之計劃，這個計劃，不像他們大多數的紙上談兵的空話，曾被兩位來自苦羅笨敦富於進取心的社員，蒲蘭塔（Planig）和沙利斯（Salis），確實實現了。一位二十世紀類型的政治務實家，對於老瑞士社，頗以為虛疏無用，譏其雖屬逸趣橫飛，但為熱腸人和志趣純潔者之無效力的聯合，到一七九八年，法國五執政內閣（French Directory）之軍隊開入該國時，乃如煙消雲散了。然而在一個理想的立場，該社會達成了兩種偉大的目的，值得

瑞士人民永遠的感謝。在一個猜忌的、爭鬧的地方主義和教派對峙的時代中，瑞士社的創始者，確實有國家的精神。如納布賀時博士 (Dr. Hans Nahlitz) 所說：

第一、這種新的愛國情懷，突破狹隘的州的界線而包括整個祖國，它是瑞士社所孕育，而受其盡心養護者。在瑞士人民中，創造了一種精神的基礎，使十九世紀之偉業，即一八四八年之聯邦政府，得以建設起來。

第二、在普遍的立場，甚至是一個更偉大的功業，瑞士社令先知先覺者 (men of light and leading)，覺悟必須大家聯合起來，增進同胞之福利。

跟着仲裁法案之成立全國秩序恢復之後，於一八〇七年，在所芬井 (Sofingen) 所召集之會議，產生了第二瑞士社。在這個新組織中，只有少數舊會員，曾參加活動，所以其管理權，不久即落到懷抱自由思想之朝氣蓬勃的青年會員手中了。他們以全副精力，參加當代實際政黨的鬭爭，極力擁護出版自由、人民主權，反對教會干政，並力主將一八一五年之鬆弛的和約，變為一種強有力的聯邦的盟約。自然，第二瑞士社，不久即失掉了保守分子之擁護，但在另一方面，對於一八三〇年之偉大的改革和最後一八四八年的憲法之成立，它卻有過極大的貢獻。因為在這個憲法上，它的主要的目標，都已達成，所以它也隨着壽終正寢了。第一和第二瑞士社，在方略上雖迥然不同，但它們在一個基點上，是相同的，即專心致志於一種化除地方和語言畛域之愛國心——換言之，即一種擁護全國各地共同福利之愛國心。

直到現代，因瑞士的情形再陷於惡劣的境地，使一般愛國人士，不得不起來組織第三瑞士社，借以保障國家

的利益。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突然在該國說德語和說羅曼斯語的區域之間，似乎裂開了一道深淵。現在很清楚，這種隔閡，在幾年以前，業已日漸加深；並且，倘使對於該項情形，能及早作適當的措施，也未始不可防患於未然，而使其不致一發不可收拾了。不幸，瑞士全國各處，當時更充斥了由兩個交戰集團，如雪片飛來的宣傳品，使其國內之危機，更變本加厲了。或者，關於危機之嚴重，說得太過火了：瑞士人是極端謹慎的，而令來自較大的國家之觀察者，深感他們將從國內外所發出的政治的威嚇，看得太為嚴重了；但是，該國確實危懼因內爭而兆分裂和不可思議的災患。

一旦遭遇了一個顯然如此嚴重的事變，然而其措置，也是頗為敏速的；老瑞士社之傳統，昭示兩個隔閡的區域間之和解的途徑。實在倣倣，在該種情形之下，於一九一四年的春天，全國各地的代表，曾被召集赴白恩開會。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差不多從未謀面的青年，他們大家都為國內的情形和歐洲一般的情勢，深感不安；但在彼此平心靜氣討論之結果上，他們都明瞭，使他們分離之爭端，同一個聯合的國家的情操之極端重要性，相形之下，實在不過是一種不足重輕的誤會。自然，在白恩會議中，曾費九牛二虎之力，務使各種可能的爭端，都能冰消瓦解，同時極端側重瑞士一切公民之共同利益，不管語言和地域之歧異。在那個集會之中，便產生了現在的新瑞士社，它在戰事的暴風雨之下，曾竭力維護國家的統一。當然，它並不是竭力奔赴該項鵠的之唯一的勢力。優秀的報章和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擁着全國各地先知先覺者之有力的贊助，皆曾致力於安內之偉業。然而新瑞士社，以其致全力於國家統一的組織之資格，對於該項正義，曾作極偉大的貢獻，成了各種統一的動向之中心和焦點。例如，詩

人史匹特勒 (Karl Spitteler) 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沮利克以『我們瑞士人的觀點』(『Inser Schweizer Standpunkt』) 爲題之不朽的講演，即爲在新瑞士社的一組會員之前，所發表者，這篇演說，比任何官廳的或非官廳的關於戰爭之發言，更能將該國之思想合盤托出。自一七一八年以來，該社便成了對於當前一切重大政治問題的討論之全國的講壇了。

新瑞士社之宗旨，是在於強化祖國之觀念。在其『擁護瑞士的尊嚴和安全』(『Pro Helvetica dignitate ac securitate』) 的策略之下，它認定治本的辦法，在專致力於國家的情操、國家的教育和國家的利益之促進；它的目的，是在創造一種全國的覺醒，恢復瑞士的愛國心。它企圖增進全國一般的福利，但它深信，必須先激發公共的良心，來反抗唯物主義之侵襲。爲達到上項目的起見，它的社員們，企圖先將他們自己對於各種問題之紛歧的意見，盡量揭露出來，借以相互攻錯。新瑞士社，絕不承認有成爲一個政黨之任何意思；它企圖站在一切政黨之圈外，而取超然的態度。自然這種態度，有時是決難保持的，例如，最近關於某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和他們的政策，該社所應取之態度，各社員之意見，頗難一致。因着該社之顯然愛國的性質，所以在它的社員中，有很少社會黨的代表。在另一方面，在它自己的領袖中，有些人因爲它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不够強烈，頗覺失望。

現在新瑞士社，在內地有十九個集團；十三個在說德語的瑞士，五個在說法語的瑞士，一個在苦羅笨敦州。在東部，聖加侖和沮利克之集團，是特別強有力的；在西部，日內瓦和羅善之集團，最爲強大。該社共有社員二千五百人，就中有許多是聯邦高級的官員。每年它舉行三四次全國的會議，各地集團，均派代表出席參加。在改變這些集

會之地點上，該社一方面適應了各社員赴會之便利，同時可使其勢力伸張到全國各地。從下面所列舉一九二七至二九年該社之全國的會議議事日程中所包含的比較重要的議案，可略窺見其興趣之範圍：反對瑞士公民接受外國的勳位和勳章之創制；瑞士農業之問題；瑞士同蘇俄之關係；當前經濟利益之衝突在政治上之危機；地帶的問題和撒沃依（Savoie）的問題；准許在俱樂部內恢復賭場之創制；酒的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接受關於在瑞士須設法抵制太多的外國人口之聯邦憲法第四十四條之增補案；因行政人員之增加所發生的問題；在瑞士所生的電力之出口的問題；婦女參政權；地方自由權；公民服役；屬於民治主義之冷靜的批評之範圍以內的，有害於清廉的公共生活之勢力。

如上舉各問題，照例是先在地方集團之會議中被討論，然後以其討論之結果，連同所搜集的大宗的材料，向全國代表會議報告，以供參考。在後者中，所舉行的辯論，是具有很高價值的，彙集全國學者，對於所考慮的一切問題之縝密的意見，以為考鏡。它們是詳細披露於該社之公報的，該公報是一種兩個月出版一次，具有從六十至八十面的有價值的雜誌，此外更載關於政治題材的時論之批評，並為地方集團的活動之總匯。最近該社，曾從事於一種全國的年鑑之刊行，剛出版的第一次年鑑，其標題為：『瑞士，一九三〇年』（Die Schweiz, 1930）。它以三百零五面的篇幅，緊密地載着許多著名的權威，關於該國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之許多方面的論文。這一部新年鑑，足以媲美前些年希勒特（Hilty）、壽林登（Zurlinden）和瑞士印書館（Schweizer Presse）所發行的年鑑。它是國內外的學者不可少的參考書，尤其是對於瑞士公民教育發生興趣者，當以先睹為快。

新瑞士社之慣例，爲指派專家委員會對於繼續的政治問題，加以研究。從這些委員會之辛勤的工作，發展了大宗小册子的文獻，這種文獻，乃是對於自世界大戰爆發以來瑞士公共生活發生興趣者，所不可忽視的參考資料。在可能的範圍內，該社之決定，是以決議案之正式的形式，通過於全國代表大會者，在某種情形之下，這些決議案，是被提出於全國各地社員請其複決者。以這些決議案，在全國各報所佔篇幅而言，可見有一個很大部分的民衆——最有知識的民衆——對於該社之事業，感覺很深的興趣。間或也有一個團體集會，其中有某著名的領袖，討論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於是公開於民衆的而爲大家所注意。

新瑞士社之批評者，頗以爲它約略太偏於學術、太謹慎和太不願採取一種勇猛的態度，雖它不能不如此，否則難以保持全國各地社員之擁護。他們又說，它是根本保守的，不是激烈的，和它的兩個前身毫無二致；而它不再如先前英勇的時代，履行那般扼要的職能了。然而目前，凡不喜悅新瑞士社對於任何待決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之政客們，自然要毫不猶豫地表示反對。但是將它看爲由全國許多最有名的人士，對於重大爭執問題的討論之一種繼續不斷的講壇，該社所履行的職務，就顯然很有價值了，因爲在他國，這種職務，大致是由一般政黨會議之非專家的和別有私圖者之操縱、黨派的報紙、特殊利益之向議員、黨領袖者和議員們所包辦。

新瑞士社之最顯著的貢獻，雖爲其以瑞士的公論之太上的國會之資格所履行之職能，但在許多重要的關頭，它也曾顯示一種非常切實的把握。例如，在世界大戰期中，爲改進工商業的狀況起見，它首倡瑞士週會（*Schweizerwoche-Vorband*）之設立，該會至今仍按期舉行，證以報章對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

對於瑞士週會（它實在有兩星期的會期）之報道，足以顯明新瑞士社對於實際問題之把握。因着該會之努力，在各中心的都市中，國貨之大規模的展覽（Antwermessen），實際上也是普遍於全國的結果。『使一切瑞士的經濟集團，和民衆集團之間，有了更好的相互的諒解，並且使全國人民，能更深切體認國家經濟之需要』。其所用的方法，既簡單又省事。在爲這個緣故所特定的兩星期之中，由於商家和消費合作社之協作，各處商店之櫥窗，都一齊展覽着國貨和模型，其範圍雖不大，但頗爲動人。同時舉行各種會議，有時這種會議，具有全國的規模，出席者有該共和國之大政治家和商人，在會議上所討論者，爲瑞士的生產者、消費者、和工人之優點和需要。以關於各種國貨之更普遍的應用爲題，向學校兒童懸賞徵文之辦法，或者也發生過頗大的效力。

在大戰期間，新瑞士社也曾以極端直接和聰明的方法，來轉移公共的輿論。許多瑞士的報紙，因其經濟的不裕，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慣於從規模宏大的印刷公司，購買特殊星期的增刊（Voltaire），分贈它們的讀者。因着大量的生產和成本的低廉，這筆生意，大多落到德國行家的手中了。它們供給了民衆文藝的讀物，誠然，大致是無害的，但仍有不少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的至高無上的皇室人物，和其他親族關係之照片和報道，使醉心民主政治的瑞士人，頗覺不安。自然，隨着戰爭之爆發，這種星期增刊，使有利於德國的宣傳，在實際上，能遍佈於該國每個家庭。爲應付這個危機起見，新瑞士社趕緊成立了一個協會，專依照自己的意見，發行星期增刊，使它們充滿着純正的作品，有簡單的詩歌，和描寫本國生活之圖畫，一切都屬於真正瑞士的和中立的性質，而瀰漫純粹民主的空氣。全國的新聞紙，都被敦促用這種本國製造的星期增刊，去代替德國的貨品，並在經費方面，給予它們種種

的便利。在瑞士人的眼光中，這是一件很花錢的事情，因為它曾虧折了六萬八千佛郎；然而在該協會之全盛的時期，它曾於每星期流通過三十萬份之增刊，這些增刊，對於轉移人民的視聽，於純粹國民的觀點，不可謂無重大的貢獻吧！

然而，新瑞士社以爲沒有其他問題，是比移民問題更爲重要的，所以它對於這個問題之實際的貢獻，也不減於其他任何問題。它是先由斯卡夫好生的集團，作爲一個特殊研究問題的，其辛勤的工作之主要的結實，乃是穆勒 (Ernst Müller) 所精心編纂的一本名曰『我們的瑞僑』 ("Unsere Auslandschweizer") 之優良的小冊子，其中充滿着正式的文件。因該社對於該問題之純粹科學的探討，尙以爲未足，乃於一九一五年，於佛銳傑 設立了一所特殊的祕書處，最近遷至白恩，在色勒委吉爾 博士 (Dr. Ed. Zellweger) 精明的管理之下，曾辦過極多實際的工作。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它又發刊了一種附有精美圖畫之月刊，名曰『瑞士回聲』 (Schweizer Echo)，現在由沮利克 的納特 博士 (Dr. A. Natt) 主編，頗受僑居各國之瑞士人民的歡迎。最後該社曾於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一部由白賽爾 之韋白 (J. Weber) 撰著的『你的家鄉，瑞士僑民教科書』 (Deine Heimat, Das Auslandschweizer Buch)，最好稱它爲，在僑居外國的瑞士人中培育愛國精神的教科書。它是一部最完善的著作，以簡潔的文字，概略地敘述該國之歷史、地理、文學、社會和經濟的狀況、藝術和文化——全書插有豐富的影印圖和彩色畫，並附有各種精美的地圖。聯邦總統馬塔 (Federal President Mata)，曾特爲韋白 的著作，撰著論文一篇，可見其價值之高了。它是同時有三種國語發行的，並半價（三佛郎）發售予僑居外國的瑞士人和新瑞士社之社員。



瑞士對於移民的問題，已有數百年的經驗。以一個多山的國家，生育率既高，生活狀況又頗艱窘，而其四週鄰國擁有膏腴的平原和富庶的人民，所以在中世紀，它的壯年們成千成萬地離開家鄉，幾乎專為異邦的國王的軍隊充當僱傭兵。近代型的經濟的移民，始於十六世紀，自然在十九世紀達到了它的最多的移民人數。起初，因為該國之貧窮，向外移民，確為必要而相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正式予移民以補助，有時並予以頗大的經濟的助力，尤其是在荒年或災變之後。有些地方，政府欲竭力減少貧窮者之人數，所以將無家的和赤貧的人民，大批地輸送出國——老弱的兵丁、跛者、癩者和瞎眼者、白癡者和低能者、剛出獄的犯人——這些人當中，大多數悲慘地葬身於赤道的南美洲。這個現在被稱為生靈的葬送（*Seelenverkäuferei*），在瑞士的歷史上，是充滿恥辱的一頁，雖他國的移民史上，當然也難免有相等的污點。殖民企業的行商、轉運公司，和甚至外國的經理，在他們的輸送人民出口的事業上，是被獎勵的。許多美國人，定然是會吃驚的，當其他們知道在前一世紀之八十幾年之間威斯康辛州（*State of Wisconsin*）在白賽爾設有辦事處，專在瑞士各地分散贊成移民之宣傳的文字。

自從那個時候以來，對於這個問題之公共的輿論，幾乎完全轉變過來了。想到在最近幾十年中外來的移民，曾遠超移出國外的人數，這當然是應有的轉變。在本世紀之頭十年中，瑞士出國的人數，為五萬四千人，而同時有十三萬四千人移入瑞士。在一九一〇年，居於瑞士之外國人，共計五十五萬二千零十一人，而其全國人口之總數，為三百七十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三人，前者之百分比（一四·七）和美國同時之相當的數字，幾乎完全一樣。十平以後，因為世界戰爭之結果和其後對於入口移民之限制，關於外國的僑民，情形乃大改變了，其人數曾降至四

十萬零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或僅爲全人口之一〇·四百分比。然而有思想的瑞士公民，對舊態之復萌，不免有恐怖之展望，一方面惟恐喪失了他們自己的同胞，他方面又恐遭如潮湧進的外僑之喧賓奪主的威嚇。自一九二〇年以來，移出海外的人數之增加，比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更爲猛進，使他們的恐慌，更爲真切，雖在最近有數字可稽的三年中（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這個運動已稍退減了。（根據一九三六年瑞士統計年鑑（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s Schweiz, 1926）1〇八面：軍政部關於軍事年齡的男子所蒐集的統計確數，顯示在一九二六年中，出國者有八千七百三十三人，而回國者，有五千四百三十人——出入相抵，淨失三千三百零三人。在一九二七年，因爲國外經濟狀況之比較的不良，尤其是法國和國內經濟狀況之比較的良好緣故，所以其潮流轉變了，出國者有七千八百八十八人，而回國者有八千二百九十九人——出入相抵，淨得四百零八人。）

連續多年以來平均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外國人，抵補每個出國的公民，難怪關於移入和移出的問題之討論，在瑞士吸引了很多關切的注意。在第十六章內，將對於處理移入人口之方法，加以討論；此處僅須說人口出入的運動，是在不同的經濟的和教育的水準上，進行着的。例如瑞士的機器構造工業，難於覓得相當的機器工匠和工頭，但對於該國之優良的學校所訓練衆多的本國工程師，又無法盡予安插。某種工資低廉而爲本國人所不願就的職業，遂大多落於外國工人的手中了。在瑞士從七十到八百分比的鞋匠和修理皮鞋者，和從八十至九十五百分比建築業的工匠是外國的僑民。在另一方面，凡爲生計所迫，而離鄉背境的瑞士人，每爲高等技術人員或曾在該國最優良的學校畢業的男女農夫、牧人、奶場工人和葡萄園的工人，因其家鄉山谷地畝之狹小而被迫出

國謀生者，都曾受過很好的訓練，而且時常是受過很好的教育的，這些人，在外國普通都頗生意興隆。據說委爾熱斯克（*Chamasa*）之有資格的選民，現居美國加利佛尼亞州，而從事各職業之人數，超過尙留於他們的本鄉，渺小的提省諾的山谷之人數。農業的工人和提取工業的工人，幾乎佔瑞士移民百分之三十；工匠，在他們當中，有許多是金工和紡織之專精的工人，佔一個相等的比例。在移民中，有六分之一是商業和運輸的雇員；學生和以私人的進款爲生者，佔八分之一；行政的官吏、律師、科學家和藝術家，佔十六分之一。其餘（六·七五百分比）到外國充當僕役，在他們當中，有許多到外國去的，目的是爲精通其語言和風俗，以便將來回國加入旅館的工業，這是人所熟知之事實。

瑞士作家，關於移民問題所常加以討論之一點，乃是怎樣減少移民之人數。普通立法的禁令或徵稅的法案，卽或這兩種方法，是合宜的，也仍無濟於事，因爲關於這一點，聯邦的憲法保障公民的自由（*Verfassung*）（然而它對於經手移民的商業之管理，是以聯邦的立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加以規定的。在這一條憲法的規定之下，曾通過幾個法律，最近的是於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成立的，按照其規定，在聯邦行政委員會之政治部內，設立了一個移民局。現在在瑞士，對於懲息移民的宣傳，是在禁止之列。在另一方面，爲使人民對於繼續居住家鄉，更覺有利和可有很多的成就，例如改進工資和工作的條件；建設附有花園之小住宅；國內的改進和國內拓殖之發展較好的工業的、商業的和農業的教育，和最後，抵制外國經理機關，招募瑞士工人和雇員之戮力。

然而，大家坦然承認，許多公民，必須僑居外國，乃是該國之經濟狀況所使然。倘使在世界各處，沒有這樣的代

表——商人、製造家、工程師和專門技術人員——瑞士的工業，就不能以廉價購得生料，而且，因此就會失掉了它的許多最好的主雇。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衰落的繁榮，將驅整批的人民出國謀生了。在國際貿易和轉運上，瑞士有許多公民旅居異邦，而爲它作開創的事業，也顯然是與它有利的。兼之，每個移入外國的人民，不論他居留在什麼地方，總是本國貨物之好主顧，並在新的鄰居中，有效地宣傳其優點。關於移民的這筆帳，應該將借方和貸方之帳目，一一登記於經濟的總帳上。瑞士僑居外國的工人和專門技術人員，在奶餅、紡織和製造鐘錶的工業上，曾成了其本國貨品之勁敵。然而，在這一方面之損失，同瑞士大批在他國居留人民所得巨大的利益相比較，是不足輕重的。

居留外國之衆多的瑞士人民，對於其本國之政治和經濟都有裨益。他們每一個人，都覺得在某種意義上，是他本國的一個欽差；在集體上，他們時常以其勤奮、能量和愛惜名譽之高尙的意識，時常光大了它的令譽。每值困窘的時候，瑞士本國的人民，對於他們在外國的同胞們之臂助，有五中銘感之理由；在世界戰爭期中，他們對於瑞僑之感激，實不減於任何時期，因爲當時該國之生活和工業所絕不可少的食物和材料，大部分是由居於交戰國家之一造或它造的瑞僑所獲得的。並且，不論甚麼時候，在瑞士有了急需，它的旅居海外的子女們，莫不立即慷慨捐輸款項和工役，以爲其救濟。這個效忠祖國的熱情，在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曾有過一個可驚的和感人的鐵證，當時有二萬五千能勝任兵役的男子，在他們當中，有許多是生長異邦，而從未見過祖國者，一律返國當兵，以防可能的侵略。

自世界大戰以來，瑞士國內的人民，對於僑居異邦的國民，因深感其情意，遂曾顯露了一種新的興趣和熱情。在這個運動上，上面曾略提的新瑞士社，所從事的事業，具有重大的意義。該社以對這個題材所貢獻的科學的知識，以普遍公開的討論所激起的興趣，以對於該國之公使和領事的職務之改進，所作之建議，最後以它自己的瑞僑委員會（Ausland-Schweizer-Kommission）所指導的全球的組織之成立，爲其首先的倡導。在後者之白恩總機關蔭庇之下，在世界各處，成立了一百六十三個瑞士僑民的集團。此外該委員會，更在其他移民之中心地點，派了二十三個通信員，後者必定會儘速在各該地方成立瑞僑的集團。自然，瑞僑們會時常聯合於慈善的組織，以賑濟祖國同胞之災難，並且在唱歌、遊戲運動和射擊等會社內，他們也是聯合爲一體的，尤其是由於後者，他們曾於某個程度內，保持了與祖國之聯繫。然而，在新瑞士社的蔭庇之下，最近所成立的集團之意義，乃在它們的旨趣，專在同瑞士保持着最密切的可能的政治聯繫。

據估計，僑居外國的瑞士人之總數，略超過三十萬人，就有十六萬人在歐洲各國，和十三萬四千人，在南北兩美洲。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之北部，有許多城市中，有瑞士僑民的『殖民地』（瑞士人用此字有他們的特殊的意義）；在南北兩美洲，也有這種殖民地；在巴爾幹和近東、在非洲、亞洲，更遠的印度和澳大利亞，這種移民團，就較爲稀少了。瑞士僑民委員會，擬與這一切成立正常的聯絡，包括極多的通信，都由白恩的總機關所主辦。平均對於每七個留住本國的瑞士人，就有一個僑居外國的瑞士人，該委員會之公布的宗旨，在接觸這第十二個瑞士人，不論他在天之涯或地之角，用文字和實力幫助他，在他裏面，保持着一種同祖國的聯絡之意識。爲達到這個目的

起見，曾竭力廣播『瑞士回聲』之月刊，和最近出版的瑞僑教科書，務使這兩種刊物，得落到每個瑞僑的手中。此外該委員會，更以最低可能的價格，寄出大批書籍和小冊子，有時完全奉送，不取絲毫代價，特別是瑞士地理、歷史和政治教科書，以及專為學校之用的裴斯泰洛齊日曆。最近它曾於各鄰國的城市中，舉行團體的集會，放映『葡萄園丁節』（Fête des Vignerons）之影片，和表演瑞士作家所寫的戲劇，成跡甚為卓著。為該委員會所遣派的演說社和唱歌社的社員，在德、法、意等國的瑞士移民團體，也頗受熱烈歡迎。於一九二九年的春天，該國最顯赫的文學泰斗之一，摩西林（Felix Moeschlin），被新瑞士社所指派，赴美國充任『知識的大使』（“Intellectual ambassador”），在我們的幾個較大的城市中，向具有高等欣賞力的聽眾，作學術的講演。

在新瑞士社的名義之下所分發的各項刊物，毫無褊淺的愛國主義的（chauvinistic）性質，也沒有任何刊物，其旨趣對於瑞士移民所居的國家或其鄰國之政治，有絲毫不利的企圖。在這兩點上，該社的活動，是和法國和西班牙的宣傳的組織在南美洲各國所運的手腕，迥然不同的。瑞士人從意大利的國家主義的會社，但特·亞里吉爾銳（Dante Alighieri），和德國具有類似性質的會社，在外國，保持德國精神的普通德國學校聯合會（Allgemeiner Deutscher Schulverein zur Erhaltung des Deutschtums im Auslande），所得的經驗，使他們深知狂妄的愛國的組織所採用的方法，但他們自己，卻毫無效顰的意思。反之，新瑞士社，在外國所分發的文獻之整個的論調，在韋白所著的『瑞士僑民教科書』中，開宗明義地，下面一段文字，作了一個總聲明：

『什麼是這一本書的宗旨？培植愛慕家鄉的心理，一種以家鄉的認識和家鄉的歡樂為基礎之愛慕，一種

深植其根株於我們的祖國之美的欣賞，和我們所敬服的聯邦之歷史的發展之理解之愛慕；覺醒家鄉的意識，或者甚至少許對於公民資格之矜持。這一切美德，都必須建築在對於我們的政治制度，我們的民主的憲法，和我們在許多方面，可為表率之立法之理解和欣賞。對於祖國之真正的愛慕，是同狹隘的愛國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為後者僅為國家主義者之誇大狂和對於戰爭之煽動）；它對於鄰邦，發揮謙遜和尊重，對於我們渺小的，不屈不撓的，採取正當自衛手段的人民，在人羣中，要求適當的關係；總之，誠如我們的詩人和沮利克的同胞，客勒（Gottfried Keller）之無以復加的名句：

『尊重他人的祖國，但愛你自己的祖國。』

在瑞士的移民中，有一個很高的百分數，遲早必定要回國，永久居住在他們所出生的故鄉。關於這一點，除了關於軍事年齡的壯丁外，顯然沒有適當的統計材料，曾被蒐集；但大家都知道，在離國的人中，有許多（例如時季的工人、僕役、學生、書記、旅館雇員和其他欲精嫻語言和完成職業訓練者），僅希望在外國居留短促的期間。甚至連那些意欲出國久居和掙錢糊口者，也很想回鄉同故舊閒話桑麻，特別是他們稍有資產的時候。根據外國所搜集的數字，在各該國的瑞士移民，返國者，約佔四分之一。新瑞士社所從事的一種工作，是使厭煩僑居生活者，有返國的便利。恢復他們的公民的性質之難易，顯然繫於他們在外國時同本國所保持的關係之深淺。關於後一層，在瑞士有時可聽見的怨言，使人很容易想起柏拉圖在『共和國』中對於外國的影響，所表示的恐懼。瑞士人承認，或者有點不大高興，由返國的移民所帶回的，關於外國的風俗之知識，時常具有很高的價值，但他們對於回國後

漠視本國政治者，或更變本加厲，仍同情於外國，而令在該國業已強大的外國的勢力，更加強化者，他們毫不顧情面，必會予以嚴正的批評。這樣的事件，是例外的，但它們在旅居外國的瑞士人中，大大地增進了保持國家精神之慾望。

關懷移民的動境者之一種最有趣的建議，是應給予居住國外的瑞士公民某種政治的權力和選舉代表的權力。前面已經說過，後者的人數，約計三百萬以上，僅有三州的人口，是超過這個數字的。實在，常聽見人稱瑞士的僑民爲『第二十三州』。其理由是這樣加以說明的：

『畢竟祖國不能繼續將政治的義務（例如兵役，或繳納兵役豁免稅），加諸居住外國之公民。倘欲使權利和義務相應，就必須賦予他們以相當的政治的權利。給瑞士僑民以選舉代表參加聯邦會議之權利，准許他們享受創制和複決的權利，那末，他們不特會以更大的情願，履行他們政治的義務，他們對於祖國之政治生活，也會保持最蓬勃的興趣』。

法國殖民團，在巴黎的參議院和衆議院中之代表，常被引用以佐證上面的提案，雖其動境自然不同，因這些殖民團是在法國主權之下的，而瑞士的殖民團，僅爲居於外國旗幟之下的公民團體。

主張賦予瑞士僑民以投票權利之議論，直到現在尙未超出純粹學理的階段。自然這個計劃，雖將大增領事館職務上的負荷和經費，但在現代交通便利，和可郵寄選票的情形之下，在學術上，並無不可剋制的障礙。至於外國政府，願否瑞士僑民，在其領土內投票選舉，其聯邦立法的議員，和表決瑞士的複決的爭議，似乎未被考慮到。兼



之，國內的瑞士人民，因尙未能脫盡偏狹的團結，所以對於他們國內的問題之解決，必定不願受國外的投票和代表所干涉。

新瑞士社爲扶助瑞士僑民起見，所從事的有計劃的和熱心的工作，令人不得不表示欽佩。所利於它的事業者，爲實際上所有瑞士的移民，對於鄉邦之非常的愛戀。在未出國以前，他們所受的非常充分的教育，對於在他們中間，保持着一種終身不墮的國民愛國的心理，也很有裨益。倘使其移民團體所居留的地方，屬於文明程度較低的國家，該項情操，或將被世世代代永遠保存着。然而，在文化水準齊一的國家中，該項情操，傳至第二代，就大約會減色了，到第三代，就會絕跡了。但即使新瑞士社，在這樣的國家中之奮鬥，終竟是沒有成功之希望的，然而，它仍不失爲一種值得繼續努力的奮鬥，當其大批人民，繼續出國之際，或於多數生長於瑞士的人民，仍居外國之際。因爲這種戮力，至少能使他們在所加入的國家中，作更好的公民。納特 (Natt) 博士曰：

『凡居留異邦而贏得其人民之最高的尊重和信任者，就正是值得最高的推崇之瑞士人；在他們中間，凡不失其本色者，乃常爲最優秀的分子。他們沒有諂媚外國人之必要，也沒有否認祖國之必要。他們顯示一個人，如何可同時爲一個瑞士人，和一個世界的公民。因爲，這兩種資格，是相輔而行的。』

例如，凡曾研究過瑞士人在美國之影響者，決不疑惑其相輔的性質，特別是在政治的關係上。兼之，或遲或早，返國的大部分瑞士移民，在一個特殊的程度內，顯證新瑞士社，保持他們對於本國事情的興趣之戮力，是有價值的。在任何可想到的環境之下，瑞士國爲它自己的利益起見，不得不容許一個很高的百分比的人民，出國僑居，

同時它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外國人民之移入。然而現在，其移民之人數，是逾限的，而其移入人民之多，也達到了危險的程度，所以，兩者都有減少之必要。經濟調整的方案，生育節制的實施，和一種類似美國限制移民入口的制度，應該足以達成所不可少的改革。同時，沒有半點理由，可以停止『建設靈性的橋樑之事業，因為，憑借這種橋樑，瑞士本國的人民，纔能同從異邦而來的人民，發生關係，而因着有益的思想之交換，他們可以形成而保障該國之將來』。

### 福幼會 (Pro Juventute)

在國外翊贊新瑞士社的事業而成績卓著者，另有一個在拉丁文的名稱 Pro Juventute 之下，爲瑞士人民所熟知的組織，它在他種事情中，曾致力於僑居外國的公民的子女之養護。在後者中，有許多處境頗爲連遭，特別是自世界大戰以來。福幼會，在其經濟能力的範圍內，曾盡力設法使他們的子女，能有回瑞士消夏的機會。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十年中，該社會以兩百萬佛郎的巨款，在本國招待過一萬九千男女兒童。在這個事業的開始，大部分的兒童，是由慈善的家庭負責免費養護的，但近年以來，因人數的增加，所以必須將其半數安插於公共的機關。在甄別請求招待的兒童時，常以優先的權利，留給弱者或有病者，特別是被肺癆所威嚇者，務使從滋補的食物，如家庭一般的照顧，和山上的空氣，能獲得最大利益者，得被挑選。在其所費子的物質的恩澤之外，福幼會在這個領域內，更容易令清寒瑞士僑民之子女，對於他們父母之邦的生活和思想，能就地得着一些親切的知識。

然而，福幼會之大部分的事業，是爲居住本國的瑞士青年而設的。該社創始於一九一一年，其首要的宗旨，在於「喚起並發揚父母、教育者、官吏和全體人民，對於青年的責任心」。它更宣稱：「並且青年必須被教導，關於對自身和他人應盡的義務」。爲達到這些目的起見，福幼會曾設立了一個中央總匯所，並爲三千多散在瑞士全國，爲兒童謀幸福而具有各種語言、宗教、政治和經濟之彩色的組織，籌措經費之來源。它曾慷慨贊助產婦和嬰兒之保護；學齡的前後和其中的兒童之養護；變態的兒童之特殊的救治；以及許多其他具有類似性質的公益事業。

在興趣上，僅亞於上列各種活動者，爲福幼會所用以籌募款項的方法。每年該社委托一位著名的畫家，繪製一組普通常用的郵票，於節假期中，以稍昂的價格，憑借私人的代售和全國各郵局推銷，以其贏利，作爲該會之經費。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二八年之間，這筆收入，從十二萬五千佛郎，增至五十餘萬佛郎了——後面這個數目，倘以人口爲比例，等於在美國募得三百萬元美金。

這些郵票，因着它們的優越的美術的價值，所以除了籌集款項外，並爲福幼會作了很有效的廣告。此外該會並出售繪畫名信片，以及恭賀弔唁電報用的美術紙張；它從四種用該國三種語言所發刊的兒童雜誌，賺了不少的錢，並接受了許多私人的捐助，和聯邦政府所頒給的一筆適度的補助費。

福幼會，在籌集經費上之奇妙的成績，雖誠然應歸其首功於政府的贊助，但究竟這不過是片面的觀察。政府之所以肯慨然予以贊助，必定是由於社會一般民衆，對於它的事業之普遍的贊許，否則，不僅政府不會予以褒獎，就是偌大一筆款項，又從那裏籌集呢？所以在最後的分析上，福幼會之成功，實由於全體瑞士人民之一種很強的

特性，即非常歡喜兒童，而對於兒童的福利極其關注。

瑞士公民教育會(Verein Der Schweizerischen Staatsbürgerkurse)

從十八世紀之最後二十五年到現在，瑞士之先知先覺者，對於青年之公民教育，無時無刻不爲之殷憂。或者，實由於他們謹慎的國民特性，他們是太操心過度了，太喜歡悲歎青年對於政治之漠視，對於遊戲或社會的娛樂之迷戀了；太容易紆發懷念古時黃金時代的牢騷，因爲，譬如在舊同盟之下，其風俗係於每隔十年將某某幾州的青年聚攏起來，而向他們宣讀他們所應遵守和他們宣誓尊重而永守無替的憲法和條約；或更遠溯瑞士的古史，當時的風俗是令滿十四歲的男孩子，即入伍，同執長矛和舞鉞斧者爲伙伴了，他們所受的教育，爲古話和英武的傳統。在十九世紀中，民主政治每次的擡頭，對於教育制度，都加上了新的要求，希望它能準備將來的公民，負擔他們前途的更繁重的公民的義務，關於此層，我們在上文業已提過。學校雖曾竭盡心力，向此目的猛進，然而其結果，至今仍不能滿足愛國的批評家。後者，不特對於學校教育表示不滿，就連家庭、報章或政黨，對於訓練公民資格所施之教育，他們又何嘗滿意過。已故的福銳爾(Robert Forrer)十年以前，代表聖加侖充任國會議員時，在一篇尾尾動聽的說詞中，概論這件事情如下：

『凡知道如何訓練它的生長的青年，使其成爲最優秀的國家公民，即成爲對國家充滿真純的愛慕和忠誠，和對祖國具有真正的擁護之公民，他們決心不僅爲他們自己生活，而且要以赤誠和理解，爲全體人民之福

利服務，惟有這樣的國家，纔會生存而有一個光明的將來。」

關於更有效的政治訓練，大家既早已深覺其急需，所以在一九一〇年，纔產生了一種新穎而極其有趣的教育制度，曰公民教育科（*Staatsbürgerkurse*），而且自從那個時候以來，已在瑞士東部，有了顯著的發展。具有這個性質的第一種實驗，是由白賽爾所發起，跟着碧哀羅（*Biel*）和白恩，也都衍行了。獨立民主黨（*Freisinnige*）於一九一三年，在碧哀羅所召集的會議，費了很多的時間，討論關於政治教育的問題，而且該黨從那時起，對於公民教育科，就曾盡力予以贊助。自一九一九年以來，新興的農民黨，也已從事於這個事業。在這個運動之萌芽的時期中，各地方從事於公民教育之團體，除了其領袖們，每年舉行年會一次外，就沒有其他聯絡。然而於一九二四年，因其事業之發展，業已達到了相當的程度，於是一種聯邦的組織，爲不可少了，所以纔成立了瑞士公民教育會。

現時，該會包括二十七個活動的單位，每一單位，在瑞士東部，一個都會或市鎮中，舉辦公民教育。在該區域中之一切較大的城市——沮利克、白賽爾、白恩、聖加侖和呂賽爾——都莫不有公民教育之設施，此外更有二十較小的地方，參加了這個運動，就中有些地方，同鄉村不相上下。各地方的公民教育，都有一領袖主其事，並常有一個委員會，爲其協助。在有些城市中（白恩、堡格道夫（*Burgdorf*）、墨金所（*Murgenthal*）、沮利克），受訓人員，有選舉職員和決定政策之權利。依照其中中央組織之憲法，該會之宗旨在於：

『憑借公民教育科之推廣和統一，以促進政治的教育，使全國的青年，都可成爲愛國的公民；並使其在一切戮力上，奉奉服膺自由之基本原則，和獨立民主黨，對於政治的概念之特殊的標準。』

反對公民教育科者常指上文最後一讀，爲它們實在不過是有利於自由黨和獨立民主黨的宣傳之圓融周到的方法而已之鐵證。實在，更忿忿不平的社會黨，竟斥之爲『愚民政策』(“schemes to stupefy the people”)；更忿忿不平的教士們，乃又斥之爲『異端之淵藪』(“schools for heretics”)。這樣的謾罵，不必說是毫無理由。自然，這個新運動，誠然大率是爲獨立民主黨所提倡，雖在有些城市中（白恩堡格道夫，藍景所 (Jungenthal)），其他中等階級的政黨，也加入合作；但在其他城市中，例如在聖加侖，它是同任何政黨完全不相干的。因爲瑞士人民，憎惡精幹的政治領袖，所以凡欲增加黨員之政黨，不得不憑借委婉的和間接的方法，這也是事實。在公民教育科內所作的演講，大都顯然有利於現政治制度，因此對於維持現政治制度之政黨，是有益的。在另一方面，在一個純粹教育的立場，它們也確有崇高的價值，並且誠如該會的刊物所宣稱，它們是不受黨派或宗教的直接的宣傳所影響的。如我們在前面，業已說過，社會黨和教士黨，在其宣傳的工作上，率皆利用演講，而且該項演講，確有黨派的色彩，雖不居公民教育的名義。

欲判定公民教育之講座，其首要的宗旨，究竟在於教育或黨派，最好先考慮其講員所常討論的題材。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冬季，在沮利克提出了下開各節目：『羅曼斯語的瑞士之晚會』(“Romance Swiss Evening”)由沮利克羅曼德俱德部擔任 (by the Club Romand of Zurich)；『聯邦憲法之修改和民主主義』由沮利克大學佛賴納教授主講 (by Professor Fritz Fleiner)；『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以及護庇利』(“Political and Ordinary Crimes and the Right of Asylum”)由沮利克的辯護士，若勒爾博士主講 (by Dr. Otto Zoller,

Advocate, Zurich) 『商業政策』(“Commercial Politics”) 由聖加侖國議員蒲飛斯特爾博士主講 (by Dr. B. Fister, St. Gallen,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爲勞動階級所設施的工業幸福事業』由斯屈納委爾德之製造家波里氏主講 (by Mr. J. Bally, manufacturer, Schönenwerd) 『農業之現狀及其與現代經濟界之聯繫』由國會議員及布熱荷瑞士農民幹部之科學協理孔里格博士主講 (by Dr. R. König,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and Scientific assistant in the Swiss Peasant secretariat Brugg) 『自由貿易保護政策和世界經濟會議』由沮利克之斯泰滿博士主講 (by Dr. Arthur Steinmann) 『遊戲和政治』由沮利克遊戲雜誌總編輯布其利氏主講 (by Mr. Hans Buchli, editor-in-chief of Sport, Zurich) 『瑞士婦女之公權和義務』由白恩之古如特爾女士主講 (by Miss A. L. Grueter, Bern) 『國防』由白恩之聯邦行政委員會委員斯秋銳爾氏主講 (by Federal Councillor K. Scheurer, Bern) 『橋樑建築及其意義』由沮利克工程師本德勒爾博士主講 (by Dr. L. Bende) 『具有消費者的身分之婦女』由阿勒顯之委仙爾·阿里奧斯夫人主講 (by Mrs. Vischer-Alioth, Arlesheim) 『委池委勒以罪犯和失業工人繁殖的內地之模型』(“Witzwil, an Example of Inner Colonization by Prisoners and Unemployed”) 由委池委勒之理事客勒爾赫勒斯主講 (by Director Kellerhals, Witzwil) 『大城市對於外科免費診療之需要』由沮利克州立醫院院長克拉蒙教授主講 (“What Demands May a Large City Make upon a Surgical Clinic?” by Prof. Paul Clairmont, Chief physician of the Zürich Cantonal Hospital) 『美術

工業和標準化』由沮利克瑞士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札布勒爾氏主講 (By Mr. F. Gubler) 『齒之腐爛和齒的保護』由沮利克之齒科學院之院長斯塔盤尼教授主講 (By Professor Stopyany, director of the Dental Institute, Zurich) 『瑞士通行的服裝』由爾冷巴其之海耳里夫人主講 (By Mrs. J. Heierli, Erlenbach) 『叔伯特演奏夜』(Schubert Evening) 由沮利克之郎吉滿氏主持 (By Mr. K. F. Langemann)。在同一晚間，舉於一個爭執的問題，延請三、四位演講員，從各種立場加以討論，在上舉的節目中，雖不會有過，但它在公民教育科中，也不是不常有的事情。上舉一九二七——二八年之沮利克的節目，在其結束時，對於超過學齡的瑞士男女公民，和凡願洞悉該國特殊制度之外國僑民，親密地籲請加入公民教育科。

我們必須即時聲明，在一切公民教育科中，對於陶情怡性的節目，也頗為重視，否則上文所引的節目，就未免太近於高頭講章而煩冗了。並且，在沮利克的表列中，講演的次數，也非常之多（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有十九個演講），必然因為該城在教育上和在財政上，都有豐富的資源之原故。人口較少的地方，每年冬季，能有六至十次聚會，照例就算很好了。兩三個夜晚，可留作在城中的戲院中表演戲劇或滑稽歌劇之用，或請著名的獨唱者獨唱，和地方的樂隊合奏，或請著名的作家，朗誦他們的作品。用幻燈和活動電影所表演的旅行談 (Travelogues)，是頗受民衆歡迎的，在幾個市鎮，每年冬季的節目中，至少有一次。這種旅行談，雖時常是關於外國的風光，但瑞士之較為寫遠的地方，尤其是苦羅笨敦和提省諾，常為講談的題材，伴以該兩極南的州之服裝的展覽，並歌唱其民間的歌曲以助興，顯然，這都是一般聽衆所樂聞。



除了演講和晚間的娛樂外，每個公民教育科，照例並於日間以低廉的價格舉辦四次或四次以上的遠足會。這些遠足會，或為赴郊外瀏覽風景之性質，但它們更常為歷史的遺跡或建築之巡禮，博物院或美術館之觀光，公共事業，例如郵政局、監獄、煤汽和電汽工廠，或私立的工廠和商店之參觀。每次遠足會，對於所到的地方，都有一位專家伴隨指導，而隨時向會員們作必要的說明；或由各機關的首領，招待導指參觀各處。這種遠足會（*austflüge*），頗為會員們所欣享，而使人民樂於參加公民教育科。最後，主持公民教育科的委員會，慣常舉辦各種節目之慶祝，尤其是八月一日之聯邦節（*Federal Festival*）。在這些舉國同歡的節目中，晚間完全留作音樂、唱歌、獨幕劇、方音詩詞朗誦之用——其壓軸的節目，為跳舞會，以及各種歡樂和美豔』（*und allerlei Lustsings und Schönsps*）照一個節目單上所說。

在公民教育科內，曾用過他種方法，以引起少年之興趣，結果頗好。在沮利克，常從參加者中選拔音樂的人才，組織樂隊，令其於特殊的節目演奏音樂節目。在許多城市中，不時延請人事管理專家，演講關於青年男女選擇職業的問題。青年學生，關於他們自己經濟的問題和關於政治的問題，常向主持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們，請求指導。這種個別的指導，雖加重了各委員之負擔，但因此而有的個人的聯絡，其自身是可樂和有益，並且必然大大地擴充了這個運動之勢力。

然而在公民教育科之主要的對象，即一般青年，看來，其中有些演講，畢竟確實似乎太乾澀了；在一般較為成熟者看來，它們無疑地是很有價值的。但也不應過分重視這一點，因為瑞士的青年，比較美國的青年，老成的多了；

並且，瑞士人不分老幼，都習於並似乎能設法以教育的方法、治政治的問題。他們願安受教的精神和勤奮，而縝密向學的態度，其他民治國家的觀光者，時常以爲深堪敬佩。

在公民教育科中，所舉行的演講，其教育的質量，時常是無以復加的。對於熟習瑞士思想之領袖者，沮利克一九二七——二八年節目表上，主講者之姓名，就足以證明它在這一方面之偉大的價值了。在任何公共利益的領域中之傑出的人物，每年照例必有幾次被邀至舉辦公民教育科的城市中，作公開的講演。爲地方委員會的便利起見，總會每年將凡願在它的蔭庇之下公開演講者之姓名，開單通知各地，以便分別延攬。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其名單包含六十七個姓名，包括聯邦行政委員會的委員，邦議會和國議會的議員，聯邦、州和地方行政各部的首腦、政黨的幹事、工程師、森林學家、航空家、製造家、商人、大學教授、州和城市學校教員、宣教士、醫生、律師、編輯、作家、旅行家、史學家以及婦女參政運動之領袖。一旦發生了任何重大問題的時候，主辦公民教育科的委員會，似乎隨時可邀到該國最大的權威，對該問題加以討論，而毫不感覺困難。有時，聯邦的總統，親自出席在它們的蔭庇之下，發表演講。

在大多數的事例中，公民教育科於講員，是盡義務而不受報酬的。凡由遠道而來者，得受旅費和旅館的費用，有時再加微薄的酬金。在少數的城市中，主管官廳，准許地方委員會使用公共的場所，召集會議，完全豁免租費或僅徵收最低限度的租費，但在其他地方，進必須繳納租費了。然而，很希奇的，乃是有二十幾種公民教育科，包括兩百多個演講，每年聽講者，有幾千民衆，而其所費乃寥寥無幾。例如聖加侖委員會於一九二六——二七年，所提

出的財政報告，顯示該季六個演講之費用，僅共計一百五十元，就中三分之一爲酬金，四分之一爲租費，再四分之一爲廣告費和印刷費，其餘爲活動電影機之租費、通信、郵資和其他雜費。

有時公民教育是公開予民衆而不徵費的。然而較好的辦法，是以售門票的方法，盡量使其自給，而以自動的捐款，抵補偶然的虧欠。賺錢是毫未計及的，因爲它故意使門票的價格非常低廉，以便最貧寒的階級之青年，也不致有向隅之感。例如沮利克之公民教育科，包括十九或二十次演講，其季票，現在僅值一元，從前僅值六角。並以稍微較高的價格發售，每一單獨晚間之門票，普通每張一角。自然，對於同演講相聯的遠足參加者，須另繳費，但後者因鐵路或公共汽車和旅館的價目，有特別的優待，所以也是極其低廉的。不消說，在這樣低廉的價格之下，必須以贊助該項運動者每年的捐款，來抵補其不足之數。然而，這些捐款，常爲數甚微，在其總會的帳簿上所記載的最大的個人捐款，爲十元。三個城市——白恩、碧哀羅和桑恩（Biel, and Thun）——爲鼓勵該運動起見，擔保由市庫予以少許補助。於一九二五年，該總會曾呈請聯邦行政委員會，每年予以一千元之補助費，以爲維持和推廣公民教育科之費用。這個呈文，未蒙批准，其主要的理由爲：（一）聯邦議會曾咨該委員會，以後除非絕對的必要，不得再給任何補助費，和（二）倘使批准該會的請求，將引起其他組織之無數類似的請求。或者，因有人非議該會具有黨派的色彩之事實，亦爲其請求未蒙批准之一原因，雖聯邦行政委員會，在其批覆上並未明言此點。然而，中央政府，確曾頒發補助金，以利其他具有巨大政治勢力的組織之進行。許多贊助公民教育科者之意見，以爲聯邦政府，於一九二五年，拒絕頒給補助金，乃爲該會之幸事。領得這樣的補助之後，該運動，就難倖免被人批評爲政府

政策之應聲蟲了。

公民教育科，直到現在，仍僅限於瑞士的東部。然而這並不是說利用公開的演講之公民教育，在該國的他部，就完全沒有。幾年以前，在日內瓦和羅善(Lausanne)曾發起了一個運動，擬教育學齡以上的青年們，使他們對於黨務發生興趣。這個運動，被放棄了，因為覺得它不及另一個計劃，邀請十六歲以上的青年男子，列席正常的黨務會議，使他們可從觀察學習並熱心擁護黨的正義。自然，在這種會中，當他們未滿二十一歲以前，是沒有投票的權利的；但是因為對他們沒有相當的注意，所以這個運動，也就煙消雲散了。最近對於這件事情的興趣，又曾恢復了舊觀，在西部的各州中，對於過激的政黨之青年，又設施了政治的演講之教育。例如羅善之民主團(The Democratic Circle of Lausanne)，每年冬季延請著名的政治家，舉行講演，這種講演，不特在城內舉行，並在遍物德州其他各地舉行。

這個運動，在該國羅曼斯的區域，不論將有怎樣的發展，不過我們可以確實地說，德文的名稱，公民教育科之法文的譯名，在那裏是不會被採用的。瑞士人用“Etat”一字，是專指聯邦政府而言，這是一個特殊的事實。他們不用此字以指州政府，如同我們在美國，用它指州政府。所以“Staatsbürgerkurse”之名稱，比本文所用的“citizenship courses”之譯名，更為有聲有色；所不幸者，它染着中央集權之濃厚的意味，而中央集權，又是羅曼斯的瑞士所厭惡的。雖在瑞士東部，提倡公民教育科者，絕不一定贊成聯邦政府在每個政治問題上的主張，而且他們的宗旨，也不在培植該項態度，但羅曼斯的瑞士，仍然忌用這種名稱。反之，一旦任何這樣的問題發生時，他們的主

張，大致是分歧的，雖就一般而言，"stato"，這個字和中央集權的政策，在德語的瑞士人中，不致像在法語的瑞士人中，惹起的那樣的仇視。

天主教教士黨(Schweizerische Konservative Volkspartei)對於公民教育科運動之仇視，一半也由於相同的理由。但是，他們對於地方分權之擁護，並未阻止他們利用演講以達到宣傳的目的。然而這些教士們，雖也利用演講，但卻規避『公民教育科』之名義，而稱之為『基督教文化講座』。社會黨之反對公民教育科，是同教士黨異途同歸的——自然，並非它們有集權的傾向，乃因為在大體上，它們是擁護現制的。然而如上面業已指出，社會黨不特隨時利用演講，以徵求新黨員，並且也用培植黨中的領袖人才。所以教士黨和社會黨所設施的教育，其黨派的色彩，都確實更為濃厚。實在，擁護在中等階級蔭庇之下，公民教育科通常所提出的一個理由，是倘使對於這樣的公民教育科，不加以維持和擴充，則全國的青年，不左傾而陷入過激黨，就必右傾而陷入教士黨了。故此有一位熱心擁護公民教育的青年，於一九二七年，曾發怨言說，獨立民主黨(Proisinnige demokratische)之較老的領袖們，漠視全國的青年，任其飄流，而不加以誘掖；而其他較大的政黨，尤其是天主教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對青年之態度，乃適得其反。他再補上一句說，『前者在兒童未出生以前，即已開始了青年的事業』。

公民教育科運動之側重，雖在於演講，但它所出版的極多刊物，也是值得恭維的。就中主要的是在其總會蔭庇之下的，每兩月出版一次的機關報，『公民』(Der Staatsbürger)。它是一種經過嚴正編輯的八面的報紙，爲關於設施公民教育科的各地的消息之總匯，此外更刊載許多有價值的論文，時常是用德文發表的文字，有時也

有法文的文章，討論許多關於社會、教育和政治的問題。在『公民』上發表的更重要的文章，被重印爲小冊子，免費分送，或以極低的價格售出。其中有一部特別有價值的手冊，是關於聯邦憲法的，包含該憲法之全文，附有用簡明的序言和關於現行納稅的法律，以及自一八四八年以來一切創制和複決之總表，全部都有很好的索引以便檢閱。

總之，瑞士公民教育科，對於該國之教育的資源的，確是一種有價值的貢獻。就全體而言，它們似乎對於成人比較對於青年有更大的影響，雖後者是它們的主要對象。誠然，它們乃是廣義的『科』，而不像美國專科學校和大學之狹義的『科』，但它們在兩三年的程序上，確能提供相當的材料，使參加者對於瑞士之政治的制度和其當前的問題，能作大致的涉獵。此外它們更包含許多關於社會、經濟、美術和文藝頗有價值的題材；在全科內，更插入相當的音樂和遊戲的節目，使智力平庸者，不致感覺太單調乏味。在公民教育科內所包含的黨派的程度，同其教育的品質相比較，乃是輕微不足道的，而且即或有也是間接的，導人擁護現制而不致使人有擁護任何政黨的活動。關於這一層的批評，不論有怎樣充分的理由，也可爲教士黨和社會黨之直接黨派的教育活動所抵消了。

所可惜者，因缺乏私人慷慨的捐助，該運動遂不能推廣到德語瑞士之其他各城，不能傳入該國之法語和意語的區域，更不能有三種國語之機關報。現在它似乎在原有地盤中，有了停頓的狀況，每年約有三千正常的參加者，自然，偶然參加者的人數，要大多了。雖然如此，這個運動，在瑞士已經達成的發展，倘使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是不能有的。在大戰以前，德國曾有過同樣的企圖，其結果，出版了許多定期刊物和小冊子。在美國同公民教育科最相

似的企圖，乃是婦女選民同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所主辦。我們當能省記，於一九一二年，美國進步黨曾宣佈過一個教育宣傳的計劃，不僅限於運動選舉的期間，乃是從一屆總統競選到下屆總統競選之四年中，連續推行的教育宣傳。不幸隨着羅斯福的民衆崩潰之後，它也歸於消滅了。然而它究竟能否成功，是可疑的。美國人之對於政治，如同他們從前飲酒的習氣一樣，寧可多日不飲，一飲就必飲的痛快，非至酩酊不止，他們對於政治教育，也是一曝一寒的。公民教育科，在瑞士所達到的非常的成功，根本由於其人民在政治上之永恆的興趣，這在他們是沒有停息之一日的；並且也由於他們超邁其他各國族之深信，即教育乃是解決生活上一切問題之不二法門。

#### 童子軍(Pathfinder)

男童俱樂部 and 各種集團，在瑞士早已有了。於一九一二年，因童子軍的運動，傳入了該國羅曼斯的區域，使在這個領域內之事業，有了新的生機。一年以後，講德語的區，也效法了他們西部的鄰人之榜樣。這兩個運動，於一九一三年十月合併了，結果成立了一個包括全國的瑞士童子軍同盟，其總部設在白恩。它是隸屬於世界童子軍同盟(World Boy Scout League)的，而參加在後者蔭庇之下，每四年所舉行的國際大露營(international "Jamborees")。

瑞士人如同其他業已加入童軍旗幟之下的國家一樣，曾切實遵照創立人巴登·鮑厄爾爵士(Sir Robert Baden-Powell)原來爲英國的男童所擬定的計劃。他的袖珍書『童子軍訓練良好公民之手冊』(Boy Scouts;

A Handbook for the Training of Good Citizens) 被譯成德文，專為該國講德語的區域中之男童之用。在三年內，該譯本之第一版業已銷罄，因應各方面之急需，第二版於一九二六年出世了。一個簡本，名曰瑞士童子軍小冊子 (Swiss Boy Scout Booklet)，也曾享受過普遍的流傳。後者所包含的材料，大致都為各國類似的書籍所共有，且說其中值得注意者，乃是對於吸菸和飲酒之極端的抵制。此外有幾部分，是適應地方需要的，例如關於爬山的規則之簡明的記述，以及瑞士歷史和政治之概況，關於後者之討論，比較在普通小學教科書中，所見者更為簡略。

童子軍運動，自從一九一二——一三年傳入瑞士以來，即在瑞士全國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一九二六年，其參加人數，業已達到六千零二十四人。然而以其全國人口為比例，後面的數字，顯示瑞士人對於這個組織之興趣，尚不及美國人同樣的興趣之四分之一。在另一方面，瑞士童子軍的人數，在比例上倍於意大利，而四倍於法國。同歐洲的小國相比較，瑞士在這方面優於比利時、希臘和蘭和瑞典，但不及丹麥和挪威。相當於我們自己的女童軍之女嚮導的組織，在瑞士人中，也是頗受歡迎的，於一九二六年，它們的人數，達到了一千四百八十六人。這些運動，在瑞士之長足的進展，必然由於該國之風景明媚為露營之理想的環境，並由於在學校中，久已成立的從低級起由全體學生參加有組織的遠足之習慣。瑞士童子軍，並常參觀歷史的遺蹟、博物院和武庫。

在最近幾年中，瑞士已開始被選為組織之夏令世界中心。於一九二二年，由幾個國家的熱心會員之捐輸，在白恩山區之坎德爾斯台荷 (Kandersteg in the Bernese Oberland)，購置並設備了一座國際童軍別墅 (Internation-



ational Scout Chalef) 在一九二五年之夏季，在坎德爾斯台苟，差不多招待過一千作客的童子軍。一年以後，因為該地方之極多優點，曾被選為國際會議之地點，據美國派往參加者之意見，在該運動之歷史上，那是一個最重要的集會。赴會的代表，有一百以上，由三十二個國家所遣派。國際聯盟所遣派的三位代表，在會議中，常提及國聯對於該運動之興趣。會議中重要的決議案，為准許墨西哥加入為會員，並為下屆會議准許德國加入為會員，起草了一個計劃。滿佈暗礁的少數童軍的問題 (the thorny problem of "minority scouts")，意即在梵爾賽條約之後，有許多童子軍必須背棄祖國，而向另一國家的政府宣誓效忠之問題，也曾在會議被提出討論。瑞士政府對於坎德爾斯台苟會議之關注，可證之於招待該會各代表之正式的宴會，在席間，聯邦總統亨利·林本林 (Heinrich Haeblerlin) 曾作動聽的演說，即以該運動對於世界公民的影響為題。

童子軍的組織之在瑞士，如同在他國一樣，常被人指責在兒童富於可塑性的心坎上，深深地種下了愛國的狂熱和黷武的情操。在學校教員們當中，其中有極多是絕對反戰者，對於該組織有某種反對，雖它所重視的自動和品性的發展，是同當今最崇高的教育學理相融合的。在另一方面，許多教員，是該運動之熱心贊助者，並且參加其活動。在後者中，有一位最著名的教師，磨生博士 (Dr. Mousson)，沮利克之教育局長及該州之行政委員，當其它於一九一六年在會議中被人攻擊時，曾為它作熱烈的辯護。以培植狂妄的愛國情操而論，擁護該項組織者，宣稱童子軍，顧名思義，純粹為發展個人的品質，如力量、機敏和自立，所以絕不重視教操者之方法。巴登·鮑厄爾爵士，在為英國的運動所撰的袖珍書上，曾為此點作強有力的申辯，此層在為瑞士所編的袖珍書上，也曾被重述。

關於狂妄的愛國情操之培植，一考童子軍的文獻，就不難明瞭該運動在瑞士可被人非議的地方，實遠不及在英國或美國之甚。上面所提及的簡易袖珍書，爲一位瑞士的作家，賽羅（Ernst Thilo）所編纂，專爲瑞士人所用者，用最高限度的篇幅，描寫戶外的生活，而以最低限度的篇幅，發揮愛國的情操。在上面所提及的歷史和政治之概況外，它所論列的，具有國家主義的性質之唯一題材，乃是効忠祖國之誓詞，佔十四面之愛國的和童軍的歌詞——後者佔其多數——以及佔四面的關於瑞士國旗的淵源之史實。關於國旗的典禮之詳細的指導和向國旗行舉手禮之儀式，都未被列入。該小冊子之歷史的部分，對於和平的藝術之功業和戰爭的藝術之功業，是並重而不分軒輊的，而完全沒有推崇和頌揚瑞士人所曾參加的每項軍務之傾向。特別關於後一點，它和數年前在美國各處通行的一本袖珍書之相當的部分，是迥然不同的，因爲後者的內容，是會受芝加哥市長湯目生（Mayor Thompson of Chicago）之熱烈贊許的。從瑞士的小冊子中所摘錄出來的如下的文句，乃爲其對愛國心之全般的討論之關鍵，由此可見它所宣傳者，絕非偏狹的國家主義：

『爲要向祖國作至高無上的奉獻，我們就必須以全副精力去愛它；這是我們時常更加明瞭的真理，但我們對於將來，也有一個展望：世界各國的人民，總有一天要像全世界的童軍一樣，彼此相親相愛無異弟兄姊妹。』

從瑞士人對於巴登·鮑厄爾爵士的袖珍書之翻譯，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們怎樣修改專爲英國和他處的應用所闡明的童軍的主義，以求適合他們自己的需要。其它各國之大多數的讀者，至少會同意該書之第九章，專

論愛國心者，在字裏行間，是充滿着不列顛帝國的情操的。瑞士的譯者，顯然也看出了這一點；但是爲求信實起見，他將原意毫不脫漏的譯出，然而在該章的頭上，冠以他自己不贊成原文的主張之詳細的說明。他評論道：

「我們絕不應該忘記著者「巴登·鮑厄爾」是以英國的愛國者的身分寫作的，他當然要在他自己的立場，觀察世界及其事情。我們應當承認他有這樣做的權利。同時，我們也有權利，在我們自己的立場，觀察一切狀況、人物和事情。從譯者的國籍，可以知道一切帝國主義的目的都是他所憎惡的。」

跟着一九一四年世界戰爭之爆發，和瑞士大部分的壯丁之動員，擔任防邊的義務，於是該國的童子軍，獲得了機會，以顯證他們的訓練之價值。他們被遣派去擔任許多種類的服務，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充當電報局、銀行、軍事機關和警察局之交通隊，在這些服務上，他們的自行車是很是用的。他們也曾被普遍地雇用在火車站和在鐵道的服務上，擔任較輕的職務。在幾個城市中，他們也相幫送牛奶，於是防止了嚴重缺乏和嬰兒死亡率之頗大的增加。城市中一般嬌生慣養的兒童，下鄉去幫助農家餵養牲畜、刈草、收割莊稼，否則因長工的缺乏，該項莊稼就會爛在田地裏了。一個年齡較長的童子軍團，被派到鄰近莫熱特 (Mont)之大澤地，擔任築路修徑，建築輕便橋樑，並將這些建設，繪在參謀部之地圖上。在這一切事業上，該組織彰顯了爲國家服務之真純的意念；而且對於它的分子之服務的價值，也不能有任何疑問。

秘密互助團在瑞士的歷史始於一七三六年日內瓦地方支部 (local lodge) 之成立。其後不久，有幾個彼此獨立的支部被組織了，但其運動，因為受了法國革命的影響，就停止進行了。在十九世紀的頭上，它又重新組織起來了，而且不久就有了全國的規模。白恩之瑞士總部亞爾卑那 (The Swiss Grand Lodge Alpina) 成立於一八四四年，是同倫敦原有的總部完全獨立的。按照最近可採訪的估計，於一九一八年，在瑞士有三十五個支部，共計會員四千五百人。後者大多來自「有職業的中等階級之優秀分子：商人和製造家、醫生和律師、政府官吏、教員和牧師」。

在瑞士極多社會組織中，沒有一種比秘密互助團是更常遭人批評的。有兩種很激烈的宣傳的小報（一種是以德文刊行的，另一種是用法文刊行的），常以該團為攻擊的對象。在教會方面，仇視它的人，以其神學者特有之爭論上的憎惡 (odimtheologicum) 痛斥之為「可呪詛的異端」、「蹂躪人類的疫癘」——絕頂的侮辱——『撒旦的會堂』(“the Synagoge of Satan”)。他們以為它是「一種圖謀墮滅教會和政府的最惡的陰謀」。在瑞士，如同在他處一樣，政治可產生奇怪的拉攏 (politics makes strange bedfellows)；但是，我們發見為反對秘密互助團起見，共產黨、社會黨和天主教保守黨，居然可同鼻孔出氣，就不由得我們大吃一驚了。在馬克斯的信徒們看來，該團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工具」罷了，為「銀行的資本和交易所之僕婢」而已。

上面的種種形容，雖盡了刻薄和有聲有色的能事，然而究竟類似罵街的口臉，而缺乏確鑿的內容。在瑞士，對於秘密互助團之攻擊見諸文字者，大多屬於這個類型。但是有一位行政法的作家 (L. Jenny)，略舉過具體的事

實。他以爲互助團的團員們，大率是地方上重要的人物相互結合起來，以便操縱政治——州、全國和外國的政治——而爲他們自己的利益，來統治全國一般經濟的生活。他們原是仇視景教徒的（*Jehoids*），但他們不惜盡量採取後者的策略，以致現在爲要滿足他們自己，求富貴榮華之私慾，毫不猶豫地，同其舊日的仇敵攜手。據說該團的團員們，欲推翻真正的聯邦政府而建立一種政治的雜色的組織，一種憲法的民治和非法小組的專擅之卑鄙的混合，直接的民治和祕密的互助的專橫之可恥的混合。他們更被指責，在文武官廳中，互相緣引和提拔，並以他們自己的利益爲準則，操縱立法的規劃。互助團的團員們，特別被人指稱仇視民權之擴充（創制和複決）和比例代表制。

互助團在瑞士，遭受各方面的猜忌和憎惡，乃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實在，尚不足以促成一種獨立的政治運動，有如一世紀以前，我們自己的反互助黨（*Anti-Masonic Party*），但頗足以在各種政治緊急關頭，發生有效的作用。關於該團的團員們，圖謀壟斷立法之宣稱，到底有幾分真實性，不得而知，但其仇敵們，隨時盡量利用這樣的宣稱，以收政治的利益，乃是確實的事實。一九二〇年，關於參加國際聯盟的提案之複決的運動，乃是其顯著的例子。反對該提案之教士們，在各處散佈的一種辯論，乃是關於克雷孟梭（*Clemenceau*）、魯意·佐治（*Lloyd George*）和威爾遜總統，都是著名的互助團員，所以國聯的本身，就必定是一種反對上帝、宗教和教皇的互助團的陰謀！對於個人也施以攻擊，時常在背後，以耳語宣傳某某候選者，是屬於該團的團員，但有時竟公開地加以宣布。有一件惹起各方面評論的事件，是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在關於沮利克市行政委員會補缺的選舉之前

發生的。在這一件事情上，指責互助團者，乃是社會黨和共產黨，他們以從未有過的幾近萬人的大多數將他們的候選人舉出了，並將獨立黨、民主黨、基督徒黨和福音人民黨聯合提出的候選人壓倒了。因為這一次補缺的選舉包含許多其他爭論，自然難於斷定反互助團的攻擊，究竟發生了多少效力。但是互助團，以為這次的攻擊，頗為嚴重，所以在選舉以後，沮利克之支部，竟採取非尋常的，倘使不是空前的手段，提出了正式的抗議。

在瑞士所流行的對於互助團之空泛的謾罵，不過是政黨之招搖的手腕罷了。判以謾罵之來源以及關於在其團中代表多數的階級之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其團員對於獨立民主黨和自由黨，必定有普遍的同情。然而按照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補缺選舉之後，沮利克的支部所發出的忿忿不平的抗議，『社會民主黨，絕不致於不知道該黨的黨員，因為信仰互助團的主義，而也自願加入了』。且說這個佈露，正合共產黨的心意，以為他們對於某些社會黨員所運用的趨炎附勢的策略，抓到了真憑實據。它究竟包含多少真實性，我們姑置不論，但社會民主黨對於盡量隨時利用反互助團的辯論，以攻擊保守的候補者和提案，一定是不會遲疑的。後者同該團之聯絡，在政治上似乎必然是得不償失的。倘使為上文所稱，該團是反對民權的擴充和比例代表制的，但他們在為着各種不同的動機而採取相同的主張之政治的要素中，不過是一個小部分罷了；並且他們對於這些方案之聯合的反對，終久是沒有成功之希望的。

互助團員，再被人指責，因着他們在社會上的著名經濟的勢力和崇高的官職，他們所能運用的神祕的力量，同他極其少的人數相比較，是完全不相稱的。關於這一點，瑞士人的議論是很分歧的。有一位誇人，硬要說該團在

人數和力量上，是在不斷地長進；另一位證人，也硬說它是在不斷地衰敗，而且現在差不多完全沒有勢力了。根據這樣矛盾的見證，頗覺莫衷一是，尤其是關於一個盡量嚴守秘密的組織。瑞士互助團員，玩弄政治的程度，顯然是美國人所夢想不到的。就連擁護該團者，也默認它的團員們，在文武官職之任命和升遷上，是竭力互助的。然而設分祿位的制度，這種操縱，似乎斷難達到普遍或危險的境界。關於互助團員，以其團員的身分，參加立法，借使私圖之傳說，較少聽見或被入信以爲真。因着他們頗爲狹隘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環境，並因着他們在支部內之親密的聯繫，關於公共爭執的問題，他們必然會採取頗爲一致的態度。然而如上文所指陳，他們實在如此做過或僅被人猜疑如此做過之事實，一定會被敵黨喧鬧地利用，結果使他們所得的票數，不能償其所失的票數。在另一方面，在美國有時尚可聽見的怨言，宣稱秘密會社之會員們，在民事或刑事案件中，常受法官之袒護。至於瑞士之互助團員，即或曾受同樣的批評，也是很稀少的。

瑞士的互助團之境遇，所以特別成了衆矢之的的緣故，乃因爲它是孤立的。倘使如同在美國一樣，有五十種其他不同的秘密會社，它就不致被人注視了。而我們所熟知的撮合類型之政客，就會盛極一時了。兼之，該團因爲在瑞士有保守團員姓名的秘密一般的習慣，也吃了不少的虧。在少數事例上，屬於該團之個人，是爲人所知道的。但公然佩掛徽章或勳章是忌諱的。按照公同的報告，一個人是團員直到死後，纔被人知道。當時因他的棺木上，放着一朵白玫瑰花，或因他被暗指爲『我們的去世的弟兄』，人家纔知道他是曾屬過該團之團員。這種秘密，必然大大地促成了旁人對於該團之猜忌。

互助團雖時常受人攻擊，但緘默不答，差不多是他們一成不變的慣例。且說這個態度間，或使人指責該組織之領袖們，太爲矜持而不恤人言。上文業已提過這個緘默政策之例外，曾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沮利克補缺選舉之後，發生了。在這件事情上，他們被迫用四個地方支部之名義，和其首席職員之簽名，發表了一篇宣言。它首稱：

「互助團的支部，乃是一般立於愛國基礎之上而在管理和習慣上，避免任何政黨政治的人們之結合。……其宗旨是在借着其團員之自學，促進人與人間之高貴的情誼，並增進國際的團結之堅實。……兼之，我們堅強的抗議，指責互助團從事於反基督教的態度之謬言。倘使這是一個關於福音的精神之問題，瑞士互助團支部，就曾累次聲明它們對於它之服膺。」

在旁的時候，關於該團之宗旨，它也作過半正式的公開宣言，時常側重它的容忍的、人道的和非黨派的性質。其中有一個宣言，引總部亞爾卑那之規則如下：

「互助團員是坦白而忠誠地愛護其祖國的；瑞士的互助團員，特別承認他的神聖的義務，是在於按照他的能力同大家合作，保持祖國以內的和平，並促進其真正的進步，以及憑借合理的方法和特別中和的言語、寫作和行爲，照樣保持它的自由與獨立。」

「本團承認在祖國內，在各該名義上之政治的差別；我們不願取消、抹煞或毀滅這些差別。在另一方面，我們確實企圖使它們隸屬於忍耐和容讓他人的見解之較高的觀點，於是減少它們中間之衝突。」



我們不能希望像上面那般言論，會轉化在瑞士反對互助團者之堅強的態度。其仇視之根株，是深埋於古老的宗教的紛爭和現代的階級鬭爭之中的，所以徒以冠冕的詞藻，是不能使其動搖的。在一個徹底寬宏大量的民族中，而發見了這樣一種偏狹的見解，是特別耐人尋味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偏見，是輕微的；倘使將它同在美國仇視天主教徒、猶太人、黑人和外國人所表現之偏見相比擬，它就誠然是微乎其微了。反互助團之任何威脅的公然的表現，在瑞士乃是斷斷乎不會有的。對於這個團體之激烈的反感，僅限於知識低弱的分子，而且就連他們，也是溫和的，實在，倘使同十足的美國三K黨黨員（100 per cent American Ku Klux Klansman）相形之下。同有識力的瑞士公民接談，不論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是怎樣懸殊，他們時常總會使你相信，他們絕不致於被間或為政治的作用，借端發生的反對互助團的喧鬧所蒙蔽。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在反動秘密社會的舉動上，有某種民主的邏輯。虛構自己，就曾痛詆『國內之偏私的會社』（partial societies within the state），並加補充說，『倘使果有這樣的會社，最好就多多益善』。整個瑞士民族，確實是服膺這條原則的，不僅在反對互助團，也在嫌忌魄力雄厚的領袖人物，以及仇視大規模的私人企業上，他們都表現了這個信仰。

## 第十一章 語言文學和報章

### 語言

在瑞士人中，常聽見說，他們的國家，是建立在今日盛行全世界的國族觀念之反面的。雖有語言、宗教和地理的隔閡，他們仍然達成了較高的政治的融合，他們必然要引以為榮的。倘使我們想到，在如此其多的國家中，猖獗一時的誇大狂的國家主義（*megalomaniac nationalism*），它對於世界戰爭之血淋淋的結果之關係，因此，由強大民族接連施行的，大小的虐政，以及由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同樣接連喊出的怨聲，我們又怎樣能怪他們竊竊自喜呢？

有不少瑞士人，因被如此威脅的仇怨所激動，憧憬着一種世界的總解決——或者由國際聯盟所產出——基於他們自己的問題之聯邦的解決。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千福年的夢想（*millennial dreams*）（譯者按：這個典故，係指基督教新約聖經啓示錄所載，耶穌基督將再來人間，作王千年使全世界人類共享昇平之樂，烏托邦的玄想（*utopian speculations*）），迥異該國慣常政治思想之穩健，但以他們在剋制民族和語言的分立主義上，所達成的奇妙的成功而論，也並不是完全無稽之談。間或有外國的觀察者，被瑞士的方法所感動，在他國建議它

們的應用。譬如威廉·謝飛爾 (Wilhelm Schäfer)，一位德國的作家，暗示在德、法、意三國之間，有成立一種聯邦的共和國之可能性，仿照講這些國家的語言之民族，在瑞士國內，所成立的聯邦共和國，於是可作成一個偉大的西歐的國家，代表西方的文化，同莫斯科之東方的社會主義相對抗。

對於瑞士的國家，否定現代國家思想之宣稱，應該加以考慮。倘使接受後一名詞之廣泛的界說，那末，這種說法，就是不錯的。比如拿白節士 (J. W. Burgess) 的機警的陳述來說，瑞士人就絕不是『一個住居於地理的統一體之地域的一個民族的統一體之人民』(“a population of an ethnic unity, inhabiting a territory of a geographic unity”)。難以找出第二個地域，是比瑞士國土更爲龐大的自然障礙物所分裂的，其人口，除一小部分外，也不符合在『民族的統一體』下，所列舉的各種測驗，就是『一種共同的語言和文學，一種共同的傳統和歷史，一種共同的風俗，以及一種共同的善惡之意識』。『共同的善惡之意識』，是一個約略模稜兩可的詞句，是以倫理的、法律的或歷史的解釋爲轉移的，大致僅能在局部的意義上，應用於瑞士人民兼之，他們在具有一種共同的風俗上，也是不够资格的；在這一點上，變化多端，乃是他們極其顯著的特性。關於『共同的傳統』，也有相同的情形，它們在各州，是各不相同的。以整個瑞士而言，『共同的歷史』，只從一八一五年以來方纔有的，在瑞士作家中間，每每提出在那個時候以前，可否說有國家的歷史之問題。在舊同盟之下，內戰如此其頻繁，而某某幾州，加入同盟如此其晚——時常是在累次抗戰以後，方始加入的——所以直到今日，在該國公共學校中教授歷史，確實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自然，瑞士人最考不及格的，乃是普通算爲最重要的『一種共同的語言和文學』之

測驗。並且他們在三種文學上，僅有次要的地位，而同時有三種國語，更不必提銳托——羅曼尼克語（Rimeto Romantic）（譯者按：即瑞士東南部所通用的羅曼斯各種方言）和約七十種的方言。

根據國體之另一種定義，其側重點，從統一的原因，轉移到結果的統一之自身，瑞士人就頗够資格了。譬如銳南（M. Ernst Renan）氏，在其一八八〇年之梭明講演（Sorbonne address），以『何謂國家』（Qu'est-ce que l'état nation）為題，稱『使一個人民成爲一個國家者，並非語言和民族之統一，乃是他們大家從祖宗的丰功偉業和榮耀，或其艱難困苦和犧牲所傳下的記憶之情操，以及共同生活於同一國家，而傳遞其遺產於後代之願望』。銳南氏關於國家的定義之前半，是純粹法蘭西的（Gallic）語氣，瑞士人不加保留的條件，是不能接受的，雖他們頗能熟記奧國人、德國人和最近法國人，使他們所遭受的患難和犧牲。在另一方面，關於他們『共同生活於同一國家，而傳遞其遺產於後代之願望』，是毫無疑義的；全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關於這一點有沒有能超過他們的實在，是可以疑感的。

瑞士的作家們，爲他們的人民爭取『國家』之稱號者，常注重統一之觀念，而不問其來源。比如威命曼（Willemann）稱一個國家乃是：

由全體人民結合而成的休戚相關的，而同其他民族分立的團體，這樣的結合或因着共同的承襲和共同的血統，因着使用同一語言，或如瑞士的盟友（Eidgenossen），只因着他們自己甘心隸屬於同一獨立的共和國。

瑞士人，就這樣被圈入其範圍以內了，但須注意，他們是先經附註其特殊的種名，然後歸入國家之科目的（but not, however, it will be observed, without the use of a codicil which classifies them as a distinct species of the genus）

如上文所指陳，在瑞士的統一之成就內的一點，其在他國惹起極大興趣，不必說驚奇者，乃是尅制似乎不能超駕的語言的隔閡，而這種隔閡，一向就存在於該國，而至今仍然是存在的。或者因爲在這一點上，外國的觀察者，對於在他們自己的國內，特別是由於十九世紀內，偏狹而狂熱的國家主義，宣傳之結果，所曾發生的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之不斷的，和有時是暴烈的紛爭，受了太深的刺激。瑞士人因曾逃避了這樣沈痛的經驗，所以對於外人加於他們的頌美，是頗覺受寵若驚的，被他國認爲政治奇蹟者，在他們乃完全等閒視之。在最後的分析上，瑞士人關於這件事情，是太謙讓了。他們決然應該受人推崇，實在並非因爲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有有計劃的和系統的解決，乃是因爲他們肯耐煩作無數微細的實地規則的（rule-of-thumb）調整和讓步，或者最值得旁人稱讚的，乃是因爲他們曾以寬大的善意，從事於這個問題之解決。

然而在他們的歷史上，有幾個有利於他們的努力之條件，但我們提出這一層，並沒有抹煞其成就的意思。第一、這個問題是在十八世紀之末，方始顯露的。到了十九世紀，尤其是於一八〇三年提省諾和物德，加入爲其正式的州，復於一八一五年，有發賴失、紐卡德爾和日內瓦之加入，瑞士然後纔成了具有三種語言的國家。在舊同盟中（一二九一至一七九八年），德語原佔極大的優勢，這並不是說其人口，都講一種統一的語言，乃是說其無數方

言，除了少數例外，都屬於條盾的語系。這個事實之一有趣的例證，是早在一四八六年，由路易十一世所供給的。發見他的瑞士雇傭兵之精銳的隊伍中，參雜有從撒沃依 (Savoie)、加斯科尼 (Gascony)、洛林 (Lorraine) 和他處而來的冒險的兵卒 (soldiers of fortune)，他於是頒布了一個規則，制定其後，應以講德語的能力，為來自瑞士的兵士之測驗，而凡假冒瑞士籍來應徵者，應治以絞罪。

由民主主義和代議政治之擡頭，語言的少數民族，方纔能設作難統治的多數民族。在舊同盟之下，純粹民主的各州，在語言上，是純一的，所以是不被這個問題所紛擾的。在另一方面，幾個較大的貴族政治的州，必須應付其人口中講法語的部分。因為後者，大多是得之於割據的領土之居民，而其政治的權利，也是被剝奪的，所以他們對於應用德語，為政府和法庭之正式的語言，是無法提出有效的抗議的。

然而被征服的各省之羅曼斯居民，似乎並未特別，因為他們的語言，遭受很大的欺負。他們雖曾被其條盾的主子所欺凌，但其欺凌之目的，乃在政治的和經濟的方面，而不在文化方面。在語言的橋頭上，譬如在佛銳堡，雖不時有禁止外國語之企圖，但其勢甚溫和而且十分無效。比如在十四世紀，有一條為市政府所頒布的法令，禁止兒童高喊 (Alaman Contre Roman)，顯證青年黨徒的精神 (the youthful gang spirit)，早已存在了。於一五

八三年，以法語叫賣貨物，是應受罰的，而六年以後，禁止在教堂中的拉丁禱告，和講道之野蠻刺耳的法語音調。當宗教革命發生的時候，瑞士之壓迫和叛亂的囚徒，是不減於他國的，當時即有少數語言的糾紛，也被人忘記了。雙方都難免有狂妄的舉動，但其狂妄的高潮，罕有如在三十年的戰爭中，經一位西班牙的大使所道破者，他

說：『你應該知道一個信奉天主教的非洲人或印第安人，對於你有更親密的關係，而且他比一個信奉邪教的瑞士同胞，在你手中，應該接受更優渥的待遇。』

最後，在瑞士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中央政府之懦弱無能，使大規模的語言糾紛，無由發生。除開法國干涉時期（一七九八至一八一五年），各州具有地方自治之最恣肆的屬性，完全語言的自治，乃是其中之一。在這樣極其渺小的區域內，照例只通行一種語言，講他種語言的少數人民，因為太弱，故不能提出任何有效的問題。兼之，容忍的政策，是被各處實施的，尤其是因為一種強烈的各州獨立主義是佔優勢的，所以對於地方的風俗，總是姑息的，而對於中央的集權，總是反抗的。因為某州的法律，是只以某一種語言印行的，間或有人提出抗議。甚至在這樣的事例中，其動機，並非在於壓迫或為難少數的民族，乃不過因為瑞士人節儉的特性罷了。結果，照例議決，多撥一點經費雇用譯員，以第二種語言刊印法律和告示，然而附有但書，須承認原文為正式的文學。

最後於一八四八年，一個高度的中央集權來臨了，然而並非沒有經過內戰，就輕意來臨的，此種集權的勢力，並於一八七四年，大加擴充了。一八四八年之新聯邦政府，是建立在一個廣大的民主的基礎之上的，一八七四年之修正，將創制和複決，加於其上。瑞士因具有中央集權和民主主義，對於在其他各處所常見的語言糾紛之應付，是綽有餘裕的。然而以地方的方言而論，各州仍保持着從前的自由，於是免除了糾紛之一種可能性。實在有幾州，在聯邦的榜樣之影響之下，將它們的憲法自由化了。一八四七年，籌建憲政之元老們，因其勇猛的和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的風度，曾排除了國民間的仇視之任何危機。在該年所舉行的憲法會議中，關於語言的事件，並無衝突；

所仍須努力者，只在覓取一種能表達一般通行的意見之公式，這是經過對於兩、三個草案，加以討論之後，用下文所引第一百零九條之簡短的文句，所達成的：『瑞士之三種主要的語言，德語、法語和意語；乃爲聯邦之國語。』據威命曼博士說，這條憲法所代表的事實爲：

向日羅曼斯屬地的人民和同盟，最後與較老的各州之德人，在各方面，成了平等的國民了。……曩德昔人，同盟之殘餘的紀念，被一筆勾消了；民治的思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據了建瓴的地位，使三種語言的人民，必須成立一個三種語言的國家，其中沒有一個國民，應被視爲在其他國民之上。

自一八四八年以來，瑞士憲法之第一百零九條，在精神和文學上，是徹底被奉行的。法律及法令之法語和意語之譯文，尤其是聯邦官廳之一切決議案，同德語的譯文，在法律上，有了完全相同的價值。有必要時，甚至連銳托——羅曼尼克語，也被採用。在國會中和在聯邦權力之前，這三種語言，是交相應用的。並且，在選舉上，或在聯邦行政委員之任命，和其他國家行政與司法機關之任命上，務必在三種語言分子之間，竭力保持平衡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中，一種比例代表制，在該國之德語、法語和意語的人民之間，早已自動規劃出來了，其後於一九一九年，纔有根據選民之數學的名額之比例代表的選舉制，應用於國議會之選舉。誠然，有時對於從該國德語部分而來的候補者，得了太多的差事，不免惹起了各方的批評。在另一方面，據說以原則言之，時常是在竭力設法，務使法語和講意語的瑞士人，能設獲得比較他們的人數在全國人口中之比例所應有的差事之百分比，更稍微多一點。這種純潔的公允，爲各種權益的分配所同具，乃是完全可能的。否則，勇於批評的瑞士人，就必定會大發其牢騷了。語言



的仇視，就是應用如上文所述的那樣非常的，但完全簡單的政治的幻術所避免的；誠如一位作家，以略近詩意的措詞所說，『不僅聯邦的語言，就連其腦筋和其靈魂也都三語化了』。

關於如此順利的一個結果，大部分功勞，應該歸之於公共學校中，所施的有效的語言教學，第七章對於這一點，已詳加討論過。因為它的努力，人民中一個很高的百分比，是能講兩種國語的，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階級中，三種國語都能講。這個領域中之非常優良教學的結果，再加某種其他順利的因子的，的確確使一個講德語的瑞士人，在該國之羅曼斯區域旅行中，並不覺得在該處所講的法語，是外國語言，而且掉過來說，也是對的。對於他簡直是一個『第二國語』(Zweite Landessprache)，在聯邦憲法上和他所肄業的學校之課程上，都是這樣稱說的。於是他避免了時常由煩惱之感，而變成的仇恨，比如一個跨過來茵河作旅行的法國人，聽見德語時的情形。

以瑞士人，曾居然避免了關於語言問題之一切嚴重的內政糾紛而言，他們能講三種語言，可以算是一種積極的利益，因為每種語言，是為他們一個強大鄰國所用的。倘使他們據有一種為他們所專有的語言，他們現在對於德國、法國和意國之許多關聯就要斷絕了。惟其如此，所以條盾的各州之瑞士人，可以很便利地同德國之日耳曼人，互通消息，並可對於後者之發展，時時加以密切的注意。同樣，提省諾和西部各州之瑞士人，對於意大利和法蘭西之現狀熟悉的程度，令人不勝佩服。自然在這三種事例中，其國土之渺小，及其對於這三個強大的鄰國，所佔據的中心地位，都會強迫瑞士人，對於後者之行動，加以極其關切的考察。但在此處重要之點，乃是因為他們對於國境以外所講的語言之嫻熟，使他們能作更周到的觀察。

常聽人說，瑞士人是徹底的地方公民，而同時也是優秀的世界公民。自然在這兩者之間，他們也並非其聯邦政府之壞公民，不過，後者比二十五州的祖國資格較淺罷了。必然，瑞士人對於世界公民資格之適當的程度，因着他們在國內所講的語言，是在國外廣被應用之事實，更加提高了。

自然，世界公民資格所帶着的有利益亦有弊害。幾個世紀以來，瑞士人曾大批地移居國外，自然，大多數移居於講他們本地語言之鄰國，直到約在一八四〇年，所開始的海外移民運動。並且，在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回國了，隨身帶回對於外國的留戀和同情。照樣，德國人、法國人和意國人，也更易移入瑞士國內，講他們各該國語的區域。然而同人民進出國境的行動，完全兩樣的，乃是瑞士人同其德國、法國和意國的鄰舍，因着共同的語言之便利，所有的活動的商業的和知識的交換，使外國的勢力，乘機而入，尤其是知識外國化（*Geistige Iherfremdung*），常爲條盾的各州所不滿。

爲抵制由三道通至外國的語言橋樑是促進的知識外國化之威脅起見，一個阻塞的制度，曾被發展，在其結果上，稍遜於用以解決國內語言問題之方法。在該國所有一切的學校內，教員都側重純然文化的聯繫，和必須的政治的忠貞間之區別，這一課題，乃是由該國政治領袖、愛國會社和大多數詩人及小說家等，不惜以焦舌敝唇或連篇累牘，盡性發揮者。

在瑞士東部和中部所講的，爲人民非常鍾愛的條盾的方言，使其地之人民同德國之日耳曼人，迥然有別，也可算是一件希奇的事實。誠如保羅·西普爾（Paul Schipper），他自己是出自羅曼斯血統的，將其中一種方言，即

沮利克之士語所作的壯麗的描寫：

『那是我們的屏障……它是一種表現能與力的語言。其凡繞樑之音，若擂鼓。我們覺得這個語言，有其土地之氣味。它使我們想起山溪急流的喧囂，暴烈的南風，穿過松林之咆哮，山銳公牛之吼聲，戰場的騷嚷，從其中反響着瑞士催戰的喊聲：「Hanses」。我們的盟友們，將它死死地抓住，好像死死地守牢他們最寶貴的財產，因為他們深深地覺悟，這是保護他們的和不可侵犯的開石，使其不致被由北方而來的洪水所淹沒。』

瑞士人是斷乎不以他們的方言為可恥的，關於這一點，我絕不致於言之過甚；反之，他們是以其方言為榮的。為使其永垂不朽起見，正在興工建立一座堂皇濶博的紀念碑，即瑞士方言詞典（Schweizerische Idiotikon），或者是世界上最詳審的方言詞典，完成到T字之八大冊，業已出版了。

在瑞士西部，各種方言久已絕跡了，但其講一種很準確的法語之居民，大部分屬於改良的教會，看不起天主教徒，而同時也看不起法蘭西之無神的法國人。信奉天主教的瑞士人，不論他們所講的是法語或德語，也絕不願意放棄他們在瑞士所享受的廣汎的自治，而去忍受其西方的強鄰所標榜的反教士的政策。

總之，瑞士人，業已一成不變地決定了，由他們自己組成一個政府，講德語的分子，同講法語和意語的分子，三者團團相聯以成一體，而在一世紀以上的共同生活之後，他們至今仍堅定地立志，永遠不變其決心。倘使法語的和意語的瑞士，決心要叛盟，條盾的瑞士，大致尚能撐持一時，但瑞士現在已經是够小了，再加三分之二的分離，終竟必然會被德國吸收而去了。關於這一點法語的和意語的瑞士也是毫不含糊的；倘使它們退盟了，它們也必然

會被法國和意國吸收了。除了稀疏的例外，他們絕不願在一個很集權的國家制度中，僅成爲人家的行省而已，並且是距離國都遙遠的行省。受過教育的講意語或法語的瑞士公民，雖同羅馬或巴黎，保持着活動的知識的關係，但以顯然的誠懇，稱說他們簡直不能設想到他們自己是意大利或法蘭西的公民。

一個瑞士人，不論是講德語、法語或意語的，他動輒會想起同講他的語言之強國聯絡，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在國內，他並不會因它而吃什麼虧。他高興同柏林、巴黎或羅馬所保持的任何文化的關係，也是不會受絲毫干涉的。在另一方面，同法國或意大利之聯合，將一筆鉤銷了他的州所享受的廣汎的地方自治。就連在德國的聯邦制度之下，它所能享受的州權之範圍，也是比較狹小的。在這三個例案中，沒有一個會使它享受任何權利，可以够得上，現在各州所有的在邦議會中之平等的代表權利，或由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所擔保，關於憲法增補案之平等的州的表決權利。

然而對國家之忠貞，比政治的利害之任何快樂主義的（*hedonic*）計算法，是更高尚的事件。瑞士人本能地覺得併入三個強國之後，他們要被吞沒，而完全消滅了。他們知道在現政府之下，他們各自的語言和方言，是十分安全的，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到處是被人容忍和鼓勵的。併入德國、法國或意國之後，在這方面，能有什麼更大的利益？自然，他們重視他們的語言，但不過把它們當作瑞士的地方生活和特性之一部分而已。此外他們也重視全國各地所產生的特別的文學，無數地方的崇奉（*local cult*）傳統和儀式，在政治上，同德國、法國或意國聯合之後，這一切都要受危害了。瑞士人喜歡將他們的國家，比作一座具有二十二個房間的迂迴曲折的舊式的別業

(châlet)，每間屋子，有其顯著的特色，但通統，在同一廣大的和蔭庇的房頂之下。在內心，他們頂樂意共同過活，他們自己的生活，保障並鼓勵彼此的各種特異性。所以在國境之外，所講的語言之相同，或所從事的文化之興趣之相同，對於瑞士家 (Schweizerhaus) 內之舒暢而滿足的家族之團聚，是不能施展多大誘惑能力的。

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乃在瑞士政黨之分野，未被薩尼河 (River Saane) 所隔斷，該河流是該國韋勒志 (Valais) 和德意志 (Deutsch) 區域之界線。與這樣的分野最近似的，乃是瑞士西部，在政治爭端上，贊成地方分權之確鑿的傾向。但是這個傾向之強度，是遜於講德語的中央各州之擁護地方分權之傾向的，但該處之動機，是宗教的而非語言的。

在一八七四年，當其聯邦的創制和複決，被提出的時候，關於講德語的人口，以其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或者會慣常應用這些制度，在投票上，壓倒講法語的少數，曾有人表示過不安的預測。關於這一層的恐懼，現在雖較少表現，但爲羅曼斯瑞士之「知識的和道德的安全」問題之討論，不時尚可聽見。它們使人想起，關於婦女參政所表示的惶懼，惟恐婦女一旦獲得了選舉權之後，就會聯合起來，組織她們自己的政黨，反抗男子，圖謀將男女間之仇視，推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必然，瑞士人並未在言語的基礎上，決定創制和複決的問題。自然，在一八四八年以來，八九十年中間，中央集權有了一點進步，然而同其他聯邦制度，尤其我們自己的相比較，是慢的多了。在瑞士如同在他處一般，在這個運動後面之原動力，在實質上是經濟的，而並非在講德語的分子方面，想攬政權之慾望。特別以聯邦的複決而論，它是累被應用，以消滅中央集權之有希望的規劃的，人民自己，比較他們所選舉的國會議

員，表示更不願意贊成中央集權。即使復決的結果，是肯定的決議，德語瑞士人，也歷次顯證願意考慮羅曼斯區域之輿論。特別是後述的區域，願意將各項條約提交復決和瑞士須加入國際聯盟，這兩種願望都達到了目的，雖西部比東部佔更大的多數。甚至在次要的事件上，例如至今（一九三〇年）尚未解決的關於外國的勳章之創制，許多講德語的公民，在未投票之前，對於他們的韋勒志（*Wille*）同胞之面子，願加考慮。

在統計上和在政治上，瑞士之語言的平衡，都被保持了顯著的平穩。第八表顯示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二〇年之各期中，每個主要集團之人數和百分比。

第八表 瑞士人口依照其國語之分類統計

國	一八八〇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二〇年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數	百分比
德語	二,〇三〇,七九二	七一·三	二,五九四,一八六	六九·〇	二,七五〇,六二二	七〇·九
法語	六〇八,〇〇七	二一·四	七九三,二六四	二一·二	八二四,三二〇	二一·二
意語	一六一,九二三	五·七	三〇二,五七八	八·一	二三八,五四四	六·二
鏡托	三八,七〇五	一·四	四〇,二三四	一·一	四二,九四〇	一·一
羅曼尼克語						
其他	六,六七五	〇·二	二二,〇三一	〇·六	二二,八九四	〇·六
總計	二,八四六,一〇二	一〇〇·〇	三,七五三,一九三	一〇〇·〇	三,八八〇,三二一	一〇〇·〇

注意在第八表所包括的四十年中所發生的唯一巨大的差異，是講意語如其國語的人口之增加，在一九一

○年達到了八·一百分比之最高限度了。這個特別的發展，是由於從南方移入的大批勞工。在世界戰爭中，瑞士國失掉了它的外國人口之一大部分，因軍事的緊張，各該國雖將其壯丁召回從軍。其結果，對於意大利人會使其一九二〇年之百分比，僅稍微超過一八八〇年之百分比。除開這一個參差，每個語言集團，在上表所記錄的各時期中，都顯示了一個絕對的增加，而將該四十年首尾上各集團的百分比，各自比較其差異，沒有超過千分之五以上者。

在顯示瑞士語言問題之顯然如此完全的解決之後，令人躊躇，應否討論於一九一四年在德意志和韋勒志的區域間，幾乎要發生的嚴重的裂痕。顯然在那個日期以前，瑞士人太過信了他們的堅實性。在另一方面，在旁觀者的立場，似乎他們以一個小國的慣常政治的謹慎，不必說是膽小，確實將危機看得太大了，正如我們在當時，爲着尤其渺小的理由，突然將我們對於美國大熔罐之意氣洋洋的信任，失掉了。時局之威脅，並非在於國內的仇視自身之事實。在瑞士，後者時常是不缺少的；實在，有時在二十二州中，每州都似乎都歡喜朝着不同的途徑進行。兼之，在追求某種共同的目的上，各州可組成四、五個集團，其分合變幻之無常，令人目炫神迷。對於這樣的紛歧，沒有人表示驚恐，以爲它們是一個聯邦制度之家常便飯。在一九一四年，瑞士人所特別引以爲可憂者，乃是該國將以薩尼河爲界，忽然裂成迥然不同的兩半，每一半，大致對其強大的鄰國和世界戰爭中之語言的兄弟，要表深厚的同情，彼此以危險地親法或親德之罪名，互相攻擊。

在一個世紀之三分之二的時間之後，在那個時間中，整部語言的問題，似乎已經按照各人的滿意完全解決

了，瑞士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反面的證明，當然要覺得呆然若失了。在由此所發生的喧囂的爭辯中，夾雜着不少與羅曼斯區域中之發言的代表，決然佔了優勢。是否由於語言的相同，姑置不問，至少，他們所採取的主張，乃是一切瑞士人所應該有的正常的主張，就是贊助大戰中之更民主的勢力。並且，他們能殼指出比利時的命運，一定會落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倘使德國決定要用它爲其公路。這是一個不中肯的借口；但無疑的，尤其是講德語的瑞士人，被從德帝國陸軍印刷所，忽然如雪片飛來的宣傳品，深深地迷惑住了，雖然他們已經世世代代慣於同萊茵河彼岸之德國人，結爲知識之交。當時誠如史匹特勒（Spitteler），向他們所提出的警告，「從德國而來的成千成萬的知識潮流，它們天天好像恩澤廣破的尼羅河（River Nile），有效地淹沒了我們的山谷，但其河流非經瀘清是不適口的。」

語言的紛歧，雖常被指爲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瑞士的誤會之根源，然而，倘使不同時列舉其他助成的要素，就不能見其全貌了。在東部和西部之間，有血統的、傳統和歷史的、宗教的信仰、經濟的利益等等差異，而以這一切差異之中，產生了社會心理之很顯著的分歧。在薩尼河的一面，有客爾文（Zwingli）的信徒，而在另一面有薩文黎（Zwingli）的信徒，誠然兩者，都是新教徒，但不論如何，不是同樣的新教徒。在西部瑞士人的血管中，尚湧着法國革命之大部分的熱潮，雖在那裏，時常聽見他們宣稱盧梭的正統，只存於他們中間——據他們說的「回到自然去」（“Back to Nature”），乃是「耕種田地」的意思。在另一方面，講德語的瑞士人，是直言無隱的，唯實主義者（realists），言語遲鈍，恨惡一切做作，各人在其自己的行業內，對於最麻煩的工作，是恆久不懈的，喜歡秩序和



紀律。所以對於現存的權力，差不多是太尊敬了。

在這樣紛歧的經歷和脾氣的人民之間，誤會必定是要常常發生的，即或他們講同一的語言，誤會，仍然是不能免的。然而，誠如兩造在心平氣和的時候，自然的流露，更活潑而富於想像力的西部瑞士人之品質，對於較為魯鈍的（Grison）和唯實的東部瑞士人之品質，成了一種絕妙的補充，而且兩者配合起來，在知識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比較各自分立，豐富的多了，這也是同樣不可抹煞的事實。這好比一樁並非沒有偶然的爭吵之婚姻，但畢竟因為這些爭吵，就更加快樂和更加繁榮了。

然而一九一四年所危懼的分裂，畢竟是證明瑞士統一的原則之一個例外。一個經過盡善盡美的準備之公民資格，雖定然會對於其國家門口之戰爭，處之泰然，而在其對祖國之忠貞上，不致發生絲毫的動搖，在另一方面，相互的諒解與合作，在各區域間恢復的敏速，足以顯證瑞士人民之實質的堅實。在極其緊張的關頭，根據通常一般人的言談和信仰，都以爲倘使必須宣戰，全國必取一致的行動。動員是以可驚的順利和迅速所達成的，而且在整整四個年頭之中，對於防守邊境的重荷之負擔，是絕少怨言的。不意從講德語的瑞士而來的兵隊，在羅曼斯區域中，曾受極其熱烈的歡迎和款待，反之亦然。在戰爭，結束若干年之後，在各方面尚可聽見如此成立的友誼，和講意語、法語和德語的瑞士人，彼此所發生的新的和更完全的諒解之最愉快的回憶。

同時政府的官憲、愛國的會社、文人和報章、教師和傳福音的教士，曾竭盡心力，在德意志和威勒志之間，培植諒解，務使其不致各走極端，而現裂痕。我們所得的印象，是對於外國表同情，鬧得最烏煙瘴氣的，大致是一知半解

的知識分子，在他們中間，滲雜着一些新舊教會的教士、農民、工匠和小商人之堅實的團體，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是瑞士人。在另一方面，該國之真正知識領袖，對於國家的團結之恢復，曾絞盡腦漿，耗盡心血。

這整個事件之總結，是瑞士人雖有語言及其他紛歧，但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居然能毅維持他們長久尊崇的中立原則。雖經意大利加入戰爭之後，他們的國家，成了一個渺小的和平之被包的領土（a little enclave of peace），各方面，完全被交戰的強鄰所包圍了。我們對於世界戰爭中之中立，雖可有不同的判斷，但對於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保持中立所必須有的統一之精神、決心和犧牲，是不能有疑問的。戰爭停止了十年以後，講德語、法語和意語的瑞士人之相互的信任和諒解，是同從前一樣完全的，或者因為它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所遭受嚴肅的考驗，甚至更加完全了。但願他們仍用席勒爾（*Schiller*）的詩句說，因為該項詩句，比任何其他文字，更能表達他們統一的精神，不問那個統一，是否被認為有國家的性質：

Wir wollen sein ein einzig Volk von Brüdern,

In keiner Not uns trennen und Gefahr.

我們要成爲如手足的團結爲一體的國民，

任何艱辛和危險都不能使我們分離。

## 文學

瑞士，在文學上如同在語言上一樣，是一個單位，獨立的和自抑的（self-contained），但包含三個部分，每一部分，屬於超出該國的疆土一個較大的文化。但是，這些部分，以其本體或以其為較大的整體之分子而論，都斷乎不是不足輕重的。反之，在有幾個時期中，瑞士的創造（Helvetie origin）之衝動，曾大大地轉變，其鄰近的大國中，文藝的江河之主流。比如在十八世紀，曾有一個時候，沮利克之波德梅（Bolmer）和布銳挺結（Breitinger）曾執德國文學之牛耳。稍後，日內瓦的盧梭（Genevise Rousseau），在法國思想上之影響，並未讓波、布兩氏專美於前，因為盧氏誠能『極其充分地和莊嚴地表現瑞士之天才』。單獨考慮該國之文藝作品，誠如一位最近的評註者所云，『在目前，沒有一個德國的省分和法國的省分，能比瑞士曾在文字上、色彩上和形態上，曾經創造過，或現在正在創造如此其多的國家的文化』。

瑞士文學之三分部，每一分部，在其國外，有一個知識的首都，誠為該國的統一之隱憂。然而這個困難，是以在文化的聯繫和政治的忠貞間，所作成的斬釘截鐵的區別，來應付的，並且也大部分被剋制了。甚至在小學之高級，但在中學內尤其認真，教師們，慣於將這個區別，深深地印在他們的學生之心上。並且，在下文，我們將要提到，瑞士最偉大的現代作家們，曾竭盡心力堅持這一點。

兼之，以純然文學的事件而論，在瑞士作家的作品及其在德、法、意等國，同道的作品之間，易於指出顯著的差異。前者同德國的著作之區別，特別是在於以在北部和東部，各州中所通行的許多條方言所寫的廣大的作品。它同三大鄰國的文學之區別，都在於反映地方風俗和傳統之趨向，因為這個趨向，在瑞士作家中間，遠勝在任何

僅爲行省的社友們中——這就是他們自己常說的『呼出本鄉的氣味』(‘to exhale the odor of the nati-  
vity’)。因爲這個獨特的性質，所以該國之山嶺的背景，就難免不成了其大部分散文和詩歌之顯明的背景了。最  
後，瑞士的作家們，對於國家和一切關於政治的事情，比德國、法國和意國的作家們，更喜歡採取一個確定的態度。  
自然，自己既然是瑞士人，而對於瑞士的生活有極大的關切，該國的文人們，倘使不敘述其國人在政治上之  
特有的興趣，又怎能保持其本色，而忠實地描寫其同胞呢？因爲這個特性的結果，文學在公共生活上之影響，在瑞  
士比較在任何其他國家，大率更爲直接而有力。無疑它對於公民教育之貢獻，是更偉大的，在各級學校中，對於本  
國作家之重視，使其貢獻更加遠大了。

瑞士文學史，明白敘述該國之較大的詩人和小說家，是爲離心的和向心的兩種反對的勢力所支配的。在一  
方面，有在德國、法國和意國之較大的國家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之誘惑，或者，在於最有天才者，有對世界文學界  
突露頭角之野心。這條路，更爲困難，但是，假使成功，可有更大的美名，自然又可有更多的版稅。以瑞士僑居外國的  
作家之人數而論，可見法國之文藝的魅力，比德國相對的強，或者因爲前者之知識的生活，集中於巴黎之故。

在另一方面，一切瑞士的作家，不論大小，都受了強力的吸引，以從事於他們四週圍的地方生活之描寫。有極  
多作家，將他們自己貢獻于方言的寫作，或在一個單獨的州或該國之一個區域中的農民和鄉村狀況之述敘。這  
種文藝的活動，除了在一個極其渺小的地方上之顯揚外，在名譽方面，尤其是在金錢方面，僅有很微薄的報酬，雖  
有時一部地方的小說，比如 J. O. Heer's *König der Berolina*，碰遇投了德國一般讀者之愛好，而達到了近似

美國銷售最廣的書籍 (Welt und Lebens) 之成功。然而不管名譽和金錢上的報酬，怎樣微薄，瑞士地方文學之作品，仍然不見衰減；易言之，在上文所指兩種勢力中，求心力 (centripetal) 是強於遠心力 (centrifugal) 的。關於這一點特別值得記錄的，乃是不僅次等的作家，就連第一流作家，在國外為極多讀者所欽佩的作家，例如愛德華·儒德 (Edouard Rod) 或卡爾·史匹特勒 (Carl Spitteler)，都將他們大部分時間，貢獻于地方瑞士的實況 (local Swiss scene) 之描寫。

在一切文藝的領域中，瑞士的方言小說和詩歌，必然是最狹隘的。在格特弗銳·客勒 (Gottfried Keller) 和邁爾 (O. F. Meyer) 的影響之下，在十九世紀之第二半，它是略被放棄的，但自本世紀以來，它不特恢復從前的盛況，而又過之了。下面關於按照所代表的特別區域，較為著名的最近作家之簡表，可約略顯證這分田地，在德語的瑞士中，被人辛勤耕種的狀況：弗銳 (A. Frey)、阿爾各 (Aargau)、布熱盾斯泰 (J. Breitenstein) 和蒲盧斯 (M. Plüss)、白賽爾 (Basel)，前者代表白賽爾市，後者代表白賽爾鄉 (Stadt and Land respectively)，它費爾 (R. v. Tavel)、依西爾·布仁苟德 (R. Ischer-Bringold) 和葛雷爾詩 (O. v. Greyerz)、白恩 (Bern)、廉乃特 (M. Lienert)、愛因賽得能 (Einsiedeln)、魯詩禮 (C. A. Loosli) 和格弗勒爾斯 (S. Gfellers)、恩門托 (Emmental)、斯崔弗 (C. Streiff)、古乃熱斯 (Tarais)、羅士 (J. Roos) 和拉基里 (O. Nägeli)、呂賽爾 (Luzern)。按羅色恩 (Solothurn) 在方言作品上可稱巨擘，代表它的是該項藝術之大師來因赫德 (J. Reinhardt) 的前輩，威斯 (B. Wyss)、喜勒德 (J. Schild) 和賀弗斯塔特爾 (J. Hofstätter)。甚至有一兩個作家，企圖寫歷史小說，恢

復地方語言之古老的形勢，可見此種作品之猛進了。顯然，上述性質之作品，只能引誘很有限的讀者，但其引誘的能力，被其所用的家常的媒介，大加強化了。一位著名的批評家，曾評論一本非常優異的方言作品說，它堅強了人民在其自身上的信仰。無疑，在它們當中，有許多應得相同的稱美；但看見他們自己，在其中被描寫的人民，究竟不是瑞士全國的人民，不過是該國某一個小角落裏的獨特的人民罷了。

不用方言，但在一個單獨的區域或州中，為他們的作品，覓取背景之作家的人數，也是可驚地繁多。比如邁爾的偉大歷史小部之一的背景，就是在苦羅笨敦 (Hautbünden) 內。最近司普熱喬 (J. A. v. Sprecher) 雪勒委亞·安陸亞 (Sylvia Andrea) 茶格·薩那池 (Truog-Saluz) 和赫爾斯 (J. C. Hers) 曾在相同的田地中耕種，最後一人所受民衆之歡迎，是超過其作品之價值的。具有優越價值者，為吉結里乃爾 (J. Jegerlehner) 善命 (E. Zahn) 和威勒爾 (E. Wyler) 對於發賴失 (Valais) 提省諾 (Ticino) 和古老熱斯 (Glarus) 的生活之各各的描寫。

在講法語的瑞士內，因其地方言之漸歸消滅，所以沒有機會以它們為文藝媒介之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非常富於地方小說、戲劇和詩詞。譬如，儒德之說部，其中大部分背景是放在物德州 (anton Vaud) 中的，都是細密刻畫之傑作，為法國及羅曼斯瑞士的廣大民衆所欣賞。在散文和詩歌上，紐卡德爾 (Nouchâtel) 曾因一羣顯耀的最近的作家而聞名，就中有康布 (L. Combe) 葛德特 (P. Godet) 波熱爾·吉拉德 (Borel-Girard) 紐好時 (L. Nohains) 彭銳 (J. de Pury) 客乃米 (M. Calame)；在這兩種文體上發賴失是因柯爾向 (L. Cour-

Thion) 苦熱斯 (J. Troaz) 以及柏拉特·蒲若文斯 (Barnal-Provins) 而聞名的；物德是因西銳所勒 (A. Cècè-zio) 而聞名的；而白恩的法律 (Bernase Jura) 是因熱賽爾 (V. Rossell) 而聞名的。

上面列舉的地方作家，大多以生活而不以政治爲其主要的題材，但因政治是瑞士生活之一極其普遍的要素，所以它很難逃得出，至少偶然的提及。有時可發見這些要素的數量顛倒了，譬如在勃銳特 (J. P. Porret) 的小說『梯子』(L'escalier) 中，它之所以得名，是因爲對於過激的煽動者所施予的嚴厲的矯正。並且，這個集團中代表的區域和作家，有一部分是熱烈信奉天主教的，這個事實在他的作品中，時常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大概是不致被批評家和教科書的編纂者所忽視的，因爲他們文藝的判斷，是略被神學的偏見所扭歪的。依照銳諾德 (M. Genzague de Reynold) 之觀察，瑞士的天主教徒，在其有勢力的評論報『新與舊』(Nova et Vetera) 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文藝復興的工作，而新教徒的靈感，似乎已經竭絕了。

同上述性質相近的作品，有時，其實是同它們聯在一起的，乃是極多關於農民生活或高山環境之書籍，在瑞士作家，並非不自然地達到非常的顯耀。格賽勒佛 (Jeremias Gotthelf) 生於一七九七年，死於一八五四年，在十九世紀之第一半中，以其對於恩門托農村生活之清晰的描寫，成了前一領域之領袖，直到現在，在德語瑞士各處，仍享着絕頂的盛名。格賽勒佛未違逆其國民的特性，在他的時代之白恩的政治中，有深沈的興趣和相當的活動。他以鄉間牧師的身分，曾洞悉其需要，並在教堂中，和在寫字檯上，不住地普遍宣講優良的學校和穩健的改良之必要；但在另一方面，他動輒以不分皂白的盛怒攻擊他所謂『泥濘的過激主義』(sloppy radicalism)之

表現。自從格賽勒佛的時代以來，瑞士農民在鄉村、田中和高山牧場上之生活，曾有過許多描寫者。在這個性質之現代作家中，摩西林 (F. Moeschlin) 之於德語的瑞士，和芮瑪斯 (C. F. Ramuz) 和莫熱克斯 (R. Morax) 之於羅曼斯瑞士，都是已登龍門的作家，最後一人之成名，由於在沃都依斯·求拉 (Vaudois Jura) 之中心，他自己的小劇場所出演有高度創造性之戲劇。

一個瑞士作家，所寫的第一首頌揚該國之山嶺背景之文學的讚美詩 (Literary hymn) 是於一七二九年出自何勒爾 (A. v. Haller) 之手筆的『亞爾彭』 ("Die Alpen")。一百多年以後，邁爾 (C. F. Meyer) 寵榮了冰河、巉崖及雪峰之崇高的亞爾卑斯山的世界，在其中發見了他的實質的祖國。在這一點，他和他的同時的偉大作家客勒 (Gottfried Keller) 是迥然不同的，因為後者的瑞士之本質，並非其山川平原等自然的形勢，乃是瑞士人民自己——他們的歷史、他們的制度、他們日常的生活、他們自足的民主精神 (their self-reliant democratic spirit)。邁爾死後，亞爾卑斯山的主旨 (Alpine motif) 直到一八九三年，是較少被側重的，當時善倫 (J Ernst Zahn) 之『奮鬥』 (Kämpfe)，如雪敢亭尼 (Segantini)，在其無與倫比的畫圖中之所為，在高山環境和高山居民間，發展深沈而親密的融合，遂使這個主旨，有了新的活力。除善倫以外，亞爾卑斯山的題材，曾為幾位有名的現代作家，重新地採用和適當地處理，其中有廉乃特 (M. Lienert)、巴斯赫特 (J. Bossart)、阿德馬特 (H. Olermolt) 以及吉結里乃爾 (J. Jegenleher)。

瑞士的批評家，時常而熱烈抗議他認為方言、地方、農民和山地的題材之陳腐的老套。當其海銳其，肥德兒



(Heinrich Federer) 在瑞士的中立之不可抗不卑的戰時的辯護內，故意將這種空氣轉移到崇高的天庭時，使批評家們覺得非常可氣。他們勸勉青年作家們，試探一個較為廣大的活動領域，而發展一個在一單獨的山谷之狹窄的界線內，所不能發見的較為廣大的哲學。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牛棚的臭氣，乃是瑞士一種特有的氣味。有時雖為臭氣熏人，但它仍可使人記起日間的滋養料和田地的肥料，而且必然是無可恥的或須灑以香水。並且，瑞士地方生活，是如此千殊萬異的，甚至對於一個小州內的生活之精通，也不是輕易的成就。據說美國的作家們，所懷抱的大志是撰著『美國唯一偉大的小說』(The Great American Novel)——想到我們國民生活漸趨一致的情形，確實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成就。在瑞士人中，這件事情，從未被人道及，簡直就因為它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雖沒有寫作瑞士唯一偉大小說之野心，但可以無數優美地方速寫來安慰自己，因為這每一個速寫，都是以光明和同情煊染着地方舞臺的。

希望讀者會原諒冗長的名單，和一些重複，因為我們經過考慮之後，覺得必須討論瑞士作品之上述的特性，雖它們是純粹文藝的特性。方言的作品或敘述特殊區域，農民生活及高山環境的作品，雖很少包含一大堆政治的事情，但是，它們在間接地形成公民生活之心理的背景上，是具有深遠潛力的。它們一律側重地方的精神，使它在業已熟悉它於日常生活的接觸之人民的心目上，有新的明晰的輪廓和鮮明的色彩，無限地加深了他們對於較狹小州的反比廣大聯邦的家鄉之愛戀，於是，增強了他們擁護地方權利之思想習慣。自然，這個局勢有兩方面。在信仰中央集權者的立場，在其中有很少可樂的原因。就連在揭示廣大政治見地之文學作品上，例如威勒爾

(Eugen Wylar)之“*Tamara*”，仍有一個明晰的動向，要逐漸導人和以州的經驗與忠貞爲聯邦的思想之基礎。——自然，這是同瑞士生活之實際絕對不能分離的。然而，瑞士文學上如此普遍反映的地方權利主義之信徒們，並非不理會它的可笑的誇張有變爲小氣的、自私的精神之可能性，就是在政治上常被他人嘲笑的偏僻地方主義 (Kantonlergeist)。

爲避免太重視了瑞士文學之地方化的影響起見，我們應該聲明在廣大的領域內，也有不少作品。已經列舉的小說家和講故事者中，有許多人絕對是不受方言和地方作品之拘束的；此外，並有，列享盛名的現代的或最近的小說家：白諾依黎 (K. A. Bernoulli)；巴斯赫特 (J. Poshart)；蔡斯 (R. de Trey)；費德銳 (H. Federer)；赫井白結 (A. Hugenhörner)；寇斯 (P. Eg. H. Kurz)；馬提 (F. Marti)；斯卡夫能 (J. Schaffner)；司提分 (A. Steffen)；沃荷特林 (A. Vögelin)；瓦直斯台特爾 (R. Waldstetter)；瓦斯兒 (R. Walser)；韋斯兒 (M. Waser)；以及文吉兒 (L. Wenger)。人數只亞於小說家者，爲抒情詩人 (Lyrical Poets)；屬於上一代者，有弗銳 (A. Frey)；凱撒 (J. Kaiser)；劉所德 (H. Lenthold)；以及席米德 (F. Schmid)；比較新近的有班寧結 (K. Bänninger)；耳馬挺結 (E. Brämtinger)；飛西 (R. Faesi)；解林結 (M. Jeillingner)；赫特布潤能 (H. Hiltbrunner)；郎吉 (S. Lang)；馬提 (E. Marti)；普費爾 (M. Pulver)；以及司坦 (K. Stamm)。代表批評的有葛德特 (P. Godet)；西普耳 (P. Zepplod)；發賴特 (G. Valtette)；和一大羣較不著名的作家，以及小品欄記者 (feuilletonists)。歷史的著作，在瑞士時常是受廣大欣賞的。柏克赫特 (J. Burckhardt) 之文藝復興研究之傑作，是在

各處被人閱讀的，在國史的領域內，在較爲新近的作家中，其著作不僅聞名於地方者，可列舉其名如下：奧其可里（W. Oechsl）、戴若兒（J. Diemerer）、但里克（K. Dändliker）、格勒底（Gagler）、邁爾（K. Meyer）、傅友德（E. Fueter）、寇爾提（Th. Curti）、波爾交德（G. Borgental）以及馬丁（W. Martin）。

在另一方面，在戲劇上沒有瑞士人曾享過最大的盛名。在其新近詩人中，被人尊爲最大詩人之魏德曼（V. Widmann）曾著過幾本戲劇，研修至精的外形和微妙的思想，乃其特色，但缺乏氣魄。日前在民衆露天劇場（popular open-air theatre）上，有了顯著的成績，在這個領域之著名的作家，奧特（A. Ott）他的長處，乃魏德曼之短處，而魏氏之長處，又是他的短處。在瑞士和英美文學之間，迥然不同之點，莫過於前者，差不多完全放棄了傳記。尤其是我們的大衆，對於英雄之崇拜和領袖之崇奉，是不可救藥地上了癮的，不知飽足地匍匐吞嚥，這種性質的作品，如銷路最好的小說一樣，似乎很少顧及它們的好壞，或者，其實歡喜壞的，倘使它們包含着投合低級嗜好之內容，而公言以心理分析的手術，處理其書中不幸的人物。瑞士人將民主主義的觀念，擴大到猜忌和仇視偉大人物之極端，而自屬於弗魯之尼古拉（Nicholas von der Flue）以來，就未曾有過英雄，他們在另一方面，顯然完全失掉了閱讀，其後較小人物的傳記之胃口。

瑞士文學作品，雖相對地放棄了戲劇和傳記，但以其全體而言，尤其是想到該國人口之少，實在是異常豐富的。統計顯明每年出版的作品，約計一千九百種，此外，並有非常繁多的討論各種不可思議的題材之小冊子，是在川流不息的印行和分送之中的。城市中到處都是書店，而且顧客常是盈門的。按照最近的估計，每年輸入的書籍，

雖不若戰前之多，但仍達到八百五十萬冊之數，自然其中多數係來自德國和法國。瑞士輸出的書籍，每年約自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冊，在經濟的立場，是一個頗爲不利的人超，不論我們將以它是怎樣稀有的知識的現象。這個畸情之大部分，無疑是由於巴黎、柏林和來比錫（Leipzig）等大城之較大的印刷的便利，但它也略反映瑞士人對於其強鄰之頗近於行省的態度。最後這一點，在國內常是怨言之題材的，並常有人確說本國的作家，倘使沒有受過外國的批評家和讀者之稱讚，在國內就不會被人瞅睬了。在另一方面，像在瑞士國內所生產那樣富於地方色彩之書籍，在外國是很難覓取市場的。但是，照例德國、法國和意國之讀書的民衆，對於瑞士的天才和普通的興趣之承認，斷然是遲緩的。

一位有名的批評家，最近對於這個事實，曾從新指出，就是德語瑞士的詩人，比較萊茵河彼岸之歌者，對於國家有更深的關切。在後者至高無上的穹蒼內，顧不到凡俗政治的事實。在另一方面，瑞士詩人，對於國家常有一種見解，誠然不一定是擁護國家的主張，但卽或是中立的或反對的，也必定會明白揭示的。在該國所出產的一切文人中，格特弗銳德·客勒（Gottfried Keller）（一八一九至九〇年），必定是最富於政治思想者。在一種意義上，誠如史匹特勒（Spitteler）對於他的評語，就是他「先是一個公民，然後纔是一個詩人」；但是，他的文學的天才之偉大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史匹特勒之評語，是不可盡信，因爲他自己先是一個詩人，然後纔是一個公民。但史匹特勒，由於命運之嘲弄，有一次，曾被逼比該國歷史上任何詩人，更直接地干涉過國家的政治。客勒年青的時候，曾爲耶利買亞斯·格賽勒佛（Jerimias Gotthelf），極其藐視的過激黨，寫過文章並充過戰士——後者不大有效。

其後十五年（一八六一——七六年）曾在他所愛的沮利克州政府內，充任命職的政府書記官（the appointive office of clerk of state），其中有一部分時間，他曾兼任選舉職的州議會的議員。客勒的好運道，乃是得親眼看見他的政治的理想，於一八四八年，差不多完全實現了；在 *St. J. Palmstein der St. J. Aufrechten* 中，他把其後數年的瑞士之圖畫描繪的完全可樂，但確實太鶯鶯色色了，他夢想的瑞士實現了，誠然是一個雛型的烏托邦，但是一個在各部分幾近完全的烏托邦。詩人的壞運道，乃是在其後數十年中，親眼得見那幅圖畫被他所謂民主主義之危險的形態的侵襲所污損了。他以他的無與倫比的文學的藝術，來同它們抗戰，但如他借着他書中的一個人物，馬丁·撒蘭德（Martin Zolander）的口所說：『我要用盡我的力量，同謬誤的思想宣戰；倘使它勝了，只好算數，我願體體面面地服從它』，於此可見他的氣量之寬宏了。

其實客勒終身深信不疑的民衆，本能之實質的正義，乃是使其易於樂意服從勝利的謬誤思想之主要的原由。他堅持政治，並未使人變壞，而人乃是使政治變壞者。客勒雖對於真實有準確的意識，而且時常毫不缺乏豁達的幽默，但在實質上，他是一個極端反對中立的人。對於在一八四五年，劇烈政治鬭爭中，只能看見個人的和狹小集團的利益之友朋，赫及（H. J.）詩人，在回信上堅持它斷然是一個『是或非、真或僞、正或誤、白或黑』之事件，其間決不容有中立之存在，並在結語上以動人的詞鋒，表達他的信仰說，其成敗係於政治爭論中的崇高原則，能淨化有關的人物和行爲（high principles at stake in controversies over matters of state purify the actors and transactions involved）。

客勒的“*Mian Regula Amrain und ihr Juncker*”在實質上，是一位賢惠的母親教育兒子的故事，而該項教育之大部分，是關於道德和公民。瑞士學校，把它作為大家應讀的經典，而它確實對於學生之政治的和文學的教育，有完全相同的貢獻。在他稱爲“*Die Leute von Seldwyla*”短篇小說集中，一個瑞士小鎮的人民之生活狀態，被他描寫得栩栩欲活，絕不是沒有一點惡作劇的毒意的（*comic malice*）。在客勒的較長的作品中，其最後寫的『馬丁·撒蘭德』（*Martin Salander*）是最富於政治內容的；借着該書之主人翁，著者將他自己最真實的本質，表白出來了，就是他所心愛的瑞士之護衛的精靈，永遠以父親的資格關心她、教育她、向她說教、給她警告、責罵她、懲罰她。他的許多較短的著作，也有崇高政治的價值。例如在他充任政治書記官時代所寫的『祈禱日的講演』（*the Prayer Day addresses*），尤其是一篇稱爲『選舉日』（“*Der Wahltag*”）之簡短的小品，訓斥逃避政治職務者，該文可譯成英文，用於美國勸勉人民投票的運動中。

客勒毫無問題地是德語瑞士之國家詩人中之最偉大者，在萊茵河彼岸，也不無榮譽；但在他的著作中，實際上完全沒有提到該國之法語和意語的區域。在天主教的各州中，他是少被誇獎的，因爲他的宗教和政治的自由思想，時常是直言無諱的。他所作的某項攻擊，尤其是對於景教徒之攻擊，也是招怨的原因；實在，我們應當承認在呪罵之十足、乾脆和惡毒上，它們可算是空前而絕後的，就連中世紀教皇驅人出教的敕令（*medieval bulls of excommunication*），尚望塵莫及。然而一切事情，經過考慮之後，客勒比較瑞士十九世紀，任何其他文學明星，更接近於其整個精神之表現。在他所撰壯麗的國歌，“*An das Vaterland*”內，我們可聽見該國之真實的聲音，尤

其是在差不多所有慶祝節日，當其瑞士到會的全體民衆，站起歌唱它的時候。

自從客勒死後，沒有瑞士的作家在愛國的熱忱上是趕得上他的。康拉德·肥頂爾·邁爾（一八二五——一八五年），他的最大的同時的文人，以爲國家在其最壞的方面，是必須有的弊害，權與力之集體的概念。政府和教會在其最好的方面，他以爲是至要的，但都不是最高典型之制度，都不外乎是在人的本性上，成爲形體的至高無上的靈力之代行職權者。在客勒與邁爾之間，其後的瑞士著名作家之傾向，似乎更願採納後者之政治哲學，這個傾向，自世界大戰以來，會逐漸顯著了。比如，摩西林書中的主人翁，在 *Revolution des Herzens* 一劇上，所得的結論是，永遠不要擎起一支來復鎗，攻打一個人；斯坦書中的兵，站立在釘在十字架上的當前，猛然覺悟過來，他曾胡亂地殺過人。雅各·巴斯赫特堅持『政府是一種機構，我們不值得爲它犧牲了自己』；又說『國家的福利，是至善乃是妄言』。『第一是成熟的人——就是對於他們自己和對於團體，曾達到一種崇高的和意識的責任心之個人』。在他的『野外的呼聲』(*Ein Ruf in der Wildnis*)中，巴斯赫特之英雄，爲現代的瑞士，描繪了一幅悲慘的圖畫，它的可怕的社會的仇視，人們如爲饑餓趨迫，到處覓取食物的野獸，彼此怒目相向，隨時隨地可演成弱肉強食之悲劇，在有財產和沒有財產的人們的眼中，都閃耀着爭權奪利的貪慾，雇主們隨時可鞭打工人，工人們如綁在機器上的奴隸，口中喃喃唸着『組織』、『階級鬭爭』、『工資的等級』、『罷工』、『一致團結』、『工作時間』、『布爾喬』、『資本主義』、『革命』。即或將上文所舉粗鄙的過甚其詞的地方，打一個適當的折扣，我們也顯然可以看出瑞士人已經遠離了格特佛銳德·客勒及其在 *Das Fährlein der Sichen Aufrechten* 中

所插繪的田園的幽靜。

並非悲觀和歛望，對國家之仇視，以及個人之崇拜是最近瑞士文學之唯一的論調。反之，在許多詩歌和小說內，尤其是敘述農民和地方生活者，有不少自滿，雖其中，也有頗爲沾沾自喜（rather smug）。獨特的人，慣常矜誇他們自己的獨特的性質，即或後者在另一個山谷中，就是不爲人所知者。並且其中，也不缺少關於一切瑞士人，實在縈懷的一種自然的情感之謹慎的表白，不論他們承認這種情感與否，就是他們在往昔，是一個受天獨厚的國家，而且大概是命定對於全人類之發展，要作有價值的貢獻。作家們比如像亞多夫·弗銳（Adolf Frey）（一八五五——一九〇年），曾和格特佛銳特·客勒，有過許多共同的戮力者，曾保持住了後者，大放光明的愛國的傳統。在青年作家中，也有像由革·威勒爾（Eugen Wyle）者，他們雖不過分重視他們的國家之美德，但仍讚揚它並深信其將來。其他的兩部，令人銷魂的小說，“Fridgenossen”和“Stansoo”中，他曾顯示描寫和結構之非常的能力，同時把握工業和農民的見解之能力，尤其是後者，如古乃熱斯（Günz）山間人民所表現者，能深刻地檢視政治的弊病，但不忘記國民生活之有希望的特性，能權衡在該國所傳播的最保守的和最過激的主義，最後，能表現整個瑞士人民，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之沈潛的信仰。

自本世紀的開始，客爾·史匹特勒（Carl Spitteler）（一八四五——一九二四年業已）是瑞士文學上之傑出的人物；實在，有許多人以為他是哥德（Goethe）以後德國文學上最大的詩人（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是爲紀念史匹特勒，而致瑞士人民的一篇公開的信中說：『他是你們一切當中之最偉大者。你們的地方——神



聖的個性和自由之可敬的土地——從來沒有產生過這樣一位藝術和思想的英雄。現在他已作古了，讓一個生人（雖曾很久作過你們的客人，因此在他的方面，已不覺得再是一個生人了，不論在你們方面，你們會怎樣感覺）來尊崇我們的荷馬（Our Homer），自哥德以後，最大德文的詩人，自米爾敦（Milton）死後三百年中，詠史詩之唯一的宗匠。但在他時代之藝術中，比這些人中之——或他，都是一個更孤獨的人物。』然而他的三部傑作——Prometheus und Epimetheus, Der Olympische Frühling 以及 Prometheus der Dauler——超越了國家的界線，瑞士的和德國的。因為它們的模規是世界的，所以其人物，或說其人物之姓名，都是從古希臘之神話和寓言的世界中取來。它們都推崇超人（superman），已經被史匹特勒在詠史詩的偉大中所孕育和闡明的人，然後纔由神經過敏的尼采（Nietzsche），在哲學的形態中，把他發展出來了。至於詩人之政治的見解，在他偉大的著作中，他始終堅持做皇帝是一件倒楣的事，因為社會和國家殺傷靈魂，而使人們變成奴隸。過後，他須確說：『世界歷史之智慧，可被總括於一個單獨的句子中：每個國家盡力偷竊它所能偷竊的（Each state steals as much as it can）。點（Punctum）稍停，以便消化和被稱為和平之無意識之發作（With pauses for digestion and fits of unconsciousness which are known as "Peace".....）。政治家之天才愈大，就愈殘忍無情。』

史匹特勒在幾篇較短的詩和散文作品中，揭示了他對於瑞士的事物之深邃的理解。批評家也指出環繞他的史詩人物之山、湖和樹林，很像亞爾卑斯（Alps）而不像奧林拔斯（Olympus），並且他以他自己的民族所特有的字句，強化了他對於修詞之精嫻。然而除開這樣，偶然的表現外，沒有什麼可以顯示在詩人的胸懷中，有一顆愛

國的心。在私生活方面，自一八九二年以來，他就在實際上，度着隱居的生活，將生命完全奉獻于他的藝術。尙有值得注意的，乃是他的聲譽很早就洋溢乎萊茵之彼岸，但直到他已達垂暮之年，他的聲譽，纔在本國被承認。

總之，客爾·史匹特勒，顯然是我們最難希望肯爲其祖國的福利，戮力之一人。然而在一九一四年，當其瑞士被在其德語和法語區域間之裂痕所威脅時，據詩人之自供，戀戀不捨地脫離了他隱逸的生活，但是拿定主意，要去履行他的公民義務，而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以『我們瑞士的觀點』爲題，向沮利克新瑞士社全體社員公開講演，這番講演，比聯邦行政委員會一切的告示和在這緊要的關頭，尙能保持清醒的腦筋之著名瑞士政治家們之一的演說，對於恢復國家的統一，都更有效。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瑞士歌詠超人之詩人，顯示了他能擔當一件超人的功業（In that fateful hour the Swiss singer of the superman showed that he was capable of a superhuman deed）。

史匹特勒所感格的國家，其人口雖很有限，而且他的舉動，在瑞士國境以外，雖被多事的世界戰爭所湮沒，但是我們懷疑古往今來爲人手所撰著的一切政治的小冊子，有沒有一本比『我們瑞士的觀點』（Unser Schweizer Standpunkt）更完全地達到了它的目的。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上，要找一本同它相等的著作，就必須遠溯到革命戰爭中（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湯姆·培因之『常識』（Tom Paine's Common Sense）。史匹特勒以鄰舍和弟兄間之區別，爲其立論之基礎。

凡住居在國家邊界那一面的人們，都是我們的鄰人，而在目前都是好鄰人；凡住居在這一面的人們，就不

只是鄰人，乃是我們的弟兄。然而在鄰人和弟兄之間之分別，乃是一個極大的分別。就連最好的鄰人，倘使有穢可乘，也是會用大礮轟我們的，然而弟兄們，乃是在戰場上其同禦侮。

從這個基點——在一個藐視國家者的口中，誠然是一個奇妙的基點——史匹特勒於是懇求他的德語瑞士之同胞們，修明其內政。對於他的羅曼斯瑞士之同胞，他無絲毫的批評，這個態度，在當時，該國條盾區域的瑞士人中，僅少數採納了。反之，史匹特勒以為可以完全相信他們必定會處理他們自己的事情，而用不着旁人越俎代庖。史匹特勒日不旁瞬地一意抨擊，當時在德語瑞士中所流傳的戰事宣傳品，務使其體無完膚。自然，這樣通體被毀滅的材料，在事實上，幾乎完全是從萊茵彼岸而來者。關於比利時史匹特勒也沒將他胸中欲吐的真話隱忍不說。他說：

以其本身而言，比利時同我們瑞士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在另一方面，它的命運，對於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比利時受了人家的欺侮，這原是當事人，完全坦白承認的。其後，要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起見，該引將亞伯說得一錢不值（Later, in order to appear whiter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Cain blackened Abel）（譯者按：此處所引該引和亞伯的典故，係出自舊約聖經創世記，該引和亞伯，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兒子，該引是哥哥，亞伯是兄弟。因亞伯為人良善而受了上帝的寵愛，該引妒火中燒，遂將亞伯殺了。在本句中，該引係指德國，而亞伯係指比利時）。我以為在尚在戰慄的被害者的衣袋中，搜尋證據，是一個屬於靈性的款式之錯誤。勒死了，犧牲也就罷了。再加以罪名，是太過了……倘使我們自己的生命，要被謀害了，在我們的頭上，也要完全一樣

地被蒙上莫須有的罪名了。

因反對以新聞紙上各欄作爲戰爭宣傳之利器，史匹特勒堅持以正確的實話和謹嚴的公正之態度，對待瑞士一切鄰人，只要肯繼續作它的好鄰人——法國、英國、德國、塞爾維亞（Serbia）、比利時和俄羅斯，完全一樣——列舉各國之美德，以及各國歷次對待瑞士之友誼的行爲。對於瑞士人自己，他建議警備一切邊境之繼續的防守，真正的中立，舉止之適當的謙遜。

『因着命運之非常的寵惠，我們得坐觀現在蹂躪歐洲之恐怖的悲劇。在舞臺上全是悲哀；在幕後，殺人的慘案。你的心，不論向那裏諦聽，或向右或向左，你可聽見悽慘的啜泣，而悽慘之啜泣，在一切國家中，都是一樣的；在它們裏面，沒有語言的分別。哎呀！在這一堆未加計算的國際苦難的前面，讓我們以緘默的憐憫，盛滿我們的心，以虔敬盛滿我們的靈魂，尤其要脫下我們的帽子……於是我們會站在真正中立的瑞士的立場。』

或者，真如史匹特勒仁厚地評述，在他的沮利克講演未發表之前，潮流業已開始轉向統一了。在他演講之後，它必然流的快多了。然而在當時和以後由愛國的個人和會社所作的一切戮力中，寂寞詩人之呼聲，清楚地是最有力的單獨的因子。他的公民的義務履行了，『沒有猶豫也沒有酬謝』（ohne Wank und ohne Dank），他返回了，他在呂賽爾之隱居，重新在他自己所創造的史詩的英雄們中間，度他的幽閒的生活。在德國，在大戰前，他在那裏能列舉極多的朋友和景慕者，跟着沮利克的演講，有了一陣呢罵的咆哮。賣書者，從書架上將他的著作盡行抽出，而將它們丟入垃圾堆中。直到今日，我們尚可在普遍應用於德國學校的德國文學課本中，檢出如下的文

句：「由於他在世界大戰中之可恥的態度，客爾·史匹特勒放棄了要求每個真正德國人欣賞他的詩之權利。」在總帳之另一面（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edger）我們高興能發登記在詩人於一九二四年去世之前，他得了諾貝爾之文學獎金（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被如此推崇的唯一瑞士作家。如此加於他的殊榮，不過是許多證據之一而已，顯示這個人的偉大之某個數量（其廣博、其崇高及其令人肅然起敬之精誠，有如高峻的亞爾平世界（higher Alpine world）之一雪峯）已開始在瑞士和全歐洲被人理解了。

最近，載在紐約一個銷路很廣的報紙上的，關於史匹特勒第一部被譯成英文的長篇著作之批評說：『必然瑞士人在歐洲是最少文藝的人民。他們在奶餅、巧克力糖和旅館上，比較在文學上，更善於表彰他們自己的能力。』比前一句所包含的事實之荒謬的陳述，是難於杜撰的，而其荒謬，也並不致於因其所附帶的陳腐的油滑（to unnoyance hypocrisy）而減輕了。記取上文所引各種領域中的作家之冗長名單，瑞士比較世界任何其他國家，在每一萬人口中，必定有更多的著名的作家——用一個統計的短語。瑞士人有時被人指責說，他們沒有產生過哲學家，而他們自己也很願意承認，對於純粹理論的玄想，是不大感覺興趣的。在另一方面，在使哲學對於生活有實際的應用上，他們曾顯示具有豐富的機智，比如由裴斯泰洛齊的作品所顯示者，且說他也利用說部的形式來傳播他的教育的學說。但我們不能指責瑞士人說，他們沒有產生過詩人。反之，他們不特充分地產生過詩人，並且他們慣於以誠摯的尊敬對待詩人——這或者是更難能可貴（原註：在德語瑞士如在德國一樣，詩人（Dichter）這個字，是用以指任何創造的作家的，不論他用不用韻文的形式）。

關於這一層特別值得記錄的，乃是許多瑞士作家，是由教師出身的，直到所抽版稅達到了相當的數目，然後纔擺脫教學的職業，專心從事於著作。不論有沒有教學的履歷，在他們中間，都有一個強烈的傾向，要在他們文藝作品上，發展一個教育的態度，時常在道德、政治和社會的題材上，予人民以當頭的棒喝，如格特弗銳德·客勒之所爲；或至少將私人生活和團體生活之高尚的理想，以只隱藏一半的施教的熱心，高舉於他們的同胞之前。這種直接的或間接的教學之大部，在影響行爲上，發生了效力，也是沒有任何疑問的。我們可以說，一個慣於諦聽其詩人之人民，比一個慣於諦聽其哲學家之人民，都大致是會受高尚指導的，實在倘使曾有過任何國家作過後者。必然，人都以爲諦聽詩人，比諦聽哲學家是更危險的。

關於瑞士人對待其啓迪後進時，文人們之尊敬和重視我們有許多證據。在他們的國中，很爲希奇，一位詩人平常不被人視爲徒然從事於悅耳之聲韻者，大概是意識錯亂的，而必然是沒有實際效用的，乃是被視爲一位創造的藝術家的，其作品同畫家、作曲家或建築師之作品，完全一樣是值得欣賞的。這後一觀點，不僅在書報上，也在瑞士知識圈中之談話上，是繼續發現的。比如，聽見人指提省諾的詩人（the Ticinese poet）佛輾西斯柯·豈沙（Francesco Tassinari），在該州內，是最大文化的勢力，絕對不是稀罕的；當其最近羅馬大學，贈予他博士學位（honoris causa）的時候，差不多在同時，他又得了瑞士席勒基金之大獎金（Grand prize of the Swiss Schiller Foundation），實際上，全國所有報章都向他敬伸祝賀。比如，在這雙喜臨門的際會日內瓦日報（Journal de Genève）評述道，「意大利在佛輾西斯柯·豈沙裏面，尊敬了它的詩人和散文作家中之一位最通達人情者。」

位最深信和最有資格代表它的文化和文藝傳統者。瑞士將榮譽的冠冕，加於它的一個兒子之頭上，因為他能發以空前的圓滿表現構成它的三位一體的一個地方，和一個人民。在私人生活上，豈沙是一位曾舉行過從事教育五十年紀念之教師，這是剛在上面所提事情之前，在提省諸人民之歡呼中舉行的。他的重要的作品在詩的方面有“*Pr-Judio*”，“*Calliope*”，“*Iviali doro*”，“*Fuschi di primavera*”以及“*Consolazioni*”，在散文方面有“*Istorie e favole*”，“*Racconti puerili*”以及“*Tempo di Marzo*”。

關於瑞士人，敬重詩人之又一證據，可提出其政府在兩次所採的行動。民主國家，雖不能頒給勳章和爵位，但是它曾設法以超然獨存的殊榮，贈予格特弗銳德·客勒和客爾·史匹特勒。當其前者七旬大慶的時候，那是因着全國到處的感恩和愛情的表現，而與平常迥然有別的一天，聯邦行政委員會，贈了他一個獎狀，特別注重他對於祖國之勤勤。茲節錄其文如下：

『我們很可以指出這些（客勒的）文章之絕峯，不論怎樣對它們自己高舉而插入奇幻創作之境界，仍然在祖國的土地內，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正為這個原故，纔對於我們的人民，有極大的價值。但也是其道德的核心，貢獻予青年和全國人民的教育之確鑿的宗旨，這是其中許多作品所包含的（無損其詩的美），使它們成了我們現在活着的人和我們的人民之子孫孫，可以從而汲取最好的和最健全的活力之泉源。』

同樣，當其客爾·史匹特勒於一九二〇年慶祝他的七十五歲的壽辰的時候，聯邦行政委員會，給了他一個獎狀，使白髮蒼蒼，但精神矍鑠的詩人深信：『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曾以你的精神和你的膽力之稟賦，為你祖國

的理想鬪爭，而且在我們的公民中，曾護持了國家的統一』(“Never will we forget that you entered the lists for the ideals of your fatherland with the gifts of your spirit and your heart, and stood for unity among our citizens”)。共和國雖可以是忘恩負義的，如諺語之確說，但瑞士共和國，對於它的兩位最大的詩人，曾顯證它自己並不是薄情的。

在瑞士詩人不僅是被人尊敬的，他們的作品，也是被人熟讀的。在第七章內，我們曾請讀者注意，在學校中關於國語及其文學的研究，和在高級中，對於其他一種或多種國語和文學所費的時間之多。幸虧這種教學，尤其幸虧讀本和他種課本之精良，所以我們可以安然地說，就連只能在法律所規定最低限度的時間就學之兒童，對於該國更偉大的作家之作品，也能獲得一個略為充分的嘗試。甚至從學校畢業以後，有一大部分的人民，仍然保持着讀書的習慣。雖據一些道德家說，在瑞士對於從德國和法國所輸入的廉價的投合低級嗜好的小說之消費，完全太大了。上文所引關於每年買賣外國和本國書籍的冊數之統計，似乎可證其說之不謬。

讀書習慣，普遍於大多數人民之程度，又可以該國公共圖書館之數量和質量為例。這個習慣，也不是新近纔養成的；聖加侖之大寺圖書館 (the abbey library of St. Gallen) 早於公曆八六〇年，就藏有四百餘卷，直到現在，仍然是在全世界，以蒐集稀有的古手寫本和書籍最爲著名；愛因賽得能 (Einsiedeln) 和英結爾堡之寺院圖書館，都是創立於中世紀的——巴塞爾大學之圖書館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Basel) 是十五世紀中成立的；而白恩、沮利克、日內瓦、斯卡夫好生 (Schaffhausen) 和穩特日爾 (Winterthur) 之市立圖書館，是於



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成立的。在十九世紀中，幾個優良州的蒐藏開始了，在其末葉，公立圖書館數目之增加，比從前更迅速了。在一八六八年，瑞士有二千零九十所圖書館，共有圖書二百五十萬冊；在一九一一年有五千七百九十八所圖書館，幾有圖書九百五十萬冊，其後總冊數之增加，遠超千萬了。聯邦政府曾設立了一座國立圖書館，專蒐藏瑞士文學領域內之圖書。地方圖書館特別注意書籍，普遍流通於各鄰近的鄉區。許多較大的市立圖書館，新近曾移入優良建築了，最大單獨的蒐藏如下：中央圖書館，沮利克，六十五萬冊；大學圖書館，白賽爾，五十六萬冊；公立圖書館，日内瓦，四十萬冊；白恩之瑞士國立圖書館和市立圖書館，各各有三十六萬和二十七萬冊；羅善（Lucerne）和佛銳堡（Fribourg）之州立圖書館，各各有三十萬和二十二萬五千冊。

在圖書館以外，在該國各處，都有讀書會的組織。還有一種媒介，使著者和讀者之間，可以發生接觸，在歐洲各國，頗為平常，但在美國不大發達，就是由新聞紙的小品欄（newspaper feuilleton）所供給的媒介，在瑞士差不多各日刊和周刊，至少至首幾面的下端，可看見這種小品欄。在閱讀瑞士著名作家之略傳時，我們看見在他們當中有一個很大的百分比，尤其在他們的早年，曾被迫以這種方法所投寄全國各報之論文（essays），批評、短文和故事，時常是很優秀的作品，來貼補微薄的版稅。客爾·史匹特勒曾這樣幹過，引用最著名的單獨的例子，直到在一種遺產的形式之內的一筆意外的橫財，使他能供奉其餘年子史詩的吟詠。

考慮一八四八年之瑞士，那時它三分之二的人民，是務農的，到一九〇〇年，已變成了三分之二的人民，是從事於工業的國家，顯然農民和地方作品之繼續的興盛，代表一種文藝的落後。在另一方面，尤其是自世界大戰以

來，青年作家們對於各種過激的主義，是在作嚴重的表示。瑞士文學同瑞士政黨生活一樣，於是變得五花八門了，幸虧學校中所施的優良教育，人民之讀書的習慣，他們對於所喜愛的作家之景慕，後者之優秀的品格，以及他們對於公共福利之專誠的潛心，所以文學在政治上之赫赫優勢，在瑞士似乎必然要無限地繼續下去。

### 歌曲 (Ballads)

以活潑的款式，頌揚英雄的勞績之詩歌，既然在瑞士文學作品上，佔如此其大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們對於它們應予特殊的注意。瑞士全部歷史，雖不是用歌曲寫的，但比較在任何其他國，它大致有一個更大的部分，是如此記錄下來的。自然，在人民日常生活上，有許多重要的事情，在敘事詩中，未被提及。在犂頭後面之緘默的暹勉，在市場上之堅定的勞作，在州和地方人民議會中之清醒的討論，對於英雄款式中的詩人，都太平凡，而不配為其歌詠之題材。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記得幾百年中的瑞士歷史，乃是極端好戰的，充滿着深刻的仇恨，盟約之驟然的翻變，短兵相接的鬪爭，以及個人英勇的行爲。自然，這些曾是各代和各國歌曲作者之鍾愛的題材，並且難怪瑞士的文學，曾被他們辛勤的歌詠，充實到一個非常的程度了。

瑞士歷史，所提供的歌曲題材之非常動人的情形，許多德國作家，曾在這個領域內發見了詩文的原料，乃是最好的顯證。新近在瑞士出版，專為瑞士讀者而編的一個集子包含席勒 (Schiller) 烏蘭德 (Uhland) 蒲乃登 (Platen) 但尼 (Dahn) 斯夸布 (Selwach) 謝飛爾 (Scheffel) 林各 (Ling) 古潤 (Grün) 辛拉克 (Simrock)

白結爾 (Burger)、斯托堡 (Zollberg) 及其他諸人之代表的作品。在其國之本身內，對於歌曲之興趣，顯然是在繼續增高的。在近代瑞士文學上，一切較偉大的姓名，都曾對這個詩體，發生過深遠的興趣。就有格特弗銳德·客勒 (Gotfried Keller)、康拉德·弗頂蘭·邁爾 (Conrad Ferdinand Meyer)、亞多弗·佛銳 (Adolf Frey)、客爾·史匹特勒 (Carl Spitteler) 以及面拉德·廉乃特 (Meinrad Lienert)。在最近幾十年中，用各種地方方言所作歌曲之數目，也曾有過顯著的增加。瑞士全體歌曲之傾向，雖在以顯揚盟友 (Eidgenossen) 之德行來刺激國家的情操，但在另一方面，方言的歌曲和根據地方的神話所作之歌曲，同州的精神之強化頗有裨益。

在上面所提瑞士歌曲選集中，該國歷史上從湖居人 (Lake dwellers) 時代，到世界大戰所有英勇的軼事，都在被頌揚之列。一切大戰和許多小戰——森拍其 (Sempach)、聖雅各·昂德·白斯 (St. Jakob an der Birs)、賴頓德生 (Grandson)、莫熱特 (Morat)、方坦那 (Fontana)、駱瓦拉 (Novara)、客百列 (Kappell) 以及斯坦史之大屠戮 (massacre at Stanz)——都有一首有時有兩、三首歌爲之表彰。這種可歌可泣的史事之普遍的傳誦，對於愛國之情操之發展，必然有很大的貢獻。不僅在詩歌的專集，就連在學校教科書上之單獨的選錄，也都是被普遍傳誦的。因爲它們充滿着山頂之烽火、警鐘之鳴聲、號筒之催戰以及鋼與鋼碰着時鏗鏘之聲，所以它們對於好鬪的情操，也有同樣強烈的貢獻。在後一點上詩歌，以其古老的和崇拜英雄的痼疾，對於該國，除桑德本之戰以外，在一百多年中，所保持和平的態度，是格格不入的。只在少數較爲新近的吟詠中，例如在羅柏特·費西 (Robert Faesi) 之『下園』(“Abgesang”) 內，可以看到對於和平祈求。無疑，作詩歌者之窮兵黷武的見解，將永

遠是無可救藥的；在另一方面，有意義的，乃是在這個領域中，瑞士最新專集，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其旨趣，不在鼓勵人民去參加戰爭，乃在鼓勵他們堅決保持四年前所採取的中立的態度。誠如一位當代的詩人之崇高的吟詠：

Volker, wir wollen euch Leidgenossen,

Dir, Heimat, Eidgenossen sein!

Einsam umdroht, gemeinsam entschlossen,

Freund zwischen Feinden stehn wir allein,

Harren: Wann sprengst du auf blutenden Rossen,

Gottlicher Friede, als Sieger herein?

人民啊，在盟友之故鄉中，

我們是你風雨同舟之伴侶！

倘使你怕孤單，我們一齊要來爲你壯膽，

我們嚴守中立於友人和仇敵之間。

等着罷！你既然會將水遍灑於將萎的薔薇之上，

難道上帝的和平不會照樣普照於人世間？

報章 (The Press)

在人口的比例上，瑞士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有更多的新聞紙。在一九一〇年內所蒐集的統計，顯示它對於人口中之每九千九百零八人，就有一種新聞紙。同年他國新聞紙的密度，有如下表：

德國	每一五、四七四居民有一種新聞紙
英國	每一八、七〇〇居民有一種新聞紙
美國	每四五、九八六居民有一種新聞紙
意大利	每五六、九五〇居民有一種新聞紙
西班牙	每六二、九一三居民有一種新聞紙
法蘭西	每六六、〇〇〇居民有一種新聞紙

前面的數字，固然未足以概括一切。它們沒有說到有根本重要之銷數多少，也沒說到報紙篇幅之大小，它們內容的性質和價值。誠然，以平均銷數而論，瑞士在前表中，要列近底端了。在另一方面，該國維持着非常衆多的報紙，雖其大多數在性質上，是純粹地方的。一個小鎮的報館之所以繼續地盛行，大致因為瑞士生活之極端離中的趨勢——應記得不僅在政治的制度上，有這種離中的趨勢，就在自然的環境上，在事業上，在語言、民族、宗教和風俗上，都有同樣的趨勢。

在瑞士的近代史上，在民主主義的發展和爲人民服務的報章的發展之間，有一個易於察覺的聯繫，而它們彼此是互爲因果的。在反動的時期（一八一五——一八三〇年）之末，在全國中，尙沒有一分日報。跟蹤而來的普遍自由的運動，在全國各處引入了黨派的機關報之成立。自然，對於它們，保守黨只能動手辦他們自己的報，以爲對抗。到一八四八年，全國業已有了八十八種報紙，平均每二萬七千三百十五人，有一種報紙。雖根本是州的機關報，但在這些當中，較爲重要的，有少數，倘使不是在全國各處，至少在它們自己的語言之區域中，吸引了衆多的讀者。聯邦憲法，於一八四八年，成立之後，一個全國規模的報紙之需要，成了清楚的事實，爲適應這個需要起見而有的第一確定的企圖，是由在一八五〇年所成的白恩協會（*Union of Bern*）所發起的。現在約有半打瑞士的報紙，因有相當廣汎的銷路，是應列入這一類的。然而在它們當中，仍然沒有能壓倒其區域中之地方報館的，在這一點，它們是遠不及美國各大都市之報章的。

兼之，瑞士政治報紙之發展，大多由於創制和複決之加入聯邦憲法。這些直接民治之工具，於一八三〇和一八四八年之間，在各州曾有過長足的進步。在後面那一年中，因應用於憲法的修正，它們乃在聯邦的憲法上，獲得一個地位，而一八七四年之修正，爲普通聯邦立法成立了自由複決的規定。同時，它們是迅速地擴充着，並在各州中，時常加以施行。然而聯邦的創制，對於部分的修正，直到一八九一年，纔能發生效力。這些發展的效果，略可見之於政黨的報紙之迅捷的增加，它們從一八四八年之八十八種，增到一八八〇年之二百五十種，再增至一九〇〇年之三百五十種。因着創制和複決之結果，瑞士聯邦和各州的立法機關，就負有一些顧問機關的性質了，差不多，

一切重要事件之最後的決定，都交付予人民了。對於報章，就加上了一種極其重要的職分，就是準備並指導選民如何適當地履行其立法的義務。自然，瑞士政黨報紙，對於提請人民表決的立法建議，每每採取黨派之見。然而將待決的法案之贊成反對兩方面的主張，加以充分的陳述，而勸勉公民自作主張者，也絕對不乏先例。不論如何，既然有如此其多的具有各式各樣黨派色彩之報紙，選民當不難發見，關於任何創制和複決的法案，兩方面的辯論了。瑞士同歐洲大陸一般的情形相似，其咖啡店、餐館、旅館和俱樂部，備有各種新近出版的日報和定期刊物。無疑，就爲這些原因，美國式的宣傳小冊子，尙未被瑞士所採用。

按公民教育報，於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調查，在該年，約有一千種瑞士的報紙和形形色色的定期刊物。其中有五百五十種，是用德語印行的。講德語的人口，既佔全部人口六九百分比，可見羅曼斯瑞士，相對地有更多的報紙了。在上面所提千種刊物中，對於各國所流行的一切種類，差不多是應有盡有了——不僅有政治的刊物，也有文藝、科學的、教育的、經濟的和職業的等等刊物，其中有許多，頗爲優秀，所以它們值得更多外國讀者之訂閱。然而，似乎沒有猥褻文學的出品，沒有那些在其鄰國賣報紙的攤頭，所可見的以裸體冒充體育之雜誌。有一兩種瑞士談諧雜誌，是在國內外都著名的，它們是極其正經的（“hard boiled”）和直言不諱的，對政治的人物和事體，尤其是如此的。在少數較大的城市中，也有幾種銷路不大的小報，專作社會穢聞之拉圾桶。高尚的瑞士報紙，只以很小的篇幅，登載罪惡的新聞，雖間或對一個著名的案件，也陸續加以詳細的記載。然而沒有專門引動感情東西（“sob-zister stoff”），也沒有罪惡魔竊的大流氓之警人的特寫（“not any sensational featuring”）。

of underworld heroes)——總之，毫無助長罪犯虛榮心的東西。較小的或凡庸的過失，是罕被提及的，雖有時，可以發見代以犯人姓名之第一字母的違警案件之簡略總表。關於遊戲新聞，按照美國的標準，是很少的，大致不外關於遊戲的事項和記錄之單純的記載，實際上，對於個人運動家，沒有重視 (virtually no honoring of individual athletes)。但有一個例外，必須加以記錄，即在盛大的健身操和打靶的競賽中，因為是全國的盛會，所以由全國各大報詳加披露。

新近有一位批評家，刻薄地評論美國的報章說：

『報章的讀者，在出版自由中，覺察有侵犯他個人的私事，未經他的許可，登刊他照像，將從法庭上所蒐集的物品，堆積在他的門口，以及種種不勝枚舉的黑幕 (and ballyhoo) 之特權，用這些以為其自己的錢囊，增加收入，並為競技者 (prize-fighters)、海峽游泳者 (channel swimmers)、踢足球者 (football players)、表演歌舞的少女 (chorus girls) 以及飛行者之大吹法螺。他不能看見，出版自由之廣被利用於拂逆民衆的見解之辯護；用於工業的弊端之解剖，用於被選的官吏之自由的批評；用於國會的黑幕大膽的暴露。』

我們不能設以上述兩種罪名，控告瑞士的報章。反之，過激的報紙，繼續地為不孚衆望的見解辯護，和解剖工業的弊病。一旦國會中有了黑幕，一切政黨的報紙，絕對不會放鬆了它，而不積極地加以暴露的。實在，對於公共官吏批評之程度，在旁觀者看來，時常是太過分時，因為不特在報章上，可常看見這種難堪的批評，連在私人談話中，都隨時可以聽見。瑞士的公民，在他的一切美德中，是一個勇敢抗議者和訴苦者，隨時可以執筆在手，同報館編輯先生



通訊。而且編輯們自己，間或被人指責發出冤枉人的批評，以求激增其銷數。公共的官吏，因為是上述性質的攻擊之目標，所以吃了它不少苦頭。無疑，他們習慣的謹慎之大部分，是由於深知，倘使稍微背離正道，就必定會在報章上遭受各方面的批評。尤其是關於辦理外交的事件，是不能稍有疏忽的，因為瑞士的公民，是極端注意這種事件的。在這亞爾平共和國（Alpine republic）中，所以差不多沒營私舞弊或虛糜公帑的事件，也是半由於這個事實，就是在這兩種中，任何一件事情，會立時被偵察出來，而披露於報章的。

在一千瑞士各種定期刊物中，有三百五十種，可歸入在性質上是以政治為主的類別，其中約八十種，是『中立的』，其餘都是黨派的機關報。所謂『中立』，係指瑞士人對於這個字的解釋，而不應釋為我們美國的『獨立』（independent）之同意字。在事實上，這樣報紙之很大的部分，是廣告的媒介，所以只以很少的篇幅，登載政治的事情。它們登載少許他種新聞，略注重犯罪的案件，和投人所好的事情，雖絕不像美國黃色的報紙或小報（tabloid paper）。它們『知識的價值，同它們所費的紙張之體積，是成反比例的』，使它們在外表上，如一般瑞士的報紙之外表，頗為像樣的一個相當够大的體積。因為它們的收入之大部分，是從廣告中得來，所以它們是以極端的廉價售賣的。其結果，令幾種中立的報紙，在該國之德語的區域中，常稱為『通訊報』（Anzeigers），在法語的區域，常被為『新聞紙』（Familles davis），曾達到了對於瑞士可稱最大銷數之四萬到六萬分，或說超過銷路最廣的政治日刊兩倍以上。對於公共事件發生興趣的瑞士公民，慣於嚴厲地批評 Anzeiger 類型之報紙，責備它們，令選民不赴票廳履行公民的義務，使人民迷於物質的利益，等等。然而這種新聞紙中的關人（journalistic

*eunuchs*)，是這樣死地沈寂，這樣純粹地『中立』，這是在各方面皆然的，除非在其中，我們可以發見他報所不載的一些蹩腳廣告，所以要將沒有這種報紙的其他民主國家，所共有的政治現像，來責備它們，似乎是牽強附會的。不論如何，它們的勢力，不敵我們暴發的小報 (*muchroom Enclids*) 及其猥褻的囁語 (*with their pornographic*)。其政治的穢聞，以及其無數的圖畫以一×號，顯示被殺者之身體，被人發見的地方。瑞士新聞紙，普通很少應用圖畫、滑稽插圖、或任何種卡通圖，這是可以記錄的。

在因着比例代表制之施行，在一九一九年國議會的選舉上，所發生的選舉票之極大的轉變以前，以政治爲主的瑞士之新聞紙（意即除去中立的報紙），在該國各政黨中，在大體上，是依照它們相對的人數而被分配的。然而在目前保守派的政黨，在這一方面，佔着很大的便宜。依照瑞士印刷業之普通機關報 (*Die Presse*)，於一九二八年所提出的數字，在它所認爲在性質上是以政治爲主的，共計二百八十四種報紙中，不下一百二十八種，是屬於獨立民主黨的。此外尚有十九種民主黨的報紙，十九種自由黨的報紙，和十七種普通是中等階級的報紙。農民黨有九種，而反動的天主教保守黨有七十二種報紙。在另一方面，社會黨僅有十五種報紙，其中有十二種是日報；有三種報紙是隸屬於共產黨的。後面兩類過激的報紙，既然是在大都市中發行的，而且是被工業區域的民衆所閱讀的，所以大概它們的銷數，是遠超普通一般報紙的。

在瑞士的政治新聞紙中，只有少數，是全國馳名的日報，雖它們自然只以其自己語言區域，爲其主要流通之地盤。就有四種，甚至可以說有國際的地位，而且在國外是常被轉載的，它們就是獨立民主黨的 “*Bund of*

Bern”和“Neue Zürcher Zeitung”自由保守黨的“Journal de Genève”和“Gazette de Lausanne”他種具有廣大影響的報紙，爲獨立民主黨的“National-Zeitung of Basel”在瑞士所發行的最大報紙，它在一九二八年，宣稱有三萬四千之銷數；民主黨的“Zürcher Post”是寇爾提（Th. Curti）所創辦；呂賽爾之“Vaterland”，天主教保守派，在德語瑞士中之總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之正式機關報“Berner Tagwacht”和共產黨的正式機關報“Rasler Vorwärts”。

該國較大的報紙，可以靠得住會盡其力之所能及，對於流行的新聞作精簡的敘述，並對於時事作切要的評論。想到其中較爲成功者，也不過只有兩三萬分的銷數，而且享受不着大批廣告的贊助，它們當然不能提供其鄰國大都會的報章所共有的許多要點。其結果，使從巴黎來的法國日報，從米蘭（Milan）來的意大利日報，從慕尼黑（Munich）法蘭克福（Frankfort）和甚至從柏林來的德國日報，乘機而入，而在瑞士奪取了很大的銷數，瑞士人對於這個事實，不勝憂懼。然而凡對政治發生興趣之瑞士人，必須要看在日內瓦、白恩、白賽爾或沮利克所發行的大城市的報紙中之一分，不然，就算不得消息靈通了。在其中，他不僅會發見當天主要國際和外國新聞之簡明的敘述，他在這方面的注意，是遠超他國的讀者的，而且也可以看到，聯邦和地方的事情之充分的報道，包括全國和市立法機關中的計錄之頗爲詳細的敘述，以及該報所代表的政黨之議會，或代表大會之記錄。顯然，瑞士人同英國人一樣，對於新聞之這種記載，務必挨次閱讀不肯稍有脫漏，所以堅持在政治的報紙上，對它必須逐日加以披露。這種稿件，無疑是頗爲繁重的，但它們是如此重要，所以美國報紙，將它從正常新聞事項中排除，唯一的

例外，是全國會議的報道，使我們的民主國家，頗為相形見绌了。兼之，瑞士政治的社論，普通是結實的而且其思考是縝密的；尤其是在近年中，它們很少是輕操妄舉的或火性的（*spiritually or waspish*）。一切大城的報紙，尤其是羅曼斯瑞士之各大城，對於登載許多由各界名流簽名負責，撰著討論政治、經濟、文藝和科學題材之專論，也作成了一個慣例。這樣的專論，每每是富於考據，而且在註腳上指明來源和參考書目，使它脫去了日報的面目，而儼然有科學雜誌的尊嚴了。最後，如像普通在歐洲大陸各國一般，在多數頁之下端，可以看見那永存的小品欄（*feuilleton*），每每是數期繼續登載的一篇小說，或一個短篇故事，但時常是一篇論說，一篇確有價值的史論或批評。就全體而言，瑞士的編輯們，比較在英國、法國或美國，他們的同行，在他們的讀者們當中，所照準的，乃是一個頗為更高的智力水準；其實我們懷疑他們付印的大部分的東西，是否超過了一般人民了解的程度。

除了全國的或至少區域的性質之報紙外，瑞士一切人口衆多的州，都有一兩種日報，用以贊助具有任何可觀的地方羣衆之政黨。最後，在全國各市鎮和鄉村發行的有許多週報，每種週報，只有很少的銷數，但在其總積上，運用了一個極大政治的勢力。許多次要的週報之產生，由於一個鄉間的印工之企業心，他曾在印刷業上，積了一點錢，於是投資於一種報紙，而自任編輯。倘使能得到一千二百定戶，這樣的企業，就可自給了。關於普通瑞士公民，時常表示最深的興趣之州的，或甚至地方的事件之編排，小刊週報之資源，加上附近相識之輔助，以及本人稟賦的政治的慧眼，應付就綽有餘裕了。然而直到現在，它們尚完全不能購買一個聯邦通信社的稿件。對於有謀略的政客，這樣好的機會，是絕不容輕意放過的。於是成立了一個中央報業協會（*Schweizerische Mittelpresse*），在

名義上，是由於同情於獨立民主黨的紳士們所贊助的。不久該協會就雇用了十五位編輯和記者，令他們從白恩，不停息地對各地方的報紙免費，或僅徵最低的代價，寄發關於聯邦、國際或其他題材之新聞報道。自然，這種報道，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中立的，但在實質上，據說它們包含許多有利於獨立民主黨之圓滑的宣傳。然而，它們是被忠厚的鄉間的主筆，以貪得無厭的慾望吞嚥下去的，使其他政黨之全國的領袖們，見着不勝憎恨。最後天主教保守黨和社會黨，都不得不在白恩開辦類似的中央新聞通信社，來幫助他們自己的鄉間的主筆，雖後者在財力和在編輯的助手上，是遠不及中央報業協會的。幸虧有這些熱心的，倘使不是完全沒有用意的，扶助它們戮力，瑞士鄉間的報館，對於聯邦首都的事情，纔有了非常靈通的消息；而現在，任何小市鎮的主筆，也不致焦慮怎樣得着最合他自己的定戶之胃口的，用特殊黨派的調味品，所烹製的新聞。

在瑞士的過激黨批評說（其批評之自身，也不得不用一個私人所有的報紙，纔能揭示於衆），各報紙反映着它們的主人之經濟的利益，所以公眾的利益，有時遂遭了損害。並且也有的確說，多登廣告者，堅決要求避免有損於他們的營業利益之任何社說的措詞。然而，徵費的廣告，在總數上和在每個登廣告者所買平均的篇幅上，都是很小的，所以這個因子，大致不比在他國之重要，在後者，全頁的廣告，算是平常的事情。並有人作嚴重的控告說，某某報紙的債票，被外國人收買了大半，所以在它們的評論上，可以發見外國的勢力。果真這種事情，它就必定是靈巧地隱藏着的，因為讀者們是絕不容許有這種事情的。自然，黨報的時評，是公開偏袒的；並且它們的新聞欄，也不能完全免去染色的材料。比如，地位最高的保守派的報紙，並不猶豫在它們從俄國的通信上，插入各責蘇維

埃的政策之句子；而社會黨和共產黨，自然要眼還眼牙還牙了。有時，註句（parentheses）被用以指點事實，但更多的時候，讀者必須自己去發見事實。因為閱讀的民衆，有很高的批評力，而又極不能容忍頹補才——並且是一個極其歡喜作無窮盡的政治的討論，如瑞士之民衆——所以大致如上面所述的那種新聞紙的習慣，在比較上，是不會有多大的害處的。

反映瑞士政治生活之普通的容忍，甚至連最老實承認自己是黨派的報紙，也很少放縱於過火的言論，除了少數不名譽的報紙不說。在這一點，在法國的報紙和瑞士的報紙之間，有一個特別清楚的反比。一分「法國的行動」（Action Française），所包含的表性形容詞（epithets），超過在該亞爾平共和國之一切州中，全年新聞紙的產品。誠然，瑞士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刊物，是更易發怒，而且時常訴諸火辣辣的譏諷，但同在其他歐洲的國家中，同一政治信仰之機關報，相形之下，甚至它們也是溫和的。瑞士並非一向就是如此的。直到前一世紀之八十幾年中，時常被認爲最有效的主筆，仍然是最善於透澈地和惡毒地挖苦他的對手者。在這個活潑的時代中，所產生的新聞紙的狠毒之珠寶間，或被人掘出以作今日較爲清醒的世代之笑料。因着在近幾十年中，盤據瑞士政治的思想之龐大社會，和經濟的問題之突出，所以一個更溫和和正經的論調，已經成了瑞士報紙之特徵。這個論調的改變會產生了，第一、在人民方面，對於報章之更大的敬重；第二、在全國編輯中之較大的交誼。爲證明後一種發展起見，我們可引幾年前所成立的瑞士報章聯合會（Swiss Press Union）爲例，該項組織，在其會員中，包括各黨和新舊宗教派別之新聞記者。瑞士報章聯合會，對於其整個專業的利益之增進，特別在保障出版自由上，是極端活

動而有效的，因隨時有某種利益，出而威脅該項自由。

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或者同剛纔所提及的發展，不無關係，就是在瑞士報館主筆中，有一大部分是來自大學講座，或律師業務者。依照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統計報告，在從他種職業轉入新聞事業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曾當過教師，而有五分之一以上，曾當過律師或官吏。並且，許多屬於過激派的報紙之新聞記者，曾在工會所雇用的幹事部中，執行過練習生的職務。編輯們非常容易接識領袖及其黨中之羣衆，所以也最容易被選舉爲地方教育董事、市議會的議員、州議會的議員和聯邦立法的議員。在一九二六年，四名邦議會的議員和二十四名國議會的議員，是新聞記者。在兩個聯邦立法的團體之攏總的議席中，該業的代表所佔的等次，僅亞於律師。有人曾經說過，每個能幹的編輯，一旦被選爲聯邦議會的會員，對於聯邦行政委員的位置，就可垂手而得了。然而，目前在七位行政委員中，沒有一個新聞記者。瑞士新聞記者，除了在文職中佔有顯著的地位外，在武職中，也超過了他們應盡的充分義務。在他們當中，凡於一九二三年，屬於軍事年齡者，有三分之一任將校職，和五分之一是下士官（*third held commissions and a fifth were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今日之瑞士的報章，就像它所服役的人民，是結實的、系統的、教育的。它不是光輝燦爛的，或非常剛邁的，但它也不是狐媚的，或投時好的。它應受並獲得了大羣讀者之尊敬。它予人民的指導，照例在選舉和複決上，是有力的；但是，有時候，民衆也顯示他們十分能殺不聽社論的勸告，而投與之相反的票。『在一個小國如瑞士』，白費士（*Byss*）評論道，『人民對於他們的著名人物，有一種親切的知識，該項知識，將報章降於次要的地位了』。這個

評語，對於小地方和各小州，尤其真切，因為在那些地方，領袖們的命運，繫於個人接觸和政治談話者，遠勝報紙的宣傳。在另一方面，在全國事件上的和在各大州中之領袖，必須多借重報章，纔能號召他們衆多的民衆。

在瑞士，雖有人批評報章是被其股東、登廣告者或一般資本階級的勢力所支配，但該項批評，比較在其鄰國或在美國，對報章所作類似的控告，較爲罕見，並較爲平和。一個普通的瑞士人，在本性上，雖更多狐疑，然而他比普通的美國人，對於閱讀的書報，有更大的信仰。前者在這件事情上，並無錯誤；甚至在他所閱讀的黨派的報紙上，也比較很少無稽之談（*thin-fam*）。在個人和黨派方面之交相凌辱，在社論上既經罕見和幾完全絕跡（with the decline and almost complete disappearance of slap-stick personal and partisan abuse from editorial columns），富於戰鬥本能之讀者，覺得它們淡而無味了。但對於思想之衝突，表示興趣者則不然：一種報章，每日反映着七個政黨之鬪爭，它們在方略上，有從教皇全權論而至共產黨之迥然的不同；該項報章，處理國際聯盟的議事錄，差不多如像一個地方的制度；因着該國之中央的地位，所以它必須登載歐洲列強的時事——對於一切這樣的讀者，瑞士的報章，並不是一個不足取的政治學校。



## 第十二章 瑞士的象徵——儀式紀念旗幟和紋章服制節日

### 儀式 (Ceremonials)

在描寫瑞士國民性之一切企圖中，其側重點，一定是在於他們實質的單純、鎮靜和自抑，尤其是在於他們對華美和壯麗之根深蒂固的忌厭。依照這樣的作家，豪奢的浪費，觸犯一個極端節儉的人民之極其發達的經濟意識，而任何帶有正堂堂的王威之風味者，是他們政治本能所深閉固拒的。當其法國的大使來覲見瑞士國家元首時，他碰見後者的夫人，在其卑微官邸旁之公泉，正從事於家用衣服之洗滌，然而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當然現在舒適生活之物質的條件，在城市富裕人民中，是普遍地享用了。但是上面素描的特性，大部分依然如舊。它們之頑強，足以很顯著地影響公私的行爲，瑞士人常給予從一個大都會的環境而來的外國人之印象，是極端的魯鈍、平庸和樸素。

不難舉例顯示這些國民特性之強度。比如，在一九一二年，當其威廉二世 (Wilhelm II) 以全副君王的盛裝遊沮利克時，把幾位有身價的公民，嚇得忘乎其形了，甚至以難於見容於該國共和的傳統之熱心接待了他。這個偶然發生的事件，是從未被別人放鬆的，凡曾屈膝卑躬於其皇帝陛下之前者，至今仍爲殘酷譏嘲之鵠的。異常私人

的炫耀所遭受公衆的非難僅稍微輕些。有幾個大城市，尤其是沮利克、白賽爾、白恩和日內瓦，在其公民中有不少財產在百萬以上之大富豪，至少是擁有百萬佛郎之大富翁，但是因為他們的住宅、服裝和生活形式之樸素，令人永遠看不出來。僑居瑞士之外國富翁，可以享樂驕奢淫逸的生活，但任何瑞士人，一旦摹倣他們的榜樣，就會爲人所不齒了。聯邦憲法，雖有禁止賭博之條文，但旅客們在俱樂部 and 溫泉 (casinos and spas) 仍容易有機會作公開的賭博；但清醒的公民爲保持名譽起見，是躲避輪盤賭檯的。以從瑞士人方面所發出的社會主義的情感而論，其溫和的程度，大概一半是由於富人階級生活之簡樸和經濟。在歐美各大城市所常見的財富之鄙俗的和使人生氣的炫耀，在瑞士幾乎是沒有的。

一個固守簡單和經濟的人民，大致是不會大規模地發展儀式的。就一般而言，這對於瑞士人是確實的。然而，在下章將要討論的唱歌和音樂會社、體操和射擊競賽等之儀式，也絕不缺少動人的觀瞻。民衆的祝典，是極其繁多的，舉辦得非常動人，又能吸引如此衆多參觀的羣衆，所以嚴肅衛道的老先生們，沈痛抗議蹂躪該國之「節會的時疫」(Festevuche)。露天戲劇是以審慎歷史的準確表演的；但除卻微委之種葡萄者之節會外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estival of the Vineyardists at Vevey)，就沒有被人斥爲非常奢侈的了。在天主教的各州中，教會的儀式，具有該教特有一切動人的景象，其轄境內，農民之熱忱，又從而推波助瀾了；但於這些地方，瑞士人對於法蘭德斯 (Flanders)、布勒塔尼 (Britanny) 或意大利之宗教行列的壯麗，仍然是望塵莫及的。在少數城市和鄉區中，有季節的慶祝會和花會，雖能打動人民好奇的興趣，但乏特殊精密的經營。戰爭的紀念和歷史的周

年紀念，在其慶祝上宗教的情緒往往多於浮華。在白恩官廳的程序，比世界任何國都或者都更爽快而踏實。全國的選舉運動和選舉帶有同樣乾脆的性質。法官坐堂時不著長袍不戴假髮。陸軍制服，從前以紅藍的鮮豔而奪目。如歷史博物院的蒐藏所充分地顯證，現在採取了一個中立的暗灰色 (a neutral field-gray tint of low visibility)。然而對於瑞士政治程序之一的平庸，有一個顯著的例外，就是在下面，將予記錄的關於全民大會之儀式 (the ritual of Landsgemeiden)，因為後者是年代久遠的、富於色彩的和非常動人的。

在宗教的節日中耶穌復活節、耶穌升天日和聖靈降臨節 (Easter, Ascension Day, and Whit-Sunday) 在瑞士是特加慶祝的。在講意語的提省諾和講德語白賽爾狂歡週 (Carnival week) 是專為作樂和自由的，甚至專事鄙褻和可憎的放縱，似乎與其人民之正常性質大相徑庭。此外更有許多地方慶祝，例如在散提斯湖上的威爾叩其里 (Widkirchli on the Stantis) 之保衛天使節 (Fête of the Guardian Angel)，在阿彭色爾人 (Appenzellers) 看起來，它是古昔國家傳統之珍寶。在復活節禮拜天，古時德國民族菟蛋 (Eierabend) 的風俗，在該國德語區域中，尚被實行。升天節，不僅在其宗教的意義上被慶祝，並且也更在其字義上被人慶祝的，因為民衆紀念它的方式，是趁清晨日出之際，出發遠行至鄰近山區攀登山巔以效耶穌當日之所為。在沮利克州幾個鄉區中，殷實的農民聯合濟貧的善舉和營業的智慮於聖靈降臨節，以牛乳贈送其貧寒的鄰舍，一般民衆，深信如此做法，可使他們的製乳場終年蒙福。降臨節也是一個很好出郊遊覽的時候，雖在暖 and 月分中，只要天氣晴朗，都是很好遊山玩水的時候，且說，這個因子，在都市的社會中，乃是使許多人不出席履行投票義務者，吃虧的往往是

中等階級的各政黨。從前的批評家，慣於以輕蔑的口吻，評論瑞士人說，雖常樂意陪伴旅行團爲其搬運行李或嚮導其爬山途徑，但除卻純粹有利可圖的差使，他們唯恐走入山中。必然，現在已完全兩樣了。誠然，出得起錢的富翁們，常赴北海濱或法國的避暑勝地去遊玩，但現在一般無錢無勢的公民羣衆，常以步行和乘火車、坐汽車、騎自行車和各種交通工具，踴躍地赴高山區域，以消遣星期例假或其暑假。因爲一切階級的瑞士人，遊覽和享樂他們國中無敵的美境之人數，已經非常衆多了，所以他們從前懷恨旅行者之成見，幾乎已經完全消滅了。

在瑞士冬天就是冬天——是一個人畜蟄伏的季候——比歐洲的低地(Lowlands of Europe)嚴寒的多了。因此春之來臨，應加慶祝，乃是極其自然的舉動，尤其是在該國之各鄉區，比在他國的慣例，更爲歡欣和熱鬧。甚至城市的居民，也覺得有一種衝動，要用表情的方法，將那冰雪漫天和戶內蟄伏的季節，送將出去——譬如羅卡諾之山茶節(Camellia festival at Locarno)、孟崔克斯之水仙節(Narcissus festival at Montreux)、日内瓦之音樂和花節(Music and flower festival at Geneva)尤其是沮利克所特有『六時鐘聲』(Sechselfintion)。這個別緻的祝典，是在每年春分後第一個星期一舉行的，如像其命名之含意，歸結於第一次鳴鐘在六點鐘收工而廢止冬季之七點鐘停工的鐘聲。在『六時鐘聲』節之早晨，那位於林馬湖上的古城(ancient city on the Lemnaud)，各街道上點綴着小學生的行列，在他們當中，有許多穿着該州特有的如畫的服裝。他們爲歡樂和尊敬之每種表示，護送載着春之女神及其扈從之凱旋式的無邊平頂車。其後跟着波奧格(Böve)，一個象徵冬天的大而無當的醜陋的人物，是用裹着棉花的板條所作成的，爲準備快要臨到它頭上的命運起見，它在腹中，滿裝着

火藥和煙火。圍着波奧格者，爲一大羣舞蹈的和嘲弄的小丑，他們對於冬之象徵，用各種方式表示他們的憎恨。於是該行列緣林馬湖畔進行着直到該如鏡的湖之盡頭，在那裏波奧格被掛在用長竿所搭成的架子上，在各長竿之下端，支撐着許多爲晚間野火之引火的材料。煙火放畢之後，小學生乃整隊赴市政廳去參加慶祝該項事件之跳舞盛會。

當天下午，該城各同業公會的會員們（*guild members*）以盛大的尊嚴，整隊遊行，穿着古時的和富於色彩的服裝，並持着他們的組織之旗幟，並佩帶其徽章。事實上，這些團體，已經不再是在十八世紀之下半，執行它們的工藝之工匠們所組成。然而在沮利克，如像在白恩和其他城市一樣，同業公會，曾繼續是社會的團體，時常仍保持着古老而優美的會館，爲其總部。它們目前的會友，是從一切不同的營業和各種行業中徵求而來，雖也有很多人請求加入，是因爲他們的祖宗，原是屬於該會的。這些團體之本來的經濟意義，雖已喪失，但它們儀式的意義，是比前增加了；而在一切盛大公民節日中，例如沮利克之『六點鐘聲』節，它們彼此競爭，再行穿着曩日之鮮明的制服。

隨着該城，一切大鐘在六點鐘齊發的鳴聲，當天戲劇之最後一幕，遂登場了。在一個稠密的人羣之前，波奧格準時在架上被焚燒了；當其它在煙焰和預兆的爆炸中，贖它去冬之罪過時，在烏特里堡（*Uster*）、沮利克（*Zürich*）及四周其他高崗之上，響應着閃爍的光焰，同時從環着如鏡湖面之一大隊船舟，升起了各種煙火。『六時鐘聲』節乃是少數節日之一，在它們當中，沮利克之清醒的市民，確實放任了狂歡的精神。波奧格燒成灰燼的時候，祝典絕不就此告終，而是以適當的灌奠繼續到次日之清晨的。

在上英格丁 (Upper Engadine) 各村中，春之來臨，是以一種如畫的，名曰查蘭達馬詩 (Chalantamarz) 的風俗所迎接的，據說這個風俗之來源，可回溯至羅馬人佔據該國之時代 (Days of the Roman occupation)。於三月一日日出即起身，大男童們，整隊遊行於街市，盡力動盪沈重的牝牛頸鈴 (cervantes)。立卽有較小的兒童，加入其隊伍，每人頸上掛一個鈴。後者是排成單行的，正像牛羊在山道中進行時被派之順序。身量最高的青年，穿着牧場主之服裝，並在肩頭上負着一個極其清潔的牛乳桶，走在這個快樂的行列之前面。他的較大的伴侶們，協助他部勒較小的兒童，該行列是由另一個高大的男童所收尾的，扮成牧人的模樣，手持長竿，並假裝留心照顧迷路牛羊的模樣。這樣鏗鏘騷擾的隊伍，挨家挨戶地向前進行，唱着一首古時的羅曼斯歌 (Romanschene)，被人慷慨饗以的食品，如臘腸、夾心麪餅、點心、蘋果和殼果等。跟着有跳舞和宴會，在其中，成人們也有他們的分兒，飲乾了無數杯甘芳的紅葡萄酒，借以慶祝臨近的春天。

在瑞士遍山區無數小村中，每年春天，一俟冰雪已經相當地融解，牛羊羣可動身向高地草場進行的時候，就開始慶祝『起身上亞爾卑斯山』(Alpaulzug) 了。這是人畜同慶的一個節日；實在，後者以其驚擾和鳴聲，表示它們覺察一種快樂的轉變，卽由其冬季的廐室之黑暗和窄狹的拘禁，遷入高據在山岡之上被陽光普照的柔嫩青草之牧場。在『起身上亞爾卑斯山』之節日中，吸引更多注意者，乃是這些牲畜。它們被一隻強壯的公牛領導着，後者頭戴花冠，在其身體之側，負着一個擠牛乳用的獨腳凳。在它的後面，跟着母牛們，也都綴着花朵，並特爲過節，其皮毛被洗刷的非常清潔光滑，走在陽光中發出光輝。牧人們領導這個行列，親熱觀察，並摸撫其槽中之愛畜。跟

在他們後面的，有各種車輛，滿載傢具和製乳器。沒有儀式是更簡單的，而且沒有儀式，與其人民之遊牧的生活，有更親切的聯繫，並且也不會比它更富於音調，因它有無數牛鈴之響聲，亞爾卑斯山的角聲，以及伴以岳得調的合唱 (accompanied by yodeling choruses) 之牧人曲調 (Kühreigen) 之歌唱。

每年在一個全州 (古乃熱斯) 和四個半州 (上翁德華登、下翁德華登、外阿彭色爾和內阿彭色爾) 開會的全民大會 (Landsgemeinden)，在一種意義上，也是春節。它們是在四月之最後一個星期日或五月之第一星期日舉行的，倘使天氣晴朗，它們就會帶着由全鄉男女老幼共同參加的一個盛大的野宴之風味了。婦女和小孩們，在靠近會場之山上，一邊觀看一排一排地環坐會場四周之選民的舉動，一邊在遊戲和社交中消遣了一天的光陰，而其活動的程度，並不亞於下面選民之政治的鉤心鬪角。這種全民大會，在主要的性質上，雖是立法的和國民的團體 (while primarily legislative and constituent bodies)，但也有一個很強烈的宗教性質。平常在未開會之前，先要在州的首城之主要的禮拜堂中，舉行禮拜的儀式；它們是以祈禱和唱聖歌開會的，而以嚴肅的宣誓閉會的。總之，一個瑞士的全民大會，是以春節、宗教的集會和民主的立法三個方面合而為一的。

對於全民大會之政治的和宗教的方面之側重，不應該抹煞它們是真正民衆事件之事實，而且因此絕不缺乏幽默的意味。由於所處理的事件之嚴重的性質之要求，在觀瞻上和在進行的程序上，雖都有相當的威儀，但是任何煩擾的或談諧的臨時發生事件，時常會逗引適當的樂趣，例如坐在前排凳子上之公民，或者因為多喝了一杯酒，撐不住而向後倒了，或者因為有一個人在這們大的一羣人中間，不能使他的聲音被大家聽見，而發出的嘎

聲。田舍的演說家，有時引起一陣轟場大笑（*Barcolic orators sometimes rouse a gale of Homeric laughter*），照例都是十分無意地。但是，關於全民大會之幽默的意識之最好的證據，乃是從前在外阿彭色爾和幾個其他州中所流行的一種風俗，在這些地方，幾百年以來，在每年的盛大政治的事件之次日，舉行一個滑稽大會（*Narron-rememnde*）。在滑稽大會中惡作劇者（*practical jokers*），演出一幕戲劇，將本地著名政治家之個人特性和政治錯誤，刻薄地加以譏諷，引得觀眾捧腹大笑，演完這一場滑稽戲之後，時常以投票的方法，將一個非常不體面的職務，贈給他們小區域中之尊嚴的權威。顯然阿彭色爾之農民丑腳們，對於刻薄和謹慎之細緻的聯絡之成就，比不上因此著名的華盛頓足球劇場俱樂部（*Tridion Club of Washington*）兼之，據說滑稽大會之巨魁，是受酒資（*Trinkgelder*）所支配的，時常也真是如此消費的，要被他們挖苦的人，付給這項酒資，以免遭受難堪。爲着這兩個原因，無疑滑稽大會，雖極受人民的歡迎，對於州中在教會和政府居要津者，乃是一種呢逐，後者自一六八〇至一八一一年，曾不住地以其威風發令，取締它和以立法的手段制裁它。在後面那一年以後，那個愉快的制度消滅了，雖在阿彭色爾，仍用其名，以指跟着全民大會星期日的星期一以爲其紀念，該兩日都爲地方的例假。

瑞士政治之一切其他民衆的過程——選舉運動、投票和複決之表決——都純粹是例行的事情而已。在另一方面，瑞士全民大會，具有一種老到幾個世紀的儀式和富於色彩的禮節，雖輕而易舉，但有最高度動人的能力。各州全民大會的典禮，容有不同；從前由銳的程序，可代表一般，而且或者是最如畫的。人民在阿爾特多弗（*Alt-dorf*）做過禮拜之後，於是他們在方場上，退爾銅像（*Tell Statue*）之下，排成行列，而步行三英里，至波池林



(Bülzingen) 之歷史的會場。在這翠綠而綴以野菊之草坪上，他們成環地圍坐着，迨大家起立宣誓畢，就開始處理該年之政治的事情了。

古乃熱斯之全民大會，或者不及由銳那樣如畫，但甚至更爲動人。在古乃熱斯州內，其會場就在其首城之寬廣的公共方場內，但環立該城四周的古乃里席 (Mürsch)、弗銳·堡吉 (Frei Berge) 和古飛爾斯塔克 (Gutstock) 等山之高峯，俯視其景象，令平庸都市的環境相形之下，渺乎其小了。在古乃熱斯全民大會中，平常出席的人數，都在六千以上。在整個會議中，他們是站立的，在依階梯式環列的木凳上，大家擁擠的水洩不通，只在場之中心，留着一圈小地方，爲主持會議的職員之用。等到全民大會所規定的開會時間快要到了，古乃熱斯一切教堂之鐘，同時齊鳴，震耳的轟響。其後如何以及它對於參加者所作的印象怎樣最好引一位居住該州而爲瑞士最有天才的青年作家之一的，由董·威勒爾 (Eugen Wyle) 的敘述以代描寫：

會集在古乃里席山麓者，乃是古乃熱斯的人民電力所 (Power house) 一個工作者的人民之電力所。一個呼出新犁泥土、山中茅屋、商店和工廠的氣味之人民。皺紋的面、胼胝的手、積勞的身，明白昭示辛勤的和無間的勞作，乃是大家共同的命運。但從其沈重的足音所表示的驕傲和從其眼目所閃耀的是何等奇怪的驕傲：全民會議之精神。指天爲誓，結義同志之精神！他們當中，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年輕或年老，高貴或卑微，都爲的是要幫助推進全體的福利而來的。大家都有相同的權利、相同的義務。沒有人更多；沒有人更少。實在，倘使這裏和那裏各種仇恨，在人民當中，露出了臉面，但每一個人，一直明白，雖說現有未解的糾紛，有一個共同精神的維繫，將



在的力量和純正良善的意識。國家之愛護。忠心地和堅定地擁護多數公民所決定；少數應不猶豫地服從。但願自由的精神、擁護正義的精神以及公道和真理的精神，時常鼓勵我們；但願全民大會，永遠是自治、獨立和人民自由意志之無可比擬的慶祝；但願我們大家，以純潔的心，爲我們地方的幸福共同戮力。古乃熱斯的人們！聯邦的同志們！世界上沒有其他民族，是站立在自由之如此崇高之階段的。永遠勿忘我們的祖宗，嘔出了他們的心血來，爲這個自由奮鬥。他們曾以堅強不動搖的信仰奮鬥。但願我們，在我們的世代中，永遠不動搖；但願我們時常如環繞我們的自然之至高無上的作品，一樣堅強。在對祖國之忠貞上，堅強而不變……！

於是，那位領袖發出了宣誓的暗號。男人們摘下帽子了。目光所能注射到的他們大家。一大隊人，站立，靜默而恭敬；對於他們，這個時間是眞摯和聖潔如上帝的時間一樣。

議會灰髯的祕書站起，以響亮及遠的音調朗誦誓詞：「我們應許並起誓，在真理和忠誠內，擁護聯邦和古乃熱斯地方之憲法和法律，保護並守禦祖國的權力、它的獨立、它的公民之自由和權利，如我們祈禱上帝祝福我們一樣眞誠！」

一大片如像森林的手，自然地擎起來響應誓詞了。「我們誓必恪守此誓」。莊嚴地揚起了這個沈重低語的應對，在一大羣人之一排一排的中間，作沙沙之聲。人民宣誓効忠聯邦。他們重新宣布忠於國家和憲法。這些闊肩頭的面帶褐色的人們，露着頭站在那裏，他們眼和手，向天高舉如在祈禱中。

衆手臂再沈入羣中去了，衆頭顱再降低了。人民靜默地站着，好像剛纔接受了上帝的祝福之靜默！

在政治上，全民大會由於常被批評的缺陷，已不及從前之盛了（參看本書第五章）。然而，以儀式而論，它是舉世唯一民主精神感人最深的表示。並且，它的簡單的性質和動人的能力，是成正比的。直到今日，其遵循之程序，是七世紀民衆經驗之結晶，這種經驗『使帝王朝代誇耀的古老自殘形穢，彼此相形之下，後者似乎特爲昨日之新政而已』（語見 E. A. Freeman,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p. 20）。全民大會是一種教育的潛力，關於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古乃熱斯在如上面所記載的風俗中，是特別幸福的，借着這個風俗，該州的少年們，被帶進會場之正中心，以便他們在尚未履行公民義務之前，可以有機會學習直接的自治之過程。這在瑞士是最近似傳授公民資格之儀式（an initiation into citizenship）。然而，在一切其他具有全民大會之州中，小孩子可伴着他們的父母，參加大會，這樣所得的心印是終身不滅的。

#### 紀念 (Memorials)

在瑞士，是不愁沒有週年紀念舉行的，因爲它既有十九個全州和六個半州，就中不乏在未加入同盟之前幾百年中，有過它們各自斑駁陸離的歷史。而它們的確是被慶祝的，非常頻繁和非常生動，以致州或國的生命中之一切卓著的事情，在人民的心中，都未被遺忘了。

一個最盛行的慶祝，乃是紀念一個州加入同盟的日期。在平常的各年中，它的舉行，是毫不鋪張的，但是一旦到了百年的紀念——而在如此許多州中，百年紀念，絕不是罕有的——這件事情，就是以廣大的熱心和對歷史

的正確之極其縝密的考據而慶祝的，戲劇藝術和音樂藝術之一切可能資源，都被徵求參預其事了。譬如西委斯（Schwyz）於一八九一年，慶祝了它的六百周年紀念，而在那相同的十年中在白恩、白賽爾、色各（Thurgau）、基爾（Chur）、梭羅色恩（Solethurn）和其他地方演出了，大規模的慶祝戲劇。斯卡夫好生（Schaffhausen）於一九〇一年，慶祝它加入同盟之四百周紀念的時候，爲百周紀念，創了一個新紀錄。詩人亞諾德·奧特（Arnold Oetli）曾在同一性質的撰著上得名者，被主持百年紀念者挑選爲該項紀念創作一本歷史戲劇。在各方面，差不多與他齊名的人，被邀爲其演出撰著樂譜、指導表演和繪製佈景。該劇是在露天演出的，在靠近斯卡夫好生城之一片草坪上建了一座極大的舞臺。有從各階級人民中所選出的一千二百六十七位公民，尤其演員，參加其表演。共上演了五次，而每次可容六千人的座位，都被售罄，同時尚有幾千人在鄰近山上，看其表演。斯卡夫好生紀念劇之印本，會重版十二次，爲著作人賺了一萬二千佛郎的版稅——對於這樣的作品，在這樣小的國家如瑞士，可算一筆很可觀的報酬了。這樣大規模之百年紀念，就不僅具有純粹地方的或州的意義了；實在，它們是被人看爲真正國家事件的。它們從全國各處，吸引了觀光者；它們在重要報紙之新聞欄中，佔了很多地位，因爲後者常派遣其最好的批評作家，報告每場表演。關於它們大大地啓迪瑞士人民之歷史的和愛國的情緒，是毫無疑問的。

在瑞士盛行的第二種慶祝，乃是特爲紀念救了一州或聯邦的生命之勝利。譬如白賽爾的公民們，以行列和愛國的演說，慶祝聖·雅各·昂·德·白斯（St. Jakob an der Birs）之戰（一四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周年紀念。同樣，日內瓦人紀念十二月十二日爲『攀城攻擊日』（Escalade Day）——一六〇二年沙沃依公爵

(Duke of Saxe) 欲以詐術取得該城，而遭失敗之周年紀念。在這一天，照例要在教堂中，舉行宗教儀式，包括誦讀舊約詩篇等一百二十四篇，其後人民從事於以一小鐵罐為中心的狂歡，紀念由一位老婦人，以極準的手法，將盛滿沸湯之鐵罐丟在沙沃依軍一位大將的頭上之史事。

摩格盾之役 (The Battle of Morgarten) (1315年) 在該役中，成立不久的聯邦之農民步兵，在抵抗奧國精銳騎隊中，收穫了他們第一次驚人的勝利，每年是以在戰場之南一英里之遙古老的聖·雅各小教堂中所舉行的宗教儀式，為其紀念的。森柏其之勝利 (Victory at Sempach) (1386年) 每年是在聖·烏利其日 (St. Ulrich's Day) 後第一星期日，被慶祝的。政府和教會的代表，連同該鎮之公民和學生，整隊步行至古戰場的原址，聚集於溫克銳德石碑 (Winkried Stone) 之四周，該碑是為紀念捨身突破奧軍方陣 (Austrian Phalanx) 之神怪英雄溫克銳德，而立的。在這裏政府代表發表一篇演說，其後在戰場上的古老小教堂中，舉行宗教儀式，包括宣讀歷史的文件，一篇講經的演說，和大彌撒 (High Mass) 並為陣亡將士的幽魂之安息做法事。在小教堂舉行儀式之後，參加者再折回森柏其，在那裏，將當天剩下的時間，用於演說、音樂和宴會，以為歡樂社交的聯絡。

在古乃熱斯之拉飛爾斯 (Nidale in Glarus) 地方，一三八八年之役的周年紀念，每年是在四月第一星期四慶祝的。該州內之每一地方自治區，都遣派其要人為代表，參加紀念典禮。遵照在一三八八年之役以後第一次全民大會之決議，在典禮中，照例誦讀於該役捐軀的古乃熱斯公民之姓名——他們共計五十四人，而與國侵略者，死亡之數，據估計當不下二千五百人。這個紀念日之一特點，就是稱為『拉飛爾斯巡禮』(Nidalefahrt) 者，

包含整隊遊行，在其路線上，有十一座石碑，是用以指示敵軍十一次攻擊被挫之地點，遊行隊伍到達每座石碑時，必須稍停致敬。其後之他種宗教的和社會的節目和森柏其相同。或這種慶祝，是以某種待決的政治問題之討論，爲其中心的。比如在一九二八之拉飛爾斯周年祭中，古乃熱斯之州長，在其發揮愛國精神之講演中，乘機推薦抵制酒毒的新法律之通過。

同樣，克服勇者查爾斯於顧輦德生（victories over Charles the Bold at Grandson）（一四七六年三月二日），以及於莫熱特（Morat）（一四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勝利，是被凡曾於出征勃艮第（Burgundy）期中出兵加入聯軍（Army of the Confederation）之各州所紀念的。於一九二六年，上述第二勝利之第四百五十周年祭，是舉國一致慶祝的。在那天有五萬以上遊客，擠進了莫熱特之小城。這個參觀戰場之行列（cortège），是由該地學生和聯邦政府以及各州的政府之代表所領導的。跟在這些後面的，是許多分隊的兵丁，穿着富於色彩的服裝，並執着一四七六年之旗幟、軍器和盔甲。那天主要演說者，是聯邦總統海銳其·哈柏林（Heinrich Harlin）。按照瑞士的風俗，該次慶祝，是以一部創作的紀念劇爲結束的，該劇是傅那基結爾（Frickiger）教授之作品，在三個驟然發生令人興感之局面內（in three tableaux），敘述戰事前後之本地事情。幸而摩熱特比任何其他瑞士城鎮，更妥善地保存了其古堡和有雉堞的城牆，它們現在巍然屹立之地，就是它們於一四七六年傲視勇者查爾斯之進攻的大軍之地。對於一九二六年動人的輝煌古裝遊行（pageant），他們供給了一幅完全的背景。

考慮該國直至十九世紀之極端好武的歷史，我們就不能怪瑞士人太喜歡慶祝軍事的勝利了。甚至在這樣

的祭日中，演說者的論調從來不是黠武的，而且絕少誇揚戰爭之論調。倘使其歸納的結論是主張軍備，但它絕不是進攻的軍備，而特爲防守的軍備而已。宗教的儀式，在這一切慶祝中所佔重要的地位，乃是值得注重的一點。紀念勝利的儀式雖屬樸素，但瑞士戰場紀念碑，就尤其樸素了。在該國的地圖上，雖有極多地方標有交×之劍，但沒有可以比擬葛的斯堡（Châty-saurg）的雕刻之塊然的兇暴。一個有意義的事實，乃是瑞士之最精緻的公共紀念碑，即嵌於日內瓦古牆之上者，並非奉獻予戰爭的，乃奉獻予宗教革命的。它的最美而最傷心的紀念碑，呂賽爾之獅（the Lion of Luzern）是對於一七九二年爲護衛一個波本王（a Bourbon King）而犧牲的七百八十名瑞士兵之忠心所給予的至高的褒獎。然而，同時對於抗議古老的中世紀的弊竇，即賣身予外國當局而充其雇傭兵，它所作的一個永久悲慘的見證，也是十分有效的。在翁德華登之司坦史（at Stans in Unterwalden）於一八八六年，爲森柏其之役五百年周祭而立的簡單而有效的一組雕像，是爲紀念亞諾特·溫克銳德之英勇犧牲者，按照父老的口傳，他曾『以一個寬大的擁抱，將奧國一葉致命的矛尖，插入其單獨的心臟了』。然而大部分瑞士戰事紀念碑，是一根簡單石柱，刻有紀念的位牌。倘使陣亡的人數不多，那末，就不僅軍官的姓名，連兵士的姓名，也一齊刻在紀念位牌之上的。無疑，這種紀念碑數目之稀少和形式之簡陋，一半也由於該國之相當的貧窮。像在其各大鄰國所看見那種壯麗的軍事紀念碑，在瑞士是絕對談不到。然而這裏面所包含的不僅是經濟的要素。在這件事情上，如同在其他人生的關係一樣，瑞士人是忌諱華美和高大堂皇的。並且，他們覺得以誹謗之詞，紀念在內戰上所獲之勝利，是有失觀瞻的——而許多瑞士的戰爭，是國內的戰爭——因爲從前那些戰敗的州，許多世代以



來都是和平的鄰人及聯邦的分子。在瑞士思想中，對於內戰之擯斥，有不少被轉移到對於一切戰爭之擯斥了。從這樣一種土地上耗費而雄壯的紀念碑，是生長不出來的。

在平常，瑞士公墓中陸軍的等級和出征，是記錄在墓碑上的。紀念的會社，時常在墳地上舉行追悼儀式，而在其去世的同志之棺木上，鳴鎗致敬。在瑞士的教堂墳地上，有幾個最動人的墓碑，是紀念在普法之戰和世界戰爭中，被拘留於該國而死者。然而值得記錄的，乃是官銜、選舉的或任命的職務在死之警告（*memento mori*）中，也佔了一個地位。比如，在一個鄉下教堂的墳塋內，有三位「鄉村的貴人」（*Village Hainprens*），在其他事情之外，載有下列官職：

#### 州行政委員

#### 教員、鐘書記官和公民登記官

#### 市長、州議員、某處鐘錶業之創始者。

關於瑞士戰爭紀念，不論是鑄於石或記於史書者，最驚人的事情，乃是對於任何將軍完全不提，或僅有極端簡短的記錄。陣亡的士兵，雖只有樸實的紀念，但也沒有亞歷山大（*Alexanders*）、該撒（*Caesars*）和波拉帕脫（*Bonapartes*）之頌揚，簡單而充分的理由，是他們未產於瑞士。從一三一五年之摩格盾（*Morgarten*）到兩世紀以後之馬銳各蘭諾（*Marignano*），瑞士人在事實上，雖沒有偉大的領袖，但在抵抗中歐列強，從頭到腳，以益甲蓋覆的諸候和貴族武士所統率的最精悍的封建軍旅上，接連打了許多妙不可測的勝仗。因為他們的貧窮，山國之

士兵們，沒有這樣的保護，也得接戰；實在大致就因着這種顯然的吃虧，所以他們纔達成了極其神勇的戰績。

爲尅服穿戴盔甲的敵人起見，瑞士人從新發展了方陣（*Quadrats*）——一種行動靈便的陣式，陣中的士卒，僅穿牛皮短緊衫或軟皮掛子，間或有一頂鋼帽或胸鎧——這個陣式，在各方面槍戟林立，如不可破的刺籬一般，所以能予敵人以極大的衝擊，而向前與敵交鋒，直到他們精疲力竭，於是在側面或後面，閃出一條路來，以使用斧者衝出去，砍殺對方被笨重的鎧甲所累而極其疲倦的武士們。在十四、五世紀的環境中，該項方陣，是一個大不可當的戰鬪機構，其效力和簡單，是成正比的，因爲策劃它們的人之兇蠻的英勇，使它們更加可畏了，這些人，絕不求人饒命，也絕不饒人家的性命，而每每盡屠所得俘虜，以污損其勝利，連落在他們手中的可憐的雇傭兵卒，也在不饒之列。這是一種密集的機構，它在敵人心目中所激起的恐慌，使瑞士人從摩格盾到馬銳各蘭諾，獲得了無數的勝利和征服。

此處不須詳加檢考，這個國家的戰術制度衰頹之專門原因——大致是火藥和大礮，大規模的徵集，受過專精訓練之將才和軍事工程。隨着在馬銳各蘭諾之敗績，瑞士征服的事業，從此告終了；其後，他們在所參加的大多數戰事中，雖也驍勇善戰，但是毫無光榮之可言，因爲他們是在外國王子、皇帝和教皇的軍隊中，充當雇傭兵，或在國內作同室操戈的勾當。在我們現在的立場，特別有趣的，乃是在上文已經提到的一個事實，就是在其軍事全盛時期中，他們沒有發展過偉大的將才。從最早的時候起，人民之整個精神，一種透頂猜忌的民主的精神，是嫉視很集中的統治的。在探行全民大會的各州中，軍官是由士兵選舉的，亦猶文官是由民衆選擇的一般。在大城市中，各

州的隊長，是由行政會議所提名的。地方的猜忌是強烈的，甲州的兵丁，動輒不服乙州的軍官之調遣；故此總司令之任命，乃是例外而不非常規。或者也因爲有些熟悉現代意大利軍事情形之瑞士文官，不願意使任何本地的斯福熱士（Sforza），有一個機會。這樣成立的傳統，至今仍不稍衰；在平時，瑞士聯邦的事隊，沒有總司令，也只得過去。只在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候，就是必須大規模動員的時候，聯邦行政委員會（Federal Council），纔選舉一員大將，他於是可以在聯邦行政委員會指導之下，總理全部軍事。世界戰爭爆發時，烏利其·威勒（Ulrich Wille），曾被選充任該職，這是自從一八七一年以來，瑞士陸軍第一次有過的一位統帥。在全部十九世紀中，他的前任者僅有普法之戰中的赫熱各將軍（General Harzog），和在一八四七年桑德本之戰中，以及在一八五七年關於紐卡德爾（Neuchâtel）反普的激昂中之居福將軍（General Dufour）。

並且，在十五、六世紀的瑞士陸軍中，在全體士卒方面，曾有過一種可驚的民主的言論自由；小兵對於他們暫時的軍官，並不猶豫，直言不諱，甚至勢焰洶洶。

在比可客（Bicocca）之前士卒諱諛道：『軍官，領年金者，受雙薪的人在那裏？請他們出來，在這一次做一點對得起他們的俸金之事情；他們大家今天必須身先士卒打頭陣』。比這個要求之專橫更可驚的事實，乃是軍官們居然從命了。司令們和隊長們，都邁步向前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曾得生還（註：這是一五二二年比可客之役的記載）。

一旦時局吃緊，就有軍事會議之召集，包含各州分遣隊的隊長，他們對於目前的戰事作一切的部署。這是否

認關於由辯論的會社所統率的軍隊的命運之古老格言的，因為他們的軍事會議，時常是熱忱而樂意戰爭的，所以瑞士人，差不多每次都是勝利的。故此，有這兩世紀無主帥的軍事全盛之似是而非的矛盾。

當然，對於上文所述之例外，是舉得出來的，但它們的數目，僅够證明上面的原則，而不能推翻之。在古時同盟之戰爭中，耳拉克之孺多福 (Rudolf of Erlach)，似乎確可稱爲軍事天才；但白恩在勞彭的勝利 (Victory of Laupen) 之後（一三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雖曾誇耀說上帝做了該城一個公民，但直到現在，尙未爲他豎立過一座紀念碑。杜福將軍，於一八四七年，對於聯邦的軍隊之練達的部勒，使桑德本之役，於二十一日中，差不多有了一個兵不血刃的結束，但他關於如何主持戰事以免其同胞犧牲生命之悲憫的概念，和他的神快而赫赫的將略，是同樣被人稱揚的。總之，該國少年，在今日學校教科書上所讀着的瑞士戰爭史，在事實上，沒有什麼是可以拿對於軍事領袖的光榮之熱望，來感動他們的。在另一方面，在其中處處可以提醒他們關於生命之喪失，再事征服之缺望，爲人雇傭兵之可恥，家宅和財產之毀滅，牛羣和羊羣所遭之蹂躪，以及兵卒的羣衆和平民的羣衆所必須負荷的一切層出不窮的戰爭之重擔。

在一個純粹政治的立場，在十四、五世紀之瑞士軍事全盛時期之歷史，好像是一個巨大的無用和終極的挫敗。比如查爾斯·奧曼 (Charles Oman) 曰：

故此極多奇妙的勝利之記錄，並未達到充分的結果；州與州間之猜忌，失掉了許多顯著的機會；昧於政治的知識和爲小失大的貪婪相輔而行了。累次似乎會創造一個統治中歐的新而重要的軍事國家之同盟，竟蹉

跽歲月而坐失良機了。

雖然，塞翁失馬，又安知非福呢？倘使瑞士曾優容了偉大的將才之發展，它誠然可於領土和能力上，超升於顯揚的地位，如法蘭西和德意志其後之成就，但它不犧牲精誠擁護自由和自治之特性，就不行了。步大將之後塵者，將為君王或軍閥的暴君。誰也不能擔保它會利用如此獲得的力量，於更正當的途徑，而不致如其兩個強鄰過後之所為。在另一方面，曾避去了一個波拉帕脫（Bonaparte）和一個威廉二世，曾逃脫了三十年之戰和世界大戰之血浴，不能說是小福氣。最後，曾顯證協調三種語言和兩個宗教之可能性，雖在一個比較小的領土上，曾達到了獨立和民衆的政府，比較創造一個統治全歐的新而重要的軍事國家，對於世界，可以有更高的價值。

#### 旗幟和紋章 (Flags and Coats-of-Arms)

顯然，在瑞士沒有以像在美國所常見的舉手敬禮的儀式，來發展一個旗的崇拜（cult of flag）之企圖。但是，全世界沒有公民，比他們對於一切種類的愛國象徵，有更大的興趣，因為他們不特對於國旗自身有極深的興趣，就是每一個州的旗，它們的軍旗以及它們的紋章，都能吸引他們極大的注意。有沒有一個任何大的百分比，美國人知道他們州的旗是成疑問的；但在另一方面，對於差不多一切瑞士人，他們州之旗號同他們聯邦的象徵之紅白，是完全一樣熟悉的。只根據這個事實，對於州權的情操，在瑞士之雄厚的力量，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充分的觀念了。在一切休假日中，國旗和州旗都是被揚起的；而後者在數量上，也並不比前者更少或較不顯著。一張典型的繪

書明信片，盛行於日內瓦的，顯示聖彼得大教堂（*S. Pierre*）為慶祝某一政治事件而被點綴的情形。那座色彩不大鮮明的大教堂之正身，是很適當的黑白之素描；但其鐘樓之一，是以日內瓦的旗幟之紅黃煊染的，而另一鐘樓，飄揚着聯邦的象徽之紅與白。然而在瑞士不僅在假日是掛旗的。有一個盛行於全國的風俗，是在一州之一切公共建築之百葉窗上，以油漆繪畫其旗號，組成一個極端觸目的圖案，務使人人對於後者都能熟記。

除旗幟外，地方和聯邦的紋章，也是遍處懸掛而為一切瑞士人所認識的。歷史和公民教科書，通常包含這些象徽之圖畫，並附以其起源和意義之說明。其中有幾個，比如由銳之公牛頭和邇能拉德之兩隻忠心的渡鳥（*two faithful ravens of Meinrad*），它們仍然是飛在愛因賽得能的人民之旗號之內的（*Witch Will fly in the banner of the people of Einsiedeln*），都是從古老的傳說而來的。這個類型的象徽，能在一個很直接的方式內，感動大部分人民。紋章通常是被認為貴族的創立；但雖在該國之民主的性質之下，仍有不計其數的瑞士家庭佩帶它們。由銳和古乃熱斯兩州，有一個完全的國家的系譜（*national genealogy*）。在其他鄉區中，其人民曾世代久居其地，而未遷移，紋章就被每一農家族所具有了。不僅貴族的子孫，就連城市中之商人和工匠階級，都也佩帶它們。顯然在中世紀每一個瑞士人都被人承認有佩紋章之資格。現在盛行着相同的自由，並且還有權利可以隨意改變它們，只要不侵害其他家族被人公認的象徽。這些風俗之性質，雖自由而隨便，但除了比較少數的暴發戶以外，關於在瑞士如此普通佩帶的紋章的意匠之真純性，是沒有疑問的。於是乎對於州的象徽，纔有了普遍的興趣，因為後者，每同家族之紋章是合織的。而後者，是用以紀念家庭的歷史，祖先為國家所建的功勳，使

幾百年以來的家傳，可以永存不墮。

### 服制 (Costumes)

在古老的瑞士之獨特性中，最能引起旅客之注意者，莫過於在一切節會慶祝中，農民所穿的富於色彩的服裝。每一州——其實，在幾個州內，是一山谷——對於男女都有它自己的服式。這些服裝 (Trachten) 當中，有許多是極其美麗的；它們都能使人追懷本地的風俗和本地的歷史。它們也絕不是簡單而不費錢的。它們雖是家婦和鄉村的女裁縫匠之手工，但其材料，時常是豐富的，式樣是複雜的，刺繡和裝飾是厚重的。(註：被瑞士人尊稱為『服裝之母』(“Trachtenmutter”)的虬麗·海爾利夫人 (Frau Juli Heerli) 曾在『瑞士人民服裝』(Die Volkstrachten der Schweiz) 標題之下，印行了載有精美圖畫之三冊 (Verlag Eugen Kentsch, Frlenhof, Zurich) 是關於本地服裝之詳盡歷史研究。第一冊專論瑞士東部；第二冊專論瑞士西部；第三冊專論瑞士西部)。

在經穿和美麗上，雖優於現代的款式，然穿着瑞士農民服裝者，在近百年中，日漸其少了，由於鐵路、商業和旅行者之來到，它們會完全絕跡於節會和賽會、喜宴和宗教的行列，而只成了博物院玻璃櫥中無頭的假人之衣服了。然而較爲新近，曾有過一番反動。必然因爲露天戲劇對於服裝堅持必須同歷史的服束不爽毫釐，也是使大家對於古裝重新發生興趣之一原因。在最近幾年中，曾發生了其他影響。生活透澈機械化的勢力，尤其是從外面世界而來者，瑞士生活中，有些要素，對之頗生厭惡，並且相信只有保存人民的個性，纔能證明國家之獨立生活，因此

這些要素曾開始聯合起來，盡量恢復古代的傳統。

農民服裝之保存，當然不過是保持國家獨特風俗之整個運動中之一部分而已。直到最近少數關初服裝之團體，是純粹地方的性質。然而，它們曾累累設法，鼓勵吸引大衆注意之展覽。比如，在一九二二年，從白恩州各處而來的農民，表出了一個 *Bändtisch-Fest*，它使該首城之有連環拱廊的街道，充滿了高曾祖父、高曾祖母從前穿過的服裝。這個古裝表演的運動，很受了白恩人士之贊賞，所以復於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舉辦過相似的節會。在後一次會中，有兩千農民，穿着該州之古裝，列隊在街上遊行。

一九二二年之農裝展覽會顯證了：第一，瑞士城市的居民，對於服裝的展覽，有很深的興趣；和第二，在極多鄉間居民中，對於古裝仍存着真實的熱忱。所以舉辦該展覽會之財政的目的，對於後面一點，可予以斷然的證明。當時似乎因爲有論列本地方言爲白恩人民性質之明鏡的一本雅俗共賞的書，已被撰著了。不幸，因在世界大戰以後，印費高昂，不能出版。爲這個目的募集款項的原故，農民們，自告奮勇，而使一九二二年之展覽會，達到了功果圓滿之目的。這件意外的事情，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爲在瑞士人自己當中，大家無不公認，在全世界個人類型中，沒有比白恩州的農民，更強硬和實事求是的。或者這種論斷，是使他們受了冤屈；但不論如何，在剛纔所引的那件事情上，他們曾顯示自己，甘願爲一個理想的目的，擔當無窮的麻煩。

於一九二六年，在呂賽爾成立了一個保存服裝及培植民歌之協會，用以替代從前聯絡在這兩個領域中活動的地方團體之鬆懈的委員會，這個新組織之目的，是在使其所代表的運動，有一個全國的規模，和多量中央的



指導，以古裝而論，該會坦白承認恢復它們到百年前盛行的程度，不特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但是，它相信它們能穀並且必須被用，使各種愛國的節日，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和典禮的情調。爲促進這個目的起見，該協會建議，同瑞士民俗社(Swiss Folk Lore Society)對古裝作一番精細的考據，提倡展覽它們的博覽會和賽會之舉辦，並阻止特別精美的古裝之出口。於一九二八年春季開始，它曾從事於一種圖畫雜誌之發行，每期有德文和法文兩種文字，每年共出八期，其唯一的旨趣，在使該運動比從前能享有更多進取的精神和力量。該協會業已達到的相當的成功，可以拿對於一九二九年之夏，在愛因賽得能，在它的蔭庇之下所舉辦的國民服裝會，大家所表示的興趣爲證。它證明是一樁完全欣愉的事件，其中有三千以上的代表，出席參加，並在全國報章，有很長的報道。

在上面已經說過，這種古裝，不特沈重，而穿在身上不覺舒適，並且往往是十分費錢的。該協會並不否認這些事實，所以建議徵求婦女裁縫專家之服務，以便製成一種服裝，使其在樣式上，既絲毫不違古制，在實用上，又完全適合現在的條件。這個新組織，希望在這些不同的方法中，促進凡服膺它的信仰之瑞士人之目的，即「強化地方固有的特性，乃是對於全體人民之一種高尚的服務」。

### 節日(Holidays)

在美國，每年有七、八個國家的節日，是爲全國國民所慶祝的，在其總積上，使營業受了不少妨礙。倘使在這些事件當中，有一件剛巧落在星期日，其慣例，是將公民的慶祝展期至次日（星期一）舉行，於是再將人民的工作

時間，佔去一天。無疑，我們的富庶，是足以使我們能殼耗費這許多節日的，或者，因着極端的專門化，迅快以及我們工業的和商業的生活之神經的緊張，它們實在是不可少的。在瑞士，在另一方面，只有兩個國家的慶祝，其中一個等於我國的酬恩節（Thanksgiving Day），時常是落在星期日的。其他一個公民事件，可以同我國的七月四日相比擬，是一個比較新近發源的事情。在一八九一年八月一日，全體瑞士人民，大規模地慶祝了西委斯，由銳和翁德華登所簽訂的『第一永久聯盟』（First Perpetual League）之第六百周年紀念——該聯盟，乃是現在的共和國之濫觴。自一八九一年以來，八月一日之慶祝，就已成了一個每年的事件，逐年更受人民的歡迎。然而，因着這個辛勤的人民之特性，這個紀念日，雖被稱爲『國家的節日』，但其白日的時間，仍然是用於工作者，只有晚上的時間，是用於慶祝者。有人以爲這樣過節之美德，大部分在於對『職分第一』（*Duty First*）的格言之重視。關於這一層，大家應該記得瑞士的選舉和複決，也都是在星期日舉行的。故此，在瑞士選舉的實際義務之履行，以及國家的慶典之更熱情的遵守，都做到了絕不侵佔人民絲毫工作時間的成績。

八月一日之慶典，在其他方面，雖純粹是一個非宗教的事情，但它是以全國城鄉各地，不論什麼宗派之一切教堂，同時發出的鐘聲爲其先驅的（註：八月一日晚上，各教堂必須鳴鐘，最初是由一八九九年聯邦決議案（Bundesbeschluss）所規定的）。凡曾在白恩或某州之首城聽見過所謂『聯邦之一副發諸音之鐘樂』（Bundesglocken）者，大致是永遠不會忘記那個經驗的。樂音逐漸加深的各鐘之挨次的鳴響，加入了偉大的合唱；空氣和鐘樓及牆壁之堅實的磚石，好像都因它們的震動而顫動了，這樣有一刻鐘之久。當其黑夜臨到時，高山各峯被

野火照明了（Höhenleuer）它們投射其紅光，遍滿於鄰近山谷之深處。在公共的建築和各城市的公園中，在小鎮之方市場上，或在全民大會慣常集會的幽靜鄉村草坪上，一般人民，走攏來聽著名的演說家。在較大的都會中，倘使在當天晚上，請得到聯邦行政委員會中七位委員之一，來作壓軸的演說，就以爲不勝榮幸之至了；而他的評論，只要是涉及目前的話題，就必定會廣泛地在報章上被轉載和評述了。在小城或市鎮上，有低級聯邦官員、州政府中的官員、大學教授、律師和其他急公好義的公民，被邀請到會演說。自然，八月一日的演說之普通的論調，到處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國家的元老們之英勇的事蹟，和智慧之訓誨，被讚揚了；現代的人，被召去同他們媲美，拋棄州和地方的猜忌、語言、宗教和一切其他糾紛。有一個略爲希奇的事實，就是八月一號之慶祝，雖以一二九一年之永久的聯盟之成立，爲其歷史的根據，但它也通常被稱爲『聯邦日』（Bundesfest）。在後一意義中，它乃是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四年之聯邦憲法的慶祝，故此是慶祝反對分離析的傾向之國家的統一。

除了愛國的演說之外，八月一號之慶祝，通常表出一些其他有趣的節目。倘使本地有一個唱歌社，它就會被召來唱國歌，其中之合唱句，是由全體會衆同聲歌唱的。由於人民之天賦的音樂才能和公共學校中所施的優良的音樂教育，這樣的集團唱歌，時常是動人的，有時竟有無上的成績。本地體育會的會員，穿着緊身的白色運動服裝，被邀參加該晚慶祝節目，在彩色的火焰和火箭之光中，表演他們的操練，並堆砌其纏結的金字塔。市政府的和工人的樂隊，也都參加遊藝的節目。在有些城市中，並舉行展覽中世紀各同業公會的服裝、徽章及旗幟之化裝遊行；在鄉區中，許多婦女穿着鄉間如畫的服飾，出來遊行。然而，就全體而言，並沒有可厭的吵嚷的示威，精心磅劃的

或耗費的炫耀。瑞士關於全國的節日，尙未察覺有發起『安全第一』(Safety First)運動之必要，因為危險的和喧嘩的煙火，是幾乎沒有聽見說過的。然而，幾年前(一九二七年)，在白恩有人埋怨在該城之某段，有兒童以爆竹搔擾鄰居。報章對於無法律禁止這樣擾害公共安寧的事件，深覺遺憾。有一個報紙，竟提出了一個極其古怪的暗示，說給兒童以爆竹者，乃厭惡國慶的人，希望用這個方法加以破壞。他種瑞士報章，對於遊樂區域利用八月一號舉辦熱鬧而耗費的慶祝，以吸引行旅之習慣，大加非難。

民衆慶祝八月一號通常所用的方式，雖屬樸實而莊嚴，但仍有許多瑞士人，以爲這種方式，同所紀念的偉大的事蹟和原則，並非完全相稱。在他們的立場，演說、唱歌、體操、放煙火，在其本身並不算壞。然而，在他們當中，沒有一樣能殼，就把它們加在一起，仍然不能殼對於感動一、二九一年的人們的和其後在每個緊急關頭，挺身救國的犧牲精神，手足摯愛和熱誠的精神，表示適當的敬意。爲使這個精神發榮滋長，而永垂不朽起見，只憑洋洋灑灑的演說和恭恭敬敬的跪拜是不夠的。於是在一九一〇年，成立了一個瑞士聯邦慶祝委員會，其宗旨，爲在每年舉行一個供獻禮，以使國慶高尚化。該委員會，每年選擇一兩個團體，負責經管其事，有時是教育的或藝術的團體，但更多是慈善的團體，並籲懇全體瑞士人民，慷慨捐輸，玉成善舉。在國慶前幾星期，就在全國各處，黏貼通告，務使人人注意其工作。同時在各種俱樂部 and 會社之集會中，發言人常約略提及該項提議的捐款及其旨趣。在八月一號那一天，略似美國的『紙片募捐日』(Paper Day)所用的各種方法，被採用了。然而，在他們並無所謂『急切推進』(Drive)或競賽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美國有時使這些慶祝非常可厭。在十字路口、鐵路車站、公園入口及其他公

其場所，白衣女郎和著制服的童軍隊員，站着接受凡樂意輸將者之捐款，以綢質徽章，贈與捐款人以資識別，徽章上印有日期，和常見的紅盾上面的白十字架。

對於該委員會之事業，不僅企圖使本國的公民們發生興趣，就連外賓也務求其贊助。在八月一日，瑞士旅館和公寓之客人，會在其餐碟發見一張募捐的傳單，它是以其三種國語以及英文與和蘭文印行的。其文如左：

自由和獨立之愛戀，乃是聯合我們祖宗的盟約。他們的理想是萬衆一心地對抗艱難和危險。瑞士國慶委員會以爲培育這種同胞的意識，乃是他們神聖的職責。但願我們大家，在我們的國慶日，以實際的善行，顯明我們的團結。一切急公好義的瑞士人，會喜歡幫助我們，而且我們的客人，會以贊助我們的戮力之樂意增光此日。

從一九一〇到一九二六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該委員會，總共募集了一、八二三、〇〇〇佛郎（三、六一、六〇〇元美金）。有一個有意義的事實，乃是在世界戰爭期中，該國的經濟情形，雖頗窘迫，但所募得之款，反遠駕緊接戰事前後之年度。然而，於一九二三年起，捐款總數，再達到了新的高水準。在一九二六年，它們共計三六五、〇〇〇佛郎（七三、〇〇〇元美金）；在一九二七年，到了三五〇、〇〇〇佛郎（七〇、〇〇〇元美金）。在美國的立場，這樣的數目，似乎實在微薄；然而，僅以人口爲根據，美國之類似的捐款，在一九二六年會收到二、一三八、〇〇〇金元，和在一九二七年二、〇五二、〇〇〇金元了。由於瑞士聯邦慶祝委員會之戮力所募集之款項，是專門使用於下列各項公益事業的：爲創立瑞士人民圖書館之用（一九二二年）；爲提倡瑞士少年之體育及經濟教育之用（一九二〇年）；爲在白爾之裴斯泰洛齊新希望基金之用（for the Pestalozzi Neuhoft

Foundation in Birm) (一九一四年) 爲瑞士席勒基金和雕塑術資助金之用 (a sustaining fund for plastic arts) (一九一一年) 爲紅十字會之用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七年) 爲撲滅肺癆之用 (一九一三年) 爲救濟因受戰事影響而感受困苦的瑞士公民之用 (一九一五年) 爲救濟盲人之用 (一九二三年) 爲救濟僑居外國的瑞士貧苦公民之用 (一九二四年) 爲救濟聾啞之用 (一九二五年) 爲救濟年老的窮人之用 (一九二八年) 爲救濟瑞士國防軍之窮苦兵士之用 (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

瑞士祈禱日，或稱其名爲『酬恩、悔罪和祈禱之日』(Jank-Buss-und Betag)之慶祝，其創立之早，遠超八月一日國慶之上。前者係由一六三九年之福音的會議 (Evangelical Diet) 因感謝上帝使其國家得免受三十年戰爭之災禍而制定的一個節日。在一八三二年八月一日，聯邦行政委員會宣布它爲國家的節日，而規定九月之第三星期日，爲守此節日之日期。現在，高級宗教權威，在這一天，照例須發表一篇酬謝節的告示。然而，在幾十年前，該項告示，是由州政較高當局所發出者。因爲這個較老的風俗，瑞士的文學，從幾篇在沮利克行政委員會名義之下，由當時的州書記官，格特弗銳德·客勒主稿的 (in the name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of Zurich, written by the cantonal clerk, Gottfried Keller) 酬恩告示，獲得了無上鴻寶。這些公文當中有一篇，出自瑞士偉大詩人一八六七年之手筆，結束如左：

論到對於我們身體的滋養之照顧，我們應該感謝永生的上蒼，使其恩澤，廣被我們耕種田地的農民之辛勤……但願他再賚予我們以世界和平之保持，以便我們辛勤的工作，得結果實，而使千萬的工人，得再享受恆

久的雇傭。但是，不論將來有何事變，我們祈求各種恩澤之施予者，施予我們一種恩惠，就是在艱難和困苦的時間中，他不使一個階級，在仇怨和反控中，攻擊另一階級，而使人民之一切階級，他們原是彼此相需的，將在統一中，互相維護與輔助。

我們可否以全備的道德和精神的健康之感，膽敢立在全智者（All-Wise Being）之前——親愛的同胞們，那是必須以一種熱誠的內心檢舉作答的，倘使我們不願意在我們政治的機體上，成爲死的肢體，我們就必須在一切事情之上，來作這個檢舉。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籲懇上帝，給我們以明亮的眼睛和能力，去連根拔除卑鄙的自憐、自尊和自樂（to uproot gross self-love, self-praise, and self-interest）。

但願上帝賜給我們能量，使我們能將在簡單和禮貌中之家庭生活，適應於我們的公共生活，以便後者能有健全的和繁榮的發展。

爲達到這個目的，但願他賜給我們一個公道的、正直的心和輔以習於自由的人民之尊嚴和沈靜的能力，以便對於教會、學校和我們整個公民的生活之永恆的進步，去籌謀並實行所必須有的事情。爲達到這個目的，但願他使我們有在真理中的堅決、勇敢和良心；但願他保護我們，脫離永遠不能結善果的罪惡的情慾之怒發。倘使我們也能設在我們自己身上，發展我們至高無上的先師基督的那些美德，於是協力使祖國更加豐富，那末，我們對於它的保護所作的貢獻，就不啻以鐵的武器所作之貢獻了。

親愛的同志公民們！我們求你們在快到的祈禱日，同你們在上帝裏面的一切瑞士的弟兄，一道懷念他的

無窮的愛，從其中吸取那人類的愛，只有它能够使甚至自由的人們之生命可忍受。

因着格特弗銳德·客勒有過一個較早的經驗，所以我們能設在瑞士祈禱日的告示中，看出自由之界線。這樣的公文，因為是告全體民衆書，自然必須是普遍的訴請，避免爭議的題材和太淵博或太高深的事情。爲着上述種種理由，詩人爲一八六二年所草擬的告示，沒有獲得沮利克之行政委員會之批准；但是，在文學的立場，它是他關於守祈禱日所寫的絕好的文章。關於新近的法律，准許了猶太人享受公民權利，而除去了自古加在他們身上之歧視，客勒在爲那年起草祈禱日的文告中，曾向州議會和人民道賀。他曾因我們自己內戰的光景而心碎；所以對於那巨大的鬭爭，曾加入了一筆感人的敘述。他大着膽量，不但請求教會謹守此節日，並且請求不贊成教會之公民『在享受他們的良心之自由上，他們不應該將這個自由，用於喧囂的遊戲，而應該在靜穆的集會中，表示他們對於祖國之敬意』。其文章之頂點，是在下列達觀的但不大孚衆望的文句中，被達到的：

倘使在我們聯邦政府內，建築歷史之偉大師匠，實未成立一個完全的計畫，而不過一個小規模的企圖，類似一個建築者的模型，一旦它不再合他的意，一旦它不再符合他偉大的計劃，這同一的師匠，是可以毀滅它的。自從那個時候以後，它將不再合他的意了，所謂那個時候，就是當其我們不再以剛毅的熱忱，向前奮鬥的時候，當其我們將以未曾嘗試的決心，作爲已成的事實的時候，當其我們對於每逢安安逸逸地表示我們的能力於空談，就願以宴享之樂，犒賞我們自己的時候。

自然，並非一切瑞士祈禱節文告，都是經過格特弗銳德·客勒之天才渲染的。或者在一國的歷史上，平常屬



於機器製造類型的言論，有一兩次變成了純粹文學的形勢就算够了。其實，在新近一個頗引人注意的祈禱節，它們表現了一個黨派的偏見，而激動了不少忿恨。於一九二〇年瑞士天主教之主教們，據說被在教士蔭庇之下所組織的基督教社會工會擬增加其會員之慾望所刺激，在他們的宣言中，插入一個陳述，略稱「凡公開擁護社會主義爲一個制度而服膺其基本的主張和主要的宗旨者……就缺乏對於聖禮之有價值的接受之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了」(“lacks the prerequisite which is essential to the worthy reception of a sacrament”)。自然從被侵害的政黨之撰著小冊子者，馬上發出了激烈的答辯。然而，這可算一個單獨的例外，因爲現代的祈禱節公告，是避去了諷刺或驚人耳目的事情的，而是以純粹習慣的方式措詞者。但是，它們都表現着一種以宗教思想爲基礎的公民精神——如其名稱中的三項所指示，不特是感恩，也是悔改和禱告之精神。瑞士人也沒養成一種習慣，將這個節日之慶祝，集中於體育場之遊戲或觥籌交錯之宴會。

在國家節日之外，尚有幾個地方的慶祝。按照一九一四年聯邦工廠法，每一個州，可以在一年中，規定八個節日，在這些節日中，勞工應享受同星期日一樣的特權。然而，似乎對於這個規定，大家不大熱心去利用。有幾個由地方所制定的公民休假日，兼有全國和州的性質，例如，當其被紀念的事情，是關於該州加入瑞士聯邦的時候。僅舉這樣的事情中之一件爲例，譬如在日內瓦，每年六月一日，是如此被慶祝的。然而洽洽同八月一日之聯邦節日一樣，該州之勤奮的公民們，整天繼續工作，只留出晚間幾個小時，對於他們加入瑞士共和國之事件，作一個簡單而莊嚴的慶祝。如上文業已提過，這樣的事情之百周年紀念，是更正堂堂地慶祝的。在幾州內，有同本地的傳說或

歷史，略有關係之宗教的節日，但這些節日，僅對於各該教會的分子有束縛力。此外，各州對於特殊的區域，可以指定純粹地方的節日，例如，當其某地方自治區或山谷，願慶祝其歷史上有名的一日的時候。貶抑領袖的顯著而褒揚民衆的服役之傾向，或者是有意義的，因此瑞士人沒有像我們的林肯和華盛頓日那樣的節日。

將一切這樣的事件總算起來，全國的、州的和地方的——仍然顯見瑞士人在節日的事情上，如同在生活之一切其他關係上一樣，是十分經濟的。爲抵消他們有限的公民慶祝起見，可以注意被無數打靶、運動、音樂、化裝以及將在下面提出的其他慶祝所耗去的一些工作時間。然而，這些慶祝，只限於對它們發生興趣之特別階級，而不包括全體民衆的工作之停歇。在瑞士人走馬觀花的旅行者，也不能不在各方面，看出其人民之極端勤奮之證據。城鎮和鄉間，都是一樣的整齊、清潔，被人謹慎愛護的；每一苗青草，都好像是天天被人洗刷梳理過的一樣。城市的書記和工匠都是逐漸喜歡節日的，而且樂意多有幾天節假，但在寫字檯上或在工廠裏，他們是有恆心的工作者。至於業農的人民，倘使天氣晴朗，就不論什麼節日、慶祝，甚至星期日，都必定不能假使任何男人、婦人或小孩放棄田地上應治之事。

## 第十三章 崇奉——射擊術健身術唱歌和音樂會社 (Culta-Marksmanship, Gymnas

ties, Singing and Musical Societies)

### 射擊術

在瑞士，有三種崇奉，會有非常的發展——射擊術、健身術和音樂之崇奉。每種都有地方的、州的和全國的組織；每年每種都舉行幾次盛會，其特點，為精心壁劃的儀式，和轟轟烈烈的競賽，於其中，贈予優勝者之獎品，其所代表的榮譽，比其本質更為人重視。既然這三種，都吸引了這樣廣泛的興趣，不必說熱情，所以難於決定，究竟那一種，在民衆的心理上，有最大的把握。然而，射擊之崇奉，是瑞士人最大的特色，而且是唯一的崇奉，在其中，他們的傑出，是最無疑問的。在健身術和音樂中，他們都達成了赫赫的成績，但這兩種崇奉之組織和方法，大致都為德國人所共有。

威廉·退爾 (Wilhelm Tell) 之出類拔萃的藝術——就是瑞士人了解的非常透澈之藝術——和這個藝術使他成功的事業，都一樣是他所以受他自己的人民之愛戴的原因。然而，瑞士人對於弓箭之愛好，遠在他們民族的英雄時代之前。在十四世紀之末葉，射箭者之協會，業已發現於沮利克、呂賽爾和他處，以聖安妥尼烏斯 (St. Anthony)

Antonius) 和西巴斯田 (Sebastian) 爲其祖師 (patron saints)。以弩和矢，其後以手鎗、火繩鎗、毛瑟鎗和來復鎗 (with cross-bow and bolt, later with hand gun, arquebus, musket, and rifle)。射擊之演習，曾被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直到我們自己的時代。因着如此，所獲得的技巧，加上其他真正軍事的品格，所以在古時雇傭兵的時代，瑞士的新兵，在鄰國君王的軍隊中，是最受歡迎的。

在十八世紀中，當其政治的腐敗和解體，使其國家降落到極其衰弱之地步的時候，射擊術之演習，到處都被人放棄了。法國的干涉，激動了其人民，使他們覺悟了他們的過失，於是在十九世紀初葉，各地方對於射擊俱樂部之組織，又如雨後春筍了。這個崇奉，在其新的形式中，就不只是一種遊戲；它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之色彩，這是無可諱言的 (it was avowedly, aggressively nationalistic)。於一八二四年，在愛羅 (Aarau)，該國一切地方組織聯合而成立了瑞士射擊會 (Schweizerischer Schützenverein)。該會的章程，第一條陳述其宗旨如在：

本會的宗旨，在使我們公民的聯誼更多一重維繫，借着統一和更親密的友情，增加祖國的力量，同時按照我們每個會員的能量，對於射擊的藝術之促進和改善，求作相當的貢獻，這個藝術，不特在本質上是美麗的，並且對於聯邦之國防，有極高的價值。

該時期的一切史學家，都承認這個射手之全國的組織，在其目的之實現上，是成效卓著。自從一八二四年以來，射擊會期，不特是地方的和區域的，並且也是全國的，都是準期舉行的。當其聯邦的觀念，尚被分權者旁礴的勢力和各州猜忌的獨立所埋沒的時候，這樣的會期，就成了『瑞士國家情感之真實的育種場了』。『這些瑞士的

集會」一位當代的評論者說，「對於人民之愛國心，有一種傳電的效力。凡同它們有關的事情，其用意都是在好像用魔術，將瑞士人團結起來，成爲一個國家」。有一個有意義的事實，乃是在我們所考慮的時期中，射手之組織慣常應用紅底白十字爲其旗幟。直到一八四一年，後者纔正式被採用爲國家的象徵。

在一八三四年七月九日，少年格特弗銳德·客勒，被沮利克的學校開除了。三天以後，在該城所舉行的第一次聯邦射擊會期，准許公衆自由參觀。這位將來的詩人，當時僅十五歲，因無事可作，遂此極大的興趣，去觀察該會的程序。最令他醉心者，乃是該會期之鮮豔的色彩和歡欣的喧嚷；或者其所含蘊的思想尙在其次。在射擊公園之中心，高聳着『自由之樹』(tree of freedom)，有一百五十英尺之高，在其頂端，飄揚着一面巨大的聯邦旗。甚至向羣衆售賣茶點之餐館，都以『統一』和『忠誠』爲其商店之名號；到處都飄揚着紅地白十字，到處牆壁和拱門，都貼着愛國的格言。對於年少的客勒，在沮利克所舉行的第一屆聯邦射擊會期，乃是一種興趣之萌芽，這個興趣，命定要與年俱增，而於十年後，在他的一首最美的短詩中，開成豔麗的鮮花。由於那個光榮日和其後歷屆類似的光榮日之經驗，我們得着一部可喜的小說，Das Fährlein der sieben Aufrechten。對於在一八四八年所採行的聯邦憲法之次年，在愛羅所舉行的全國射擊會期，它提供了一幅生動的畫面，並且對於凡有志研究該項儀式者，仍然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

跟着瑞士射擊會，於一八二四年成立以後，該運動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它現在包括四千零二十個被承認而領津貼的俱樂部，在一九二九年，它們從聯邦政府所受的津貼，共計三、五二八、〇〇〇佛郎，全體會員共計二十

九萬人。在其陰庇下，來復鎗的演習，不斷地進行着，但在該會會曆上，最令人望眼欲穿的事件，乃是它所舉辦的射擊會期，尤其是照例於每三、四年所舉行盛大的全國射擊會期。於一九二四年，該組織之百周年紀念，是在其發祥之城，愛羅，以一種煞費苦心的規模被慶祝的，參加比賽的會員，約計五萬。一千二百五十白恩的射手，穿着其州之歷史的服裝，從首都護送該會之總旗至會期的地址。三位聯邦行政委員會的委員，聯邦總統爲其中之一，在盛大公共集會中，出席演說；有一部特爲該紀念會所編的愛國戲劇，接連上演了九次，每次有六千觀眾。在專門技術方面，因着改進的鎗彈和其增準度的新兵器初次的使用，而使愛羅之會所創新高記錄，吸引了特別的注意。最近一次的瑞士聯邦射擊會期，是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至二十八日，舉行於貝林若拉（Bellinzona）者，它的每場比賽，從第一場到最後，射手王之加冕（*final crowning of Marksman King*），在全國各處，是以極大熱忱被人注意的，足見這個國家的崇奉之魅力，正方興未艾哩。

瑞士射擊會之純粹自願的活動，在結果上，對於該國男子之軍事訓練，是一個重大而有價值的貢獻。信任其陸軍足以擔任國防之一主要的理由，乃在於它所包含的一個很大百分比之狙擊兵。因爲缺乏經費的原故，如上文已說過，瑞士有一個非常短促的兵役期。當然一切新兵，都必須經過射擊的訓練；但幸虧人民對於射擊之熱戀，在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其後的歲月中，犧牲他們自己的時間和金錢，繼續作射擊之演習。聯邦政府，雖亦給予財政的幫助，但其數甚微薄。凡遵照官廳規定以建築來福鎗打靶場之各地方，得受少許津貼，凡遵守政府章程之射擊俱樂部，亦然。自然，軍政部之規定，凡隸屬於國防軍（*Landwehr*）之兵士，每年至少必須射擊三十鎗，而達到某

個射擊標準，將一個強制的因素加在這件事情上了，並且也是瑞士極多射擊會之存在之一部分的原因。

人們以爲一般人民的興趣，既然有這樣大的一部分被吸收於射擊，就會培育一種黠武的精神。這種疑慮，很少事實之證明，雖社會主義者和反戰論者，有時以這個理由批評射擊俱樂部 and 會期。在事實上，射擊集會之遊戲的和社交的要素，在參加者之心理上，顯然是佔優勢的。對於瑞士人，愛好和平和善於使用兇器，是可並行不背的。這些在表面上似乎是冰炭不相容的觀念之調和，是以在愛維所暨紀念全國射擊會在該城成立之石碑之基地上所鐫的文句，堂而皇之地表出了：

Mit Morgenstern und Hellebarden

So zogen einst die Väter aus;

Mit blanken Stutzen ziehn die Enkel

Zum frohen Fest, zum blut'gen Strauss,

Wann kommt die Zeit, wo nur mit Waffen

Des Geistes wird gekämpft verdur?

Wann Freiheit, Toleranz und Liebe

Die Herrschaft führen einst auf Erden

持着釘棒和戰斧

我們的祖宗在他們的時代向前邁步。

執着放光的來復鎗他們的後裔

去赴歡宴，去赴血戰。

什麼時候纔有朝一天

我們只以理智的武器去交戰？

那時自由、友誼和容讓，

最後將以其當然的地位盛行於世界之上。

決不放棄聯絡感情之機會，確實是瑞士的射擊之特性，如他們的其他遊戲一樣。每個俱樂部，至少有一個房間 (Schützenstube) 爲展覽戰勝紀念品和會員集會之用。在幾個大都會中，射擊的組織，置有精美舊式的房屋，其裝修是根據其旨趣而特具風味者——譬如，白賽爾射擊組織所佔之房屋，是建於一四六六年的，時爾西 (Schützen) 的組織之房屋，則建於一五一四年。然而，超過一切之上的，乃是各種會期，將瑞士各地之競賽隊，皆萃於一處，其中相處，莫不以融融的友誼爲基調。同各隊隨行者有組織之過去的好手，和少年的助手，許多業餘的隊員和熱心的旁觀者。在相伴的儀式上，有許多演說，無數奉觴頌祝，許多情感橫溢之精神，以及聯絡交錯於階級、州和宗教的畛域間之友誼。在射擊的集會中，如此培成的聯誼，如同在健身的和音樂的會期中所作成的友誼一樣，在維繫全體瑞士人民之集體的利益上，佔着不可輕視的地位，這是毫無疑義的。



有一個注目的事實，就是瑞士人民之和平觀，雖是不容否認的，但在今日世界各文明國家中，沒有比在瑞士可常看見更多著常服者在臂膀下挾着來復鎗往來着。必然，沒有一個國家，在破壞每個星期日早晨和下午之清靜的射擊比賽中，有如此同時隨處存在之辟拍的鎗聲。一旦敵軍壓境，射擊術雖爲有用，但瑞士人練習射擊，大多別有用意。他們承認它對於筋肉之發展，不及健身的練習。在另一方面，他們指出一個善於射擊者，如欲出類拔萃，就必須具有身心完全的鎮靜，而這種鎮靜的功夫，只能從不斷的訓練和嚴格的紀律中得來。尤其是射擊術之極端的靈敏和不能差以毫髮之準度，使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覺得醉心，正如他們被最準的錶和經線儀之製造所醉心一樣。對於他人，它是純粹的遊戲，具有團體之一切的競爭，和比我們自己的壘球，有更多個人的競爭。在其遊戲的本質上，它的熱心家，完全看不起足球，惟恐後者之新近的時髦，會勾引射擊俱樂部之青年會員，捐棄國家古老的遊戲。倘使戰爭永遠絕跡於人間了，瑞士人仍然會因對射擊術本身單純的愛好，而永遠繼續演習它了。

### 健身術

幾百年以來，瑞士人曾致力於身體的操練。薩文黎（Zwingli），一個很實際的神學家，曾於十六世紀極力鼓吹應用它們爲教育的方略。一個山國中的生存競爭，雖時常必須是嚴厲的，但在瑞士，它從未足以吸收人民之一切富有的能力。本來，他們主要的體操，是簡單而不拘泥——跑、跳、擲石和角力。在後一種遊戲中，瑞士人早已發展了一種爲他們所特有的形式，名曰急旋式角力（Zürcher Ring）。這個名稱，最爲得體，因其規則，准許每個競技者抓

牢其他競技者之衣服，其結果，有時使他們當中之一人，高舉其他一人，而將其全身在空中急旋之。在急旋式的角力之外，瑞士人也練習在其他歐洲各國所通行的角力。

在舊式的亞爾平遊戲上，競爭時常是劇烈的，甚至僅爲一個單獨地方的牧人演習時。然而，在代表一切山谷的競賽隊之會集中，其劇烈的程度，就更遠超平常了。在這樣盛大的集會中，山中各村的撰手交手了，不僅想在個人的力量和技巧上，同他人見高下，並且也想爲他們自己的地方在雄偉的力量、技能和耐久力上，博得超羣出衆之榮譽。這些農村運動會之一，就是在基龍（Zürich）畫布上，傳諸萬世的景象，該畫現懸於白恩美術博物院之巨大的樓梯之頭上。農民和牧人之運動會，有很古老的歷史；第一次的角力和亞爾平會期是在一五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的，參加者，爲阿彭色爾各處之選手。法國革命和其後之干涉期，似乎曾暫時鎮壓了瑞士精神之一切正常的表示，自然包括運動競賽。然而，早於一八〇五年在暗斯彭命（Unspunnen）所舉行的盛大牧人的會期，在本國的遊戲上，恢復了一些興趣。在一八一五年的盟約之下（Under the Pact of 1815），反動的勢力，籠罩着瑞士一切的事情。爲反抗當時之守舊的精神起見，白賽爾、白恩和沮利克各大學之學生，於一八一九年組織了進步的（Freisinnige）會社，在其綱領上，身體的發展，居於首位。瑞士之現代的運動，是肇端於這些學生組織的，這些組織，在目的上是半屬政治的和半屬運動的。對於嚴肅的遊戲之熱忱，導源於學術團體，而普及於全國的少年，分部林立於各地，而於一八三二年，成立了聯邦運動聯合會（Fidgenössischer Turnverein）。

自從聯邦運動聯合會成立以來，該項運動，在瑞士之歷史在數量上，在精神上以及在所從事的運動之形式

上，都是一部不斷的擴充史。在一九二五年，已有二十三個會社，包括一千三百九十七個地方分部和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會員。在後者，有四萬人是活動的分子，其他是老手（*veterans*），他們仍繼續對於運動發生興趣，並繼續出席各種運動會，雖他們不再能參加較為劇烈的遊戲。一個新近的發展，是普及體操的熱忱於全國婦女界。於一九二五年，她們的會社，隸屬聯邦體育聯合會，業已有了二百六十四個地方分會，和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七個會員。她們致力於健身的和舞曲的舞蹈，成形的姿勢，活人圖，希臘動作，闊帶操練，棍棒之急旋以及他種較輕而較優美的運動操（*gymnastic and ballet dancing, plastic posing, tableaux, Greek movement, evolutions with scarves, club-swinging, and other higher and more graceful forms of athletic exercises*）。

雖多數體操集會，是撰擇夏季為開會日期的，但許多分會的事業，最近曾被擴充，以便包括用滑冰履溜冰（*skating*）、用冰鞋滑走（*skating*）和他種冬季的遊戲。在聯邦運動聯合會蔭庇之下，全國各分會，開辦了許多預習的科目。現在受這樣教育之青年，有兩萬，這些科目之旨趣，當然是專為訓練這些青年們將來可作聯合會之正式會員。在公共學校中，對於從極低的班次起，所有的兒童，所施的系統的體育，對於瑞士人在運動遊戲及其組織上之近於普遍的興趣，也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在瑞士之一千四百地方運動分會中，時常進行着緊張的系統的操練，但也並不過分緊張，因為時常有音樂和唱歌相伴着，並有無數快樂社交的機會。然而聯邦體育聯合會所主持的最莊嚴的事件，乃是在各處時常舉行的運動會。地方的、州的和全國的。沒有一年沒有在某區所舉行的運動大會，將數千運動員和數千運動宿將，

與熱心運動者聚於一地。譬如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至二十日，在日內瓦所舉行的羅曼德暨國際運動大會（Fête Romande et Internationale de Gymnastique），列入競賽名單者，有五十五個男子分會，和八個女子分會。幾個鄰近的法國城市的分會之參加，使該會有了國際的景象。然而一切區域的運動會，同每三年在該共和國之一大都會中所舉行的隆重的聯邦運動會相比擬，實在就卑卑不足道了。從瑞士各處火車站所開出的定備列車，載有大羣運動選手和熱心運動遊戲者，齊赴這個真正全國的盛會。在日內瓦所舉行的一九二五年聯邦運動會，參加競賽的人數，超過一萬八千人，須有一百五十位評判員，纔能評定他們的成績。須有六個整天（七月十六至二十一，首尾在內）纔能完結所有的節目。它是以一部『會期的戲劇』開幕的，描寫從古時到現在體育之發展。會期之愛國的性質，是以在每屆全國運動大會舉行的一種儀式所表現的。將該共和國之總旗，從白恩護送到開會的地點，以及該地官憲舉行迎國旗的儀式，而於開會期間，負責保護。在晚間的宴會中，聯邦總統哈柏林居貴賓之首座，並發表演說。

在該會期之更公開節目之中，在那廣大平坦的運動場上，擠滿了從事於無數競賽節目之白衣運動員。會期節目，分爲兩大類：國術和美術體操（National and Kunstturnen）。國術體操節目，包括跳、擲石、擲石、兩種角力等等，參加比賽者，爲高大的運動員。美術操，是在大鞦韆上、雙槓上、或懸環上（on the trapeze, parallel bars, or suspended rings）表演的，主要的評判，是以其困難、聯合和伎倆之美爲根據的（on the basis of their difficulty, combination, and beauty of execution）。近年來，另有一個第三類，名曰『輕運動』（"light athletics"）

者加入了運動項目。它是以瑞士人所首創的舊式體操爲根據的。此外尚有各種專門運動：跑、拳術、劍術、游泳、舞蹈、木棒操、鐵條操、球戲。一想起瑞士的體操家，就不能不聯帶地想到他們所最喜歡堆的人體金字塔了。因其優美的景象，所以金字塔之表演，是在夜間用射光點或彩色火焰照射着一山富於危險的均衡之骨肉演出的。茲引約翰·亞丁頓·賽孟執（John Adington Symonds）之描寫於左：

「對於一個審美的看客，會期之壓軸的節目，乃是當其成千成萬的運動員分行分部地，被高舉排成陣式來表演他們普通的操練。這些操練，包括各種動作，將四肢逐一地動作，而表現身體之全部筋肉的氣力。廣場被人山蓋蔽了，其中每一個人的活動，是按照音樂的節拍，同雄偉的人山協調的。這場表演，半點鐘纔告終了，而更佳的體操，是從未見過的。其形勢，不像檢閱式中大軍行經將臺或轉變行列以成方陣時，所產生的排山倒海之印象。但對於塑造的美，對於姿勢之千殊萬異，對於在曼妙動盪的體形中之和諧的節奏，它超過了我所知道的任何美景。」

如上面的描寫所昭示，在美國的運動活動，和瑞士健身的操練中，有迥然不同之處。對於我們，遊戲是一種單純的事情；我們頂喜歡看比賽的隊伍之粗暴的鬪爭，而對於優美或塑造的美之表示，不大感覺興趣。對於瑞士人，在各種操練中，務求有審美的印象，而又能欣賞這種印象。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有組織的遊戲（organized game）很少興趣，雖足球比賽，最近業已開始吸引民衆的注意。我們遊戲；他們操練。我們比賽團員合力之遊戲，而頂喜歡看見羣的方略所不能避免的偶然的不幸事件。如同在多數瑞士的事情中，教育的方略，是顯而易見的；他們

在遊戲中所求者，是訓練而非嬉戲。他們操練而不斷地操練，對於敵手之驟然的襲擊，是毫不為動的，直到他們精疲力竭了錯綜的操演之伎倆，或人體金字塔之堆砌。大多數瑞士的比賽，是在兩套或多套各自演出的表演間，而不是在對抗的兩隊之間。他們雖確實歡喜鬪爭，但非團體間之鬪爭，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鬪爭，比如打拳、擊劍、角力和急旋式角力。

瑞士與美國的運動間之第二顯著的差異，乃是在於參加者和看客之相對的人數。我們使遊戲專門化，使專業的和半專業的小隊，彼此對抗，而使極大的運動場（arena）坐滿了肥胖的和軟弱的看客。在另一方面，瑞士不能以一個單獨的運動場，誇耀於人前，但它有上千成萬的體育館和遊戲場（gymnasien und playing-fields）。它比較美國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拿運動訓練它的民衆。他們在成熟的年歲中，一直繼續着身體的操練。倘若不因為缺乏遊戲競技之精神，似乎可以確定地說，他們會久已發見了高爾夫（golf）球戲，繼續欣賞它，直到爲老年所壓倒爲止。不論如何在運動會場上所看見的古老的瑞士人之羣衆，無不都是『運動迷』（sportsmen）而已，乃是運動的宿將們，因着他們自己，先前參加運動之經驗，他們更能欣賞他們所看見的比賽中之精微的技巧。

瑞士之運動的組織，支配着一個堅強統一的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它們貫串了階級、語言和宗教之一切隔離的界線；它從每一個城、鎮或寫遠的山谷，召集了全國的青年，而使他們在一個共同的熱忱上，結爲一體。在一生最容易受感動和最富於同情的階段中，所結成的友誼，這個友誼，雖極不像彼此打得落花流水的競賽者間之情緒，但能發展爲永久的聯誼，不僅限於情愫之融洽，也包括經濟的、家族的或政治的利益之結合。銀行家的或貴族

家庭的公子少爺，同城區中之書記和工匠，混在一起；在運動會場上，他們同屬於鄉區的農民和亞爾卑山的牧人相比賽，同從一個州立學校中的青年們相比賽，或同大學學生預備要作工程師、醫生、律師、大學教授、牧師者相比賽。大家是在體力和技巧之共同的基點上，見高下的；金錢、階級或門閥，是毫無勢力的。

瑞士人慣於側重其公共學校和軍制中之民主的紀律。他們大可將其運動的組織，也列於其表中。後者，在其會員的人數上，當然遠不及前兩者之普及；但在另一方面，在其自願的性質上，和在愛好遊戲者中所吸引的熱忱上，它是強於它們的。在消極方面，有一個有力的證據，顯示運動的活動，在培育國家的精神上之效力，就是天主教和社會主義的政黨，最近要專為它們自己的黨員，設立體操的組織之戮力。不消說，這樣的企圖，是為一切贊助聯邦運動聯合會者，竭力反對的。一般人莫不承認，瑞士之體育俱樂部，培植合作與紀律的精神，對於公民之身體的健康，有重大的貢獻，協助公民對於工業之準備，倘使必要，使他們對於國防，也有相當的準備。

### 瑞士之青年運動

因着在每個兒童之學校生活上，成爲一個極快愉的部分之極多的遠足，令人不解青年運動，及其對於較長的徒步旅行之鼓吹，爲什麼在瑞士有如此遲晚的發展，而至今尚乏長足的進步。在德國人中間，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它的發展是迂緩的，其後竟一變而成了一個首要的國家的崇奉。德意志新共和國之第一流的政治家，不僅承認了它在文化的意義中之價值，並且也承認它可以抵消由世界戰爭和封鎖而來的體質的退化。在瑞士，贊助該

運動者，當然不是被後一動機所影響的；兼之，其全國的青年，久已非常透澈地被組織於非政黨的和政黨的體育會社中，所以提倡使用體力之新組織，似乎沒有插足的餘地了。然而，或者各種運動會之形式和典禮，曾被做得稍微過分了；不論如何，較比隨便的青年運動，在瑞士之新近的發展，如第九表所示，昭示它或者就要有長足的進步了。

第九表

年	度青年安身處過夜的客旅	年	度青年安身處過夜的客旅
一九二五	三五	一九二八	一四四
一九二六	八〇	一九二九	三〇、二〇九
一九二七	一一〇	一九三〇	一七七
	一三、七四三		

瑞士的運動之青年的參加者，大致是摹倣其德國的弟兄和姊妹的；為行路方便計，盡量少穿衣服、少攜行李，只要他們閒暇的時間，許可竭力從事於步行，倘使氣候適宜，就在露天過夜，否則借宿於其同盟所設置之簡陋的安身處，而同在路上碰遇的，從每個社會階級和本國及鄰國各處而來的過客（wanderer），暢談關於一切青年所最心悅的話題。偶然，有人說他們對於坐在奢華的汽車中，風馳電掣飛過他們身旁之肥胖的旅行者，懷抱着無上的藐視，而且對於主日學校的哲學（Sunday-school philosophy）或沾沾自喜的中等階級之觀點，很少同情之感。最糟的，據說他們願意聽信他們偶然碰遇的任何主義——經濟的、政治的、神學的或道德的——之路旁



宣傳者。

自然，這樣越軌的行爲，是不會逃免社會的柱石之擠斥的，後者，因爲年紀大，所以識見高。直至今日，顯然像在德國發生過的性慾的醜事，尙未污損過瑞士青年運動之記錄。然而，長輩中之腮腮過慮，惟恐它要被過激的政黨所管領，未被否認的事實，爲社會主義的宣傳者，對於這個運動頗感興趣，倘使遇着相當的機會，參加這個運動之青年，絕不猶豫，諦聽這些宣傳家之宣傳。由於在組織他們自己的青年遊戲、戲劇和教育會社中所得的經驗，該黨之領袖們，據說能比他們的敵黨，更圓融周到地接近這些過路的客人。在另一方面，中等階級的政黨之代表，甚至天主教保守黨之代表，在主辦青年安身處之全國和地方委員會中，是同過激黨共事的，而他們也並不猶豫去同參加的青年們，宣傳其自己的政治主張。

瑞士青年安身處之同盟（*Bund Schweizerischer Jugendherbergen*），在答辯批評中，大致是從保守黨方面來的批評，最近發表了一個聲明，抗議該組織是以政治和宗教的中立之原則爲基礎的。在另一方面，它坦白承認，累次有些青年會員的團體——這些團體在趨勢上，有時是過激的，亦有時是反動的——曾圖謀使地方的青年安身處，變成它們的勢力範圍。

『這怎樣免得了呢？人類是有過失的，青年們又何獨不然。這與本同盟的本身何傷？反之，我們以爲各種不同的運動和政黨，在我們中間，應當正大光明地互相反對，這是非常健全的事情，值不得大驚小怪。』

在結論上，瑞士青年安身處之同盟，籲請具有一切政治色彩的公民們，大家都來同它合作，如此，該組織之本

身，以及他們各人的主義，都能兩全其美了。

### 唱歌和音樂會社

歌者和樂人，同競技者與射手一樣，對於瑞士之聯邦的思想之培植，曾作過重大的貢獻。他們在全國各處，是組織於會社的，而這些會社，都頂歡喜參加各種慶祝典禮和比賽。他們時常上高山去作快樂的旅行，和他們同行的有本地的清客和年老的前輩，後者的嗓音已衰，但對於音樂之愛好，尚未因年邁而稍減。新聞紙對於音樂會期、合唱和一切旅行（Ausflüge）之記載，是詳細而長於鑒識的，顯示它們所激起的廣大民衆的興趣。瑞士唱歌和音樂會社之美名，是洋溢乎各鄰邦的。被邀請爲賓客時，他們的演奏和歌唱，是騰譽於鄰國各城市的。

對於一年到頭在瑞士所舉行的，不勝枚舉的地方和州之音樂會，期想提出一個充分的記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起駕這一切範圍有限的事件之上的，乃是聯邦歌唱大會，這種大會，是每隔三、四年，在某一大大城舉行一次的。茲舉一九二八年夏，在羅善城（Jausanne）舉行的聯邦歌唱大會爲例。全國各處參加人數之衆，可證之於開會前半年所宣布的名單。當時已有一百五十一個歌唱會社，屬於五大類而共有歌者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人，報名參加比賽了。此外尚有兩個旅居國外的兩個會社，巴黎之瑞士諧聲社（Harmonie Suisse, at Paris），和北美之瑞士男子聲樂隊（Schweizermännerchor），曾通知了他們，準備參加盛會的意旨。爲後者之會員及其眷屬親友之方便起見，曾從紐約特別爲他們包定了一隻海輪。對於聯邦歌唱大會之盛況，於此可見其一班了。

另有一個全國大規模的音樂會，是值得特別一提的。每三年在某一瑞士城中，要舉行一次聯邦音樂大會，全國各處赴會觀光者，非常踴躍。第十八屆聯邦音樂大會，是於一九二七年夏舉行於拉·雀·德·芳職城（Chaux de Fonds）。該會所採取的方式，是接着幾次演出羅西尼之歌劇「威廉·退爾」（Rossini's opera, Guillaume Tell）。參加表演者，為一個本地的樂隊、六個歌唱社和三個體育會。

在本書前面，曾累次指出音樂、體操和射擊之崇奉，在已往和現在，瑞士生活上之統一的影響。音樂常被入稱為大同的語言（universal language）。在諧調之共同欣賞上，它將講法語、意語和德語的人民，團結一致了，於此可以證明它確然曾在上句之意義中，為瑞士効勞到一個很真實的程度。在體操和射擊上之比賽，既然是這樣單純，而具體的事件，所以語言之差異，對於它們之順利的舉辦，也是沒有多少妨害的。故此，它們對於國家的情緒，也作過不少的貢獻。這三種崇奉，都是同生意昂然的色彩，和賞心的樂事之社會的氣象相聯綴的，所以它們的統一之效力，就更加強化了。如此陶成的聯誼，不僅在瑞士國內可以看到，就連在外國，凡有多數瑞士人民僑居的地方，更容易看得出來。這些瑞士僑民，必定會將他們自己組織於射擊會和運動聯合會，於歌唱和音樂會社。在瑞士或者會使他們彼此隔閡的宗教、語言、政黨之黨籍，以及社會的地位之差異，在一個外國的環境中，都被拋入九霄雲外了。使瑞士旅居外國的公民，終身念念不忘祖國之情調者，乃是這樣的聯絡以及其本鄉所珍視如國寶的各種崇奉之欣悅的演習。大概就由於這些聯繫，他們同故國，保持了親密的關係，規定他們間或返國參加某種盛大聯邦會期之觀光。在每個瑞士人之心理構成上，不管他是習於家鄉或外國生活，愛國情操之大部分，是可以音樂想

像中被表現的，回憶古老民歌之親密的輕快活潑之歌調。在視覺方面，它不僅會同國旗發生聯繫——紅地白十字——也會聯想到緊張的運動者之金字塔，或遠處所看見的靶子上之黑圈，在來復鎗的瞄準上，是界線分明的，在一切的背後而高過一切的，乃是高聳蔚藍的天際之偉大的雪峰之全部山景。

## 第十四章 藝術音樂戲劇——露天戲劇

### 藝術 (Art)

瑞士人被人非難沒有藝術，正如他們被人非難沒有古傳 (Antiquities)。後一非難之虛妄，是易於證明的。至於前者，人們必須立即承認一個褊小而多山的國家之經濟的狀況，是不利於繪畫、雕刻和建築之壯麗的發展的。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中，當然不能有人口繁榮之大都會，府庫滿盈之財富，星羅棋布之學校、美術館和博物院。政治的環境，也曾不利於藝術在瑞士之發展。從十五世紀到宗教改革該國，對於當代的繪畫，確曾有過逾額的貢獻；和爾拜因 (Holheim) 雖非產生於其國土的，但白賽爾之豐富的城市，成了他的家庭和他最大的傑作之背景。然而因新教對於教堂繪畫和虔敬的喻畫 (allegories) 之取締，遂將藝術的養護之一最大的來源摧毀了，其結果，使它於兩世紀中，憔悴而毫無生氣。自然其人民之實質的民主主義，使瑞士的畫家和雕刻家，不能在本國的王侯和內庭寵眷之下得着謀生的機會。在這種情形之下，難怪瑞士未曾產生獨特的國家藝術。

賡續宗教改革之闊淡時期 (penumbra) 中，幾乎所有瑞士的藝術家，都被迫出國，而僑居於意大利、法蘭西和德意志了。吉安·皮提塔 (Jean Peridot)，十七世紀之著名的彩釉師 (enamelist)，十八世紀之廖塔氏兄弟

(Liotard brothers) 和富士里 (Fusli) 和許多其他藝術家都在懷才不遇，因而出國謀生者之列。但藝術家大批出國之空前的記錄，是爲現在講意語的提省諾州所成立的。它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早已開始的。亞若格羅之亞達末 (Adamo of Avogno) 和比桑羅 (Bassano) 之朵諾 (Dono) 於十三世紀，離開他們本鄉的山谷，而就食於意大利。其後，整批的磚石建築匠和建築師，在威尼斯、佛羅梭薩和羅馬 (Venice, Florence, and Rome) 以雄偉的成績，見稱於世了。究竟他們的成就，應該算爲瑞士藝術史或意大利藝術史之光榮，是難於決定的；但是，後者叨蔭於下列諸人者，必定是廣博的客若那之所拉銳 (Solari of Carona)、麻若吉亞之若達銳 (Rodari of Margoglia)、比桑羅之格及尼 (Gargini of Bissono)、米里底之方坦那 (Fontana of Milite) 以及客波乃苟之馬德羅 (Madero of Capolago) —— 以上諸大師，都是出生於提省諾的。這些人，不過是許多人中之領袖而已；專門研究瑞士極南的州，十八世紀之歷史之史學家威斯 (Wiss) 列舉了七十多位出生於該地之建築師，而在意大利享盛名者，推移到較近的時期，雕刻家文生若·韋那 (Vincenzo Vela) (一八一〇——九一年) 是生長而學習雕刻於靠近門垂肖 (Menristio) 之麗各乃托 (Ligonetto) 小村的。韋那之藝術的教育及其藝術的事業，雖承了米蘭 (Milan) 和羅馬之栽培，但他愛國的熱忱甚高，所以曾於桑德本之役 (War of the Tomberhund)，返國從軍。他所贈予聯邦政府之一組，他的作品之鑄型，連同幾個底本，現陳列於麗各乃托這位雕刻大師之舊日的研究室 (atelier) 中，任人觀摩。

過了許多時候以後，直到十八世紀的末葉，繪畫的藝術，纔再開始植其根於瑞士的土地了。從最古的時代，瑞

士的圖畫，就時常能以形成它們背景之庸俗和虛構的，而蓋以白雪的亞爾卑斯羣山來作鑑定之根據。現在偉大山水的畫家，人才蔚起了：亥斯（Hess）、德·拉·銳勿（De la Rive）、代德（Diday）、客乃米（Calame）、白撒德（Barthoud）以及德·繆讓斯（De Meurons）。在十九世紀中，巴色冷迷·門恩（Barthelémy Menn）（一八一五——一九三年），成了該國藝術生活之中心人物。在他的門弟子中，有布克林（Böcklin），希臘神話之神通的諷刺畫家（the weird caricaturist of Greek myths）；西門（Simon），四輪驛車之畫家（painter of the diligence）；以及查爾斯·基龍（Charles Girton），他的大幅傑作（Chief-Peuvre），『聯邦之搖籃』是掛在白恩國議會之議場的。

門恩之最偉大的門人，乃是斐迪南·赫德勒（Ferdinand Hodler）（一八五三——一九一八年），一位真正瑞士大師，或者實在是該國所曾產生的第一偉大的畫家。赫德勒是在赤貧的困境之中，出生於白恩的，他的全部生活，是先為溫飽而奮鬥，繼為榮譽而奮鬥，且說在後一種奮鬥中，在身前，他從外人之收穫，比從本國同胞之收穫為多。日內瓦，他產生大部分作品的地方，尤其覺得難於接受他的粗野的白恩氣派，和他兇猛的筆觸（rudesse bernoise et sa brutale）。在赫德勒的作品中，粗野和兇猛，確實佔着一個很大的成分，但就因為他的手法有這些品質，所以在描寫戰事的繪畫上，他纔能設將瑞士幾世紀以來戰爭史上之一切光榮和恥辱，一一再造於畫面了。他的戰士之多節的身軀，穩定的姿勢，極大的肌肉；淪肌浹髓地是瑞士人，使人一目了然，絕不會誤認。在赫德勒之象徵繪畫上，和在他幾幅風景畫上，其筆觸較為柔和，但使當代的人，最覺不快之剛直的力之挑戰，是很少隱忍

不發的。他的至大至剛不屈不撓的性格，曾透澈表現於他的藝術和他的政治思想，所以他雖屬於條盾的血統，但在世界大戰中，他毫不猶豫地痛斥德國。直到這位大師垂暮之年，他的本國同胞們，方纔開始了解他了；現在他已去世了，尚無人能承其乏，全國各美術館正竭力蒐集他的油畫。在一切公開展覽中，赫德勒之作品，吸引人們最大的注意。

另一位值得特別提出的現代畫家，喬萬利·雪敢亭尼（*Giovanni Segantini*）（一八五八——一九九年），雖出生於意大利，但在精神和生活方面，都是道地的瑞士人。像赫德勒，他的兒童期，也是在赤貧的困境中被煎熬的；然而不像他，他很快就受了人家的恭維和眷顧。雪敢亭尼在一切繪畫亞爾卑斯山的景象（*The Alpine World*）者中，是最偉大的畫家，但他所描寫者，不僅上英格丁（*Upper Engadine*）之大山，雖其研究室是設在其中心的，以連綿不斷的峯巒和雪野之絢爛的背景為陪襯，在一切非常融和的形色之中，他描寫了土地之精英，農民及其牲畜之靈魂——他們是伴侶，也同是不能免死的生物，他們同是從土地所生出，靠土地以資生，而死後仍然返還土地的。在一眼看得見他所了解和眷戀的高山之聖·摩麗智（*St. Moritz*）地方，曾為雪敢亭尼修建了一座祠堂，以資紀念，它迅速地成了瑞士之藝術賞鑑者，巡禮之聖地。在他的繪畫和描畫之外，它陳列着他的最偉大的作品，它同生命的本質一樣廣汎，一套三張接續之圖畫（*triplych*）“*Werden, Sein, Vergehen*”（將來、現在、過去）。

自從赫德勒和雪敢亭尼的時代以來，瑞士就成了極多畫家和筆寫美術家（*painters and graphic artists*）



之永久的家庭了。日內瓦是瑞士西部畫家薈萃之中心，他們專在它的湖上和發賴失的腹地（Valaisan hinterland）之柔媚的風光中，蒐尋畫材。有若干著名畫家，已將白賽爾作了他們的久居之地了，他們的戮力，是為該城所獎勵的，因為它每年撥巨款定畫，並懸賞，而購置這些作品。全國畫家和筆寫美術家最密集的地方，或者是沮利克和沿湖各如畫的村落。從前人家說，瑞士的藝術家，生來就是專作移民之責備，到現在，已經不能成立了。

在繪畫陳列館和博物院的設施上，在最近幾十年中，也有了不少的成績。自然，瑞士所藏的繪畫，都不能同歐洲各大國相比擬。但是，在其四大城中之陳列館內，本國畫家之作品，是豐富的。惟其如此，所以它們業已開始在民衆方面，吸引着生氣勃勃的興趣了，在這種興趣中，不無國家的自尊心理之顯著的成分。白恩和沮利克之藝術博物院中，藏有很多赫德勒之傑作，並時常有新的發現被加入。在日內瓦有一個精美的歷史的蒐藏，尤其是巴色冰迷·門恩（Barthelemy Memm）及其門人之作品。白賽爾之藝術博物院，是以赫德勒之繪畫聞名於全世界的。它也有一個著名的布克林陳列室（Booklin room），以及與後者同時的畫家之繪畫，就中有馬克斯·標銳（Max Buri）之『鄉村的政客』，乃風俗畫（genre）之上乘，而且完全是瑞士的情調。瑞士對於繪畫之收藏，雖不及其鄰國之富，但它藏有數種精美的古物：甲冑、木器、繪畫的玻璃和服裝，這一切莫不充滿着藝術的興趣。這些被保存的古物中之最偉大者，在沮利克之國家博物院中，可以看到，因為它在從各不相同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中，將整個房間搬出，加以保存上有了特別的成功。近年來格特弗銳德·客勒基金（Stiftung Kellers），對於瑞士的藝術，曾予以新刺激。這個紀念詩人之基金使用，在它支配之下的大批私人的捐款，購買瑞

士或外國畫家的作品，於是將它們分配於全國各主要的陳列館。

瑞士人對於各種高等藝術，雖佔不着顯揚的榮譽，但在幾個較低的領域中，他們據有非常的地位。有很少國族，有像他們那樣豐富的木、石和金的雕工——就有許多是以務農爲業的，但在其副業上，仍然是很精嫻的。這些土著的而在本質上是民主的形態之藝術，其培育之原始，即或不在有史的前期，也在最古的時代。『在今日發賴失（Valais）所製的箱或匣的蓋子上，我們發見雕刻的羚羊像，在其動作之概略的強度上，令人追憶獵馴鹿者，在其獵獲物的骨頭上，用尖端所作草率的圖畫。』從這些家常的藝術中，從人與自然最初有意識的和經過考慮的接觸起，在時間的洪流中，發展了那個典型的亞爾卑斯山的居所，瑞士山中的小屋（Chalet）或農舍，誠如羅斯金（Ruskin）之評語，它是具有『美麗的國家特性』（“beautifully national”）。『在任何其他國家中，找不稍微像它的房屋，瞥見它凸出的走廊時，馬上就知道這是溫克銳德（Winkried）和退爾（Toll）之故鄉。』這些堅固的農民家宅在材料、款式、裝飾和傢具上，雖各州各不相同，但完全適合農業生活之需要和變易的氣候之險惡；而且它們罕有不合簡單而大方之審美條件者，尤其是經過了相當歲月，而更覺古雅的時候。

藝術的技巧，是不僅限於瑞士之農區人民的；反之，城市工人羣衆技巧之高，頗足驚人。各種製造精美之紡織物，刺繡、首飾和時計之重要工業大部分的成功，是建立在這個廣博基礎之上的。

另有一種藝術，倘使它也可被稱爲藝術——就是政治的招貼之藝術——在瑞士之發展，是極其遲慢的。一直到世界戰爭的時候，運動選舉的廣告，是不通行的，其形式僅爲候選者之名單，再加上幾句標語，或爲用大字印

刷的冗長的辯論，以便張貼對於牆壁或圍籬任閱覽。就一般而言，這些方法，比傳單或新聞紙上的通告，效力較少。德國的革命，產生了大批的彩色招貼，其中有許多被輸入了瑞士的國境，而在其人民當中吸引了廣泛的興趣。其後不久，比例代表制之加入，遂強迫了全國各政黨，四處尋覓能發感格民衆之新方法。結果，乃是在一九一九年，在新制下所舉行的第一次國會議會的選舉中，色彩繽紛的政治招貼如風起雲湧了。『街道上陳列圖畫的走廊』（“picture galleries of the street”），一旦變成了瑞士的政黨鬭爭之一要項了。

在創制和複決中，招貼也大致是被應用的，特別關於一九一八年之聯邦直接稅的法案，一九二〇年之加入國際聯盟之提案，同年白賽爾和沮利克對婦女參政之表決，一九二二年之徵收資金稅之提案，以及一九二六年關於取消糧食專賣之提案。

他們的政治招貼，大多數在意思上即或不是兇猛的，至少也是強烈的，這與瑞士的政治運動之一般的文雅和溫良，是迥然有別的。它雖常具着誇張、怪誕、幽默、諷刺、惡意或動情之性質，然而其中之傑出者，往往是極其簡單的。它們的輪廓是清晰的，色彩是生動的，而且是用最簡短的文句和粗大的字體以發表其要旨的。對於謹慎的情操之感動，是特別有效的，因為這種情操，或者可以說是瑞士政治心理之最根深蒂固的特性。共產主義，是以猙獰而犯罪的面貌，並在背靜的街道，袖出手鎗，威嚇行人的姿態形容的。從這同一圍籬大腹便便的資本家，高坐在極大錢袋之上，以狐狸的狞笑，注視着過路的羣衆。無疑，這些以藝術引起震駭或厭惡的東西（“*Thickets*”），是不無影響的，但在清醒禮讓的瑞士，它們給人的印象，是斷然不合時宜的。於此應該加上一句主持公道的話，有少數卡

通畫家所用以得票的方法，是對於他們自己的主義之優越的提示，而不是對於敵黨之訕諷。

### 音樂 (Music)

戲劇之愛好，在瑞士人當中，雖是流行的，但音樂和唱歌之愛好，差不多是人人同具的。在這兩種藝術上，他們都有權利要求被人視爲革新者。我們在下面，就要提的露天戲劇 (Freilichtspiel)，最近在瑞士，曾有了一個獨特的和廣泛的發展，更能放射其土地之氣味者，乃是歌以岳得調 (Yodeling)、亞爾卑斯山的角調 (Alphorn) 以及牧人的諧調 (Kühnheiten) 之典型音樂的形式。這一切，都是古老的，實在，關於岳得調和亞爾卑斯山角調的原始之敘述，有動人的民間故事。按照這些誠真的來源，前者，是一種超自然的原始之藝術，最初是由高山草原之精靈的牧人 (hostly herdsman) 傳授予人類的。亞爾卑斯山的角調，通常趨於奇怪的長度，而包括極多的聲音，據說，是一個牧羊的情人所創造，以便同一個在遙遠山谷中的愛人，以音樂通款曲。不管這些不狡猾的故事有多少真實性，岳得調和亞爾卑斯山的角調，必然都是孤立而寂寞的，山居生活之自然的產品。

受過教育的瑞士人，因爲念念不忘他們的同胞們在高深的音樂上之成就，所以不願重視本國固有的諧調。對於他們，後者是頗爲庸俗的，和他們頂歡喜的高深的合唱與合奏的樂隊音樂，不啻有天淵之別。但是，不管他們旅行到什麼外國的地方，都免不了要碰着如此癡笑的請求：『你是瑞士人，自然你知道怎樣唱岳得調？』在他們方面，有些悻悻然，自然因爲禮貌的關係，不便發作，這也難怪他們頗不服氣，想到其含意爲岳得調，是他惟一能唱

的歌曲；但在事實上，一切瑞士人仍然不過是單純的牧人而已。

外國人，把岳得調未免看得過分重要；全世界必然都是把它看作獨特的亞爾卑斯山型的聲調的。然而，不管瑞士知識階級之存偏見的目光，怎樣瞧不起它，它是繼續享受着民衆毫不衰減的愛好的。並且，瑞士固有的音樂，不僅是岳得調，也包括不可勝數的民歌，在陶冶民衆的精神和保存本土的特性上，比音樂大師們精心結構的一切樂譜，都有更大的貢獻：這是決無疑問的。爲着這個緣故，唱岳得調者，成立了一個全國的組織（Der Schweizerische Jodelverband），它業已舉行過兩次年會。第二次年會，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舉行於呂賽爾（Luzern），從若干鄰近的州中，吸引了大羣參加比賽之歌者，和吹奏亞爾卑斯山之角調者。照例，在這樣的盛會中，有極多穿農民服裝之婦女，點綴其間，爲該會生色不少。然而，在某些方面，這件事情，遭受了抨擊，以爲它至少一部分，是爲吸引旅行者而舉行的。

有許多古老的瑞士民歌，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在它們當中，有些是頌揚英雄豪傑之豐功偉業的；有些是爲在鄉村青草地上跳舞用的；另有其他，雖爲教會的當局所禁止，簡直是男女相愛悅時之情歌。跟着公民階級之興起（一三五〇——一五〇〇年），民歌達到了其最高的發展，其後遂降落到比較不重要的地位了。在十七世紀中，它頗有捲土重來之勢，尤其是在社會公共事情上所用之歌體。自十八世紀以來，它們曾被人重新發見了，發展了，和現在被一般人公認是無盡藏的國寶了。雖在許多要點上，同德國一般的民歌，無甚出入，但發源於瑞士者，是因山的環境之特徵而有別的。寂寞和關於自然力之無情的權勢之意識，對於人生和宇宙之沈潛的態度，對於上

帝的意旨之單純而虔敬的服從，連同其國民應該在神明領導之下，鑄造其自己的命運之深信——這些，就是瑞士通行於民間的詩歌之特徵。如同人民的精神之其他產品（神話、傳說、露天戲）一樣，民歌對於地方的和國家的情操，有同等的貢獻。其所處理之題材，往往是關於一州或一個地方之歷史。普通一般的民歌，包括牧人諧調之歌詞，或特爲岳得調所撰之歌詞，也常是以方言寫的，這一事實，限制了它們的作用之範圍，但大增了歌者對於它們的親密和愛悅。

由於鄰里的傳統，由於學校的施教和由於無數唱歌社之演習，民歌之音樂，是盡人皆知的一個瑞士人，熟記了許多歌詞，並有一個手風琴（*accordion*）或小風琴（*concertina*），就能自得其樂了，不管他的茅屋是怎樣寂寞。倘使有兩三個這樣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了，就會有一個鬧熱的音樂會，以消長夜。民歌受人民歡迎之程度，可以拿各書局時常發行的專集之數目來證明，內中有幾本代表精深學術的研究，但大多數是因陋就簡的版本，只包含一切盛行的民歌之歌詞而已。

茲舉亞爾彭·娜詩麗（*Alpenrose*）爲例，使讀者對於瑞士民衆所喜習的這種詩詞和樂調，可有一個普通概念。它是一部普通用的歌集，在一九一三年，業已銷到第八版了。它包含五百八十七首詩，差不多都是用德文寫的，分爲（一）『關於祖國、關於自由和關於亞爾卑斯山之歌，以及牧人的諧調』（二）『民衆的歌和關於社會的事情之歌』（三）『戰事和軍隊生活之歌』（四）『學生、練身者、獵人和射手之歌』（五）『宴飲之歌、饗別之歌以及漫遊之歌』（六）『戀愛和思慕之歌』（七）『其他』。只有第一類，是完全採自瑞士之來

源的，但它包含有一百八十首之多，就中有整整的一百首，具有純粹愛國的性質。

自然，在它們當中，有約翰·茹多福·威斯（Johann Rudolf Weiss）（一七八一——一八三〇年）所撰之國歌，“Deur Vaterland”（祖國），譜以英國國歌，“God Save the King”（『上帝救我君王』）之調：

Rufst du mein Vaterland,

Sieh uns mit Herz und Hand,

All dir geweiht.

你稱爲我的祖國，

你看我將赤心和能幹，

完全奉獻於你前。

然而在詩品上，它遠遜於格特弗銳德·客勒之“an mein Vaterland”（『歌頌我的祖國』），後者，在社會的儀式上，是更多被人歌唱的：

O mein Heimatland! O mein Vaterland!

Wie so innig, feurig lieb ich dich!

.....

Als ich arm, doch froh from des Land durchstreich,

Königsglanz mit demen Bergen muss,

'Thronenfliter bald um dich vergass:

Wie war da der Bettler stolz und dich!

我的家鄉啊！我的祖國啊！

我如何誠摯而熱烈地愛慕你！

.....

在我雖窮而樂的時候，

在各地羣山中我甘爲汗漫遊，

因着景物之壯麗令我忘記了王位之光輝，

各地貧苦之百姓如何引你爲光榮！

在羅曼斯語的『擊鼓罷』一曲中，有一種韻律和佳調 (there is rhythm and swing to the Romance 'Roulez tambours')，使它成了全世界行軍曲中之一最佳者；而其歌詞之動人，也不減於其樂調：

Roulez tambours! pour couvrir la frontière,

Battez gaiement une marche guerrière

Dans nos cantons chaque enfant naît soldat.



*C'est le grand coeur qui fait les braves.*

擊鼓罷！去守邊疆，

快樂地奏一個戰士進行曲，

在我們的各州裏每一個嬰兒都是生而為戰士的，

這是造成壯士之洪願。

時常有人評說，在外國的一切僑民中，瑞士人是最容易患懷鄉病的。該國所有的許多美麗的愛國抒情詩，是在異邦的國土上所寫的，因為它們把這個情緒，表達得如此傷心刺骨，所以已不脛而走。

前面業已提說瑞士保存服裝和培植民歌之協會，它是於一九二六年，在呂賽爾成立的。以其第二項宗旨而論，該協會，是在已有的民歌之基礎上，更求發揚光大為職志的。然而它也深信在該國某某地方，再加研究會發見許多幾乎被人遺忘的民間音樂之寶藏。對於古代的舞蹈和紀念的戲劇，該協會也有相當的興趣。在一個新近的通告中，該運動之愛國的作用，是在下面一段文字中被側重的：

『邦國之愛，正是以真實民衆會期及其無邪的歡娛和傳染的快樂，非常強化於一大羣人民之間的，而極其重要的——是在我們的後代青年中間……倘使我們居然能將老和少、貧和富、智和愚聚在一起，我們就有裨於強化我們國家的情緒之高尙的目的了，而同時，可以擡高民衆會期之地位，因為我們絕不應該，容許它們流於暴亂的妄舉。』

在業已論及的瑞士的崇奉中，一個最重要的崇奉，乃是音樂之崇奉，甚至在政治的立場，也是如此的。一個細密組織網，籠罩其全國各處，爲其經緯的唱歌和合奏樂隊協會，享受着它們的勞績所應有的令譽。這種勞績，有許多應該歸之於幹練的指導者和作曲者，自從於一八三六年去世的歌人的祖師，約翰·喬治·拉基里（Johann Georg Reger）之後，約翰·喬治·拉基里（John George Reger）的時代以來，他們曾專心致志於瑞士民歌之發展。然而正如在露天戲的事例中一樣，顯然大部分的讚揚，應該歸之於全體民衆，對於音樂之熱情，以及從全國各地，所徵集的成千成萬的歌者和伶人之樂意的合作。沮利克、白賽爾、白恩和聖·加侖之樂隊，對於該國之高級音樂生活，頗多貢獻，而在它們新近的和現任指導者中，有若干人是以作曲家的資格受國際之推崇的。並且，瑞士會期的戲劇，在流行廣汎和藝術效力上，都已經達到了頗高的程度。它需要一種特別的音樂，而這種本地的需要，完全是以本地的供給來適應的。在後一領域內，瑞士的作曲者，是在以顯著的勝利，解決其國家所特有的一個問題。

### 戲劇——露天戲劇

在戲劇的表演之形式上，尤其是在露天戲劇（Freilichtspiele），亦稱國家的或會期的戲劇（Heimatspiele, Festspiele）上，瑞士的象徵，達到了最高的發展。在中世紀，和甚至遲至十七、八世紀，其他歐洲的國家，也盛行着民衆舞臺的表視；但隨着逐漸的集中化和工業化，在古代人民生活，曾佔有如此廣大和富於色彩的地位之會期和戲劇，已被放棄了。由於交通的阻塞，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對於本土和本地風俗之堅強的愛護，瑞士人，曾將它們

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至今不衰。無疑地，另有一個要素，在這亞爾卑斯山的共和國中有裨於古老的傳統之保存，就是各色人等，顯然共有的演劇天才。曾有人說過，在每個瑞士人的血管中，流着一些舞臺的血液（*dim geschicht Theaterblut*）。凡觀過露天戲者，它或者是由頭腦單純的農民和鄉村的手藝人所演出，絕不致於懷疑這個特性之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瑞士的市鎮中，至少有一個旅舍，不論那個市鎮，是怎樣渺小和遙遠，必然有一個小舞臺和廳堂，此即由本地優伶（*Theatralians*）所演出無數小劇之背景。有這樣的一種人民，和這樣的一個背景，露天舞臺，在瑞士最近所達成的顯著的發展，就不難了解了。

在一切瑞士戲劇的供獻中，戶外或戶內，只有在微委所舉行的釀葡萄酒者之盛會（*great festival of the Winegrowers at Vevey*），是被外國的批評家和報章廣泛地評論者。在亞爾特多福（*Aldorf*）上演的，關於退爾之一劇（*The Tell Play*），在國外也受一些注意，而且也自然被人認為是瑞士之一種國家的制度的，然而，關於時常在全國各處，往往是在偏僻古老市鎮上，所舉行的無數露天戲，一般外國人士，是一無所知的。然而，以其總積計算起來，在瑞士人民之情緒和知識上，印有最深之烙印者，實乃這些渺小而不令人注意之提供。

一切瑞士戲劇的戮力中之最大者，在微委所舉行的釀葡萄酒者之會期，發源於古代農業之僧院（*Abbey of Agriculture*），一個地方協會，其後改稱為聖·耳般康健團（*Laudable Brotherhood of St. Urban*）。這些健康的團員們，據說以其真正天主教的精神，將異教的酒神巴客斯（*pagan Bacchus*）和基督教的聖徒，一視同仁地，尊為其守護神。根據傳說，微委的組織之肇端，可以回溯到十二世紀；不論如何它有十六世紀的記錄，足資證明。

一百多年以前，康健團就簡直成了釀葡萄酒者之社團了，它仍在這個名稱下存在着，並成了世界聞名之組織。從古時起，微委社團之習慣，對於附近一帶釀製葡萄酒最成功者，頒予獎品，以資鼓勵。從前簡單給獎的儀式，逐漸變成了繁重的典禮，於一六五一年，成了整隊遊行，於一七三〇年，居然成了輝煌古裝之遊行了，而在十九世紀中，成了大規模的寓意的扮演。

這樣浩大而壯麗的展覽，自然是一個小城如微委（僅有一萬三千人口），難於勝任的，雖有物德州（Canlon Yauld）之公民同志們，從旁竭力贊助。於是須每隔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纔能舉辦這個盛會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最後一次的會期，是在一九〇五年舉行的，當時有十萬以上的觀光者，被吸引到微委了。爲着一九二七年之會期，在廣闊的市場上（Place du Marche），建築了一所備有一萬五千座位之臨時會場，接連六場，都告滿座。有兩千舞伶參加舞蹈，供給音樂者，是由三百樂人所組成的五個樂隊，一個由一百五十件樂器所組成的合奏樂隊，以及一個由三百歌人所組成的合唱隊。一九二七年之詩劇腳本（libretto），是出於一位日內瓦的詩人，皮爾·奈熱爾德（M. Pierre Girard）之手筆。微委之格斯塔夫·杜惹特（M. Gustave Doret of Vevey），第二次充任了作者和音樂指揮者。在描寫一個如此壯麗的展覽，如一九二七年釀葡萄酒者之會期時，很難避去最高級的形容詞（superlative）而不用。甚至代表歐洲各重要日報之外國批評家，也被其魅力所攝住，而以最高的頭詞加於它了。『着五顏六色的服裝之兩千名舞伶，密集於表演場上（arena），當其一個代表四季之一的行列，以單行排於劇場之前面時，其他演員們，不停地，供給一個煊染的背景，以繼續的動作和改變，將生命本質之參差，

傳達予全體了 (communicating to the whole by continual movement and changes the diversity of the itself)。祈禱、行列、唱歌、跳舞、舞隊——釀葡萄酒者之祝典，乃是詩詞、音樂和色彩之混合物 (Invocations, processions, songs, dances, ballets—the Festival of the Vineyardists is a medley of poetry, of music, and of color)。它是一首讚美勞動與和平之詩歌。』

另一位批評家，描寫這個祝典爲『它是古希臘、古瑞士以及質樸的勞作之一種不可能的化合』(“as an impossible synthesis of Hellas, of Helvetia; and of rustic labor”)。誠然，從古代異教的世界和從十八世紀以及更早的世紀之物德之本鄉 (Pays de Vaud) 它自由地採用了其背景和服裝。然而，憑着多次的預演和練習之效能，希臘的諸神和諸女神——酒神巴客斯及其撫養的伴侶賽冷拉斯 (Bacchus and Silenus)、女穀神西奈斯和司智慧之女神帕拉斯 (Ceres and Pallas)——據說，業已成了歸化於該州之公民，爲其一切居民所熟識的鄰人了。在這廣大的表演場上，同這些神祇的角兒們，肩摩踵接者，爲手持燦爛的中世紀黃道大轟之雄偉大漢 (stalwart bearers of gorgeous medieval banners of the Zodiac) 着蟬翼舞裳之山林水澤之女神 (gossamer-clad wood nymphs) 莊重的葡萄園主、歡樂的榨酒者、林野牧畜之神 (Janus) 和狂飲之女子 (lucchantes) 著古雅亞爾平服裝而歌岳得調者 (crodlers in quaint Alpine garb) 曼妙的舞隊 (graceful corps de ballet) 古代希臘持花者、英勇的持矛者之隊伍、刈草者、製乾草者、收割者、葡萄收穫者、伐木者、獵人、漁夫、鐵匠、編筐者、成羣結隊的兒童們，穿着農民的服裝，在他們的長者中，安靜地前進着。在他們當中，有一個十四歲的男孩

子穿着牧養山羊者的衣服，獨自站立在極大表演場之中心，以其牧養山羊者之歌（*Chanson du chervier*），達成了該祭典之壓軸的場面。在行列中，出現了一對農民的新郎新娘，有穿戴各州傳統服裝之女官（*maid of honor*） wearing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all the cantons）陪伴着。有男女牧人照管着的牛羣、綿羊羣和山羊羣；古代的農具，在摹擬田地之勞作，而有節奏的舞蹈中動盪着。成爲表演場之背景，而令人追懷莫熱特（*Morat*）之睥睨一世的中世紀的堡壘，使這種不調和的情形，更加擴大了。但是，物德之人民，從這樣繁多而紛歧的要素中，曾以世世代代之實驗，學習了怎樣引出一種最純潔的美之和諧的統一。

釀葡萄酒者之祭典同瑞士一切其他露天戲之區別，不僅在其不可方物的盛大和壯麗，也在於它同本地史乘上之任何確定的事蹟或時期，是毫無關係的，屬於一個普通的和寓意的性質。爲着後面這個原因，它並不很直接培育歷史興趣或涵養國家情操。實在，它比純粹國家情操，更爲深遠。從古希臘神怪傳記中，並從在春夏秋冬四季進行着之土地耕種中，提取靈感，它以至高無上的效力，教人以自然和本土之愛的義烈（the patriotism of love bath of nature and of native land）。釀葡萄酒者之節日，因爲是以物德的山水爲背景，而且是沈浸於其傳統者，所以自然首先對於羅曼斯各州有強烈的號召力，然後對於該國之其餘的地方，有稍次的感格。詩人、作曲者和音樂指揮者，對於這個節日之成功，雖有很大的貢獻，然而其美名，甚至更多是由於它是真實民主的產物之事實——物德人民，奉獻予瑞士人民之作品。而全體瑞士人民，以正當的驕傲看它爲其國家、其人生及其勞作之絕頂美麗的描出。在那個意義上，該項慶祝，可以算是一個國家的成績，教授瑞士人以專致力於和平和工業的

## 愛國心之概念。

弗力追克·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因撰著『威廉·退爾』(Wilhelm Tell)之劇本，而贏得了全體瑞士人民永遠的敬愛，這並非過甚其詞的話。這位德國詩人，在其本國，雖有很崇高的令譽，但他在環繞呂賽爾湖(Lake of Luzern)之四個森森的州中，所受的頌揚，業已成了一種真正的崇奉，按照傳說在戲劇中永垂不朽的功業，是在那一帶地方建立的。原來的各州之人民，對於席勒之獨特的愛慕之一證據，乃是近布潤侖(Brunnen)聳立於湖上的一座巨大花崗石碑，其金字的勒記爲：『獻予歌詠退爾之詩人，弗力追克·席勒，古代各森林州敬獻』(Dem Sanger Tells, Friedrich Schiller, die Urkantone)。對於席勒之一種更好的頌揚，乃有『退爾』一劇，每隔數年，在阿爾特多弗(Aldorf)之演出，舞臺之地點，同當日退爾從他兒子的頭上射掉蘋果，而公然反抗暴君格士勒(Gessler)之地方，相距僅一箭之遠。在那古鎮之方市場上，有凱西林結(Kieselnur)爲退爾所鑄之巍巍的銅像，該像之奉獻禮，就是於一八九五年以詩人阿羅德·奧特(Arnold Ott)創作的，非常美麗的慶祝戲劇(Festspiel)之演出。瑞士人當然一向是將阿爾特多弗看爲聖地的，但自一八九九年席勒的戲劇，在該城開始出演以來，從全國各處而來的愛國朝聖者，每屆侵入由銳之靜寂的小首城者，往往比前屆更多。現在『退爾』之劇，不是在露天演出者。數年前，憑借獎券之銷售，在瑞士各地，募集了一筆款項，足夠在阿爾特多弗建造一座專演這本戲劇之美麗的戲院，該戲院，有一個非常寬大的舞臺，並包含一千個座位。於一九二七年之夏，『威廉·退爾』有九個星期日和兩個星期六之演出。戲券是以減價售予學校兒童的，這是歷史和愛國性質的

戲劇在瑞士出演時之一般的慣例。

『退爾』劇中之男女優伶，都是阿爾特多弗及其近邊一帶之公民——開設店鋪者、屠戶、烘製麪包者、工匠、開設旅館者及其妻室、兒女等。專家們負責主持藝術指導、佈景和音樂；在他們輔導之下，成就了一個演奏，或者不及專業的優伶之平穩，但充滿着熱心、活力和情緒。一切演員，雖都為清客，但其中有大多數從小就在該劇中，自不重要的角兒，逐漸升至現在的地位者，直到他所扮的角色，已經成了他的第二天性，這也是事實。他們在藝術上之成功一部分，也由於該地之精神，而其中之大半，是由於這個知識，即他們自己是前幾世紀，在由銳推翻威武的君王專制者之苗裔。『出現於阿爾特多弗舞臺之上的許多人，不特對於一個光明磊落的動機，縈迴着聖潔的熱忱，並且也以一個多節的外表和凝重的腳步，與魯鈍的行爲，顯示從舊同盟所受的遺傳；這些關於他們的承襲之表記，對於該劇之成功，比較化裝的藝術，有更大的貢獻』。

給瑞士人民之演劇天才，以最普遍表達之機會者，並非正式的戲院，或如微委釀葡萄酒者之祭典一般的盛大，而非所有的扮演。其實乃是簡單而樸素的露天戲劇，因為它們是自從中世紀神祕的時代以來，在遍國中各鎮各村，所被表出者。以原來的『退爾』一劇為例，它是在印刷機尚未發明以前，很早就由銳被撰著和出演的。這一個純真的、有力的和生動的劇本，其為衆望所歸，可以在一五一一年和一七六五年之間，頻繁的重版為證。現在露天戲劇之出演，是常有的事情，在最出人意料之外而偏僻的地方，是累次出演的。例如在最近幾年中，在普法費康 (Pfalzkon) 愛因賽得能 (Einsiedeln) 堡格道夫 (Burgdorf) 海吞斯台 (Hertenstein) 和摩爾設其 (Mor-



shach) 曾舉行過這樣的表演；在呂賽爾湖上之代起堡 (Dietschberg above Luzern) 威底尤·沮利克亦然 (Wiedikon-Zürich)。在斯卡夫好生州 (canton of Schaffhausen) 內有幾個小村莊，譬如哀各列梭 (Eglisau) 代丹賀芬 (Diessachofen) 和萊茵河上之斯泰因 (Stein-am-Rhein) 輪流演出，關於地方歷史重要事件之創作戲劇。在一九二九年之夏，拉彭斯威爾 (Rapperswil) 當聖·加侖州高級官憲和從附近一帶所吸引的一大羣觀光者之前，慶祝了它的成立之七百週年紀念，表演林拿斯·白起爾 (Linus Bercher) 之戲劇，其中之十二幕，回顧了該小鎮歷史上一切重要的事蹟。在羅曼斯的物德州內羅善湖上之麥惹爾銳斯 (Mezières above Lunsanne in the Romauce canton of Vaud) 是以其農民的優伶而著名的，在他們所扮演的許多戲劇中有莫熱克斯兄弟所編之『威廉·退爾』(Guillaume Tell by the Morax brothers)。在登·舉·美底 (Deut du Midi) 之麓，有一個渺小的村子，叫着淺卜利 (Champervy) 扮演發賴十八世紀農民婚禮 (Valaisan peasant wedd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日內瓦舉行一個青春和歡樂的節會，按照夾克斯·達苦若日 (Jacques Daleroze) 之範式，專演滑稽戲和跳舞。顯然，在瑞士一般較古老的市鎮中，很少沒有戲劇會社，時常熱心扮演歷史上可歌可泣的事蹟。在戲院和舞臺方面，雖乏充分的便利，但不足以阻止他們演劇的嗜好，一個古老方形的市場，襯着古代貴族之邸第，或同業公會之公所，又或有一座鐘樓聳立於其近旁；一個古老盤藤的牆壁或路口，在遠處有江湖或山的透視為背景，以最低限度的畫幕為點綴，在舞臺的前面，排列着一行一行的木凳，有這樣簡陋的設備，就可以開始演劇了。

倘使款項充足，這些市鎮，慣於延聘有名的戲劇家，爲任何節會編著一部特創的劇本。總計起來，這些劇本，成了現代瑞士文學之一很可觀的部分。這些國家的戲劇，在形式上，代表一種獨特的類型，這是批評家所承認的，他們對於反比戶內舞臺（Kunsthühne）的問題之露天舞臺的問題（Festspielprobleme），頗爲注意。實在，在後者之中，有許多劇本，是非常優美的，將歷史的準確，詩的詞調和高級戲劇能力，冶於一爐了。想到其在金錢收入上之微少——其實尚不虧折已屬幸事——以及這些戲劇，大概不會在他處出演之事實，它們所達成之藝術的成績，就實在是不平凡了。然詩才知清高的熱忱，是站在它們方面而願爲効力的——關於此點，可以最近去的亞諾德·奧特（Arnold Ott）之終身事業爲例，他於一九〇一年，爲斯卡夫好生之百周年紀念所撰之劇本，在上面，業被提說。露天戲劇之音樂和其劇本，是一樣被重視的，所以有爲每一部戲特製之樂譜。從前在瑞士，對於這樣的戮力，照例是不大被人重視的。近來海滿·秀特兒（Hermann Suter）、海滿·委爾利（Hermann Wehrli）、格斯台物·杜志特（Institute Doré）、依·夾克斯·達苦若日（H. Jacques Daleroze）、約瑟夫·勞白（Joseph Lanber）以及奧托·巴布南（Otto Barblan），曾將這個獨特類型之音樂曲譜，高擡至純粹藝術之境地了。

一部露天戲劇的腳本和音樂到手之後，於是選聘導演，來繪製佈景和訓練伶人——後者，如在委微和阿耳特多福（Vevey and Aillardorf）一樣，都不是專業的優伶，而是嗜藝的清客。對於歷史的準確，尤其是關於服裝，是極其重視的。幸虧，瑞士有許多歷史博物院，就中有些是建立在較小的州之首城的，它們富於古代是盔甲和旌旄，以及冠笏杖等飾件，木器與古人各種階級所着衣冠等之蒐藏。有着這樣使現代熟識的真實的模型，所以甚至在

極其簡陋的村戲中，在行頭上也很少錯誤。

要描寫瑞士露天戲劇作家之繁多的貢獻，爲篇幅所限，是絕對辦不到。茲姑舉一本可概括其餘的戲劇『弟兄』（Brothers）之一二特點，使讀者可略見其一斑，該劇是於一九二七年之夏，在哀各列梭（Fallean）地方，在六個星期日和六個星期六的下午演出的。最後兩天的表演，是以虛價爲學校兒童所保留的。卻說，哀各列梭是位於萊茵河畔之一鄉村，人口約一千五百人，由其最近的大城，沮利克動身，乘火車一點鐘可到。但它對於『弟兄』之演出，居然供給了二百五十個俗人；利用藍德沃格特（Landvogt）之古堡爲背景，它搭了一座極其寬大的舞臺，以便容納大羣武士、執兵器之兵卒、農民、僧侶、各種階級的婦女和兒童；並且它曾慇懃招待了於六個星期中每個星期日和星期六，從他處來觀劇的衆多的客人。

該劇本之本身，是亨利·沃傑爾（Heinrich Vogel）一部分根據康拉德·烏勒爾（Konrad Ulmer）的傳奇“Das steinerne Kreuz”之主旨所撰著的，其中共計三幕，採取抑揚格五韻詩之體裁，一半押韻，一半不押韻（three acts in iambic pentameter, part rhymed, part blank verse.）其旨趣，在描寫一五二七至三一年瑞士宗教改革，竭力使其符合事實，而避免宗教的偏見。那個時代之強烈的紛爭，宗教的以及經濟和社會的紛爭，將聯邦分成了兩個對峙的陣線，而結果於第二次客百列之血戰（bloody second Kappel war）在各州中，各階級相互鬪爭；而且，仿照一般內戰之花樣，家庭中弟兄之間，因政見不合，而遂同室操戈了。以這樣一個兄弟鬩牆的事件爲主題，該劇很可稱讚地，描寫了當時各種混亂的情況。

然而如『弟兄』在導言上明白的陳述，編劇者之主旨，不僅在提示宗教改革中之紛爭的畫面，也在昭示一個教訓，即『擁護仁愛之宗教，反對鬪爭之教會，極端排斥一切戰爭，而設法達成急切需要的和平』。從這一點看起來，對於贊助容忍與和平主義之有效的教學，如欲超駕哀各列梭之紀念的戲劇，是費盡心思而難有結果的。『弟兄』中極多舉動，雖都具有悲痛的緊張之特徵，但在兵卒、執行政、僕役和報信者間之說白中，插入了不少的打諢。例如在後者中，有一個角兒有如左之說白：

『當其兩人，被教會的仇恨所慫恿，

換口肆罵而抓破了彼此的面容，

魔鬼定然會蹲踞其間，

笑盈盈地作壁上觀。』

“When two, spurred on by churchly hates,

Fall out and break each others' pates,

Be sure the devil squats between,

As han hing third he enjoys the scene.”

該劇在一個更嚴重的論調中，隨處諄諄教誨，關於尊敬他人的信仰之義務。從頭到尾，它以同等的效力，宣傳戰爭之恐怖和愚妄。尤其是內戰，是被排斥為兄弟同室操戈的；但編劇者，承認一切戰爭，都有這個性質，因為它們

使天下一家的弟兄們，分於互相砍殺的陣線。甚至連兒童們，對於同盟的各州相互砍殺的慘象，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怖，因為在哀各列梭的舞臺上，有許多玩着十六世紀的遊戲和唱着十六世紀歌曲的兒童。在第三幕之頂點上，亨利·蘇·哀其（Heinrich zur Eichen）劇中之青年主人翁，從客百勒決定命運的戰場歸來，持着折斷了的刀劍而遍身帶着致命的創傷，當着他的父親和叔父——劇中互相仇視的弟兄——之前，氣絕而亡了，於是閭牆的弟兄，從此絕後了。自然他們隨即和好如初了，同時娜星·埃司基爾（Rosine Escher）亨利之未婚妻，嚙啣痛哭地，呪詛一切戰爭了。

想到參加哀各列梭戲劇之一切伶人，都是簡單的小城的居民和農民，它的演出所產生的結果，就很算驚人了。在舞臺之上，他們暫時出神入化地扮演了他們自己的老祖宗，穿着後者所穿過的服裝和盔甲。一個非瑞士人不能判斷，使觀衆受感更深者，究竟是歷史的畫面，或為該劇所負荷的倫理的教訓。前者，曾明快地復演了該鎮在一個最吃緊的關頭上之生活的狀況；這是絕無疑義的。誠然將和平與容忍之格言，放在十六世紀初葉的人物之口中，是不倫不類的（anachronistic）。然而，它們對於聽衆，絕沒有失掉效力，因為後者的國家，曾在不很久遠的四年中，被四個交戰的強國，包圍在核心，而且幾乎也被捲入漩渦了。露天和戶內的舞臺，相形之下，其中有一特點，是前者相對地更為寬敞，可以容許大羣兵士、農民、商人等等，同時出現於舞臺之上。有時這樣雄偉的影響，是做得太過了（such mass effects are overdone）；但至少，它們對於人數，不單調、色彩和運動，可使觀衆有一個很逼真的印象。並且，我們覺得，在臺上和臺下的羣衆之間，在同情上，有一個親密的聯繫。

上面業已提說，在哀各列梭之舞臺上，出現了許多玩中世紀的遊戲和跳舞之兒童，其實這是在一般露天戲中，常有的穿插。他們誠然是典型的瑞士兒童，同他們的大人一樣，是生就的伶人，不特無羞澀的狀態，並且演得極其認真。我們可以想像，由於參加這樣的歷史戲劇之表演，在這些將來的公民身上之影響。自然地，凡在前一代扮演兒童之角兒者，在下一代就成了要角了——故此後者中，有許多人之優異，是一般嗜藝的清客們所不能及的。兼之，父母和師長，也慣常帶領兒童去觀劇，不特僅為娛樂，也為它們所負荷的歷史的教學之緣故。對於這樣的表演，雖盡力鼓勵兒童去享受，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乃是有幾個州的法律，禁止十八歲以下的青年進入影戲院。

在瑞士之羅馬天主教的區域內，其人民之戲劇的衝動，在戲劇中，以及在宗教的儀式和整隊遊行中，都可找着發洩的機會。在中世紀，沒有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對於復活節的戲劇以及其後對於演耶穌在十字架受苦之宗教劇 (Eastern plays and later passion plays)，比瑞士有更大的熱忱。從一五〇〇年至一六二七年，這樣的演出，僅在講德語的瑞士中，就有過兩百次之多，但在十七世紀中，非宗教的戲劇，漸取而代之了。但是，古老的傳統，尚未完全被遺忘；而於一八九三年，一個隸屬於梭羅色恩州，而僅有一千二百人口的鄉村，舍勒熱克 (Zolach)，居然以恢復宗教戲劇自命了。這種雄心，當然是因為受了巴威 (Bavaria) 之奧柏藍麥高 (Oberammergau) 和捷克斯拉夫 (Zachoslovackia) 之和爾銳持 (Horitz) 之經驗的鼓勵。從三十年前，他們在一個小規模上開辦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了一座可容一千二百人之戲院，每四年，在其中開演耶穌受難的戲劇 (Passion Play)，該劇雖為

可能的資力所限，而不得不諸事從簡，而是全然動人而美麗的，舍勒熱克人民之熱烈的虔敬，透澈地彌漫於其間。雖其感動人心之力，當然是純粹宗教的性質，但其演出之供奉，『非爲服役於上帝，也是爲服役於祖國的，使在國際間望眼欲穿的和平之聖地，得提早實現』。關於屬靈的和世俗的動機之混合，有一個質直而顯著的例證，是在舍勒熱克蒙難劇最後一場，可以看到的，此場，係扮演我們的主耶穌升天的情況（Ascension of Our Lord）。站立在天城雉堞之上，四周圍拱衛着白衣的天使，上升的基督，他自己也穿着最純潔的白袍，在其伸開的手中，持着瑞士國旗！

就連上文所舉各種紛繁供獻，也絕對不能概括瑞士一切露天戲劇。遵循中世紀的傳統，教堂有時被用爲顯著的戲劇演出。例如於一九二七年之夏，在白恩，老教堂之門口，成了秀各·房·賀夫滿斯色勒（Hugo von Hofmannsthal）之『偉大世界舞臺』（The Great World Theatre）的演出之背景，於此次演出，專業的優伶和嗜藝的清客，是聯爲一體的。該劇之人物和腳本，雖都帶着強烈的中世紀色彩，但它借着全劇之主角，一個乞丐的口所道出的現代共產主義，其清晰曉暢，可謂無以復加了。白賽爾，也利用它的大會堂爲背景，時常表演描寫該城被瘟疫蹂躪的慘狀之戲劇，而使韓時·和爾拜因（Hans Hollien）『死神之舞』（“Dance of Death”）之名畫，再生於世了。

瑞士人自己，對於戲劇的表現之一切的形態，已司空見慣，毫不覺得它們有其它作用，所以露天戲和其他國家的和歷史的戲劇，在林林總總的民衆身上，所施展的雄偉的影響，他們是茫然罔覺的：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然

而，後者在地方和全國的了解和戀慕之發展上，必然是主要的因子。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曾運用戲劇，達成國家和愛國的目的，到如此高深的程度。或者因為這些戲劇，一向是如此純粹藝術的，而完全沒有政治的作用之原故，所以其貢獻，就更加有效了。最近瑞士戲劇的表演，在培育公民資格和歷史的連續意識上之雄偉影響，已被人承認了，而且受了公家的津貼和私人捐助，雖為數不多，但亦足資鼓勵。在一個較富的國家中，容易有的危險，是太慷慨的經濟贊助或者會使這樣獨特戲劇的形態，離正道而入邪途了，毀滅它們在戲劇和國家的立場上之功用。然而瑞士之貧瘠，實不足以津貼而致露天舞臺於死命。兼之，後者對於津貼之要求，是很有限的，從它所吸引自告奮勇的大羣劇人和極多人民觀衆方面看起來，它都是極其富於民主精神的，它是堅實地建立於一個古老和穩健的傳統之上的，所以，對於它在以後數十年中，生命之延續和更進一步的成功之發展，我們的期待，是絕不致於落空的。



## 第十五章 傳統和鄉土之眷戀

### 傳統

拿特·漢生(Knut Hansson)在他的傳奇『最後的快樂』(Die Letzte Freude)中，借着他虛構的人物之口，評論瑞士人說：『在其國內，他們甚至連一個單獨的古傳(Tradition)都沒有。他們世世代代坐在那裏，鏗光錶之輪盤和爲遊玩他們的高山之英國人作嚮導，但它是一個毫無民歌和古傳之國家』。這種非難，自古有之，並常有人作依樣畫葫蘆之玩意。關於民歌一點，前面業已加以駁復(參看第十一章)。至於瑞士人，全無古傳之責難，倘使作此評語者，不是完全愚昧無知之流，我們就難於了解這種毫無根據的謔言，如何能聽其流播了。然而誰能推說不知『退爾』之古傳呢？它在關於該亞爾平共和國之現代政治討論中，是如此頻繁被引用的，所以它應有專章加以論列。或者，這一個真正國家的傳說，實在太被重視了，所以外國的考察者，曾忽略了在其全國到處可以發見的不勝計數的地方古傳。

在瑞士，差不多每一個泉、川和湖，每一個谷和山峯，每一個森林、峻嶺和冰河，在附近一帶所熟稔的某種古老的故事中，都占着顯要的地位：這並不是過甚其詞的話。頻繁重述這些故事之書籍，時常在出版，而讀者仍然爭相

購買先讀爲快，而毫無衰落的氣象。瑞士著名的作家們，往往從這種古老的資源，吸取靈感；例如格特弗銳德·客勒之『鏡子與小貓』（*Gotfried Keller's Sprigel, das Kitzchen*）就是以詩人好調戲的幽默煊染出來的，親密的神話之一可喜的例證。自然，僅被保存於書籍中之古傳，是死的古傳。書籍雖有益於它們的保存，然而瑞士之民間的故事之真實的存在，是在於村民、農夫、牧人和嚮導口中傳說之話語。父親和母親向他們的子女之講述；在學校旅行中，領導學生隊伍之教師，指着發生該項故事之地點，原原委委地，向學生講述它們；露天紀念表演，以戲劇的形式，將它們提示出來。詩人和撰著歌曲者，將它們化爲韻文和諧調，使古老的典故，在人民的嘴上，得延長其壽命。政治的演說家和宴會上的發言者，絕不會忘記頌揚本地的傳說之英勇的人物，這樣的演講，時常會產生有力的結果。

無疑，瑞士的神話所以能流傳至今，而不少衰之原故，大致對於它們能最忠實地反映着人民之靈魂。兼之，它們是奇妙地適合於教學之目的者，因爲它們注重民衆最欣賞的那些道德和政治品格——精明、自靠、恆心、忠實、虔敬、慈善、對自由之愛護、對專制之反抗。神話和民間故事，雖爲到處的民衆所熟知，但在較高的谷中和山區，它們之暢行，自然是最爲繁盛了。農民和牧人，對於它們之熟稔，並不亞於聖經和本鄉詩人之歌詠。大多數人，雖坦白地看它們爲可愛的虛構的故事而已，但是，其實在該國之較遙遠的某些地方，對於這些古老迷信之信仰，仍未完全絕跡。高峻的亞爾平領土之自然的現象——雪崩、地崩、冰川、終年不融的雪境、暴雨、近身的閃電、四山反應的轟雷、南風（*the Föhn*）奇怪的雲形和陰影、透過渦卷的如幽靈的煙雲所看見的巖石之奇形怪狀——這一切之可

怕，都足以說明瑞士神話之來源，以及它們在單純的人民之心繼續保持住的迷信。

不知道鄉間的古傳，就不能懂得許多著名事蹟，獨特的風俗和典禮，州的和地方的紋章、旗幟和徽章之意義，信不信由你，由銳之全民大會（a Landsgemeinde in Uri）擬在通格特赫德（Gothard）山道之處，造一道橋，跨過茹斯（Reuss）江，但接連失敗了兩次，於是授權予該州州長（Landammann）同魔鬼交涉，以求達到目的。至於該州長如何居然憑借魔王陛下之力，不特建成了該項橋樑，並且乾脆地賴掉了其規約應得的報酬，說來話長，暫且按下不提。只說那條古老的魔鬼橋（Teufelsbrücke）之廢墟，在司苦李命（Schöllenen）之深而可怕的峽道中，尚可看見。倘使這還不足說服最多懷疑者，那末，在發賴失州香（Zion）河上之淺德林·沙委斯（Chandelin-Savieze），講法語的居民，必定高興指給他看，另有一條，也是以同樣便宜的條件，從魔鬼騙來的橋樑。在沮利克緊靠顧熱斯·門斯德（Gross-Münster），有一座古老的房屋，其門楣上，有一個浮雕保存着查理曼帝（Kaiser Charlemagne），從前曾在該地同一條非常聰明的蛇辦過交涉之古典。在由銳州楯形紋地（escutcheon of Canton Uri）上之公牛頭，它是時常嚇退兇猛山民之仇敵者，有一個說明其來源之驚人古傳，包括一位童女之犧牲，使秀潤侖那蒲（Surenalp）一帶的居民，得免遭兇猛的妖怪之蹂躪。

在退爾之前，瑞士山中就多英雄和聖者。在前者中，有俠義的武士斯蔡散·溫克銳德（Struthahn Winkelried），他斬過奧追爾（Odwyrl）之龍，採翁德華登（Uderwalden）之居民於水火。有一位自夏蘭滿克大學漫遊而來的學士，自身冒着可怕的危險，居然收服了勞提亞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之作怪的幽靈，根據傳說，

後者的屍體，曾被拋入湖中，該湖在靠近呂賽爾的高山之要寨中，至今尚因他得名。飄洋過海從哀爾蘭 (Ireland) 而來的聖者弗銳多林 (St. Fridolin)，卜居於古乃熱斯 (Garu)，當時該地，尚是信奉異教的，使他的施主爾所 (Ulzo)，從坟墓中復活起來，以便平反爾所貪得無厭的兄弟，藍奪夫 (Lambolf)，因爭奪地產而提起的訴訟。古乃熱斯的人民，對於聖者利銳多林這番奇蹟，和其他奇蹟非常驚服，所以他們將其像，刻於國家的紋章，直到現在，尚可見。同樣，我們只能接受聖者邁侖拉德 (St. Meinrad) 之古傳，纔能說明天主教朝聖者衆望所歸的愛因賽得能 (Insiedeln) 之創立，他的兩隻大鴉，爲他報復了殺身的仇恨，至今尚飄揚在附近森林中的居民之旗上。

許多瑞士的傳說，雖都肇端於基督教的時代，但在它們後面，有無數更早的神話和迷信，是發源於異教的。在這些古老的故事中，有些描寫亞爾卑斯山之一黃金的時代，那時繁茂綴花的草原，滿蓋最高山脈之極峯，這與地質學的發見，很奇怪地相矛盾。依照這些故事，冰河和雪境，是奉命來刑罰草場之狠心的地主者，因爲他們曾壓迫其窮困的鄰人。洽如布勒塔尼之農民 (peasants of Brittany)，相信有些市鎮，沈到海底了，瑞士某些地方之農民，也講說因爲惡貫滿盈，而被雪崩埋沒之村莊。關於岳得調和牧人諧調 (Kirchweihen)，某項狩獵的風俗，祝福草場和牛羊之風俗，以及各州各地方日常生活之許多獨特的要項等之原始，都有希奇的說明，也顯然都是很古的說明。

他們有花的神話和樹的神話，以及一切熟識的獸之神話，其中之人熊、豺狼、狐狸和蛇，都賦有說話的能力。關於妖魔和神仙之神話、水神和水鬼之神話、深山之中居於水晶廣廈之矮子，變爲狼形和狼性之人 (werewolf)。

vea) 和龍、有大羣狂暴妖怪的隨從之野獵人，在暮色籠罩中始領着幽靈的羊羣出現於高山草場之『夜人』(“night people”) 等之神話。有無數故事，是關於埋藏的寶貝，由惡毒的鬼怪所看守，以及因惡行而化為石塊之人。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關於古代弗乃斯蘭 (Friesland) 戰士之大羣的鬼魂，於黃昏與天明之間，沿着確定的路線，往返於瑞士及其北海 (North Sea) 之老家；凡有意或無意在他們所經過的途中，放置障礙物者，都必遭受禍殃。

自然，在這些鬼怪的迷信中，有許多是同豐富的條盾神話同出於一源的，倘使它們誠然不是發源於更早的時期。然而在瑞士講故事者之口中，它們帶上了一些特點和該國所特有的語氣。在這些特性中，最值得注意者，爲關於這些事情發覺的地方，它是毫不含糊其詞的，雖以發生的日期而論，它們同一般傳說一樣，都是以『從前有一個時候』(“once upon a time”) 來敷衍的。例如，不僅關於較近的『退爾』傳說爲然，就連關於埋沒於雪崩之下的古城之更遙不可測的神話，也是如此的，關於這一切城名及其地址，時常有詳細的描寫。爲着這個原因，卽或一個神話是發生於普通條盾的根株的，但這一點，對於它在瑞士人地方的愛戀和精神上之貢獻，是毫無影響的。

於此，我們對於在苦羅笨敦 (Graubünden) 卽『瑞士之西藏』(“Thibet of Switzerland”) 所發展的極多傳說，應該約略提及。該州之人民，居於高原，而遠離文明，所以自來就度着其獨立的生活，閉關自守，不知有幾個世紀了。自通鐵道以來，從前使其地與世隔絕的那些迷人的特性，現在已一變而將它拔擢於旅行者最醉心之一

地方了，但這也不過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在從前隔離的時代，苦羅笨敦人（Bündlers）很自然地發展了豐富的神仙故事和民間古話（Fairy tales and folk lore），這些東西，不特是他們所特有，並且沒有任何其它地方，可以超乎它們之上的。他們的高原和山谷，是幾種爲人所熟知的，鬼怪之居所，這些鬼在該處，都有奇怪的名稱，在它們當中，有一個極其顯著的長人之種族（die Finggen），這是在該國其它各處所沒有的。在這些鬼怪中，最大多數反映着苦羅笨敦人之地土，所以在它們同人類之關係上，是完全有益的。因此，在這裏提出一個並非無關的事實，就是在這一州內，妖婦之被害，早於瑞士各地，而其遭害之時期，亦長於瑞士各地（一四三二年至一七五三年），這似乎是易於招怨的陳述。

倘使如此繼續不斷地說下去，仍不能窮盡瑞士人之古傳的寶藏。上面之陳述，或者已足以顯示一個事實，即其人民對於山川湖沼之眷戀，不特由於人類對自然美之純粹的愉快，也由於無數民間故事之流風餘韻。兼之，在這兩個要素中，後者比前者要早幾個世紀，因為前者僅爲最近一百年的事情。瑞士人，對於地方的眷戀，大部分必然是以各州和各地地方所獨有古傳爲基礎的，而其人民的生活，以及其地方分權的政治制度，都受了這種眷戀之穩定的支配。在這個範圍內，聯邦憲法之自身，也是被傳統的壓力，所模鑄的。並且民間的故事，在現代政治的討論上，也佔着不小的勢力。瑞士的理想主義者，時常極力主張他們的提案，必須兼有茹提理宣誓（Rathswur）之格式及其儀節，這至少是一句比喻的話。

上文業已提及作政治演說者，喜歡引用本地的傳說以及其聽衆，對於這種敏銳的想像，鼓掌嘉許的情形。在

運動選舉之小冊子中，也常引用民間的古語，在這方面，退爾的故事，自然是最受歡迎的。不論一個如何新近產生的制度，一旦被人指責侵犯人民權利，或違反人民意志，就必定會被人斥為「Zwinghurer」，意即一個特為強迫人民服從，而設防之堡壘。凡贊成這樣的制度者，就會被其敵黨稱為「Zwingherren」專制的暴君，或「Vögte」（執行吏），後者係指十三世紀受奧皇委派，赴瑞士施行虐政者。不孚衆望的運動之領袖們，倘使能殺逃脫最可憎惡的「格斯勒」（Gessler）之綽號，就算萬幸了。這個名號，新近曾被用於一位聯邦行政委員，而發生了有力的結果，因為有人指稱，他是一個專為取締革命的煽動和擾亂之創制案之主動。

從民間古語所採取的政治的綽號，在瑞士選舉運動中，業已用得太濫，所以其可憎性，已不及從前之尖銳了。然而它們被人如此頻繁的利用，顯見一般人民，對於它們的熟稔之程度了。在近幾十年中，曾有一個趨勢，尤其在報章上，顯而易見，想避免對於政治的仇敵，施用含有毒意的形容詞，不論該項形容詞，是採自傳統的來源，或出自現代咒罵之武庫。然而也有例外，特別是被過激的集團所竊用。故於一九二二年選舉運動，在瑞士共產黨所發行的小冊中，發見了兩個顯例，其中古傳的英雄，作了政治的工具，或受了其侮辱。其中一本之標題為：亞諾德·溫克銳德，被令復活了（「Arnold Winkelried Is Resurrected」）。小冊子中謊稱溫克銳德說：「我雖自一三九六年就不在人世，但我再要為你們攻陷治者階級之陣勢」。他訓誨其同志，國人達到這個目的後，在其他應該做的事情之外，他們必須令每年繳納六千佛郎之賦稅者，解除其武裝，攫取一切過多的財富，而用之於老年、殘廢和失業保險。第二本小冊子名曰「威廉·退爾告瑞士人民書」，宣告後者崇奉了共產主義的信仰。這位英雄評論道：

『我射殺了格斯勒，但在格斯勒的時代，事情之糟，尚不若今日之甚。……你們應該宜一個新的希提理普，大家一致團結，而放逐你們的主子，到地獄裏去。……至於銀行和錢幣以及工廠，我們都還用得着，但我們對於押款，不願再付利息。……目前你們似乎已棄弓箭而就投票紙了。我很奇怪，怎樣會有人希望以紙條驅逐執行吏。雖然你們仍然可以試試看。……然而，當其在世的時候，我在箭袋內，帶着兩枝箭。我勸你們在投票紙以外，也帶一枝箭吧。』

從上文，可見威廉·退爾於他救出專制虎口的國家中，仍然是非常活躍的。他會被人從墓中拉出，而誣以贊成共產的暴動，這對於清醒的瑞士公民，當然是一件奇恥大辱；但他們必須承認，其全國崇奉的英雄，雖這次無故遭受共產黨之侮辱，不勝義憤填膺，但他在世時，確曾用過強暴的方法，最後，竟不惜冒政治暗殺之罪名。最近在研究十三世紀之專家方面，關於威廉·退爾，究有其人與否，發生了熱烈的論戰。自從一七五〇年以來，史家們大致都把他看爲一個純粹傳說的人物而已。瑞士學校教科書，因不能解此謎，往往只得將退爾之典故和歷史的事實兼提並論，由讀者自作主張——這個沒有辦法中之辦法，至少顯示人民不願捨去其國家的英雄之決心。然而利克大學教授卡爾·邁爾 (Karl Meyer) 最近發表的一部專門的研究，使整個論戰重整旗鼓了。邁爾以古文書學的精密的研究 (by intensive palaeographic research)，以年月之審慎的推算，和某項新事實之發見，使傳說同歷史兩相符合了，新提出一個有力的假定，以爲退爾·威理確曾刺殺沃格特·提命多福 (creating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a Tellen-Willi did Kill the Vogt Tillendorf)，又名格斯勒 (alias Gessler)，不



論如何，後者之妻，於一二九一年，將終之前，作了寡婦，已被事實證明了。當其普通人民，還沒有姓氏（*surname*）的時代，『退爾』一名本身或係出於“*Tillendorf*”或其簡稱“*Tillentor*”，就是刺殺提命多福者之意。瑞士在國內和國外之教育界，在這個略為深奧的歷史論戰中，所表現的敏銳的興趣，對於退爾的故事之本質的活力，提出了又一證據。對於一般樸實的民衆，當然這位偉大英雄之存在，是無須證明的；誠然，假定他是純粹傳說的人物，我們可以確說神話真於歷史，因為它是在瑞士人民對自由之愛護和對暴君之憎恨中，所孕育和養護的。

### 地方之眷戀

瑞士人對於地方的眷戀，有一個極高的程度，關於這一層，我們在第十一章討論其語言、文學和報章的時候，尤其是在第十二章，論列儀式、崇奉、節日和紀念時，業已累加發揮。世界上究竟有無其他國家之公民，在最嚴格的意義上，眷戀家鄉之深切，能同他們相比擬，誠屬疑問。在他們自己當中，他們不斷地權衡於兩種範圍不同的忠貞，『斟酌狹隘的和廣汎的家鄉，對於他們應有的要求』。只有到了外國的時候，他們纔僅通稱為瑞士人；在本國的時候，他們按照出生的州，就各不相同了——有時，因畛域分的太嚴，而招致忌怨。例如一個沮利克或聖加命的居民，在苦羅笨敦或者會被人看為外人，甚或被疑為德國的人民，雖後一州同這兩城之間，在鐵路的交通上，僅有數小時之距離。

強烈的，不必說過分的，地方之眷戀同氏族的社會，有某種密切的聯繫，而根據這樣偶然的事件之顯證，有其

利亦有其弊。然而就全般而言，今日之瑞士人，寧願僅看這種情形之光明的方面。比如格特弗銳德·客勒，就曾以典型的方式，概括這件事情，這段話，雖假托在射擊的節會中一位熱心的演說者之口所發出，但必定是著者自己願說的話：

『哎呀！在我們狹隘的空間，擠塞着多少各不相同的人民，在其事業上、風俗習慣上、服裝和方言上，不同的地方，不勝枚舉……你們看，這是一種如何有趣的事情，我們瑞士人，沒有一個劃一的類型，而有祖利克人（Zürcher）和白恩人（Bernese）、翁德華登人（Unterwaldner）和紐恩堡人（Neuenburger）、苦羅笨敦人（Graubündner）和白賽爾人（Basler），其實有兩種白賽爾人；有一部阿彭色爾的（Appenzeller）歷史，和一部日内瓦的（Genévois）歷史。這種在統一中之紛歧，乃是訓練友誼之真實的學校，但願上帝為我們保存這種特性；特別是在政治的相依發展為整個人民之私人的友誼中，它是一個最關重要的因子。以朋友間之親愛，補充公民精神之缺陷，兩者殊途同歸，而完成了全備的美德』。

揆諸一八四八年以前瑞士的歷史，客勒所表示的見解，必定是太為樂觀了。在該國史乘上，留着污點的，已往一切的紛爭和內戰，當然不能令對於地方的忠貞，負其全部的責任。因為它們往往是由宗教、經濟和廣汎政治的紛歧發動的，但其結果的衝突，必然是因州的精神和州的組織，而強化了。然而這位偉大的瑞士詩人，在一點上，是完全站立得住的，就是他假定地方的眷戀，大部分是以地方的不同為基礎的。在邏輯上，這確實是不刊之論；我們如何能希望無數完全相同的米西西北河流之戈芬兒草原和我們中西部之任理斯型的城市（immuable

precisely similar (to) her Prairies and Zenith cities of our Middle West)之居民(譯者按:戈芬兒草原是 Sinclair Lewis 所著 "Main Street" 之背景,任理斯城是其 "Babbits" 之背景,這兩本小說,因描寫美國中西部人民生活而得名)或單調的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的鄉村(monotonous Russian and Siberian villages)之居民,有同樣的感情呢?在另一方面,瑞士之領土雖甚渺小,但不僅分爲許多區域(localities),並且各區域都有其顯著的個性,而彼此並不雷同。除了業已指出的歷史背景之廣大的差異外,還有一個多山的國家所特有的一切形勢的和氣候的不同。有兩種宗教的信仰,各自保持着古老的畛域,而絕無溝通的餘地。接近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和奧地利的邊境之區域,有在提省諾、日內瓦、白賽爾和苦羅笨敦中,各自代表的血統、語言和風俗之不同,這些地方,相隔都沒一天的路程,但其光景,乃迥然有別。

在各州之間,甚至在同一州中之各山谷之間,既然堅持着各種如此顯著的紛歧,所以其地方的獨特性,絲毫沒有被輕忽或遺忘之危險。反之,瑞士人慣於時常以坦白和幽默,將它們提出加以討論。很少有譏諷的論調;但白賽爾之興盛而結實的優良市民,是一個熟習的類型,正如沮利克以其同紐約(New York)的往來爲榮的忙迫商人;日內瓦之承襲了客爾文(Calvin)之衣鉢,但有大同思想之居民;呂賽爾之懂得國際的禮貌,而能講說各國語言之開設旅館者;苦羅笨敦之差澀而莊嚴,方正而頑固的土人;溫柔而善於詞令的提省諾人;以空談和爭辯而著名的聖加侖之公民,老練而過分吹求但有力的白恩人;比斯格蘭人更慳吝的色各人(Engadiner);頂歡喜幽默的阿彭色爾人,等等,總之十九個全州和六個半州之人民,莫不各有其特性。倘使上列各種差異,有絲毫被遺

忘之危險，仍然有瑞士的小說家所善作的無數風俗的素描（genre sketches）使人永遠不會忘記它們。

在公共學校中，關於地方的歷史和地方的地理之精密的教學，輔以極多關於這些科目之優良的教本，將地方之獨特性質之知識，傳遞予後代了。在這一方面，連生客和旅行者，都未被遺忘。在一切城市中，和往往在第二等的市鎮中，有具備着各種本地指南簡明歷史的手冊等之詢問處，這些刊物，大多都是免費贈閱，或僅收最低的價格。古老的旅館和公寓，倘使有若干代或世紀之歷史，就必以精心撰著之小冊子，贈予其客人，在其中追述它們自開業以來著名的事蹟及其曾經招待過的尊顯的客人。歷史在瑞士人的心中，是一個極其生動的活物，尤其是他們本鎮和本州之歷史。

（註）例如在梭羅色恩（居民一三、〇六五人），它直到舊制之末（end of the Old Régime），是法國駐瑞士的大使之駐節的地方，有一所著名的旅館，以一本有四十面而用英文編輯論列該旅館及其城市的歷史之小冊子，贈送其客人。白恩有一樸素的公寓，現在已超過一世紀之上，在一個家族的經營之下，已有九十多年了，也用英文編著了它自己的歷史。這些和其他類似的作品，在撰著上，當然含有廣告的性質。然而這種性質，在極其有趣的歷史的事實之下，差不多完全看不出來了。

在歐洲各大國中，雖業已抹去大部分地方特異性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因子，但其勢力，到了瑞士，已大加削弱，而不大能生效力了。尤其是在德國，而在法國和意國也頗相似，大規模的製造、廣告宣傳和貿易，曾使生活的狀態，達到了一種劃一的程度，當然不及在美國所通行的那種劃一的程度，但也足以使各該國，同其十九世紀以前之生活狀況，截然不同了。然而在瑞士地方上，各種不同的標準，使他們不能不保持小規模的製造和分配之制度。劃一的幣制、國內通商之自由、優良的郵政、電報、電話和鐵路之服務，如潮湧的旅客之漫遊，以及統一的民法，當然不

無相當的影響。例如，我們看見各種會社，至少在各種節日保存地方的風俗和服裝上之熱心的，但約略牽強的戮力，想借此以挽救一之狂瀾。

同樣在政治的領域中，在遠心的和向心的勢力之間，在分權的精神和集權的精神之間，瑞士曾發見，明了一個精密的牽制和均衡之制度。隨着一八四八年的憲法之成立，前者已經失掉了破壞國家和平之力量，現在已不能像從前那樣猖獗了。然而，偏狹地方主義者（Kantongeist），殘餘的勢力，尙足隨時激起辛辣的斥責。在另一方面，州的和地方政府之所受的權限，完全有利於『衣服、飲食和社會風俗習慣之各自爲政』，如白賓士爵士所指出，它『顯然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因爲它削減了人生之可畏的單調』。

對於瑞士的景象，有一位非常敏銳和同情的觀察者，威廉·謝飛爾（Wilhelm Schäfer），最近曾以瑞士的小鎮之生動的個性，反比德國的小鎮之索然無生趣的劃一性，而作評論。大致摹倣司提芬斯在其『雙城記』（Tale of Two Cities）中所用之方法，他從前者中，取愛羅（Aarau）（人口共計八千）爲例，而取門明井（Memmingen）（人口共一萬二千人），屬於巴威行政區之秀亞比亞（in the Bavarian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 Swabia），爲後者之代表，發展了一組完全不利於德國市鎮之反比。我們不能根據民族，去解釋愛羅同門明井比較所顯出高度政治的活力，因爲兩地人民之血統，是頗相同的。在十九世紀以前，每一鎮都有過一個相等光榮的歷史。在經濟的利益上，兩鎮是不相上下的；在人口之數額上，德國的鎮，超過瑞士的鎮，百分之五十。對於愛羅較高政治精神，謝飛爾能設提出的唯一的說明，乃是在瑞士憲法之下，地方政府所享受的較大的自由。在德國，從前

在其帝國目前在其共和國的集權之下，小城鎮業已成了選舉國會議員的選區之一部分而已。地方的興趣，大大地被削弱了。國家的憲法，乃是蓋蔽全國各處之一極大的房頂，政黨之綱領，是以億萬選民為對象的，但兩者都無關於個人，而且是普遍的，兩者都不重視地方的習慣和個人。在另一方面，在瑞士對於州的事件之興趣，往往是超過對於全國的事件之興趣的。全民大會和市民大會，將州和地方全體選民，聚集於一處，而地方的活動之廣闊的範圍，使這種集會有重大的意義。故此，謝飛爾以酷肖格特弗銳德·客勒之論調，下結論曰：

「瑞士聯邦的公民，時常是將其州民的資格，放在其國民資格之前的。在他所稱為他的自由之中神聖地，保存着他的本鄉之一點特產；而在德國人民，必須經過十九世紀之叛亂，而痛苦地達成之自由中，沒有別的，只有個人及其投票的權利」。

倘使這個結論，對於從前尚且保存着一種聯邦政府之德國是正確，它在大體上，必然是不會錯的，那末，對於極端中央集的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目前納粹的德國，以及向來集權的法國政府，必定更能適用了。

雖然就全般而言，瑞士人對於他所謂較狹的家鄉（“the narrower homeland”）之眷戀，是以其本州、本谷、本地為對象的，然而有一段聖地，是該共和國全體人民所景仰的。這就是茹提理（Ruthi），即『林中空地』之意，位於布潤侖（Brunnen）對面呂賽爾湖之西岸，按照傳說，於一三〇七年十一月七日，由銳、西委斯和翁德華登之代表，以各該州之名義，在那塊地上，訂立了反抗奧國暴君之盟約。二十五年以前，這塊全國人民巡禮的聖地，受了旅館業的購買和擴充之威脅。然而瑞士學校的兒童，將其零用錢捐出來，湊成了一總數，足夠購買那片神聖的草

場，而將它贈予了聯邦政府。後者幸而頗爲知趣，將茹提理在其自然的形態之下，保存起來了。在那裏，有一塊不大觸目的小碑，是一八二〇年爲紀念茹提理歌之歌人所建，在空場之角落裏，有一所如畫而古老的瑞士式之田舍，現被用爲餐館和休息之所。在其他各點，該場仍如六百年以前之原樣，一片蒼翠欲滴有如仙境之可愛的園場，周長着茂密的林木，俯視數百呎以下藍寶石之湖水，並與米生（Mythen）之雙峯遙遙相對。茹提理是朝山者必遊之地，每年有千千萬萬的瑞士人去巡禮，就中有許多學校兒童遠足之集團，他們靜聽着年老的管理員，參雜傳說和歷史之講述時，頗有一種以主人自居的神情，但這是很可原諒的。

## 第十六章 瑞士國內之外僑及外來的勢力 (Foreigners and Foreign Influence in

Switzerland)

從前關於瑞士的作家，慣說其民主制度之成功，大致由於其人民中，外國人的數目不多之原故。我們懷疑，這種解釋是否值得從前的人那樣注意；不論如何，它現在是說不通的。誠然，在一八五〇年，在全國人口中，外國人民僅占一個很小的比例（百分之三），所以他們沒有什麼勢力之可言，因為，誠如當時所說，他們被本國人民「淹沒了」。一代以後，一八八八年之戶口統計，顯示他們為全國人口百分之八有奇。然而在那一年以後，外國人進口的人數，增加甚速，所以在一九〇〇年，出生於外國者之人數，達到了一一·六百分比。十年以後，這個百分比，達到了一四·七了——恰正和美國同年之比較的數字相等。在同他國接壤的各州中，其出生於外國者之比例，當然比較全國的百分比大得多了，於一九一〇年所記錄的百分比，略覺可驚：比如，日內瓦，四〇·四；白賽爾市區，三七·六；提省諾，二八·二。這種進口的外國人民，繼續增加，直到一九一四年方纔開始減退。依照最精密的估計，於那年移入的外國人民，竟達一七百分比了；但是因為世界戰爭之爆發，而交戰國家之許多國民，都因此被召返國從戎了，所以於一九二〇年，這個百分數，已降至一〇·四了。然而後來又有一個移民的新浪滾入了，而大家都料定，在本年度（一九三〇年），戶口調查中，它將揭示的百分數，同二十年前之高記錄，必定是不相上下的。



同其他歐洲大陸的國家相比較，在瑞士的外國人之百分比是非常地大。在這一方面，居第二位的比利時，於一九一〇年，也僅有三·四三百分比；法國，按照一九一一年之戶口調查，僅二·八六百分比。在後一國家中，當其出生於外國者，在全國人口中，超過了百分之一時，朝野上下，就已經感覺惶恐不安了。想到從前被瑞士登記的大得很多的數日時，就難怪在最近幾十年中，關於這個問題之討論，在民衆方面，逐漸吸引了更多的注意。真正覺得希奇的，乃是瑞士人對於這種情形所採取的態度，是那極端地鎮靜，以及他們一心利用立法的程序，來挽救這種危機之堅決。在近幾十年中，他們所招架的移民之兇浪，在比例上，雖甚至比較美國所招架者爲大，但他們並無熱烈仇視外人之情緒，也沒有像我們的不學無術者，美國愛國會，和三K黨等運動（Know-Nothing, A. P. A., and Ku Klux Klan movements）所煽動之縱情的騷擾。

自然，美、瑞兩國之外國人民，在比例上，雖頗相同，但這個問題之其他方面，就相差很遠了。第一，瑞士人不須應付在美國因黑人而發生的民族的情緒，也不須應付亞洲的和東歐劣種的移民問題。他們外國的人口，幾乎完全是從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鄰國而來的——德國、法國、意國和奧國。並且各該國的公民，大致都居留於和他們講同樣語言的瑞士地方，或如德國人的例子，至少也居留於同他們自己的語言，最相似的地方。所以，沒有任何顯著的傾向，把他們看爲笨伯或賤種（“Dutchmen” or “Wops”）。同這一層有關的，有一個頗有意義的事實，就是瑞士人顯然從未應用我們慣說的『熔爐』（“melting pot”）之比喻。並且他們也深知，因許多瑞士公民僑居外國之故，他們自己的工商業，可以收穫的利益，所以在處理移民問題時，頗願遵循一種互惠的政策。該國因爲土地

太偏小，而同德、法、意、奧等大國，又太爲接近，所以在這件事情上，即使想採取一種挑戰的態度，亦勢所不能。但如新近複決的投票所顯示，他們又絕沒有這種意思。

在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移入瑞士之人民，都是自接鄰諸大國而來的，而這些國家，又大致都是崇奉羅馬天主教者，這一事實，在一個頗有意義的問題上，再加上了宗教的糾葛（關於這一點，讀者可參閱本書前面第八章）。瑞士的市鄉（communes），因其儉約之特性，對於赤貧的外國民衆，大致會加在他們肩上的救濟的重擔，也極不願負荷。對於政治犯之護庇權（“right of asylum”），爲該國之一古老而榮譽的傳統，當然是附有條件的，即凡欲享受此種權利者，不得從事於宣傳、陰謀和不利於其所逃亡之國，或其他友邦之公開的行動。在事實上，它完全不是一種法律的權利，而不過是一種恩典（an act of grace），州政當局對它之運用，自一八八九年以來，是因着一位名曰聯邦檢察官（“federal attorney”）之特設的官員，而受聯邦之監督的。瑞士人對於政治逃亡者所加之護庇，雖非出於孟浪，然而他們在該國境內時，往往使其聯邦政府，陷於狼狽不堪的境地，這樣的事例，使主張禁絕移民入境者，更振振有詞了。比如於一九二四年，從旅瑞的德國行家和居民爲贊助希特勒復辟的叛變（Herrn Putsch to restore Hohenzollerns）而募集的三萬佛郎，在國議會中，引起了一番質問。當時一位聯邦行政委員，雖曾完全否認，有該項募捐的情事，但過了四年之後，從德國方面所洩漏出來的事實，充分證明了傳聞之屬實，使瑞士人民聞之不勝憤恨。

然而就一般而言，瑞士人對於居留在他們當中的外國人民之恐懼，尙不及他們對於外國的勢力侵入其事

業之惶恐。對於鄰國的資本家，在他們國內的、工業的和商業的經營之投資，他們頗覺可疑。他們嚴厲批評大學和中學所聘之外國教習。外國報紙之暢銷，使他們很覺不安，外國小冊子和書籍之輸入，也使他們不大放心。任何瑞士的報紙，倘使被人疑惑有外國的資本，雖僅有一部分外資，其勢力也必如江河之日下了。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之間，從某某交戰國家之正式宣傳機關所編印的戰事宣傳品，如洪水汎濫了瑞士全國，危害了其古老的中立政策，威脅了其和平以及其立國之基礎。過了十五年之後，關於這些用外力以控制其國策之企圖之回憶，仍然使他們覺得痛心。

因此，『過分外國化』（*Überfremdung*）是他們所深惡痛絕的。它不僅包括移民和歸化之管理——其實在一般局勢之中，這些是被看為次要原素的——也包括抵抗外來的知識勢力，拒絕各大鄰國所運用政治的牽扯，以及盡量遏阻外國資本之經濟的侵略。這一切綜合起來，對於國家的完整，就成了極大而令人不寒而慄的威脅，尤其是居於西歐正中心之渺小領土之一渺小的人民，從內部看起來，不勝其齟齬之情。抵制外來知識影響者，學校成了第一道防線，從旁輔佐之者，為文學、傳統和象徵。為抗拒四周強鄰之政治的牽扯起見，它不得不依賴和平之維護和對各方面的友誼之保持，外交政策之極端的謹慎，嚴格的中立，國際聯盟，將國際條約提請人民複決，以及——倘使萬不獲已——陸軍，或者以友邦所供給的軍隊為後援。現在提請選民表決的，關於瑞士人民應否接受外國政府所贈予的勳位和勳章之問題，在一個小範圍內，給了我們一樁絕妙的例證，顯示瑞士人如何抵制這種性質之勢力；因此在後面，我們將對此問題，稍微詳加檢討。

經濟的侵略，比上面所說他種外國勢力，是一種較為晚出的威脅；它的進襲途徑，因為是瞞着公衆目光的，所以其危險性，也許終竟會遠超一切之上。抵制這種威脅之顯然的防禦，是發展國內的資本，使其足以應付全國營業之需要，謹慎擲節一切資源，在雇主和傭工之間，保持和悅的關係，以及促進國內的工業和繁榮。關於這一點，值得回憶，導入瑞士鐵道收歸國有之一最強的動機，乃在使它們脫離外國股東之操縱。

回到本題之較為單純的方面，即關於外國人民進入或居住於該國之方面，當然瑞士不能以移民之武斷的限制或以額數制度之頒布，規定每年准許進口者之人數，來反抗其各強鄰。在它自己的受過高深教育的專門技術家、工程師、商人、旅館職工和一般精巧的工匠之輸出，和在本國有極大需要的各種勞工，例如建築業的工匠——泥水匠、石匠、石膏匠和粉刷匠、油漆匠、鑲嵌玻璃者、木匠、務農的工人和修路的工人、屠戶和補鞋匠、裁縫和洗衣工人、印工和釘書工人等之輸入之間，因着在國內和國外勞工市場情況之關係，它所求者，乃是所謂工人出口和入口貿易之相抵。在外表看起來，以依照公式表述而言，這是一個頗為簡單的問題，但在實施上，它是被一種經濟的性質之困難所糾纏的，而且由於喧囂的國家主義之情緒，是容易遭受突然之憤怒的。在這個領域內，基於相互諒解和善意之交涉，可有很大的成就，不僅瑞士惟然，就以整個世界而言，又何獨不然，尤其，倘使國聯和國際勞工局，能給予以相當的援助。

以入籍而論，瑞士人對於個人的行動，自然有更大的自由；但是直到最近，他們曾聽其自然。難於想像任何事情，比賦予外國人民以公民資格，對於整個國家之利益有更密切的關係。但是關於歸化、極端州權論，在瑞士通行

已久。聯邦憲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各州之公民，即爲瑞士公民」；而各州也照樣規定，被它們的一個市鄉歸化的任何外國人，即爲各該州之公民。在前述事實中，因着一種法律在各市鄉和各州賦予外國人民以公民資格之前，須先由聯邦政府根據其政治部的推薦，而予以批准，方爲有效之規定，國家的利益，誠然有了相當的保障。

所以，對於瑞士公民資格之候選者，批准或拒絕之權，在最後分析上，是歸之於全國三千多市鄉的。我們不能說，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有任何統一的辦法。政治的市鄉，是比較隨便的，但在領有貴重的公共草場和林地之較老的公民市鄉 (older citizen communes) 中，對於入籍者所徵之費頗昂。當其出生於外國者，於一九一五年開始趕辦入籍手續時，白恩之一小鎮，批准了二百六十三個請求入籍者，而向每人徵收了三百佛郎，但在同一時期中，該州之首城，僅接受了十五人。在世界戰爭爆發之前，外國人民，誠然覺得不大願意去請領入籍的證書，因爲在條約規定之下，他們居住在瑞士時，所享受經濟和社會的權利，差不多同瑞士公民完全沒有分別。所以在一九〇一和一九一三年之間，外國人民在該國之人數，因着出生的嬰兒和移入的人民，每年平均增加一萬七千人，而每年入籍之人數，僅四千。

世界戰爭爆發之結果，在瑞士，不特有各種宣傳品如潮湧來，也有外國人之雜色隊伍，蜂擁而至。特務隊、間諜、逃兵、革命黨以及戰時乘機壟斷市場者。這些宵小，雖極其討厭，但聯邦政府，總以忍耐處之，直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纔運用其全權，頒布了一個普通的法令，管理邊境警察，並對管理居住國內之外國人民，規定了某項辦法。然而戰事結束後，就免不了要返回常態；大多數關於外國人民之聯邦法規，也就被取消了，各州寬縱

的和各自爲政的制度，又復得勢了。但是，在民衆方面，因爲外國人民有人曾參加過戰時之陰謀，所以增強了對於他們的反感，其中尙有大部分，堅持不變。

對於外國僑民的敵對之另一因子，乃是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之間，他們相率趕辦入籍手續之勇猛。顯然，凡參加過這件事情的人，不都是因被對瑞士的制度和理想之純粹的擁護所感動的。在世界戰爭之前，四年中被歸化者之人數，尙不到兩萬，而在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期間，其人數，驟然增加到三萬七千以上了。結果，使各方面羣起要求將聯邦法律於一九〇三年所規定的居住三年之期限，大加展長。邦議會和國議會，順應人民的要求，於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通過了一個法律，將該項期限增至六年。然而同時，對於憲法之創制增補案，在各處流通着申請書徵求聯署，提議修改該項期限爲十五年，其中至少要有十二年，包括請求入籍前之兩年，必須確實是用於居住之年數。它更規定，凡入籍公民之兒童期，倘使其較大部分不是在瑞士度過者，只能享受投票的權利，而不能被選爲聯邦、州或市鄉之政治的官吏。同時，另有一個創制案，被提出了，建議凡外國僑民之行爲，犯了危害國家內外安全之罪者，在這樣的行爲中，特別指出『參加反對憲法之陰謀，或易於防害瑞士和外國政府間合好的邦交之政治的行動，以及違犯忠厚和信實以及有損瑞士營業之一般利益之經濟的活動，賦予聯邦政府以驅逐這樣的外國人民出境之權利和義務』。

於大戰時和其後數年中，瑞士人對於在他們中間之外國人，情感雖頗惡劣，但於一九二二年，這種情感，已開始退減了。上面提出的創制案，在關於居住的年限和對於未曾在瑞士長大之歸化公民，拒絕予以被選舉權之規

定上，無疑也是被認為太辣了。並且關於驅逐出境之規定，瑞士人覺得使中央權力太大，難免不發生弊端。因此，在一場遠不及預料的忿恨之運動之後，這兩個創制案，都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被極大多數的表決推翻了，沒有一州投了贊成它們的票。此之謂『政長張急』（“Ältnu strafft gespannt, zerspringt der Bogen”）。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所謂列克斯·赫柏林（Lex Hüberlin）法案，被民衆之三七六、八三二票反對和三七九四票贊成所推翻之後，更加證明戰時精神病減退了。該提案以對刑法之修正的方式，對於認為威脅憲政制度之各種騷擾，規定了嚴厲的懲治。贊成採納它的，實際上是全部保守的報章和全體保守黨之領袖，但顯然，瑞士人民比較他們政治的導師們，對於國家之安全，很少慌張的表露。殷實的瑞士公民，於同年年底，對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呈顯於他們之前的徵收資金稅之提案，所以非常惶恐者，就因為民主的主權，在上述兩案上之表現，因為對於國內外之過激的煽動者，兩者都顯示頗為優容。然而我們在上文業已說過，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那個社會主義的創制案，比從前任何創制案，受了人民更斷然的否決。所以總括起來說，瑞士人民意志在那一年中之各種表示，顯明其判斷不特圓融，而且穩健，在一方面，能設容忍過激主義，而在另一方面，當其他他們認為私產之基本的權利行將被人威脅時，他們會立時採取斷然保守的措置。

其後，在這個領域內，憲法的立法，以最低限度人民的反對所贏得的勝利，其範圍雖不大，但仍不無價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以三八二、三八一對二二二、二七二之人民的表決和十八半對三個半之州的表決，通過了一個憲法增補案（六十九條——三），頗希奇地顯證盡量向地方分權論讓步之趨勢。該提案之第一項規定：

『關於外國人民之進入和離開國境，寄居和定居於國內制定法律之權，屬於聯邦』。第二項向着擁護州權者，就暗送秋波了，其條文爲：『關於外國人民寄居和定居的事件之決定，由各州依照聯邦法律制定之標準主持之』。

第三項對於這個讓與，加上了一個重要的保留，即聲明，聯邦對於左列事件，有最後裁決之權：

(一) 關於各州延長或定居及寬容之准許；

(二) 關於違犯居住之條例；

(三) 關於各州之驅逐外人出境，其效力及於聯邦全部者；以及

(四) 關於拒絕給予護庇者。

另有一個增補案（第四十四條），是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以三一六、二五〇對一三一、二五〇之人民的表決，和十九半對兩個半之州的表決，所通過的，因爲它包含在某種條件之下強制歸化之原則，所以吸引了不少注意。該增補案，重述憲法對於歸化之一題材原有的一般規定之後，另加了如下的條文：『聯邦法律對於出生之子女，其父母爲外國人者，如其母爲瑞士籍，且其父母於子女出生時期，均居住於瑞士境內者，得宣告其子女爲瑞士公民』。具有上列資格之兒童，須於其母原來出生之市鄉，歸化入籍。這樣的一個兒童，雖能『按照本規定所列入之人民與其它所管轄之人民，享受同樣之權利，但對於純屬市鄉自治團體之財產，除州之法律，另有規定外，無任何權利』。這個增補案之下文，顯然爲平服州權擁護者之故，添入了如下之規定：『對於上列諸人，自其出生始至十八歲爲止，各州邑所用之救濟費，聯邦至少應擔負其半數』。



由於一九二八年增補案，對於出生地主義 (Jus soli) 原則之部分的採用，一俟補充它的立法完竣之後，估計每年將有一千八百至二千剛生的嬰兒，自然取得瑞士公民資格了。想到這些兒童的母親，在結婚以前，是瑞士的公民和兒童們，自己是出生在瑞士之國土的，而且將來大致都要進瑞士學校受教育，所以這個實驗，並沒有特別冒險的地方。事實上該增補案在起草時，曾經過極其慎重的考慮，包含着大部分試探的性質，想用以觀察輿論之風向，故此對於成功，原無多大把握。不料瑞士選民，在這件事情上，竟顯示了一種進步的傾向，所以將有進一步的建議被提出了，時常謹慎地逐步試探前進着，直到關於外國人民之歸化、寄居、定居等問題，成立了一個更劃一而邏輯的制度。

#### 關於外國勳位之問題 (The Question of Foreign Orders)

我們大致可以確說，美國憲法中之條文，被一般評註者忽略之程度，很少有超過關於「凡在合衆國政府下受俸或任職之人，未經國會之許可，不得接受外國君主或國家所贈與之任何禮物、俸祿、官職或爵位」之條文者。在另一方面，瑞士之歷史，幾乎沒有任何時候同外國君主或國家是完全脫離關係的，對於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也尚未找着完全滿意的解決。它既然是被包圍於君主的大陸核心之共和的沃壤，所以就連比初成立時的美國，也更容易被爵位之虛榮所蠱惑了。瑞士在這一方面所遭受之困難，大多由於國境之接壤；但是，我們必須說明其某些階級之公民，當其被尊榮的勳章和爵位所試探時，往往會拋棄了最嚴肅的民主的美德，這些人之數目，誠然不

多但其勢力頗大。這個意思，並不說我們美國人就應該採取一種自鳴清高，而瞧不起瑞士人的態度，因為我們的攢營勳章者流，在比例上，並不少於他們。然而因為他們在公共的事件上之勢力微乎其微，所以沒有人，似乎會爲此感覺不安過。關於瑞士人，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們因着外國的勳章，接受了更大的困難，所以他們曾竭力想找着一個補救的辦法。

瑞士新近曾舉行過莫熱特勝利 (Victory at Morgart) (一四七六年) 之四百五十週年紀念。它也許會利用這個機會，一面追憶狡猾的路易十一世之手段，利用在有勢力的廣爲分散津貼和貴重禮物之策略，他居然賺得這些人的贊助，甘願遣派其國人去參加一種戰事，其結果，使法國的君主，可坐享其利。在從莫熱特至馬銳各蘭諾 (Maurignano) (一四七六——一五一五年)，瑞士武功全盛時期中，皇帝、教皇和鄰近大小王侯，都無不罄金入國，賄買軍隊、聯盟、復仇之討伐或侵略之防禦。同盟之議會 (Diet of the Confederation) 於一五〇三年，公布了其有名的津貼法案 (Panzionenbrief) 禁止從外國王侯接受津貼和禮物。薩文黎 (Zürich) 在無數次說教中，曾大聲急呼，反對這種弊端，直至一五三一年，他在客百爾 (Kappel) 之不幸的早亡。那是一個強暴而混亂的時代，再加宗教的仇恨之困惑；外國的勢力，爲國內事件的頹廢和紛擾之主因。當代的人民，雖不以爲接受津貼就等於貪贓或叛逆，但其結果，誠如耳斯特·格勒底 (Ernst Gerold) 所說：『使本可以和平方法解決之糾紛，竟成了利害之衝突，關於對瑞士並無直接重要之問題，也結成了種種政黨憑借各種陰謀、賄賂、欺詐和強暴互作鉤心鬪角之抗戰』。

隨着瑞士武力之就衰，津貼弊害之毒焰，也少減了。但於其後三百年間，它仍舊是雇傭兵的買賣之背景。我們雖應該承認這種方式的移民之經濟的必要，是當時過賸的人口之唯一可能的出路，但是當其我們想像，當代富有的貴族們，以其貧寒的國人之血肉，作冷酷謀利之貿易時，我們仍不能不寒而慄了。從外國王侯之手，接受津貼和禮物之風氣，繼續至舊同盟之崩毀為止（一七九八年），對於這個極大的不幸，它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自私的各州之鬆懈的聯盟，顯然絕對無法抵敵強鄰在其公民中所散佈的金錢和爵位之勢力。

跟着法國之佔領（French occupation）（一七九八——一八一五年），對於國家之尊嚴，發生了一種新意識。有幾州，通過了憲法的規定，禁止從外國政府接受津貼和爵位，而下面一條（第十二條）加入了一八四八年之聯邦憲法：

『凡聯邦政府之委員，及文武官吏以及聯邦議員或代表，不得接受外國政府之津貼、或薪俸、或銜名、禮物或勳章。

上開各項公務人員，如已接受津貼、銜名或勳章，在其任職期間，應即放棄津貼之享受、銜名之稱呼以及勳章之佩戴。

但低級公務人員，經聯邦政府允許之後，得繼續接受外國之津貼。』

聯邦憲法，於一八七四年之普通修正中，保存了前項條文之外，另增加了一項規定：『在瑞士軍隊中，不得佩戴任何勳章，並不得享用外國政府所贈予之銜名』；和另一項規定：『凡軍官、下士或兵士，均禁止接受類似上述

之榮號。我們必須知道，上述各條文，如同我們自己的憲法之同樣的規定，僅適用於聯邦之公務員，一般普通公民，仍然可以自由接受外國政府所給與之勳章、勳位或津貼，只在他們充任公務員的時候，纔暫時放棄享用它們之權利而已。事實上，後一種事例是比較不常有的。在另一方面，普通公民接受外國政府贈予勳章之一事，自一八四八年直到現在，受了不少嚴酷的攻擊。

（註）各州之官吏，因不受聯邦憲法之拘束，所以他們也可以自由接受外國的勳章。然而有幾州的憲法，也曾有禁止其自己的官吏，接受它們之規定。

在世界戰爭之前，在這種小惠之施與上顯示最大闊綽者，爲與其接鄰之君主國家，特別是德國。在一九一八年德、奧都變成了共和國，而且取銷了勳章，並且自戰爭結束以後，意大利也曾減少了贈與瑞士公民以榮章之傾向。在另一方面，法國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曾發展了一種空前的慷慨。按照最近的估計，約計五百瑞士公民有佩戴該國所贈勳章之權利，而其每年增加的人數，不下三、四十人。

（註）按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之新浪利克時報（New Zürcher Zeitung）所載：根據其巴黎訪員所刺探的消息之一篇有價值的論文，在各國執有法國榮譽團（Legion d'Honneur）（即拿破侖一世所創設之勳位）所贈與勳章之人數如下：大不列顛，高級官員八百人以及最下級爵士一千六百人；意大利，十六團，每團兩百人；比利時，十團；美國，十團；西班牙，八團；希臘，四團；瑞士，兩團。按照同一來源，自一八八〇年以來，接受法國榮譽團的勳章之三百瑞士公民中，有許多是旅居國外的工程師、商人、醫生和社會工作者。在居於瑞士本國而接受了這種榮譽者之中，各種自由職業都有代表。教會領袖、醫生、銀行家、鐵道理事以及紅十字會之職員。

這種如甘露之勳章，大概是降在瑞士之西部的。沾此甘露之公民，大致都隸屬於能有效地影響輿論之各自

由職業——編輯、政論家、各州之官吏、大學教授、律師、醫生和銀行家。惹起最猛烈的反感來抵制外國的勳章之接受者，就是此種關係。瑞士之輿論，對於法國政府在地帶和稅則問題之外交上所取之態度，也久已表示不滿，並且在有幾方面，對於後者，濫施勳章頗覺可疑，揣測其作用，是欲在西部各州之有勢力的公民中，收買人心，使其私圖。關於這一方面之批評，普通是為負責的官憲所不睬的；但於一九二七年，邦議會開會期間，聯邦總統馬塔（Mata），曾蒞會隱約陳述，聯邦政府最近曾向一個鄰國的政府提出機密的表示，通知它在瑞士的立場勳章之濫施，是非所願有的。該政府在覆文上，曾提出它在其他各國所贈送的極多勳章之事實，以及這種勳章，是許多好名的瑞士公民，時常懇切攢營者之事實，竭力為其政策聲辯。

反對外國勳章者，因為深信上文所指之政府，對於這種弊端之取締，絕不願與聞或絕無能為力，所以決定訴之於創制。於是有一個修正憲法第十二條之增補案，被擬定了規定『凡瑞士公民，皆不得自外國政府接受津貼或薪俸、銜名、禮品或勳位和勳章。凡違犯此項禁令者，即不得享受政治權利』。

為避免過分的困難起見，該修正條文，另有一項規定，凡永久居住外國之公民，經聯邦政府之允許，得不受上項禁令之拘束。該項例外之動機，在於深信銜名和榮章對於旅居外國之瑞士人民，不特有益於社交活動，並有益於營業關係，使出口貿易可以活躍——卻說，這也是贊成居住國內的商人接受外國勳章者所常用的一種辯護。雖不盡能使人折服，並且依照該創制案，在合同之下，為外國政府服務所得之報酬，也被宣稱不屬於津貼和薪俸之禁令。最後，該新規定，在效力上，是不究既往的，意即凡在該增補案通過以前，已接受勳章者，得繼續保存它們，但

被選爲聯邦公務員時，就必須暫時放棄之。

在一九二八年的頭上，各種政黨之黨員，成立了一個『贊成禁止勳章創制之聯邦舉動委員會』（“Federal Actions Committee in Favor of the Initiative Prohibiting Decorations”）。簽名於其『告瑞士人民書』者，包括二十州之名流，其中有四十五位國會議員，幾佔該項團體四分之一的人數，就有十七人，是過激民主黨黨員（Radical Democrats）；十六人，是農民黨（Peasants Party）之代表（超過其集團之半數）；十人屬於天主教保守黨（Catholic Conservatives）；以及兩位社會政治黨（Social-Political Fraction）之黨員。在四月一日，即在其戮力尚未擴充到全國各處之前，據該委員會報告，它業已獲得了提出創制案所必須有的五萬人之簽名。其後，幾乎未經有組織的戮力，又增加了二萬五千人之簽名，這整個運動之費用，尚不到六千佛郎。在幾處地方，幾乎一切有政治權的公民，都加入簽名於其中請書了。

同時，全國報章，對於這個爭端，於長時間中主持了一番生氣勃勃的討論，其大部分是批評的，尤其是天主教和社會主義之機關報。前者提出了關於某項教皇的勳章之問題，而該舉動，委員會雖曾聲明，教廷既非外國政府，該項勳章，自在禁例之列，但這種正式的保證，仍不能令它們完全滿意。倘使它們承認其答案正確而滿意了，它關於教皇之政治的權利之含意，又將令它們不悅了。爭論之雙方，都因爲一九二九年頭上新梵蒂岡政府（“Vatican State”）之成立，而大受其窘了。社會主義的報紙，對於這個創制案之態度，大概是反對的，半因後者之主持人，據說是仇視勞工者，半因外國銜名之勢力，同外國資本主義企業在該國所運用之勢力，是不可同年而語的。

在對公共問題表示興趣之組織中，擁護瑞士獨立之民盟（People's 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Switzerland），是極端贊成該增補案的，該項組織，據其敵黨宣稱，頗有親德（Germanophile）的傾向。新瑞士社對於這個創制案，曾予以很大注意，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白恩所開的全體會員大會中，曾將它的各方面，詳加討論。在這次會議席上，大家的意見，頗不一致，最大多數發言人，都非常謹慎，惟恐得罪了羅曼斯各州之代表。後者在這種事情上，當然覺得他們自己是衆矢之的。最後，新瑞士社通過了決議反對住居國中之瑞士公民，接受或佩戴外國勳章，並籲請聯邦立法，對於這種事件制定罪刑。它又決定，在現行憲法條文未變更之前，聯邦政府應請求外國政府，如擬以勳章贈與居住瑞士國內公民，須先徵求其同意。

除了一些極端派和想利用政治的機會，以反對法國者外，大眾的意思，都以爲勳章之弊尙微，不應小題大做，致使該國之羅曼斯和日爾曼民族（Welsch and Deutsch）之間，重現分裂之危機。然而這種危險，似乎是不致發現的，因爲有許多熱烈贊成這個創制案者，乃是西部各州之居民。反對外國勳章者，以爲目前之德國，在這個領域內，雖與人無爭，但誰能保它將來不會增補其憲法，而也加入競爭之列呢？同時，瑞士倘不極力沒法保護其自己，全國不分東西，將爲勳章征服了，結果使外人在國內之勢力，將有喧賓奪主之一日。

在祈求白恩之人民擁護這個創制之公告中，提出了下列三大層意思：

（一）勳章之制度，是違反瑞士精神的。凡接受勳章者，對於贈與他勳章之外國政府，就負有爲其効勞之義務，因此遂至少將其獨立之一部分，拱手奉送予人了。

(二) 勳章之制度，是違反民主精神的。它促成等級和特權階級之不自然的形態。

(三) 勳章之制度，在人道的立場上，也是應該宣告不合的。它培植虛榮心、奴隸性和矯飾。

在上述性質辯論之外，擁護這個創制案者，竭力利用津貼和榮章，在瑞士歷史上所產生之惡果，以爲他們的主張之後盾。他們雖承認，以使政府腐敗的動力而論，後者誠不如前者，但往往喜歡引據一八一七年法國駐瑞士公使，塔力藍 (Talleyrand)，向其本國政府之獻策：『從前我們以金錢在瑞士賺得了擁護；現在既細於財力，我們就應該以勳章和其類似的東西之贈予，來獲得其擁護』。

在反對這個創制案者方面，最常採取的辯論之方式，是否認勳位和榮章是引進外國勢力之重要媒介。他們指出，即或受之者都是身居要津的人，但其人數，極其稀少；兼之，在一個非常民主而痛恨外國教唆之人民如瑞士人中間，他們接受了這樣的恩惠之事實，一旦令人起了疑心，即或沒有確實的證據，其乾脆的結果，或者就是不再見信於人民了，那末，當然就會下臺了。要人們爲這原故，被其國人鳴鼓而攻之者，在歷史上不乏前例。關於外國勳章之弊害，既然太過甚其詞了，擁護這個憲法增補案者，就不免要被入疑爲奸雄主義和地方主義 (Jennagooy and sectionatism) 之信徒，或犯了懼法心理變態 (Fancophobia)。反對該創制者，特別批評其懲罰條文，以爲僅褫奪投票權，不足制止普通公民去接受它們。有人建設，代之以罰金，但其數須大，纔能生效；另有人願意使它僅以憲法禁令之方式，而成爲一種不能執行法 (Lex imperfecta)，以爲只要通過了這樣的增補案，公衆的輿論就會發展一個有效的制裁了。就一般而言，反對該創制案者，理由頗欠充足，因爲他們不得不承認勳位和榮章之接受，



有擴充外國勢力之可能。在爭論之始，他們在報章上的宣傳，雖占了優勢，但瑞士的『元首』（“sovereign”），即其全體選民之意見，似乎趨於反對它們的地位了。然而，同時對於該創制案投票表決的日期，尚未公布，而民衆在這件事情上的興趣已大爲減退了。從某種觀點，這誠然不過是一個小池翻大浪而已，但是這場風波，也足以顯示瑞士人對於『過分外國化』的題材之激昂。

## 結論和權衡 (Summary and Estimates)

瑞士用以訓練公民之每種不同的機構所發生的作用，是如何重要？詳言之，對於良好瑞士公民之發展，下列機構各有貢獻若干？

- (一) 政黨？
- (二) 政府之文武各職？
- (三) 學校？
- (四) 教會？
- (五) 家庭？
- (六) 特殊愛國的和其他會社？
- (七) 語言、文學和報章？
- (八) 象徵、崇奉、藝術、音樂、戲劇？
- (九) 傳統和鄉土的眷戀？

對於如此廣泛的問題，非有暴虎憑河之勇，就不敢冒昧提出確定的答案。這裏不僅有如在『著者原序』中

業已自招的個人偏見之危險；並且也有從國家而來危險的入主出奴之見解。後者，似乎是不能避免的；比如，美國公民權衛瑞士政黨時，必須承認其心之深處，已被他關於美國政黨之知識填塞殆滿了。但著者，權衡瑞士公民訓練之各種不同的機構時，曾以他所有關於美國和瑞士以外其它各國之政黨知識，對於其判斷嚴加糾正，而竭力減少這個錯誤之因子。

免除上述困難之最妙的方法，或者是學校中記分數的辦法。每位有經驗的教員，都深知它們所包含的武斷的要素；但是，它們對於成績之種類所提出的辦法，頗足以顯示學生成績之分辨，並免除粗疏的不公平。令「一等」等於最優、「二等」等於優良和「三等」等於及格，我們就能以頗大的勇氣，為所考慮的每種機構標定一個等第了。

但，讀者也許會問，在學校中所用的等於「劣等」、「須補考」和「失敗」之「四等」、「五等」和「六等」，為何不用呢？坦白地說，它們在瑞士的事情上，是用不着之。因為該國之唯一最大缺陷，酒毒，不是上列機構之一，雖我們可以將一向不設法充分滿雪這種弊害之責任，歸之於教會、家庭、改良會社和政黨。不許婦女參政，也未被包在上表中，雖然，倘使我們高興，這些同一的制度，對於這個問題之冷淡，也是應受相當責備的。至於政治的腐敗——現代民主國家之脫不了的罪累——瑞士誠如鶴立雞羣。白費士（Brice）敘述，他曾問一位博學多聞而明晰的瑞士友人，關於白恩政府之最大的過失，以及那位友人如何回答他說，國會中各委員會間，或於夏季，以公費寄居於山中避暑勝地之旅館中，而進行其研究工作。於是「現代民主國」（“Modern Democracies”）之可尊敬的

著者，以非尋常的幽默回答說：『假使你不是在講笑話，而且這是你所能招認的最卑污的罪惡，那末，想到巴黎和蒙特利奧（Montreal）、匹茲堡（Pittsburgh）和辛辛那提（Cincinnati），借用我們兒童的讚美歌之詞調，感謝使你成了一個幸福瑞士兒童之上帝』。

他在現代民主國中，對於所研究的六個政府——美國、法國、加那大、奧大利亞、紐西蘭和瑞士——所作最後的比較，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一切美德上，即普通人之智力、知識階級急公好義之精神、擁護國家統一的情操之存在以及睿智地有效的輿論之存在，在事實上，白賈士都將瑞士列於首位。同樣，在檢閱這六個政府之各種可觀察的缺陷時，即行政者不能維持法律和秩序；行政的浪費；行政者、議員和選民不忠實；法律之誤用；政黨之精神和權力；政治官僚化；以及金錢之勢力，他也宣稱瑞士政府之過失最少。

著者雖畢慮上述種種困難，並備具相當敬意，但仍不揣冒昧，將瑞士公民訓練之兩種機構，列於『三等』——教會及家庭；三種列於『二等』——政府職務，特殊愛國的和他種會社，以及語言、文學和報章；四種列於『一等』——政黨、學校、象徵以及傳統和鄉土之眷戀。

茲將每種略加說明，評定教會對於公民訓練僅有及格的貢獻時，顯然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應立即劃出清晰的界線。後者，以其各種無數社會的組織，為四個主要政黨之一的本體和意志。但是，這兩種宗教信仰，自一千八百四十幾年的鬭爭以來，顯然已入於冷靜狀態了，新教誠然比天主教尤甚。在唯物主義日漸強盛的時代，經濟的忙迫，已將神學的興趣，拋在一邊了，身當這種潮流之衝者，不僅瑞士，西方其它各國又何獨不然。所以該國宗教各

派別之領袖們，要想如美國新教各宗派之代表，在一九二八年總統選舉上，大露其頭角，或以前在抵制三K黨運動或在擁護禁酒法令上之鬪爭，就誠然是匪夷所思了。我們如此，可以十分虔誠地加上一句，『感謝上帝』；而且因為宗教的情緒，在今日瑞士之政治中，比較在法國、英國、意大利或我們自己的國家中之政治中，是一個頂小的紛擾的因子，我們也應感謝上帝。所以在其公民訓練機構之地位，雖僅為『三等』，但瑞士教會，在其活動之本位上，也許應有一個較高的等級，因為它不僅指出進天堂的路，也預報『地下平安人蒙恩』。

瑞士之家庭，同其他西歐各國相比較，在公民訓練機構之地位上，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也沒有顯著的效率；因此只給了它一個『三等』。在離婚率上，美國打破了全世界基督教國家之最高記錄，而瑞士同美國最為接近。——不管這件事是否被認為完全不好的徵候。兼之，瑞士婦女，一天沒有參政的權利，每個家庭婚姻上之更重要配偶，對於國事就被迫而依賴所謂委托代表制（*Volontarische repräsentation*）之古老的謬言了。在總帳之另一面，我們能設登記婦女們所享受的經濟和社會的平等，她們已成立的無數有勢力的組織，在古老的市民和農民的種族中之祖先的崇奉，在人民一切階級之優秀分子中，所通行的確實優美而簡單的經濟的家庭生活，最後，對於兒童之非常強烈的愛護和興趣。瑞士婦女，雖遠不及美國婦女之解放，但她們仍然可為其它歐洲國家之姊妹們所豔羨。在上述各優越的因子之外，然而它們也是在其國所常有的，在瑞士家庭生活中，沒有什麼可以推薦予其它國家，以便改進其訓練公民資格之方法。

現在，轉到被認為應得『二等』或好分數之機構，我們應該承認，在將語言、文學和報章列入此等時，感覺了

極大困難。或者，我們對於這些應該加以分別的考慮和評議。語言之機構，在意義上同文學和報章之機構，實在幾乎完全兩樣，報章同語言，當然尤其不同了。在各鄰國中，語言和方言之種類雖較少，但它們實在是長久的冤仇，和不少暴亂之原因。在這一方面的惡感，在瑞士未曾產生類似的結果，當然不是由於其人民所講的德語、法語和意語之特殊的優長。反之，語言的紛歧，在到處都有崩解的趨勢，瑞士何能例外，一九一四年，對於這個事實，曾有過充分的證明。在瑞士勝過這些趨勢之功勞，屬於其他機構，尤應歸功於特殊愛國會社、政黨和學校；其次，也不無勞績者為教會和武職。

就全體而言，報章在反抗語言紛歧而維護國家統一上，也有很大貢獻。但是，除了為瑞士報紙特有的非常優越的智力和穩健的判斷，它所加於公民訓練之過程者，沒有一樣不也為它國所共有。所以拆開以後，它似乎僅應得一個『三等』或及格的分數。在另一方面，瑞士的文學，在其自己之權利上，確然應得一個『一等』。它的供獻，不僅在於像客勒（Keller）和史匹特勒（Stifteler）等之偉大的人物，也在於一大羣較小的作家，他們在三種國語和數十種方言內，曾宣傳中立和平及國家的統一，重新改造瑞士靈魂之本質。詩人和作家，在其同志國人中，所受的普遍的尊敬，足以顯證他們對於公民訓練所作貢獻之基本的主要性。

特殊愛國的和其它會社所以應得一個『二等』或好分數一半，因為它們在各種職業團體中之數量和種類。以其總積論，它們是很平庸的，但從無數小規模社會單元，對於民主的方法所供給的優美的訓練，以及從它們自己的聯邦的機構所發展的合作習慣，在各地政治圈中，是被反映的。因為這種訓練，再輔以在地方政府之參加

中所得之訓練，我們可以發見極多屬於每個社會階級之公民，至少有充小領袖之資格。除了存在於瑞士的極多較爲平庸的組織外，有兩個愛國會社，值得特別一提，因爲它們所發明的方法，是很值得它國模倣的——瑞士公民科聯合會，及其對於民衆教育之廣大而縝密的計劃，以及新瑞士社，在其爲瑞僑之服務上和爲國是之高深的討論上，它都作了具有最大價值之貢獻。

政府職務：文職和武職，也得了一個『二等』或優良的分數，爲分別權衡起見，它們也可被拆開。單以文職而論，因爲它是弊絕風清的原故，所以應得無限酬謝贈品；在效率上，它略超於均數；但以其組織是爲保障政府雇員之利益而論，它就簡直同瑞士商人、工人和農人所組織許多類似的聯合會，完全沒有分別。它在後一方面，當然是以擁護一個階級之利益爲大前提的，雖然對於國家的福利，也絕不是不加以相當的考慮的。在另一方面，武職在範圍和宗旨上，就完全是國家的；它在事實上，是包括全國男性成人的。在新兵學校中，它雖僅應用一個最短期的訓練，但它利用精練科目、射擊的規定以及各種軍事俱樂部，使新兵學校之畢業生，終身不致和它斷絕關係。和具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之瑞士公民接談，只除了極端過激主義者不計外，令人關於武職訓練公民資格之效力，完全沒有疑問了，想到所包含的經費和犧牲之微細，這個事實，就更令人驚奇了。所以單就軍事訓練而論，它是應得『一等』而非『二等』的。

最後達到了應得『一等』之各機構，凡曾實地觀察過瑞士生活者，沒有人還會反對將這第一把交椅奉予各種象徵——典禮、紀念、節日、旗幟和紋章之應用；古代服裝之穿戴；射擊之崇奉；健身體操和唱歌、藝術、音樂和戲

劇之培植。這一切事情，都是由全體民衆快樂參加的；其中有幾種，其發展之程度，是它國從未聽聞的。例如：精射術、露天戲劇；並有一種是絕對踏破鐵鞋無尋處的 (*sui generis*) —— 全民大會之生氣勃勃而動人的儀式。

傳統和鄉土之眷戀，幾爲上述一切象徵所強化，也應得一個『一等』。鄉土之眷戀，是反映於強烈地方自治主義者，不僅可見於政府的機構，也可見於政黨之組織以及事實上一切其它普及全國之會社。最大多數瑞士人，一提到強大集中的權力，就不由談虎色變了；他們所謂聯邦主義，以州權和邑權予以極大牽制的 (*horizontal counter-weighted by states' rights and communal rights*)，已同其性癖結了不解之緣了，所以應被視爲他們對民主主義之凌駕一切的忠貞之補充，而不是同它相反的。傳統和象徵，如此照耀地方自決之原則，所以其詩的意義與其政治的意義，是相等的。

最沒有疑問的，乃是瑞士學校應得一個『一等』，因其對於公民教育有優美貢獻。它們比任何其它機構更廣汎地將其戳記，印於每個個人和全體公民了。茲將它們在許多方面之卓越，列舉於下：在公民教育上之廣大民衆的興趣以及關於其方法之研討；語言教學之精良，以縝密的計劃抵制外國的同情之優勢；許多科目以及許多特殊商業、工業、農業和家事學校之直接實用的價值；對於本國作家著作之有力的介紹；鄉土學及公民教科書之出類拔萃的性質；率領各種年齡的兒童作教育旅行之普通的慣例；多於一切而超乎一切之上的，乃是其學校教員之優良的訓練、忠實的精神、對於政治之超然的态度以及能孚衆望。如此優良教育制度之結果，在瑞士生活之各方面，都是顯而易見的；比如，不僅在我們料想可以發見它們之工業上、商業上、農業上、文官職務上以及報章上，



並且也在政黨及其附屬的各種組織上，這就是一個美國的觀察者，所斷難料想的事情，因為我們的政黨，很少以教育的方法著稱者。

至於政黨，評定其資格爲「一等」，在著者雖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曾將它們留作最後的討論，因爲有一位偉大權威之名著，可被引來反駁他的見解。白費士在其「現代民主國」中評論道：

「政黨精神之在瑞士，比在多數民主國中，較爲巽懦，使全國輿論紛歧的問題，很少激起熱情……政治的組織，比英國或美國或奧大利亞，其團結較不堅密，其工作較不緊張……關於政黨組織之比較的不足道之最確鑿的證據，乃是沒有政黨基金……在其它民主國中（或者挪威應除外），沒有如此渺小的一個專業政治家之階級……在公共生活中之個人的野心和個人的領袖才，比在任何其它自由國家較不顯著」（卷一，第三十章）。

除了某項保留外，這一段評論的文章，是很正確的；不過其結論說，政黨在瑞士不是一種強大的勢力，似乎是頗易滋生誤會的。我們承認，政黨之精神，在該國比較它處巽懦，而使全國輿論紛歧的問題，很少激起其熱情；但一個以透澈教育的方法，應付人生種種疑問題之人民中，這豈非正是我們意料所及嗎？在瑞士，我們雖不大能看見滑稽的鬧熱（slapstick）之表演和投時好的政黨精神之披露（只有連動選舉之招貼，最近如春花之怒放，是其唯一的例外），但有極多冷靜的思考和清醒的反復辯論，其結果，對於國家的進步，更有裨益，而對於國內的和平，更少紛擾。

倘使著者之反駁，就此爲止，也許就更確鑿了。然而，他應該以絕對的坦白，承認在白賚士兩度觀察結束的年度，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九年以來，在瑞士所崛起的某項政黨的爭端，曾發展了一種十足的政黨精神。例如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社會主義者，在政治舞臺上，方始成了一個要角。他們在一九二二年，所提出徵收資金稅之創制案，誠然是剝去經濟利益之心臟的企圖，但其失敗，並非由於政黨精神，而由於辯論。茲另舉一例，將關於加入國聯之一九二〇年之複決——這一爭點，是與瑞士政黨都加入作戰的，接着是普及全國各處之辯論運動——來同在美國關於同一問題之辱罵和怨恨的爆發相對比，後者確實是被政黨精神之每種可能，令人齒冷的表露所玷污的。

誠如白賚士之評語，政治組織之在瑞士，比在英國、美國或奧大利亞，「其團結較不堅密」。事實上，在那個州權主義和堅實個人主義之國家中，每種會社集團，都比在全世界任何較爲集權，或甚至聯邦化的國家中，更爲鬆弛。但我們可以懷疑，這位尊顯的英國權威，緊接的一句評語，即謂瑞士政黨之工作，比它國較不緊張；以及他從政黨基金之缺乏，以政治爲專業者之相對小的階級，個人領袖和個人野心之不顯著，所作之結論。誠然，議員們不像在奧斯大利亞，是被人率領整隊走進預選會場，而投清一色政黨之票的（voted by solid party blocks）；在理性之支配下討論之政制（government by discussion），繼續通行於瑞士，在最後判決上，是以創制和複決爲調劑的。除了這個唯一的例外，瑞士政黨工作，並不比被提出的其它各國較不緊張。反之，它們的工作，是更緊張的，然而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就是它們使用較少的雇傭兵和較少的機關，較少高貴政治大將，但較多勝任而快愉的副

官、軍曹、伍長和兵卒。後者，既然是志願工作者，所以大批政黨基金，是用不着的；但在瑞士所有的極多關於選舉和複決運動之工作，是比在美國以更聰明而有效和絕對誠實的方法進行的。

當其一個人從反駁而進到正面的辯論時，就必須在關於政黨在瑞士之作用，正式陳述一個確定的結論之前，他就不特應該儘先考慮其自己之略為鬆弛和分權的機構，並且，也應先考慮其無數附屬組織，如工會、農民聯合會、商會以及天主教俱樂部。這些，都是其工作之後盾。我們可以將瑞士的政黨，比作矛尖，其矛幹是握在許多人之手中的，以便指揮並鼓勵攻守之戰鬪。當然，這是和它國的情形大致相同的；但是，其間之關係——比如，在經濟集團和社會民主黨或農民黨之間的關係，又或在教會俱樂部和天主教保守黨之間的關係——在瑞士，比在它國就更為直接而確定了。自然，如此密切的聯繫，會立即引出的問題是：究竟有多少功勞，應該歸之於政黨之本體，和有多少功勞，應歸之於在其旗幟下進行着的各種不同的附屬集團。在瑞士融和的工作，已經有了很大進展，所以兩者間之分解，是不可能了。我們也可以說，有許多不同的經濟和其它社會的集團，雖隸屬在政黨之下，但在政治領域外，它們為自己經營的事業，也有很大成功。然而，以它們推進黨務之戮力而論，它們在事實上，是後者之分部，追求同一選舉、立法和複決之方略。這兩種各自絕對強大而聯合一致的勢力之合成的效率，所以應該歸之於政黨。

自然這個問題之確實籠統的解決，使各種營業的組織，在公民訓練之領域內，都居於次要的地位了。這樣的組織，是有勢力的，對於這個事實，我們在上文，業已予以承認——其內容及為政黨所追求的目的，足以顯證如此

運用的權力；但其權勢，尚够不上當代瑞士人關於政治的分解（*Verwirtschaftlichung*）之慨歎所暗示的程度。該國一切經濟集團，不論是由資本主義者、或勞工、或農民所組成，雖實在都有透澈的組織和勝任快愉的專業幹事，但是它們大家對於民主政治之正大光明的手段，已經很習慣了，所以它們大致只限於互相牽制，而沒有任何集團有壟斷一切之野心。最後，顯然物質的興趣，雖正繼長增高，但並未將從若干世紀以來，共同的瑞士生活所發展之理想的社會興趣，排擠除去，這在馬克斯的信徒們看來，當然是不贊成的。民主主義和地方自治、中立與和平、語言、宗教和傳統，仍然可以奮發瑞士人之心志；倘使在他們的國家之畫面上，不儘先安置這些，即其國家之家神（*national Larves and Penates*），就是如何煞風景的事哩！

從上述之觀點，我們必須承認瑞士的政黨，在該國之政府內和在公民訓練內，都是主因（*prime factors*）。關於後一職能，還有更多其它特殊原因，我們應予政黨以最高的分數：從教徒的反動到共產主義的過激，它們提出了極多不同的政策，在許多較小的會議和在較大的年會中所舉行之透澈的討論，關於這種討論之流傳，政黨文獻之教育的品質，而最特出的，為訓練領袖、為體操和戲劇以及為優良而結實的政治教育起見，它們在其自己的組織中所建設的俱樂部之大綱。上舉一切活動，強化了具有直接得票的性質之活動，結果，使參加選舉和複決投票之百分比，相應地被提高了。最後，全民大會，雖不屬於政黨之機構，而屬於州政府之機構，但在這些純粹民主型之如畫的集會中，提出討論問題，並敦促人民赴會者，照例仍然是政黨或其集團。市民大會，也有同樣情形，它們對地方自治所給人民之初級訓練，有空前的效力，它們在瑞士在各城市之外，是普遍的。使瑞士政黨成為公民教育

如此有效動力者，在最後分析上，不僅是其智慧和博大，也是其領袖和全體黨員所特有之忠實。

然而對於形成瑞士公民資格方法之問題，僅憑分析是不能有適當解決的。充其量，它只能分別權衡所包含的因子。然而上文所討論的每種機構，都與一切其它機構是緊密交織的。顯然，其結果，在公民教育方面，乃是代表其合成的貢獻之一綜合體。並且這個綜合，並非僅為最近幾十年中的事情；在它後面，有一個直接的遺產，富於傳統和理想，是從六個世紀以上的共同民主生活所遺傳下來的。所以，將愛德門·白克(Edmund Burke)之堂堂文詞，用於瑞士人，比較用於一切其它現代國民，都更愜洽：『國家……是一種大家合作共營的事業，它不僅是為滿足肉體慾望之合作。它是在一切科學上之合作；在一切藝術上之合作；在一切真善美上之合作。這樣一種合作之目的，既不能達成於若干世代中，所以它不僅是現代人與人間之合作，也是現在、過去和將來人與人間之合作。』『一種在一切真善美上之合作』，誠然是一個頗為超脫的概念。瑞士人自己因為過慣了樸直的生活，所以對於浮誇的文詞，不以為然；比如對於一位過分獎飾他們的外國人，稱其國家為『一個小的現代烏托邦』(“little contemporary Utopia”)，他們就覺得慚愧不安了。他們雖非烏托邦，但沒有任何其它國民，是如此深沈地而如此意識地，浸潤於理想國家之目的者，或如此情願工作，尤其是利用教育，以達成這些目的。

對於世界一切其它民主國，瑞士的榜樣，提供了一種如此鴻博而富麗的教育，所以它們對於如此操守堅定，勇敢而辛勤，如此切實而如此理想主義的一個國民，應慨然予以無量的頌讚。